经济科学译库

CENGAGE Learning

美国经济史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0th Edition)

（第10版）

加里·M·沃尔顿
Gary M. Walton
休·罗考夫 /著
Hugh Rockoff

王 珏 钟红英 何富彩 李 昊 周嘉舟 /译
王 珏 钟红英 高梦沉 /校
王 珏 /总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CENGAGE Learning™ 圣智学习

经济科学译库

美国经济史

（第10版）

加里·M·沃尔顿
Gary M. Walton
休·罗考夫 /著
Hugh Rockoff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10th Edition)

王 珏 钟红英 何富彩 李 昊 周嘉舟 /译
王 珏 钟红英 高梦沉 /校
王 珏 /总译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国经济史/沃尔顿，罗考夫著；王珏等译．10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0
（经济科学译库）
ISBN 978-7-300-14529-7

Ⅰ.①美… Ⅱ.①沃… ②罗… ③王… Ⅲ.①经济史—美国—教材 Ⅳ.①F1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06979号

经济科学译库

美国经济史（第10版）

加里·M·沃尔顿 休·罗考夫 著

王 珏 钟红英 何富彩 李 昊 周嘉舟 译

王 珏 钟红英 高梦沉 校

王 珏 总译校

Meiguo Jingjish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85mm×260mm 16开本 **版 次** 2011年11月第1版

印 张 43.75插页2 **印 次** 2011年1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961 000 **定 价** 7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由于经济史研究的繁荣发展和经济的迅速变化发展，这部新版的《美国经济史》很有必要。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快速扩张，以及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都提供了研究美国经济史的新视角。此外，2001 年 9 月 11 日对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的恐怖袭击事件以及随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已经给美国的未来蒙上了一层不确定性。这些事件提高了理解经济增长和变化的源泉的重要性。

为了正确说明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经济福利的变化速度，第 1 章一开始就以 20 世纪的美国生活为焦点，讨论大多但不完全是从经济视角进行的。说明了与我们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时代相比，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如何显著不同。从 1900 年至 2000 年在生活水平、寿命以及工作和消费方式等方面的显著对比，为我们所有人提供了一个“提醒信号”，提醒我们即将展现在我们这代人以及下几代人生活中的变化。这个“提醒信号”是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目的：为未来做准备。正如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教授在她的《再思考》（*Second Thoughts*）一书中所告诫我们的：为未来做准备，我们最好用过去的经验来武装自己。

这个版本设置了全新的专栏“新观点”，其中对当前问题和过去经历进行了类比，比如，当今的禁毒问题和 20 世纪 20 年代的禁酒问题，以及今天和过去的战争融资问题，这里只略举一二。当然，经济史学家总是为他们的学生建立这些联系，但我们相信，通过在书中提请读者注意它们，我们强化了过去的教训对现在的教育作用。也许同样重要的教训是，对过去的详细研究是确定历史经验的相

目　录

第 1 章　增长、福利和美国经济 …… 1

美国人：1900—2000 年 …… 1

带着目的去学习 …… 11

第 1 部分　殖民时代：1607—1776 年

第 2 章　成立殖民地 …… 29

航海发现的欧洲背景 …… 29

葡萄牙和第一发现 …… 30

葡萄牙和西班牙：不断扩张的帝国 …… 31

后来者：荷兰、法国和英国 …… 33

英国在北美的第一批殖民地 …… 35

早期的改革 …… 36

人口统计学变化 …… 42

第 3 章　殖民地的经济活动 …… 55

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稀缺 …… 55

资本稀缺 …… 56

农业的主导地位 …… 56

天然产业 …… 62

制造业 …… 66

职业群体 …… 70

第 4 章　殖民地的经济关系 …… 74
英国重商主义和殖民地 …… 74
出口、进口和市场 …… 76
海外运输和贸易 …… 79
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 82
货币和贸易 …… 83
货币、债务和债权人 …… 85
与英国的贸易逆差 …… 87
第 5 章　经济进步与财富 …… 95
殖民地经济的增长和改变 …… 95
技术进步和生产力 …… 104
对早期增长率的思索 …… 108
1774 年人均财富和收入 …… 110
收入与财富的分配 …… 110
第 6 章　三次危机和走向反抗 …… 117
旧殖民政策 …… 117
新殖民政策和第一次危机 …… 120
更多的变化和第二次危机 …… 122
第三次危机和走向反抗 …… 124
第 2 部分　独立战争、早期国家以及战前时期：1776—1860 年
第 7 章　新生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 …… 137
战争与经济 …… 137
《美国宪法》 …… 140
美国独立与经济变化 …… 143
经济变化的数量分析 …… 145
战争、中立以及经济复苏 …… 147
第 8 章　土地和早期西进运动 …… 155
公共领地的获得 …… 156
向西部迁移 …… 163
向西南迁移和棉花 …… 170
向遥远的西部迁移 …… 174
第 9 章　交通运输和市场发展 …… 180
美国内战前的交通运输革命 …… 181
西部贸易的路线 …… 182
汽船和天然水道 …… 184
公共与私人：天然水路上的主动性 …… 189
运河时代 …… 190
火车 …… 192
公路 …… 195
美国内战前区域间增长假说 …… 197

海运 …… 198
第 10 章　市场扩张和第一次产业转型 …… 205
美国制造业的早期变化 …… 205
工厂生产的先决条件 …… 213
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 …… 218
防止外国竞争 …… 219
第 11 章　早期工业时代的劳动力 …… 227
劳动力和人口的增长 …… 227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分布和构成 …… 229
移民的影响 …… 232
制造业中男工的工资 …… 234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 239
早期的工会运动 …… 240
普通劳动人民的政治进步 …… 244
第 12 章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银行业 …… 250
美国的货币单位 …… 250
金银复本位制 …… 251
银行票据成为纸币 …… 252
美国第一银行 …… 254
美国第二银行 …… 257
经济波动和美国第二银行 …… 261
规范州立银行的尝试 …… 263
淘金热的经济后果 …… 266
第 13 章　奴隶制的保卫和地区冲突 …… 271
西半球的非洲奴隶 …… 271
美国对奴隶制度的最初约束 …… 274
种植园的效率 …… 277
经济剥削 …… 285
经济巩固与地区收入 …… 287
政治妥协与地区冲突 …… 289
第 3 部分　重新统一的时代：1860—1920 年
第 14 章　战争、复苏和地区分化 …… 299
战争的经济学 …… 300
美国内战与北部工业化 …… 303
南方经济发展滞后 …… 306
奴隶制度的遗产 …… 312
第 15 章　农业的西进运动 …… 323
耕地的扩张 …… 324
联邦土地政策 …… 325
联邦土地政策的影响 …… 327

农业增长及其变革 …… 329
农民的艰难年代：1864—1896 年 …… 332
农民的政治性组织 …… 338
联邦援助农业的开端 …… 341
自然资源保护：第一阶段 …… 342
第 16 章　美国铁路和经济变革 …… 348
横贯大陆铁路 …… 349
总体建设：速度和模式 …… 350
铁路建设与铁路需求 …… 354
土地赠与、金融资助与私人资本 …… 355
不择手段的金融活动 …… 357
铁路市场中的价格设定及监管 …… 358
铁路与经济增长 …… 365
第 17 章　产业的扩张与集中 …… 371
结构变化与产业构成 …… 371
规模经济与产业集中 …… 382
产业集中运动的两个阶段 …… 384
立法与法律行动 …… 389
第 18 章　美国劳动者意识的出现 …… 397
人口统计学变化及劳动力供给 …… 397
移民、政治以及经济影响 …… 401
战后时期工人的收益 …… 405
工会、雇主及冲突：1860—1914 年 …… 411
劳动者收益与工会 …… 416
第 19 章　战后时期的货币、价格和金融 …… 422
新形式的通货 …… 423
黄金、绿背纸币还是金银复本位制？ …… 427
金融资本、投资银行与国家债务 …… 438
银行恐慌与联邦储备制度的确立 …… 440
第 20 章　国内外商业 …… 447
城市化 …… 447
营销与销售 …… 449
产品差异和广告业 …… 456
消费者保护的发轫 …… 457
对外贸易 …… 461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采纳 …… 464
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美国 …… 467
第 4 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6 年
第 21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 …… 475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 475

美国参战 …… 477
用命令指挥系统替代市场 …… 481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劳动力 …… 484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 486
第 22 章　兴旺的 20 世纪 20 年代 …… 491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社会变迁 …… 492
新商品及中产阶级的兴起 …… 493
20 世纪 20 年代的劳动力 …… 498
关于土地 …… 502
富者越富而穷者益穷？ …… 504
宏观经济政策 …… 505
国际发展 …… 508
大牛市 …… 509
第 23 章　大萧条 …… 516
大萧条的规模 …… 517
大萧条的根源 …… 518
金融危机的作用 …… 524
为什么美联储没有拯救银行体系 …… 527
20 世纪 30 年代的财政政策 …… 529
部分复苏，然后新的衰退 …… 530
它会再次发生吗 …… 534
关于资本主义，大萧条告诉了我们什么 …… 534
第 24 章　新　政 …… 539
第一次新政：救济与复苏 …… 540
农业与新政 …… 546
劳动力与新政 …… 552
最高法院与新政 …… 556
第二次新政：福利国家 …… 556
新政的批评者 …… 558
新政的遗产 …… 559
第 25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 563
战争动员 …… 564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 569
工资和物价管制 …… 572
战时繁荣？ …… 575
战争期间的劳动关系 …… 576
少数族裔的战时经历 …… 578
战争期间的农业 …… 579

复员和转业 …… 582
第 5 部分 战后时代：1946 年至今
第 26 章 美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 591
战后时代的政府规模 …… 591
自由时代：1945—1976 年，继续扩张 …… 596
保守时代：1976—2000 年 …… 600
农业 …… 602
环境和自然保护运动的遗产 …… 608
经济学原理能解释政府的扩张吗 …… 611
第 27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 …… 617
凯恩斯主义时代 …… 618
货币主义和它的传承者 …… 629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比大萧条前更稳定吗 …… 636
第 28 章 制造业、生产力和劳动力 …… 640
就业模式 …… 640
破坏性创新风暴 …… 641
产业组织的变化 …… 648
服务业的兴起 …… 651
劳动力中妇女的角色变化 …… 652
少数族裔 …… 657
新的移民 …… 661
工会 …… 663
实际工资 …… 665
第 29 章 过去的成就，未来的挑战 …… 670
过去的成就 …… 670
实际收入增长迅速 …… 671
未来的挑战 …… 678
衰落的先知 …… 683
译后记 …… 687

第 1 章　增长、福利和美国经济

美国人：1900—2000 年

当罗格斯队和普林斯顿队在 1869 年进行第一次大学橄榄球比赛时，几乎没人能预见到橄榄球将对 21 世纪的美国生活产生的影响。从球迷每周大量投入球队的金钱和激情，到与季后超级碗赛（season-ending bowl game）相关的媒体炒作和聚会，橄榄球是真正的大生意，在大学和职业玩家中都是如此，而且比赛的变化可真大！

在 20 世纪初，一些中西部“土地赠与学院”（land grant colleges）成立了橄榄球队，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是最早建立球队的大学之一。獾队——正如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普遍的叫法——有着经久不衰的体育传统，这也提供了一些有趣的历史事实。如图 1—1 所示，在 1902 年，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由平均体重为 173 磅的球员组成。大多数运动员“要踢球的两边”（play both sides of the ball），既进攻又防守，而且很少换人。今天的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缺乏专业化。到 1929 年，球员的平均体重适度增加到 188 磅，并且球员在逐步地（尽管还不是完全地）专攻防守或者进攻。到 1999 年，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队员的平均体重为 234 磅，而且球员通常并不是只专攻进攻或者防守，而是专门研究特别的位置和特别队伍，有时甚至是研究队形类型。更引人注目的体重变化可通过最重的 5

个球员的体重比较来揭示。1902 年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最重的 5 个球员的平均体重是 184 磅，比整个球队的平均体重多不了多少。如图 1—2 所示，1929 年最重的 5 个球员的平均体重为 199 磅。到 1999 年，他们的平均体重竟达 309 磅，比 1929 年上升了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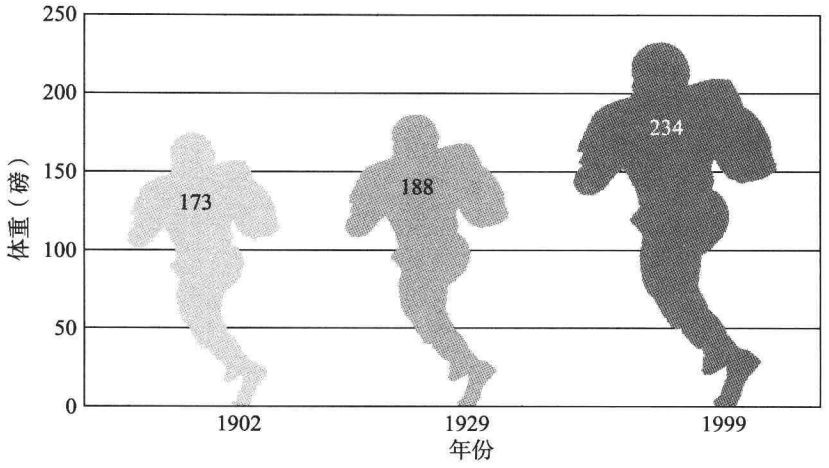


图 1—1　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队员的平均体重

资料来源：Sport Information Office，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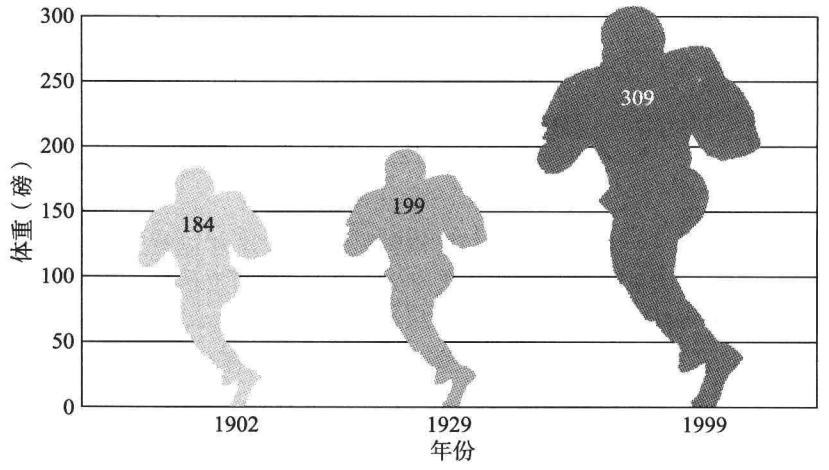


图 1—2　威斯康星大学橄榄球队：最重的 5 个球员的平均体重

资料来源：Sport Information Office，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威斯康星大学的校友和学生同样也是狂热的篮球迷，他们喜爱速度快、投篮准、跳得高、长得高的球员。和现在一样，在 1939 年，獾队打不同位置的 5 个首发球员的高度相差相当大。图 1—3 不仅表明了后卫、前锋、中锋在身高上的一贯差异，也说明了今天每个位置派上场的球员身高的显著增加。1999 年后卫的平均身高和 1939 年中锋的身高相同。引人注目的 4～7 英寸的身高增长，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如今格外出色的球员比很久以前的青年球员享有越来越多的大学入

学机会。但是身高的增加也反映了美国总体人口平均身高更普遍的增加，而这些增加反过来表明了饮食和健康的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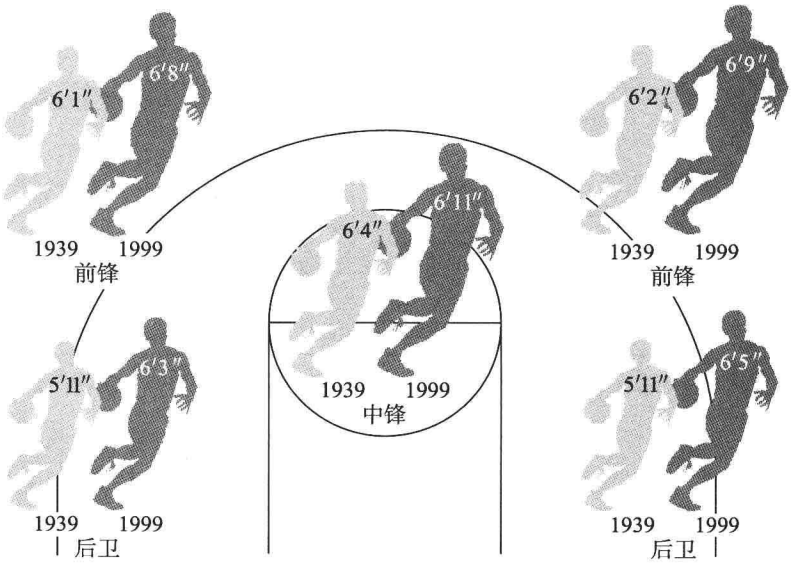


图 1—3　威斯康星大学篮球队队员的身高

资料来源：Sport Information Office，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平均身高的变化告诉了我们关于一个社会的许多情况。国民身高不断增加的那些国家（如日本在过去 50 年的情况）正变得越来越富有，国民吃得越来越好。由于个体间基因的差异，不能认为身材矮小的女人很穷，但是，这样的结论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特别是与个子不高的社会团体的其他证据放在一起时。成人身高反映了营养状况在成长岁月中的积累、疾病的环境、医疗保健，以及遗传因素（这改变得十分缓慢[①]）。美国人是全世界体型最大的人；德国人居第二。如今，美国成年男子的平均身高和平均体重分别是 5 英尺 10 英寸和 172 磅，差不多比他们的祖父高了 2 英寸。在整个 20 世纪期间，美国人的平均身高增加了 3 英寸多。和 100 年前的美国人相比，当代美国人更富有，吃得也更多更好。

另一个可认为是更好的对社会活力和福利的衡量是其市民的寿命。在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个人和社会都在与早逝作斗争。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 20 岁出头增加到接近 30 岁（1750 年左右）用了数千年的时间。从那时开始，发达国家人口的预期寿命已经上升到了 75 岁，上升了 150%，而且在 2001 年，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 77 岁。这一显著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如表 1—1 的美国数据所示，所有年龄段的寿命均有增加。结果，生活在美国的人口数量从 1900 年的 7 600 万人上升到了 2000 年的 2.9 亿人。

① 可参见 Dora L. Costa and Richard H. Steckel,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eds. Richard H. Steckel and Roderich Flou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5。

表 1—1　　美国不同年龄层人口的预期寿命

年龄（岁）	1901	1954	1977	2000
0	49	70	73	77
15	62	72	75	78
45	70	74	77	79
65	77	79	81	83
75	82	84	85	86

资料来源：1901 年数据来自美国商务部 1890 年、1901 年以及 1901—1910 年的美国寿命表（Washington：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21），52－53；1940—1996 年的数据来自美国重要统计数字（Hyattsville，Md.：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DHEW，selected years）。

人口数量的增长和寿命的增加主要源自经济增长，因为经济增长带来了更好的饮食、更清洁的水、污水处理以及其他增进健康的变化。最广泛、最常用的衡量总体经济表现的方法就是实际 GDP 水平及其增长。用 1998 年美元的不变实际购买力来衡量，美国的实际 GDP 从 1900 年的 0.5 万亿美元增长到 2000 年的 9.5 万亿美元。我们可以从图 1—4 看到，当除以人口总量时，1900 年的人均 GDP 为 4 800 美元（以 1998 年不变价值美元来衡量）。在 2000 年是 34 000 美元，大概是 1900 年的 7 倍多。年均 2.0%的增长率，虽然对任何一年来说都显得很小，逐年累积却实现了 7 倍的提升。这些增加并不仅是惠及少数人——中产阶级或大富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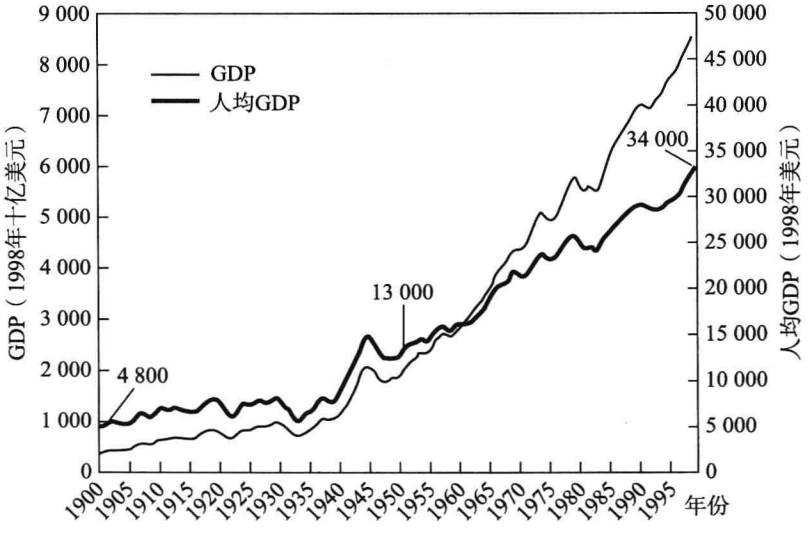


图 1—4　GDP 和人均 GDP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Series F1，and 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www.bea.doc.gov/bea/dn/gdplev.htm.

20 世纪美国物质财富的增加已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被政府归类为“合乎官方标准的穷人”（officially poor）的人如今的收入超过了 1950 年美国中产阶级的平均收入，并比 1900 年最富的 5%除外的所有美国人都高。美国官方的贫困收入水平立足于满足基本需求的思想。量度标准从正常养活一个人所需要的最低金额开始。然后将这个金额乘以 3 以满足住房、衣服和其他必需品的需求。在 20 世纪末，美国人广泛使用的贫困线标准是 8 500 美元，几乎等于普通美国人收入的四分之一，但仍高于世界上大部分其他国家的人均收入，也高于世界的人均收入。

另一种展示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的广泛性的方法，是看现在认为理所当然但 1950 年还很特殊的商品的可用性。图 1—5 提供了 1950 年美国的普通家庭拥有或使用的物品与现在处于贫困线以下的美国家庭所使用商品的比较。事实上，如今列出的美国贫困线以下的家庭比意大利、法国或德国的普通家庭更有可能拥有一台彩色电视机。配有空调的房子、冰箱、抽水马桶、电视机和电话即使是对美国的穷人来说，也是很平常的（见图 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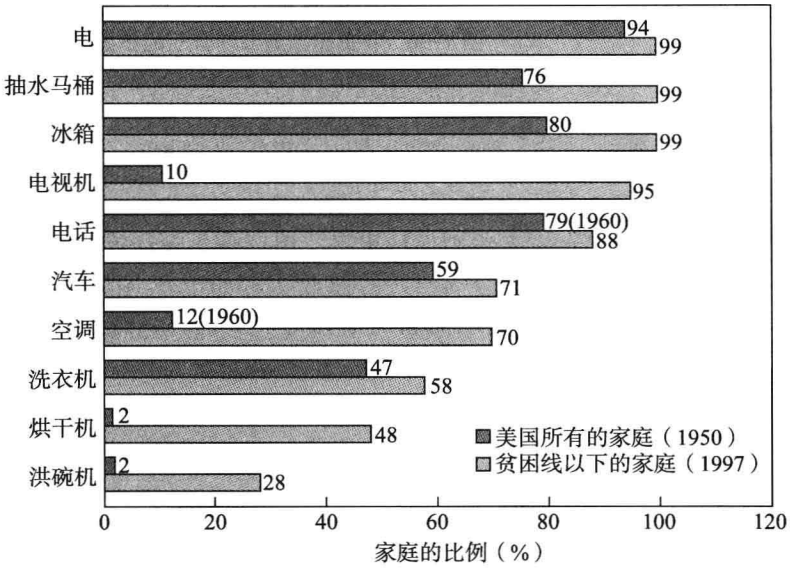


图 1—5　1997 年美国贫困线以下家庭拥有的物品与 1950 年美国全部家庭拥有的物品的比较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American Housing Surve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7;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ousing Then and Now,” http://www.census.gov/hhes/www/housing/census/histcensushsg.html; and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Series Q175.

尽管美国被称为“穷人”的人获益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依旧很大。贫富差距是得出经济系统成败结论的重要元素。它事关一个社会的凝聚力、福利和安全。一个对考虑该问题有用的起点就是快速浏览一下美国的收入分配图。图 1—6 展示了 2001 年所有美国家庭按收入排名分成 5 组的收入分配情况。和其他年份一样，最富的 1/5 家庭和最穷的 1/5 家庭存在着巨大的收入差距。事实上，最富的 1/5 家庭获得了一半的美国总收入（50.1%），几乎等于剩下的 4/5 家庭的收入

总和。2001 年美国最穷的 1/5 家庭仅获得 3.5%的美国总收入（不包括食品救济券、公助住房、医疗补助和其他类似的补助）。图 1—7 展示了 1966 年以来这五个群体所获得的平均实际收入的变化。到 20 世纪末，美国最富的 1/5 家庭赚得的平均收入是最穷的 1/5 家庭的平均收入的 13 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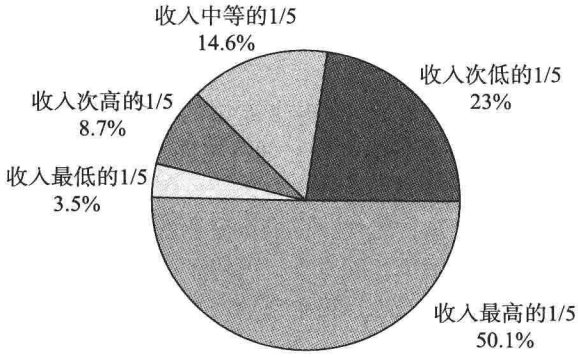


图 1—6　将美国家庭五等分后的美国收入饼图，2001 年

资料来源：2001 年，美国最富的 1/5 家庭获得了 50.1%的美国总收入，而美国最穷的 1/5 家庭仅获得 3.5%的美国总收入。“The Changing Shape of the Nation's Income Distribution, 1747—2001,” U. S. Census Bureau, http://www. census. gov.

在图 1—7 中，收入差距近几年似乎已经增大：最上面的两条线向上漂移，而较低的三条线则保持水平。用百分比来计算，举例来说，在 1975 年最穷的 1/5 家庭获得了 4.2%的总收入；如上所述，2001 年他们所占百分比低至 3.5%。1975 年，最富的组获得了 43.7%，而在 2001 年他们索取了 50.1%的总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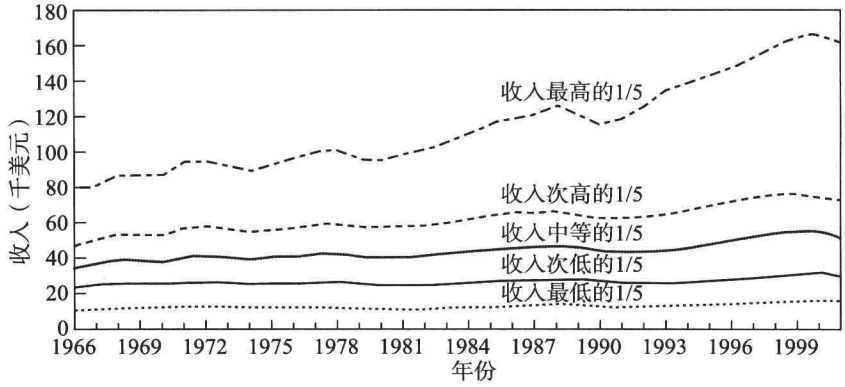


图 1—7　1966—2001 年的收入差距

资料来源：http://www. census. gov/hhes/income/histinc/f03. html.

但是，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 1975 年最穷的 1/5 家庭在 2001 年是否还是属于那个类别。如果所有 1975 年属于最富的 1/5 类别的人和到 2001 年所有属于最穷的 1/5 类别的人已经完全交换了位置（1975 年最穷的 1/5 在 2001 年上升为最

富的1/5），那么图1—6和图1—7所示的数据不会看到任何变化。当然，这样的转换应该被认为是人们收入分配的一个巨变。

关于人们在这些收入分配级别中移动的最佳可用数据来自一项由密歇根大学调查小组对1975—1991年的动态收入所做的调查。图1—6和图1—7表明收入差距拉大的传统观点与表1—2的证据形成鲜明对照。看表1—2的底行，我们发现1975年最穷的1/5家庭只有5.1%在1991年依然属于那个类别；29%已经移入最富的1/5。表1—2的顶行则说明了1975年最富的1/5家庭有0.9%到1991年落入最穷的1/5；62.5%仍留在最富的1/5类别。

表1—2　　不同收入阶层的流动

1975年按收入划分五等分	1991年每一等分中的比重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第五（收入最高）	0.9	2.8	10.2	23.6	62.5
第四	1.9	9.3	18.8	32.6	37.4
第三（收入中等）	3.3	19.3	28.3	30.1	19.0
第二	4.2	23.5	20.3	25.2	26.8
第一（收入最低）	5.1	14.6	21.0	30.3	29.0

在1991年，1975年收入最低的人群中仅有5.1%的人依然属于收入最低的人口阶层。1975年收入最低的人群中有29%的人在1991年处于收入最高的人口阶层中。

资料来源：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5）.

对数据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收入的增长和向更高收入类别的移动经常很迅速。在任何一个给定的年份，其中许多被认为是最穷的1/5的人是年轻人和在校生。随着教育和工作机会的获得，许多人稳步跃升到更高的收入排名。

另一个分析20世纪美国经历的经济增长的视角是对新产品的可用性、所有权以及使用的回顾。图1—8展现了美国家庭普遍拥有和使用的很多商品实质上的激增。大部分商品甚至对1900年最有钱的美国人来说也无法获得，因此发明是可用性的一个必要原因。然而，当20世纪即将结束时，相当高比例的美国家庭提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怎么买得起这些商品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分别对比1900年和今天的价格和工资，以此衡量相对于今天一个普通工人必须工作的时间长度，1900年的一个工人为获得同一产品必须工作的时间。

在1900年，制造业非监管员工的平均小时工资为0.15美元（或每周8.88美元）。制造业工资在当时全国最高；今天他们大体上和服务业等其他部门获得同等收入。重复一遍，与今天一个工人的工作时间长度相比，1900年一个普通工人为支付食品、衣服和住房等基本资料必须工作多长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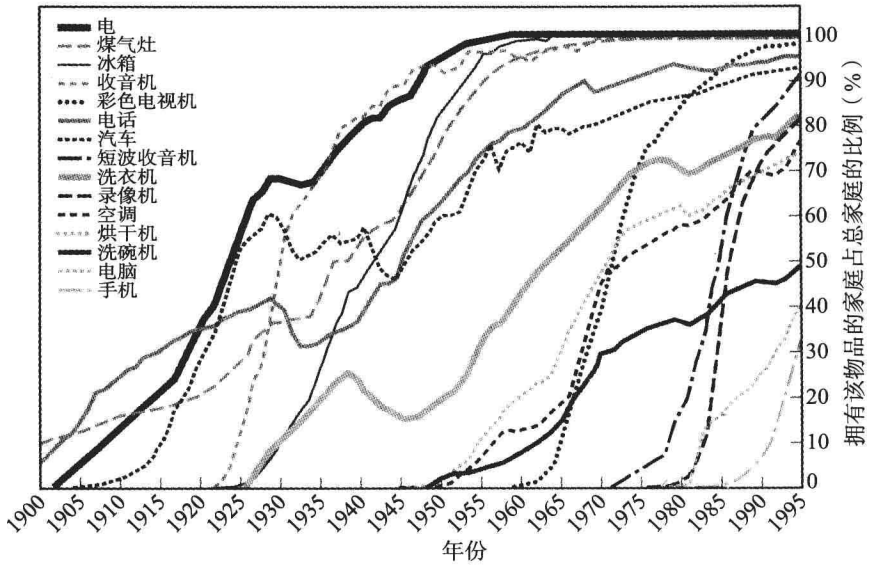


图 1—8　家庭所拥有和使用的物品

美国人日常使用的一系列商品在过去的 100 年在数量上急剧膨胀。在 1900 年，没有人（即使是富人）能坐飞机旅行，穿上舒服的网球鞋，甚至吃上一粒阿司匹林，而这些是大多数现在的美国人能正常享用的。从汽车到电脑，再到手机，我们的祖先可能会惊呆地看着我们现在认为很普通的物品。

资料来源：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Time Well Spent：The Declining Real Cost Living in America"（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7）.

表 1—3 展示了 1900 年和 1995 年美国人花在这些基本商品上的支出占其总收入的份额。这些基本品开销占收入的比例急剧下降意味着更多的收入可用来购买其他种类的商品和服务。

表 1—3　　食品支出、衣服支出和住房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

	1901 年	1995 年
食品	46	14
衣服	14	5
住房	15	18
加总	76	38

资料来源：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Time Well Spent：The Declining Real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7）.

首先，我们来考虑食品成本。表 1—4 展示了一个食品清单以及 1919 年的美国工人为购买它们所付出的工作时间，以及今天的相应数据。在 20 世纪早期，大部分美国孩子热切期待着圣诞节早晨的到来，怀着能在他们的袜子里发现橙子

的期望。表 1—4 的数据表明一打橙子要花费一个收入较高的美国人一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对于 1919 年的许多美国人而言，橙子是一种奢侈品，一打橙子的价格是一磅碎牛肉的两倍多。

表 1—4 中的比较表明，在 1919 年工人需要工作 30 分钟来购买一磅碎牛肉，而在 1997 年仅需工作 6 分钟。在 20 世纪早期，一顿有鸡肉的家宴是特别的。事实上，在 1928 年，赫伯特·胡佛的一条总统竞选承诺就是“家家锅里有只鸡”。在 1919 年，3 磅重的一只鸡的价格为 1.23 美元，或者 2 小时 37 分钟的实际工作时间。到了 1997 年，3 磅重的鸡卖 3.15 美元，实际工作时间是 14 分钟。

表 1—4　　以劳动时间核算的 12 种食品的成本（分钟）

食品	1919 年	1997 年
西红柿，3 磅	101	18
鸡蛋，1 打	80	5
糖，5 磅	72	10
熏猪肉，1 磅	70	12
橙子，1 打	68	9
咖啡，1 磅	55	17
牛奶，0.5 加仑	39	7
碎牛肉，1 磅	30	6
生菜，1 磅	17	3
豆子，1 磅	16	3
面包，1 磅	13	4
洋葱，1 磅	9	2

通过将商品的价格除以小时工资率得到这些数据。这些结果显示了在 1900 年和 1997 年人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才能得到他们每日所需的“面包”。

资料来源：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Time Well Spent：The Declining Real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7）.

由于房屋大小和设施的变化，对住房成本随时间改变的比较相对于食品成本改变的比较来说更难进行。在 1920 年，一所比较典型的新房子（用今天的标准是所小房子）的价格为 4 700 美元，或每平方英尺空间需工作 7.8 小时。表 1—5 显示了典型新房的成本和配备各类设施的新房所占百分比。请注意，如今新房中的大部分设施在 1956 年新房中被发现的比例要小得多。尽管房屋设施和面积增加了，房屋的价格也上涨了，但是每平方英尺所需的工作时间却从 1956 年的 6.5 小时降至 1996 年的 5.6 小时。

表 1—5	住房成本	
	1956 年	1996 年
房屋价格的中位数（美元）	14 500	140 000
房屋尺寸的中位数（英尺）	1 150	1 950
每平方英尺价格的中位数（美元）	12.61	71.79
平均每小时的工资	1.95	12.78
买一平方英尺房屋所需的工作时间（小时）	6.5	5.6
新房配有以下商品的比重（%）		
车库	50	86
3 个或更多的卧室	78	87
2 个以上的卫生间	28	91
1 个以上的壁炉	35	62
2 个以上的贮藏室	6	47
隔音、隔热墙体	33	93
防风玻璃	8	68
中央空调	6	81
煤气灶	1	94
洗碗机	11	93
冰箱	5	18
短波收音机	0	85
吸尘器	34	90
车库门遥控器	<1	78

资料来源：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By Our Own Bootstraps：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Dynamics of Income Distribution"（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5）.

当注意力从住所转移到衣服上，只考虑一件商品：牛仔裤。李维·施特劳斯在 1853 年将他的第一条牛仔裤卖给了一个矿工，从那时起他的 501s ® 以及其他变款的牛仔裤就一直流行。在 1900 年买一条李维斯牛仔裤（Levi's）需要一个普通的制造业工人工作 7 小时，而今天购买一条李维斯牛仔裤大概只需那时工作时间的一半。

我们用美国一个制造业雇员今天购买一大堆商品所必需的工作时间，与在显示的时期（见图 1—9）购买某种商品所需的劳动时间进行比较，用时期和百分比来推断出这一分析。例如，今天一台彩电只花费 1954 年购买一台彩电所需工作时间的 4%，那个时候彩电刚上市。在今天电费所需的工作时间还不到 1900 年

所需工作时间的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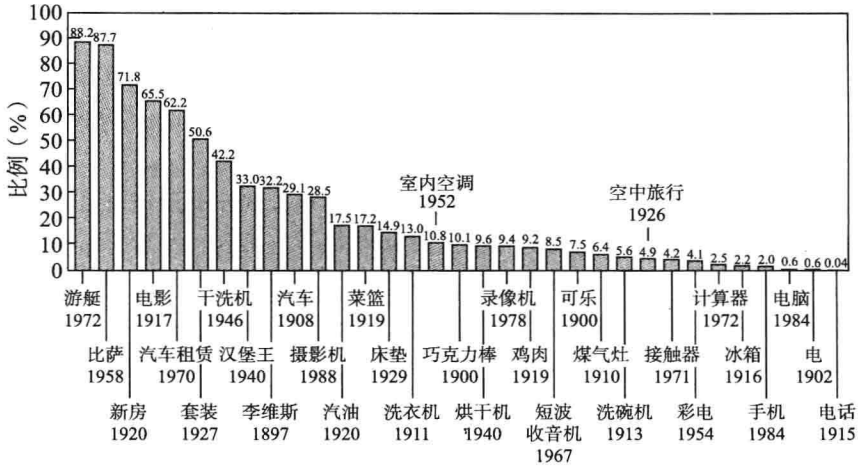


图1—9　与商品刚被引入的时候相比，现在购买该商品所需的时间成本

资料来源：W. Michael Cox and Richard Alm，“Time Well Spent：The Declining Real Cost of Living in America”（Federal Reserve Bank of Dallas，1997）.

带着目的去学习

为什么你应该学习经济史？一个直截了当的回答就是，更好地为你的未来做准备。经济史为你提供了一个考察变革力量的清晰视角以及对历史教训的很好理解。经济史的学习还提供了国家建设的教训以及如何分析影响国家和个人的政策及制度。

在100年前，大不列颠的市民享有世界上最高的生活水平，大英帝国是领先的世界强国。在1892年，主要的欧洲列强提高了它们在华盛顿的外交官级别，从公使升级到大使，因此也将美国提升到各国之间第一级别的地位。基于经济理由，这一次升级应该发生得更早一些，因为1892年美国的人均产出比德国和法国的人均产出高出很多，并且和英国的产出水平相差不远。

在1950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国人享受的生活标准到目前为止高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但是，另一个“超级大国”强烈挑战了这种霸权。随着冷战的展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加剧，世界上的国家开始被划分成两大阵营；共产主义国家强调命令、控制和中央计划系统，而自由主义国家则强调市场、贸易、竞争和有限政府。这种分组在欧洲和亚洲的国家特别明显，而许多其他国家则似局外人，思考着它们的未来以及它们应遵循哪种体制。显然，苏联展示出来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的水平与美国相匹敌。在1957年，苏联发射

了它的太空卫星，这颗名叫 Sputnik 的卫星是在地球上建造的第一枚进入太空的运载火箭。冷战于 1989 年结束，苏联的很多卫星国如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都获取了自由。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俄罗斯迫切需要援助来养活自己的人民。俄罗斯人的预期寿命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的 60 多岁骤然下降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 56 岁。苏联经济和政治崩溃，市场化制度取得压倒性的成功，这为学习经济史的重要性提供了另一个例子。

国际权力、国际地位及相对福祉的波动深刻地提醒着我们：现在永远在变化并将成为过去。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将看到和经历的那些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吗？或者命运能被控制吗？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的？

不幸的是，历史经常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似乎不相关的形式呈现出来。仅仅记忆和回忆日期和地点、将军和战争、总统和法案会将我们的注意力误导至何时何人发生了何事，从而使得我们没有把重点放在事件发生的方式及原因上。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就是将其重点放在对方式和原因的研究上。它为我们提供了对很多问题更深刻的理解，如作为国家我们该如何发展，不同阶层的人民都如何过活以及主要的政策和强制性力量会带来各地区和人民之间什么样的进步（或退步）差异。总之，学习经济史对我们来说很有前途。它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智力发展，提供给我们看时事的基本观点，而且它还提供了对政策事项的实际分析指导。学习经济史最适合那些关注今后 1 年到 1 000 年以及想要更好未来的人。

这绝不是空洞的口号。学生主修经济学或美国史的一个主要原因想必是最终改善美国经济的运行和表现以及实现个人的追求，并使个人获益。当然，教师希望他们的学生成为更明智的公民和更高效的商人、政治家和专业人士。“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如加文·赖特最近对他的经济学同仁的恰当批评：

> 如果整个经济运行和改善美国经济表现有关，那么经济学的大多数学生完成了学业却不了解美国如何成为 20 世纪上半期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太不成体统了。哪有医生不询问病人的病史就直接诊断和开药方的呢？[①]

学生经常是那些未能说明美国经济崛起和发展信息的经济学教科书的受害者。恰恰相反，教科书犹如刚刚发生一样表述了美国强大的现状，好像没什么难题，好像经济增长是或多或少自发的逐年的自我维持的过程。这种经济学教科书的作者需要一个在希腊、俄罗斯、扎伊尔开拓视野的研究休假。

经济史是纵向的研究，但没有地质学漫长且缓慢；地质学在人的一生中只有细微的变化。相反，现代经济变革的步伐在许多方面正在迅速加快。在大部分美国人的生活记忆里，一些国家和地区从次要经济体上升为世界突出经济体（如中国香港、日本、韩国），而另一些国家从主要经济体陷入停滞（20 世纪 90 年代的俄罗斯以及 2002 年以后的阿根廷）。一些国际经济贸易和支付的全新体系已得

① Gavin Wright, “History and the Future of Economic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Modern Economists*, ed. William N. Parker (New York: Blackwell, 1986), 81.

到发展（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欧盟）。新的制度、规则和法律大量涌现，如1990年《洁净空气法案》、1996年《福利改革法案》；这些法案有时扩大了、有时限制了我们的经济选择范围。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与它在仅仅60年前或70年前的作用相比已经截然不同了；无疑，它也会和50年后显著不同。经济史的学习强调制度变迁的作用，特定群体如何带来经济变革及其原因。因而，经济史的学习不仅仅是娱乐我们或使我们才智敏锐的一项活动。历史是制定公共政策所必需的大量信息。事实上，历史是对经济学课程中所教经济理论及原则和其他学科所授理论的试验场。

为了简化范围宽广的经济学理论，我们主要依靠5个经济推理命题，如经济透视1.1所示。这些经济推理命题可依贯穿本书的参照目的总结如下：

（1）选择很重要。

（2）成本很重要。

（3）激励很重要。

（4）制度很重要。

（5）证据很重要。

下次你在讨论或争论时，回想一下经济推理命题5。证据来自历史并检验某个观点的可靠性。观点是开始讨论的一种好方式，但它不应该是结束一场讨论的好方式。

正如经济推理命题5（证据很重要）所强调的，当我们希望理解事情是如何发生及为什么发生时，所有观点并非等同。经济史的两大优势是它的数量特征和用经济理论为历史事实提供有用的组织。同时使用理论和证据提高了我们检验（拒绝或支持）特定命题和建议的能力。这有助于我们在不同的意见之间进行选择。

比如，考虑一个将强制性工资和物价管制作为打击通胀的手段的建议。图1—10描绘了10年的通货膨胀并揭示了我们在尼克松年代经历的工资和物价管制。当时尼克松总统的观点是管制有利于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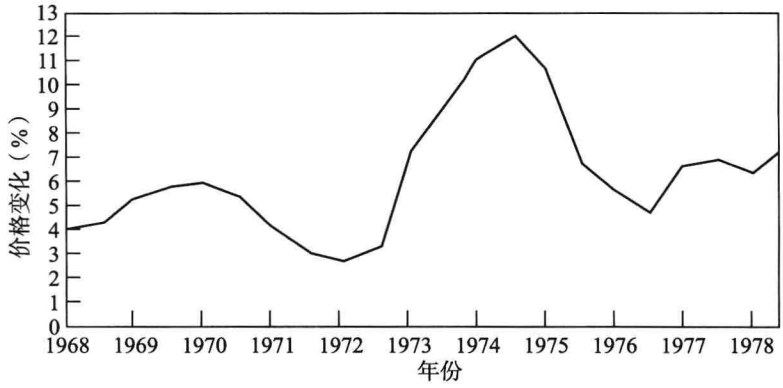


图1—10　通货膨胀与尼克松的价格管制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Statistical Abstract*，1978，483.

如图1—10所示，尼克松的管制（由他的管理人员做出的选择）在1971年8月生效，当时的通货膨胀率是3.5%。管制前的通胀率峰值是1970年初的6%，并且在管制生效时实际在下降。通货膨胀率继续向下漂移，并且在整个1972年在3%左右徘徊；它从1973年开始上升，到了管制完全取消的1974年初，通货膨胀率是10%并且继续上升。

经济透视 1.1

5个经济推理命题

正如约翰·M·凯恩斯所说：

“经济学并不提供大量可立即适用于政策的固定结论。经济学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教条，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思考方式，意在帮助使用者得出正确的结论。”

这种“思维工具”（或者说经济学的思维）可推断出人类本性和广为接受的真理的5个基本命题。

1. 人们选择和个人选择是社会成果的源泉。稀缺促使我们以某种方式竞争，且必须选择。人们基于替代选择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做出选择。选择有风险；结果不能得到保证，因为选择的结果在于未来。
2. 选择具有成本。人们做选择的时候要承担成本。选择涉及替代选择的权衡。人们权衡边际收益和边际牺牲。最终，任何决策的成本是必须放弃的次优选择。理性决策导致预期收益超过预期成本的活动的增加以及预期成本超过预期收益的活动的减少。
3. 激励很重要。激励是鼓励人们行动的奖励。惩罚措施打击行动。人们以可预见的方式做出对激励的反应；当激励变化时，行为以可预测的方式变化。
4. 制度很重要，且“游戏的规则”会影响选择。法律、习俗、道德准则、思想和文化制度会影响个人选择并形成经济体制。
5. 基于知识和证据的理解会赋予看法价值。一个看法的价值由它所据的知识和证据决定。对看法的陈述应该发起对经济理解的探索，而不是结束它。

从表面判断，管制没有制止通货膨胀。但如何解释这一令人沮丧的记录？是管制本身的错，还是其他因素要对此负责？只有对这一时期进行仔细研究才能确定管制对通货膨胀的加速作用。对尼克松的物价管制和朝鲜战争时期实施的物价管制（当取消管制时并未紧接着发生价格爆炸）进行的比较表明，有两个重要的条件要加以考察：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

此外，物价管制扰乱了经济系统的平稳运转。例如，为了规避尼克松的物价管制，为了使木材卖出好价钱，美国木材工业定期向加拿大出口木材，然后为了以较高的价格出售再重新进口。（涉及经济推理命题4：制度很重要。）由于化肥

和化学杀虫剂在国外销售比在国内销售更有利可图，农业生产饱受缺乏这些基本投入之苦。（回想一下经济推理命题 3：激励很重要。）诸如此类对生产的扰乱降低了商品和服务的增长率，若非如此，通货膨胀可能会变得更糟。我们不能在这里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观点很简单：要评价政策建议，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求助于历史记录。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工资和物价管制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它可增进我们对其影响的理解。分析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是用历史研究补充定量研究的需要。一个经济学家不能天真地认为物价统计总是说实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劳工统计局做出了努力，但官方数字只是部分反映了人们规避管制的多种途径。一种规避形式是品质降低。把脂肪添加到汉堡包，将糖果棒做得更小并用劣质原料取代，用粗糙的布料做衣服，减少对租赁财产的维修，等等。有时，所有低加价、低品质商品被清除了，迫使连贫穷的消费者都得去买更高加价、高品质的产品，要么就没有新商品可买。当然，黑市发展了，就像现在受管制物品诸如大麻的黑市一样。经济史学家的工作就是试图评估这些经济活动的整体效果。②

许多学生问：尽管经济史对专业经济学家或经济政策制定者很重要，但是如果我有其他长期目标，那还有学习经济史的实际理由吗？回答是肯定的。（参见布莱克、桑德斯、泰勒，他们说明了经济学专业的本科生比商学、数学、物理学专业的本科生在财务上做得更好。）在学习经济史的过程中培养的技巧——批判地分析经济记录，基于经济理论得出结论，并用清晰的英语写论文——在很多行业的日常工作中都是宝贵的技能。审查银行章程以确定法律意图的律师，研究以往的股票市场崩溃以找到如何预见可能导致崩溃的线索的投资银行家，考虑被卖给大公司的其他小企业所发生变化的自有经营人——都在担当着经济史学家的角色。如果他们能把它学好，它将让他们受益。③

历史研究的重要性除了在审议私人及公共政策建议上的重要作用外，历史知识还有其他优点。首先，历史可以很有趣——特别是当我们变老并试图在怀旧的回忆中找回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时。其次，历史给了我们娱乐，也丰富了我们的自我意识，并且通常因为电视，历史记录几乎能立即提供（例如，有关 2003 年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历史感实在是极富戏剧性的参与感——把我们和较早时期的人和尚未出生的人联系起来的大量事件流的参与感。

我们用一个提醒来结束本节：经济史学家的两项主要任务是检验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增长（停滞或衰落），并找出当经济发生变化时社会内部群体的福利发生的变化。在下文中，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适应不断发展的世界经济，美国经济如何增长和变化。我们通过研究过去以更好地理解今天经济变化的原因以及

---

① Hugh Rockoff,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提供了对美国工资和价格控制的一个对比和比较。

②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 Hugh Rockoff, "Indirect Price Increases and Real Wages in World War II,"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407 - 420。

③ 对学习经济史的好处的更深度见解，参见 Donald N. McCloskey, "Does the Past Have Usefu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14 (1976): 436 - 461。

生活标准如何受到政策和源自技术、人口、制度变革等其他因素的影响。[①]

摆脱贫困的漫漫长路

在对强调经济增长力量的美国经济史年表进行钻研之前，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现今情况放置在适当的历史角度来研究是十分重要的。正如温斯顿·丘吉尔所称道的一句话，“你回顾得越悠久，你就可以看到越长远的将来。”但是，我们连遥远的过去都没看清楚，更不用说未来。

或许从《圣经》、莎士比亚的作品或一些好莱坞史诗来反思一些历史事件，是一种有趣的练习。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记得的都是关于伟大的人民、大事件、爱情故事、战争、宗教，以及人类经历的其他戏剧性事件。国王、英雄或者宗教领袖……在城堡、宫殿或教堂……带领军队作战，或者进行发明创造或发现新的世界——它们很快浮现在我们的脑海，而且通常美化过去。[②]

诚然，有所谓的黄金时代，像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在中国的北宋，以及只有一小部分人享受舒适生活的其他时期和地方，而且其中一小部分人有时克服了低微的生活水平。但是，这样改善的时期从未持久。[③] 以长远的眼光来看，能断定我们几乎所有的远祖，除了幸运的少数人，都过得无比清苦。为了看清这种清苦生活的规模以及脱贫之路的漫长，让我们思考道格拉斯·C·诺斯在1993年的诺贝尔奖演讲中对人类历史的这个时光胶囊（time capsule）的总结：

> 让我们把人类迄今为止的经历描绘成一个24小时的钟，其中起点是人类从灵长类动物分化出来的时间（很显然是在非洲的400万～500万年前）。然后，所谓的文明随着约公元前8000年在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的农业发展和永久定居开始了——**已经是时钟的最后三四分钟了**。在其余的23小时56分钟或57分钟的时间里，人类仍是狩猎者和采集者，并且尽管人口在增长，却是以非常缓慢的速度增长。现在我们给文明时代制作一个24小时的新钟——从农业发展至今的10 000年——在最初的12个小时变化的速度好像非常缓慢……历史人口统计学家推测，相对于以前的时代，人口增长率可能已经翻番，但仍然非常缓慢。在过去的5 000年，变革的步伐随着经济和文明的崛起和衰落而

① 制度变迁的例子，参见 Lee J. Alston,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 in History: Lessons for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in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East and Central Europe: Legacies From the Past and Policies for the Future*, ed. David F. Goo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43－59; 以及 Jan Siniecki, “Impediments to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Former Soviet System,” in *Empirical Studies in Institutional Change*, eds. Lee J. Alston, Thrainn Eggertsson, and Douglass C. North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5－59。

② 这样的颂扬有着持久的传统：“The humour of blaming the present, and admiring the past, is strongly rooted in human nature, and has an influence even on persons endued with the profoundest judgment and most extensive learning,” from David Hume, “Of the Populousness of Ancient Nations,” in 1777/1987, 464。

③ 例如，参见 Winston Churchill 对罗马时代及其之后时期的英国生活的描述：*A History of the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Vol. 1 (New York: Dorsett Press, 1956)。

加快。人口可能从基督时期的3亿增长到1750年的8亿——与早期的增长率相比，是大幅度加速。最后的250年——**只是我们24小时新钟上的最后35分钟**——是伴随着如今导致世界人口超过50亿（1993年）的人口爆炸的现代经济增长时代。如果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过去的250年，我们看到，在这250年中的200年里，经济增长基本上局限于西欧和英国的海外扩张。①

1750年是人类生存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支持诺斯这个评论的证据可由图1—11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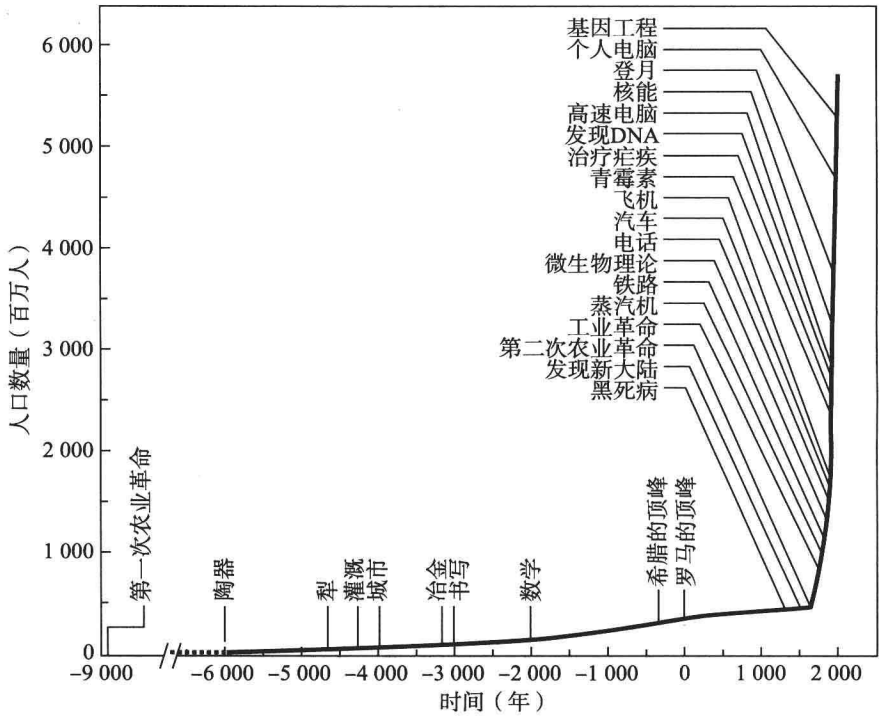


图1—11　世界人口和重大发明及知识进步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1999).

这张包含过去1.1万年的世界人口图，与值得注意的发明、发现和大事一起，如实展示了18世纪中期的人口爆炸。在美国独立前几十年，世界人口才开始快速增长，之后很快就超过60亿人。源自通常被称为第二次农业革命的新技术以及新资源（例如，新大陆的土地）的利用与这次人口爆炸相符。还值得一提的是重要发现的转变步伐的剧烈加速。1600年以前，它们之间相隔几个世纪。比如，犁的改进和推广，首先在美索不达米亚河谷于大约公元前4000年出现，直到公元1000年左右变化都不大，这与空中旅行形成对比。莱特兄弟在1903年完成了由马达驱动的首次成功的飞行。仅仅66年后的1969年，尼尔·阿姆斯特

① Douglass C. North，"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364－365.

朗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简而言之，我们许多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变化的速度一直在加快，特别是在过去的两个半世纪。

在1750年之前，长期饥饿、营养不良、不健全、疾病及夭折对世界各地几乎所有人来说都是常态。即使是有钱人也吃不好；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罗伯特·福格尔所说：

> 即使是富裕的英国贵族，在16世纪或者17世纪期间的饮食也是有害健康的。尽管蛋白质和热量很丰富，贵族的饮食仍然缺乏某些营养物并包含大量的有毒物质，尤其是酒精饮料和盐。①

因为缺少选择或是由于稀缺，极其恶劣的饮食和长期营养不良是常态。粮食生产很少能超过基本的生存水平。人们陷入了食品困境：微薄的产量严重限制了所有追求活动的能量，包括生产。营养不足的饮食，伴随着高发病率和低抵抗率。

营养不良和广泛传播的疾病可用身高和体重方面的证据来揭示。直到1750年，英格兰（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成年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4英尺7英寸，法国和挪威的矮一些。② 如今美国男子的平均身高要比这高15英寸。在18世纪50年代，一个英国男人的标准体重为130磅，一个法国男人的标准体重为110磅。与之相比，今天美国男性的体重大约为175磅。今天我们在伦敦塔（Tower of London）里看到古代战争中武士的铠甲会大吃一惊；它们生动地提醒我们即使是古代体格最大的人，在今天看来也是多么的小。

始于18世纪中期的第二次农业革命发生没多久，就发生了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些革命引发并保持着人口剧增，提高生育率并降低死亡率。表1—6总结了不同国家、地点和时代的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的研究成果。从表1—6和其他的经验证据来看，我们发现，对整个世界而言，出生时预期寿命的增加从20岁出头上升到1750年的大约30岁用了数千年。③ 西欧国家最早摆脱夭折及过去的营养不良、极差的饮食、慢性病以及较低的人类能量。例如，表1—6的数据表明，到1800年，法国人的预期寿命是刚刚30岁，而在英国约为36岁。相比之下，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印度人的预期寿命仍然低于25岁，而20年后，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在25岁和35岁之间。到1950年，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接近70岁，然而印度人和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分别只有39岁和41岁，比得上其他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

---

① Robert W. Fogel, "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1999).

② Robert W. Fogel,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gr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369 - 395.

③ S. H. Preston, "Human Mortality Throughout History and Prehistory,"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5), 30 - 36.

表 1—6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

地点	中世纪	特定的年份	1950—1955	1975—1980	2000
法国		30（1800）	66	74	78
英国	20～30	36（1799—1803）	69	73	77
印度		25（1901—1911）	39	53	63
中国		25～35（1925—1931）	41	65	70
非洲			38	48	54
世界	20～30		46	60	67

资料来源：J. Lee and W. Feng, "Malthusian Models and Chinese Realities: the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1700—200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 (1999); E. A. Wrigley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Development Repor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在1750年之前的时期，各地的儿童和婴儿的死亡率非常高。至少20%～25%的婴儿在他们满周岁之前就夭折了。到1800年，法国、美国和英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已经突破了20%的水平，相当于中国、印度和其他低收入发展中国家在1950年的水平。对欧洲、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来说，婴儿死亡率目前已经低于1%，但在中国是4%，在印度是6%，在非洲是9%。①

为提供另一个摆脱贫困的长远观点，表1—7和表1—8提供了各个时期尽管非常不精确的人均实际收入的证据。在过去的1 000年中，欧洲的实际收入在1 000多年期间率先逐步上升。到1700年，它已经远远高于原来与中国（公元1000年前后最先进的国家）差不多的较低人均收入水平。而当世界其他地区在沉睡，在经济上仍然大致不变时，欧洲继续前进。到19世纪早期，美国已经超过欧洲，而到了20世纪中期，美国公民享有的收入水平远高于居住在欧洲的人，并且比生活在其他地区的人高出许多倍。1 000年前，甚至只是500年前，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收入水平也只类似于当今最贫穷的国家：扎伊尔、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缅甸、孟加拉国（见表1—8）。

表 1—7　　实际人均 GDP（1990 年美元）

地区	1000年	1500年	1700年	1820年	1952年	1995年
欧洲	400	640	870	1 130	4 370	13 950
美国			600	1 260	10 650	23 380

①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9 and UNDP 2000.

续前表

地区	1000年	1500年	1700年	1820年	1952年	1995年
印度			530	530	610	1 570
中国	450	600	600	600	540	3 200
非洲	400	400	400	400		1 220
世界	420	550	600	670	2 270	5 190

资料来源：Maddison（1998，1999）.

表 1—8　　56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1990年美元）

	1820年	1870年	1900年	1913年	1950年	1973年	1992年
12个西欧国家							
奥地利	1 295	1 875	2 901	3 488	3 731	11 308	17 160
比利时	1 291	2 640	3 652	4 130	5 346	11 905	17 165
丹麦	1 225	1 927	2 902	3 764	6 683	13 416	18 293
芬兰	759	1 107	1 620	2 050	4 131	10 768	14 646
法国	1 218	1 858	2 849	3 452	5 221	12 940	17 959
德国	1 112	1 913	3 134	3 833	4 281	13 152	19 351
意大利	1 092	1 467	1 746	2 507	3 425	10 409	16 229
荷兰	1 561	2 640	3 533	3 950	5 850	12 763	16 898
挪威	1 004	1 303	1 762	2 275	4 969	10 229	17 543
瑞典	1 198	1 664	2 561	3 096	6 738	13 494	16 927
瑞士	—	2 172	3 531	4 207	8 939	17 953	21 036
英国	1 756	3 263	4 593	5 032	6 847	11 992	15 738
平均	1 228	1 986	2 899	3 482	5 513	11 694	17 412
4个西方分支国家							
澳大利亚	1 528	3 801	4 299	5 505	7 218	12 485	16 237
加拿大	893	1 620	2 758	4 213	7 047	13 644	18 159
新西兰	—	3 115	4 320	5 178	8 495	12 575	13 947
美国	1 287	2 457	4 096	5 307	9 573	16 607	21 558
平均	1 236	2 748	3 868	5 051	8 083	13 828	17 475
5个南欧国家							
希腊	—	—	—	1 621	1 951	7 779	10 314
爱尔兰	954	1 773	2 495	2 733	3 518	7 023	11 711

续前表

	1820 年	1870 年	1900 年	1913 年	1950 年	1973 年	1992 年
葡萄牙	—	1 085	1 408	1 354	2 132	7 568	11 130
西班牙	1 063	1 376	2 040	2 255	2 397	8 739	12 498
土耳其	—	—	—	979	1 299	2 739	4 422
平均	—	1 194 *	1 676 *	1 788	2 259	6 770	10 015
7 个东欧国家							
保加利亚	—	—	—	1 498	1 651	5 284	4 054
捷克斯洛伐克	849	1 164	1 729	2 096	3 501	7 036	6 845
匈牙利	—	1 269	1 682	2 098	2 480	5 596	5 638
波兰	—	—	—	—	2 447	5 334	4 726
罗马尼亚	—	—	—	—	1 182	3 477	2 565
苏联	751	1 023	1 218	1 488	2 834	6 058	4 671
南斯拉夫	—	—	—	1 029	1 546	4 237	3 887
平均	—	876 *	1 174 *	1 527 *	2 235	5 289	4 627
7 个拉美国家							
阿根廷	—	1 311	2 756	3 797	4 987	7 970	7 616
巴西	670	740	704	869	1 673	3 913	4 637
智利	—	—	1 949	2 653	3 827	5 028	7 238
哥伦比亚	—	—	973	1 236	2 089	3 539	5 025
墨西哥	760	710	1 157	1 467	2 085	4 189	5 112
秘鲁	—	—	817	1 037	2 263	3 953	2 854
委内瑞拉	—	—	821	1 104	7 424	10 717	9 163
平均	—	783 *	1 311	1 733	3 478	5 017	5 949
11 个亚洲国家/地区							
孟加拉国	531	—	581	617	551	478	720
缅甸	—	—	647	653	393 *	589	748
中国	523	523	652	688	614	1 186	3 098
印度	531	558	625	663	597	853	1 348
印度尼西亚	614	657	745	917	874	1 538	2 749
日本	704	741	1 135	1 334	1 873	11 017	19 425
巴基斯坦	531	—	687	729	650	981	1 642
菲律宾	—	—	1 033	1 418	1 293	1 956	2 213
韩国	—	—	850	948	876	2 840	10 010
中国台湾	—	—	759	794	922	3 669	11 590

续前表

	1820 年	1870 年	1900 年	1913 年	1950 年	1973 年	1992 年
泰国	—	717	812	846	848	1 750	4 694
平均	609 *	638 *	775	872	863	2 442	5 294
10 个非洲国家							
科特迪瓦	—	—	—	—	859	1 727	1 134
埃及	—	—	509	508	517	947	1 927
埃塞俄比亚	—	—	—	—	277	412	300
加纳	—	—	462	648	1 193	1 260	1 007
肯尼亚	—	—	—	—	609	947	1 055
摩洛哥	—	—	—	—	1 611	1 651	2 327
尼日利亚	—	—	—	—	547	1 120	1 152
南非	—	—	—	1 451	2 251	3 844	3 451
坦桑尼亚	—	—	—	—	427	655	601
扎伊尔	—	—	—	—	636	757	353
平均	—	—	—	—	893	1 332	1 331

* 假定的平均数：假定有数据差别的群组中的国家的人均 GDP 的平均变化与样本中的国家的平均变化一致。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on，*Monitoring the World Economy 1820—1992*（Paris Development Centre of the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1995），23-24.

通往富裕的制度路线图

从前面的人均收入估计数、其他证据和诺斯对人类存在引人入胜的时光胶囊的总结来说，脱贫之路显然是崭新的。很少社会已经经历过，包括西欧、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的旁支）、日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几个其他国家或地区。西欧和英国的旁支采取了什么措施从而领导人类通往富裕之路呢？为什么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约 13 亿）如今远超印度（人口 10 亿，居世界第二），而 50 年前两国人均收入大约相等，比今天大多数贫穷的非洲国家更贫困？是否存在通向富裕的路线图？是否有一套政策和制度安排供各国采纳从而复制美国、欧洲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成功？对该问题的一个诚实回答令人失望。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样的经济发展组织，以及无数将其职业生涯致力于研究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学者都充分意识到尚未拼凑起来的有限的理论结构。

事实上，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总产出从根本上是由它的总投入——它的自然资源、劳动力、资本存量、企业家才能决定（且受它约束）的——而且通过……投入的生产率，用单个工人（或每单位资本，每英亩土地，等等）生产的

产量或服务来衡量。但是，为衡量生活标准，我们依靠人均产出（收入）而不是总产出。对于人均收入的变化，生产力进步是主要原因。比如，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增加了10%，而劳动力和其他投入也增加了10%，人均产出基本上保持不变，除非生产力提高了。250年前各地的大多数人（劳动力的80%～90%）都从事农业，其中大部分都是为了生存、自给自足、非商业性的耕作。今天，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这个比例已经少于5%（美国为3%）。在这个过渡过程中，人长得更高，吃得更多，工作得更少（而且过得更舒适）。提高农民人均（和每英亩土地）产出和允许农业人口的子女进入其他（商业）职业且进入城市的生产力进步体现在如下方面的改善上：

（1）技术（知识）。

（2）劳动的专业化和分工。

（3）规模经济。

（4）组织和资源配置。

（5）人力资本（教育和健康）。

这些决定因素对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增长源泉十分有用，但用来解释生产力进步和资源配置只在世界上某些地方明显有效，在其他地方就不尽如人意了。

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比其他国家增长得快，我们需要密切关注各国适用和适应生产力变化源泉的方式。为了利用这种观点，我们需要评估一个社会的规则、习俗、法律（制度）及其经济表现的复杂关系。为了阐明，考虑只有一个生产力变化的源泉：技术。一项新技术可以引进一个全新的产品或服务，如飞机（和更快的旅行），或一种更好的产品，如将一辆2004年的宝马与1930年福特A型车作比较。一项新技术也能导致新材料的问世，如铝，这影响生产成本。铝为建造建筑物及设备提供了一种相对较轻但更坚固的材料。

简而言之，技术变革可看成是提高（改进）产量或降低成本的知识进步。它们对新发明和新发现的修正往往包括所谓的创新。两者都需要基础科学研究、反复试验，然后作进一步的研究，以适应和修改最初的发现从而投入到实际应用。从事研究的发明家或公司承担大量的风险和成本，包括失败的可能性和没有商业利润。科学家、发明家、商人和其他人如何有勇气去追求高成本、高风险的研究投资呢？这些风险投资是如何整合并沿着发现—适应—改进的路径成为对我们的个人福利有用的商业应用呢？

这正是法律和规则——或我们称之为制度——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技术变革原因的方式。制度提供了一个社会的激励框架（经济推理命题3：激励很重要），包括对发明和创新的激励。在1789年的美国宪法中首次提出的专利法，为发明者的发明专利提供了产权和排他性所有权。这一开创性法律促进了创新和发明活动。重要的是，这一排他性所有权包含了出售权，通常是卖给擅长发现新发明的商业用途的人。这里的关键是法律和法规——为一些社会的进步产生动态力量，而在其他国家则扼杀创造力和企业。在发达经济体中，商业法律和产权制度促进技术充分实现其商业—社会潜力，并帮助开拓市场，且为之提供正面激励。法律法规还可以增加许多对大学、其他科研机构、公司以及各种商业实体（和律师及

法院）之间不断变化和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详细描述，所有这些形成了生产和交换的相关市场，同时加速科技进步。①

发展和维持实现社会整体利益的制度变迁对增长来说十分重要。根据道格拉斯·C·诺斯、小曼库尔·奥尔森及制度变迁的其他著名学者，签订和执行合同（在交换中）、保护产权及设定其使用范围和影响人们在工作、创新和交易中的激励的意识形态和游戏规则是分析的重要领域。

诺斯告诫说，“长期增长的关键，是适应效率而不是分配效率。”② 有没有能力接近、适应和应用新技术和生产力进步的其他源泉直接指向了一个社会的制度。制度变迁通常是很缓慢的（习俗、价值观、法律和宪法在发展），而已确立的权力中心有时会阻止和破坏有利于经济进步的变迁。当行动会同时产生赢家和输家时，一个社会对冒险和变革的接受度有多高呢?③

以下是允许市场形成并加强的关键制度性决定因素的部分清单，而这解释了欧洲、美国和其他现代经济体经历的摆脱贫困和夭折的道路：

（1）法治。
（2）产权的清晰界定。
（3）合同的执行。
（4）信息获取和低交易成本。
（5）进入与退出自由的开放竞争。
（6）融资渠道。
（7）投入的流动性。
（8）教育和健康。
（9）政治参与。
（10）有限政府。
（11）个人自由。

在后面的章节，我们将追溯美国经济史，不只是简单地更新和叙述旧的事实和数字，而是强调制度（习俗、价值观、法律和宪法）的锻造过程。冷战的结束和越来越多的关于制度对经济进步的重要性的探讨，给重写历史记录及见证新兴民主在受制于法律和其他制度的市场规律范围内运转的利弊以充分理由。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tack, Jeremy. “Long-Term Trends in Productivity.”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161 - 170.

① Nathan Rosenberg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② Douglass C. North, “Economic Performance through Tim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359 - 368.

③ Joseph A.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Avery, Dennis. "The World's Rising Food Productivity."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379 - 393.

Black, Dan A., Seth Sanders, and Lowell Taylor. "The Economic Reward for Studying Economics." *Economic Inquiry* 41 (3), (July 2003): 365 - 377.

Blank, Rebecca M. "Trends in Pove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231 - 240.

Burnette, Joyce and Joel Mokyr. "The Standard of Living Through the Ages."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135 - 148.

Churchill, Winston S. *A History of English Speaking People*. Vols 1 - 4. New York: Dorset Press, 1956.

Fogel, Robert W.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ces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369 - 395.

Fogel, Robert W. "The Contribution of Improved Nutrition to the Decline of Mortality Rate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61 - 71.

——. "Catching Up with the Economy."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1999): 1 - 21.

Haines, Michael R. "Disease and Health through the Ages."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51 - 60.

Harberger, Arnold C. "A Vision of the Growth Proces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8 (1998): 1 - 32.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Lee, J., and W. Feng, "Malthusian Models and Chinese Realties: The Chinese Demographic System, 1700—2000."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25 (1999): 33 - 65.

Lindert, Peter H. And Jeffery G. Williamson. "The Long-Term Course of American Inequality: 1647—1969."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188 - 195.

North, Douglass C.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reston, S. H. "Human Mortality throughout History and Prehistory."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30 - 36.

Rector, Robert.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5), (October 1986), 1002 - 1037.

——.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5), (October 1990), S71 - S102.

——.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8

(1), (Winter 1994), 3 - 22.

——. "New Goods, Old Theory, and Welfare Costs of Trade Restrictions."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conomics* 43 (1), (February 1994), 5 - 38.

——. "How 'Poor' Are America's Poor?"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241 - 256.

Rosenberg, Nathan, and L. E. Birdzell, Jr. *How the West Grew Rich*.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1986.

Schumpeter, Joseph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Simon, Julian L. and Rebecca Boggs. "Trends in the Quantities of Education—USA and Elsewhere." In *The State of Humanity*, ed. Julian L. Simon. Boston: Basil Blackwell, 1995, 208 - 22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Wrigley, E. A., and R. S. Schofield. *The Population History of England, 1541—1871: A Reconstruc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Zakaria, Farred. *The Future of Freedom*. New York: W. W. Norton, 2003.

第1部分

殖民时代：1607—1776年

经济和历史回顾：1607—1776 年

1. 在美国殖民统治时期，贫穷在世界范围内都很普遍，国家间经常爆发战争。北美最早的英国殖民地遭受了巨大的人类苦难和资本损失。

2. 相对于其他主要的伊斯兰国家和东方帝国，欧洲国家和城邦摆脱了长期相对停滞的封建时期，上升为财富和权力的杰出代表，并迅速支配着美洲的那些国家和地区。

3.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都建立了国际性的帝国，英国和法国更是通过成功运用重商主义政策提高了它们的相对经济和军事实力。英国最终占领了北美的殖民地，并且是发起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国家。

4. 贸易和商业的创新、实用知识的传播、新的和不断扩大的定居点导致土地的增加及改良，以及贸易和边境生活不断降低的风险都提高了美洲新大陆的生活水平。到了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殖民地的物质生活水平跻身于世界前列，并和英国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然而，不同性别、不同种族以及自由市民之间的财富和人权的分布非常不公平。

5. 尽管美国人即使在独立后也仍维持着他们悠久的英国文化和制度传统，他们强大的经济崛起最终将他们置于与宗主国对抗的境地。1763—1776 年是对抗、愈加不信任和最终反抗的时期。在整个殖民时代，由于疾病、动乱和战争，美洲土著人口的数量下降了。

第 2 章　成立殖民地

本章主题

从在美洲的欧洲拓殖者的角度看，美洲新大陆是极大扩张的欧洲的一块偏隅，可谓欧洲的西部边疆。美洲新大陆为拓殖者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但是他们的语言文化、法律习俗以及基本制度都从大西洋彼岸演变并修改而来。在那些将最早脱离欧洲并成为美国的殖民地上，这些是与英国之间的感情纽带，因为在欧洲民族国家争夺帝国的比赛中，最终是英国在北美获胜。英国能够支配北美得益于它的制度以及移民和殖民的自由政策。相应地，我们作为美国人的遗产大体上是英国的——如果不是血缘上的，至少在语言、法律和习俗上是。

要理解这个遗产，最起码要简单了解西欧的崛起、航线的发现、建立在美洲新大陆的帝国等事件的关键发展背景。这将有助于更清楚地透视人口转变，正是这一人口转变使得英国人相对于土著人口及来自竞争对手欧洲民族国家的其他拓殖者能成功统治美国。

航海发现的欧洲背景

从罗马帝国的衰落到导致欧洲扩张至“新大陆”的航海发现，超过 10 个世纪过去了。在接近该时期末时，封建时代已经过去，而到了 14 世纪晚期，整个欧洲

出现了大量民族国家。在俄罗斯、瑞典、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国家统治者享有大量市民的忠诚，相当大的讲德语的群体由他们自己的国王和贵族统治。

地中海地区是欧洲财富和商业的中心。这种经济集中主要是以亚洲（主要是波斯）、中东和欧洲的长途贸易为基础。由于它们的区位优势、上好的产品、商业技能和知识，米兰、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威尼斯这些意大利城邦已经统治旧大陆的长途贸易好几个世纪。

欧洲渊源和扩张的帝国

然而，到了15世纪晚期，北欧的商业经历了重大的发展，尤其是在与北海和波罗的海接壤的汉萨城市里。个人和财产的较大安全在法律上确立并通过法庭和公认的政治实体来执行，这刺激了商业和经济投资。交流与交易的日益安全开辟了全新的贸易和商业航线，尤其是在欧洲的西部和北部地区。这种上涨往往扩大了地中海地区的旧贸易，但是新贸易的增长速度要比旧贸易快。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欧洲人口的迅速增长，它正从14世纪早期的饥荒恢复过来，最重要的是从1347—1348年的黑死病恢复过来。例如，英格兰的人口从1348年的370万人下降到14世纪70年代的不足220万人；法国大概失去了40%的人口；其他地方的人口损失率估计从30%到50%不等。在15世纪到16世纪期间，人口再度增加，促进了商业的增长和经济增长集中的不断转移。人口的快速增长和欧洲经济的日益商业化是巩固欧洲新兴国家的重要基石。欧洲和其他地方（最终包括美洲）的扩展也是国家建设进程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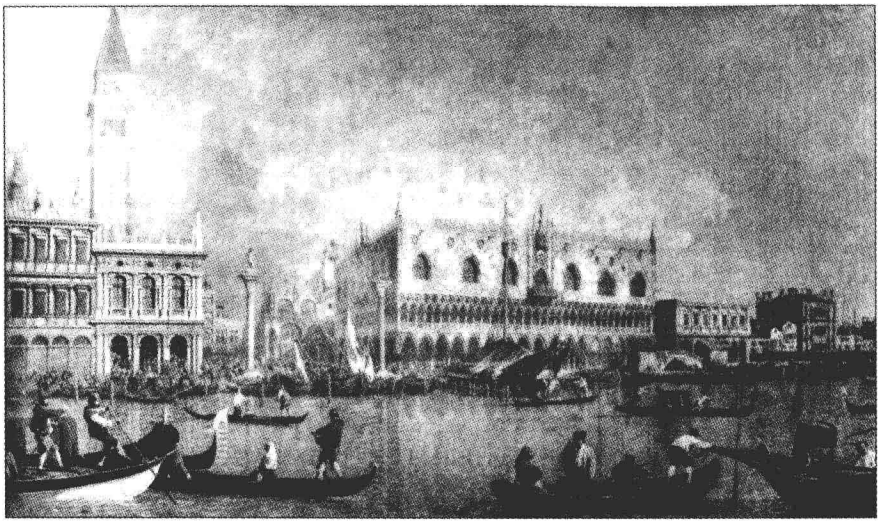
了解到如下一点意义非常重大：几百年来欧洲天主教陷入与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军队的战争中，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东征。到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在政治、商业（和航海）及军事等许多领域遥遥领先。15世纪是一个转折点，加快了相互竞争的国家和帝国之间军备竞赛的速度。在基督教的西班牙，1492年被人们铭记在心既是为了庆祝从摩尔人手中占领了格拉纳达，也是为了庆祝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的美洲航行。

葡萄牙和第一发现

在某种程度上，受雇于西班牙的热那亚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取得最重要、最著名的着陆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无论是西班牙还是大量的意大利城邦，都不是长途探险的世界领先者。微小的航海国家葡萄牙是大西洋的先驱，到哥伦布开始探险活动时，葡萄牙已有超过70多年的海洋发现了。

葡萄牙在13世纪就已经将穆斯林赶出葡萄牙领土，于1415年通过占领

北非的昆塔开始了欧洲的海外扩张。在航海家亨利王子［其位于萨格里什的海军兵工厂就是15世纪的葡萄牙卡纳维拉尔角（Cape Canaveral）］积极且充满想象力的领导下，从1415年到1460年沿着非洲西海岸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探险活动。马代拉岛在1419年被占领，此后不久加那利群岛也被攻下。葡萄牙从1439年至1453年在亚速尔群岛建立殖民地，并将那些从非洲进口的大量奴隶移民到这些岛上种植糖料作物。这些风险投资同时具有商业和军事目的。欧洲人在早期的十字军东征中初次认识糖，而地中海群岛的塞浦路斯、克里特和西西里岛早已是主要的糖产区。伊比利亚拥有的岛屿的商业开发和甘蔗种植园反映了15世纪经济实力和经济活动的西移。此外，由于土耳其和威尼斯相互勾结对东地中海贸易航线的贸易和价格进行控制，葡萄牙人和其他人试图绕过这一航线。欧洲人渴望得到亚洲货物，尤其是香料。在没有制冷的时代，中世纪的厨师慷慨异常地使用胡椒粉、丁香、生姜、肉豆蔻和肉桂，这一时尚是为了掩盖受污染的肉的味道，并给单调的食物调味润色。伴随新土地发现和新行业出现的是知识的积累。帆索具和船舶设计（从一桅船到三桅船）的新方法和其他航行方面的进步通过不断摸索被掌握。这些新技术对克服强大的大西洋的流行季风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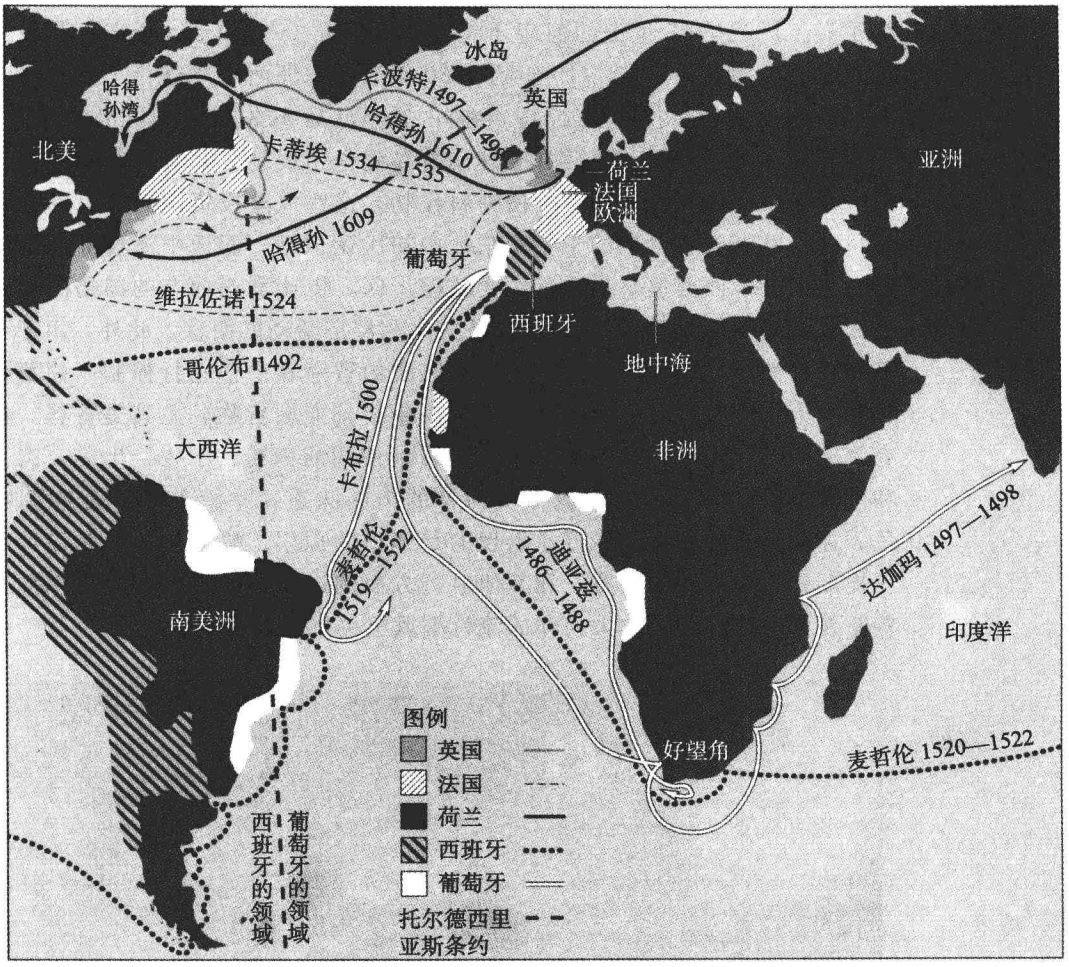


COPYRIGHT: SCALA/ART RESOURCE, NY

商业繁荣的壮景：威尼斯（由卡内莱特提供）既可以被认为是一个东方城市，也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西方城市，并且它的商业和航海实力在几百年中一直是西方文明的一股持续的力量。

葡萄牙和西班牙：不断扩张的帝国

正如地图2—1所示，来自欧洲最伟大的海洋探险发生在略少于35年的时间



地图 2—1　探险

西班牙和葡萄牙最早去北美探险，之后法国、荷兰及英国都在北美的一些地方探险，这都是由于新的经济机会的出现，但是英国的探险导致了在新世界的永久定居点的出现。

内。它的历史范围是惊人的。在 1488 年，葡萄牙的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绕过了好望角，如果他的船员不强迫他回国，甚至可能已经到了印度。在 1522 年 9 月，维特多利亚号——费迪南德·麦哲伦五船舰队中的最后一艘船，进入了塞维利亚港。18 个欧洲人很壮观地环绕了地球。在这两个时期之间，两个同样重要的其他航行也完成了。哥伦布认定从加那利群岛到日本不超过 2 500 英里，他说服了西班牙君主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资助他的初次大西洋探险。1492 年 10 月 12 日，他的眺望员看到了巴哈马群岛的小岛圣萨尔瓦多。仅仅几年后，为葡萄牙人航行的瓦斯科·达伽马通过好望角到达了印度的卡利卡特，并在 1499 年回国。继迪亚士和哥伦布的发现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带着教皇的祝福，在《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Treaty of Tordezillas）中承认佛得角群岛至其以西超过 130 里格（1 100 英里）的全部土地归西班牙所有（这个测量意外地最终建立了葡萄牙对巴

西的领土所有权)。因此，随着葡萄牙支配着东方（范围覆盖至东非、波斯湾、印度洋、中国及更远处），而西班牙在西方至高无上，航道开通了。

到16世纪早期，欧洲的财富和商业已经转移到了大西洋。地中海的领导者并非绝对衰落，他们只是被超越了。在国际背景中，这是主要的西方民族国家相对崛起和取得最终霸权的关键的第一阶段。

在1521年赫南多·科尔特斯征服墨西哥之后，美洲的金银以不断增加的数量流入西班牙。当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在1580年强行合并葡萄牙之后，西班牙的声望达到了顶峰。通过王室法令，西班牙吞并了葡萄牙，在东方强大、在美洲无敌的两大帝国如今结合起来了。当我们细想当时还没有其他国家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永久殖民地时，西班牙权力的衰落是如此之快似乎很令人惊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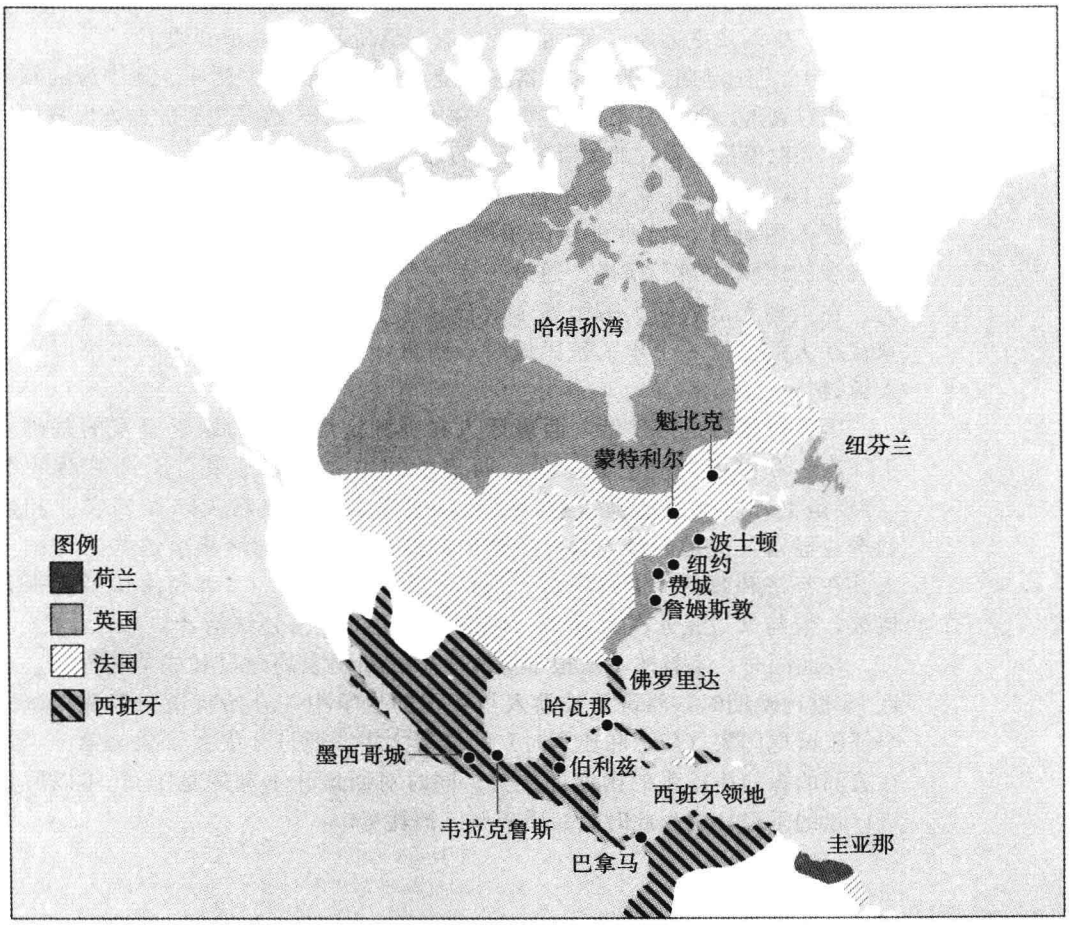
尽管西班牙是拓殖者，西班牙人在美洲定居的努力缺乏坚实的基础。对于征服者和国内的统治者来说，西班牙的主要兴趣是来自美洲矿藏的财富（特别是银）以及传播基督教。当然，他们也试图在新大陆发展农业和建立制造业经营，但是西班牙人保持着阶级统治，从而统治从事这些工作的土著人并在经济和政治上束缚他们。他们的宗教、管理、军事和法律制度强大而持久，但与其说是永久拓殖者，西班牙人更像是占领统治者。

与此同时，宗教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国家的建设和战争的性质。当接近16世纪晚期时，西班牙被卷入与英国的战争中并开始将精力浪费在试图完全征服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的徒劳之中，西班牙失去了成为第一个通过在美洲的探险而扩张的国家的优势。同时对西班牙不利的是1600年以后金银进口量的下降，因为此时高品质矿石已被耗尽。

后来者：荷兰、法国和英国

荷兰、法国以及英国像西班牙一样，都最终在新大陆争取霸权（见地图2—2)。英国人和荷兰人的成功代表了17世纪席卷北欧和西欧的商业革命的成就。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它到17世纪中叶在航运、金融和贸易方面均处于领先地位。但是荷兰对北美的占有仅限于纽约（经济上以皮毛为基础)，并且它的大部分利益主要是在远东而不是在西方。此外，荷兰人过于强调贸易站的建立，太忽视用殖民来牢固建立自己的海外帝国。

事实证明，好几个世纪以来法国和英国都是最大的竞争者——争夺霸权的长跑比赛。从1608年起塞缪尔·德·尚普兰建立了魁北克，法国在美国成功进行了西至五大湖地区的探险活动，并到17世纪末时从密西西比峡谷向南推进至路易斯安那。在东方，尽管作为一个后来者，法国在1664年建立法国东印度公司后也成功地和英国竞争了一段时间。但是不到一个世纪，英国在印度击败了法国，就像他们有朝一日在美洲的做法一样。英国人在印度和美洲取得胜利是因为他们建立了最广泛的永久定居点。在1756年法英北美殖民地争夺战爆发时，定



地图 2—2　欧洲殖民地

欧洲实际拥有和宣称拥有的美洲殖民地不断变化，这里展示了 17 世纪末期它们的领地和主要的城市。

居在加拿大和加勒比地区的法国人有约 6 万人，相对来说，定居在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有 200 万人。

对我们来说，欧洲扩张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上定居点稳定而持续地增长。为什么英国人是如此成功的拓殖者呢？

可以肯定的是，和法国人及荷兰人一样，英国人觊觎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财富，并且英国水手和商人一度表现出他们在北美的荒野艰苦的前哨据点似乎只是暂时的。他们在拉丁美洲做贸易，但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和托马斯·卡文迪什之类的私掠者在经过拉丁美洲北部海域时也掠夺西班牙帆船上的财富。随着 17 世纪的发展，在东方探测有利可图的前哨的英国冒险家在印度成功建立了根据地。但是，和一些西欧国家的领导人不同，诸如理查德·哈克卢特之类的英国人主张在新大陆长久殖民并定居，他们意识到真正的殖民地将最终成为来自宗主国的工业产品的重要市场，并成为其原料

来源。

但是只有商人和国家元首从繁荣殖民地获得好处是不够的：必须使平民相信移民新大陆将给他们及其家庭带来好处。移民的最大动力是拥有土地的愿望——仍然是欧洲的地位和经济安全的象征——并努力争取比国内收入最高的工匠获得更好的生活水平。这些经济动力也经常伴随着宗教动力。考虑到跨大洋航行的昂贵成本（超过了普通人的年收入），问题仍然是如何支付人们移民到新大陆的费用。

英国在北美的第一批殖民地

危险的开端

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和沃尔特·雷利爵士这两个同母异父兄弟是最早在北美从事冒险的英国人。作为西北航道上更加热诚的探求者之一，吉尔伯特在1578年去了纽芬兰岛，并于1583年又去了一次，但都未能在那里拓殖领土，并在第二次尝试后返回英国的航行中丧命。相反，雷利被授予在弗吉尼亚定居的权利，并可以控制他可能建立的任何殖民地周围近600英里半径内的土地。雷利确实带了两批拓殖者到达新大陆。第一批拓殖者在现在的北卡罗来纳州海岸的罗亚诺克岛登陆，并停留了不到一年。除了对新家园的热情，第一批拓殖者和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在1586年夏天空手返回英格兰。大无畏的雷利恳求一些富有的伦敦人给予财务援助并于次年派遣了第2组由长官约翰·怀特带领的150人。雷利已经给出明确的指示，要求这一殖民点将建在切萨皮克湾的某个地方，但是怀特长官不理会这一命令并在罗亚诺克靠岸。怀特回到英格兰寻求补给；当他在长时间延迟后于1590年返回时，这批移民都已消失。著名的“失去的殖民地”（lost colony）的成员一个都未曾找到，甚至连一颗牙齿都没找到。

在1588—1603年英国与西班牙之间漫长的战争之后，英国继续尝试在北美开辟殖民地。在1606年，两个许可证被授予：一个授予了一群伦敦人，另一个授予了普利茅斯和其他西部港口城市的商人。伦敦公司得到了拓殖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南部的权利；普利茅斯获得了对北部的管辖权。

于是两个相距甚远的殖民地于1607年建立起来了：一个在靠近缅因州肯纳贝克河口的萨加达霍克，另一个位于今天的弗吉尼亚州。[①] 在北部那块殖民地的冬天存活下来的人放弃并回国了，因此，在詹姆斯敦建立的殖民地赢得了作为英国在北美第一个永久殖民点这个来之不易的荣誉。

① 当时，弗吉尼亚指在北美殖民地上的英国人声称拥有的全部领土。早期的租约显示这一地区在北纬34度到北纬45度之间，大约在卡罗来纳的南部港口和纽约最北部的边界之间。

确实来之不易！当伦敦公司于 1607 年将三艘小帆船在切萨皮克湾靠岸时，有 105 人上岸去寻找詹姆斯敦殖民地。由于被无用的“一夜暴富”（get-rich-quick）计划轻易地分散了注意力，他们居然在 1607 年和 1608 年运送了几船的云母矿和黄铁矿回英国。结果，还未等听到他们的财宝不过是些不值钱的“愚人金”（fool's gold）的坏消息，疾病、饥饿和灾难就使一大批人命丧黄泉：詹姆斯敦殖民地原来的 105 个拓殖者在第一年里竟死去了 67 人。

于 1609 年由改组并更名的弗吉尼亚公司派出的 800 个新的到来者加入到剩下的极少数幸存者（其中一个被判吃人罪）中。到了第二年春天，边疆的困难导致拓殖者的数量从 838 人削减至 60 人。那个夏天，尽管有新拓殖者的新补给及鼓励他们重新考虑，这些幸存者仍然沿着下游逃回英国。用查尔斯·安德鲁的生动标签来说，这是弗吉尼亚的“饥饿时代”，也是环境退化的时代（Earle 1975）。

供给不足以及开辟殖民地经验的欠缺使早期的边疆拓殖者大都因为遭受苦难而撒手人寰。1623 年，由于 500 名拓殖者因遭遇印第安人的攻击而死亡，一项针对弗吉尼亚经历的皇室调查被发起。调查报告说，自 1607 年以来共有 6 000 名拓殖者移民弗吉尼亚，其中有 4 000 人死亡。这些饱尝磨难的拓殖者到达异国他乡后的预期寿命只有两年。

最初殖民在付出惨重的人力代价的同时还有巨大的资金损失。早期殖民地的风险投资无一例外地无利可图。事实上，它们是金融灾难。弗吉尼亚公司累计投资的超过 20 万英镑（相当于现在 2 200 万美元）的本金和利息均未曾偿还。在新英格兰的投资情况稍好些，但总的来说，英国的资本家在致力于征服边疆的过程中成为地地道道的失败者。

早期的改革

这些最初的殖民地留下的经济和制度教训使后来的冒险者受益匪浅，因此，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除个别时候，殖民活动贯彻始终。由于北美没有金矿或银矿或者准备好交换外来货物的远古人类的早期发现，建立像南美和东方的欧洲前哨基地那样的贸易站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北美边疆需要一种更永久的殖民地形式。这将导致没有持续的公司或皇家补助，能在殖民地种植并可用于商业交换的“经济作物”或其他作物的发现是必不可少的。因此，我们将在第 3 章中讨论的烟草和水稻种植以及其他经济活动的扩张对英国殖民地在北美生根并长久发展至关重要。此外，为提高生产效率，组织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当被迫适应北美的环境时，有利于筹集资金并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好地服务于英国人的股份制公司衰退了。仿照诸如东印度公司这样大的东方贸易公司，新公司——包括伦敦公司、新普利茅斯公司和马萨诸塞湾公司（Massachusetts Bay Company）——必须取得在新大陆建立第一批英国殖民点的信贷。但是它们的成功仅局限于保卫殖民地立足点。除了哈得孙湾公司（成立于 1670 年且今天仍在运行）和在殖民时代晚期

独特的佐治亚实验，股份制公司（来自英国的指导缺位）在英属北美殖民地存活了不到 20 年。

詹姆斯敦的痛苦经验有力地强调了早期拓殖者遭遇的困难和所需的调整。早期的詹姆斯敦拓殖者由公司带来并给予“殖民者股份”，五年后才开始分配利润。同时，他们的生活费用由公司承担，他们完全为公司工作。实际上，殖民地最初作为集体单位经营，其中成员共享生产方式和消费，但是集体经营方式缺乏个人激励，并导致许多不满。未婚男子抱怨其工作没有得到给已婚男子妻儿的生活成本的补偿。当更强壮、更能干的工人未获得比那些不能像他们那样努力工作的其他工人更大数额的食物和供给时，他们会因此愤愤不平。此外，公有制扼杀了对照管和改良土地以及进行生产创新的激励。

另外，来自英国的指导缺位产生了问题，这是因为成功的生产需要当地的管理指导。英国的一味逐利转移了生产目标，并增加了早期拓殖者的挫败感。

1609 年小块的花园土地被授予个人，1612 年又进行了很多体制改革，詹姆斯敦居民获得了对当地事务更大的控制权。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产生更有弹性的领导和当地自治，一名副总督被派驻到弗吉尼亚。此后，来自英国的集中指示变得越来越少见。

随着私有土地取代公有制，工作激励改善了；对个人努力的充分回报变成了现实，取代了产出共享的安排。1614 年，个人被允许拥有 3 英亩的私有土地。1618 年的人头权利制（headright system）是建立私有产权的重要的第二步。根据该制度，任何自费去弗吉尼亚的拓殖者均可获得 50 英亩的土地，并可因为替任何其他人支付了交通费而获得另外的 50 英亩土地。在 1623 年——在首批拓殖者到达詹姆斯敦仅 16 年后——所有土地均转化为私人所有。那一年的皇室调查同样迎来了殖民地公司形式的解体。1625 年，弗吉尼亚转化为英国直辖殖民地。

詹姆斯敦早期经历的许多困难在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也感受到了。但是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殖民，最早在普利茅斯（普利茅斯公司，1620 年），然后在波士顿（马萨诸塞湾公司，1630 年），避免了詹姆斯敦拓殖者面临的一些问题。例如，由于马萨诸塞湾公司将它自己的章程带到了新大陆，它避免了来自英国的昂贵指示和缺位控制。较强的社会和文化凝聚力以及更相似的宗教信仰可能促成了那里公共安排更大的成功，但是正如经济透视 2.1 所述，普利茅斯殖民地也恢复为私有土地。城镇企业延长了公有土地的使用，但是私有土地逐步取代公有土地。到 1650 年，私人拥有的家庭农场在新英格兰占主导地位。

经济透视 2.1

产权和激励

集体所有制和平等共享消费的问题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殖民时代的美国和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均尝试建立这种生产和分配的组织形式，但这些努力最终都失败

了。有些人将这个问题称为“公地悲剧”(共同财产)，它导致公有资源的过度使用和迅速竭尽。

我们鼓励你在这一点上简要回顾第 1 章经济透视 1.1 中的 5 个经济推理命题。这些经济推理命题有利于解释集体所有制和产出的共享（平分或固定份额）如何导致“免费搭车者”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考虑共享土地所有权且共同生产了 100 蒲式耳玉米的 10 个工人，平均每人消费 10 蒲式耳玉米。假设一个工人开始偷懒并将其劳动努力减半，从而导致产出减少 5 蒲式耳。由于产出共享制度的安排，偷懒者的消费量和其他工人一样，现在都是 9.5（=95÷10）蒲式耳。尽管他的努力已经下降了 50%，但他的消费量只下降了 5%。偷懒者是在搭他人劳动的便车。事实上，每个工人的激励都是搭便车（经济推理命题 3），而这降低了总的努力和产出。

相反，假设一个工人考虑每天工作更长时间（12 小时，而不是 10 小时）以将总产出从 100 提高到 102。每个人的消费增加是 0.2 蒲式耳，每人增加了 2% 的消费，但这是以个人增加 20%的努力为基础的。你会做出额外的努力吗？

如果设定了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权，就不会有搭便车行为。任何努力的削减相应地由个人产出下降来承担。任何努力的增加将额外努力的所有奖励都放在更努力（或者更灵活）地工作的人的怀抱里。更普遍地讲，如果设定了每个人的私有财产权，来自较多努力的产出的任何变化（ΔQ）都归额外努力的那个人。如果是公共财产，增益不是 ΔQ，而是 ΔQ 除以该群体的人数。群体越大，来自更努力工作的增益就越少，且越不努力工作，来自干得更少的损失也越小——从个人的角度看。换句话说，群体的规模越大，搭便车的激励就越大。这些激励效应（经济推理命题 3）告诉我们，正如布拉德福德总督 1623 年在新英格兰的普利茅斯殖民地所注意到的那样：

> 因此，他们开始思考如何尽他们所能提高玉米的产量，以及获得比他们已有的更好的作物，这样他们可能不用再在痛苦中变得衰弱无力。最后，在对事情的许多争论之后，总督……让步了，即每个人有为他们自己种植玉米的权利，并在这一点上相信他们自己；让所有的其他事情仍按以前的一般方式处理。所以根据家庭人数所占比例，给每个家庭分配一片土地，仅供当前使用（但未规定继承分割），此外，所有的男孩和青年分布在一些家庭。该制度非常成功，因为它使得所有人都非常勤劳地工作，种植的玉米比总督和其他任何人能采取的任何手段下所能生产的玉米都多得多，它也省去了总督很多麻烦，并让他更加满意。如今妇女很愿意下田，并带着她们的小孩去种玉米，而之前，她们则声称身体太弱不能下田；强迫她们下田工作的人都被认为是暴君和压迫者。而在这种公共事业和条件下的经验尝试了一些年，在一些虔诚且清醒的人中，可能充分地表明了柏拉图及其他受到后人称赞的古人的自负虚荣——剥夺财产并使共同体进入共同富裕状态将使人们繁荣幸福；好像他们比上帝更聪明。由于这种共同体（至少在目前看来）滋生了许多的困惑和不满……由于最能干且最适合工作和服务的年轻男子抱怨他们无偿地花时间和精力为其他男人的妻子和孩子工作，强壮或多才的男子分得的食物和衣服并不比那些体弱的、不及他们 1/4 工作量的人分得更多，这是不

公平的*……不让人反对这种做法，就是人类的腐败，这与事业本身无关。我认为，因为所有人身上都有这种腐败，所以上帝以他的智慧看到了另一种更适合他们的事业。①

很显然，寻求合理的制度安排（经济推理命题4）非常重要。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由股份制企业建立的殖民地是纽约，最早是由荷兰西印度公司（1620）据有，但于1664年在一次不流血的冲突中被英国人夺走。马里兰和宾夕法尼亚是通过私有赠款开始的，分别于1634年和1681年由巴尔的摩公爵和威廉·佩恩获得。前者的愿望是如果有利可图的话，建立一个罗马天主教徒的避难所，而后者的愿望同样是为贵格会教徒和其他受迫害的宗教团体提供避难所。罗得岛的殖民同样是出于宗教原因，缘由是罗杰·威廉斯于1644年被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放逐。上述地区以及卡罗来纳州和最后拓殖的大陆殖民地佐治亚州（1733），都得益于早期殖民的许多困难和教训。不论各个殖民地的组织形式如何，皇室保证给予除奴隶外的所有英国市民拓殖者应有的权利。在北美的大英帝国从法属加拿大延伸至西属佛罗里达，直到加勒比地区的糖料种植园群岛。

引来殖民者

大西洋给北美的殖民造成了极大的障碍。在17世纪早期，通过大西洋的航行费用为每人9～10英镑，比一个普通英国人一年的收入还要多。在殖民时期晚期，和平状态下的船资大都是5～6英镑。所以，在17世纪，大多数新来的英国人和欧洲人并非自费来美洲。然而，到1775年，超过50万的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及其他欧洲人已经完成了横渡大西洋的航行。其中超过35万人通过借款或签订一种特别的借据（IOU）——一种债务契约（indenture）来支付船资。

这种债务契约规定，人们可以通过向新大陆的某个雇主在一段时间里出卖劳动力来支付其赴美船资。今天在新闻界经常被误称为准奴隶制，契约机会实质是个人自由的扩展。尽管这些合同形式多样，但法律习俗使它们相似。一般而言，潜在的移民者会对限定他们服劳役3～7年的契约条款予以认可，尽管4年可能是最常见的期限。契约移民通常与船长或英国的招募代理人签订契约。只要仆人活着抵达美国的港口，该契约就被出售给种植园主或商人。这些契约在18世纪的售价通常为10～11英镑，几乎是航行费用的两倍。契约奴因此被约束着按照

---

* 本句原文为 The strong, or man of parts, had no more in devission of victails & cloaths, then he that was weake and not able to doe a quarter the other could; this was thought injuestice。译者希望能尽量翻译准确。——译者注

① *William Bradford, of Plymouth Plantation* (New York: Capricorn, 1962), 90 - 91.

雇主们的要求进行劳作，以换取食宿，且在服役期满可以拿到一定数量的货币或土地作为“自由费”。这一制度提供了人才的活跃贸易，而且契约制度应被视为对移民的投资，就像对就业培训（或学徒训练）的投资。

最早的契约移民者被送往詹姆斯敦并由弗吉尼亚公司售出：1618 年大约有 100 名十几岁的孩子，1619 年也有相似数量的一批以结婚为目的的年轻女性，而 1620 年有一群年轻的工人。之后不久，私人代理四处搜索港口、酒馆和乡村，从而与工人签订契约。契约奴从广泛的欧洲社会范围中选出，包括农民和不熟练的工人、工匠、家庭佣人及其他阶层。尽管大多数人刚来时没有专业技能，但他们自愿来到美国，因为在英国或欧洲大陆上升到地主地位的可能性非常小。他们也乐意签署债务契约，因为他们的机会成本（利用他们的时间的次高价值）通常很低——作为英国乡村的农业工人（一个“务农的仆人”）的食宿和低工资。在英格兰村舍中出生的小孩通常 10 岁时就去工作了，在家庭和农场之间移动，直到好运（通常是遗产或赠予）允许他们结婚。对于许多人来说，以一段时期的束缚来换取美国之旅似乎值得冒险。

一个仆人的生活是艰难还是轻松主要取决于工头的性情好坏；法院通常保护契约奴免受极端残暴的对待，但法律也允许迅速逮捕并遣返逃跑的仆人。对逃跑仆人通常的处罚是契约期限的延长。

戴维·加伦森、罗伯特·希夫纳和法利·格拉布的研究揭示了这个受束缚劳动力市场的许多错综复杂之处。例如，妇女的契约期限最初是要短于男性的，因为殖民地的妇女更稀缺。但到 18 世纪时，两性的服务期限相当。契约奴的工作环境和服务期限也取决于所在地。通常，在较不健康的居住地区，如加勒比群岛，提供的工作契约期限比大陆殖民地的要短。一般来说，熟练的或有文化的工人也会获得较短的契约。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充斥着理性行为的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机制。

来自欧洲大陆的移民（主要是德国人）通常是靠出卖劳动力来抵偿船资的移民，他们靠船长提供的信贷从海外来。有时，这些人会预付一部分船资。到达之后，他们被允许在一个短期限内还钱给船长，或是从亲戚朋友处借钱，或是通过自己签订缔约出售他们的服务。因为他们通常在抵达时没带现成的合同，而且一般也不会讲英语，支付航行的全部费用的合同期间有时要高于债务契约的期限，高达 7 年。此外，德国移民通常是举家迁移，而英格兰移民则通常是单身而且更可能成为契约奴。靠出卖劳力来抵偿船资的德国移民的服务期限较长，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他们偏向于选择大雇主，而这项权利是契约奴所没有的。家庭群体的迁移鼓励了这种偏好，且大多数德国人定居在宾夕法尼亚州。另外，如果家庭在上岸前已经支付一部分船资时，他们靠出卖劳动力来抵偿船资的服务时间可大大缩短。

随着几十年过去，作为契约奴或靠出卖劳动力以抵偿船资的欧洲移民的比率下降了。到 19 世纪早期，契约市场已经基本上消失了，这是由经济力量而非立

法所致。根据法利·格拉布，其他提供资金的途径，主要是美国居民为旧大陆的亲戚支付路费，是这个市场消失的主要原因。①

另一个有助于它消失的原因是这一时期船资的下降和欧洲工人收入的上升。此外，与契约奴或自由劳动力相比，奴隶制是一个可行且削减成本的替代劳动力的来源。

尽管在1620年后奴隶以不断增加的数量进口，但与白人契约奴或自由劳动力作用相当的人，即奴隶，直到1650年以后才成为劳动力的重要来源。到1700年，从马里兰以南，奴隶制已成为牢固确立的制度。② 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并非不拥有奴隶，但在那里因为几个原因所以较不普遍。在南方，奴隶难得因为坏天气而不能工作，而在北方由于坏天气而好几天无法进行户外工作的情况时有出现。同样重要的是，烟草，然后是大米，最后是靛青，它们都是南方的主要作物。由于种植它们需要大量非熟练劳动力，他们可在工作组中受到有限的监督，因而这些经济作物特别适合使用奴隶种植。尽管不如加勒比群岛上的甘蔗种植园一样大，大型农场仍然使奴隶制有利可图，而且南方的农场规模也变得比新英格兰或中部殖民地的大很多。这些作物，尤其是水稻和靛青，和奴隶制相结合产生了规模经济并促进在监督下的团体劳动的生产单位变得更大。随着生产单位变大，当产出相对于投入（土地、劳动和资本）扩大时，规模经济出现了。我们已经从克里斯托弗·黑尼斯那得知，与自由劳动力及具有较小程度自由的契约奴相比，奴隶制的另一个好处就是降低了人员更替成本。③ 奴隶主不会面临奴隶在播种或收获季节或为了更高的工资转为其他雇主干活而离开田地的可能。最后，伴随着南方奴隶纯粹的增长势头的是为加强和维持奴隶制而进行的道德和制度的适应。例如，南方对进口奴隶的购买活动引发了每购买一个奴隶可获得50英亩土地的人头权，这加强了那里农场单位的规模增长。并且，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一种继承形式，其中土地转让给长子）在南方的殖民地盛行。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罗得岛和纽约除外），通常遵循多子分承制（multigeniture），在儿子之间平分财产。久而久之，长子继承制使土地永久传承且建立了相对较大的种植园。

与白人契约奴不同，非洲奴隶在殖民地并不作为英国人的保护对象。奴隶的服务期限是终生，不管孩子的父亲是谁，女奴隶的孩子生来就是奴隶。只有通过自购或者慈善，奴隶才能获得自由。1774年，殖民地大约有50万名奴隶，其中只有18 000人是自由的。

正如我们已经强调的，那些通过自身的资源来到美洲的人在大多数殖民地获

---

① Farley Grubb, "The End of European Immigrant Servitu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ket Collapse 1772—183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1994): 794 - 824.

② 关于在切萨皮克地区契约制度向奴隶制度的转变的经济分析，参见 Farley Grubb and Tony Stitt, "The Liverpool Emigrant Servant Trad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lave Labor in the Chesapeake, 1697—1707: Market Adjustments to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 (1994): 376 - 440。

③ Christopher Hanes, "Turnover Cos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lave Labor in Anglo-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 (1966): 307 - 329.

得了人头权授予的50英亩土地。但是，吸引工人来殖民地的不仅仅是土地，还有相对较高的工资。尤其是在海港，所有种类的技工、工匠、商人和水手，甚至是学者都给西大西洋海岸的商业生活带来了活力。最后，或许有多达3万名囚徒为了避免死刑或无期的监禁也自愿将他们自己运输到新大陆。1718年以后，犯罪情节轻微的囚犯需作为契约奴服务7年，而犯罪严重的则要服务14年，这已经成为不成文规定。

人口统计学变化

尽管高增长，人口仍稀少

美国经济生活的一个主要事实——人口稀少和劳动力短缺——在整个殖民时期持续。英国殖民极端重要的另一方面和在确保及维持英国对北美的边远地区的控制中的关键因素是殖民地极高的人口增长率。产生人口明显不足的原因是有大量的可用土地，这使得殖民地人口在空间分布上密度过低，且只在少数主要港口城镇有稠密人口。尽管增长率异常高——人口大约每25年翻一番，以至于托马斯·马尔萨斯忧心忡忡地称之为“增速极快，可能史无前例”，不过这还是发生了。马尔萨斯和其他人都将美国殖民地作为几乎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的最好例子。这一增速是欧洲人口增速的两倍，这样一种增加速度，最终不会导致饥荒、瘟疫及死亡吗？

这样的欧洲论战和殖民者的想法相差甚远。事实上，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1年写了一篇文章赞美殖民地的人口高速增长的好处。尽管用尽各种办法来鼓励或强制（就非洲俘虏而言）人口搬迁到新大陆，人口过剩从未在殖民地发生。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也未产生殖民地的人口压力；人口增长一般被视为进步的一种标志，被作为减少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危害的一种手段。

英属北美的人口增长

表2—1展示了不同区域和种族之间来自移民和自然原因的人口增长。请注意新英格兰和上南部地区（Upper South）人口时序、人口增长和人口水平十分相似。后来者——中部殖民地和深南部（Lower South）——则显示出略高的人口增长率，这使它们能赶上前者的水平。从整个殖民地的角度来看，人口的增长速度是平稳的，年均略超3%。从1610年弗吉尼亚的300名拓殖者，到1770年有170万欧洲血统和50万非洲血统的人定居在13个殖民地上。

表 2—1　　北美殖民地各地区的人口（千人）

年份	新英格兰			中部殖民地		
	白人	黑人	总和	白人	黑人	总和
1620	0.1	0.0	0.1	0.0	0.0	0.0
1640	13.5	0.2	13.7	1.7	0.2	1.9
1660	32.6	0.6	33.2	4.8	0.6	5.4
1680	68.0	0.5	68.5	13.4	1.5	14.9
1700	90.7	1.7	92.4	49.9	3.7	53.5
1710	112.5	2.6	115.1	63.4	6.2	69.6
1720	166.9	4.0	170.9	92.3	10.8	103.1
1730	211.2	6.1	217.3	135.3	11.7	147.0
1740	281.2	8.5	289.7	204.1	16.5	220.5
1750	349.0	11.0	360.0	275.7	20.7	296.4
1760	436.9	12.7	449.6	398.9	29.0	427.9
1770	565.7	15.4	581.1	521.0	34.9	555.9
1780	698.4	14.4	712.8	680.5	42.4	722.9

年份	深南部			深南部			13 个殖民地总和		
	白人	黑人	总和	白人	黑人	总和	白人	黑人	总和
1620	0.9	0.0	0.9	0.0	0.0	0.0	1.0	0.0	1.0
1640	8.0	0.1	8.1	0.0	0.0	0.0	23.2	0.5	23.7
1660	24.0	0.9	24.9	1.0	0.0	1.0	62.4	2.1	64.6
1680	55.6	4.3	59.9	6.2	0.4	6.6	143.2	6.7	149.9
1700	85.2	12.9	98.1	13.6	2.9	16.4	239.4	21.1	260.4
1710	101.3	22.4	123.7	18.8	6.6	25.4	296.0	37.8	333.8
1720	128.0	30.6	158.6	24.8	14.8	39.6	412.0	60.2	472.2
1730	171.4	53.2	224.6	34.0	26.0	60.0	551.9	97.0	648.9
1740	212.5	84.0	296.5	57.8	50.2	108.0	755.6	159.2	914.7
1750	227.2	150.6	377.8	82.4	59.8	142.2	934.3	242.1	1 176.5
1760	312.4	189.6	502.0	119.6	94.5	214.1	1 267.8	325.8	1 593.6
1770	398.2	251.4	649.6	189.4	155.4	344.8	1 674.3	457.1	2 131.4
1780	482.4	303.6	786.0	297.4	208.8	506.2	2 158.7	569.2	2 727.9

资料来源：根据对应区域将 John J. McCusker and Russell Menard 文章中的表 5—1、表 9—4、表 6—4 和表 8—1 加总。John J. McCusker and Russell Menard，*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5），103，203，136，and 172.

绝对移民数量最大的时期发生在18世纪——尤其是1720年以后，那时有10万～12.5万个苏格兰—爱尔兰人和约10万个德国人来到北美。17世纪的大多数移民是英国人，而另一次英国移民的剧增发生在1768年到1775年之间。多达30万个白人移民在1700年到1775年之间来到新大陆，而黑人移民也以略少的数目抵达。大量非常肥沃的土壤和宜人的气候吸引着欧洲人并为保护黑奴提供了动力。尽管如此，在各区域殖民的最早的几十年中，移民是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

在新英格兰，17世纪40年代后期移民基本就停止了，而自然原因成为1650年以后人口增长的来源。对于后来开拓的地方，如宾夕法尼亚，移民力量后来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即使在那里，自然力量在1700年后也逐渐取得主导地位。在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只有1/10的白人是在外国出生的；黑人的比例介于2/10至3/10之间。

商业上的成功、有利的经济环境和劳动力的高价值促成了殖民地的高生殖率。北美白人的年出生率介于45‰到50‰之间，在欧洲接近30‰，而在今天的美国只有12‰。殖民地的人口非常年轻。到18世纪70年代，57%的人口未满21岁。此外，殖民地人口中较高的比例处于育龄期。通常，殖民地的女性往往结婚相当早，在20岁到23岁之间，这比欧洲女性的平均结婚年龄要早几年。土地的廉价鼓励殖民地的早婚，殖民者一般比欧洲人更容易开始自行谋生、获得土地并组建家庭。生育是妇女死亡的主要原因，而且许多男子会通过再婚以维持其家庭。欧洲的已婚男子平均有4～5个孩子，但是早婚和育龄母亲的比重较高导致每个普通的殖民地家庭大概有7～8个孩子。对农村经济活动的重视也鼓励殖民地较高的出生率。在城市地区抚养孩子的代价更高，并且孩子的劳动贡献也往往更少。

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是，一旦饥饿的最初几年已经过去，殖民地就会经历相当低的死亡率。欧洲的年死亡率约为40‰；殖民地的年死亡率为20‰～25‰。

殖民地较低的人口年龄结构部分解释了这点，但异常低的儿童死亡率更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统计数字。平均而言，殖民地的白人母亲在吃住方面要好于欧洲的母亲。因此，殖民地的婴儿也更健康。北美的严冬和边远地区较差的医疗技术等问题被充足的食物供给、燃料和房屋远远抵消了。并且由于人口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流行病在殖民地很少见。一旦过了婴儿期，殖民地的白人男子通常能活到60岁以上。但是，由于分娩的危险，早期殖民地的女性寿命通常只略高于40岁。①

种族概况

新大陆进口的所有奴隶的6%进入了后来成为美国的地区。如图2—1所示，移民是黑人人口增长的初始力量。但是到了18世纪，自然力量主导了黑人人口的增长。到18世纪中期，黑人的出生率和白人的一样，接近生物学上的最大值。

① 尽管也许不典型，Philip Graven，"Family Struc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Over，Massachusetts，"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April 1966）：234－256提供的证据显示那个地区的女人也可以活到60多岁。

黑人的死亡率也和北美白人的相似。由于两个种族的自然增长率相当——这导致了人口数量大约每 20～25 年便翻一番——而且因为进口黑奴的数量实际上等于白人移民的数量，总人口中黑人的比例在 1700 年后显著上升。我们从表 2—1 可看出，在 1680 年，总人口中只有 3%是黑人。一个世纪后，这一比例已上升到约 20%且黑人人口的数量接近 50 万。当然，区域间的差异很大，90%以上的黑奴都生活在南部地区。但正如图 2—2 所示，和加勒比群岛相比，大陆殖民地总人口中相对较小的比例是由黑人构成的。在新英格兰，黑人的比例大约为 2%；在中部殖民地为 5%。在殖民时代晚期的马里兰，黑人占总人口的 32%，在弗吉尼亚为 42%。由于港口不足，北卡罗来纳的商业发展受到了较多限制，这导致黑人人口比例只有 35%。相反，南卡罗来纳容纳了最集中的黑人——60%。南卡罗来纳特别高的黑人比重起因于奴隶劳动的特殊优势及生产大米和靛青的规模经济。因此，由高度集中的被奴役的黑人所表明的南卡罗来纳的社会概况与英属及法属西印度糖料群岛的概况相似。尽管弗吉尼亚的人口概况确实也接近这一比例，但是南卡罗来纳由少数的种植园主控制大多数的奴隶这种情况在大陆殖民地之间是独一无二的。与在加勒比地区的情况相反，黑人在北美大陆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族裔。

最后，美国土著人口的变化格局与白人及黑人形成鲜明对比。当詹姆斯敦刚建立时，有可能多达 30 万的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生活在大西洋海岸 150 英里以内。到 18 世纪中期，战争的影响，特别是如天花、麻疹等传染病（当地人对这些疾病没有产生免疫力）的破坏，将他们的人口减至 5 万～10 万。无论他们的出身如何，人口减少问题在北美大陆是独一无二的。这个主题将在经济透视 2.2 进行详细讨论。

图 2—1　1620—1860 年在外国出生的黑人占美国黑人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y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23. Copyright ©1974 by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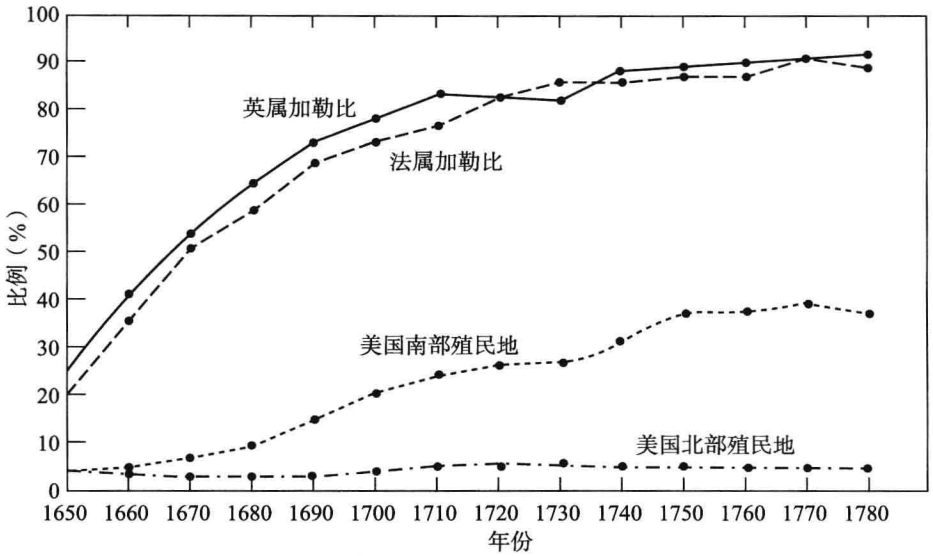


图 2—2　1650—1780 年黑人占总人口的比重

资料来源：*Time on the Cross*：*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y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23. Copyright © 1974 by Robert William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经济透视 2.2

☞

早期的欧美经济关系和人口变化

北美土著印第安人早期的人口数据比来自欧洲的新定居者及来自非洲的奴隶的人口数据更具推测性且较不准确。表 2—2 提供了目前最好的可获得的在欧洲人抵达美洲时美洲印第安人的总人口以及几个东北地区和部落的人口规模的估计。在北部地区，法国人在 17 世纪初建立了和休伦（Huron）及阿尔冈昆（Algonquian）部落的政治经济联盟。早期的荷兰人（大多是和法国人一样的皮货商），在 1620 年抵达美洲后不久也和美洲印第安人连接起来。在英国人 1644 年接管纽约后，他们也接管了由荷兰贸易商之前形成的与易洛魁人联盟（Iroquois Confederacy）的政治经济关系，该联盟是由卡尤加部落（Cayuga）、莫霍克部落（Mohawk）、奥奈达部落（Oneida）、奥内达加部落（Onondaga）、塞内卡部落（Seneca）以及后来加入的塔斯卡洛拉部落（the Tuscaroras）组成的“六部落联盟”。在东南部形成了类似的关系：法国—乔克托族联盟（French-Choctaw）以及英国—契卡索联盟（British-Chickasaw）。海狸毛皮是在东北部的这些关系中的关键经济要素，鹿皮则是在东南部的这些关系中的关键经济要素。印第安人专门从事狩猎和剥皮，而欧洲人则用布、火药以及制造品与他们批发交易。

表 2—2　　第一批欧洲人抵达北美时，不同区域或部落的人口估计量（人）

区域或部落（不包括未成年人）	人口估计量	来源
北美（不包括现在的墨西哥）	3 790 000	Denevan，Table 1
新英格兰	72 000～144 000	Cook（1976b），Snow（1980），Salisbury（1982）
莫霍克	13 700～17 000	Snow（1980）Virginia
阿尔冈昆	14 300～22 000	Feest（1973）
阿里卡拉	30 000	Holder（1970）
易洛魁	20 000～110 000	Trigger（1976），Englebrecht（1987），Clermont（1980）
休伦	23 000～30 000	Trigger（1985），Dickinson（1980）
米克马克	12 000～50 000	Snow（1980），Miller（1976，1982）

资料来源：对 William Denevan，ed. *The Native Population of the Americans in 1492*，2d，ed.（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92），xix-xx and xxviii；Table 1 as given in Barrington（1992，2）的总结。

这些早期的关系对第一批定居点很重要，而在休伦部落与莫霍克部落之间长期的敌对状态也增加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长期对抗的力量（Roback 1992，14－16）。

来自这些关系的经济收益很快被疾病（土著印第安人没有自然抵抗力的流行病）、暴力和混乱的影响所压倒。图 2—3 说明了美洲土著人口的消亡以及欧洲人和非洲人在北美人口上升的大概时间。在东南部地区，非土著人口在 1715 年之前成为多数（Wood，1989）。转换到非土著人口为多数很可能已经在东北部的英国殖民地上在相似的较早日期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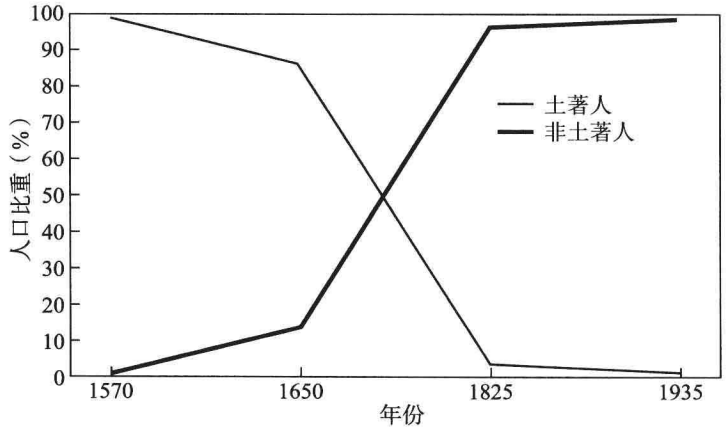


图 2—3　美国和加拿大的土著人与非土著人的人口比重

资料来源：Population data from Angel Rosenblot，*La Poblacion Indigena yel Mestizaje en America*（Buenos Aires：Nova，1954）1：21，37，59，88，as given in Barrington（199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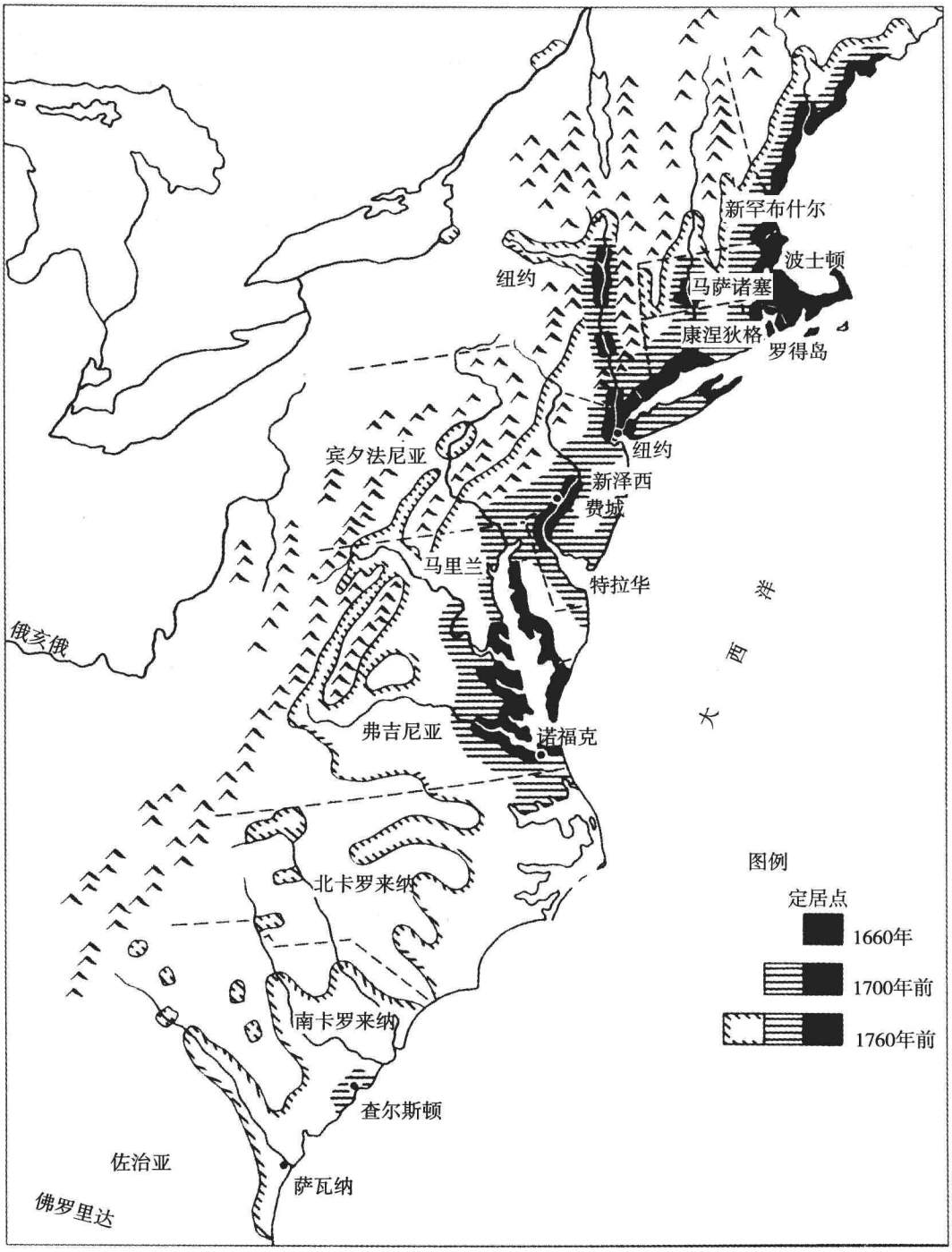
人口的空间分布

尽管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在詹姆斯敦建立之后稳步继续，但是大多数人口仍然集中在一些大西洋港口周边。获得对新大陆的坚固控制花了 50 年，在殖民历史的第一个世纪末，东部沿海地区的殖民还远未完成。到 1660 年，弗吉尼亚、马里兰和马萨诸塞都被建为英联邦，但是在佐治亚的第一批拓殖者用了将近 75 年仍没有完成殖民地的建设目标。在 1640 年，大约有 24 000 人定居在大陆的英属殖民地。到 1660 年有 65 000 个殖民者；到 1700 年有 26 万人。从 1710 年的大约 33 万人，殖民地人口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已增长至近 250 万人。

地图 2—3 展示了 1660 年、1700 年和 1760 年的殖民范围。在 1660 年前，诺福克南部没什么值得一提，在世纪之交，荒野仍然将查尔斯顿及其周边地区与北卡罗来纳北部的主要居住区分开。到 1760 年，对土地如饥似渴的富人和穷人几乎已经遍布所有的沿海平原并进入到皮德蒙特地区。早在 1726 年，德国人、苏格兰人及爱尔兰人就已经开始进入谢南多厄河谷，沿着这个河谷和其他大河谷，不断增加的拓殖者向西寻求廉价的土地。穿过群山的峡谷，一些人向东到达弗吉尼亚的皮德蒙特地区以及卡罗来纳；仅仅几年后，先驱者们就开始向西移动，特别是通过坎伯兰山口去往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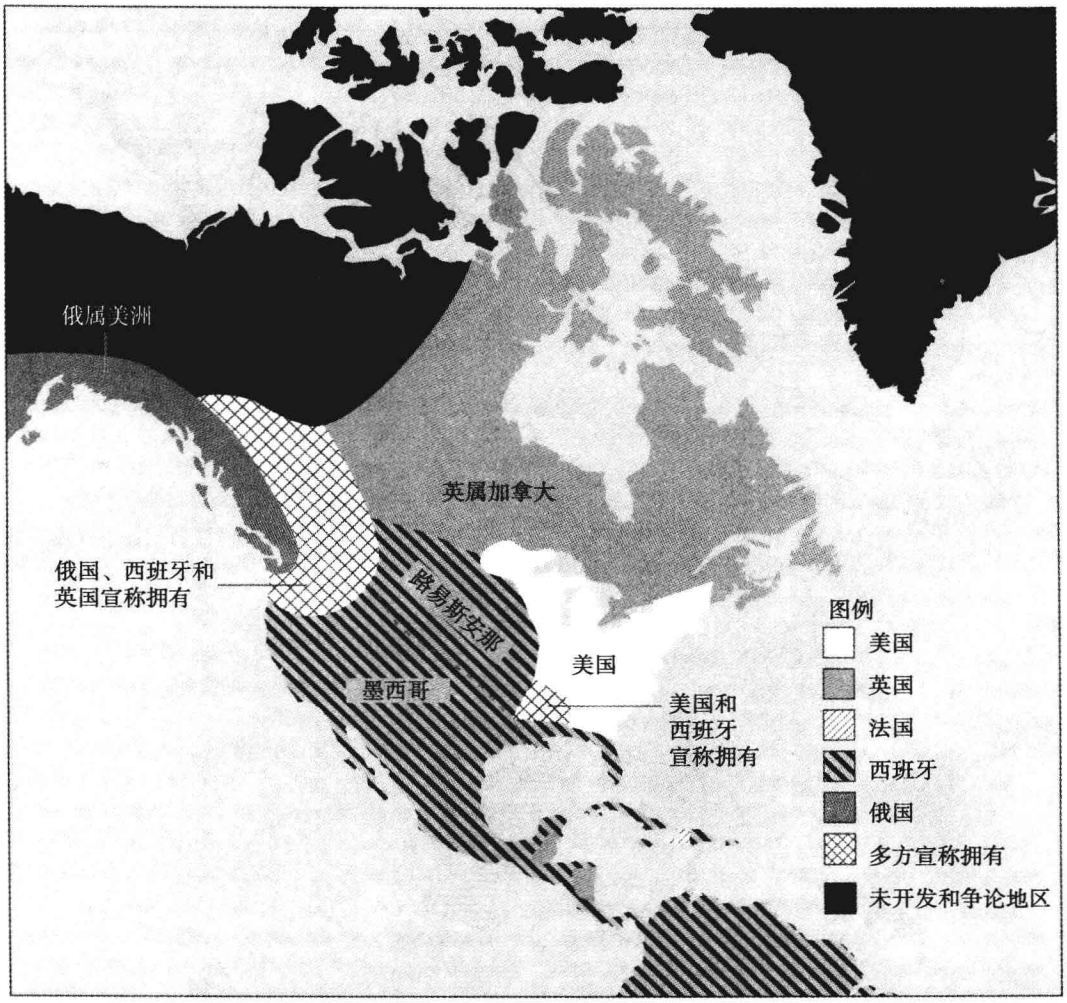
北美的帝国之争

帝国之间的竞争持续了很长时间，且人口的增长和新领土的殖民并不仅限于北美东海岸（见地图 2—4）。在 16 世纪，西班牙已经占领了北墨西哥和佛罗里达，而当英国殖民活动正在进行时，西班牙人正向北进入得克萨斯、南亚利桑那和南加利福尼亚。正如我们已经提到的，在 17 世纪，法国在小安的列斯群岛和加拿大建立了据点；法国的探险家和商人从加拿大推进到密西西比河谷，直到墨西哥湾。这三个敌对的国家注定要在美国发生冲突，即使它们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并不是敌人。我们必须将这些痛苦的对抗和由此产生的复杂的、即使是小规模的战争的描述留给通史学家。紧随法国和英国在东北部和大部分西部边疆沿线的间歇性冲突，法英北美殖民地争夺战导致法国在北美势力的暂时衰落。通过 1763 年的《巴黎条约》，只有西班牙和英国还控制着北美大陆。除了法国保留的在纽芬兰之外的一些捕鱼权和小岛，西班牙占领了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英格兰则获得了密西西比河以东的一切。据此条约，英格兰获得了佛罗里达的全部，从而解决了英国与西班牙困扰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殖民地的长久争端。我们很难记住是西班牙而不是法国，将最初的 13 个殖民地的开拓者驱逐到南部内陆。直到 1800 年，法国才重新获得了路易斯安那的领土和新奥尔良的重要港口，但这一控制并未持久。



地图 2—3　定居点的变迁

易于到达的沿海地区和河谷成为最早的殖民点，但是拓殖者很快就移向皮德蒙特地区、阿巴拉契亚山脉的大峡谷，以及颇让人心动的山区。



地图 2—4　宣称拥有的领地

在 18 世纪末欧洲国家在北美洲和中美洲实际拥有的和宣称拥有的领地。

两项制度安排特别有利于英国统治北美。第一项是契约奴劳动力市场的开放，这一制度为英国所用，但未被西班牙和法国采用。50 万名英国移民（1610—1775）中有 35 万人是被作为契约奴带来的。第二项是英国永久殖民地的建立，这促进了私有农场、家庭的成长，并最终产生了城镇。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两项制度，在北美的英国殖民者的数量到 1750 年超过了法国殖民者，约为 20∶1。受到广泛的经济机会鼓励的高水平的英国移民锻造了隐藏在英国法律、语言和习俗中的美国特征的开端。①

① 对新大陆不同地区发展的不同路径的进一步分析和比较请参见 Stanley L. Engerman, and Kenneth L. Sokoloff, "Factor Endowments, Institutions, and Differential Paths of Growth Among New World Economics: A View From Economic Historian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How Did Latin America Fall Behind?* ed. Stephen Haber (Palo Alto,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lston, Lee J., and Morton O. Shapiro. "Inheritance Laws Across the Coloni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8): 277 - 287.

Anderson, Terry, ed.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cs: The Political Economy Forum*.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2.

Anderson, Terry, and Robert P. Thomas. "White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Extensive Growth of the New England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634 - 667.

——.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and Labor Force in the 17th-Century Chesapeak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290 - 312.

Andrews, Charles M.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4.

Bancroft, Georg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rom the Discovery of the Continent*, 6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1879.

Barrington, Linda, 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Boulder: Westview, 1999.

Boorstin, Daniel.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58.

Bradford, William. *Of Plymouth Plantation*.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62.

Bruce, Philip A. *Economic History of Virginia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2 vols. New York: Macmillian, 1896.

Bruchey, Stuart.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An Essay in Social Causation*.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5.

Curtin, Philips.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Earle, Carville. *The Evolution of a Tidewater Settlement System: All Hallow's Parish, 1650—178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

Ekirch, A. Roger, *Bound for America: The Transportation of British Convicts to the Colonies, 1718—177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Fogel, Robert, and Stanley Engerman. Chapter 1 i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Franklin, Benjamin. "Observations Concerning the Increase of Mankind." Philadelphia, 1751. In *The Papers of Ben Franklin*, ed. Leonard Labere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Galenson, David W. "Immigration and the Colonial Labor System: An Analysis of the Length of Indentu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361 - 377.

——. "British Servants and the Colonial Indenture System in the Eighteenth Cen-

tury." *Journal of the Southern History* 44 (1978): 41 - 66.

——. "The Market Evalu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 Case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1981): 446 - 467.

——. *White Servitude in Colonial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entured Servitude in the Americas: An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 - 26.

——. "The Settlement and Growth of the Colonies: Population, Labor,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35 - 207.

Germery, Henry. "Emigration from the British Isles to the New World, 1630—1700."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5, ed. Paul Uselding. New York: Johnson, 1980, 179 - 232.

Grubb, Farley. "The End of European Immigrant Servitu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arket Collapse 1772—183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1994): 794 - 824.

——. "Colonial Labor Markets and the Length of Indenture: Further Eviden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4 (1987): 101 - 106.

Grubb, Farley, and Tony Stitt. "Immigrant Servant Labor: Their Occupational and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in the Late Eighteenth-Century Mid-Atlantic Econom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9 (1985): 249 - 275.

——. "The Incidence of Servitude in Trans-Atlantic Migration, 1771—180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2 (1985): 316 - 339.

——. "The Market for Indentured Immigrants: Evidence on the Efficiency of Forward-Labor Contracting in Philadelphia, 1745—177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855 - 868.

——. "Redemptioner Immigration to Pennsylvania: Evidence on Contract Choice and Profit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1986): 407 - 418.

——. "The Liverpool Emigrant Servant Trade and the Transition to Slave Labor in the Chesapeake, 1697—1707: Market Adjustments to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 (1994): 376 - 405.

Hanes, Christopher. "Turnover Cos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Slave Labor in Anglo-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 (1966): 307 - 329.

Heavener, Robert. "Indentured Servitude: The Philadelphia Market, 1771—177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701 - 713.

Higgs, Robert, and Louis Stettler. "Colonial New England Demography: A Sampling Approach."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7, no. 2 (1970): 282 - 294.

Hughes, Jonathan R. T. "William Penn and the Holy Experiment." Chapter 2 in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reprint).

Jones, E. L. "The European Background."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95 - 133.

Kulikoff, Allan. "A 'Prolifick' People: Black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Chesapeake Colonies, 1700—1790." *Southern Studies* (1977): 391 - 428.

Lemon, James. *The Best Poor Man's Country: A Geographical Study of Early Southeastern Pennsylvan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Menard, Russell. "From Servants to Slav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esapeake Labor System." *Southern Studies* (1977): 355 - 390.

Morgan, Edmund S. *The Puritan Family: Religion and Domestic Relations in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 "The First American Boom: Virginia 1618 to 163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8 (1971).

——. *American Slavery, American Freedom: The Ordeal of Colonial Virginia*. New York: Norton, 1975.

Morison, Samual E.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Morris, Richard. *Government and Labor in Early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6.

Nash, Gary. *Red, White, and Black: The Peoples of Early America*.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74.

North, Douglass C., and R. P. Thomas. *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erkins, Edwin J. Chapter 1 In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otter, Jim.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America, 1700—1860." In *Population in History: Essays in Historical Demography*, eds. D. V. Glass and B. E. C. Eaversley. Chicago: Aldine, 1960.

Powell, Summer C. *Puritan Village: The Formation of a New England Town*. Middletown, Conn.: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63.

Rink, Oliver. *Holland on the Hudson: An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New York*.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Roback, Jennifer. "Exchange Sovereignty, and Indian-Anglo Relations." In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Forum*, ed. Terry Anderso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1992.

Rosenberg, Nathan, and L. E. Birdzell, Jr. Chapter 3 in *How the West Grew Ric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Salisbury, Neal. "The History of Native Americans from Before the Arrival of the Europeans and Africans Until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 - 52.

Smith, Abbot E. *Colonists in Bondage: White Servitude and Convict Labor in America, 1607—1776.*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47.

Smith, Daniel S. "The Demographic History of Colonial New Engla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165 - 183.

——. "The Estimates of Early American Historical Demographers: Two Steps Forward, One Step Back, What Steps in the Future." *Historical Methods* (1979): 24 - 38.

Thomas, Robert P., and Richard Bean. "The Adoption of Slave Labor in British America." In *The Uncommon Market: Essay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eds. H. Genery and J. Hogendor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8.

Thornton, John K. "The African Background to American Colonization."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6, 53 - 94.

Ver Steeg, Clarence. *The Formative Years, 1607—1763.* New York: Hill & Wang, 1964.

Walton, 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Chapter 2 in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Weeden, William B.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New England, 1620—1789*, 2 vol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90.

Wells, Robert V. *The Population of the British Colonies in America before 1776: A Survey of Census Dat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Wood, Peter. "The Changing Population of the Colonial South: An Overview by Race and Region, 1685—1760." In *Powhatan's Mantle: Indians in the Colonial Southeast*, eds. Peter Wood, Gregory A. Waselkov, and Tomas M. Hartley.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89.

第 3 章　殖民地的经济活动

本章主题

在发现烟草等经济作物后，市场生产和贸易快速增长并赋予英属北美殖民地永久性的特征。在本章，我们将从区域和职业专门化的角度来呈现殖民地的经济活动。

这些专业化从根本上取决于生产的比较优势，并且各个殖民地之间的优势差异显著。但是，压倒性地，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决定了不同殖民地的发展道路和特定的经济活动。这种区域专业化基于土地（和自然资源）相对于资本和劳动来说很丰富的现实，这与英国和欧洲高得多的劳动力—土地比和资本—土地比形成强烈对比。殖民地专业化的出现，特别是因为市场交易而出现，也使这一年轻的经济能够增长并将自身融入英国皇家经济和世界经济中。

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劳动力稀缺

在整个殖民时期，大多数人靠土地谋生。从新罕布什尔到佐治亚，农业都是主要的职业，而那里的工商业活动几乎完全是围绕着从土地、森林和海洋获取的材料。在土壤和气候不适宜种植商业作物的地方则通常可能转向捕鱼和捕猎以及

生产船只、造船木材、沥青、焦油、树脂及其他森林产品。土地似乎广阔无垠，因此价钱不高，但几乎所有的殖民者都想成为地主。当我们回忆起对欧洲人来说土地所有权象征着财富和地位，这就不难理解了。对土地从未有过的渴望解释了为什么在美国历史的最早半个世纪中，许多可能已经是成功的工匠或受雇于他人的劳动力往往转而从事农业，从而加重了在新大陆的劳动力的持续短缺。具有高超技术的工人的短缺是最引人注目的，因为欧洲大量需求的工匠和训练有素的技工太满足于待在国内，即使工资大幅提高，也不会被诱惑到文明边沿的新大陆受苦。但是所有种类的劳动力一般都是稀缺的，因为在早期的边疆危险被克服后，高的土地—劳动力比率可以保证独立农民具有相当舒服的物质生活水准（但也有一些例外，正如经济透视 3.1 所示）。

资本稀缺

生产用的有形资本的总供给是有限的，特别是在殖民的第一个世纪。可利用简单工具从自然资源中获取的特定形式的资本品显然是丰富的。例如，有如此多的木材可用，所以建造房屋、谷仓和工场是相当容易的。马车和货车基本上是用木头做的，农具、车轮、齿轮和轴也是。造船厂和船舶用品都是用木材构建，而且很早就开始大量造船。

此外，金属制成品尤其稀缺，工厂和其他工业设施仍少而小。直到殖民时期末，道路和港口的改进仍远远落后于欧洲的标准。资本形成是殖民者的一个主要挑战，殖民地需要的资本总是比它们所能获得的多得多。英国政治领袖们出台法律，阻碍工具和机器从英国出口。商业银行并不存在，而有储蓄可用于投资的英国人或殖民者更喜欢更安全的英国公司。尽管如此，正像我们将在第 5 章中所看到的，18 世纪的发展中的美洲殖民地的居民过着比大多数其他地方的人更好的生活，甚至好于那些生活在当时最发达的国家的人。

农业的主导地位

在 18 世纪末，大约 90%（现在约为 3%）的美国人的大部分生活来源是务农。一般而言，土地及其他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高比率在殖民地产生了非常高的人均产出水平。新大陆的大多数产品供殖民者自己消费，但是也有相当比重的殖民地产品和服务是为商业交换而生产的。适时地，每个区域都在特定的产品和服务的生产上变得不断专业化。专业化区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土壤类型、气候和森林及海洋的天然物产。

南部殖民地

从总产值方面来看，南部的农业在整个殖民时期以及19世纪都占主导。南部的殖民地提供了肥沃的新土地能提供比较优势的一个好例子。几乎在一开始，南部的殖民者就种植烟草，它所产出的烟草比世界上绝大多数其他地方的烟草都要价廉物美。后来，南部开始生产另外两种主要产品：大米和靛青（原产于印度的蓝色染料）。近两个世纪，南部经济都围绕着这几种主要的出口产品，这是因为该区域的土壤和气候得天独厚，使其能够种植人口众多的欧洲工业化地区需求量很大的作物。[①]

经济透视 3.1

佐治亚的社会工程和经济约束

1732年，在北美建立最后一个英国殖民地的计划正在制定中。佐治亚的殖民化提供了一个生动例子，来展示良好意愿与经济机会和约束的经济现实相冲突。在这里，我们将再次注意到相对于大量土地（和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投入）相对稀缺性的影响，并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

与宾夕法尼亚和马萨诸塞一样，建立佐治亚是为了帮助那些在旧大陆中一直被麻烦困扰的人。詹姆斯·爱德华·奥格尔索普（James Edward Oglethorpe）将军说服了托马斯·布雷博士（一个以优秀作品闻名的英国圣公会牧师）尝试建立一个项目以解脱那些会因欠债而被判监禁的人。这是18世纪英国特殊的被呼吁给予纠正的罪，因为除了通过有组织的慈善机构，债务人可能在监狱里度过多年都没有希望获释。只要个人被监禁，他们就不能挣钱偿还债务，即使他们最终被释放了，多年的监禁也使他们身体不佳无法工作。奥格尔索普的想法就是鼓励债务人去美洲，在那儿他们可能成为负责任的（甚至富裕的）公民。

他们除了希望帮助英国的“城市坏蛋”（urban wretches）之外，布雷、奥格尔索普以及其同伴有另一个主要动机，那就是确保繁荣的北部英属殖民地和西属佛罗里达之间的军事缓冲区的安全。除了他们在道德上厌恶奴隶制外，他们相信为了安全应使得该地区全为白人人口。奴隶在战斗中能否靠得住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只要有奴隶制，叛乱总是有可能的。因此，奴隶制作为制度在佐治亚是被禁止的——最初。

在1732年，国王乔治二世很乐意地将萨凡纳河（Savannah River）和奥尔

① 当然也有失败。例如，美国人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以促进酒的生产（当时酒主要从法国和西班牙进口），但是美国人生产的酒质量太差以至于试图与已建成的酒产地竞争而进行的认真尝试都被放弃了。类似的，当时美国人也希望能批量生产丝绸和棕榈并且为丝绸及棕榈产品提供了补贴和奖金，但是，产品质量太差，且高工资还导致了成本很高的产品。

塔马霍河（Altamaha River）之间的土地授予布雷博士和他的伙伴；最初的土地包括的范围要大大小于现在的佐治亚州的面积。根据皇室宪章，一个将由一群受托人管理的公司得以建立；21 年后，这块领地要恢复成英国直辖殖民地。由私人和公共基金提供资金，这次投资有了个良好的开端。奥格尔索普亲自带领由几百名移民者（大多数是债务人）组成的第一支队伍来到了这个新国家，在那里一个 50 英亩的农场等待着每个殖民者。与家人一起来的自由移居者可得到更大的农场，并在大陆和英伦三岛都做出了坚定的努力来保护殖民者。

很不幸，受托人的理想和希望与经济现实和佐治亚采用的制度发生冲突。尽管“佐治亚实验”作为慈善事业取得了一定成功，但它的经济发展在几十年内都是令人失望的。在沿海低地乡村（这里有肥沃的土地）的气候是不利于健康的且比更北的地方产生了更高的死亡率。正如拉尔夫·格雷和贝蒂·伍德的研究所表明的，没有奴隶制是不能将在南卡罗来纳如此有利可图的靛青和水稻种植园引入佐治亚的，而且给予慈善移民的 50 英亩土地太小以至于不能获得规模经济和商业生产所需的竞争效率。

由于没有持续补贴就不能吸引足够数量的白人来确保军事缓冲地区的安全，而且考虑到奴隶经营的种植园企业有吸引力的潜在利润，受托人最终屈服于经济力量。或者说，在无奴隶小农场的制度结构下，资源的机会成本（经济推理命题 2）太高了以至于不能在没有持续补贴的情况下吸引劳动力和资本。到 18 世纪中期，奴隶制被合法化，奴隶开始涌进佐治亚；佐治亚在 1751 年转为英国直辖殖民地。到 1770 年，那里 45%的人口是黑人。

这样的社会—经济工程的具体例子揭示了一个更普遍的真相。和英国及欧洲大陆的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相比，在整个殖民时期，殖民地生产的最鲜明的特点是土地和自然资源丰富，而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相对于土地和自然资源并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投入比例相比则极度稀缺。生产要素之间的这种关系解释了殖民地区域发展的许多制度安排和模式。

烟　草

弗吉尼亚在詹姆斯敦的殖民地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向英国出口烟草。这种烟草已被欧洲所知一个多世纪；参与探险的第一批航海的水手已经带回了一些烟草样品和土著人使用的方法说明。尽管有基于道德上的许多反对，抽烟在 16 世纪日益流行；因此，尽管国王詹姆士一世认为它“如此恶劣，腐化习俗”，对英国人来说能找到烟草的供应来源仍是个宽慰，这样就不必从西班牙进口烟草了。烟草需要漫长的生长季节和肥沃的土壤。此外，烟草能在小块区域上种植，土地只需部分被清除干净，且只需最基本的生产工具。所有这些很适合原始的弗吉尼亚社会。但在殖民地的烟草生产有两个额外的好处：当持续的种植消耗了某块地的原始肥力之后，新的土地很容易得到；船只可以顺着弗吉尼亚沿岸的河流在种植园码头装载货物。而一个在 17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持续的挑战是殖民者在正确保存、处理和装运烟草方面还有很多要学习，而且在很多年里，美洲生产的烟草都要劣于西班牙生产的烟草。不过，殖民地的烟草在英国市场上得到了保护，并且它价

格低廉的事实使得它在烟草贸易中的份额稳步上升。烟草栽培向北传播至切萨皮克湾附近并沿着很多河谷传播。到17世纪末，在北卡罗来纳已生产一些烟草。

高产的美洲烟草区域使英国和欧洲市场上的烟草供应增大，并且直到17世纪最后的25年，烟草的价格都在急速下降（这将在第5章详细讨论）。到18世纪之交，很明显在殖民地的烟草生产竞争中取胜的将是大种植园，而且如果小种植园主想要成功，他们将不得不也生产高品质的烟草或者粮食和其他作物。我们从戴维·克林格曼的研究可知，在18世纪，切萨皮克周围的大量地区（尤其是马里兰）已转而生产小麦了。

由于奴隶分组工作并能被监督和驱使，较大的生产单位受烟草种植青睐。为达到最佳的效果，一个种植园主必须拥有足够的奴隶以确保种植园管理者的合算使用。监督成本并不按使用的奴隶数量成比例增加，因此，单位成本随着种植园规模的扩大而下降（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一个少于10个奴隶的种植园可能会偶尔取得繁荣，但只有较大的种植园才能获得高于成本的可观收入，只要它们被正确管理并获得了足够的土地面积以避免土壤耗竭。因此，有钱人或那些能从英格兰和苏格兰商人那里获得足够信贷的人才能达到更有效的烟草生产规模，并且通过这样做他们变得更加富有且进一步改善了他们的资信状况。但是，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奴隶只被最大的种植园持有；今天可获得的原始数据表明，在革命之前及之后的时代，大量的种植园主拥有不到10个奴隶。尽管如此，为降低单位成本，在南部殖民地上有持续的压力去发展大型农场。

水　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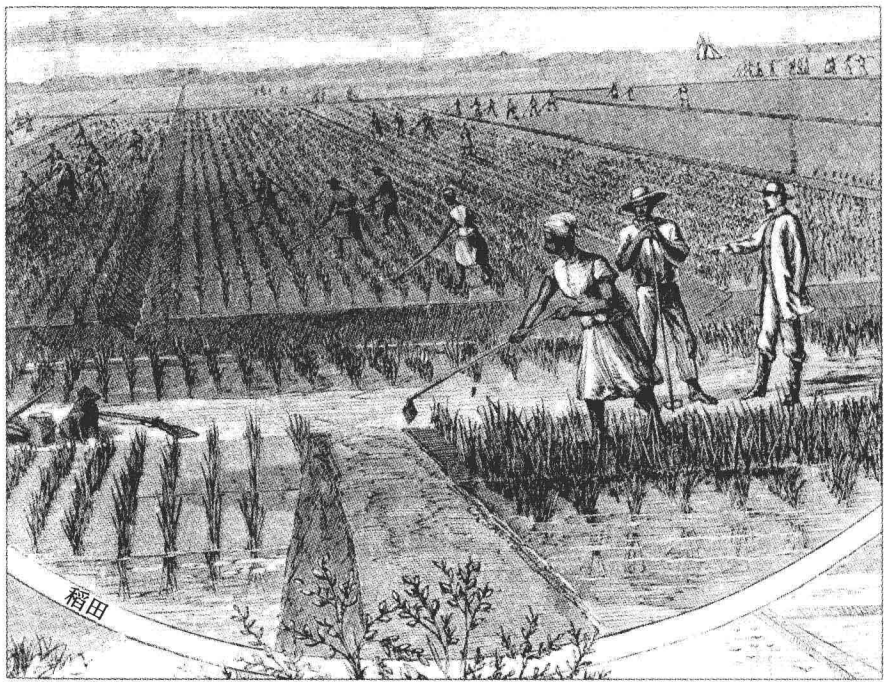
在1695年前后，南部殖民地引入了第二大作物。早期的弗吉尼亚殖民者已试验了水稻种植，南卡罗来纳则在拓殖后的两年内就已经尝试种植水稻，但是直到谷物新品种引进后才获得成功。[①] 到18世纪早期，尽管灌溉问题依然存在，水稻已经是查尔斯顿附近区域的常见生长作物。

没有间歇性的灌溉和排水也可能种植水稻，但是谷物的品质会变糟。水稻最早被种植在由来自河流的季节性洪水灌溉的内陆沼泽中，但洪水取决于不确定的溪流。此外，这种种植方法不能应用于极为平坦的沿着海岸本身的土地。不久，一种新的使生产者能够利用潮汐流的动力的灌溉系统被设计出来。原本是荷兰特产的水控制技术在英格兰（用于给沼泽排水）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这种技术也被传播到了美国。堤沿着河流下游建成，随着潮汐推回淡水，它通过闸门进入穿过田地的灌溉水渠。

由于过多的洪水对作物会造成一定危害，因而便需要建筑排水系统，而适当的排水则要求精心的工程设计。但是资本的大量投入是值得的，因为合适的工程设计可以允许潮汐驱动的两大洪水发生在正好正确的时间且水能够被准确地排出。这样的固定成本也增加了稻米生产的规模经济的前景，同时需要大量劳动力来修建堤坝以及种植和收割。

---

① Lewis C. Gary,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Vol. I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3), 278.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种植水稻需要高级的工程技术以及更多的奴隶，但是对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来说，在殖民时期，水稻仍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作物。

为实现这些目标，在 18 世纪进口了大量奴隶。工作奴隶的任务体制（task system，即给每个奴隶一小块土地供其耕种的体制）得以利用。这种工作是使人筋疲力尽的，和在加勒比的甘蔗种植园使用的团队体制类似，并且是在很热且蚊子出没的沼泽地区工作。尽管当代观点认为非洲人能够比欧洲人更好地抵御疾病和体力透支的影响，但这个区域的黑人死亡率很高。最近的研究提供了证实当代观点的证据。在北部的大陆殖民地，黑人的死亡率非常高，而在遥远的南部和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白人的死亡率非常高。菲利普·科埃略和鲍勃·麦圭尔解释说，这些种族方面的差异来自于接触到他们没有或之前没有地理条件接触的病原体。热带疾病对欧洲人来说影响特别严重，对非洲人则没那么严重。[①] 尽管存在生产困难，大米产量稳步增加，直到殖民时期结束，而水稻的栽培最终从萨瓦纳以南扩展到北卡罗来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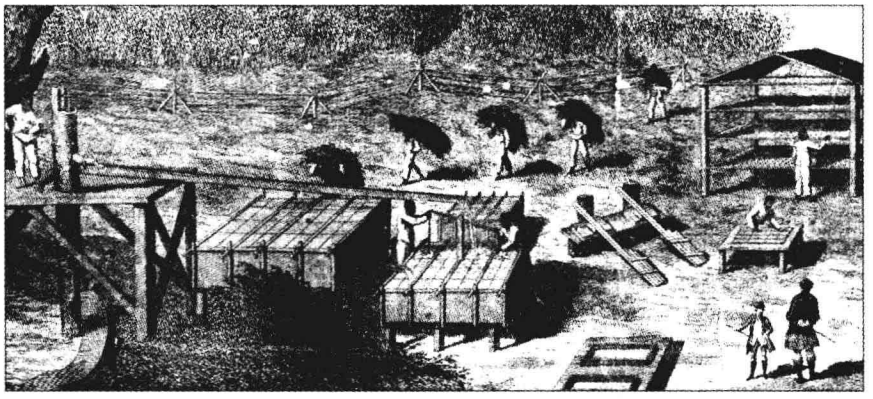
靛　青

水稻利润的增加来自另一种作物——靛青，如此命名是因为它是原产于印度的一种植物。植物靛青是在 1743 年由伊莱扎·卢卡斯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居住在查尔斯顿附近的一个种植园的年轻女性成功引进的。没有特别的帮助，植物

① Philip R. Coelho and Robert A. McGuire, "African and European Bound Labor in the British New World: Th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Cho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97): 83 - 115.

靛青几乎肯定不可能生长在殖民地，因为植物靛青的栽培要求苛刻并且深蓝染料的制作需要特殊的技能。但作为水稻的补充，靛青是理想的作物，因为这种植物可种植在水稻无法生长的高地上，而且因为加工靛青的工作量最多时正好是一年中奴隶不需要在水稻田里忙碌的时节。靛青的生产受 1 磅给予 6 便士补贴的英国政策鼓励，大大增加了种植园主的利润，从而吸引资源到该地区。

在强调烟草、水稻和靛青的重要性时，我们有忽视南部殖民地其他商品生产的危险。卡罗来纳出口鹿皮和松脂，而大量的铁也从切萨皮克区域运出。在整个南部，大量出产干草、动物制品、印第安玉米、小麦和其他谷物。这些产品和很多水果蔬菜一样，大多是为了让农业单位尽可能地自给自足。而高地的农民，尤其在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饲养牲畜供商业性销售以及出口生鲜或熏制的肉食，大批运往其他殖民地。在所有的殖民地，为家庭消费生产食物是主要的经济活动。



COURTESY OF THE CHARLESTON LIBRARY SOCIETY, CHARLESTON, SOUTH CAROLINA

殖民地的农业高度依赖于类似靛青这样的经济作物——这里展示的是靛青从采摘到最后干燥的过程，而水稻的种植则在前面图片的种植园背景中展示过了。

中部殖民地

总的来说，在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和哈得孙河之间的土地是肥沃的并随时可耕种，因此在谷物和其他食品生产上享有比较优势。随着 17 世纪的过去，那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农业经营。往西，在西部边疆，连续几代继续遇到困扰第一批殖民者的困难。森林中的树木——经常存在的障碍——必须被砍伐，通常在它们被围起来并允许砍伐之后。被砍伐的树木被烧毁且它们的树桩被移除，从而能使用马拉犁。种地的工具和中世纪欧洲人的工具相差无几。生计必须从土地上获取。同时，一个稳定的和相当发达的农业开始发展到东部边疆。从与该区域土壤类似的地方带来了技术和耕作方法的在纽约的荷兰人和在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是第一批被鼓励在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这些小型发展中城市进行销售与耕作的人。渐渐地，一个商业性农业发展起来了。

小麦成为了重要的主要产品，而且尽管玉米、黑麦、燕麦和大麦的产量也很大，但该区域的经济是以大量的面包谷物为基础的。在17世纪后期，小麦及制成的面粉的充足产量允许这些产品向外出口，特别是出口到西印度群岛。

中部殖民地发展的这种农业单位后来成了美国中西部大食物带的典型。种植面积大大小于南部的一般种植园的私人农场由农民和他的家庭经营，很少雇用帮手。蓄奴是罕见的（除了沿着纽约的哈得孙河和罗得岛的周边地区），因为小麦生产只有在种植和收获季节是劳动力密集型的，而且因为在小麦、玉米或广义农业中没有像南部种植园主要作物特别是水稻那种明显的规模经济。雇用一个契约奴作为帮手通常是可取的；最初的支出并不大，而即使是一个年轻且无经验的契约奴的生产力也很快就足以归还雇主的投资。北部较短的生产季节也降低了奴隶劳动力在田地里的经济收益。最后，正如科埃略和麦圭尔所示，相对于白人，北部的气候对黑人有负面的生物影响效果。

新英格兰

尽管新英格兰的农业对该地区的人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它只构成了供销售的商业产出的相对不重要的一部分。贫瘠的土壤、崎岖的地形和凛冽的气候导致了有限的商业性耕作。当地典型的农场强调自给农业，仅生产维持家庭生活必需的农作物。由于它几乎可在任何地方种植而且即使在贫瘠的土地上其产量也令人满意，印第安玉米是当地的主要农作物。小麦和其他谷物，以及其他耐寒的蔬菜一起，都是为了家庭食用而种植的。部分原因是由于气候，部分原因是出于天然屏障提供的远离野生肉食动物的保护，纳拉甘西特地区（Narragansett region），包括沿着其海岸线的大岛，成了牛羊饲养中心。但到革命前夕，新英格兰仍然是粮食和纤维的净进口地。它的命运依赖于另一种经济努力，而且从很早开始，许多新英格兰人就将耕种和其他工作结合起来，因此比仅局限于他们的农场资源过着更好的生活。在所有的殖民地，尤其是在新英格兰，所有种类的家庭工艺是农村生活的共同特征。航运业和渔业也是该地区的主要经济活动。

天然产业

尽管大多数的殖民地美国人依靠农业为生，很多人却间接地从土地上获得生计，我们称之为天然产业。人们可以从森林中获得皮草、野生动物皮、木材和松脂，从沿海水域获得鱼和奇怪的哺乳动物——鲸鱼，从土里获得矿产，尽管在早期殖民时代只有少量这些产品。围绕这些产品建立的各种行业的产值仅次于农业。

皮草、森林和矿石

到殖民晚期时，最初的 13 个殖民地已成为皮草的第二大来源，这是因为最好的皮毛沿着海岸被快速加工，并且最有利可图的渔获物早在边疆推到内地之前就完成了。[①] 法国人，而非英国人，以他们和美洲印第安人（他们完成了大多数的诱捕）强大的贸易联系成了北美主要的毛皮商（参见视角 3.1）。然而，农民将猎取的皮草作为获取现金的副业，尽管他们抓到的主要是麝鼠、浣熊，这些动物的皮毛和如今一样，在当时并不太理想。

森林本身比它的栖息者是更具有经济意义的开发对象。殖民者生活在木器时代。与其说是矿产及金属，不如说木材才是主要的燃料和基本的建筑材料。农业人口几乎无一例外地从事某种形式的伐木工作。先驱们必须伐木以廓清土地，然后使用木材来建造房屋、谷仓、家具，有时还搭建篱笆。他们经常燃烧木材并分散灰烬，但是一些有进取心的农民最终发现他们可以使用简单的设备来制造碳酸钾和高度精炼的珍珠灰。这些化学品为制造玻璃、肥皂等产品所需，且为所有殖民地的许多家庭提供了现金收入。

人们还可以从森林里获得船舶和船舶修理所需的木材和松脂制品。白松作为帆船的桅杆和甲板的建筑材料是无与伦比的，白橡和红橡是建造船肋部的高品质材料。在殖民地大量生长的松树提供了装备松脂制品的原材料：沥青、焦油和树脂。在木质帆船时期，松脂制品在造船厂是必不可少的，大多用于保护船舶表面和填塞缝隙使船不渗水。这些材料在当地和英国的造船行业都有大量需求。生产松脂需要相当多的熟练劳动力，只有在奴隶经过专门训练以执行必要任务的北卡罗来纳，生产这些材料才能在没有英国补贴的情况下获利。

视角 3.1

☞

美洲印第安猎人和海狸的枯竭

北美洲部落之间的领土狩猎权（财产权）的早期形式维持着猎物的存量，这是因为猎人（尤其是森林地区的猎人）有限制他们猎取的激励（经济推理命题 3：激励很重要）。在森林地区，猎物通常留在一个固定区域，所以部落或群体之间就建立了规则，将捕猎区域划分给特定的部落或群体。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比如饥荒、大火等等，来自另一个部落的猎人才被允许进入其他部落的领域。英国人在 17 世纪早期建立的哈得孙湾公司为满足英国和欧洲市场对海狸皮毛的需求，鼓励印第安猎人去猎取更多的海狸皮毛。法国人和哈得孙湾公司一起，争相为皮毛以及用来交换皮毛的斧子、布和其他制成品定价。

① Carl Bridenbaugh,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43, 191.

当法国人进入市场与英国人竞争时，皮毛价格上升，这导致对海狸更加密集的捕杀。图 3—1 和图 3—2 展示了在两个主要的英国贸易站，1700—1763 年的价格指数以及区域海狸数量的估计。仅仅是更加激烈的竞争并不会使海狸灭迹，尽管其数量在减少，但是仍然维持在自我维持水平以上。

最高的可持续产量（图中水平的 Pmsy 线）表明与森林栖息地能够维持海狸头数相一致的可被捕获的数量。如图 3—1 和图 3—2 所示，在 18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刚好与可持续的海狸头数相一致的这个最大产量一直被维持着。但是在 18 世纪 40 年代，欧洲对皮毛的需求增加以及价格上升，加上法国贸易站和英国哈得孙湾公司的边境贸易站点之间更激烈的竞争，一起使海狸灭绝。更高的价格鼓励过度捕猎（经济推理命题 3），而且由于不断增加的部落迁徙和混乱，美洲印第安人群体已经不能产生以社区为基础的或封闭使用的产权制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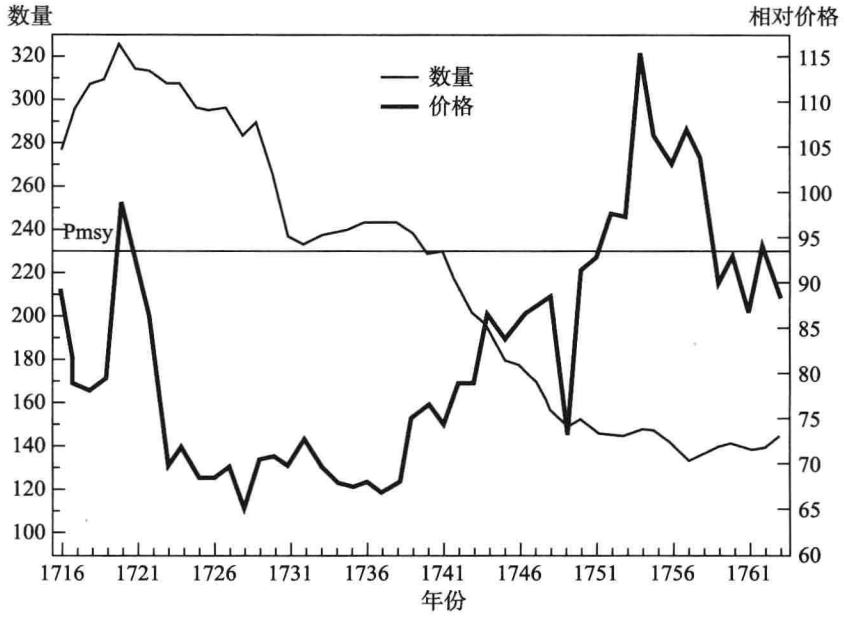


图 3—1　1716—1763 年皮毛价格和估计的海狸数量：York Factory

资料来源：Carlos and Lewis，1999.

公地悲剧与它所有的消极后果一起出现。在缺少适当的财产权的情况下，日益激烈的竞争失灵（经济推理命题 4：制度很重要）。到殖民时代晚期，殖民地只剩下很少的海狸了，即使是在最远的西部，海狸也正在濒临灭绝。

（如需更多的分析，请参见 Carlos and Lewis，1999。）

殖民者唯一能大量获得的矿产是铁。尽管到了革命时期，熔炉尺寸已经大了很多，但是殖民地炼铁工业采用的工艺和中世纪晚期发展的工艺相差无几。在 17 世纪，铁的主要来源是沼铁矿，这是取自池沼的一种沉淀物。将这种沉淀物加入木炭一起放在炼铁炉或者锻炉中，直到木炭吸收了矿石中的氧，一种白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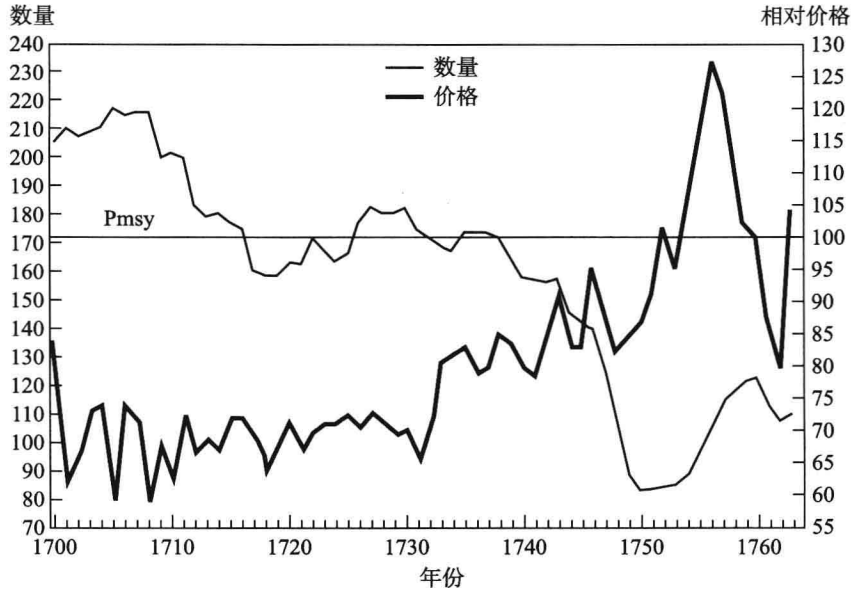


图 3—2　1700—1763 年皮毛价格和估计的海狸数量：Fort Albany

资料来源：Carlos and Lewis，1999.

海绵金属产生了。炽热的铁球从锻炉移开后就在白热的状态下锤打以去除矿渣并留下一块很大的熟铁。

当人口往内地迁徙时发现了丰富的岩矿石，并在 18 世纪，大量炼铁炉为了还原这些矿石而建，生铁因而能得以大量生产。含矿岩、木炭、牡蛎壳和石灰石的混合物被置于方形或圆形炉中，然后点燃。在来自下方由水能推动的空气作用下，铁矿石被还原成海绵状金属，当它落在炼铁炉底部时会将自身和大量的碳铸成合金，从而成为我们所说的“铸铁”。被倒入模具中后，产生的金属要么被再熔并最终铸造成形，要么在工厂或铁匠铺进一步精炼和再加工。对这些基本过程的讨论为我们理解美国钢铁行业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背景。

不足为奇的是，因为所需的程序很简单而且木炭充足，殖民地的炼铁业能够在条形铁和生铁的销售方面与英伦三岛竞争。人们已经对以下观点达成共识：革命前殖民地的炼铁炉和锻炉的数量可能超过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量总和，那时殖民地锻造和铸造铁的年产量大约为 3 万吨，或者说是世界产量的 1/7，但殖民地仍然是很大的铁制成品净进口方。

海产品

尽管主要限于北部殖民地，渔业和捕鲸业在整个早期殖民地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大海为新英格兰地区的人提供了有现成市场的商品，而且那里也有很多极好的港口可以停泊小渔船以及造船所需的大量木材，但是最重要的是存在着

相当大的鳕鱼市场。大而肥且难以保存的鳕鱼在当地被消费。最好的鳕鱼则出口到信奉天主教的欧洲；级别较低的鳕鱼则被发往西印度群岛给奴隶吃。格洛斯特、塞勒姆、波士顿和马布尔黑德是大型捕鱼船队的主要栖息港口。

在殖民时代，鲸油被认为是极珍贵的，它可作为光源和润滑油，龙涎香可作为香料的基础，鲸骨可作为支撑物的材料。因此，尽管规模很小，捕鲸业仍是一个有利可图且充满活力的行业。在 1700 年之前，捕鲸者在新英格兰海岸附近作业，但他们的捕获量很小。然而，在 18 世纪，捕鲸范围变广变远，而且到 1775 年，300 多艘大大小小的船从马萨诸塞的港口驶出，其中的楠塔基特就是一个很大的捕鲸中心。

制造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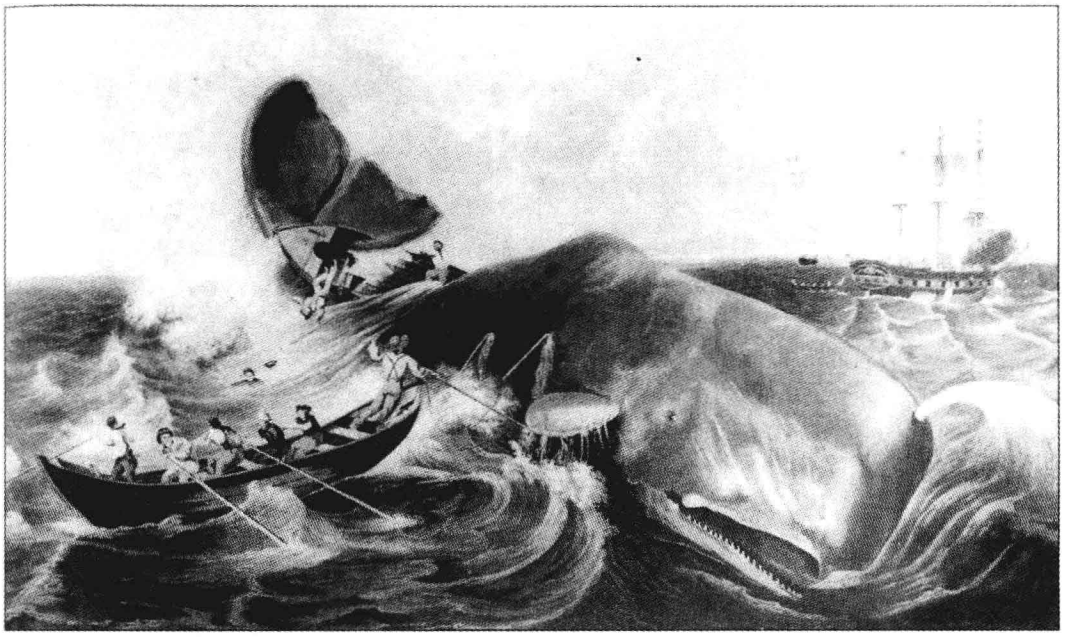
殖民地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以及稀少且分散的人口阻碍了制造业的发展。不过，多为自我效能和市场外的家庭生产很普遍，而且殖民地的手工工场、工厂也是值得一提的。

家庭生产和手工工场

殖民地的家庭首先关心的是食物和衣物的生产，而且殖民地的大多数家庭必须自己生产这些必需品。农场种植的小麦、黑麦或印第安玉米在当地的磨坊磨成面粉，但是家庭中的妇女每周供应的面包和硬面饼极为丰富。做果冻和果酱时会加入殖民者从蜂蜜、糖浆和枫糖中提取的增甜剂，从而能在不密封的坛子里无限期地保存它们。家庭中的男人很少是绝对戒酒者，契约奴所签订的合同也显示契约奴的食品开支的几乎三分之一都是酒精饮料。啤酒、朗姆酒和威士忌是最容易酿造的，但是葡萄酒、蜂蜜酒和一些品种的白兰地和甘露酒则是一些家庭的特产。

制作衣服——从准备粗纤维到缝制成衣——让妇女和小孩一直忙得不可开交。如袜子、手套和毛衣等是主要的自制衣物。亚麻毛织品（由亚麻和羊毛制成）和牛仔制品（羊毛和棉花的结合物）是北部和早期西部的标准纺织品。同样不易破坏且穿着更舒适的是粗斜条棉布，它是一种主要在南部使用的棉花和亚麻的混合物。妇孺衣料和精美套装得从英格兰进口，而且即使是城里人，购买这类奢侈品通常也是难得的和令人兴奋的。

有特殊才能的早期美国人会制造从钉子、厨具到精美的壁橱等所有东西。每个地方的家庭中的男人都参与他们自己房屋的建造，尽管精细的木匠活和必要的石匠活需要通过技术工人来完成。这些能力不同的技术工人在城市和乡村的十字路口都可以找到。即使是在相当早的时期，城市中心就展出了种类繁多的技能。比如，在 1697 年，除了建筑行业，还有 51 个制造业手工艺品在费城展示。



© THE NEW BEDFORD WHALING MUSEUM

在美国的早期，捕鲸是一个危险但高利润的行业，而且是新英格兰航海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贝德福德——阿哈布船长开始捕鲸之旅的地方——和南图克特是新英格兰主要的捕鲸中心。

但是，在美洲殖民地上的专业手艺人和家庭工人的差别并不总是很明显。南部种植园上熟练的奴隶可能将他们所有的时间投入生产；这使他们成为工匠，即使他们的产出被认为是家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在村子之间移动出售价格合理的专家服务的巡回万事通，在欧洲人看来当然不是工匠。由于熟练劳动力稀缺，个体劳动者履行的职能往往比他们在本国进行的更多样化；举例来说，一个殖民地的制革工人可能同时也是一个鞣皮工人（皮革准备者）和一个鞋匠。而且，由于本地市场小以及随之而来的几乎所有类型的生产的地理扩散，很少有从事相同行业的工人在任何特定的地点联合起来。

由于这一原因，很少成立由具有相同技术的工匠所组成的行会和联盟。但是作为例外，我们注意到早在 1648 年，波士顿大量的鞋匠努力促使最高法院将他们合并成一个行会，而且到了 1718 年，费城的裁缝和鞋匠群体也发展壮大，继而申请合并。①

磨坊和工场

对殖民者来说，磨坊是碾磨谷物、采伐木材或者锻铁的装置。直到 18 世纪

① Jacob Price, "A Note on the Value of Colonial Exports of Shipp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704 - 724.

© E. B. GRUNZWEIG/PHOTO RESEARCHERS

作为制作家制衣服初始工具的纺车在殖民时期的美国家庭中是一个普通的工具。

中期前后，大多数磨坊仍是十分简陋的装备，靠大西洋沿岸中部和北部的小溪提供的水能运转。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采用的是原始的机械装置。锯木机和磨粉机的曲柄几乎总是铁制的，但是水车轮本身及其嵌齿却是木制的（最好是山胡桃木）。在这个时期，殖民者对能量转换的理解很少，以至于每件机械都要建一个单独提供动力的水轮。在革命前不久，能量在碾磨过程中的运用得到改进，而且特拉华河及切萨皮克湾沿岸的磨坊可能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在 1770 年，一个一般规模的磨粉厂每天能碾碎 100 蒲式耳的谷物，如果配上几对石头，每年可以将 75 000 蒲式耳的小麦磨成面粉。

我们只是提一下磨坊业的不同类型。有树皮碾碎机的制革厂在北部和南部都有发现。在宾夕法尼亚很普遍且在新英格兰也很寻常的造纸企业被称为“磨坊”，因为需要机器将亚麻碎布磨成纸浆。纺织品是重要的家庭产品，但是在马萨诸塞、东部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很多磨坊是为了进行更为复杂的编织和制造工序而建立的。新英格兰的朗姆酒酿造厂为国外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种主要产品，而且

各地的酿酒厂满足了宴饮的需求。

造船业

尽管大型生产不是殖民地经济活动的特征，但造船业却是个重要的例外。早在1631年，仅仅在朝圣者登陆普利茅斯十年之后，一艘30吨的单桅帆船在波士顿建成。

在17世纪期间，新英格兰海岸沿线兴起了很多造船厂，其中波士顿及纽波特一路领先。纽约是个强大的竞争者，直到1651年《航海条例》（Navigation Act of 1651，参见第4章）给以荷兰为主的造船业以重创，但在1720年之后，纽约的造船业又迅速发展起来。此时，费城的特拉华河沿岸为拥有数十家大型船厂而自豪，而在主要的五个城镇中，只有查尔斯顿依靠进口其他地方生产的船只。在18世纪上半叶，殖民地的船厂产量达到了顶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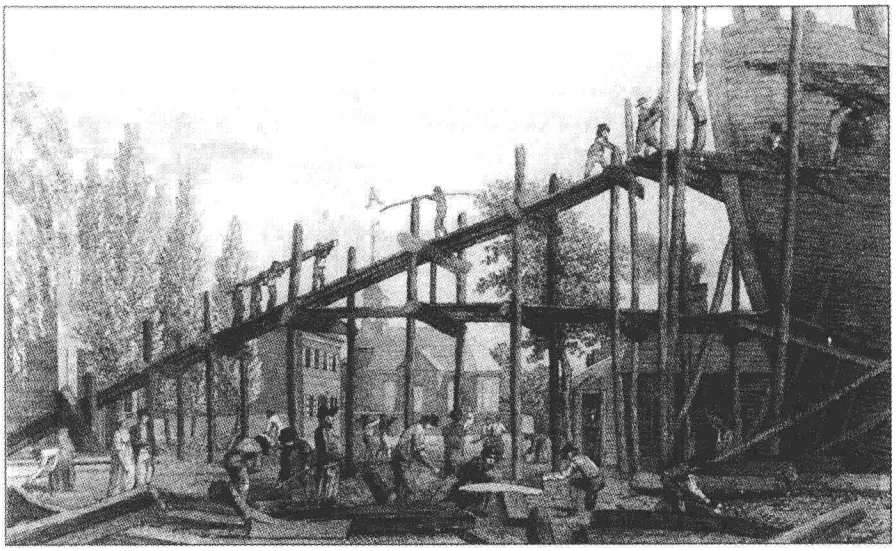
到1700年，新英格兰的船队超过了2 000艘，渔船未包括在内。美国的造船业不仅为国内的大型商船队提供船只，它也大量销往国外，主要是销往英国。一个普遍接受的估计将英国商船运输协会（British Merchant Marine）1775年近1/3的船只归功于美国制造商。①

许多船都很小。但无论他们是建造几百吨重的横帆的要配3个船长的船，还是建造10吨重的渔船，美国人都具有明显且持久的优势。殖民地造船业成功的基础是邻近原材料，主要是木材。尽管英格兰的劳动力和资本成本较低，但是来自波罗的海或殖民地的大宗原材料的高运输成本使得英格兰的造船业更贵。较高的工资促使足够数量的造船者和技工从英格兰和荷兰移民至殖民地，在那里他们建造的殖民地的船所用的成本约为英国的2/3。因此，殖民地的造船业是特别的：尽管大多数其他制造商节省的原材料成本不足以抵消殖民地高得多的劳动力成本，但在这种情况下，大宗原材料的高运输成本保证了有利于殖民地的生产的比较优势。此外，将在第4章中讨论的《航海条例》在同等程度上鼓励了殖民地和英格兰的造船业的发展。不过，在制造业发展的第一个世纪，在英格兰和北美之间产生了重要的差别。在英格兰，原材料通常是进口或者由工匠购买，而在新大陆，工人很接近原材料。

商船队

最后，正如相当大的新英格兰船队所表明的，船运服务和其他与运输相关的分配服务、搬运和商品销售是殖民地重要的商业活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商船队雇用了成千上万的人，这些商船队在世界范围内的很多贸易中和荷兰及英国的商人一样高效。事实上，到殖民时期结束，殖民地可以为有相当大的商业部门而自豪，并且作为外汇收入的来源，来自船运服务的销售收入仅次于烟草的出口创汇。船运和海外贸易作为商业活动对殖民地经济至关重要。

① Jacob Price, "A Note on the Value of Colonial Exports of Shipp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706 - 724.



© BETTMANN/CORBIS

得益于上等木材和松脂制品的有效供给，殖民地船舶制造商在造船业上拥有早期的比较优势。

职业群体

尽管殖民地建立了丰富多样的经济活动，但是从实用的职业角度看，日常生活是相当稳定的。职业角色在殖民地改变甚微；从今天的角度看，职业机会仍然是有限和刚性的。大多数人期待未来复制过去，并且大多数年轻人继承他们父母的职业。视角 3.2 展示了美洲印第安人文化上的传统主义。

男性人口一般会从事几种职业种类的其中一种，最主要的是家庭农民。其他重要的种类或阶级是：奴隶、契约奴、不熟练劳动力和水手。较高的中间阶层包括技工、商人和拥有土地的农民，但是最有钱的职业群体是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商人以及南部拥有大量土地的种植园主。正如埃德温·珀金斯和艾丽斯·琼斯告诉我们的，这些很富有的人被划分为士绅、绅士和官员。

大多数女性参加工作，以补充男性家长的收入。照顾小孩、家政服务、照管牲畜和家庭生产是妇女的主要职责。家庭农场生活是该时期典型的生活方式，妇女和儿童在家中从事手工业生产。在收获期间，他们又到户外帮助男性工作。比如，在 17 世纪的马里兰，路易斯·G·卡尔和洛雷纳·威尔什已经表明，妻子们经常在烟草田里度过春季和夏季。根据琼·詹森的描述，在中部殖民地，女性通常帮忙做些较为轻松的活，如将草展开晒干、挖土豆、收集亚麻和采摘水果等。妇女（尤其是年轻女性）大多数的离家工作就是在别人家里工作。这些为了额外收入的家政服务对于 25 岁以下的女性是平常的。

视角 3.2

☞

美洲印第安人的家庭结构

与欧洲殖民者的父系家庭架构相反，易洛魁部落和其他部落发展了一种母系家庭结构。作为捕猎者，男性经常长期不在家，通常长达几个月甚至有时是几年才回家一次。这使他们脱离了父亲（及丈夫）的责任；因此，夫妻关系并不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相反，家庭最根本的基础是母女关系。

妇女是播种者和收割者，玉米是主要的食物来源。尽管所有的土地都由一个民族或部落共同所有，但是个人小块土地松散的所有权还是可能发生。由安东尼·华莱士（1970，24）我们得知：

> 如果她愿意，每个妇女可以“拥有”一小块玉米地，或者是一个苹果园或桃园，但是没有理由去坚持土地所有权：共同耕种更快乐，并且在缺少正常市场的情况下，生产剩余没什么个人好处，尤其是如果冬天十分寒冷且其他家庭需要玉米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囤积只会导致反感和关系紧张，同时，还会增加为自己和家庭在未来获得玉米的困难。

共同生活的母亲、女儿、孙女及邻居的长期关系使偷懒及不良行为降到最少，而且共享为个人收成差和艰难时期做准备。

正如艾丽斯·汉森·琼斯提醒我们的那样，我们要对女性较低的法律政治地位和家庭中男性统治和家长权威的事实特别注意。女性被要求服从丈夫，而婚姻毫无疑问地被认为是女性的正确命运，不论其阶层或地位。对于未婚女性，工作的前景黯淡。

纺织或者帮助父母或亲戚做家务对未婚女性是很有可能的（因此 spinster 一词的意思是未婚女人）。有一些受过教育且有特殊关系的未婚女性可能会教音乐、阅读或其他技能。

子女大约在七八岁就开始帮助他们的父母干活了；到 12 岁时，他们通常是家里或田里重要的学徒式工人了。童工非常重要，并且维持子女为了父母去劳动的忠诚对于在没有奴隶的地区的父母来说是个特殊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甚至体现在法律中。各殖民地之间的继承法有些不同，但均符合经济效益和保持可靠的农村劳动力的目标。南部殖民地采用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是因为奴隶供应种植园的劳动力；而在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则通常采用多子继承制（将土地在儿子之间平分）以更好地保证儿子们的工作忠心。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dams, Donald. “Prices and Wages in Maryland 1750—1850.” *Journal of Eco-*

nomic History 46 (1986): 625 - 645.

Alston, Lee, and Morton Owen Shapiro. "Inheritance Laws Across Coloni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277 - 287.

Bailyn, Bernard. *The New England Merchant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Bridenbaugh, Carl. *The Colonial Craftsm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0.

——. *Cities in the Wilderness: The First Century of Urban Life in America, 1625—1742*.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Bruchey, Stuart. *The Colonial Merchants: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Carlos, Ann M., and Frank D. Lewis. "Indians, the Beaver, and the Bay: The Economics of Depletion in the Lands of the Hudson Bay Company 1700—176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1993): 465 - 494.

——. "Property Rights and Competition in the Depletion of the Beaver: Native Americans and the Hudson Bay Company."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ed. Linda Barrington. Bloulder: Westview, 1999, 131 - 149.

Carr, Louis G., and Lorena Walsh. "The Planting Wife: The Experience of White Women in Seventeenth Century Maryland."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4 (1977): 542 - 471.

Carroll, Charles. *The Timber Economy of Puritan New England*. Providence, R. I.: Brown University Press, 1973.

Clark, Victor S. *History of Manufactur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6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6.

Coelho, Philip R., and Robert A. McGuire. "African and European Bound Labor in the British New World: Th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Choic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97): 83 - 115.

Coon, David. "Eliza Lucas Pinckney and the Reintroduction of Indigo Culture in South Carolina." *Journal of Southern History* (1976): 61 - 76.

Doerflinger, Thomas. "Commercial Specialization in Philadelphia's Merchant Community 1750—1791."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7 (1983): 20 - 49.

Goldenberg, Joseph. *Shipbuilding in the Colonial America*.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Gary, Lewis C.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3.

Gary, Ralph, and Betty Wood. "The Transition From Indentured Servant to Involuntary Servitude in Colonial Georgia." *Exploration in Economic History* 13 (October 1976): 353 - 370.

Greenberg, Michael. "William Byrd II and the World of the Market." *Southern Studies* (1977): 429 - 456.

Hedges, James. *The Browns of Providence Plantation: The Colonial Yea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Henretta, Jam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2 (1965).

Jensen, Joan. *Loosening the Bonds: Mid-Atlantic Farm Women 1750—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Jones, Alice Hanson. "The Wealth of Women, 1774."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Claud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Klingaman, David. "The Significance of Grai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bacco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69): 267 - 278.

Menard, Russell R.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9 - 295.

McCusker, J. J., and R. R. Menard. Part II and Chapter 14 and 15 in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McMains, Douglass. *Colonial New England: A Historical Geograph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Norton, Thomas. *The Fur Trade in Colonial New York, 1686—1766.*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4.

Paskoff, Paul. *Industrial Evolution: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Growth of the Pennsylvania Iron Industry, 1750—18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

Perkins, E. J. Section 1 in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rice, Jacob. "A Note on the Colonial Exports of Shipp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704 - 724.

Schweitzer, Mary. *Custom and Contract: Household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Shammas, Carol. "The Female Social Structure of Philadelphia in 1775."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83): 69 - 138.

Stackpole, Edward. *The Sea-Hunters: The New England Whalemen During Two Centuries, 1635—1835.*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53.

Vickers, Daniel. "The First Whalemen of Nantucket."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0 (1983): 560 - 583.

——. "The Northern Colonies: Economy and Society, 1600—1775."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9 - 248.

Wallace, Anthony C. *The Death and Rebirth of the Seneca.* New York: Knopf, 1970.

第 4 章　殖民地的经济关系

本章主题

殖民地与英格兰及海外地区的经济关系是殖民地经济进步的核心部分。海外地区作为殖民地产品的市场，作为美国消费者所需的制成品和其他商品的来源，以及作为劳动力及资本的来源，在经济上是很重要的。英格兰为了提供防卫进行额外投资。本章将分析殖民地的商业关系和商品贸易、殖民地的船运业和贸易的法律和商业方面及货币、资本、海外及国内商业中的债务等特殊问题。本章说明了殖民地是如何融入世界经济和英国贸易领域的。

英国重商主义和殖民地

在从 1500 年到 1800 年这段长时期中，西欧的民族国家都受到了被称为重商制度（mercantile system）或重商主义的一系列思想的影响。重商主义学说和体系既不是由特定群体的思想家所创造的，也未被某个“学派”的经济学家系统地阐述，但这些思想很重要，因为它们被务实的商人和国家元首所掌握，而国家元首在不同国家不同时代都强烈影响着公共政策和制度变迁。

正如约翰·麦卡斯克（1996）提醒我们的，重商主义者的主要目的是为国家

实现权力和财富。西班牙在16世纪的经历已经导致很多观察家断定金银的流入是获得所需商品及服务和执行战争的有力帮助。为了通过贸易产生金或银的流入，出口值应该大于进口值。出口和进口之间的差额用金银支付。有了这些增加的被称为“金币”的货币数额，国内贸易会更加活跃，税收收入也会较高。有人还认为，只有政治和经济统一成为事实，一国才能获得强大的实力。在生产率如此依赖工人的技能及知识的时代，将技工留在国内至关重要。如果缺乏扶植国内工业必需的原料，它们最好能通过建立殖民地或友好的外国贸易站来从这些地方进口所需物品。一支强大的商船队可以运载国外的货物，因此争取有利的贸易平衡，而且如果有必要，商船能转换用于战争。

重商主义者相信这些实现国家实力的手段可以通过管制经济生活的立法的通过和严格执行取得实效。英国到15世纪末已经开始通过类似的法律，但是重商主义者的努力直到英国连同荷兰成功地超越西班牙之后才完全见效。事实上，标志着有组织且持续地管制殖民地贸易开端的英国立法得以通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英国渴望超过荷兰的结果，后者在17世纪上半叶就已经达到其实力顶峰。

在16世纪早期开始殖民活动时，英国并不是明确地坚持重商主义原则。当弗吉尼亚的烟叶开始以具有商业价值的数量运到英格兰时，国王詹姆士一世对它征税，同时却禁止在英格兰种植与之竞争的烟草。尽管税收、管制和补贴都被用作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影响殖民地的主要政策却是《航海条例》。

早期的《航海条例》

在英国内战期间（1642—1649年），英国人有太多他们自己的麻烦，以至于不能高度重视对殖民地贸易的管制。在这一时期，美国人已经养成了直接将他们的货物运至大陆港口的习惯，而荷兰人则已经大举进入殖民地的运输业。在16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所谓的《航海条例》，主要针对禁止美国货物使用荷兰船只运输。但是，从1660年和1663年的《航海条例》开始，直到王政复辟时期之后，英国的立场都是执行严格的商业政策。

这些条例因数百次政策变化不时地进行修改；在这一点上，它足以说明贸易限制的三个主要类别：

（1）所有殖民地贸易必须使用英国建造和拥有的船只运输，由英国船长指挥，且配备的船员有3/4是英国人。英国人被定义为“必须是国王陛下的英格兰、爱尔兰和种植园的臣民”。对殖民者很重要的是如下事实：殖民者和殖民者的船根据该法律都被认为是英国的。

（2）所有外国商人都被排除直接参与英国殖民地的商业。他们只能通过英国或者居住在殖民地的商人从事殖民地贸易。

（3）殖民地生产的特定商品只能出口到英格兰（或威尔士、特威德河畔的贝里克郡或其他的英国殖民地，本质上是目的地必须在帝国内）。“列举的”这些商品包括糖、烟叶、棉花、靛青、生姜和其他各种染料木材（黄颜木、洋苏木和巴

西木)。这个清单后来被修改并变长了，而且在1707年之后，苏格兰被增加为合法的目的地。

将这三个限制类别牢记在心是很重要的。尽管它们是殖民者偶尔进行抗议的原因，但它们实际上没有造成17世纪剩下的几十年中早已建立的贸易模式的中断。事实上，在整个17世纪的大多数时候，这些条例只是松散地执行。当海事法庭系统于1696年建立以执行《航海条例》时，其影响才变得较为明显。事实上，从18世纪初开始，殖民地的商业活动的大多数领域都受到管制。18世纪30年代的一次管制放松值得一提。在那时，一些列举的商品被允许直接运送到西班牙北部的菲尼斯特雷海角南部的港口。

出口、进口和市场

要求直接运送至英格兰的特定商品的细目表明这些商品对宗主国的特别重要性。表4—1也从殖民地的角度确认了这一重要性。烟叶、大米和靛青占了殖民地出口前10名的价值总和的一半多，而这三种产品主要产自南部殖民地。南部殖民地的主要产品占总殖民地出口额的比例的优势在17世纪要高于18世纪，但是它们的领先地位和重要性一直保持到独立的十年。在1768—1772年，这些出口排名前十的产品平均占总商品出口的77%。

表4—1　13个殖民地出口最多的十种商品（1768—1772年的年均价值，千英镑）

烟草	766
面包和面粉	410
大米	312
鱼	154
小麦	115
靛青	113
玉米	83
松木板	70
侧板和天花板	65
马	60

资料来源：Gary M. Walton and James F .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able 21, 194 - 195.

各种各样的制成品的价值占据了从英格兰进口的产品总价值的最大份额；一

个费城的商人提供了他从英国进口贸易的当代描述：

……大量各种各样的英国工厂、印度商品，等等。在冬去春来之际，[我们]进口我们的亚麻布和夏天需要的其他商品，而在夏末，我们应该准备将在秋天销售冬天使用的各类呢绒。春季是销售铁器、刀具、家具和所有其他铜、铁制品的最好时节。我们对这些商品的进口量非常大，这里的人们大都从事农业、家政、耕种土地，但是这里的制造业发展缓慢。①

葡萄酒和盐进口自南欧，糖、糖蜜和朗姆酒进口自西印度群岛。

图 4—1 是对殖民地的各个贸易伙伴的相对重要性的一个有用总结。英国是接收殖民地出口货物的主要海外地区（占总量的 56%），也是供给殖民地的进口货物的主要海外地区（占总量的 80%）。② 尽管如此，南欧和西印度群岛也是殖民地重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作为美国出口商品的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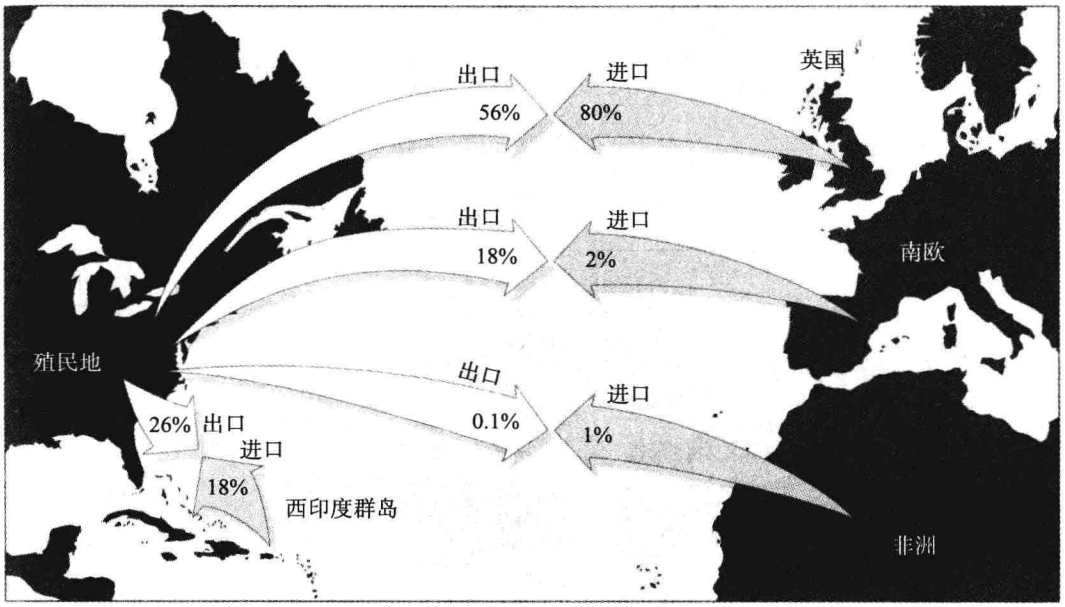


图 4—1　殖民地贸易的百分比分布

美国首要的进出口贸易伙伴是英国，其次是西印度群岛和南欧。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0 - 161.

图 4—2 揭示了殖民地贸易的另一个特征。这里我们将看到这些地区与各种海外市场的联系形成鲜明对比。在南部地区，对英贸易占绝对统治地位。而中部殖民地在英国、南欧及西印度群岛之间较为均衡。新英格兰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西印度群岛。殖民地每个地区的进口主要经由英国抵达，少数产品进口自南欧，而与非洲的商品贸易微不足道。

---

① Letters from Thomas Clifford, Philadelphia, to Abel Chapman, Whitby, England, July 25, 1767, as quoted from Ann Bezanson et al., *Prices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35), 263.

② 由于《航海条例》允许转运，并不是所有这些商品都在英伦三岛消费或生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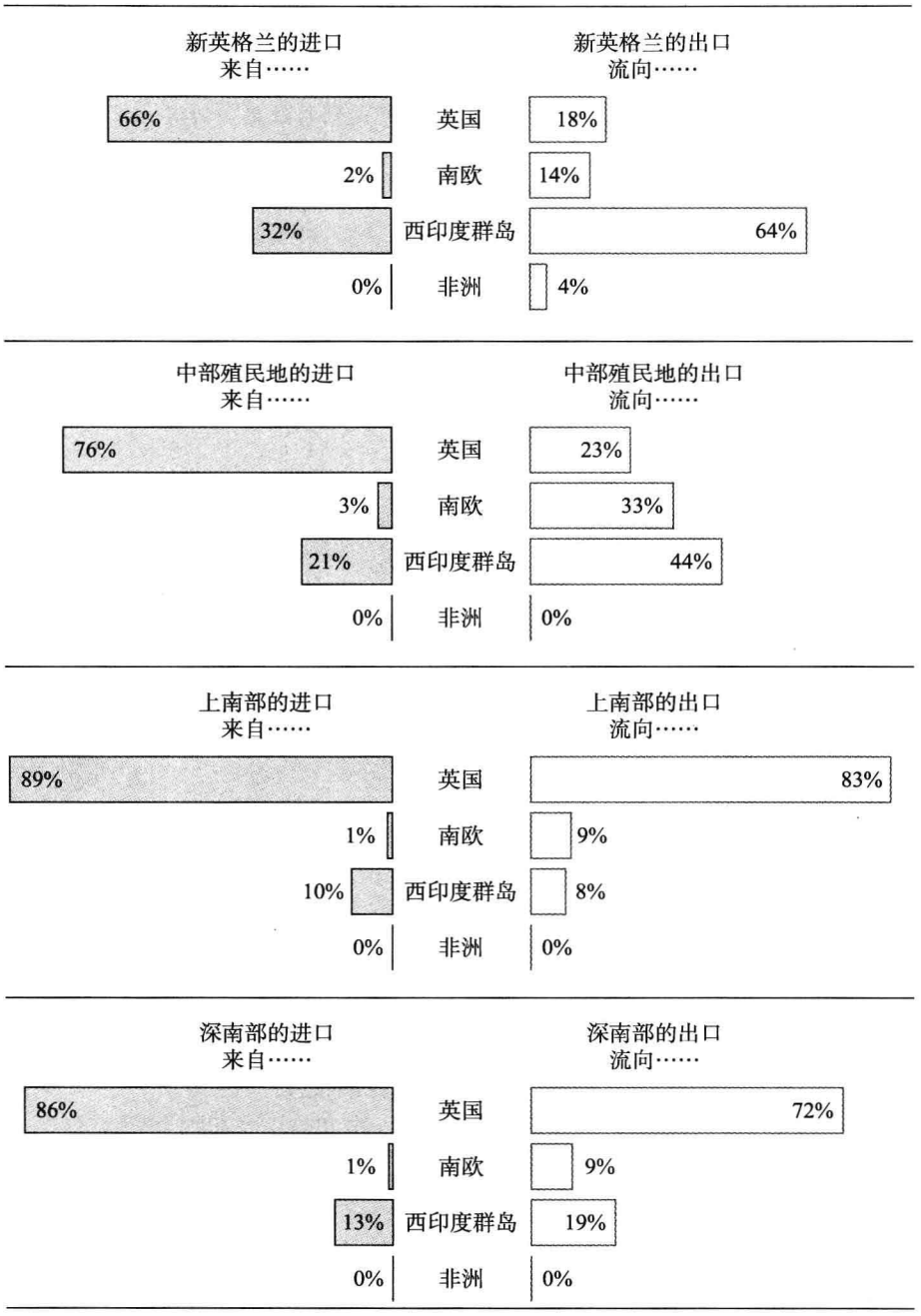


图 4—2　按地区分，殖民地贸易的百分比分布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60 - 161.

海外运输和贸易

尽管城镇居民人数在殖民晚期只占总人口的5%多一点，但是拥有安全港口和易达到的富饶海岸的主要港口城镇成为贸易和商业的关键地点。地图4—1展示了1776年10个人口最多的城镇。拥有4万人的费城是英帝国内仅次于伦敦的人口第二多城市，只比今天加利福尼亚州的戴维斯和艾奥瓦州的艾奥瓦市的人口略少一点。纽约（25 000人）、波士顿（16 000人）、查尔斯顿（12 000人）、纽波特（11 000人）是仅有的其他几个居民数量超过10 000的城市。请注意，10个人口最多的城市都是港口城市。因为这些城市都交通便利，又是交通模式的转换点（在海运、河运、陆地交通工具运输之间的转换），它们作为贸易中心极其有利。在这样一个时代，肥首型帆船（bluff-bowed sailing ships）通常需要6周才能横渡大西洋，而传递消息至内地还得再花几周时间，港口城市还具有特殊的通信优势。最后，旅行和运输经水路总是要比经陆路便宜，特别是对于殖民地典型的很重的大宗货物。内陆城市在铁路时代之前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位置和通信的优势也进一步决定了海外航运和贸易格局。很显然，无论是英国还是殖民地的船只，都未能在所有航线的运输上统治或具有比较优势。例如，英国的船只几乎完全控制了南方殖民地区的贸易，但是新英格兰的船只则在新英格兰—西印度群岛这一贸易路线上占优势。

表4—2表明了几条关键贸易路线上船运的所有权比例。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英国的船只，还是殖民地的船只，都没有在所有的贸易路线上占统治地位或具备比较优势。举例来说，在新英格兰到西印度路线上，殖民者拥有出港总吨位的96%，这一比例在新英格兰到西印度这条路线上则是85%，但只占12%的从上南部地区到大不列颠的吨位。为什么英国人主导了南部殖民地到英国的贸易，却在新英格兰和大不列颠之间及新英格兰和西印度群岛之间的贸易上落后了？三个关键因素提供了答案：（1）海上贸易的高风险；（2）对市场信息（价格和贸易机会）获取及反应的问题；（3）通过在国内港口解雇船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机会。

首先考虑贸易和市场的问题。新英格兰和其他殖民地的商人通常将他们的商品委托给船长或者称为代理人的销售代理商，这些人常驻海外市场并运输货物。由于这些商业关系使得对第三方的高度信任成为必需，所以殖民地的商人偏爱殖民地船只的船长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商人和代理商之间更加熟悉以及更频繁的接触降低了贸易风险。因此，殖民地的商人大多偏爱殖民地的承运商以获得信任，并能更好地保证他们在交易中获得更高的收入。

由于那时的通信和交通形式尚未发展完全，在地理上更接近市场就是一个重

要的优势。例如，在获取切萨皮克湾地区和欧洲的情况变化方面，英国的承运商和从事烟草贸易的商人要比新英格兰的承运商更容易。不过，在往返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中，殖民地的承运商和商人则更加靠近市场并能更迅速地对市场的变动情况做出反应。靠近市场可降低获取市场信息的时间和成本，允许商品更加及时地到达并降低贸易的风险。正如英国船主迈克尔·阿特金斯在 1751 年写给他的一个殖民地同事的一封信中所说："北部殖民地的商人包揽了西印度群岛的生意。欧洲人在粮食和木材商品上没有机会和他们竞争。你们在时间安排上更准确因而运到市场上就更便宜。"①

地图 4—1　安全的港口和富饶的海岸是促进殖民地这 10 个主要的城市中心发展的重要条件

① Richard Pares, *Yankees and Creol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8.

表 4—2　　18 世纪中期航运业的份额（%）

	殖民者所有	英国人所有	西印度人所有	殖民者所有	英国人所有	西印度人所有	殖民者所有	英国人所有	西印度人所有
船只出港	去英国			去南欧			去西印度群岛		
新英格兰	85	15	0	93	7	0	96	3	1
中部殖民地	72	28	0	75	25	0	80	20	0
上南部	12	88	0	88	12	0	85	0	15
深南部	23	77	0	0	100	0	51	23	26
船只进港	来自英国			来自南欧			来自西印度群岛		
新英格兰	68	32	0	84	16	0	96	1	3
中部殖民地	63	37	0	76	24	0	84	16	0
上南部	9	91	1	33	67	0	61	23	16
深南部	12	88	0	20	80	0	30	43	27

资料来源：Gary M. Walton,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September1968): 368.

最后，对劳动时间的充分利用总是一个重要因素。在殖民时期，常规做法如下：当船只在国外港口停靠时，船员是有报酬的，而船员通常只在航海结束在家乡港口时才能被解雇。这就意味着，在烟草贸易中的英国船员花费在海上和南部殖民地港口的时间都将得到报酬，但是他们在英格兰港口停靠的时间则不计报酬。因此，在这条贸易路线上，新英格兰的承运商处于劣势，这是因为他们必须支付船员在英国港口和切萨皮克湾的工资。相反，殖民地的承运商在国内港口和加勒比地区之间的贸易路线上面临较低的劳动力成本。

这些相同的考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贸易路线。这是不久前美国学习殖民地历史的学生被告知的往返路线（出去并直接返航），是南方殖民地贸易（主要是运往英格兰）的常见且典型的模式，但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通常采用三角贸易或其他更复杂的贸易模式。[①] 不过，往返模式已被证明是所有殖民地区的主导模式。[②] 对于大多数贸易，往返模式可削减成本。尽管希望船只尽可能满载的愿望

①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之前的美国大学历史课本中一般都强调这些情况。一些高中历史课本同样也是这样。著名的三角贸易路线包括：新英格兰—非洲—西印度群岛（去往新英格兰）；新英格兰—南欧—英国（去往新英格兰）；以及新英格兰—西印度群岛—英国（去往新英格兰）。例如，参见 Dudley Dillar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North Atlantic Community*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67), 197 - 198; Ross M. Robertso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2d ed. (New York: Harcourt, Brace&World, 1964), 80 - 81; Harold F. Williamson, ed.,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2d ed.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 Hall, 1951), 50 - 51; Edward Kirkland, *A History of American Economic Life*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0), 111 - 112; and Chester W. Wrigh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1), 153 - 154。

② 参见表 4—2 以及它的来源 (Gary M. Walton, "New Evidence on Colonial Commerce")。

鼓励船只在不同的港口之间“不定期运输”以利用可得的需求和货物之间的差异，但这种做法经常会导致抵消成本。例如，为了他所代理的商人，一个在西印度群岛做贸易的新英格兰船长会试图将他所运输的商品送至最好的市场。但是，在价格、交换媒介甚至是以往债务的问题上达成一致之前可能需要船只在岛屿间做好几次航行。交易通常是很复杂的，即使是相互熟悉的商人和船长之间也是如此。当然，在不熟悉的市场中，通信不畅、信贷限制以及无理取闹的其他细节都构成了困难。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停靠在陌生港口通常会导致停靠延误和高成本的停靠时间延长；因此，船长们通常就维持在数量有限的熟悉的目的地之间的定期运行。只有在国内港口停靠时才能解雇船员的做法进一步促进了往返贸易路线的发展，这是因为这些路线会提升在国内港的停留时间（不用发工资）占总在港时间的比重。

殖民地之间的贸易

由于类似的原因，殖民者主导着大量的沿海贸易。早在17世纪，新阿姆斯特丹的荷兰人就已经希望通过沿着殖民地海岸分销欧洲商品换来烟草、皮毛、谷物和鱼（这些商品之后将被运往荷兰）以获取潜在利润。荷兰人在1664年失去他们在北美的权力之后，他们对这些贸易的控制降低了，而新英格兰人和纽约及费城的有进取心的商人一起主导着北美的沿海贸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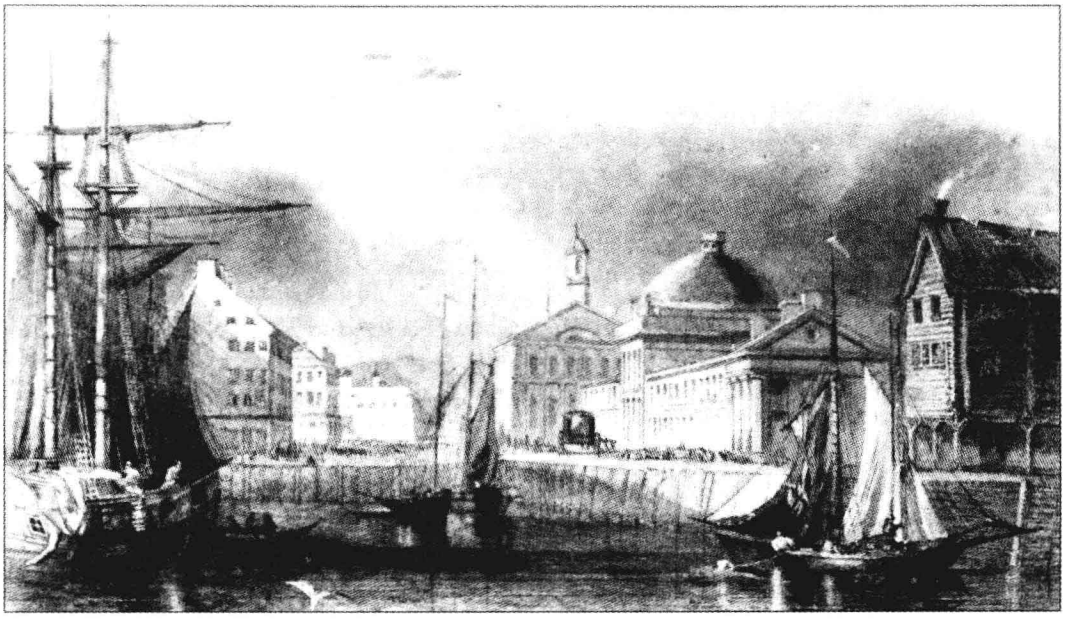
从交易商品的货币价值来看，沿海贸易额要比与大不列颠或与西印度群岛的海外贸易额要小，但在实际交易量上，沿海贸易却和这两个海外贸易的主要分支差不多。正如詹姆斯·谢泼德和塞缪尔·威廉森所表明的，就在革命前，沿海贸易构成了海外贸易总额的约1/3。和北部相比，南部的沿海贸易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即使在那儿，沿海贸易或许也贡献了南部港口进出货物吨位的1/5。[①]

至于内部贸易以及城镇与农村之间的贸易，在数量上很少。多亏了许多学者，包括詹姆斯·A·亨莱塔、威妮弗雷德·B·罗滕伯格、托马斯·M·多尔福林格最近的基于遗嘱认证、纳税清单和其他原始资源的研究工作，我们才得以知道更多关于乡村贸易和活动的丰富多样性。[②] 不过，我们仍然不知道贸易量的统计估计数字。边远地区的人们用他们少量的农产品剩余交换他们自己不能生产的物品——盐、药品、弹药、棉线、茶或咖啡，等等。在乡村和城镇，家庭较少自给自足，尽管最有钱的家庭也会生产一些日常消费的物品。

---

① E. R. Johnson et al., *History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Commerce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5), 171-172.

② 例如，在以下书中参见有关它们的章节：Ronald Hoffrnan et al., eds., *The Economy of Early America: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1763—179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8)。



© BROWN BROTHERS

波士顿的自然条件使得该城市作为贸易中心和船运中心获得了领先的地位，但是其西部的山脉使得它不得不开发其西部的内陆。最终，波士顿被其商业竞争对手纽约超越。

在城乡之间的综合的殖民地内部贸易中，城市商人通常会放贷给农民，直接放贷给农民或通过所谓农村商人的中间人来放贷。旨在获得工具和建材等资本设备和日常生存必需的补给品的目的都取得了进展。在生长季节结束时，农民们将他们的产品带到城里偿还债务。

货币和贸易

殖民地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是确立和维持一种可接受的货币。尤其是在熟人和朋友之间，易货贸易和赊账交换是很普遍的。但是，一般的商业需要货币以方便商人和农民之间的交换。货币还作为记账单位使用并作为财富的一种流动形式。

商品货币

最早的一种货币形式是借用印第安人的贝壳串珠，一种用蚌壳磨成的黑白珠子。贝壳串珠在马萨诸塞作为用来清偿私人债务的法定货币一直流通到 1661 年，并在纽约作为货币使用直到 1701 年。在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烟草为最初主要的交换媒介，其他殖民地则把兽皮、皮毛、油脂、母牛、玉米、小麦、豆类、猪

肉、鱼、白兰地、威士忌以及子弹等物品指定为“乡村货币”（country pay）（交税时使用）。忙乱的政府官员们经常被蒙骗而接收劣质的“乡村货币”。

显然，除了不方便、易腐化以及储存困难外，使用商品货币的一个主要问题在于质量控制，因为人们为了自身利益尽可能地用低劣的物品进行支付。

最早在殖民地出台的法规之一——1747 年《马里兰烟草检验法》（Maryland Tobacco Inspection Act of 1747）旨在解决这一问题。该法令主要是为了增加马里兰出口烟草的价值。[①] 这一质量控制举措最终的确使马里兰烟草出口的价值提高了，还为充当货币的烟草制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事实上，对受验烟草签发被称为检验单的纸质票据，使货币流通变得更容易了。事实上，由于给予被检查过的烟草一张被称为检查函（inspection note）的纸质证书，货币的流通也就变得简单了。1753 年，一位马里兰州的种植者报告说：

> ……口袋里揣着烟草检验单的好处是，不管到哪里它都能保证我的烟草信誉，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把一定数量的烟草轻松脱手给任何人；而在这个法令出现以前，我的信誉只被周围的人所了解，最远也只能到达可能有人知道我的地方。[②]

尽管有这么多问题，实物货币在 17 世纪的殖民地还是得到广泛使用。而到了 18 世纪初，金银铸币和纸币均在沿海大城市普遍使用。到殖民地时期结束时，实物货币，尤其是皮毛，只在沿西部边疆地区被接受。

硬币、铸币和纸币

由于殖民地与许多海外地区的大量贸易，所有欧洲重要商业国以及它们在西半球领地的金银铸币在北美东海岸可自由交换。由于法律不允许英国货币从英国流向殖民地，相比之下，西班牙的银币更加重要。这些银币在墨西哥城及利马（Lima）铸造，再通过与西班牙殖民地兴旺的贸易活动进入美洲殖民地经济。说英语的人将“piece of eight”（西班牙古银币比索的名称）称为“西班牙元”（dollar），可能是因为它和德国萨勒*差不多大。西班牙币在殖民地被普遍使用，因此这种硬币最后成为美国货币单位。被称为“雷阿尔”（real）或“一角两分半”（bit）的辅币，价值大约是 12.5 美分，或者说是 1 西班牙元的 1/8，这种辅币在找零时很重要。[③]

虽然早在 1652 年马萨诸塞率先铸造低含金量的硬币，但殖民地最后转而印制纸币以补充短缺且不可靠的货币供给。著名人士的期票与签发给英国商人的汇票几个月内就能顺利转手。此外，各个殖民地的财政部门开始在收税前签发期票，同时向城镇官员下达书面命令要求当地店铺履行付款义务；如其他可转让的

---

① 对这一法案的影响及烟草价格事实的深入分析，参见 Mary McKinney Schweitzer,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Colonial Economy: The Maryland Tobacco Inspection Act of 174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551 - 570。

② *Maryland Gazette*, April 5, 1753, as reported in Schweitzer (1980), 564.

* Thaler，是德国 15—19 世纪的银币。——译者注

③ “piece of eight” 是口语的叫法，因为在硬币的一面刻上的数字 VIII 表明它的价值为 8 雷阿尔。在美国的很多地方，“2 角 5”（two bits）、“6 角”（four bits）、“7 角 5”（six bits）的表达至今仍然在使用。

单据一样，这些票据经背书后可作为货币进行交换。[①]

1690 年，马萨诸塞发行第一批取款凭单（bills of credit）向士兵支付酬劳。在此后的 65 年中，至少有另外八个州效仿此举以应付财政紧张状况，尤其是有关战争的支付。发行取款凭单的附带条件是凭单会在将来某日以货币赎回；同时签发凭单的殖民地可将这些凭单当作税款接受。虽然有条件限制，但这种赎单方式有助于单据像货币一样自由流通。在罗得岛、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南卡罗来纳等州，这种单据通常过量发行，使其相对于硬币有所贬值。由殖民地政府建立的公共“银行”的票据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银行，这些机构通常以土地和房屋做抵押向个人发行贷款凭据。借款者用此类票据支付债务并且通常要以逐年分摊并支付利息的方式偿还贷款。

除了政府发行的票据外，间或也有个人发明的清偿方式。正如一位商人 1761 年 4 月在《马里兰公报》的声明中所说：

> 我每天因缺少零钱而给生意带来不便，这对于几乎做任何生意的人都是个问题。所以我打算自己印制一批小额钞票，面值为 3 便士、2 先令和 6 便士，使之与符合检验法律的货币一样流通，并可在我这里按每西班牙元 7 先令 6 便士兑换成西班牙币。[②]

以这种方式，交易成本被降低了，尤其是零售和小批量交易的成本。

货币、债务和债权人

从历史上看，殖民地的大多数纸币发行很少受到英格兰的关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债务人更频繁地企图以贬值的纸币来清偿旧债。纸币作为法定货币在纳税和私人交易中使用，已被新英格兰的法律和习俗公认。

图 4—3 阐明了宾夕法尼亚纸币和英镑的汇率在伦敦的问题和发展轨迹。在 18 世纪 40 年代晚期，兑换 100 英镑大约需要 180 镑的宾夕法尼亚货币。货币的票面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差异是殖民地债务人和英国债权人之间冲突的根源。英国商人通常愿意接受以市场价值计价的货币，但是债务人却指出殖民地法律声明债权人必须以票面价值接受纸币（1 镑殖民地货币兑换 1 英镑）。最终，英国王室和议会被迫卷入这场争议。作为对英国债权人的抱怨的回应，1751 年《货币法案》（Currency Act of 1751）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取款凭单限制在 2 年之内且不得用于私下交易。此外，现存的纸币在它们到期后不再使用。从最终产生政治效果的角度看，1764 年《货币控制法案》（Currency Restraining Act of 1764）更重要。该法案将 1751 年《货币法案》条款的适用范围推广到所有殖民地。由于弗吉尼亚的一些事件的促成，弗吉尼亚在 1755 年之后以付款凭单的形式发行

---

① Curtis P. Nettels, *The Money Supply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Before 17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4), 250 - 251.

② 来自 Joseph A. Ernst, *Money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755—17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154 - 155。有关这一问题的更多论述，参见 John R. Hanson Ⅱ, "Small Notes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 (1980): 411 - 420。

了 25 万镑的完全法定货币，该行为引起了南方殖民地居民的强烈抗议。同时，反对在法英北美殖民地争夺战中以大量发行的纸币支付本应以硬币支付的到期债务的英国商人，点头赞成了该法案。正如在战后萧条时期一样，《货币控制法案》引起了很大的敌意。到 1773 年，在不断的对立中，英国议会做出让步，并允许殖民地在公共付款中以票面价值使用货币发行物，但不可用于私人支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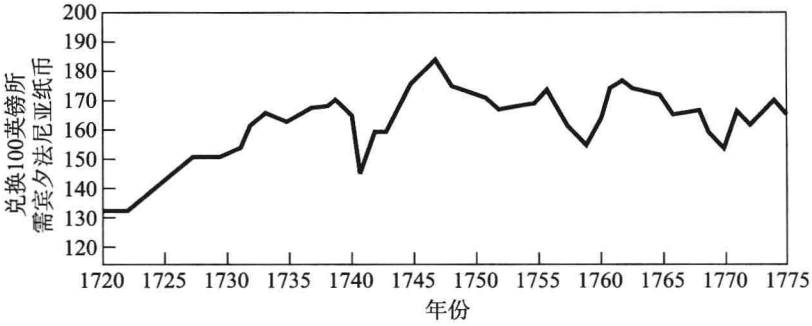


图 4—3　伦敦对宾夕法尼亚纸币兑换的年汇率

在 1720—1739 年，英国硬币对宾夕法尼亚纸币的汇率不断上升，这导致兑换 1 英镑需要更多的宾夕法尼亚纸币。在之后的时期，英镑汇率下跌。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Series Z585.

请注意，当时纸币只是美国所独有的。尽管在古代中国被发明和使用过，纸币在 1500 年之后未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被使用，直到在大陆殖民地再次被引入。纸币已经被广泛认为是殖民者伟大的遗产之一。

STOCK MONTAGE, INC.

17 世纪英国拥挤的监狱中关押着很多债务人。佐治亚的殖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缓解押满债务人的监狱的压力。

与英国的贸易逆差

这里再强调一下由英国皇室实施的用来管制贸易并产生有利于英国的贸易余额的重商主义措施是很重要的。此外，由于新大陆对欧洲工业品的需求量极大，殖民者面临长期的贸易逆差，尤其是在他们和英国的贸易中。殖民地的贸易逆差导致了硬币从殖民海岸持续流出并鼓励纸币替代品的使用。表 4—3 展示了在 18 世纪的许多时间里殖民地与英国的贸易逆差的规模和趋势。正如表 4—4 中所强调的，这些赤字的大部分是由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产生的，但即使是南部殖民地也经常在与英国的商品贸易中面临赤字。

表 4—3　英国和美洲殖民地经济贸易的价值和账户（10 年的年平均数，千英镑）

时期	进口	出口	赤字
1721—1730	509	442	67
1731—1740	698	559	139
1741—1750	923	599	324
1751—1760	1 704	808	896
1761—1770	1 942	1 203	739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42.

表 4—4　1768—1772 年 13 个美国殖民地的年均经常贸易账户（千英镑）

	英国和爱尔兰	南欧	西印度	非洲	合计
新英格兰	−609	+48	−36	+19	−577
中部殖民地	−786	+153	−10	+1	−643
上南部	50	+90	−9	0	+31
深南部	−23	+48	+44	0	+69
合计	−1 468	+339	−11	+20	−1 120

注：(1) 加号代表贸易盈余（出口额超过进口额）；负号代表赤字（进口额超过出口额）。

(2) 价值以大陆殖民地价格表示，因此，进口价值包括了运输、佣金和其他处置成本。出口价值也以这一价格表示，因此，不包括这些配送成本。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115.

殖民地是如何支付它们的贸易逆差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60年给一个议会委员的答复中解释了宾夕法尼亚对其与英国的赤字的支付，如下所示：

> 余额是由我们运往西印度群岛的产品和我们在该岛上出售的或卖给法国人、西班牙人、丹麦人及荷兰人的产品来支付的；通过同样的方式将商品运往其他的北美殖民地，比如新英格兰、新斯科舍、纽芬兰、卡罗来纳和佐治亚；我们还将商品运至欧洲的不同地区，比如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在所有地方，我们得到适合汇给英国的货币、汇票或者商品；其中，包括所有我们的商人和水手所在行业在迂回航行和货运中获得的利润。所有上述收入最终集中起来清偿赤字并支付在该省持续使用或由我们的商人卖给外国人的英国工业品。①

正如受尊敬的富兰克林所强调的，殖民地对英贸易逆差可以通过殖民地对其他海外地区的贸易顺差以及船运业和其他商业服务的收入来支付。

其他的外汇来源（例如英国军队驻扎在殖民地的支付）也影响了英镑的流入。为了确定这些和其他交换收入（和损失）来源的相对重要性，我们需要评估殖民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的各个组成部分（见经济透视4.1）。

解释：货币、债务和资本

已经评估了殖民地的国际收支，我们现在转向它对殖民地经济的影响。20 000～40 000英镑估计的剩余的殖民地年度赤字要么是通过硬币的流出支付的，要么是通过越来越多的英国债务。临时的硬币流出无疑确实存在，从而使殖民地的贸易和价格紧张。当然，那个时期人们对货币稀缺性（尤其是硬币）的抱怨表明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这种正常的赤字的主要部分都不能用贵金属来支付。殖民者不能维持长久的硬币净流出，这是因为北美殖民地并没有开发金矿和银矿。当时，通常流往英国的硬币流出一般和同殖民地交换收入的其他来源的流入相当。尽管如此，硬币移动的不稳定模式以及不确定值的纸币的发行造成了货币骚乱，这反映在价格变动以及货币之间汇率的变动上。但大多数殖民者更喜欢花掉而不是积累硬币。毕竟，有限的硬币只是资本稀缺经济的另一个表现。对于殖民者来说，相比不断增加的硬币积累，获得额外的进口——特别是制成品是较为理想的。

最后剩下的殖民地赤字通常通过短期信贷来融资，而且美国商人以赊欠一年的方式从英国购买商品。事实上，这已成惯例，以至于英国商人在他们出售的商品价格中已包括了通常5%的利息，并对在年底前支付货款的商人给予一个回扣。而且在弗吉尼亚，苏格兰公司一般在商店中设立代表来销售或用英国货物交换烟草和其他产品。在这些情况中，短期信贷是日常的殖民地交换正常的一部分。

短期信贷的增长反映了大西洋贸易的扩张并代表了不断增加的殖民地欠英国

① 引自 Harold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8th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81。

的债务的适度数量。革命之后英国商人对南方种植园主的大量索赔[①]促使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伦敦商人和南方种植园主之间的关系在当时是灾难性的，他们甚至认为不断增加的殖民地欠英国的债务提供了进行革命的动力。但事实上是如此吗？

通过将“看不见”的收入和船舶销售额加入到贸易逆差（和盈余）后，我们得到了殖民地的区域赤字（－）和盈余（＋）的粗糙平均值[②]：

新英格兰 －50 000 英镑　中部殖民地 －350 000 英镑　南部殖民地 ＋240 000 英镑

经济透视 4.1

13 个殖民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

对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研究可以澄清很多关键的问题。它能确定对英格兰的贸易逆差是如何偿还的以及硬币从殖民地净流出的数量或反映出殖民者欠英国债权人的不断增长的债务的数量。它能显示出殖民地的资本流入以及英国对殖民地经济发展的可能的补贴幅度。国际收支平衡表是一个会计框架，其中的贷方和借方的数额总是平衡的。总之，购买的物品得用商品、货币和借据（债务）等这种或那种方式支付。这对所有人和所有国家都是适用的，殖民地也是如此。

尚存的 1768—1772 年无数交易的信息给了我们一个合理清晰的殖民时期后期殖民地国际收支的描述。表 4—4 提供了这一时期殖民地与主要海外地区的商品贸易余额的细目分类。这些数据证实了表 4—3 展示的结果，表明了殖民地（尤其是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对英贸易中存在大量的赤字。有些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殖民地与西印度群岛的商品贸易也是不理想的（深南部地区除外）。但是，殖民地对南欧的贸易创造了可观的顺差（比对非洲贸易的顺差稍微多一点），这已足够将南部殖民地区在其整体商品交易中增加到顺差的状态。

尽管商品交易占殖民地贸易的大部分，但是殖民地确实还有其他的外汇收入（及损失）来源。表 4—5 始于殖民地商品交易，表示该类别的总赤字为 1 120 英镑。

抵消平均赤字的外汇收入的最重要来源是殖民地船运服务的销售收入。在殖民时期后期，船运业每年的总收入大约是 60 万英镑。此外，殖民地商人通过保险费和佣金每年赚得的收入超过 20 万英镑。加在一起，这些“看不见”的收入抵消了超过 60％的殖民地商品贸易总赤字。这些“看不见”的收

① 在 1791 年，英国商人的索赔额大约是 500 万英镑，其中，超过 230 万英镑是由弗吉尼亚借的，马里兰大约欠了 57 万英镑，南卡罗来纳欠了 69 万英镑，北卡罗来纳欠了 38 万英镑，佐治亚欠了 25 万英镑。但是，这笔款项有接近一半的数额是 1776 年之后开始还息的赤字的累积利息。此外，奥布里·兰德认为这些索求的款额被夸大了 800％，美国人只应偿还其中的 1/8。参见 Aubrey C. Land, “Economic Behavior in a Planting Societ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hesapeake,” *Journal of South History 32* (1967): 482－483。

② 航运业收入和其他“隐性收入”的区域差别来自 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chapter 8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由于船主并未按上南部和深南部进行区域划分，我们将这两个区域合在一起，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上南部挣到了 24 万英镑贸易顺差中很大的一部分。殖民地北部区域获得了所有的船只销售收入，新英格兰得到了其中的 10 万英镑，中部殖民地获得了其中的 4 万英镑。

入的几乎80%转到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居民手中。因此，新英格兰人和中部殖民者（尤其是从事西印度群岛贸易的商人）的商业活动使得殖民地能够从英国进口大量的工业品。当将所有的13个殖民地一起考虑时，“看不见”的收入超过了烟草出口（这是殖民地最重要的大宗出口产品）的收入。

航海事业的另一个方面——船舶的销售，也成了殖民地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一个持续的贷方项（credit item）。正如雅各布·普赖斯所指出的，在1763—1775年，殖民地的船舶年销售额平均至少是14万英镑，主要是销往英国。再一次，这些收入的大部分归新英格兰的船舶制造商，但是中部殖民地也获得了船舶销售利润的一部分。船舶销售收入和“看不见”的收入合在一起将殖民地的收支逆差降低至只有16万英镑。

相对于这些收入来源，人类贸易的资金不断地流向外国市场。平均每年大约有8万英镑花在5 000～10 000名（在殖民时代晚期每年来到殖民地的）契约奴身上。这些契约奴中的大多数被送往宾夕法尼亚和切萨皮克湾地区。每年约有20万英镑的更大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买约5 000名奴隶。超过90%的奴隶被送往南部殖民地，特别是在殖民时代后期被送往深南部地区。

最后，英国政府花费在殖民地国防、民政管理和司法上的开支显著地抵消了殖民者的贸易经常账户上的剩余赤字。表4—5并未指出英国的这些支出的总数额。相反，它显示了购买殖民地的商品和服务用了多少英国货币以及支付给驻扎在那里的人的工资。1768—1772年，这些开支的年均净流入为44万～46万英镑，从而将这些年殖民地国际收支的净赤字降低至每年最多4万英镑，甚至可能更少。

表4—5　　1768—1772年13个殖民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千英镑）

	借方	贷方
商品		
出口收入		2 800
进口收入	3 920	
贸易赤字	1 120	
船只出口收入		140
隐形收入		
运输货物		600
商业佣金、保险等		220
人力成本		
契约奴	80	
奴隶	200	
英国税收和支出		
税收和关税		
军队和民政支出	40	440～460

续前表

	借方	贷方
由硬通货流入或（及）债务减免而削减的赤字		20～40

资料来源：Data compiled from Gary M. Walton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Table 9, 101; Julian Gwyn, "British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40—1755," in *The Atlantic Empire befor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Peter Marshall and Glyn Williams (London: Cass, 1980), 74-84, fn. 7, and in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1980): 74-87, fn. 7; and Peter D. G. Thomas, "The Cost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1763—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988): 510-516.

显然，发生贸易逆差的主要区域在切萨皮克湾区域的北部，主要是在中部殖民地。贸易经常账户足够的顺差有利于南部地区支付对奴隶和契约奴的购买。

相当数量的种植园主利用了来自海外的更多的贷款。尽管如此，这时南部殖民地的平均债务水平似乎并没有增加，而且出于军事和管理目的的英国开销减少了新英格兰负的收支差额并减少了中部殖民地的大部分逆差。①

即使有夸张，英国的索赔却是足够真实的。但是要记住，英国商人和他们的殖民地代表通常会延长其对南部种植园主的贷款期限并接受他们的潜在收成作为抵押。当然，通常丰收到来之时，殖民者的未付债务即可得到支付。但是随着革命的爆发，这一情景从根本上改变了。一般延期至全年的殖民地贷款在年底时仍未付，这是由于在农作物收获及清偿债务之前，英国公司的代理商和合伙人就已经撤回英国了。但是，仅仅这些债务的存在并不表示越来越多的债务，也没有为殖民地起义提供动机。

发生的资本流入很少被引导到殖民地的长期投资，而且英国商人也极少对此类投资拥有所有权。不过，认识到因为英国人提供了短期商业贷款，殖民地的储蓄得以用于其他用途是很重要的，这些用途包括改良土地、修筑道路等长期投资以及如船只、仓库和公共建筑等实物资本。从有利于殖民地发展的角度来看，英国对殖民地的短期贷款代表了援助之手，其形式更不用说比其数量更重要。

但是，除了军事和国防是高度重要的例外，在任何很大的程度上，殖民地显然并没有得到英国的资助。在大多数情况下，新大陆的资本形成取决于储蓄的稳定增长和来自殖民者自己口袋的投资。准确地确定在殖民时期后期每年的储蓄额和投资额是不可能的。根据我们的估计（这将在第 5 章阐述），殖民地的人均年

① 对于区域间贸易逆差和顺差的进一步改变可能是由区域间的沿海贸易所导致的。令人惊讶的是，13 个殖民地的主要区域看似都在沿海贸易中获得了贸易顺差。佛罗里达、巴哈马、百慕大群岛、纽芬兰北部殖民地、新斯科舍和魁北克是沿海贸易中出现逆差的区域。参见 James F. Shepherd and Samuel H. Williamson, "The Coastal Trade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803。

收入大约为至少 11 英镑。因为在革命前夕差不多有 250 万人生活在殖民地上，如果我们假设储蓄率不低于 9%（11 英镑中有 1 英镑用于储蓄），那么当时每年的总资本积累可能已经超过 250 万英镑。因此，来自英国的资本流入可能只占到殖民地资本形成额的 1%或 2%。

对 1763—1775 年之间英国在北美的军事开支的相当大的估计（Peter Thomas，1988）以及对 1740—1775 年之间这个更长时期内民事和军事开支的估计（Julian Gwyn，1984）支持如下一般性结论：殖民地在殖民时代后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国际收支的净逆差很小。只有军事和国防目的的大量支出揭示了革命前的几十年里英国资助或殖民地依赖的一种形式。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ndrews, Charles M. *The Colonial Period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4 of England's Commercial and Colonial Poli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

Barrow, Thomas. *Trade and Empire: The British Customs Service in Colonial America, 1660—177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Becker, Robert A. *Revolutio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America: 1763—178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Beer, George L. *British Colonial Policy, 1754—1765* (Gloucester: Smith, 1958).

Bernstein, M. L. "Colonial and Contemporary Monetary Theory."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3, no. 3, 2d series (Spring 1966).

Breen, Timothy H. *Tobacco Culture: The Mentality of the Great Tidewater Planter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Brock, Leslie. *The Currency System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00—1764* (New York: Arno, 1975).

Bruchey, Stuart. *The Root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607—1861: An Essay in Social Causation* (London: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5).

——.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6).

Coleman, D. C., ed. *Revisions in Mercantilism* (London: Methuen, 1969).

Dickerson, Oliver M. *American Colonial Government 1696—1765* (Cleveland: Clark, 1912).

——. *The Navigation Acts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51).

Ernst, Joseph. *Money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1755—1775*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3).

Evans, Emory. "Planter Indebtedness and the Coming of the Revolution in Virginia, 1776 to 1796."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9, 2d series (1962): 511 - 533.

Greene, Jack P., and Richard M. Jellison. "The Currency Act of 1764 in Imperial-Colonial Relations, 1764—1776."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18 (4), 2d series (October 1961).

Gwyn, Julian. "British Government Spending and the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40—1775."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8 (1984): 74 - 84.

Hacker, Louis M. "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part 1 (September 1935). Reprinted in Gerald D. Nash.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D. C. Heath, 1972).

Hanson, John R. "Money in the Colonial American Economy: An Extension." *Economic Inquiry* (1979): 281 - 286.

——. "Small Not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411 - 420.

Harper, Lawrence A. *The English Navigation Law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 "Mercanti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March 1942). Reprinted in Gerald D. Nash.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eath, 1972).

Hughes, J. R. T. *Social Control in the Colonial Economy*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6).

Kulikoff, Alla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275 - 288.

Lester, Richard A. "Currency Issues to Overcome Depressions in Pennsylvania, 1723 and 172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1 (1963): 324 - 375.

McCusker, John J. Monetary Experiments: *Early American and Recent Scandinavi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9).

——. "British Mercantilist Policies and the American Colonies."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37 - 362.

Neal, Larry. "Interpreting Power and Profit in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Study of the Seven Years'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20 - 35.

Nettels, Curtis P. "British Policy and Colonial Money Suppl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 (1931).

——. *The Money Supply of the American Colonies Before 17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34).

Perkins, Edwin J. Chapters 2 and 7 in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Price, Jacob.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Chesapeake and the European Market, 1697—177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1964): 496 - 511.

——. "Economic Function and the Growth of American Port Town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erspective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8, eds. D. Fleming and B. Baily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A Note on the Value of Colonial Exports of Shipp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704 - 724.

——. *Capital and Credit in British Overseas Trade: The View from the Chesapeake, 1700—1776*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osenberg, Nathan, and L. E. Birdzell, Jr. Chapter 4 in *How the West Grew Rich*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Schweitzer, Mary McKinney.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Colonial Economy: The Maryland Tobacco Inspection Act of 174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551 - 570.

Shepherd, James F.,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Shepherd, James F., and Samuel Williamson. "The Coastal Trade of the British North American Colonies 1768—177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783 - 810.

Smith, Bruce. "Some Colonial Evidence on Two Theories of Money: Maryland and the Carolina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3 (1985): 1178 - 1211.

Studenski, Paul, and Herman Krooss.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52).

Thomas, Peter D. G. "The Cost of the British Army in North America, 1763—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5 (1988): 510 - 516.

Ver Steeg, Clarence. *The Formative Years*, 1607—1763 (New York: Hill & Wang, 1964).

Walton, 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Weiss, Roger. "The Issue of Paper Money in the American Colonies, 1720—177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0): 770 - 785.

——. "The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s of Massachuset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7 (4), 2d Series (November 1974).

Wicker, Elmus. "Colonial Monetary Standards Contrasted: Evidence From the Seven Years'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860 - 884.

第 5 章　经济进步与财富

本章主题

由于高水平的移民和快速的人口增长，殖民地的总产出在整个殖民时期都以高速增长。以当代的标准来看，一般殖民者的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也是很高的，可以和英国、荷兰及法国的生活提高相媲美。人均收入增长的源泉是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部分，因为这些进步的源泉将殖民地经济提升到了可独立于英国的位置。这些源泉主要是在生产力变化的案例（或部门）研究中被发现的。尽管经济增长且繁荣了，人们和地区并未平等获益，而且，随着荒野的定居点成长为乡镇和贸易中心，财富（和收入）的大量不平等就已经在人们及地区之间存在。

殖民地经济的增长和改变

构成殖民地经济总体的许多当地和区域经济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因为殖民地真正地是以荒野的定居点开始的，也因为战争和边界骚乱经常发生，所以要系统地描绘殖民地的经济增长是特别困难的。数据严重不足以致无法系统全面地衡量经济增长。

在 1964 年，乔治·R·泰勒引发了一场方兴未艾的辩论。在经济史协会的

会长致辞中，泰勒认为，以实际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来看，在1710年之前，殖民地几乎没有发生经济增长（它是“既慢又无规律的”），但随后，在1710—1775年，平均增长“每年1%多一点”[①]。一个得心应手的被称为70法（Rule of 70）的经验规则，显示了年增长率的影响。如果r是按百分比计算的增长率，而t是不断增长的数量翻番所需的年数，那么$r \times t = 70$。泰勒1%的说法意味着人均实际收入翻一番需要70年：$t = 70/1$，即70年。泰勒所宣称的18世纪早期的加速真的发生过吗？人均收入在1710—1775年真的翻番了吗（正如1%的增长率所意味的）？此后经济进步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还是出现过停滞时期？

由于实际人均收入数据的局限性，我们得不到确定的答案。[②] 不过，通过最近的学术努力，信息片段看来已经显著推动我们对殖民地经济增长速度和主要源泉的理解。

农业生产力的变化

殖民地主要的经济活动是农业，而且该部门的进步对殖民地的总产出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由于农业是总产出中如此重要的组成部分，该部门的进展（或没有进展）对总的平均收益有显著影响。此外，记住以下这点十分重要：从实际人均的角度看，经济进步主要来自于提高生产力（相对于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和土地投入的总产出的增加）的人类努力。因此，我们将特别关注生产力变革时期以及引入农业改进的原因。

上南部地区的烟草

一个明显的出发点是占主导地位的殖民地主要作物烟草。如图5—1所示，关于切萨皮克湾地区的烟草价格的信息表明烟草业生产力的大部分增加在殖民时代早期就发生了。从17世纪20年代早期的每磅20便士*至30便士之间，烟草价格在1630年左右跌至每磅不足3便士。持续了约40年的第二阶段，遵循这一急剧下降。这个时候，烟草的平均价格降至约每磅1便士。当然，短期变动发生了，但是烟草价格在大多数剩余的和平年代都维持在低价格上。

毫无疑问，烟草价格下降的这两个较早的时期代表了生产力的两次主要的上升。根据艾伦·库利科夫（1979）的研究，在1630—1670年每个工人的烟草产量翻番。欧洲对烟草的需求在持续增加，而种植烟草所需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在这些年并没有下降。下降的工资和租金不能解释烟草的较低成本，所以这些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每单位投入（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起）引起的产出增加，也就

① George R. Taylor,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40: An Exploratory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1964): 437.

② 记住以下这点很重要：在衡量收入变化时，我们经常忽略其他的影响生活水平的因素，比如享受的闲暇时间数量、健康状况、环境、个人成就甚至是财富分配。

* d.，1971年以前的英国货币单位，1英镑=20先令=240便士。——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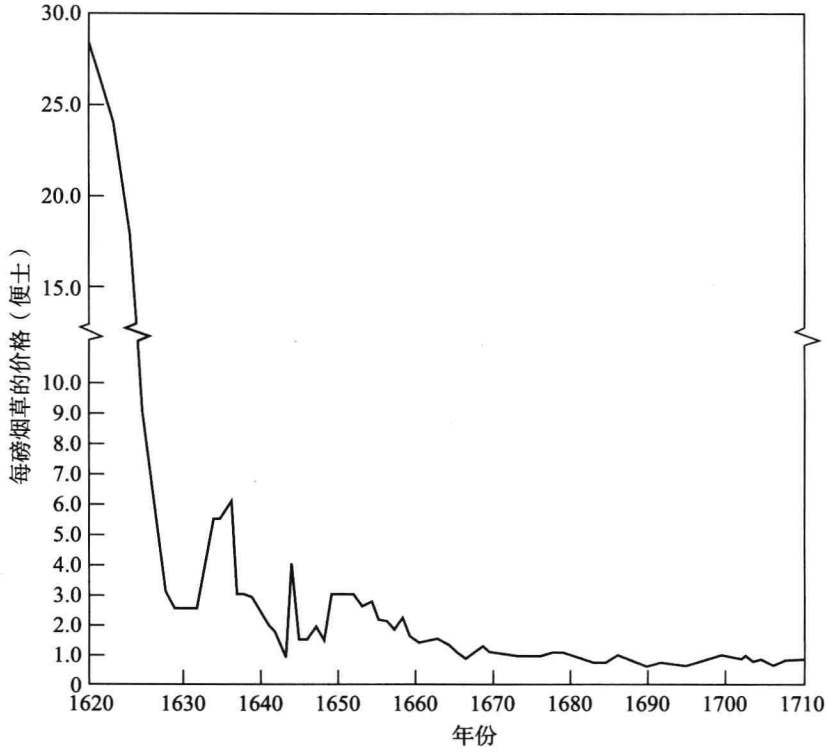


图 5—1　1618—1710 年切萨皮克农场的烟草价格

资料来源：Compiled from Russell R. Menard, "A Note on Chesapeake Tobacco Prices, 1618—1600," *Virgi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1976): 401 - 410; and Menard, "Farm Prices of Maryland Tobacco, 1659—1710," *Maryland Historical Magazine* 58 (*Spring* 1973): 85.

是通过生产力的提高。特里·安德森和罗伯特·托马斯（1978）也估计烟草业的生产力有非常大的进步：在 17 世纪的后 75 年里，该进步差不多为平均每年 1.5%。不过，烟草业在 18 世纪很少发生生产力进步，而且毫无疑问，烟草种植业生产力进步的主要时期是在 17 世纪而不是 18 世纪。

这种早期快速提高而之后较慢发展的特点一直是企业和行业中生产的共同增长模式。在殖民时期（在技术进步广泛的时代之前），生产力的提高主要源于反复试验和干中学。在农业，这些努力的成果一般要在作物引种的数十年内实现。像烟草的情况一样，有时一种新品种种子的引进会导致作物生产力的激增。而且，在实验的早期阶段，殖民者会发现各种方法来合并和改善土壤、种子、劳动农具以及其他农业投入使之得到最佳应用。在农业开发的后期阶段，改进是逐步的，且以对可得土壤和资源最有效使用的知识较低速度的积累为基础。在某些情况下，如殖民者在葡萄酒生产和养蚕业的尝试都是徒劳，这些努力在实验阶段就终止了。

中部殖民地的粮食和牲畜

粮食和牲畜的生产和烟草生产一样，在18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生产力的提高似乎是不多的，事实上是很低的。宾夕法尼亚的农场最明显的变化是农场平均规模的急剧下降，从1700年的约500英亩下降到18世纪末的约140英亩。但是该下降并不意味着“有效土地”与劳动力投入这一比率也在下降。事实上，它是人口膨胀以及随着新农场的发展未清除土地进行细分的结果。因为每个农场未清除的土地数量超过了燃料和木材的最低需要，所以这些种植面积的减少对农业产量并没有显著影响。因为每个农场已清除土地的平均数量几乎不变，所以每个农场的土地的有效投入在整个18世纪中几乎不变。

© HISTORICAL PICTURES/STOCK MONTAGE

这样的18世纪乡村殖民地环境的安静掩饰了家庭农场的繁重工作和多变的日常任务。

此外，添加的农具、结构和累积的存货也提高了每个农场的资本投入量。同时，平均的家庭规模在缩小。因此，在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宾夕法尼亚等地区，每个农场的劳动力投入也下降了。所以，资本—劳动比率以及已清除土地—劳动的比率都上升了。由于每个工人的投入增加，我们希望每个工人的产出扩大。

事实上，证据揭示了每个农场的产出确实增加了（Ball and Walton，1976）。不仅是农场生产了更多的牲畜和粮食（主要是小麦、小麦及黑麦的混合粉），而且到了殖民地晚期，一部分农业劳动时间转向了非农业生产（包括碾磨、锻造、橱柜制作、椅子制作以及鞣革），这部分时间的比例虽然很小但不断增加。总的来

说，每个农场的平均产出在18世纪的第1个和第3个25年里增加了约7%。当将总产出的增加和总投入的变化进行比较时[①]，似乎在这些年里总生产率提高大约10%。以变化率来衡量，总生产率每年提高0.1%～0.2%，最迅速的变化（0.3%）发生在18世纪的最初数十年。最后，每个工人的产出增长率（大约年均0.2%～0.3%）在18世纪的前3/4的时间里稍微高点。[②]

几乎没有关于这些进展的确切的具体证据，不过，历史记载证实了对这种进展的低估。例如，在比德韦尔和福尔克纳经典的农业研究中，他们断言在切萨皮克湾北部的殖民地上，“18世纪的农民在照料牲畜上并没有比第一批殖民者进步的地方”，而且“如果农具上有任何改进，那也是直到18世纪即将结束时才有”[③]。另一项关于宾夕法尼亚农业的研究得出结论：“整个18世纪的经济条件不利于重大变化的产生，但刺激了一种适度稳定而且统一的混合耕作类型，这种类型涉及相当广泛地或者浅表地使用土地。”[④] 得出农民开始学会更有效地利用土地和农具的结论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无论从技术进步，还是从较大农场的规模经济来看，没有迹象表明存在投入的节约。然而，更有组织和更广泛的市场参与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导致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当根据之后时期的农业发展进行考察时，这些调查结果和结论也就不足为奇。比方说，罗伯特·高尔曼的调查指出，在整个19世纪，总生产率的提高大约为每年0.5%。[⑤] 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每单位土地、劳动及资本的合并产出以每年0.1%～0.2%的速度增长。在19世纪下半叶，生产力的增长速度上升到0.8%。毫无疑问的是，较低速的19世纪上半叶——在过渡到畜力和提高的机械化之前——会更加使人联想到18世纪的经验。总之，农业进步在大部分殖民时期是零星的、有限的、低速的。

运输和分销中的生产力提高

尽管农业的生产力进步是缓慢而渐进的，但是装卸和运输货物的生产力却有大幅提高。这样的提高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运输及其他分销费用占了产品的最终

---

① 由于单位农场土地投入几乎不变，单位农场劳动投入下降、单位农场资本投入上升，所以每个农场总投入的变化受劳动和资本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投入数量的相对变化的影响。由于劳动力成本在总成本中占的比重较高，每个农场的总投入在18世纪中实际上是有一定比例的下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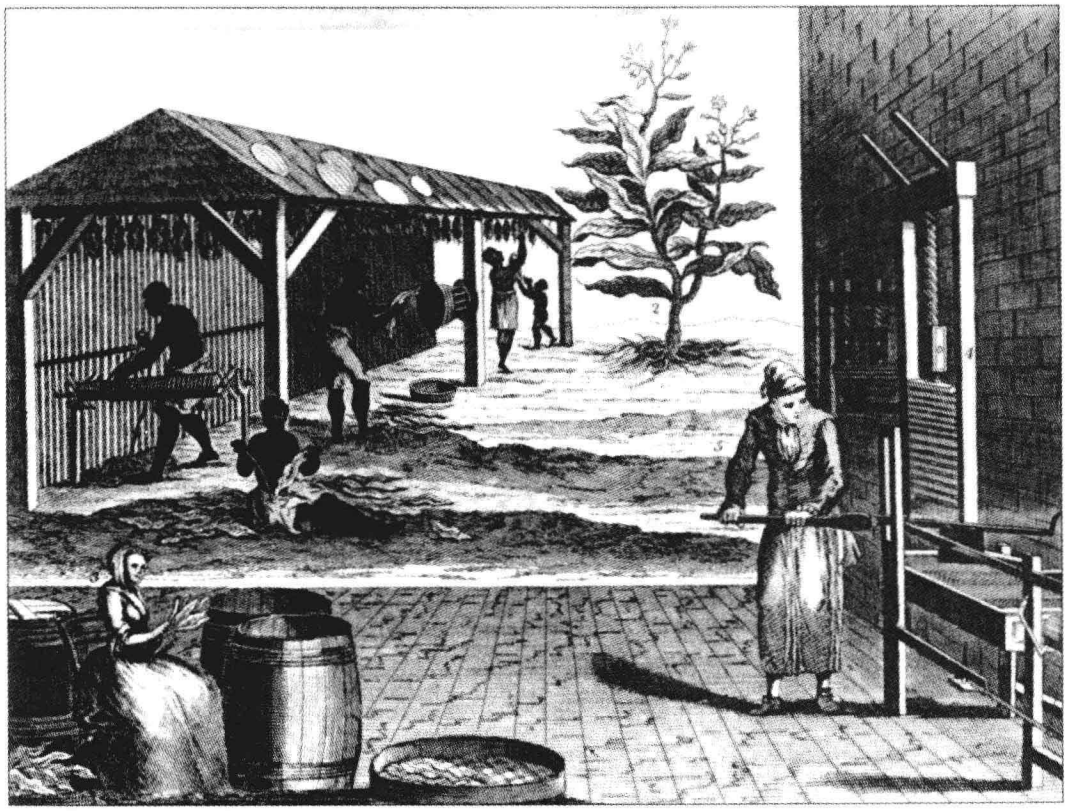
② 需要注意的是，劳动生产力（单位劳动者的产出）一般要比全生产力（综合要素投入的总产出）的增长率高，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单位劳动者的资本和已清除的土地的数量是增加的。其他要素投入的增加使得劳动力的产出更大。

③ P. W. Bidwell and J. I. Falconer,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620—186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5), 107, 123.

④ James T. Lemon, *Best Poor Man's Country: A Geographical Study of Early Southwestern Pennsylvani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2), 150 - 151.

⑤ See Robert E. Gallman, "Changes in Total U. S. Agricultur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46 (1972): 191 - 210; and Gallma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U. S.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eds.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35 - 76.

市场价格的大部分。这对于殖民地的大宗商品（相对于它们的重量或体积，商品的价值是很低的）尤其真实。例如，装卸和运输成本将使在马里兰和伦敦之间运输的一桶沥青的价值翻番。即使是昂贵的轻质商品的分销费用也占据了其价值的很大一部分。


© CORBIS

资本的增加和工作的专业化提高了殖民地烟草生产中每个工人的劳动生产力。

在18世纪，运往殖民地的制造业商品在英国和殖民地的价格差异以一个很稳定的速度在下降。在18世纪的最初几十年，英国商品在殖民地的销售价格比在英国的销售价格高80%～140%并不少见。到18世纪中期，英国商品在殖民地的销售价格要高45%～75%。最后，就在革命爆发前，这个价差已减少到只有15%～25%的范围。不过，迟至18世纪70年代，类似于沥青、柏油、木材、大米及其他占空间的殖民地主要出口产品在正规的英国和欧洲市场的要价仍然是其在国内售价的两倍。

表5—1显示了跨大西洋烟草运输中营销和分销有改善的证据。阿姆斯特丹和殖民地之间烟草的平均价格差（以阿姆斯特丹价格的一个百分比的形式给出）下降了。[①]跨大西洋烟草分销的一系列进步源于包装和销售规划的改进，源于有

① 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Shipping, Maritime Trad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lonial North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60.

关价格及市场信息的成本下降，还源于贸易风险的减少。然而，目前最重要的改进是在航运上。尽管运费率根据运输路线波动，而且在战争和和平时期之间也会有所不同，但是运费率的长期趋势是持续下降的。在革命之前的 100 年里，实际的航运费用几乎下降了一半。以生产力来表示，航运业以每年约 0.8%的速度增长。对于那个时代——特别是和农业的变化相比较——这些增长表明，航运业是整体推进殖民地经济的战略因素。

表 5—1 $\frac{\text{欧洲价格—美洲价格}}{\text{欧洲价格}} \times 100\%$

年份	比例（%）
1720—1724	82
1725—1729	76
1730—1734	82
1735—1739	77
1740—1744	77
1745—1749	76
1750—1754	67
1755—1759	72
1760—1764	70
1765—1769	65
1770—1774	51

航运业生产力变化的源泉

是什么引起了生产力的这些进步？当行业得到了很好组织及具有相当大且安全的市场，航运业的规模经济通常可以实现。例如，在波罗的海的木材行业中，较大的船的使用产生了运送每吨货物所需的劳动力节余。尽管较大的船需要较多的船员，但是增加的货运能力不仅仅弥补额外的劳动成本。随着船的大小的增加，它们单位劳动的货运能力也增加了。换句话说，运输给定体积的货物，更大的船所需的劳动力更少。

尽管有这些可能性，但是在大西洋西海域和加勒比地区所用船只的平均大小在这 100 年里并没有显著增加。规模较大的船舶潜在的劳动节余被这些水域的低利用率抵消了。事实上，在大量小且分散的市场中，大船的在港时间通常为小船在港时间的两倍。因此，在殖民地的水域，纵帆船（schooner）和小帆船

(sloop) 一般平均每吨运行的里程要大于大型船舶和双桅横帆船 (brig)。尽管如此，每人的吨数却增加了，这是因为减少了船员数量而船的大小没变。例如，在18世纪早期，一艘50吨的波士顿船平均雇用7个人，但是到殖民时期末，同样的一艘船只需要5个船员。在同一时间跨度内，一艘有代表性的50吨的纽约船只的船员人数从11个减至7个。与劳动力减少相类似的是在殖民地水域交易的船上武器的减少或消除。17世纪，枪支在大西洋西海域从事贸易的船只上司空见惯，但是到殖民时期结束时，大炮已经从所有的船只上消失。

尽管船只的平均使用寿命在这个时期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保险费率却由于航海业中风险的下降而降低了。与早些时候相比，到1720年，大多数单程的跨大西洋通道的保险费率达到和平时期最低的保险费率水平，即2%。当然，在海盗经常出没的海域中航行的保险费率则是另一码事。例如，在纽约和牙买加之间，1720年盛行的5%的保险费率在18世纪70年代已经跌至4%。从新英格兰到西印度群岛的不同小岛的航线上的和平时期保险费率在1700—1775年间下降了一半。

更快的航行速度并不是提高生产力的积极力量。如图5—2所示，在此期间，从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开往西印度群岛并返航的船只并没有表明在行程的任一段的速度上有提高。尽管如此，往返航行时间却在1700—1775年间减少了。如图5—3所示，除波士顿外，在新大陆的许多重要港口的停留时间都显著减少了。因为一艘航船使用年限的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港口上，所以这样的下降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例如，在切萨皮克的贸易中，船只在17世纪的在港时间比它在18世纪60年代的在港时间的2倍还要长。导致这个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苏格兰代理人（苏格兰商业公司的代表）1707年以后在切萨皮克湾地区的引进。毫无疑问，他们为了快速装载而对谷仓和仓库里的烟草作物进行收集并编制清单，这显著缩短了船只在切萨皮克湾的在港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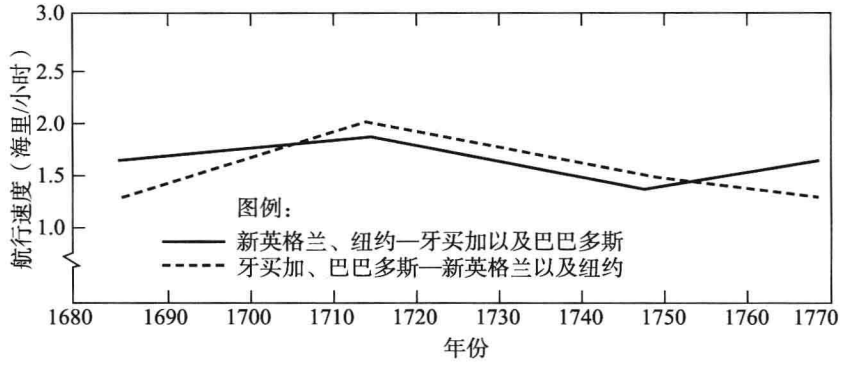


图5—2　平均航行速度

资料来源：Gary M. Walton,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merican Colonial Shipp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 (April 1967): 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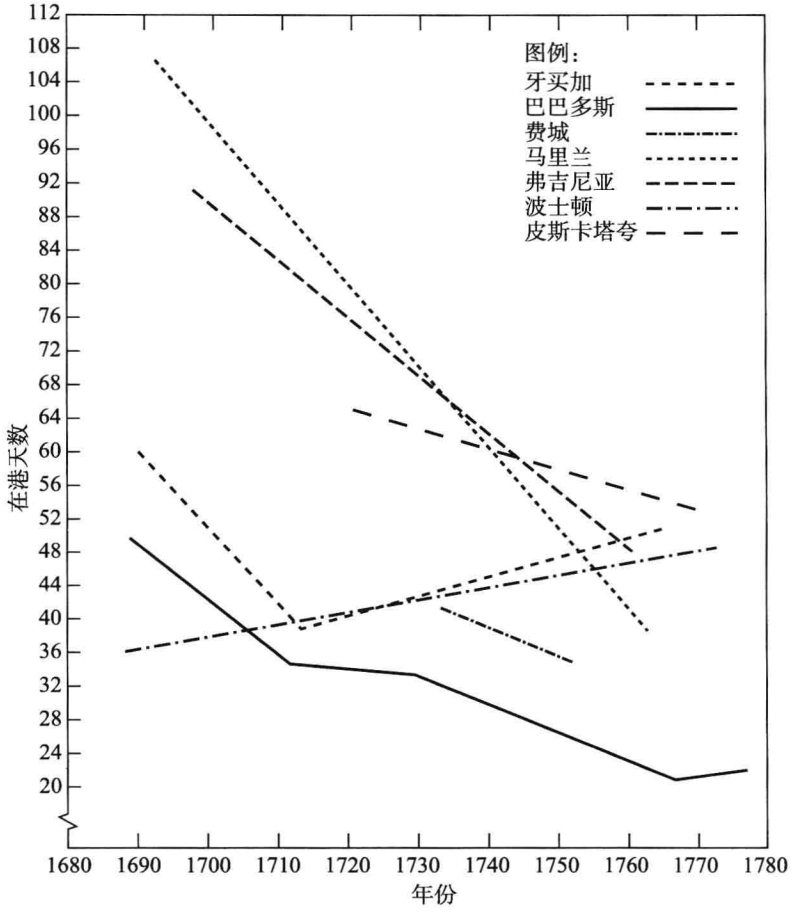


图 5—3　平均在港停靠时间

资料来源：Gary M. Walton, "Sources of Productivity Change in American Colonial Shipping,"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 (April 1967): 75.

类似的，在这一时期船只在巴巴多斯的在港时间下降了一半。在殖民时代早期，由于交易难以进行，所以在港时间非常长。许多分散的市场既小又远，且不同的岛屿之间价格不同，甚至在同一岛屿上都不同。代表商人利益的船长可能要在一次航行中去好几个小岛从而为他的货物寻找最佳的市场。谈判价格和确定交易媒介的困难，以及可能需要解决过去的债务，都可能会延长交易时间。通常会实行物物交换，即使在使用货币的时候，货物的价格仍难以确定，因为不同的货币和汇票（有不同程度的风险）未被给予规定的价值。最后，收集货物的问题延长了在港时间，特别是在收成不好的时候。[①] 随着更加系统的市场经济以及其他制度变迁，在加勒比地区的长期逗留变得较不普遍。

① 正如第 4 章中所讨论的，其中的许多因素也解释了殖民者在对英特别贸易航线中的航运业采用往返贸易的线路占优势的原因。

视角 5.1

印第安文化中的马和制度变迁

像一项发明一样，在 1601—1740 年间，马（最初由 16 世纪的西班牙人引入）的向北扩散给北美印第安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这对于生活在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尤其真实。在有马之前，他们是半游牧的，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中，他们居住在泥制的公共小屋里，种植豆子、南瓜和玉米。他们在夏季和秋季步行迁徙，用狗拖圆锥形帐篷，追逐并猎杀野牛，从而为他们的饮食增加些肉。

徒步以及和狗一起走，天气很好时一天的行程大约为 5 英里。在冬季，一些猎人成功地追踪野牛；天气好时，较大的猎人队伍使用包围策略包围小的兽群并用弓箭射杀它们。如果地形合适，他们会使用“行人驱赶”（pedestrian drive）的方式将兽群赶到陷阱中或赶下悬崖。

马的最直接的影响是降低了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所从事的农活的数量。这改变了他们的饮食习惯，导致了大规模屠宰动物和几乎不食用畜类骨架上的肉——所谓的“轻屠宰”（light butchering）。

狩猎团体从以前的每天 5 英里到骑马能走 20 英里。一个季度的狩猎范围不再是 50 英里，他们很快能够将狩猎范围扩展至 500 英里。狩猎团体的规模也在变小且更加独立，这是由于需要较少的公共计划（communal schemes，一种保险）：待在固定地点的泥制的公共小屋里的时间更少了，马力使得用狗拉的旧式雪橇（无轮车）才能拖动的更大的圆锥形帐篷的移动成为可能。

牧草和水源变得更加重要了，从而加剧了营地选择的问题。在马被引入之前，部族间的战争是罕见的；随后，部族间的联盟很少，而战争却很频繁。

最后，如土地对于欧洲人，马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来说也成了财富和威望的象征。它是个人财产（包括可继承、可交易、可使用及排他性使用的权利）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在平原上，马所带来的制度变化是如此大，以至于拥有的马匹数量通常意味着生存、饥饿和征服的区别。（详细说明请参见 Anderson，1999。）

注意到不断减少的在港时间产生的节约不仅是资本上的节约，而且还有劳动力成本的节约，因为当船只在外国港口停靠时，全体船员习惯上由船主负责食宿并支付工钱。这种节约足以抵消成本上涨的其他来源。尽管工资和船舶维修费在此期间仍然相当稳定，但是造船和粮食获取（为全体船员获取食物）的成本却增加了。不过，总体来说，生产率的提高抵消了成本的增加，而且货运成本在 1675—1775 年间减少了一半。

技术进步和生产力

现代经济增长最有力的引擎就是技术进步，它使产出相对于投入更快地增

加。但是与19世纪的技术进步相比，殖民时期的技术进步仍然是次要和零星的。这一时期先于轧棉机、蒸汽动力和许多冶金上的进展（这些极大地增加了工人可用的工具）的时代。即使是在铁的生产业中，我们从保罗·帕斯克夫那里得知，干中学仍然是殖民时期后期节省劳动力和燃料的主要来源。在革命之前的十年里，人均产铁量几乎增加了50%，同时，每吨铁所用的木炭的数量也减少了一半。学会将燃料投入降至最低水平节省了收集木炭和锻铁所需的劳动力。不过，技术始终未变且炼炉大小始终如一。农业中的证据也表明技术没有明显的飞跃。

© BETTMANN/CORBIS

1720年之前，西大西洋、加勒比和其他地区的海盗活动十分猖獗。皇家海军对消除海盗活动的长期影响包括：改变了船只的属性和降低了海洋运输的费率。

在航运业方面，有同样的结论。在铁壳轮船和蒸汽船出现前的时期，轮船的材料和动力仍然未变化。即使船帆和桅杆日益复杂和船体形状已改变，也未能提高船速，无论如何不能表现知识的根本进步。

当然，可能有人认为全体船员的减少是源于知识的进步。不过，在17世纪早期，荷兰船只早已展示了船只在设计、人员配备及其他投入要求方面的许多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在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大西洋西海域的最先进的船上可以找到。事实上，该时代在航运业上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大约在1595年就已经发生，那时荷兰最先使用了快艇，这是一种专门为运输大宗商品设计的商船。相对于其宽度，这种快艇格外的长，有个平坦的底端，且造得很轻（武器、炮座和加强木板

都被除去）。此外，它的船桅很简单，所需的全部船员也很少。相反，为满足防御和商业的双重目的，英国人和殖民地的船都被建得很重，装有枪炮且载人更多。他们所建造船只的结实的构造和军备是昂贵的——不仅体现在材料上，也体现在人力上。更多的船员被用于操作这些船上更为复杂的船桅装置以及枪支。

新观点

来自历史的当代议题和教训：海盗和恐怖主义

当恐怖分子于2001年9月11日早上劫持了来自波士顿的洛根机场（Logan Airport）的飞机并撞向纽约世贸中心的双子塔以及华盛顿的五角大楼时，美国的商业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估计达到300亿～500亿美元，但是除了这些第一轮损失，还有不断增加的阻止其他恐怖行动的成本。美国的6 000多架商用飞机，曾运送近7亿人次，每年起飞1 100万次，如今每次起飞之前必须接受严格的审查。检查旅客和行李的联邦检查站增加了每位旅客旅行的时间成本。联邦雇员、排爆犬和空中安全警卫官进一步增加了航空旅行的费用，国内国际旅行的费用都增加了。2002年《国土安全法案》（Homeland Security Act of 2002）创造了一个情报和执行的联邦兼并，它进一步增加了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成本。这的确像一场战争。

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是不同的，但是它们的影响以及清除它们的好处是相似的。不过，海盗行为和恐怖主义对贸易和商业生活的影响惊人地相似。当英国皇家海军在18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清除了大西洋西海域和加勒比地区的海盗活动之后，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成本下降了。大炮、船员规模、船舶建造成本、保险费等等都下降了。由于恐怖主义，保护和备战等类型的成本再次上升，尽管是以不同的具体形式表现出来。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世界由于恐怖主义正变得更不安全和更不富裕的时代，这和近300年前海盗横行的时代是一样的。当（或如果）恐怖主义平息且商业生活变得更加安全时，贸易和财富会像海盗活动灭迹的时代一样增长。

在海盗威胁比较小的海域，快艇在特定大宗贸易中能方便地被使用，这点很快就得到证明。不过，在进入地中海和西印度群岛高利润而危险的贸易时，就需要更昂贵的船了。一般来说，在所有殖民地水域的高风险导致了17世纪航运业的最显著特征之一，即大炮和武器在商船上的广泛使用。这些特征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仍可在特定水域观察到。直到1750年左右，在加勒比地区（特别是牙买加附近）重量超过100吨的船只几乎都有武器装备，即使是很小的船只通常也会携带一些枪支。

对自我保护的需要在加勒比地区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里，海洋被很多提供安全停泊和避难的小岛打破，上面有木头、淡水甚

至可带走的补给品。在那里，欧洲列强的殖民地聚集，彼此之间只要航行几天即可到达，但是它们老是被卷入当前的欧洲战争，而这给它们当中的强者提供了掠夺弱者的理由，似乎使这些海域上不断的动乱显得合情合理。在那里，贸易利润很高，但是殖民稀疏且防御困难。那里是为了缓解旧大陆的社会压力，懒人、罪犯和赤贫者被流放的地方。所有这些条件促进了海盗行为，而且海盗行为毁灭性地猖獗了两个世纪，在一定程度上海盗行为是个人致富的一个简便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海盗行为是可实施的政治的一个工具。①

私掠（privateering）也加剧了动乱。作为一种普遍的做法，民族国家经常给公民个人骚扰敌对国家的船只许可证。这些私掠授权或“捕虏敌国商船之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在战争时期无限制地颁发，而且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它们也会偶尔被授予公民，这些公民因来自侵略国的臣民的行为而遭受损失。因为私掠者经常忽视授权的限制，因此私掠者通常很难和普通的海盗行为相区分。

其他的政府政策也倾向于加剧现有的海洋公害。为了增加私掠者和海盗的数量，一些岛屿被蓄意安置了流放的罪犯。甚至到了 1718 年，牙买加的总督还在抱怨这项政策：

> 经在前几届会议中通过的《议会法案》（An Act of Parliament）的激励，最近有几个人从英格兰的监狱里被送出来……这些人远没有改变其邪恶做法和生活方式，也没法成为对我们有益的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经走了，并诱导其他人和他们一起当海盗，他们鼓励别人离开其主人并投奔在古巴的西班牙人。剩余的为数不多的人仍然被证明是邪恶的懒人。所以，我衷心祝愿这个国家不会因更多的这种人而陷入困境。②

早在 1700 年，弗吉尼亚的上校夸里（Colonel Quary of Virginia）就在给贸易和种植园委员会（Council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的信中写到，“美国所有的消息是，海盗不仅蜂拥至这些海岸，而且遍布所有西印度群岛，这对贸易的破坏比战争还要严重十倍。”③ 当然，海盗活动并不仅限于加勒比地区。海盗安全地潜藏在北卡罗来纳的入口处，在那里，他们经常抢劫在查尔斯顿进行贸易的船只。在 1718 年，有人惊呼，“每个月都会带来新暴行的情报，船只在公海遭到洗劫，他们的货物被烧掉，船员被抓走并受到不法分子的恶毒虐待。”④ 卡罗来纳当地的商人、承运商和政府官员反复请求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给予保护。在绝望中，北卡罗来纳议会在 1719 年拨出专用资金以支持私人船只，希望将海盗驱赶出他们的海域。这些请求和保护措施大多是徒劳的，但最后，由于确保贸易航道安全的好处相对大于消除海盗行为的成本，所以英国皇家海军采取行动。

---

① Violet Barbour, “Privateers and Pirates in the West Indi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6 (1911): 529.

② Letters to the Board of Trade (September 1, 1718, C. O. 137: 13, 19), printed in Frank W. Pitma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Indies, 1700—1763*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17), 55 - 56.

③ Barbour, “Privateers and Pirates,” 556.

④ S. C. Hughson, “The Carolina Pirates and Colonial Commerc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Studies in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12 (1894): 123.

到18世纪40年代早期，大西洋西海域的海盗已被消除。

与海盗活动的减少并联的是船上武器的消除以及船员规模的缩小。就其本身而论，这是个技术扩散的过程。没有了海盗活动，类似快艇的专门货船被设计出来，从而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

如果当今世界成功地消除或大大减少了恐怖主义，那么18世纪英国皇家海军清除大西洋西海域和加勒比海上的海盗活动的经验教训能够提供对未来的深刻见解。不断下降的运送人员和商品成本以及不断上升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性将加强贸易并促进收入和财富的增长。这种不断改进的制度框架的潜力再次提醒我们经济增长的无数源泉以及经济推理命题4的重要性。

总之，在殖民时期，航运业中主要的生产力进步源于与市场发展有关的制度变迁，这导致：(1) 货物装卸的规模经济，从而减少了船只的在港时间；(2) 海盗活动（它是技术扩散的障碍）的消除，从而允许使用专门的低成本货船。[①]

对早期增长率的思索

正如乔治·泰勒（George Taylor）所提议的，生产力进步的所有这些衡量标准表明，虽然殖民地的物质财富的标准有所提高，但它的速度是缓慢且不规则的。不过，这些衡量标准并不支持他说的1710—1775年的人均实际收入每年增长1%的论断（回忆经济推理命题5）。在具有快速的技术变化和对教育的普遍投资以产生高度熟练和适应性的劳动力的现代之前，经济增长的有效源泉非常有限。这一点已在分析生产力进步的源泉时揭示了，强调干中学、如有可能则适应并利用规模经济以及传播现有技术的重要性。

财产持有额

更多的证据以已故殖民者的查验遗嘱上的财产持有额为基础，也描绘了1630—1775年整个期间里缓慢且不规则的经济增长率。人均财产包括土地、建筑物、物质财产、货币、应收款项减去所欠债务，还通常包括奴隶和契约奴。艾伦·库利科夫对18世纪马里兰的财产持有额的分析表明长期的经济增长率为年

① 其他类似的生产力进步至少在这里值得简单说明。由于港口停靠时间的下降，存货的时间也下降了。这减少了种植园主的资产（作物）在仓房和仓库闲置的时间。存货时间的下降也节省了殖民地的资本。类似的，风险和保险费率的下降也降低了船只的被保险人或者承担风险的私人船主的成本。同时，由于装烟草和糖的大木桶、装大米的桶以及其他的容器都变大了，包装方面也发生了显著的进步。尽管建造更大的桶需要更多的投入，但是它们的承载能力提高的幅度相对更大，这是因为这些容器的表面积相对于其体积增加得要少。注意到这点（处理上不断增加的困难补偿了使用大容器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干中学、试错过程的绝佳例子。

均0.4%。[①] 他的证据展示了对比鲜明的时期：在18世纪的第一个25年里，略有下降；在第二个25年里，较突然地下降；在第三个25年里，非常强劲地提高。回顾种植烟草的殖民地从1630年至1670年的生产力强劲增长期，但在17世纪后期则很少或没有变化，看来在上南部地区，人均福祉的大部分增长把无增长（或可能是下降）的长期也包括在内了。特里·安德森对新英格兰的研究也显示人均财产持有额在1650—1680年间有非常强劲的增长，然后直至1710年都很少增长。1650—1710年的趋势是异常高，可能年均增长率达1.6%。

由格洛里亚和杰克逊·梅因提供的关于1640—1774年新英格兰南部的最近证据如表5—2所示。平均每个男性的总财产的增长表明这个地区年均收入增长的趋势是0.35%。不过，请注意，1638—1654年期间突然高涨，直到世纪之交相对停滞，然后是另一个20年的突然高涨，接着是另一个20年的相对停滞时期。这项证据进一步支持了各个地区之间在它们的增长阶段的时间选择上有很不相同的观点。但是，在很长的时期内，各区域的趋势增长率很可能非常相似。

表5—2　　1638—1774年新英格兰南部男性的人均遗产（英镑）

年份	总财富
1638—1654	227.3
1655—1674	251.9
1675—1694	263.5
1695—1714	248.9
1715—1734	272.4
1735—1754	275.8
1765—1774	364.7

注：仅包括男性的资产；根据年龄和地区加权。1755—1764年的资产并未纳入表中，这是因为地区权重的样本不完整。

如下结论看似合理：在殖民时期的最后100～150年，增长率趋势略低于每年0.5%。基于从所有殖民地遗嘱查验财产的样本中收集的财产证据，艾丽斯·汉森·琼斯得出结论：

> 尽管在1650年之后的一些分时段中可能有地方或区域性的高涨或滞后，甚至是衰退，但看来，对所有合并地区，相当稳定的密集增长伴随着新大陆不断积累的经验、干中学、不断增加的在大西洋共同体内航运的诀窍，以及随人口和贸易的增长而来的市场规模的扩大。[②]

按照她的计算，琼斯提出了三个不同时期的增长率：1650—1725年，0.3%；1725—1750年，0.4%；1750—1775年，0.5%。[③] 虽然她的数字所隐含

① 死去的人的财富实质上超过了人均财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在死后留下了写入遗嘱的财产。尽管如此，如果财富分配在这一时期并没有急剧变化，遗嘱上的财产的变化趋势可能就反映了人均占有财产的变化趋势。此外，如果产出（或收入）与非人力财富（资本）保持一个相对固定的比例，人均财富的变化趋势可能就反映了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

②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305.

③ Ibid., 78.

的增长加速可能会受到质疑，但是考虑到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改进以及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英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估计为0.3%，她的数据范围似乎是合理的。[①]

1774年人均财富和收入

反思第一个定居点的痛苦经历，如在罗厄诺克岛的“失去的殖民地”和早期詹姆斯敦的“饥饿的年代”，与革命前夕的殖民地生活的经济条件形成鲜明对比。1776年在遥远的苏格兰，亚当·斯密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宣称：

> 没有哪个殖民地的进步能比英国的北美殖民地快。大量的优质土地以及用自己的方式管理自己事务的自由似乎是英属北美殖民地繁荣的两大原因。

殖民地的同时代人也支持上述观点。早在1663年，波士顿的牧师约翰·希金森就观察到，“我们的生活方式比以往任何时候我们所能想到的更加丰富、舒适。”到18世纪40年代，本杰明·富兰克林评论道，“开辟新殖民地最初的苦差事，将人们的注意力限制在纯粹的必需品上，但现在已相当不错了；而且在每个地方在这种情况下都有很多财物使他们安心。”[②] 事实上，按照大多数标准的比较，到殖民时期结束，自由的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物质财富水平出奇地高。他们比当时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活得更长、生活得更好，而且比今天世界各地的大多数人都要好。

收入与财富的分配

正如经济透视5.1和表5—3、表5—4所说明的，殖民地美国人高水平的物质财富在区域之间不是平均分配的。迄今为止最富有的地区是南部，那里自由人的人均财富和收入远远高于在中部殖民地和新英格兰的水平。

来自当时的遗嘱检验记录的证据也允许我们估计个人之间的财富分配。人们普遍认为，直到19世纪早期工业化开始，北美殖民地的收入和财富分配是相当公平的。但是，表5—5的估计（这包括持有的奴隶和契约奴）表明，财富和收入的普遍不平等现象之前就已存在。例如，所有新英格兰人中最富有的20%拥有当地总财富的66%。在中部殖民地，最有钱的20%占有总财富的53%。在南

---

① See Phyllis Deane and W. A. Cole, *British Economic Growth, 1688—1959: Trends and Structur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4), 80.

② Stuart Bruchey, ed., *The Colonial Merchant: Sources and Reading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1.

部，最有钱的20%占有总财富的70%。总之，南部殖民地的财富分配最集中，而中部殖民地的财富集中程度最低。南部财富集中程度较高主要是由于那些占主导地位的富有的种植园享有生产的规模经济优势。奴隶制也增加了南部殖民地财富的高度集中，但请注意新英格兰的财富集中程度几乎一样高，且财富不平等程度在港口城市特别严重。同样值得重视的是，与加勒比的产糖岛以及整个巴西和西属美洲殖民地令人目瞪口呆的财富不平等相比，这些数字所反映的不平等程度是次要的。

归功于杰克逊·梅因和詹姆斯·亨莱塔开创性的努力成果，我们得知财富和收入分配的日益不平等伴随着殖民地拓居和经济成熟的过程本身。随着开发的进行，边疆地区被改造成极少专业化或分工的自给自足的农业区域，然后改造成为商业化农业区域，最后，在某些情况下被改造成市区。在梅因看来，这种不断增加的商业化导致殖民地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更加不平等。①

詹姆斯·亨莱塔和布鲁斯·D·丹尼尔斯的其他研究也表明殖民地的财富分配在区域内的不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长。② 通过比较两张波士顿的税收清单，亨莱塔发现，在1687年，波士顿前10%的纳税人拥有当地总财富的42%，而他们在1771年拥有57%。③ 丹尼尔斯调查了大量新英格兰的遗嘱记录，因此，能够初步确认梅因的论点，即随着经济活动在殖民地变得更复杂，它往往导致财富的更加集中。显然，随着自给生产让位给市场生产，殖民地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赖导致了（或者至少是伴随着）更大的贫富差距。这在以前和最近定居的农业地区都是如此。另外，在整个18世纪直到1776年，在类似于波士顿和哈特福德等已建立的大面积的城市区域中，财富分配显示出相当稳定。这些城市中心也反映了殖民地财富不平等的最大限度。小城镇表现出较少的不平等，但随着城镇的成长，其分配不均也在增加。

特别高的富裕水平可在港口城镇和城市中观察到，在那里商人阶层正在形成并获得经济控制。特别有影响力的是商业船东，他们从事进出口贸易并被认为是社会的上层阶级。此外，城市化和工业化产生了另一个阶级群体：拥有很少财产或没有财产的自由劳动力。

大约1/3的自由人口几乎没有资产（根据遗产记录和税收名单），但是正像杰克逊·梅因所认为且被玛丽·施韦策的研究工作所支持的，这些人不是自由穷人的永久下层阶层。这些人大多是20多岁的年轻人，仍然依赖父母或亲属。通过赠予、储蓄和其他来源，婚姻通常使家庭财富立即增至三倍。没有向更高收入水平流动的证据，我们无法辨别人们沿着经济阶梯向上流动从而摆脱贫困陷阱的频繁程度（正如在第1章中所示）。由于殖民地土地的可获性以及不太严格的社会限制，我们的推测是殖民地的自由人比旧大陆的人有着更高的“阶级流动性”。

---

① Jackson T. Ma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Americ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② James Henrett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Colonial Bost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2 (1965): 93 - 105; and Bruce D. Daniels, "Long-Range Trends of Wealth Distrib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1973—1974): 123 - 135.

③ 亨莱塔1771年的估计结果被杰拉德·沃登（他发现亨莱塔研究所基于的对税收清单中的财产的估计值存在历史上的不一致性）修订并下降至48%。这一调整实际上修改了波士顿分配不均快速扩大的结论，但是并没有推翻财富分配不均的结论。

不仅职业、婚姻和财产所有权，还有出生环境都极大地影响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种族和性别是主要因素。一些妇女很富裕，但是她们拥有的财富通常要比男人少得多，且极少有土地。1675年之后奴隶劳动力的增加也推动了殖民财富不均的整体上升。

在整个殖民时期直到1775年，在大部分的殖民时期中，财富的日益集中总体上来说没有在13个殖民地的自由白人之间发生。尽管在特定地点和区域内会发生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但这并没有在总体上发生。这是因为财富集中程度较低的区域，农村，特别是新的边疆地区，容纳了超过90%的人口。这些地区的发展和城市地区一样快，甚至更快，因此抵消了城市中心不平等的温和增长。[①] 作为一个额外的统计上的疑异（statistical oddity），尽管每个地区内农村的财富持有额（每个自由人）要少于城市的财富持有额，但是作为总体，农村的财富持有额平均多于城市持有额。这种逆转的发生是因为南部殖民地每个自由人都有非常高的财富持有额，且实际上超过了北部城市居民的平均财富持有额。不管怎样，尽管集合了这些特性，但是，早在工业化时代和在19世纪发生的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前，大量的财富不平等就已经是经济生活中的事实了。自由的美国人之间没有日益扩大的贫富不均意味着其中的近180万人广泛分享了人均财富和收入的增长。在革命前夕，他们的幸福感以及对经济前景的判断无疑是积极的。英国的干涉和不断变化的税率政策是一个强大的年轻新兴国家愿意并能够克服的威胁。

经济透视5.1

☞

1774年人均收入的估计

之前报告的决定性结论能被接受的数量基础也来自艾丽斯·琼斯的研究工作。她对1774年财富的估计列在表5—3中。这些都是不同地区人均非人力财富（nonhuman physical wealth，不包括金融债务、奴隶和契约合同）以及自由人人均非人力财富持有额。表5—4中的人均收入和自由人人均收入是根据资本—产出比利用表5—3的财富数据估算出来的。从财富持有额估计出的实际收入将取决于当时的资本—产出比率，但是所用的比率（3∶1，3.5∶1和4∶1）范围可能包括了1774年获得的真实收入。

表5—3　　1774年私人的非人力物质财富（英镑）

地区	人均	自由人人均
新英格兰	36.4	38.0
中部殖民地	40.2	44.1

① 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Peter H.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21-31.

续前表

地区	人均	自由人人均
南部殖民地	36.4	61.6
13 个殖民地	37.4	48.4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54, 58.

表 5—4　　1774 年地区收入的估计（英镑）

	资本产出比					
	人均			自由人人均		
地区	(3∶1)	(3.5∶1)	(4∶1)	(3∶1)	(3.5∶1)	(4∶1)
新英格兰	12.1	10.4	9.1	12.7	10.9	9.5
中部殖民地	13.4	11.5	10.0	14.7	12.6	11.0
南部殖民地	12.1	10.4	9.1	20.5	17.6	15.4
13 个殖民地	12.5	10.7	9.4	16.1	13.8	12.1

注：这些自由人口人均收入的估计源自艾丽斯·汉森·琼斯对财富的估计，艾丽斯·汉森·琼斯假设资本收入比为 3.5∶1，这里采用了另外两个资本收入比的假设（3∶1 和 4∶1）以拓展分析。这提醒我们这些收入估计值仅仅是近似的。通过将财富估计除以资本产出比，财富存量可以转换成收入流量，但是资本和产出的关系（资本产出比）受很多因素影响，且因时间、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尽管如此，在和平时期，资本产出比很少低于 3 或高于 5。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lice Hanson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63.

使用 3.5∶1 的资本—产出比率产生了 1774 年每个自由人的收入估计为 13.8 英镑，或者当比率为 4∶1 时，估计值为 12.1 英镑。以 2000 年的价格计算，这些估计数大约为 1 500 美元和 1 300 美元，还不到美国官方贫困线的一半，但很显然，商品范围、其他生活条件以及估计中的误差使得任何这样的比较都很粗糙。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猜测，自由的殖民者享受着当时世界上令人惊讶的高生活标准。因为殖民地的税收要比英格兰少很多，所以殖民地自由人的税后收入在革命前夕可能要高于宗主国的人们。

表 5—5　1774 年总物质财富：资产规模及自由财产所有者的财产构成（英镑）

	所有殖民地	新英格兰	中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
平均值（英镑）	252.0	161.2	189.2	394.7
中位数（英镑）	108.7	74.4	152.5	144.5
分布（%）				
最低的 20%	0.8	1.0	1.2	0.7

续前表

	所有殖民地	新英格兰	中部殖民地	南部殖民地
最高的20%	67.3	65.9	52.7	69.6
构成（%）				
土地	53.0	71.4	60.5	45.9
奴隶和仆人	22.1	0.5	4.1	33.6
牲畜	9.2	7.5	11.3	8.8
个人消费品	6.7	11.2	8.4	5.1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lice Hanson Jones, *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2d ed., 3vols. (New York: Arno, 1978); presented in Edwin Perkins,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219.

即使在今天，也只有相对较少的几个国家的平均收入水平接近独立战争前夕美国自由人的收入。事实上，目前一半以上的世界人口所在国家的平均收入低于200多年前美国自由人的收入。这对“第三世界”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以及非洲和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相对而言，无论是以今天世界上很多地区的标准还是以18世纪末世界上最先进地区的标准，美国自由殖民者的生活都非常好。

©W. P. FIRTH ILLUSTRATION, PHOTO BY CHARLES PHELPS CUSHING/H. ARMSTRONG ROBERTS

这里描绘的城市财富与弗吉尼亚的第一批拓居者居住的笼屋形成鲜明对比。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nderson, Terry. *The Economic Growth of Seven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A Measurement of Regional Income* (New York: Arno, 1975).

——. "Economic Growth in Colonial New England: 'Statistical Renaissa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243 - 257.

Anderson, Terry, and Steven LaCombe.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Indian Horse Culture."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ed. Linda Barring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9).

Anderson, Terry, and Robert Paul Thomas. "White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Extensive Growth of the New England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634 - 661.

——. "Economic Growth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olon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368 - 387.

Ball, Duane, and Gary M. Walton.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Change in Eighteenth-Century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102 - 117.

Carr, Lois G., and Lorena S. Walsh. "Changing Life Styles in Colonial St. Mary's County." In *Economic Change in Chesapeake Colonies*, eds. G. Porter and W. Mulligan (Greenville: 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Center, 1978).

Daniels, Bruce. "Long Range Trends of Wealth Distribu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1973—1974): 123 - 135.

——.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olonial and Revolutionary Connecticut: An Overview."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7 (1980): 427 - 450.

Doerflinger, Thomas. *A Vigorous Spirit of Enterprise: Merchan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evolutionary Philadelphi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Egnal, Marc.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ntinental Colonies, 1720 to 1775."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2 (1975): 191 - 222.

Galenson, David, and Russell Menard. "Economics and Early American History." *Newberry Papers*, No. 77 - 4E. (Chicago, 1978).

Hanson, John 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1720 to 1775: A Critique."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7 (1980): 165 - 172.

Jones, Alice H. *American Colonial Wealth: Documents and Methods*, 3 vols. (New York: Arno, 1978.)

——.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The American Colonies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Jones, Douglas L. "The Strolling Poor: Transiency in Eighteenth-Century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975): 28 - 54.

Kulikoff, Allan.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ighteenth-Century Chesapeake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275 - 288.

——. *Tobacco and Slaves: The Development of Southern Cultures in the Chesapeake, 1680—180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6).

Maddison, Angus. "A Comparison of Levels of GDP per Capita i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1700—19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27 - 41.

Main, Gloria. *Tobacco Colony: Life in Early Marylan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

——.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Colonial Massachuset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101 - 108.

Main, Gloria, and Jackson T. Main.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in Southern New England, 1640—177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27 - 46.

Main, Jackson T. "Standard of Living and Life Cycle in Colonial Connecticu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159 - 165.

McCusker, John J., and Russell R. Menard. Chapters 3 and 12 in *The Economy of British America, 1607—178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5).

Paskoff, Paul. "Labor Productivity and Managerial Efficiency against a Static Technology: The Pennsylvania Iron Industry, 1750—18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129 - 135.

Pencak, William.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evolutionary Boston: Evidence from the Great Fire of 176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979): 267 - 278.

Perkins, Edwin. "The Material Lives of Laboring Philadelphians, 1750 to 1800."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38 (1981): 163 - 202.

——. Chapter 1 in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Schweitzer, Mary. *Custom and Contract: Household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in Colonial Pennsylvan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Smith, Billy G. "Inequality in Late Colonial Philadelphia: A Note on Its Nature and Growth."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41 (1984): 629 - 645.

Walsh, Lorena S. "Urban Amenities and Rural Sufficiency: Living Standards and Consumer Behavior in the Colonial Chesapeake, 1643—177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109 - 117.

第 6 章　三次危机和走向反抗

本章主题

在法英北美殖民地争夺战（也称为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结束时，当法国作为在北美的敌对力量被淘汰时，英国的大陆殖民地却处在另一波经济增长及日益繁荣的边缘。根据英国殖民惯例，殖民者仍然是英国市民，他们享有国王的臣民根据英国法律享有的所有权利。由于财政、行政和政治的原因，英国皇室和议会在 1763 年开始了“新秩序”（经济推理命题 4）。来自英国的政策失误、管理不善和时机不当为引导独立进程的经济环境增添了政治意愿。革命就是其结果。

旧殖民政策

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并与英国的法律和制度一致，殖民地政府仿照英国的政府组织。尽管最初有公司殖民地（康涅狄格和罗得岛）和私有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和马里兰），但大多数殖民地最终都成了英国直辖殖民地，且全部都有相

似的治理组织。例如，在1625年之后，弗吉尼亚是一个典型的英国直辖殖民地，它的总督和委员会（上议院）都是由皇室任命。但是只有下议院可进行财政立法，且该机构是由在殖民地内的有财产的成年男性选举出来的。

尽管总督和皇室可以否决所有法律，但是随着殖民地的立法机构不断地模仿英国的下议院，权力逐渐转移到下议院。因为殖民者控制了下议院——因此控制了财政大权——从而殖民地产生了政治自由和独立的气候。普遍被认为是代表帝国的意志且有权否决违背英国利益的立法的总督，往往不仅同情殖民者，而且还依赖立法机关保证他们（经常被拖欠）的薪水。因此，殖民地内政的实际控制权通常取决于殖民者自己——通过他们的代表。

当然，允许这种情况存在的权力在英国，且当地自治的程度是受到官方限制的。在1690年英国的权力由皇室转移到议会之后，枢密院（Privy Council）按照程序审查殖民地通过的所有法律。根据官方程序，殖民地的法律直到枢密院批准后才生效，而且枢密院有时会否决殖民地通过的立法。但是，时间、距离和官僚冷漠通常允许殖民地的法律和行动生效，然后才在英国审查；并且，如果殖民者非常希望那项被否决的立法获得通过，他们可以改写并重新提交该立法。

总之，英国指令只是温和地影响殖民地的日常事务。事实上，政府的活动——无论是英国政府还是殖民地政府——都是殖民地事务中相对次要的一个方面。例如，国防负担落在英国的那些人的肩膀上，而不是由殖民者承担，并且殖民者是世界上税负最轻的群体之一。此外，殖民者自己拥有处理地方性质的问题的权力。他们没有中央或统一政府（unifying government）[①]，但是殖民政府在18世纪初已经具有如下职能：任命官员、授予西部土地、与印第安人谈判、收税、为穷人提供救济，等等。这样，在整个殖民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新大陆的英国公民享受着自决的广泛自由（经济推理命题1）。

早期《航海条例》（它对殖民地的经济自由施加了最重要的限制）的主要条文形成了旧的殖民政策的基础。注意这些法律概括了英国重商主义且有三重目的：（1）为了保护和鼓励英国及殖民地的航运；（2）为了确保主要的来自欧洲的殖民地进口从英国的港口装运；（3）为了确保殖民地所需的大宗产品——被列举的商品——被运往英国。

最初的《贸易和航海条例》（1651年、1660年和1663年）提出了关于殖民地与英帝国关系的这些概念。殖民定居者和投资者一直知道这对他们的经济活动的限制。规则逐步被改变，而且直到1763年，都是以这种方式——殖民者没有表达严重的抱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物品被添加到列举清单中。最初，清单完全由大陆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产品组成，最重要的是烟叶、蔗糖、棉花、染料木材以及靛青。大米和糖蜜直到1704年才被加入清单，松脂直到1705年和1729年才被列入清单，而皮毛直到1721年才被加入清单。每当列举细目导致明显且不合理的困难，解除可能就会被批准。例如，大米必须被送往英国的要求使大米的航运和装卸成本大幅增加，以至于美国的产品尽管质量上乘，却因价格定得过高而被挤出南欧市场。因此，18世纪30年代通过的法律允许大米直接运送至菲

① 本杰明·富兰克林建议在1754年组建一个新的统一的殖民地政府，但是他的提议遭到拒绝。

尼斯特雷海角（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海角）南部的港口。

如果对英国的制造商特别重要或预计会带来大量海关收入，那么这些商品就会被列举。不过，运输被列举的商品对于英国港口的困难并没有我们最初设想的那么大。第一，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共有血缘和语言上的全面联系（并且，更具体的是，他们之间的信用联系更容易建立），殖民者主要与英国商人进行交易。第二，对像烟叶那样很大程度上再出口到殖民地的商品征收的关税，被全部或大部分免除。第三，对一些被列举的商品支付津贴。第四，为了供给基本用品的目的，允许在殖民地之间运输清单上的某些商品。第五，可以通过走私逃避法律；除了糖蜜这个例外，这样的逃税行为在 17 世纪、18 世纪的各个殖民地和欧洲相比，不多也不少。

关于殖民地进口，《航海条例》的结果是有些扭曲的，但对贸易流量无重大影响。货物必须经由英国转运的事实增加了成本且限制了殖民者的贸易。不过，无论如何，传统的联系可使美国人成为英国商人的最佳顾客。此外，通过提供商品的直接运输缓解了困难，比如盐和葡萄酒从菲尼斯特雷海角南部的港口直接运到美国。

如果英国制造商在英属美洲市场上被授予的特权在其他欧洲制造商之上，那么竞争的殖民地制造商是否也该受到限制？许多英国制造商认为，这种“重复生产”（duplicate production）应被禁止，并试图使英国议会相信殖民地的制造业并不是对帝国最有利的。在 1699 年，一项法律规定将殖民地的羊毛、羊毛纱及羊毛制成品出口到任何外国甚至其他殖民地是非法的。后来，美国人（很多人是荷兰出身）被禁止出口用海狸毛皮制成的帽子。将近 18 世纪中叶时，铁制品监管问题在英国引起了争议；在 1750 年之后，生铁和条形铁获准免税进入英国，但铁制成品的殖民地制造却被明确禁止。这些是针对殖民地制造业的唯一的禁止性法律，这个事实表明英国缺乏对美国竞争的恐惧。

毕竟，英格兰在制造业上有着明显的比较优势，且殖民地的比较优势绝大多数存在于农业和来自海洋及森林的其他资源密集型产品。请注意，殖民地重要的造船业并不受英国的立法限制；确实，它还受英国议会的支持。因此，采取防止殖民地制造业活动的零碎行动似乎主要是为了有利于英国的特定既得利益群体，尤其是那些具有影响力和游说能力的人。

禁止殖民地产品的法律执行松散；它们是限制性的，而且是导致烦恼的原因，但是它们并没有严重影响美国早期的工业发展进程及殖民地对独立的追求。此外，英国在殖民地实行的经济控制并没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殖民控制那么严格，而且对美国的这些控制没有对爱尔兰和帝国内其他殖民地的控制那么严格。但是，我们不应该误解旧殖民政策的执行趋势。对外部殖民地贸易的管制正逐步加强。从 1675 年开始，总督开始配以大量帮助执行贸易法规的官员；在 1696 年全面重组后，这些官员的权力足以提供大量的监视和商业监管。

唯一的一部标榜不受惩罚的贸易法律是 1733 年《糖蜜法案》（Molasses Act of 1733）——该法案如果执行，会扰乱殖民地的主要行业之一，并造成严重的后果，尤其是在新英格兰。在 1700 年之前，新英格兰主要是与西印度群岛的英国属地做贸易。但是，适时地，英国种植园主并没有为北部殖民地的商品提供足够

的市场，而来自日益多产的法属群岛的蔗糖和糖蜜要比英国人的主要产品便宜。在同一时期，蔗糖制品在再出口之前必须先运至英国的要求伤害了在产糖群岛上的英国种植园主。为保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份额，英国议会对进口到英属殖民地的外国（主要是法国）蔗糖、糖蜜和朗姆酒征收高关税。对这些关税的严格征收以及对走私的查禁肯定抑制了北部产品在西印度群岛的市场，并严重减少了涉及朗姆酒的所有贸易。新英格兰人认为他们没有可行的办法，因为他们必须出售他们的鱼、口粮、木材和朗姆酒来支付他们的进口商品。新英格兰继续像往常一样开展贸易，而不是屈服于这样的困难；许多英国官员经常收受贿赂（10%成了"寻找另一种方式"的惯例），因而没有努力严格执行这些贸易法规，更不是坚决地面对这个问题（经济推理命题4）。大约30年后，在这个问题被提了一次又一次之后，1764年《蔗糖法案》（Sugar Act of 1764）否决美国的殖民者、支持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该判决的目的是征税，它是引发导致革命的第一次危机的一个关键因素。

新殖民政策和第一次危机

如果我们重复和牢记其核心的基本主题，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事件：已经建立且施加在基本自治的人民身上长达150年的旧殖民政策的新的快速变化促成了一系列危机，并最终爆发战争。这些危机基本上是政治性的，但是导致殖民者对英国当局恐惧和憎恨的压力和紧张是有经济起源的。英国的"新"殖民政策仅仅是旧殖民政策的扩充，但有一点不同：新颁布的法规由英国议会采纳且由官僚监督其执行，从而急剧地改变了殖民地的自由氛围。此外，高级的英国官员——在几乎完全错误的时刻——坚持采取处罚行动，这反而加剧了殖民地已经激起的痛苦。

导致第一次危机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始于1763年英国对法国战争的胜利。当然，七年战争曾是帝国的斗争，它同样也是保护美国殖民地的战斗。但是在为英国供给军队和物质方面，殖民者只提供了有限的帮助，更不用说他们在加拿大和西印度群岛与法国人间歇地进行有害的贸易了。英国人决不肯饶恕那些不知感恩且自命不凡的家伙。此外，战争给英国国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在18世纪60年代中期，英国的人均税收可能是世界上最高的。[①] 国债的利息飙升至每年500万英镑（相当于今天的近5亿美元），而且英国的土地税在战争期间翻番。对很多英国人尤其是纳税人来说，似乎唯一公平的是要求美国殖民者支持还需驻守在殖民地边界的部队。尽管拥有大量财富，殖民者在当时仍然是防卫的免费搭车者，几乎是零成本地获得英国的防卫。殖民地的人均税收水平是世界上最低的地区之一，只有普通英国居民税收的20%～25%。

① Lance E. Davis and Robert A. Huttenback, "The Cost of Empire," i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ds.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42.

英国首相乔治·格伦维尔提议派驻约1万人的英国军队到北美属地。尽管派驻的实际人数只有约6 000人，但他们每年的费用却超过35万英镑。为了帮助支付这些费用，议会通过了两项法律以获得大约1/10的这项收入。在这两项法律中，1764年《蔗糖法案》对殖民者有更深远的经济意义，因为它包括的条款服务于全部主要的英国经济利益并威胁殖民地的许多美国企业。尽管实际上没包容一切，但1765年《印花税法案》(Stamp Act of 1765) 却将政治气氛提升至沸腾，在一种现实意义上开始了走向反抗的第一步。

《蔗糖法案》最重要的条款是对西印度群岛的非英国产品的进口商品征税。尽管对外国糖蜜征收的关税实际上从每加仑6便士降低到3便士——这是对旧的《糖蜜法案》所设税率的一个大幅削减——但严格征税的规定认为较少的税如果严格执行将产生更多的税收（这是今天供给学派独具的相似论点）。不过，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保护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他们在议会中很有代表性）免于新英格兰朗姆酒制造商的竞争。事实上，一半以上的殖民地进口糖蜜被家庭用于制作波士顿焗豆、糖馅饼、苹果布丁和蜜糖杰克啤酒（molasses jack，一种家中自酿的啤酒）；但是英国蔗糖种植园主的主要恐惧是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便宜的糖蜜进口品可能使新英格兰的朗姆酒酿造商占领大陆和非英属岛屿的朗姆酒市场。[①] 尽管新英格兰的产品是靠不住的劣质商品，但他们的担心可能是有道理的。此外，《蔗糖法案》给列举商品清单增加了英国制造商需要的一些原材料，其中包括北部和中部殖民地的一些重要出口商品。最后，这一综合性法律去掉了大多数以前同意给经过英国港口的欧洲商品的关税回扣（出口退税），甚至对与英国产品竞争的外国纺织品征收新的关税。然而，《蔗糖法案》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与之前通过的限制及控制贸易的法案很相似。

另一方面，《印花税法案》只是为了增加税收收入且并非出于重商主义政策。该法律要求在法律文件、合同、报纸、小册子甚至扑克牌和骰子上附加半便士到几英镑不等的印花税。

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致议会的反对税收的理由，殖民者反对的根据是：该法案征收了一种“内部”税，这种税有别于传统的对殖民地进口货物征收的“外部”税款或关税。当英国大臣拒绝承认这一区别时，殖民者进一步反对说，该税是由不含一名殖民地代表的遥远的议会征收的，从而诞生了殖民地的战斗口号，“没有代表权，就不得征税”(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殖民者抱怨《蔗糖法案》和《印花税法案》都要求征收的税款要汇往英国以支付开销，这个程序会进一步耗尽殖民地珍贵的硬币且不断降低美国能够进口的商品数量。当严格执行将伴随这些措施变得明显时，殖民地就产生了严重的抵抗。律师和印刷者尤其被《印花税法案》激怒了，他们为反英骚动提供了清楚干练的领导和沟通。

随之而来的十年麻烦的特点是殖民地反抗时期、英国妥协时期、重新尝

---

① 关于这一议题的更多细节，参见 Gilman M. Ostrander, “The Colonial Molasses Trade,” *Agricultural History* 30 (1956): 77 - 84。也可参考 Stuart Bruchey, *The Colonial Mercha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6), 67 - 78。

试增税时期、更多的殖民地抵抗时期及最终的（对殖民地的不忠行为感到愤怒的英国人采取的）惩罚性行动时期的交替。所谓的《印花税法案》代表大会于1765年在纽约召开，它通过了效忠的正式决议，并组织抵制英国商品。“不进口协会”（nonimportation associations）在殖民地各地建立，从英国进口的商品数量急剧下降，码头和仓库中堆满了卖不出去的英国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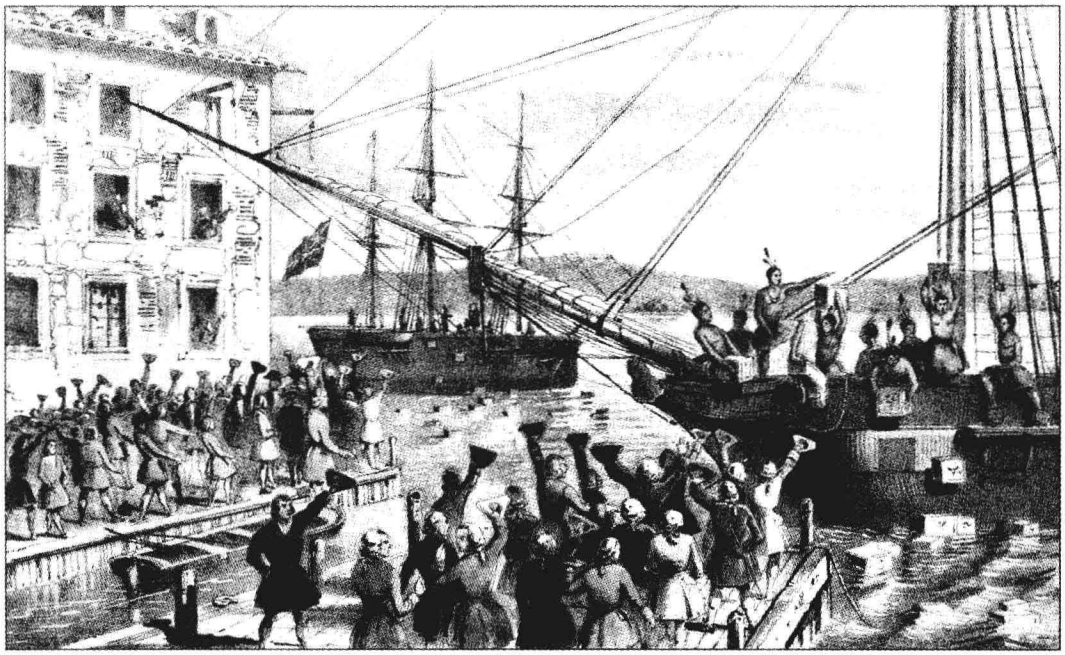
抵制英国商品的共同努力并没有在所有地区发展。中部殖民地——抵制活动最先集中的地方——和英格兰的贸易出现最大的下降。上南部地区有效地促进了抵制，主要是由于1764年《货币控制法案》削减了弗吉尼亚纸币发行量（参见第4章）。新英格兰只给了这些最初的不进口协议轻微的支持，而深南部地区则未加入抵制。但总体而言，殖民地抵制英国进口商品的努力是高度有效的（经济推理命题2）。事实上，英国商人受到了急剧影响以至于他们要求废除《印花税法案》。同情殖民者的政治领袖如埃德蒙·伯克和威廉·皮特等也加入了他们。议会迅速做出反应，废除了《印花税法案》且将外国糖蜜的关税从每加仑3便士降低至1便士。因此，美国和英国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对抗和平解决，而且学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在重商主义者的预料中，帝国已经倾斜了。美洲大陆的殖民地最终成为英国商品的一个重要市场，同时大陆殖民地和西印度群岛种植园成了同等重要的英国的原材料产地。美国人作为消费者已经发现一种新的且有力的经济武器——抵制。

更多的变化和第二次危机

尽管英国议会通过废除《印花税法案》来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但是英国愤怒且顽固地坚持它对殖民地的征税权。其他的糖税仍保留，且1766年《声明法案》（Declaratory Act of 1766）肯定了英国议会可对关于美国人的一切事宜立法的权力。尽管如此，殖民地和英国都感到满意，而且人们普遍相信英国和美国的分歧是可以协调的。但即使在当时，1765年《驻宿法案》（Quartering Act of 1765）已经写进法典一年，其中规定殖民地议会为驻扎在英国的殖民地部队提供营房、一些给养和部分军事运输费用。这部法律在纽约必将被证明是特别有问题的，在那里士兵们正全神贯注于前往西部。但是，更糟糕的事情马上发生了。乔治·格伦维尔在1765年已经被英国内阁解职，主要是因为25岁的国王乔治三世不喜欢他。格伦维尔的财政大臣位置被查尔斯·汤森取代了。由于大量的英国地主持续要求减轻他们沉重的财产税，汤森试图再次提高美国的税收收入。他认为如果殖民者反对“内部”税收，那么他将为他们提供一些“外部”的关税，对诸如茶叶、玻璃、纸、红铅和白铅（油画的颜料）等重要消费品征收。到1767年，开始征收汤森关税（Townshend duties）。

尽管这些被征收关税的商品对于殖民地生活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如果英

国没有采取措施认真地执行法律，殖民者可能已经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征税行为。其中一项《汤森税法》（Townshend Act）法令设立了一个美国海关局（American Customs Board），有一项《汤森税法》法令规定了令人痛恨的搜查令（被称为协助收缴走私物品令），由殖民地法院发出，而且另一项《汤森税法》法令规定在哈利法克斯（Halifax）、波士顿、费城和查尔斯顿设立海事法庭以审判走私案件。仅此一举，英国内阁再次“成功”地使广泛的各个阶层的美国民众产生对抗情绪，而且抵抗再次爆发——这次抵抗的形式既包括和平请愿也包括聚众暴力，并以1770年的波士顿惨案告终，该惨案造成五个殖民者死亡（经济推理命题4）。不进口协议再次生效，特别是在港口城市（见地图4—1）。仅在切萨皮克殖民地——一个主要的殖民地保留了一个海事法庭，这使得这次抵抗相当不成功。[①] 然而，到1769年底，美国进口商品可能已降至其正常水平的1/3。英国在殖民地失去的销售额在1768年和1769年合计超过100万英镑，英国商人再次施加压力，要求改变贸易政策。第二次，议会似乎默许了殖民地的要求。在1770年，除了茶叶关税，所有的汤森关税均被废除，而且尽管一些最令人讨厌的条款仍然有案可查，但是除了一些鲁莽的殖民者，所有人都认为和平解决是可能的。贸易得到了恢复，并且在1771年达到一个新水平的繁荣。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装扮成印第安人的愤怒的殖民者邀请他们参加“倾茶活动”以表现他们对英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感受。财产的损失大约是9 000英镑（大约相当于2004年的100万美元）。

① 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可能是切萨皮克地区的贸易相对分散，从而减少了将未加入抵制活动的殖民地进口商以及其他人列入黑名单或进行抵制的可能性。

第三次危机和走向反抗

合理的平静持续至1773年，可是在1773年抵抗再次由于某些现在看来已经无关紧要的问题引起。很多有权势的人均拥有股份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正面临财政困难。英国议会已经准予该公司一笔公共资金贷款（就像美国国会在1981年给克莱斯勒公司提供贷款一样），并且还通过了允许该公司以新方式买卖茶叶的1773年《茶叶法案》(the Tea Act of 1773)。直到这时候，享有与印度贸易的垄断权的东印度公司将茶卖给英国的批发商，然后这些批发商再转卖给零售商，最后由这些零售商将茶叶发送到美国。总的来说，许多人都从这一系列交易获得收入；此外，该产品的关税在到达英国港口时已被征收，并在抵达美国时再次征收。新的《茶叶法案》允许东印度公司直接将茶叶运往殖民地，因此，消除了英国的关税且降低了装卸成本。消费者将会因少为茶叶付钱而受益，东印度公司将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更多的茶叶，而且每个人都会很满意。但是每个人都不满意。荷兰茶叶的走私者现在要抛售茶叶，而殖民地的税仍在征收（一个真正的痛点），而且最重要的是，美国进口商已被排除在外了，从而使美国商人惊恐。如果殖民地的茶叶批发商可被绕过，那么其他商人的生意是否也能被削弱？英国的其他公司是否也能获得其他商品的垄断权，直到美国人最终沦落到经营小店铺并零售他们的外国主人为他们进口的商品的地步？是否将只有少数处理必要分销程序的亲英代理商们致富而坚强的美国人变穷呢？问题的清单变长，并且答案似乎对经商的几乎每一个殖民者都是很明确的。从波士顿的商人到小村庄的店主都开始做出迅猛的反应。港口城市的茶叶被送回英国或被用各种方式销毁——最壮观的就是波士顿倾茶事件（Boston Tea Party），这是涉及30～40个人在3小时内利落完成的事件（经济推理命题1）。很多殖民者都被对估计约为9 000英镑的私人财产（大约相当于2004年价格的100万美元）的肆意破坏震惊了，但是和在英国燃起的愤怒相比，他们的反应比较温和。

结果是痛苦和惩罚性的立法，被称为《不可容忍法案》(Intolerable Acts)。于1774年初夏通过的《不可容忍法案》：（1）停止波士顿港口的所有航运业，直到殖民者赔付东印度公司的茶叶损失；（2）允许英国官员控告在一个美国殖民地的犯罪行为，同时强迫在其他殖民地或英国使用英国法律审理；（3）修订马萨诸塞特许状（charter of Massachusetts）使某些宝贵权利依赖于皇家任命的总督的武断决定；（4）为驻扎在波士顿的部队提供营房，这是在四年前波士顿惨案发生之后对市民来说特别麻烦的事。在随后的几个月，政治骚乱达到了新的暴力高度，经济制裁也被再次调用。不进口协议第三次被实行，且第一次大陆会议的代表投票决定不与英国和英属西印度群岛进行贸易，除非英国做出让步。1774年10月14日，大陆会议提供了一张对皇室不满的清单：

（1）“英国”议会一直将税收强加给殖民地。

（2）英国议会声称有权为殖民地立法。
（3）在殖民地设立收税的专员。
（4）海事法院的司法管辖区已扩大至内政。
（5）法官的任期由皇室的喜好决定。
（6）常备军已经驻扎殖民地。
（7）人可被运出殖民地审判。
（8）波士顿港口已被关闭。
（9）戒严法已被强加给波士顿。
（10）《魁北克法案》（Quebec Act）已经没收了殖民者的西部土地。[①]

大陆会议最终继续要求废除1763年之后对殖民地实施的所有主要法律。[②]然而，到这个时候，立法的反应和颁布变得不重要了。这场危机已成为道德和政治上的危机。美国人不会向英国人屈服，直到他们的基本自由得到恢复；而英国人不会和解，直到殖民者让步。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平和解的可能性在降低。最终，战争伴随着1775年4月19日的枪声（这标志着世界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爆发。1776年7月4日，美国宣布独立。1765年衰落的帝国如今已经破裂。

© NORTH WIND PICTURE ARCHIVES

这幅插图强调了由1774年《不可容忍法案》发起的政治对立。

① Jonathan Hughes,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3d ed. (Glenview: Scott, Foresman, 1990), 59.

② *Documents Illustrative of the 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State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27), 1-4.

农村的支持

尽管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事件主要集中在英国当局和殖民地城市商业的冲突上，但是广大的农村群众在独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我们如何能够解释富有的南方人和许多贫穷农民愿意支持由对立的商人阶层引导的反抗呢？尽管这些群体之间肯定不存在明显的共享的相关经济利益，但是每一个群体都有各自抵御英国当局的动机。在美国农村，敌对主要源于英国的土地政策（经济推理命题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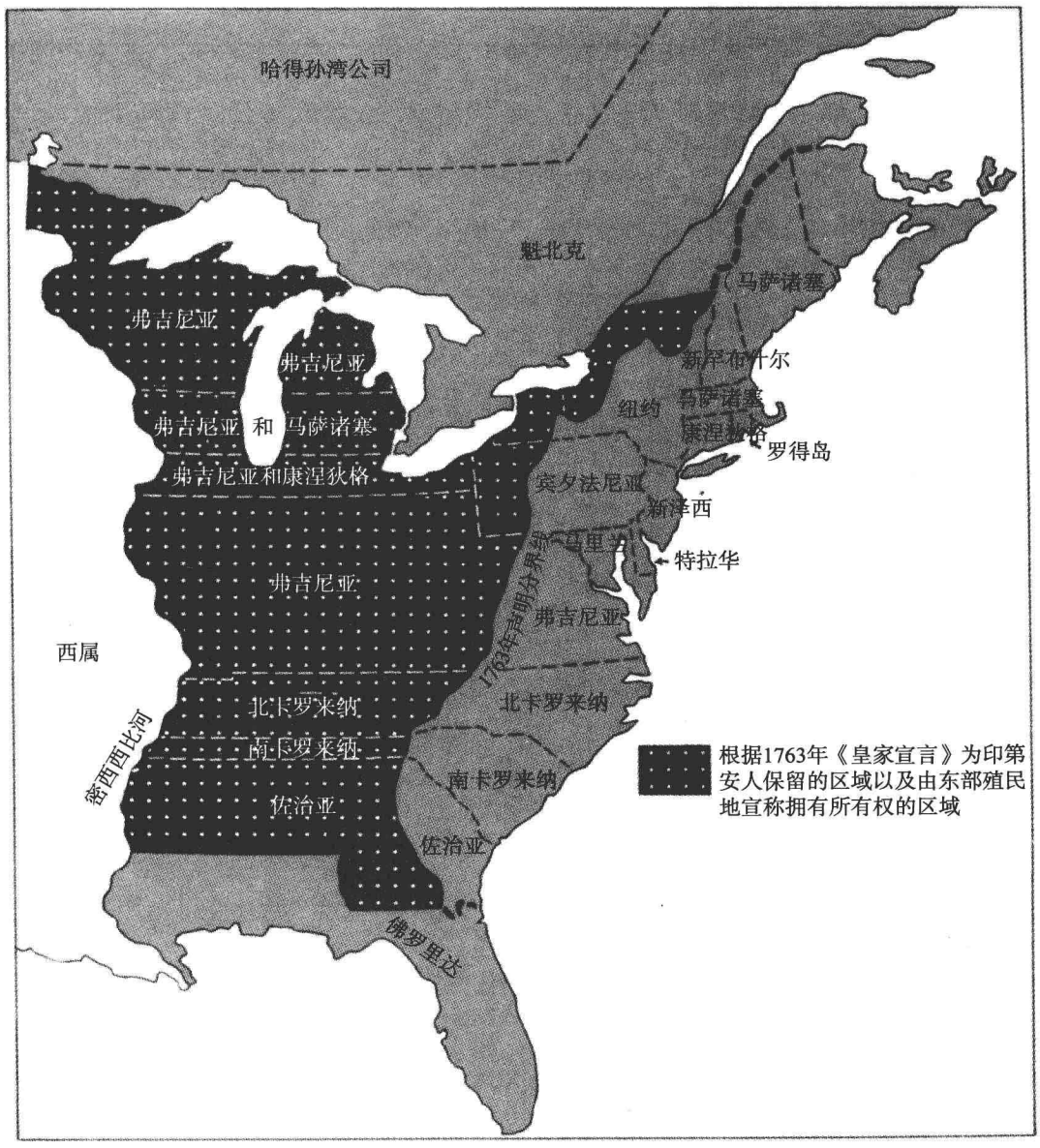
在 1763 年之前，英国的政策一直旨在鼓励殖民地西部的快速发展。为了贸易利益，英国商人想要这个新国家的人口尽快增加。此外，快速的拓居活动拓展了边界，也因此有助于加强对法国和西班牙的打击。不过，到 1763 年，增强边界反对外国列强力量的需要已经消失。正如皇室和议会所理解的一样，现在是对边界进行更多控制的时候了。第一，英国人认为完全将人口控制在沿海地区是明智的，在那里有主要的投资，而且实行政治控制会更容易。第二，皮毛贸易目前完全由英国控制，让边界的开拓者们不断前进并制造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被认为是不明智的。第三，有钱的英国地主正在大片购买美国西部的土地，也就施加了为这些投资者“保留”一些好土地的压力。第四，将西部土地置于皇室的直接控制之下，目的是要为英国财政部获取销售土地和免役税的大宗收入。①

在 18 世纪 60 年代初，边界事件有助于加强皇室对殖民地的控制。由于对不公正的愤怒以及害怕拓居者会侵犯他们的猎场，北部印第安人在渥太华酋长庞蒂亚克（Pontiac）的带领下反抗了。殖民者和英国军队平定了这次起义，但代价是尼亚加拉河以西的 9 支英国守备部队中的 7 支被消灭了。每个人都知道向西部拓殖将受到持续的威胁，除非土著印第安人被平定。主要是作为一个临时解决方案，国王颁布了 1763 年《皇家宣言》（Crown Proclamation of 1763），这实际上画了一条线，殖民者未经皇室明确授权不得越线定居（见地图 6—1）。总督们再也不能授予流入大西洋的河流以西土地的特许权；寻求这种授权的人必须直接从国王那里取得。同时，皮毛贸易被划归集中控制，商人未经英国的允许不可穿越阿勒格尼山脉。

几年后，将殖民据点置于英国监管之下的政策得到重申，虽然很明显，西部边界线将不会继续严格固定。在 1768 年，边界线西移，且与印第安人的条约使得投机者能够获得大片的土地。在 1774 年《不可容忍法案》通过后，两项英国行动表明，暂时的权宜之计已演变成永久性的政策。首先，一项皇家宣言收紧了土地变成私有的条款。土地授权不再免费；相反，大量的 100 英亩到 1 000 英亩不等的大片土地通过公开拍卖出售，最低价格为每英亩 6 便士。更为严重的是

① 免役税是封建义务的一种古老形式，除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所有的殖民地都极少履行这项封建义务。在弗吉尼亚，免役税支付给英国皇室（在 1765 年之后，大约是每年 5 000 英镑）；在马里兰，免役税被支付给巴尔的摩公爵，他是马里兰的所有者。

《魁北克法案》在1774年通过，这将魁北克的边界变为东至俄亥俄河，西至密西西比河（见地图6—2）。更重要的是，该法案破坏了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弗吉尼亚对西部土地宣称的所有权。皮毛贸易要由魁北克的总督监管，而印第安人的边界线向南延伸至佐治亚了。许多殖民者将该法案视为盗窃。



地图6—1　殖民地土地所有权

如殖民地土地所有权所显示的，殖民者对新土地的胃口是巨大的。1763年《皇家宣言》的目的是要阻止西移。

并不是所有殖民者都因新的土地政策而蒙受损失。在政治上强大到足以获得国王的特殊授权的富有的土地投机者发现新规定是限制性的，但不是毁灭性的。

确实，在山脉东侧拥有未授权土地的如彭斯和卡尔费特等大土地所有者，或者拥有大量大片已授权土地但还未开发的人，都因英国禁止西进运动导致的财产价值上涨而受益。同样，旧的、已确立的农业地区的原有农民将受益于两个方面：（1）来自新土地的农产品的竞争现在将更少；（2）因为农业劳动力获得自己的农场将更难了，所以雇工会更便宜。

地图 6—2　所有权的再分配

1774 年《魁北克法案》将之前由各殖民地所有的土地划归了印第安人，这几乎使魁北克的面积翻番。

* 殖民地拥有的土地。

尽管对西进运动的多项限制是必要的，由于印第安人在边疆的抵抗，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是必要的，但是，许多殖民者对这些限制表示愤恨。从廉价的未开拓的西部土地撤退击碎了计划自食其力的年轻人的梦想。还记得，从 1720 年至 1775 年，大约有 22.5 万名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移民到了美国，主要是到中部殖民地。这些人基本上处于好战的年龄，且对英国皇室没有忠诚。现在许多人被拒绝给予他们认为应当属于他们的土地。同样，即使是已确立边界的农民也采取反英立场，因为他们认为在自由处置土地的政府之下，他们会更有可能成功。尽管贫穷的农民在西部土地上所拥有的金钱利害关系无法和那些大的皮毛贸易商、土地投机者和种植园主的资产相比，但是他们仍受到了影响。有时，不能偿还债务的人由于止赎权失去了自己的农场；一项禁止西进运动的英国政策激怒了拓荒者且往往使他们一致反对英国人，以及美国人中的贵族——这些与他们没有从属关系的人——结成联盟。1764 年《货币法案》（《货币控制法案》）也使债务人群体沮丧和烦恼，因为虽然价格在随后的十年温和上涨，但农民们认为，他们的命运随着温和的纸币紧缩已经开始恶化了（经济推理命题 4）。

重新思考经济剥削

人们有时会宣称美国独立战争是相互竞争的资本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以及英国对殖民地进行剥削的结果。从长远看，这样的臆测违背实证检验。毕竟，怎样才能判断是独立还是英国统治能使北美的经济发展更有希望呢？

当然，对于独立的短期后果能进行评估——这项任务将在第 7 章完成。但在此刻，重要的是重新考虑将对殖民地的剥削作为反抗的一个动机的问题。英国的贸易限制耗尽了殖民地经济吗？

首先，对制造业的限制存在于羊毛制品、帽子和铁制成品。由于殖民地的羊毛制品生产仅限于个人使用或地方贸易，所以这项限制对它没有产生大的影响。殖民者非常乐意以较低的价格（英国采用的大规模生产方法使之成为可能）从英国购买制成品。这种状况甚至在独立后仍然持续，而一直到 19 世纪，美国的羊毛制品根本无法和进口的英国纤维织物竞争。

殖民地制造业活动的一小部分（主要是纽约生产者的活动）因 1732 年通过的《皮帽法》（Hat Act）受损。这种片面立法通过禁止殖民地海狸帽子的出口使得伦敦的帽子制造商受益。不过，对于美国经济的总体，《皮帽法》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同样，议会对铁的限制结果不怎么有害。事实上，殖民地的铸造用生铁和条铁的生产受到了鼓励，但是对铁和钢的抛光以及特定类型的设备的使用在 1750 年之后被禁止了。不过，像 1733 年《蜜糖法案》一样，对殖民地制铁业的限制因免罚而被忽略：仅在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就有 25 个铁工厂于 1750 年和 1775 年之间建立。此外，当宾夕法尼亚议会公然违反法律，给一个新的切割工厂（制钉厂）下拨财政援助时，殖民者所享有的立法自由得到了充分体现。不管英国的这些管制对殖民者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厌恶，但它们是多余的（羊毛制品限制）、可忽略的（切割工厂）和微不足道的（皮帽生产）。

普遍自由的英国土地政策旨在鼓励快速殖民。只是在与庞蒂亚克酋长的战争及由此产生的1763年《皇家宣言》以后土地政策才突然变得不那么灵活。当凭借1774年《魁北克法案》再次收紧对土地的控制之后，重要的政治问题出现了。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弗吉尼亚原先拥有所有权的西部土地被重新分配给了魁北克，并且土地也变得不易获得了。领地政府完全由英国官员掌控，并且审判没有陪审团。

我们已经评定了这些土地政策的经济影响。一些人获益；其他人受损。但显然，自由的氛围迅速改变，而这些新政策的政治影响很难被殖民者接受。主要的问题似乎已经是谁来制定政策而不是政策本身是什么。事实上，英国的土地政策被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必要的，而在实现美国独立后联邦政府也规定且采用了相同的基本管制。如果它们是经济上的负担，那么新政府似乎将不大可能采取这些限制措施（经济推理命题2）。

货币限制措施也是如此。在取得独立之后，新政府采取了与英国之前施加的那些措施相同的措施。例如，在1751年，英国议会通过了《货币法案》，该法案禁止新英格兰建立新的公共银行和发行供私人交易的纸币。作为切萨皮克地区发生的事件的结果，一部类似和补充性的《控制法案》于1764年问世。那里的种植园主负债累累，因为他们在七年战争期间继续进口，即使他们自己的出口已经下降。当弗吉尼亚发行了25万英镑的取款凭单，在私人交易和公共部门支付（主要是税收）中作为法定货币使用，英国债权人一定会有所损失。当种植园主开始使用贬值的货币来偿还他们借硬通货英镑发生的债务时，英国通过将原有《货币法案》扩大到所有的殖民地来做出反击。这个扩大一定会伤害捉襟见肘的切萨皮克地区且刺激了它在1765年不寻常地支持对英国进口商品的抵制。但是，独立后对相同管制措施的采用表明货币管制的经济负担在整体上已经是难以忍受的。该问题的真正根本点是应该由英国还是由殖民地本身掌握货币的控制。

看来只有《航海条例》才导致了严格意义上的重大经济剥削，如经济透视6.1所述。用劳伦斯·A·哈珀的话来说：

> 在1660—1766年的各部法案和1663年《主要产品法案》（Staple Act of 1663）中对主要的殖民地出口商品的列举打击了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这些法案要求殖民地允许英国的中间商分销诸如烟叶和大米等产品，并规定如果殖民地不购买英国的产品，至少他们应该购买在英国的欧洲商品。强加给殖民者的负担中最大的要素不是估计的税收。它存在于英国必须作为转运港的要求所产生的装运、转运成本的增加及中间人的利润。①

虽然这些更昂贵的进口商品和利润较少的殖民地出口商品的重担合计差不多是殖民地总收入的1%，但对殖民者也有好处：他们获得了英国政府给予的奖金和其他好处，例如由英国付费的海军保护和军事防卫。

无论如何，殖民者已经忍受了这些限制措施一个多世纪。即使是这些受打击最重的人——烟草和其他被列举产品的生产者——在他们对英国的不满清单中也

---

① Lawrence A. Harper, "The Effect of the Navigation Acts on the Thirteen Colonies," in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Richard B. Morr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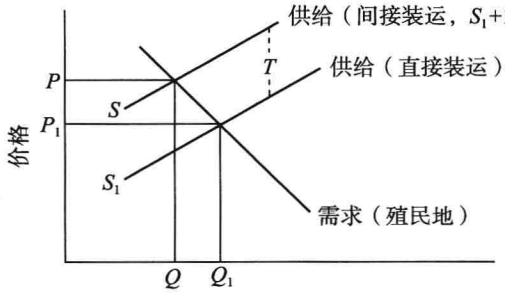
几乎从来不提及这些限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贸易法案甚至没有在《独立宣言》中提及。

经济透视 6.1

《航海条例》的供需影响

供给—需求分析对明确说明《航海条例》给殖民者造成的负担是有用的。英格兰必须被用作“转运港”的规定使得殖民者背负着额外的装卸和运输成本——在如果货物从欧洲大陆直接装运将发生的成本之上的成本。下面这幅使用供给—需求曲线的图说明了进口的情况：

假设 T 表示来自欧洲大陆的殖民地进口采取间接装运路线所产生的额外成本。这些额外的成本可被看做是供给曲线从 S_1 到 S 的移动。更高的运输成本的影响就是它导致受影响的进口商品在殖民地的售价更高（从 P_1 上升到 P），同时数量更少（从 Q_1 下降到 Q）。



通过英国从欧洲进口的商品

价格变动（$P-P_1$）乘以贸易量 Q 给出了来自欧洲大陆的殖民地进口的负担下限。（$P-P_1$）$\times Q_1$ 给出了一个上限度量。同样的方法可以说明法律给殖民地对欧洲大陆的出口所带来的负担。在这种情况下，殖民地的出口价格由于法律而降低。正如罗杰·兰塞姆（Roger Ransom）的研究所表明的，这些负担大部分由南方人承担。但总体而言，源于间接装运路线的进出口负担不到殖民地收入的 1%。[①]

不是剥削，而是迅速变化和严格执行的新殖民政策促成了美国独立战争。在 1763 年以前，殖民者可随心所欲地做相当多的事情。偶尔一部新法规或英国对殖民地立法的否决造成的冲突很少或根本不存在冲突。但是，在七年战争之后，环境突然改变。许多新的税收和规章制度被英国宣布生效并严格执行。新的税收都很轻，但它们的收取方法却使人们负担沉重。

① 对这些成本的几个研究和估计的评估，请参见 Gary M. Walton，“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4，2d series (1971)：533－542。同样，一篇较近的文章和辩论，请参见 Larry Sawyers，“The Navigation Acts Revisit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5 (2)，(May 1992)：262－284。

从集体的角度来讲，1763年以后的法令几乎给每个殖民者都带来了不满：债务人反对《货币法案》；承运商和商人反对《蔗糖法案》；开拓者反对《魁北克法案》；政治家、印刷者和赌徒反对《印花税法案》；零售商和走私者反对《茶叶法案》。随着殖民者愤恨的爆发，通信委员会（Committees of Correspondence）奋力向前，正式主张他们早在1763年以前就在事实上已经拥有的权利（经济推理命题4）。

从许多方面来说，殖民地经济逐渐走向成熟似乎很快使美国独立不可避免。事实上，殖民地的生产总值当时有近2 500万英镑，差不多是英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而在18世纪初，仅仅约为1/4。显然，殖民地在经济上已经成熟到使得独立进程可行的地步。

但革命是脱离大英帝国所必需的吗？毕竟，其他的英国殖民地在随后获得独立并未诉诸武力。据查尔斯·安德鲁斯所说，到1775年，殖民地已经达到了如下地步：

> 他们有资格与宗主国合作，友好关系类似于自由国家之间的兄弟情谊，就像如今的英联邦（1926）。但是英国无法看到或者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因此美国成为政治骚乱的场所，而这也许本可用妥协来克制，但却被压制转变成反抗。这种情况非常有趣，因为英国以它在其历史上关键时刻的妥协能力闻名于世。但至少在这一次，英国失败了。①

该“失败”的本质由劳伦斯·哈珀做出了很好的总结：

> 作为一个宗主国，英国有很多东西要学。任何一本现代的父母杂志都可以告诉乔治三世的大臣们：不要犯的错误是，采取一个立场然后屈服于痛苦的吼声。这是英国政府重复犯的错误。它对糖蜜征收每加仑3便士的关税，且当它遭到反对时，又降至每加仑1便士。它规定了《印花税法案》并在遭遇勃然大怒时撤销。它规定了外部税项以应对殖民地的反对，然后又再次屈服，去除全部税项仅保留其中一项。当它终于试图执行法律时，可惜为时已晚。在这种境况下，任何有自尊的孩子或殖民者都不愿意屈服。②

这样看来，英国人从他们与美国殖民地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对他们在以后的时期很有帮助，因为其他的英国殖民地随后获得独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流血。这个殖民地遗产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非常重要。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arrow, Thomas. *Trade and Empire: The British Customs Service in Colonial America, 1660—177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① Charles Andrew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n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1 (1926): 232.

② Lawrence A. Harper, "Mercanti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25 (1942): 14.

Becker, Robert A. *Revolution, Reform,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America: 1763—1783*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0).

Beer, George L. *The Old Colonial System 1660—1754* (New York: Macmillan, 1912).

Davis, Lance E., and Robert A. Huttenback. "The Cost of Empire." I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ds.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Ernst, Joseph, and Marc Egnal.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29 (1972): 3 - 32.

Hacker, Louis M. "The First American Revolution." *Columbia University Quarterly*, part 1 (September 1935). Reprinted in Gerald D. Nash.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ealth, 1972).

Harper, Lawrence. "The Effect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on the Thirteen Colonies." In *The Era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d. Richard Morri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9).

Matson, Cathy. "Mercantilism a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March 1942). Reprinted in Gerald D. Nash.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eath, 1972).

——. "The R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Nation."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63 -401.

McClelland, Peter D. "The Cost to America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59 (7), (May 1969): 370 - 381.

Miller, John C.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Morgan, Edmund S.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A Review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 (Washington, D. C.: Service Center for Teachers of History, 1958).

Morgan, Edmund, and Helen Morgan. *The Stamp Act Crisis: Prologue to Revolutio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3).

Nash, Gary. *The Urban Crucibl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Nettels, Curtis P. "British Mercantilism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Thirteen Colon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2 (1952): 105 - 114.

Ostrander, Gilman M. "The Colonial Molasses Trade." *Agricultural History* 30 (1956): 77 - 84.

Perkins, Edwin J. Chapters 7 and 8 in *The Economy of Colonial America*, 2d 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8.)

Ransom, Roger. "British Policy and Colonial Growth: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8): 427 - 435.

Reid, Joseph D. "On Navigating the Navigation Acts with Peter D. McClellan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0 (1970): 949 - 955.

——. "Economic Burdens: Spark to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81 - 120.

Sawyers, Larry. "The Navigation Acts Revisited."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5 (2), (May 1992): 262 - 284.

Thomas, Robert P.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on Colonial Welfare: Some Preliminary Finding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5 (1965): 615 - 638.

——. "British Imperial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1968): 436 - 440.

Tucker, Robert W., and David Hendrickson.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Origins and the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2).

Ver Steeg, Clarence. "The Amer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Considered as an Economic Movement." *Huntington Library Journal* 20 (1957).

Walton, Gary M.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 Burdens of the Navigation Act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4 (4), 2d series, (1971): 533 - 542.

Walton, 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Chapter 8 in *The Economic Rise of Early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第2部分

独立战争、早期国家以及战前时期：1776—1860年

经济和历史回顾：1776—1860 年

1. 正在工业化的英国和拿破仑统治下刚发生革命的法国，成为当时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大国. 英国在海军力量和人均收入上占据优势，法国则在陆军力量上占据优势，并且拥有更高的总产出和更庞大的人口。

2. 1793 年，英法之间爆发战争，并持续到了 1815 年。为有助于给战争提供资金，拿破仑在 1803 年将路易斯安那准州出售给美国，从而使这个新国家的领土范围加倍。由于美国的航运公司作为中立者向交战国提供服务，美国港口的贸易和商业猛增。对美国航运的压制，则使美国在 1812 年被卷入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

3. 1785 年和 1787 年的《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 Land Ordinances of 1785 and 1787）确保了新的美国领土能够朝着州的状态发展，并且保证了新加入联邦的各州和原有的州完全平等。

4. 1789 年通过的《美国宪法》（U. S. Constitution）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因为它的视野及简洁明了，以及对政府权力的约束和作为一个政治妥协模式，它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它为财产保护提供了和个人自由相一致的保证（南部坚持的奴隶制则是一个显然的例外）。

5. 伊莱·惠特尼（Eli Whitney）于 1793 年发明的轧棉机（cotton gin），保证了能够经济有效地清除短绒棉的棉籽。此后，美国棉花产量在世界总产量中的比例从 1791 年的 0.5%增加到 1850 年的 68%。随着西部移民促使支持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的两种力量进入持续不断的争端，南方的奴隶制日益巩固，并逐渐成为联邦的威胁。

6. 随着 19 世纪早期工业革命从英国传播到美国，交通运输革命也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全国市场展开，将工业化的东北部地区、农业的中西部地区以及作为棉花王国的南方紧密联系起来。

7. 到 1860 年，美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工业国。

第 7 章　新生国家面临的严酷现实

本章主题

1776—1815 年的历史由四个截然不同的时期组成：首先是战争（独立战争）；然后在和平与独立之后紧接着的是另一场战争（拿破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新生的美国扮演了中立国的角色；最后，则是这个年轻国家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这些事件引发了经济波动，给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并随着贸易航线的开放和关闭而迫使资源进入新的生产领域。总体而言，长年战争减少了美国的贸易和经济活动。然而，战争期间美国作为中立国的那几年，由于其他国家忙于战争，美国的航运和贸易获得了填补空白的机会，在当时特别繁荣。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由于这个新国家已经不受大英帝国控制，巨大的经济调整也发生了；而和平时期严厉的贸易约束让这个国家雪上加霜。

最后，这个新生国家不仅面临独立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大量债务的偿还问题，还面临着在各州之间达成协议的问题——如何在宪法限制的基础上组建一个新政府（经济推理命题 1、2 和 4）。

战争与经济

正式爆发于 1775 年 4 月 19 日的独立战争，历经了六年多的艰辛岁月。从两

个多世纪之后的有利地位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这场战争预示着西方世界的巨变——革命的连锁反应，无论大小，都将改变这个世界。但对于严阵以待的殖民地人来讲，它仅仅是一场战斗——为了能从无法容忍的英国对美国事务的干涉中获得自由这个正当理由而战。矛盾的是，革命却从未得到大多数普通大众的支持。也许 1/3 的殖民者依旧对英国忠诚，另外 1/3 的殖民者对该事业几乎没有任何贡献，还经常与敌军进行非法交易，并以有利可图的价格向美国军队出售粮食和补给。以不同数量且在广阔分散的战场上，步兵们在令人心碎的战役中疲倦而艰难地来回行进，却毫无军事进展。尽管水兵相对较少，并且通常海战并没有军事上的决定性，但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是，独立战争最终是依靠海军的力量取得了胜利——法国舰队在其海军上将格拉斯伯爵（Comte de Grasse）的带领下，击退了英国军舰并在约克镇包围了康华里（Cornwallis）。

当然，海上贸易历来是战事中的重要因素，而贸易联系对武器和弹药的供应至关重要。在 1775 年英国人和殖民者同时执行法律限制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美国海外贸易都突然停止了。到 1775 年中期，在诸如火药、打火石、步枪和刀等军事必需品上，殖民地面临着十分严重的短缺，甚至连盐、鞋、羊毛和亚麻布也都存在供应不足的情况。1775 年末，大陆会议批准了同西印度群岛的有限贸易，主要是为了获得武器和弹药；而到 1776 年春，与其他非英属地区的贸易已经不受限制。

然而，英国仍维持着对美国港口相当有效的海上封锁，尤其是在战争的最初两年。1776 年末，波士顿港口开放，但新英格兰和中部殖民地的许多重要港口在 1778 年以前都一直被紧紧封锁。随着英国放松对北部的控制，英国加强了对南部的控制。萨凡纳在 1778 年末被占领，而查尔斯顿在 1780 年被占领。

尽管封锁严密，但各殖民地仍然从事国际贸易。1778 年同法国以及随后不久同荷兰、西班牙签署的正式的商业条约都促进了美国的海外贸易。1778 年至 1782 年初，美国的战时贸易达到巅峰。其间，法国、荷兰、西班牙以及它们的属地都积极地与殖民地进行贸易。即便如此，进出殖民地的货物流量也远远低于战前水平。而走私、私掠以及与海外合作伙伴的合法贸易，仅仅部分地弥补了对英贸易的锐减。甚至沿海贸易也由于船只不足、封锁以及战时运费等原因而收缩。在一些英国占领的港口，例如纽约，只有少许的进口活动，而几乎没有出口。

随着进出口量的下降，进口替代大量存在，殖民地经济因而在相当程度上变得更加自给自足。例如在费城，新建的纺织厂雇用了近 4 000 名妇女在家里纺织布料。手工作坊也大量涌现，刺激了啤酒、威士忌及其他国产酒精饮料的生产。在海岸沿线及主要港口城市，将美国的生产资源转到进口竞争行业的再引导格外强烈（经济推理命题 1 和 2）。只有商业化程度最低的乡村地区才能免受战争硝烟与战时贸易封锁的影响。

总体而言，战争给这个新生的国家带来了明显的经济困难。大部分商品的成本上升且更加难以获得。高昂的价格和严重的贸易困难促使一些投资者将资金从商业转向制造业。然后，一旦贸易航线随着和平的到来重新打开，即使是那些在战争中获利的人，也因为潮水般涌入美国港口并引起价格大幅下降的进口商品而

感到气愤。尽管许多美国人避开了战争带来的直接考验，但很少有美国人能够不受战争影响——起码是间接受到它的影响。

组建政府的关键性问题加剧了战争和经济衰退的紧张。13 个殖民地被《联邦条例》（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联合起来；它最初是为了解决团结一心对付敌人的紧迫问题而创立的；各州批准它费时颇久——从 1777 年到 1781 年。这些条例有诸多优点，并且作为一个殖民地之间的早期政治协定的来源，它们是十分有效的；但倘若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永久框架，它们是不够的。例如，征税的权力被留给了各个州，因此允许任何州对其他州所创造的收益搭便车。再者，当殖民地获得独立之后，大国以一种接近蔑视的高傲态度来对待这个新国家。由于美国拒不履行和平条约中规定的条款——偿还战前的英国债权人并归还被没收的英国保守党的财产——从而惹恼了英国；英国将美国排除在有价值的商业特权外，并且拒绝撤回布置在美国领土上的边境检查站中的军队。西班牙试图切断密西西比河下游与美国的交通。即使是法国，也拒绝向一个主权政府继续提供传统上的帮助。对于各自为政的各个州来说，包括这些在内的种种问题实在难以克服；这就必然要求一个强有力而不是孱弱的联盟。而《联邦条例》下的国民内阁，在协调改善经济和军事关系上似乎太过无力。

视角 7.1

美洲土著和独立战争

美国独立战争并不完全是一场殖民地士兵对抗宗主国士兵和水手的战争。在战争期间，最初易洛魁联盟有 6 个部族主张保持中立的身份。然而，最后绝大多数易洛魁的部落与英国军队一起并肩作战。战后，很多美国人将易洛魁族视为一个被征服的民族，一些人想要他们被放逐西部。另外，印第安人的土地也被极度渴求着，美国人将其视为支付殖民地战士服役的军饷和支付殖民者在战争期间建立的债务的一种方式。

尽管拒绝接受被征服的身份，但易洛魁联盟的势力被战争极大地削弱了，并被紧随其后的森林战争进一步减少甚至瓦解。很多易洛魁人移民到加拿大，而他们的大部分土地也通过购买和条约的方式被美国拿走。到 1794 年，剩余的易洛魁人被局限于纽约州的一小块保留地中。

国内最紧迫的是财政问题。1775—1781 年期间，战争经费是通过发行纸币提供的，共发行了接近 4 亿美元（票面价值）的大陆货币、中央政府军需军粮券以及各州的货币等用于支付战争开销；高额的发行量最终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这样的通货膨胀在美国除了南部联邦，只发生过一次。实际上，到 1783 年中期，这些不同的发行物被拒绝接受，纸币贬值对持有人来说是税收效应。最后仅仅剩下相当小的价值不超过 4 000 万美元的外债和内债，但这些债务的偿还责任依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政治领导人认为归还了债务的州将最终阻碍政

治权力的平衡。更重要的是，国会没有独立的收入，想获得资金只能依靠各州的征集——根据各州人数的比例粗略地规定，但各州都有自己的财政问题。到1786年，有多达七个州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而其他六个州的债务人团体也强烈要求类似的发行权。尽管发行纸币的各州（罗得岛除外）办事可靠，但是由各州控制货币发行这种事情也许是最让保守派们感到恐慌的了。的确，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的影响是人们普遍对政府的金融管理失去信任。①

针对政府最终应当采取何种形式的问题，美国领导人的意见发生分歧。一派人希望中央政府没有《联邦条例》中规定的那么强大，主张与各州共命运。另一派人由热情稍差的革命者组成，他们认为应当尽快建立起一个能够统治各州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关于国家的基础制度和司法权、关于各州权利与联邦强制责任的对比（或者说地方和州的法规而不是联邦法令）等方面观点的冲突仍然是一个长期的政治问题，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正如将要强调的那样。直到战争结束，那些偏好一个强力政府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掌控着国家的事务，但是当令人欣喜的和平于1783年到来的时候，大多数热切支持强力政府的领导者回家追逐自己的事业去了，使得政府主要由弱中央政府的拥护者们所控制。

即便如此，早在1783年，弱中央政府的支持者们也开始在加强国会权力方面做出了让步，到1786年的时候，大多数强中央政府的激烈反对者们也认识到真正的联盟已经不可避免了。当年弗吉尼亚州召开了安纳波利斯大会，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州际贸易问题，但代表们做的唯一的事就是向国会建议召开另一个会议以讨论一些更广泛的问题。

很显然，美国的领导阶层正逐渐达成一致。1787年在费城召开的会议上，代表们忽略了修正《联邦条例》条款的最初目的，取而代之的是讨论如何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因为自1775年以来便讨论得很激烈的立宪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至少在大多数人的想法中。约四个月后，会议的主席乔治·华盛顿，为了获得批准，向各州发送了完整的文件。② 特拉华州很快便批准了该文件（1787年12月7日）；1788年6月21日，新罕布什尔州投了重要的第九票赞成票（经济推理命题1和4）。1789年3月4日宪法正式生效，两年后，《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也获得通过并付诸实施。

《美国宪法》

随着宪法的实施，联邦政府被授予征税权，使其能够还清以往的债务，甚至包括由各州所负的那部分债务。保证公共债务可兑现已经被证明是健全资本市场

① See Charles W. Calomiris, "Institutional Failure, Monetary Scarcity,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47 - 68.

② 评估代表们的既得经济利益的分析，详见 Robert A. McGuire and Robert L. Ohsfeldt, "An Economic Model of Voting Behavior over Specific Issues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1986): 79 - 82。

在美国发展的关键。但也曾有过失败——19 世纪 30 年代末时有几个州拖欠偿还债务，但即使是现在，美国也能从这个制度遗产中获益不少，并被看做是寻求资金安全的主要投资者的天堂（经济推理命题 3）。

宪法也赋予了中央政府唯一的铸币权和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权利，而这些权利在各州是不允许的。由于刚从金融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中摆脱出来，人们高度渴望稳定的美元，并将其视为解决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办法。

无论是征税权还是货币管理权，都使得制宪者对派系冲突的担忧、大部分手段的局限性以及政府对财富和收入重新分配的能力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①] 因此，联邦政府税必须在所有州都进行统一，当然，美元也必须在各个州都可以兑换。也正是这些忧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政府带给财富分配的重大而根本的变化，从而形成了《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部分的基础："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合理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另一个具有重大政治经济意义的问题是州际贸易法规的问题。尽管在 18 世纪 80 年代并没有出现过对州际贸易的重大阻碍，但其出现的可能性却显而易见。根据宪法规定，各州不得制定关税，从而保证了货物能够免费通行。这一重要的"州际条款"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国家共同市场，从而减少了地方垄断的潜在可能性并增加了从地区专业化和贸易中获得的收益；在以后的数十年，它也允许联邦权力扩大到许多州际经济活动领域。

宪法也从其他方面促进了贸易和经济的专业化。它授权联邦政府供养陆军和海军、设立邮局并开辟邮路、确立度量衡标准并制定统一的破产法。它也授予国会制定专利法的权力："为了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进步，对于各种著作或发现，应向其作者或发明人保证一个有限时间的排他权。"构想和创作的成果有了更强有力的保障，富有创造性的人们就会加快技术进步。

另一项移交给联邦政府的权力则是外交。联邦政府可以独立议定条约和设置关税。在与外国的谈判中，为了降低或免除国外对美国货物的征税，调解关税的权力是一个有力杠杆，正如它至今仍在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全球谈判中发挥的作用那样。在权力被转交之前，各州的竞争使这个杠杆的可能性尽可能弱化，因而美国的关税非常低。而一旦它们集中起来，关税便成为整个 19 世纪联邦收入的主要来源。

---

① 在《联邦党人文集》的第十篇里，詹姆斯·麦迪逊针对这些重要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人类互相仇恨的倾向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没有充分机会表现出来时，最琐碎、最怪诞的差别就足以激起他们不友善的情感和最强烈的冲突。但是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有产者和无产者在社会上总会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债权人和债务人也有同样的区别。土地占有者集团、制造业集团、商人集团、金融集团和许多较小的集团，在文明国家里必然会形成，从而使他们划分为不同的阶级，受到不同情感和见解的支配。管理各种各样又互不相容的利益集团，是现代立法的主要任务，并把党派精神和党争带入政府的必要的和日常的活动中去……我们的结论是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才能求得解决。

如果党争所包括的人不是多数，可用共和政体的原则求得解决，这就是使多数人用正规投票的方法来击败其阴险的企图。党争能妨碍行政管理，能震撼社会，但不能在宪法的形式下进行，并掩饰其激烈的情况。另一方面，当党争包括大多数人在内时，民众政府的机构能使他们把公益和其他公民的权利当作占统治地位的感情或利益而做出牺牲。因此，我们所要探究的重大题目就是，保护公益和私人权利免受这种党争的威胁，同时保持民众政府的精神和形式。"[此段直接引用自中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

费城会议的代表们（以及各州的代表们）自愿解除这些权力归中央政府所有的情况是前所未有的——只有通过妥协才能使其成为可能，而这种妥协则集中体现在奴隶制问题上。经过妥协，宪法规定到1808年为止的20年内允许奴隶制继续存在但限制奴隶的进口。对进口的每一个奴隶征收高达10美元的税是被允许的。此外，每个州都被责令认可其他州的法律和法庭命令；因此，逃跑的奴隶若逃往其他州则将被遣返，如赃物一般（经济推理命题3）。那么奴隶究竟仅仅是财产还是人？奇怪的是，宪法从两个方面来看待奴隶：首先，奴隶是财产，正如在殖民地时期那样；其次，每个奴隶又被视为3/5的人，这样是为了能确定每个州在众议院的席位，因为这是根据各州人口来计算的。

会议的争论集中在州与国家的利益对比问题上，并暂时地暗示：那些没有授权给联邦政府或没有在各州禁止的权利，都由各州（或者说人民）保留。为了加强这些被保留的权利，《权利法案》增加了第十条修正案，以确保各州有权来确定地方和州的法律，例如许可证交易、商业监管、税收、区域法、民事行为等等，并使用警力执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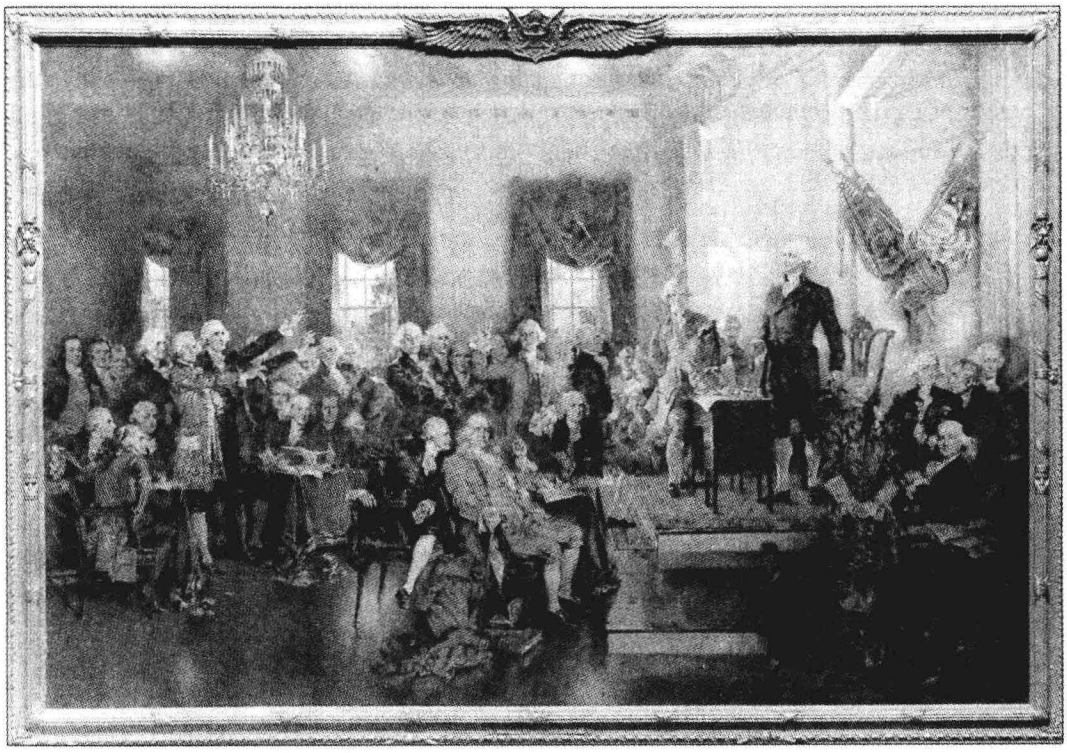
而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新国家则保留了宝贵的英国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在法院裁定基础上形成的这一系列法规，已经良好地运作了数个世纪，而且1774年的第一届大陆会议也正式宣布将英国普通法作为美国人权法。[①] 许多州重申了这一声明，而只要它们的法律法规和解释与宪法（本国最高法律）是一致的，则司法解释将保留给各州。任何冲突和质疑都需由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如有必要）进行裁决。

宪法为我们今天享有的私有财产权奠定了基础。宪法限制了政府的专制权力并增进了个人安全，而这些都促进了提高生产力的各种活动。特别简单明了的是，法院解释和《权利法案》生效以来的16次修正案证明了宪法是灵活的。

宪法基本概念的起源也许并没有单一的原始来源。然而在独立宣言向世界宣告政治自由的那年，即1776年，一个模样古怪的苏格兰人——他拥有经济方面的渊博知识——为经济自由提供了一个动人的理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最终成为畅销书，而亚当·斯密也变得出名、备受敬仰。包括美国领导人在内，各个地方受过教育的人们都阅读了他的伟大著作，纷纷惊叹于他简明的语言和严厉的批评——就重商主义对经济进程的阻碍。有评论员说亚当·斯密善于表达写作之前就已经长久存在的力量，这并没有贬损亚当·斯密的巨大影响力。在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是对私有财产安排的优势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及遵纪守法的坚定信念——法律和秩序对保护财产和机会均等来说至关重要。因此，将宪法的政治保障与它对于个人自由的基本保证相匹配的将是那些规范、习惯以及其他法律，它们建立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经济保障，而这对一个自我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美国尤其适合斯密关于经济秩序的理念，以自身利益为导向，从而限制了政府的规章条例，但不仅保证了国内安宁，也确保了外国无权

① 关于普通法的起源、发展、意义以及陪审审判同罗马法的对比研究，详见 Chapter 13 in Winston S. Churchill,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 I. The Birth of Britain* (New York: Dorset, 1990)。

干涉本国的内政——只有强大的中央政府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 BETTMANN/CORBIS

这幅画作描绘了费城会议正式闭幕并将宪法送达各州以征得同意的情形，突出表现了在没有空调的年月里，代表在7月底、8月及9月的这段时间内所处的炎热的工作环境。

美国独立与经济变化

1789年宪法的通过以及更强大的联邦政府的出现，并没有立即给美国带来重大影响。当时重要的政治决策是解决相应的复杂的经济难题，而中心问题是其自身的独立性。这个年轻的国家突然发现它已身处大英帝国的围墙之外，而即使是战时与法国及西班牙的贸易联盟也很快开始崩溃。

在加勒比海，美国船只不允许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直接进行贸易。那些试图逃避法律的美国商人则可能会被官员扣留。西班牙收回曾赋予美国的同古巴、波多黎各以及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直接进行贸易的战时特权，从而加重了美国的困境。此外，西班牙还恢复了对殖民地贸易限制的传统政策，只允许其从西班牙进口商品。美国与法国西印度群岛的贸易有所增长，但也不足以弥补与其他加勒比岛屿间商业贸易的下降。即便与法国的贸易活跃，美国也不能从法属群岛进口食糖；而只有在面临严重短缺时，法国人才会从美国进口面粉。另外，法

国人对美国的咸鱼和肉征收高额关税，而这些产品又是完全禁止进入英属岛屿地区的。

限制法规和贸易缩减也不仅局限于加勒比地区。现在美国人也切断了与纽芬兰和新斯科舍省的英国渔场的直接贸易。结果，在与北方的粮食、木材、朗姆酒和航运服务等方面的贸易中，新英格兰遭受了重大的损失。由于不再受英国旗帜的保护，也已经与英国献给突尼斯、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政府的贡礼无关，在东边和地中海一带，美国船只还面临着巴巴里海盗（Barbary pirates）的骚扰。

当美国航运业凋敝时，其造船业以及后备产业如木材、松节油等也一片颓势。英国将美国制造的船舶归为外国产品，因而便没有资格在帝国内进行贸易——即使它们是被英籍国民所拥有。其结果是美国的造船专家丧失了主要市场；1783 年后，由于美国鲸油面临过高的英国关税，美国的船舶生产进一步下降。事实上，几乎所有需要使用美国制造的船只的活动（如鳕鱼捕捞、捕鲸、商品和航运服务），都属于被抑制的行业；而作为这些活动的中心，新英格兰在独立的最初几年里受苦最多。

此前是殖民地的中部各州也受到了影响。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共同承受着造船业的损失。此外，与西印度群岛在小麦、面粉、腌肉以及其他食物上的贸易水平也远低于和平的殖民地时期。到 1786 年，中部殖民地或许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商业衰退的低谷了，然后情况开始好转——因为这些产品又重新被传统的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南部市场所接受。

类似的问题也困扰着南部地区。例如，英国对大米征收进口税，从而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的种植园主们在西印度群岛和欧洲南部的主要销售市场便受到了限制。而随着大米的价格下降，靛青和松节油储备在补助金和补贴上的损失也带来了进一步的倒退。由于生产能力缺少可替代的用途，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面临着特殊困境。它们的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类似的，作为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主要产品——烟草，所面临的市场也十分不景气。在英国，每磅外国烟草都要征税 15 便士。在法国，存在一个单一购买垄断机构——兴农专营（Farmers-General），由它来控制烟草进口。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完全禁止进口美国烟草。这些经济变化都是殖民地选择独立的结果（经济推理命题 1、2 和 4）。

弥补这些限制规定的则是一些积极的力量。之前被“列举”的货物，现在也可以与欧洲大陆的港口直接贸易。这降低了诸如烟草等商品的运费和手续费，因而对降低它们的价格有积极影响。同时，英国工业品大量涌入美国港口，其价格大幅降低。虽然美国制造商受到损害，但消费者却很满意，因为与殖民地晚期相比，贸易条件（进口价格与出口价格之比）有所改善。1783 年和 1784 年尤其如此，其时进口价格略低于战前水平而出口价格稍高。尽管如此，此后贸易条件也变得不再那么有利，到 1790 年，与战前相比，在这些相对价格的调整方面已几乎没有优势了。

经济变化的数量分析

为了能更系统地以长远观点来表达这些变化，比较殖民地晚期和独立后紧接着几年的经济状况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并不能完全代表独立对经济的影响；贸易模式和转变程度以及其他许多已经发生的经济变化，都受到了独立以外的其他力量的推动作用。然而，对殖民地晚期与18世纪90年代早期的比较，却能为这个年轻国家的新方向和前景提供一些重要的洞察。

表7—1说明，到1790年，美国利用了其新的直接与欧洲北部的各国贸易自由的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与法国和荷兰的烟草贸易，但大米、小麦、面粉和玉米（印第安玉米）也大量运往那里。虽然新的贸易格局出现了，但美国出口的绝大部分仍是销往英国，包括那些再出口到欧洲大陆的产品。人们纷纷猜测英美关系恢复的原因。部分原因可能是英国以最好的价格和质量提供了最多种类的产品，尤其是羊毛、亚麻布制品和五金器具。此外，英国商人享有共同语言、已建立的贸易往来和对美国市场足够了解等优势。因为美国进口货物是由英国商人处理的，因而将英国港口作为美国出口的中转点（dropping-off points）就十分有利，哪怕是那些发往欧洲大陆的货物。

表7—1　1768—1772年从13个殖民地以及1790—1792年从美国销往海外地区的年均实际出口额

（千英镑，以1768—1772年价格计算）

目的地	1768—1772年	占总数的百分比（%）	1790—1792年	占总数的百分比（%）
英国及爱尔兰	1 616	58	1 234	31
北欧	—	—	643	16
南欧	406	14	557	14
英属西印度群岛	759	27	402	10
属其他国的西印度群岛			956	24
非洲	21	1	42	1
加拿大殖民地	n. a.	—	60	2
其他	—	—	59	2
总计	2 802	100	3 953	100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Economic Change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ewar and Postwar Comparisons of Maritime Shipping and Trad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3 (1976): 397—422.

同时，新的贸易格局也正在加勒比地区出现。在独立战争前，美国与英属西印度群岛的贸易远多于与其他外国岛屿的贸易，但到1790年，情况则正好相反，这主要是由于英属群岛对美国船只的驱逐。毫无疑问，许多美国船舶会非法穿越英属加勒比水域，而荷属的圣尤斯特歇斯（St. Eustatius）也仍然是英属岛屿获得供应的贸易中心——正如在战争时期那样。所以，表7—1的数据夸大了这种转变。尽管如此，美国与加勒比非英属地区的贸易在这些年的增长也十分明显。这一趋势在独立战争前就已经出现，只是战后对美国航运的限制无疑起到了加速作用。

最后，在这个转变期内，去往传奇而遥远的地方的新贸易没有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出现，这不值一提。贸易模式的转变实际上相当温和。

随着贸易模式的改变，许多贸易商品的相对重要性也发生了变化。例如，18世纪90年代早期最重要的出口产品已不再是烟草，而是面包和面粉。尽管烟草生产增长缓慢，但上升的烟草价格却有助于烟草产地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经济的复苏。而其他重要的南方产品，如沥青、焦油、大米和靛青，其价值和生产数量却是同时下降的。出口奖励的损失以及战后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靛青产量上升，加剧了靛青产业的衰退。这一时期最明显的变化，是诸如腌制肉类（牛肉和猪肉）、面包、面粉、玉米和小麦等食品出口的上升。当然，这些增长是随着美国同西印度群岛相关贸易的上升而发生的。不过因为食品运往西印度群岛的上升趋势在独立战争前就已经显现，所以并不是所有这些商品的转变都能完全归功于独立。

正是由于这些贸易模式和程度的不断变化，一些州的社会经济福利得到改善，而另一些州却落后了。表7—2列出了这一期间每个州的人均出口额（调整通货膨胀因素后）。到了18世纪90年代，新英格兰已经恢复到和战前相同的人均水平。尽管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宾夕法尼亚州经济严重衰退，但大西洋沿岸中部地区却呈现出改善。正如表7—2所示，南部地区的贸易并没有跟上其不断增长的人口的步伐。虽然南方的绝对出口额到18世纪90年代早期便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但人均出口却明显低于殖民地时期，而其中较南端的南部地区受到尤为严重的影响。再次强调，尽管如此，但其实由独立引起的衰退并没有比欧洲对南部主要产品需求增长的下降所引起的衰退严重。

表7—2　　1768—1772年13个殖民地以及1791—1792年美国的年均出口额

（千英镑，以1768—1772年价格计算）

产地	1768—1772年			1791—1792年		
	总出口额	占总数百分比（%）	人均出口额	总出口额	占总数百分比（%）	人均出口额
新英格兰	477	17	0.82	842	22	0.83
新罕布什尔	46	2	0.74	33	1	0.23
马萨诸塞	258	9	0.97	542	14	1.14

续前表

产地	1768—1772 年 总出口额	占总数百分比（%）	人均出口额	1791—1792 年 总出口额	占总数百分比（%）	人均出口额
罗得岛	81	3	1.39	119	3	1.72
康涅狄格	92	3	0.50	148	4	0.62
中大西洋地区	560	20	1.01	1 127	30	1.11
纽约	187	7	1.15	512	14	1.51
新泽西	2	—	0.02	5	—	0.03
宾夕法尼亚	353	13	1.47	584	16	1.34
特拉华	18	1	0.51	26	1	0.44
上南部地区	1 162	41	1.79	1 160	31	1.09
马里兰	392	14	1.93	482	13	1.51
弗吉尼亚	770	27	1.72	678	18	0.91
深南部地区	604	22	1.75	637	17	0.88
北卡罗来纳	75	3	0.38	104	3	0.27
南卡罗来纳	455	16	3.66	436	12	1.75
佐治亚	74	3	3.17	97	3	1.17
总计，所有地区	2 803	100	1.31	3 766	100	0.99

资料来源：James F. Shepherd and Gary M. Walton, "Economic Change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ewar and Postwar Comparisons of Maritime Shipping and Trad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3 (1976): 397 - 422.

各州面临的变化广泛而多样，使得进行全国性的概括总结是极其冒险的。总体而言，每年实际人均出口额发生了 30%的下滑。总出口额增长 40%，但却远远低于人口 80%的剧增。伴随着这种变化的是城市化速度放缓。尽管所有州的总人口大幅增长，但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等主要城市在这期间仅增长了 3%。人均出口下降、城市发展停滞，这两者在和平时期都极少见。然而正如所强调的那样，这些总计数据所掩盖的与它们所揭露的一样多。南部的衰退十分严重；只有纽约州和新英格兰（新罕布什尔州除外）从贸易中断中完全恢复。

战争、中立以及经济复苏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美国在整个 18 世纪 70 年代晚期和 80 年代大部分时间

遭遇经济倒退之后，便是数年的蹒跚前进和不完全恢复。然后，法国大革命爆发后仅四年，即 1793 年，法国和英国开始了一系列战争并持续到 1815 年。[①] 在这漫长的斗争中，英国和法国的货船均应征入伍，因而这两个国家都放松了其严格的重商主义政策。在所有最能填补由拿破仑战争带来的航运空白的国家中，新生的美国站到了最前端。

由于这些发展，这个国家的经济迅速地从前几年的萧条中振作起来。图 7—1 统计绘制了这些美国海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正如该图所显示的那样，从 1790 年至英法战争高峰期的时间内，其国际收支平衡（出口加上外汇收入的其他来源）中的人均贷款增长了两倍多。经济透视 7.1 详细讨论了这些年海外贸易在国家收入中的比例。毋庸置疑，这几年对于美国尤其是东部港口城市来说是不平凡的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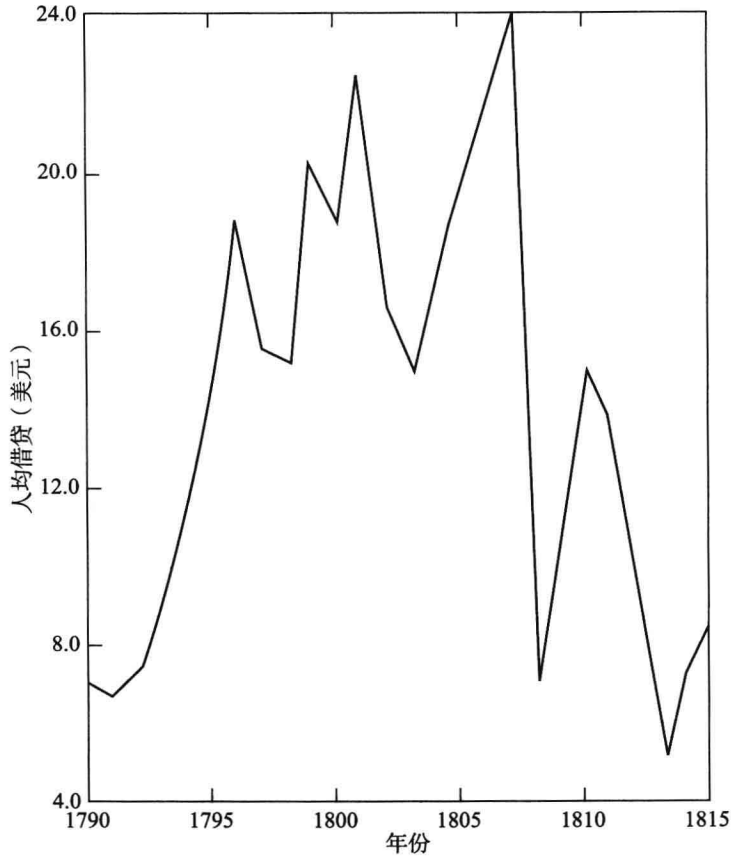


图 7—1　1790—1815 年美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人均借贷

资料来源：Douglass C. North, "Early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1961): 390.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① 1801 年晚期签署的《亚眠条约》(Treaty of Amiens)，带来了一年半时间的和平。

月——一个不寻常的繁荣和经济活跃的年代。这是一个以充分就业和城市化急剧上升为特征的时代，至少直到1808年是如此。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的一些著名企业家，诸如斯蒂芬·吉拉德、阿奇博尔德·格雷西、E. H. 德比和约翰·雅各布·阿斯特等，在此期间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这些以及其他的资本积累推动了一个完善的商业部门的发展，并最终促成了早期的制造业。

认识这数十年里经济中商业部门的重要性和商人阶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日益成长的商人阶级也曾在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现在，他们又提供了充分利用新的经济环境所需的企业家才能。随着蔓延的欧洲战争开辟了特殊的贸易机会，美国发达的商业部门开始供应战争所需的建筑物和船只以及专有技术。总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已就绪，而且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时期的成功起源于早在殖民地时期的发展。也正是早先的这些发展才成就了美国作为战争时期最重要的中立国。不是加勒比海、拉丁美洲或者加拿大的港口，而是美国的港口成为大西洋西部的贸易集散地。

经济透视 7.1

海外贸易和总收入

海外贸易在国家收入中的比例有多大？海外贸易是否庞大到值得我们对它如此重视？为了回答这些关键性问题，我们准备了一些计算。

以1774年作为基准年，我们从表2—1可以看出，当时殖民地有240万人，而从表5—4，我们可算出平均年收入大约为10.7英镑（使用3.5∶1的资本产出率），因而总收入就是2 570万英镑（=10.7英镑×240万）。

在表4—5，我们计算了商品出口的总和，加上船舶销售额，加上无形收益（但不包括英国军事人员开支），用这些来表示海外贸易和航运活动带来的年均收入值（1768—1772年）。这些也许稍低于1774年的收入，因而我们有一个下界：280万英镑（出口）+14万英镑（船舶销售）+88万英镑（无形收入）等于382万英镑。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从海外贸易和航运所得到的收入几乎达到了总收入的15%。

另一个支持海外经济活动重要性的论据是：这些活动都是市场活动，能够将资源从低价值用途引向较高价值的用途。不是赖以生存的农业、狩猎和伐木等，而恰恰是商业部门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市场扩张、经济分工、技术转移和资本积累，并推动了生产力和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最后，如果沿海殖民地间的贸易加到海外贸易和航运收入（占总收入的15%）中，那么组合的比例就接近总收入的1/5。

对海外（和沿海）贸易重要性进行数量分析的结果，以及这里提出的基于经济增长理论的论据，都促使我们重视并将这一部门视为殖民地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部门。

西进运动和持续不断的自给自足活动，减缓了人均收入的下跌。毫无疑

问，人均国内贸易并没有下降到和人均出口同样的程度（不幸的是我们并没有那个忙乱岁月的国内贸易数据）。因此，对外关系可能夸大了这一时期的整体倒退。但我们还是能安全得出结论：早期国家时代的政治混乱伴随着极为恶劣的经济条件。实际上，政府问题导致经济疲软，而经济事件则反过来暴露了《联邦条例》下政府的缺点。

这些是进入1793年时的情况，而在这一年拿破仑战争爆发，伊莱·惠特尼发明了轧棉机。这些事件带来的广泛后果在殖民地时代从未能被预见到。尽管如此，殖民地已经形成了对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的商业基础。因为有了它在海外贸易的早期努力，新生的国家已经准备好迅速利用处于战争的世界给中立国提供的经济机会。

图7—2显示了战争和中立对美国航运收入的影响。大体上，这些统计数据传达了与我们在图7—1所看到的一样的图像，也就是说，这些是商业界非常繁荣的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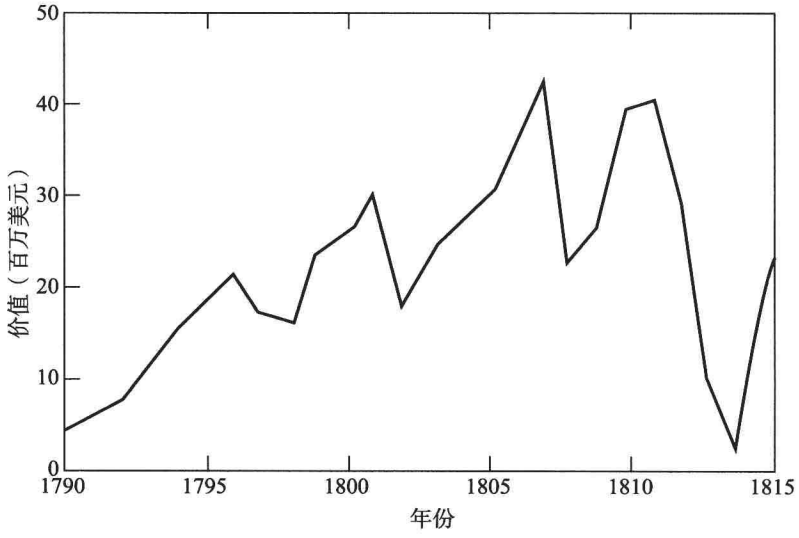


图7—2　1790—1815年美国运输业的净货运收入

资料来源：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26, 28.

虽然轧棉机刺激了棉花的产量，对应英国纺织厂对原棉的需求增长，美国的棉花供应量上升；但商业增长绝不局限于在美国生产的产品。正如图7—3所示，美国港口的大部分出口额都包括了转口货，特别是糖、咖啡、可可、胡椒、香料等一些热带产品。但由于其商业部门相当不发达，加勒比岛屿和拉丁美洲主要依靠美国的航运和商贸服务。

当然，这些独特的条件并不能提供长期发展的基础，并且（如图7—1、图7—2和图7—3所示）当短暂的和平在1801年末与1803年之间到来时，美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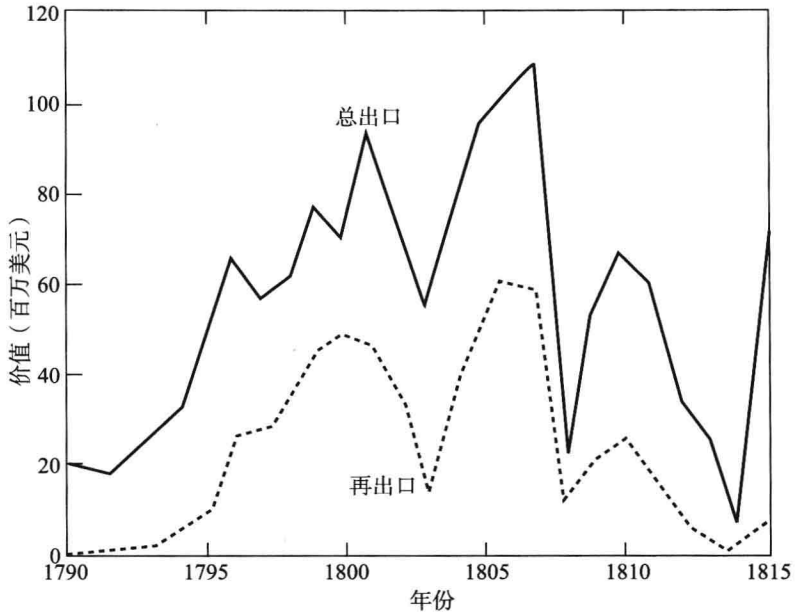


图 7—3　1790—1815 年美国的出口价值和再出口价值

资料来源：Douglass G. North，*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1790—1860*（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 Hall，1961）：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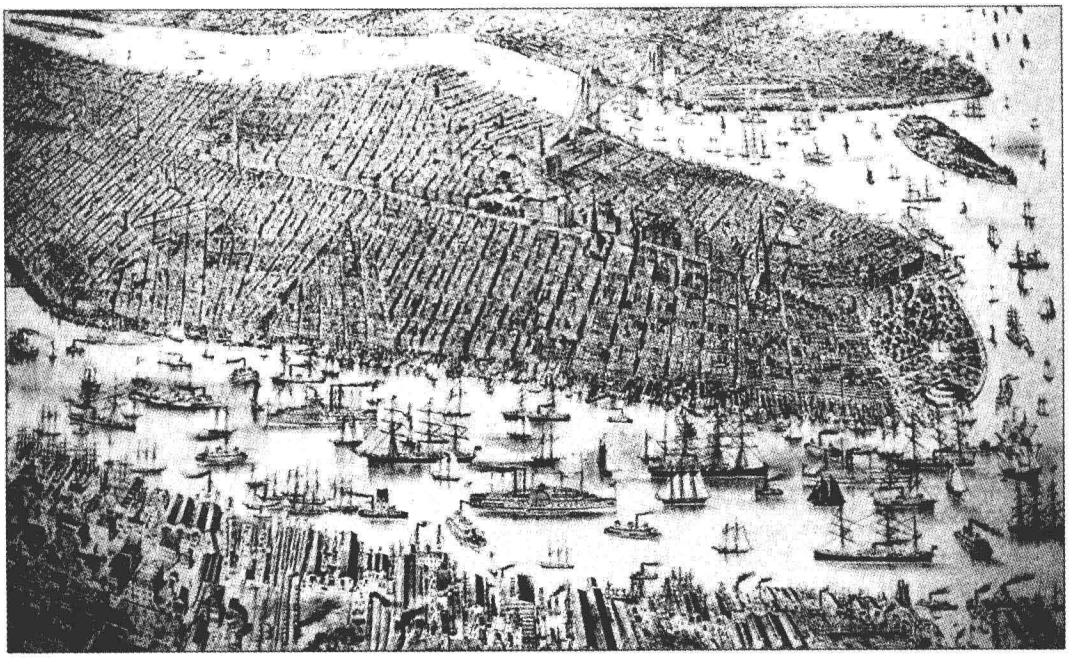
商业繁荣很快就消失了。当战争再次爆发时，美国又经历了一次商业活动的急剧高涨。但是，这一次，新的严重问题随着经济扩张而出现。1805 年，英国实行了一项过时的裁决——《1756 年规则》（Rule of 1756）——允许战时中立国只运输那些它们在和平时期通常运输的商品。这一裁决，被称为《埃塞克斯决议》（Essex Decision），与拿破仑禁止欧洲大陆与英国通商的《柏林敕令》（Berlin Decree）旗鼓相当。结果，近 1 500 个美国船只和许多美国船员被扣押，有的甚至被强行征入英国皇家海军。国会和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担心美国被卷入战争，宣布了 1807 年《禁运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禁止美国船只同任何外国港口进行贸易。

基本上，这种为美国中立取得尊重的尝试事与愿违，图 7—1、图 7—2 和图 7—3 中的急剧下降也表明，该补救措施适得其反。随着港口城市压力的增加，政治行动导致了 1809 年《不进口法案》（Non-Importation Act of 1809）。这一法案允许部分开放贸易，但特别禁止同英国、法国以及其属地通商。

然而，英美之间在加拿大边界连续不断的扣押和其他纠纷最终导致了战争——30 年内与英国的第二次战争。1812 年战争（War of 1812）主要是海战，期间英国缴获了 1 000 多艘额外的船只并几乎封锁了整个美国海岸。

由于出口已经下降到几乎为零，小型制造业部门迎来了新的增长。事实上，早在实施 1807 年《禁运法案》时这些行业的生机就已经开始出现，并迅速改变了商业相对于制造业的利润可能性。随着工业制造品价格上涨，不断上升的利润可能性鼓励资本流向制造业。1808 年的 15 家纺织厂，到 1809 年的时候已经增加

到近 90 家。类似的增加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持续着，但当 1814 年的《根特条约》（Treaty of Ghent）宣告战争结束时，纺织业便严重衰落。再一次，英国商品大量涌入，并廉价出售（之前价格被禁运和战争所带来的供应短缺暂时抬高了）。只有大规模的美国企业才能经受住这场竞争风暴，但却少之又少——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使用沃尔瑟姆织布系统的洛厄尔工厂（参见第 10 章和第 11 章）。不过，制造业与战争相关的短期爆发为进一步的工业扩张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不仅是在纺织业——当时主要的工业活动——还包括其他领域。这标志着一个经济中不同部门的角色开始更替的时代。农业在这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着经济，但随着经济增长的持续，其地位已经越来越次要了。



© RAPHO/PHOTO RESEARCHERS

19 世纪中叶纽约市港口繁华的景象反映了美国作为一个贸易中心而崛起。

拿破仑战争早期（1793—1807 年）的经济高涨是独一无二的，这与其说是因为与此后年代相比，不如说是因为 1772 年以后的 20 年来它自身惊人的逆转和发展。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弗兰克·刘易斯的研究表明，在拿破仑战争开始后的 15 年里，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平均约为每年 1%，其中，国外部门在经济增长基本来源中所占的比例超过了 25%。①

相比之下，在 1793 年之前的 20 年里，人均出口额却降低了（见表 7—2）。

① Claudia D. Goldin and Frank D. Lewis, "The Role of Export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1793—1807,"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 (1980): 6 - 25, especially p. 22. 关于中立的作用的另一种解释，详见 Donald R. Adams, Jr., "American Neutrality and Prosperity, 1793—1808: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713 - 738。

戈尔丁和刘易斯估计，1774—1793年间人均收入以每年0.34%的速度下降[①]，而人均持有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大幅下降。[②]

毫无疑问，独立之后的数十年都非常不稳定，不仅仅是20年的萧条和其后15年的繁荣。在这较长的萧条或繁荣期内也是起伏不定。由于当时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出口不稳定对整个经济都有很强的杠杆效应。尽管外部力量在决定经济波动方面一直是一个重要因素，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影响曾在20世纪70年代提醒了美国的消费者、工人和企业：他们几乎全部的优势如今正在开始减弱。而在世纪之交，国内的发展——尤其是银行业的发展——在引起经济波动方面承担了更关键的作用。正如我们将会在第12章所看到的，在19世纪早期，外部力量（通过信贷流入或流出海外起作用）和内部力量（通过信贷状况和货币存量的变化起作用）同时对经济施加了影响。而对于年轻的美国人来说，最大的挑战和机遇则是在西部的新土地上定居和工作。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dams, Donald R., Jr. "American Neutrality and Prosperity, 1793—1808: A Reconside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713 - 738

Beard, Charles A. *An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stitution* (New York: Macmillian, 1913).

Bjork, Gordon C. "The Weaning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Independence, Market Chang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1964): 541 - 560.

Calomiris, Charles W. "Institutional Failure, Monetary Scarcity, and the Depreciation of the Continenta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47 - 68.

Gilbert, Geoffery. "The Role of Breadstuffs in American Trade, 1770—179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378 - 387.

Goldin, Claudia D., and Frank D. Lewis. "The Role of Export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during the Napoleonic Wars, 1793—1807."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 (1980): 6 - 25.

Jensen, Merrill. *The New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Confederation* (New York: Knopf, 1958).

Jones, Alice H.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Matson, Cathy. "The R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Nation."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eds. Stanley L. Engerman

① Goldin and Lewis, "The Role of Exports," 22 - 23.

② Alice H. Jones, *Wealth of a Nation to B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82.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363 - 401.

McGuire, Robert A., and Robert L. Ohsfeldt.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American Constitution: A Quantitative Rehabilitation of Charles A. Bear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June 1984): 509 - 519.

——. "An Economic Model of Voting Behavior over Specific Issues at the 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 of 178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1986): 79 - 112

Nettels, Curtis P. Chapters 3 and 4 in *The Emergence of a National Economy, 1775—1815*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2).

North, Douglass C.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0).

——. "Early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s of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9 (3), (April 1961).

Shepherd, James F., and Gary M. Walton. "Economic Change after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Pre-War and Post-War Comparisons of Maritime Shipping and Trad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3 (1976): 397 - 422.

第 8 章　土地和早期西进运动

本章主题

1783 年 9 月签署的《凡尔赛条约》(Treaty of Versailles) 承认了美国人的独立以及他们根据古老的征服权要求得到的西部土地。这些首先被各州声明占有而后很快便转让给联邦政府的西部土地是有价值的资产，并为集体所有。如何最好地使用这一集体产品是个难题和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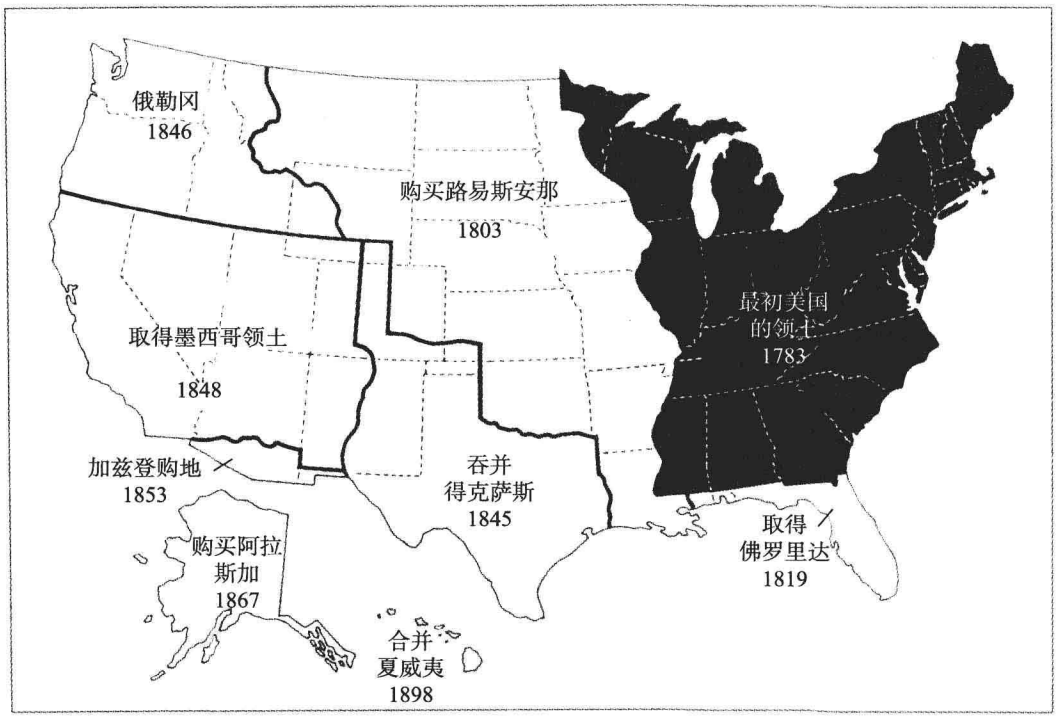
在很大程度上，1785 年和 1787 年伟大的《土地法令》(Land Ordinances) 确定了贯穿托马斯·杰斐逊的指导精神的土地政策。在其职业生涯中，杰斐逊对土地政策有三个主要目标：(1) 通过出售土地而不是永久税收来为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收入；(2) 传播民主制度；(3) 保证个人拥有的土地产权明晰，从而加强他们的自由并提供激励使其能运用并改良土地（经济推理命题 3）。而个人在购买、改进、经营以及出售土地方面的权利，也不可避免地创造了投机的机会。

由于担心一个过于强大且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政府的潜在威胁，杰斐逊提出应迅速而有序地将土地转让给人民。他提倡私有化进程。首先，应进行测勘并明确标出界限；联邦政府将土地卖给个人，必须完全转让所有权，并且不能对土地征税。随着人口和定居点向西扩散，领土将会形成，然后通过申请成为州，加入联邦并与现有各州平起平坐。所有这一切基本都源自杰斐逊的远见卓识——他留给我们的遗产的一部分。

公共领地的获得

在发动和资助了战争以后，新政府面临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问题就是如何处置西部的新土地。《联邦条例》坚持中央政府不能强制性地从各州手里拿走西部土地，而且有 7 个州拥有对西部土地的所有权。这些所有权都是基于殖民地从英国或者同印第安人的交易中所获得的最初的财产转让而来。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认为新的西部领土应当属于国家政府并以合乎国家利益的方式持有或处置。没有西部土地所有权的马里兰州，在土地问题解决以前拒绝承认《联邦条例》，从而将这一问题推到高潮。1781 年，在纽约州主动将其所有权（基于与易洛魁人的条约）移交给国家政府后，马里兰州最终签署了条例。弗吉尼亚州也紧随其后交出了对西部土地的所有权；在它们的带动下，另外 5 个州也立即效仿。

地图 8—1 中的深色区域标示了这个新国家在 1783 年从英国手中所获得的领土。美国开始了从大西洋沿岸至密西西比河、从五大湖区至（但不包括）佛罗里达州的全方位的土地扩张。



地图 8—1　土地扩张

购买路易斯安那标志着美国大陆扩张的开始，并在 1867 年购入阿拉斯加、1898 年合并夏威夷时达到巅峰。

从1802年佐治亚州最后一个放弃其对西部土地的权利，到1898年正式合并夏威夷，美国通过获得8块重要的领土几乎呈现了目前的版图（如地图8—1所示）：

（1）路易斯安那准州，1803年从法国手中购得。

（2）佛罗里达，1819年买自西班牙。几年之前，美国吞并了佛罗里达西部的狭长的土地。

（3）得克萨斯共和国（Republic of Texas），1845年作为一个州被吞并。这一共和国成立于1836年——在美国移民战胜墨西哥人之后。

（4）俄勒冈，通过1846年与英国的条约合并。最早声称占有这一地区的西班牙和俄国在很久以前便已经退出。根据《1818年条约》（Treaty of 1818），美国和英国同意联合占领俄勒冈和不列颠哥伦比亚；而在《1846年条约》（Treaty of 1846）中，又以49°纬线划界。

（5）墨西哥割让的土地，通过1848年战胜墨西哥获得。

（6）购买加兹登（Gadsden），1853年从墨西哥购得。

（7）购买阿拉斯加，1867年从俄国购得。

（8）合并夏威夷，于1898年正式批准。

国家获得新土地的手段，或是通过征服和缔结条约，或是通过购买。征服权是美国的一部分欧洲遗产——对非基督教社会发动战争时由欧洲君主所要求的和基督教社会所承认的权利。欧洲早期十字军对穆斯林的多次东征，以及1492年西班牙侵略摩尔人，从这些事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这一点。欧洲对于这种强权的信仰——征服并统治北美的非基督教本土社会——随着独立的到来而被传递到美国的手中。这一传承最终延续到了19世纪，当时剩余的印第安人被迫前往保留地。这些行为及其相关的条约，至今仍是美国的印第安人在法庭上不断质疑的目标。

在半个世纪里（1803—1853年），美国获得了300万平方英里的大陆面积，其中有14亿英亩或者说75%是公共领地（public domain）。[①] 1862年，这片广大的地区仍有2/3掌握在政府手中，但其处理程序在很早以前就已商定。

公共领地的出售

除了极少数例外，土地在拓殖以前是没有价值的。为了赋予土地价值，联邦议会讨论了三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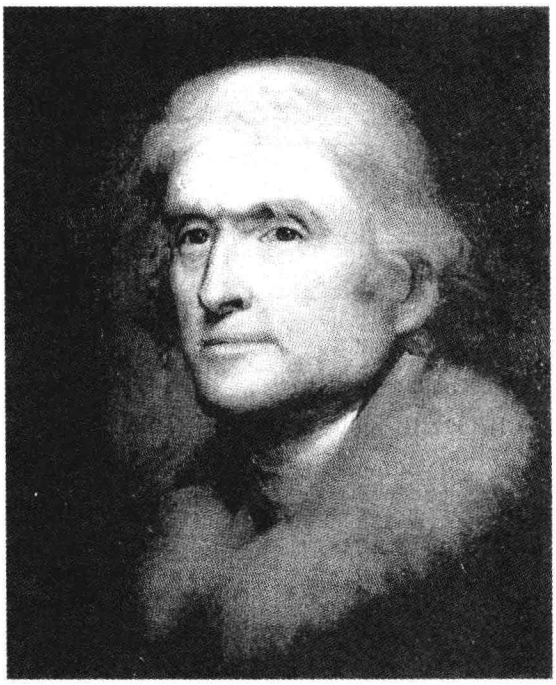
（1）如何管理土地持有和土地销售？

（2）政府应该从土地销售中索取高价吗？还是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廉价的土地？

（3）新拓殖的地区和最初的州之间的政治关系应该是什么？

---

① 后面两次获得的土地，阿拉斯加有超过586 400平方英里，其中大部分仍是公共领土；夏威夷使美国增加了6 423平方英里的土地，但都不属于公共领土。



© FRED MAROON/PHOTO RESEARCHERS

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于1801—1809年执政，他的许多领导行为，包括对重大的1785年和1787年《土地法令》所做出的贡献，都对这个国家产生了较早的深远影响。

两种主要的土地制度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形成。新英格兰的乡镇规划（township planning）制度，就乡镇的布置、乡镇细分为仔细测勘过的大片土地以及将土地拍卖给定居者都作了详细规定。在18世纪，分层建立乡镇是很普遍的，其面积通常为6平方英里。从已定居的土地到未开发的土地，新乡镇的建立以一种规律的方式持续进行着，那些未拓殖的土地看来不再常见，而且没有人能够拥有未经测勘的土地。与之相反，南部的制度未规定矩形测量法（rectangular survey）。在南方，拓殖者只是简单地挑选未被利用的土地上看起来肥沃的小块土地，然后申请郡测量员进行距离隔断。拓殖者不关注他们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之间的关系，而一块土地的法律性描述是根据其上所具有的永久的自然物，比如石头、树木和溪流。

1785年《西北土地法令》

直到1784年——弗吉尼亚州和纽约州放弃它们对位于俄亥俄河西北的南部领土的所有权之后——联邦议会开始感受到为公共领地提供一个管理制度的紧迫性。那一年，以托马斯·杰斐逊为首、共有5个成员的议会委员会，提出了一个以矩形测量法为基础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这5个成员中有3人来自南部，尽管他们出身于南方，但他们意识到了新英格兰解决办法的价值。虽然这次没有采

取任何行动，但一年后，由来自各州的成员组成了另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修改了1784年的报告并提出了经审慎考虑的建议。在做出细微改动后，这个提议作为1785年《西北土地法令》（Northwest Land Ordinance of 1785）得以通过。

就该法令为公共土地的处置建立物质基础来讲，其影响是持久的。如地图8—2中所示，政府的勘测员要在尚未定居的土地上确立称为基线的水平线和称为主子午线（principal meridians）的垂直线。第一条子午线就在现在的俄亥俄州，而第一次测量则覆盖了俄亥俄河北部的土地。最后，除了最初的13个州、佛蒙特、肯塔基、田纳西、俄亥俄的一部分以及得克萨斯，美国所有的土地都被纳入了测量的范围。这些是真正地利用恒星绘制地图的天体测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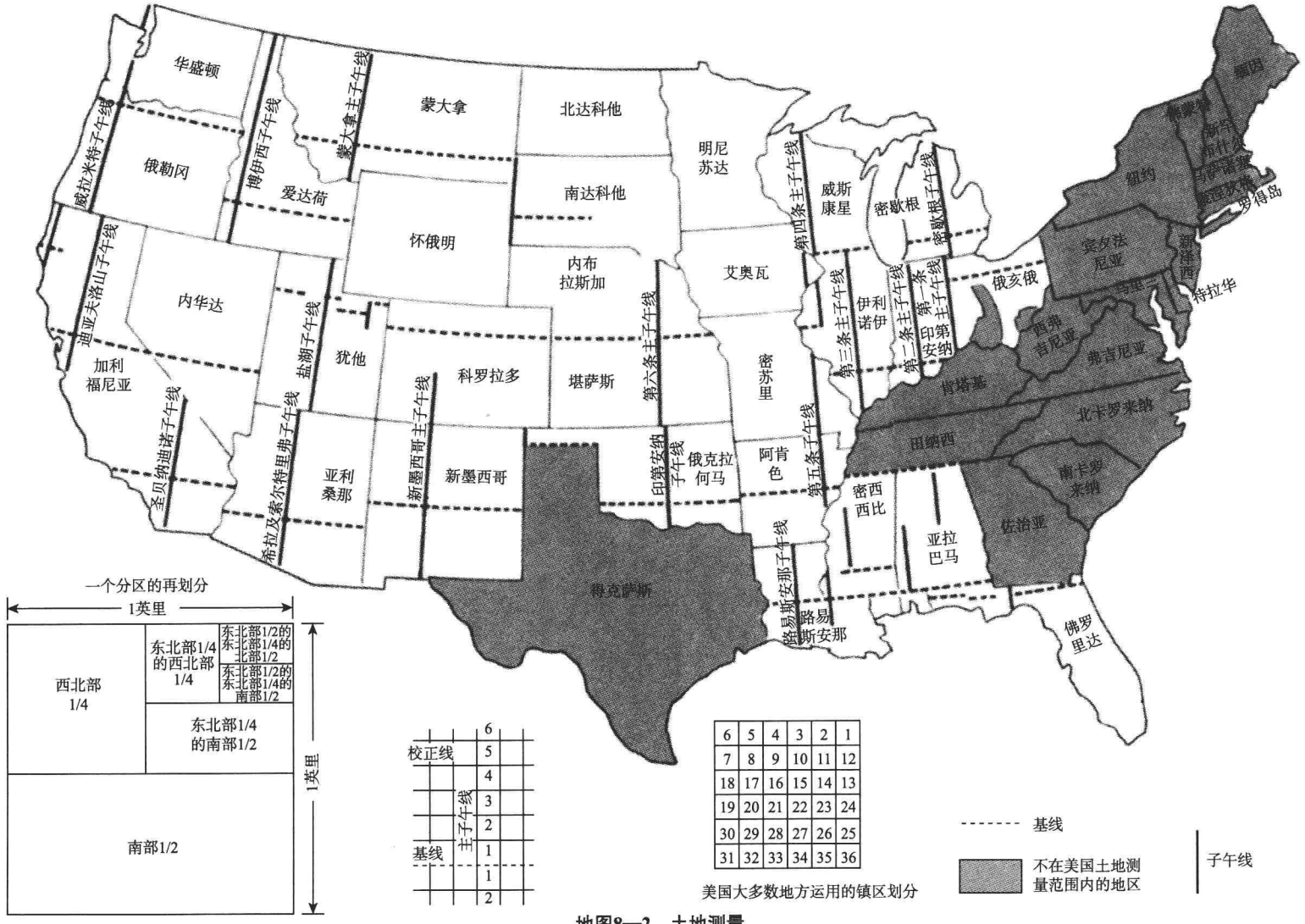
随着测量向西推进，其他的子午线也被一一确立——第二条在现在的印第安纳，第三条在现在的伊利诺伊等等。地图8—2标示出了其他的子午线和与其垂直的基线。其小图显示了称为区域（ranges）的多层乡镇是如何分布在子午线的东西两侧的。这些区域由数字和其相对于子午线的方向来标记；每个区域中的镇区，从基线开始往北或往南进行编号。每一个乡镇——6英里见方——包含有36平方英里，其编号如地图8—2所示。在1785年的《土地法令》中，每平方英里被称为一个份地（lot），但随后的法案则开始采用区域（section）一词。每平方英里区域有640英亩，而每英亩相当于一个足球场（70码乘70码）的大小。如果在晴天飞越美国，你会看见延绵不绝的棋盘样的四方形。

而在以何种条款向公众提供土地的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于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辩论随之而来。“保守派”政策的拥护者们，赞成以大片土地为单位、高价出售并需用现金支付；“自由派”（liberal）政策的倡导者们，则希望将土地以小块、低价出售并允许赊购，以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获得土地。

1785年《土地法令》反映了一个普遍认可的保守观点，即公共土地应当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尽管事实上，出售土地所获得的收益从未成为联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涉及出售土地的最小规模、价格和期限方面的规定是严格的。乡镇的一半按整体出售，另一半则以分区进行出售。所有售卖活动都以每英亩1美元现金的最低价格进行公开拍卖。因此，购买一个分区所必需的最低现金费用也高达640美元，这已超出了大部分拓荒者所拥有的财富。此外，一平方英里的土地已经超出了小农正常使用和劳作的能力，他们在第一年中勉强只能清理并耕种10英亩的土地，而四分之一个分区是一个移民者在没有成年子女的帮助下可以管理的最大面积。根据第一部法律，只有中间收入阶层的个人或者由大投资者构成的土地公司才有能力购买土地。

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

关于待拓殖地区的地位的决议还涉及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这些地区是要保持殖民依赖，遭受最初13个州的剥削，抑或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被并入联邦？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将检验出美国人的远见和无私，而他们刚成功地摆脱一个殖民帝国的统治（经济推理命题1、3和4）。



地图8—2　土地测量

基线和子午线，使得新开发的领土被精确划分为分区成为可能，并能简单描述对地区的再划分，从而简化了随后的所有权转移。

1787 年，国会讨论了为西部定居地确立政治原则的问题。1787 年《土地法令》规定西北领土应当以区为单位来划分，由国会委派的总督和法官进行管理。一旦其够投票年龄的男性居民达到 5 000 人时，这个地区就可以成立一个地区立法机构，并委派一名代表出席国会，但没有表决权。这一地区成立的州不能少于 3 个、多于 5 个；当任何一个准州地区的居民满 60 000 人时，它就将作为一个州正式加入联邦，并与原有州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该法令中包含了对该地区的公民和宗教自由、公正对待印第安人以及废除奴隶制的一些确定的保证。然而对这些新的地区而言，最重要的原则还是地位的最终平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古老的纠葛之源就这样被一个简单却空前的方法解决了，那就是承认帝国的殖民扩张地区在社会和政治上的平等。请回顾经济推理命题 4。

后来的土地法令，1796—1862 年

1785 年《土地法令》通过后十年，对俄亥俄河北部地区的开拓，不仅受限于政府土地的高价格，还受阻于印第安人的侵扰。多年来，那些坚持在西北部的美洲领土维持驻防的英国人，不停地鼓励印第安人与美国移民者开战。经过 1794 年的一个条约，英国同意撤离其在西北地区的据点，当年 8 月，“疯狂安东尼”韦恩（“Mad Anthony” Wayne）和他的军队在鹿寨战役（Battle of Fallen Timbers）中击败了印第安人。对于美国国会来说，制定新的土地政策的时机已经成熟。

1796 年《土地法令》意味着保守派的又一场胜利。矩形测量法的制度——基本上同 1785 年法令中所确立的一样——被永久化了。1796 年的法令中所允许的最小购买面积仍然是 640 英亩，但每英亩的最低价格则涨到了 2 美元；对廉价土地支持者的唯一让步，是一个关于信用支付的条款，允许购买价格的一半推迟一年付清。在这一法案下只有很少的土地被卖出去；1800 年国会将最低购买量下降到 320 英亩，而且允许购买者用现金支付一半后，两年内再支付 1/4，而最后的 1/4 只需在四年之内付清即可。1804 年的一项法律进一步地将最小购买量降至 160 英亩。而到 1820 年，自由派的力量取得了明显的胜利：最低购买量已降为 80 英亩，且每英亩价格也低至 1.25 美元；但信用条款却由于导致了政府的损失而被废止。12 年后，最低购买量被减少到了 40 英亩，所以在 1832 年时，一个拓荒者仅以 50 美元（低于一个普通劳动者两个月的工资）就能够购买一块农田。值得强调的是，这些价格都是政府制定的价格。事实上，许多移民者支付的价格都无疑低于这些“定价”。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退伍军人常常以“土地凭证”（land warrants）进行支付从而相同于减价购买到土地。而由于这些凭证是可转让的并通常被折价出售，其他人也和退伍军人一样，相对于官方定价支付了更少的现金。

那些在拓荒活动中敢于用生命去冒险的人们，其行为很少因为法律细节而受阻。刚开始，拓荒者们倾向于绕过已测量的地区拓殖并公开宣布出售。随着数十年过去，西部变得越来越“拥挤”，这一趋势也上升了。未经许可的拓殖，或者

说“擅自占地”，正是源于这些拓荒者们寻找更好的土地的尝试，也源于他们在精选的土地上拓殖并在被送交罚单之前使其成为流行主张的希望。

当然，擅自占地是非法的，但它是警方难以监督的违法行为。此外，还有人主张，通过使用和改良土地，一个擅自占地者将获得对其的权利——“小屋权”（cabin rights）、“谷物权”（corn rights）或者“汤米鹰权”（tommyhawk rights），正如他们在边界的各种不同称谓。最初，联邦军队试图将擅自占地者从未测量的土地上赶走，但成功只是暂时的。渐渐地，政府也越来越不重视这些拓荒者对法律的破坏了。为了对抗那些将在政府公开售卖时购买他们土地的人，擅自占地者们采取了非正式但十分有效的措施——拓殖到一个特定地方后，便立即成立一个保护协会；而当这个地方的土地被公开拍卖时，保护协会的成员会让大家明白，是不会有人对他们先占得的土地竞价的。拍卖会上出现的装备精良的拓荒者们，通常能使那些时髦而世故的城里人和大土地购买者相信，喊价是不明智的。即使在没有组织行动的地方，那些发现农场从他们手中被买走的擅自占地者们，通常能为他们所作的“改良”收取可观的费用，而边疆法庭也倾向于维护他们的“权利”。

早在1820年，国会就已开始向擅自占地者提供补助；而1830年在一些地方优先购买权仍不被承认的情况几乎只持续了不到一年。一部全面的《优先购买权法案》（Preemption Act），被其支持者称为《圆木小屋法案》（Log Cabin Bill），于1841年获得通过。这一法案准许拓殖在已测量但未公开售卖的土地上的任何人，都有权在拍卖举行时以最低价格购买160英亩的土地。没有人能够因出价高于这些定居者而获得土地，从而保证了这些擅自占地者能够以200美元的必要价格购买1/4个分区。但严格按照法律说来，擅自占有未测量的土地仍然是非法的，正是由于这一点，也由于对土地依旧没有完全承认，西部人民（以及其他依靠购买土地并等待其升值以赚钱的人）并不满意。然而，这个国家的土地政策，在保证公共领土为可持续收入来源的基础上已经尽了最大限度的自由。

国会仍然面临着降价的压力——那些在殖民者第一次蜂拥至西部时被忽略的不理想的土地上的“岛屿”。1854年，《分等级法令》（Graduation Act）给这些土地的最低购买价格规定了一个分层次的下降，而土地长达30年仍未出售时，就能被以低至12.5美分每英亩的价格购买。移民者们迅速地购买了这些土地，这证明了一个事实：即使是最没有希望的土地，人们也愿意去赌其微弱可能的升值。

在19世纪50年代，由于对免费土地的鼓吹持续不断，显而易见的是，《宅地法》（Homestead Law）的通过将不可避免。曾支持无偿补助真正的移民者的南方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强烈地反对。通常由宅地支持者们提出的160英亩的农场，并未大到使奴隶制经济合算运转；而且对于南部的国会议员来说，很明显，宅地将使西部充满反对奴隶制的人。另一方面，一般可能倾向于保守政策的许多北方国会议员，却加入了西部人民的阵营；他们也明白，免费的土地意味着自由的州。

1860年，一部宅地法获得通过，但由于总统詹姆斯·布坎南担心其会促成脱离联邦的情况，从而将该法令禁止。两年之后，随着美国内战迅速蔓延、南部

退出国会，1862 年《宅地法》正式成为法律。此后，一家之主或者任何年满 21 岁的公民，只需支付很低的费用，就可以获得 160 英亩的公共土地；而唯一的约束就是，农场所有人需要在这片土地上居住或者耕作达 5 年。还有一项重要的条款，即没有满足这 5 年期要求的移民者，也可以通过支付每英亩 1.25 美元的最低价格从而获得土地的所有权。

尽管根据 1862 年《宅地法》，许多土地将为私人所有，但这并不是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是一种恩惠。到这时许多一级土地已被认领。此外，法律的规定很容易规避，土地攫取者利用这一点，加上法案仍然允许直接购买，从而积累了大量土地财产。

向西部迁移

在讨论殖民地时期时，我们注意到在 18 世纪中期，拓荒者们正在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到 1790 年，100 万人中或许有 1/4 居住在山谷或者山谷以西的地方，西进运动的人流渐渐少到宛若小溪一般。在 18 世纪，存在两条西进的路线。更重要的一条是，通过坎伯兰山口（Cumberland Gap），然后进入田纳西或者肯塔基；另一条是横过宾夕法尼亚到达匹兹堡并顺着俄亥俄河下来。尽管向西的迁移在发展壮大，但拓荒者们仍是定居在宾夕法尼亚、纽约，以及向北在佛蒙特、新罕布什尔和缅因。

表 8—1 和图 8—1 描述了人口增长概况、西部迁移的分配效应以及其他的人口效应。1812 年，英美第二次战争前夕，仅有超过 100 万人（大约为总人口的 15%）居住在阿巴拉契亚以西。到 1860 年时，西部人口从 15%增长到了几乎全国人口的一半。南北战争前夕，人口中心在奇利科西（Chillicothe）、俄亥俄一带。当全国总人口从 720 万增长到 3 140 万时，西部人口则从 100 万增加到了 1 300万。总之，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的人口增长率高达东部地区的两倍——年增长率分别为超过 5%和 2.2%。

表 8—1　　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的各州的人口[a]

州	1810 年	1850 年	1860 年
俄亥俄	231	1 980	2 340
密歇根	5	398	749
印第安纳	25	988	1 350
伊利诺伊	12	852	1 712
明尼苏达	—[b]	6	172
威斯康星	—	305	776
艾奥瓦	—	192	675

续前表

州	1810 年	1850 年	1860 年
堪萨斯	—	—	107
肯塔基	407	982	1 156
田纳西	262	1 003	1 110
亚拉巴马	9	772	964
密西西比	31	607	791
路易斯安那	77	518	708
阿肯色	1	210	435
密苏里	20	682	1 182
得克萨斯	—	213	604
总计	1 080	9 708	14 831
美国总体	7 224	23 261	31 513
越过阿巴拉契亚山的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15.0%	14.7%	47.1%

a. 数据以千人为单位，不包括远西部和西部沿海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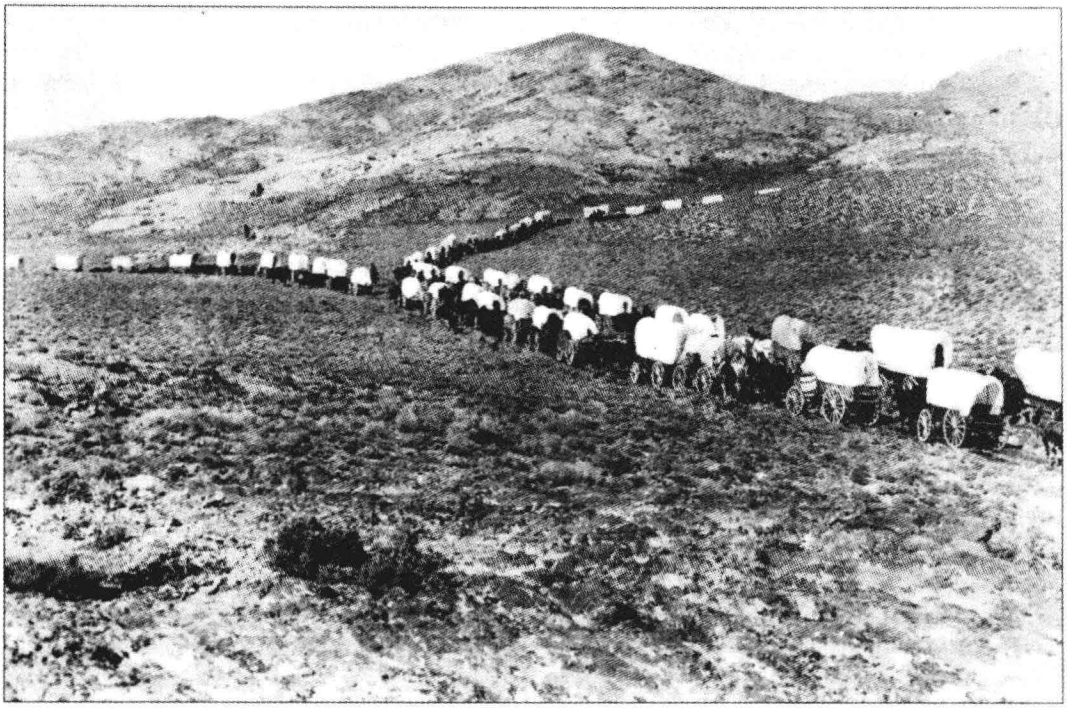
b. 没有数据。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derived from Series A，123－180.

随着人口扩张和向西推移，国家的边疆也向外扩展。边疆，正如人口普查报告中从技术上定义的，是任何每平方英里上人口在2～6之间的地区。在地图8—3上，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绘制了1800年、1820年、1840年以及1860年的边疆线。1800年的边疆线显示，一个楔子被打入了西部，而它的点恰在肯塔基西边。60年之后，界线向南移动，从明尼苏达中部的一个点，以一个显著的凸起到达内布拉斯加和堪萨斯的领土，并以一个明显的趋势到达得克萨斯。

西北迁移和猪、玉米以及小麦

正如表8—1和地图8—3所示，19世纪初横越国家表面的迁移行动发展迅速，而移民最初的领先力量则来自于南方各州。在19世纪最初的25年中，来自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各州的人们，川流不息地涌入俄亥俄北部各县、印第安纳，并在晚些时候进入密歇根南部。到1850年，密歇根南部已经有相当程度的定居，而伊利诺伊北部和威斯康星南部最好的土地也已经被移民宣称拥有。在南北战争前夕，拓荒者们将边疆的西北端推进到明尼苏达中心，艾奥瓦的大部分地



© CULVER PICTURES

19 世纪，马车队源源不断地将移民们送往西部及其扩张土地。

区都已在边疆线以内，而堪萨斯东部的大片区域也被拓殖。相对于堪萨斯，只有在田纳西 1860 年边疆线才更凸向西方。到这个时候，加利福尼亚成为州已有十年之久，俄勒冈则刚被承认不久，但西部疆界和海岸线之间的广阔地区在另外半个世纪中也没能够完全被定居。

横穿俄亥俄河的南方人，成为对旧西北地区南部的主要影响力量。在伊利运河使交通更为便捷后，新英格兰人便在五大湖地区占据了主导，但仍有另外起源于中大西洋地区各州的人流也汇入了他们。家庭大多都是单独迁移，尽管有时候也有高达 50～100 户人家一起行动。随着边疆向西推进，处于前端的拓荒者们往往也是在几年前开垦了附近的处女地的人。另一些人，则是那些曾参与了征服荒蛮之地的男女们的成年孩子。

在西进运动的初期，渴望土地的人们从国外持续不断地涌入。从 1789 年到 1812 年战争结束，有不超过 25 万人从欧洲移民过来；随着拿破仑最后战败以及国外和平的到来，移民人数再度恢复。人口流量从 19 世纪 30 年代的 50 万人，增至 40 年代的 150 万人，并在 50 年代达到了 250 万人。新来的人大都来自欧洲北部，以德国人和爱尔兰人为主，但也有很多移民是从英格兰、苏格兰、瑞士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来。在这些人中，德国人比其他人更倾向于直接抵达西部的土地。而其他团体中，有一些移民加入了农业移民，但大多数都成为东部城市人口。我们将在经济透视 8.1 里讨论西部移民的时间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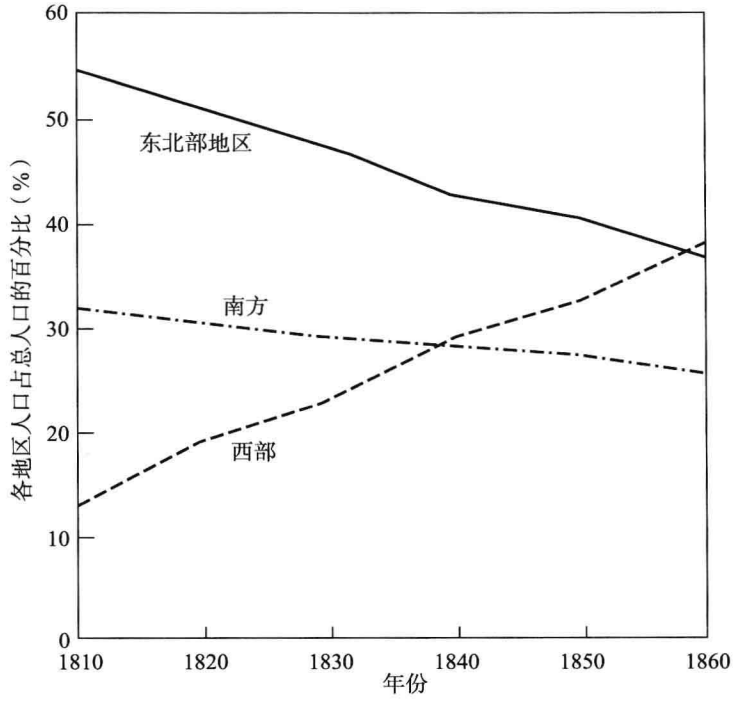


图 8—1　1810—1860 年按地区绘制的人口分布

注：南方——亚拉巴马、阿肯色、佛罗里达、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得克萨斯以及弗吉尼亚；西部——伊利诺伊、印第安纳、艾奥瓦、堪萨斯、肯塔基、密歇根、明尼苏达、密苏里、内布拉斯加、俄亥俄、田纳西、威斯康星、加利福尼亚、内华达，以及俄勒冈；东北部——康涅狄格、特拉华、马里兰、马萨诸塞、新罕布什尔、新泽西、纽约、宾夕法尼亚、罗得岛以及佛蒙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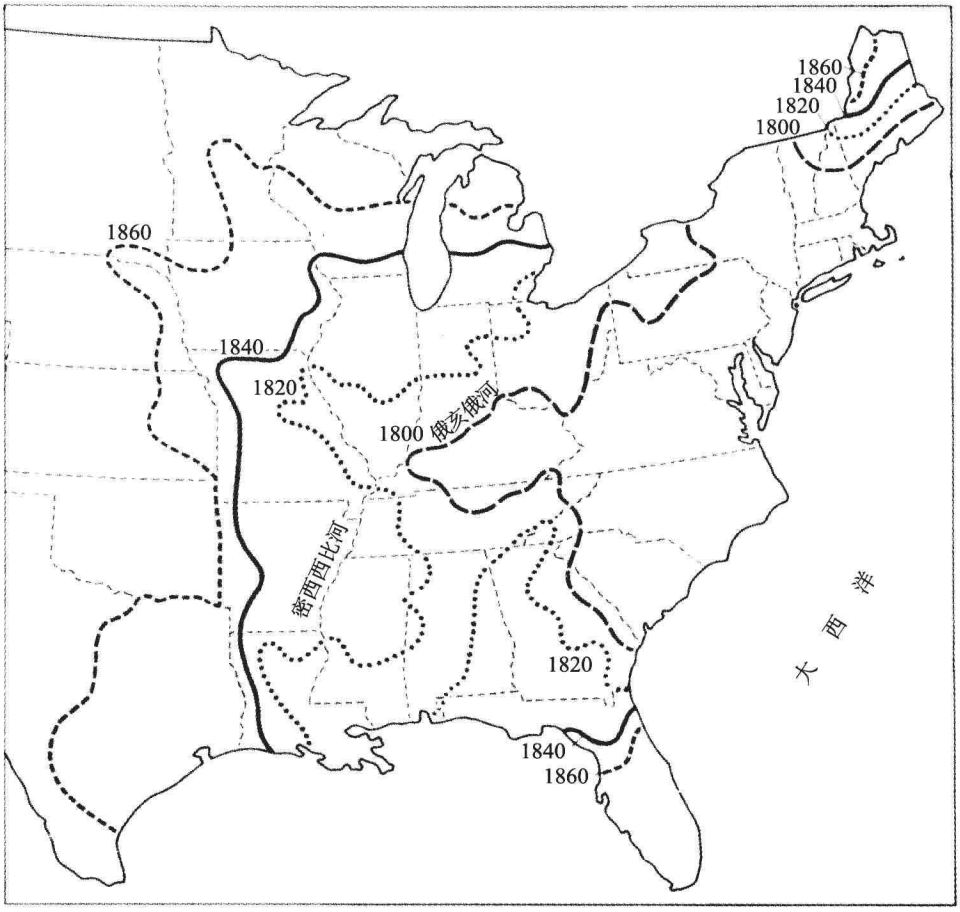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U. S. Census Bureau, *A Compendium of the Ninth Census*, June 1, 1870, by Francis A. Walker, Superintendent of Census (Washington, D. C.: 1872): 8 - 9. Reprinted from 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121.

农业专业化与区域错位

西北部（现今的中西部）地区产量激增的结果并没有立即扰乱原来各州的农业。尽管如此，但几十年来，猪、玉米和小麦的主要生产地已逐渐转移到了西部各州。

19 世纪初，西部的猪产量在很大程度上为高额的运输成本所限制；猪从俄亥俄经由陆路被驱赶到东部的城市中心，或者由船运往南部出售给种植园；牛群也被大批地赶往东部，在那里它们被出售后要么立即被宰杀，要么养到更壮。但不久之后，拓荒的农民就能够在离家很近的市场上销售猪了。屠宰场及肉类加工中心出现在早期的西部，而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绰号“猪肉城市”（Porkopo-

lis）的辛辛那提成为全国最重要的猪肉加工城市。



地图 8—3　边疆线的移动

1800 年的统计数据记录了不断向西的人口流动。“边疆”的轮廓由自然景观以及一些人为和地形障碍所决定，对冒险者具有极大的吸引力。

经济透视 8.1

移民浪潮和经济机会

对于西部迁移的时间进程，有没有一个经济学解释呢？虽然从东部各州和国外向西部迁移的绝对人数一直保持增长，但从百分比看来，向西扩张最盛的年代是 19 世纪头 10 年和 30 年代。而从绝对数来说，19 世纪 50 年代则是最高的。从表 8—1 我们可以算出西部人口在 1810—1860 年的五个十年中的增长百分率：分别是 6.9%、4.9%、5.6%、4.2%和 4.1%。同样在表 8—1 中我们看到绝对数

的最大增长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接近430万人。

正如道格拉斯·C·诺斯所指出的，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急剧增加都可以用西部特别的经济机会来加以解释。[①] 猪、玉米和小麦成为了西北部的主要产品，而正如图8—2所示，玉米和小麦的价格在这几十年中是很高的。人们来到新的土地正是为了追逐在这些地区生产大宗产品所获得的利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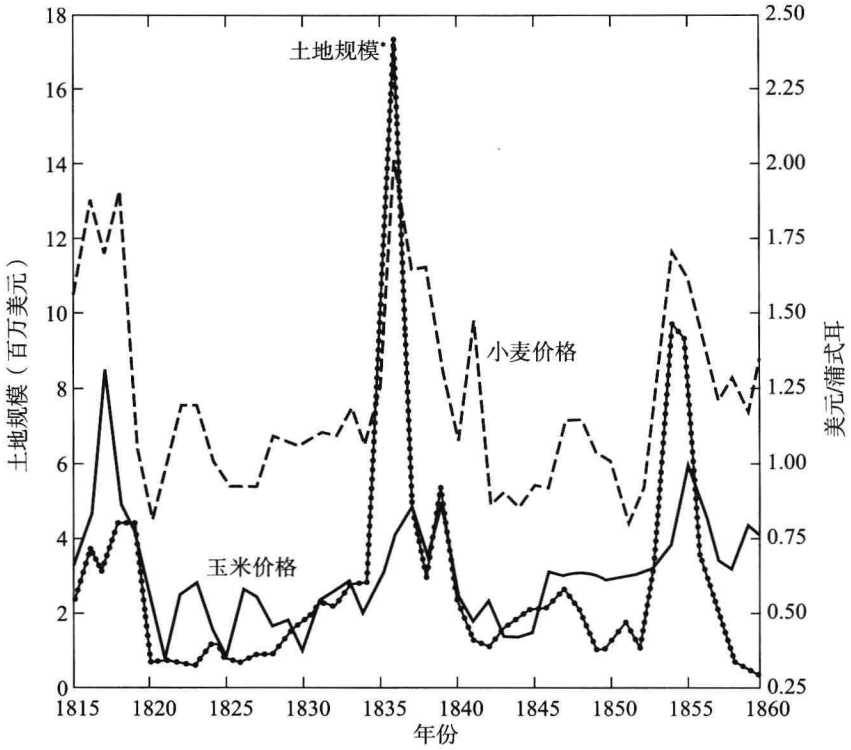


图8—2　1815—1860年美国一些西部州的公共土地规模以及小麦和玉米价格

*俄亥俄、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密歇根、艾奥瓦、威斯康星以及密苏里。

资料来源：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137.

诺斯的“市场机会的反应”（market opportunity response）观点的批评者们对此提出了反驳，他们认为这一时期的土地出售是基于普遍的投机动机，而不是移民定居和市场生产。[②] 然而，却有大量土地投入使用。（用于放牧、植草、耕地或是休耕的）改良土地的最大增长同样也出现在19世纪头10年、30年代和50年代（1810—1860年，改良土地每十年的增长百分率分别是23.5%、6.5%、

① See 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② 详见，例如，阿尔布罗·马丁的评论，参见戴维·H·费希尔的 *Historians' Fallacies: Toward a Logic of Historical Thought*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December 1972): 968-970，以及彼得·特明的 *The Jacksonian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69), 93-112。

7.1%、5.4%和7.8%)。[①] 简而言之，诺斯的批判者们错了。

与诺斯的一般结论唯一稍微不一致的变量是19世纪50年代西部的人口增长率。然而，从当时已出现的现象如总人口增长速度的全面放缓、每个人所拥有的已改良土地数量的增长以及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来看，这种增速减缓是可以预见的。在19世纪头10年以及30年代，我们观察到供应量对主要产品的高价做出的反应同时受到人口和改良土地数量的影响，但到了50年代，供应量在景气年份的变化则更多地受到改良土地数量而非人口的制约。

商业养猪增加了对玉米种植的需求。曾有一段时间，是允许猪进入森林从而以从树上掉下来的橡树果实、坚果等为食的。但倘若想生产优良品质的猪肉，有规律的喂食却是必不可少的，而玉米恰是一种理想的饲料作物。如果有足够的降雨量，玉米几乎可以生长在任何地方；它已经在所有原来的殖民地和整个南方种植。迟至1840年，肯塔基、田纳西和弗吉尼亚在玉米产量中仍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但很显然，20年之内西北部的各州将成为生产玉米的主要力量。[②] 在南北战争前夕，伊利诺伊、俄亥俄、密苏里和印第安纳在玉米产量中处于领先，而且看起来艾奥瓦、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排名总有一天将超过肯塔基和田纳西，分别名列第五、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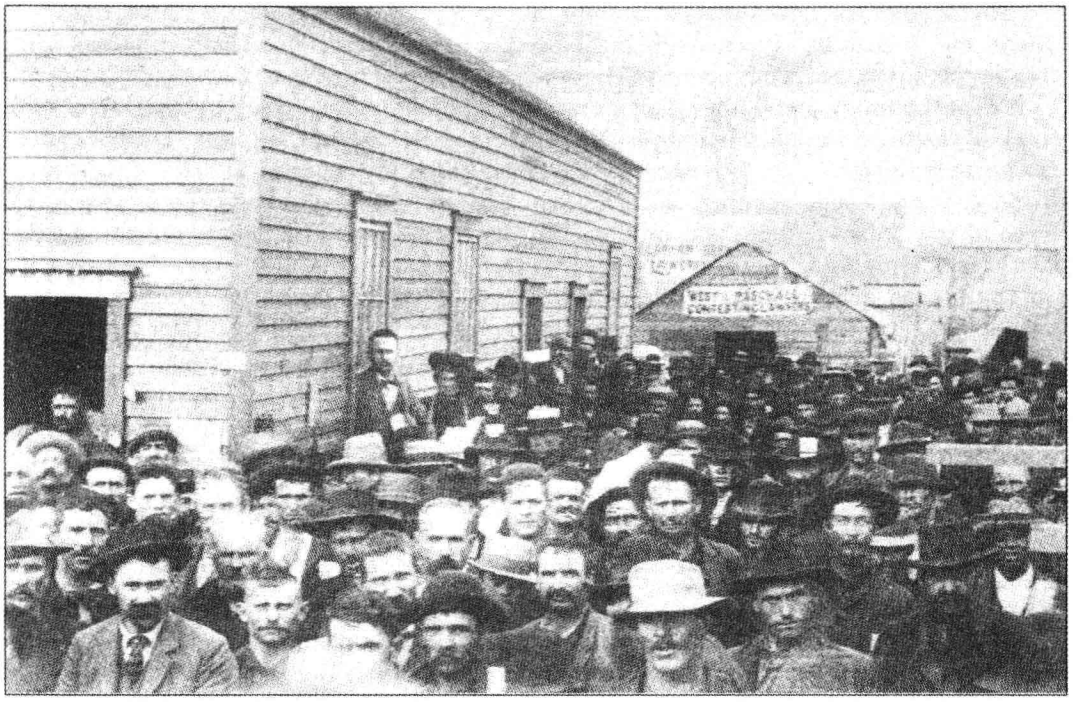
新土地对于小麦的吸引力也是巨大的。在能够将大量小麦运往东部城市中心的设施出现以前，西部的小麦一直未能引起关注；甚至到1850年时，宾夕法尼亚和纽约的小麦产量在全国范围内仍分别位居第一、第三；而在19世纪30年代成为商业产地的俄亥俄则排名第二。在接下来的10年中，小麦生产向西部的转移是显著的。到1860年，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威斯康星成了主要的生产地，从西北领土分出的5个州的小麦产量大约占到国家总产出的一半。尽管如此，主要的小麦生长区依然没有最终确立；这一重要作物的生产向更西地区的转移尚未到来。

最终，西部迁移推动了东北部各州农业的变化。在宪法正式通过的25年后，除了个别地方外，新英格兰的农业仍旧十分原始；个人农场单元几乎能生产一个家庭所需的全部东西。在1810年后，随着新英格兰工业化的推进，城市市场的出现成为可能。在1810—1840年，中大西洋地区各州的农民仍继续种植着当地历来适合种植的产品，而且如前所述，直到19世纪中期以前，宾夕法尼亚和纽约仍是主要的小麦生产地。但是1811年轮船抵达西部、19世纪20年代伊利运河开通以及19世纪40年代铁路扩展到阿勒格尼山脉以外，这些都意味着肥沃的西部土地上的产品将以不断增长的数量大规模涌入东部。西部的竞争，导致东北部地区的农民减少了谷物的耕种，而在畜牧业中也只有乳牛生产仍保持着重要的地位。

---

① Eric F. Haites, James Mak, and Gary M. Walton, *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Improvements*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113.

② 对于西部拓荒者来说玉米种植的优势，详见Paul W. Gates, *The Farmer's Age: Agriculture, 1815—186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0), 169。1配克(peck，谷物等的英美容量单位，约等于9公升)玉米种子，种植在1英亩的土地上，产量可高达50蒲式耳；而且远比2蒲式耳小麦种子更方便运输，而重达120磅的2蒲式耳小麦种子，很可能只带来每英亩15～18蒲式耳的产量。



© CORBIS

图中描绘了 1889 年 4 月 22 日，俄克拉何马土地争购（Oklahoma Land Rush）开放的早上。这里的人们在等待鸣枪，那将标志着他们有权进入印第安人正式持有的土地并要求所有权。而那些在鸣枪以前过早行动的人，就是所谓的“抢先占地者”。

商品蔬菜园、为城市居民提供乳制品以及为城市马匹提供草料等专业化生产成为这一地区农业的特色；而那些没能适应这种不断变化的市场条件的人，则移居到了城里或者前往西部。

向西南迁移和棉花

正如在第 7 章所讨论的，在独立初期深南部地区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倒退。即使是烟草市场也停滞不前，尤其是在 1807 年《禁运法案》颁布之后以及 1812 年战争后允许来自其他地区的烟草进入并在世界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

南部的希望是棉花。17 世纪晚期，由于获得来自东方的原棉供应，英国人越来越多地从羊毛制品生产转向了棉布生产。而一个世纪之后的那些发明——蒸汽机、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走锭细纱机和动力织布机——全都引发了对棉纤维的巨大需求。使纺织制造业中运用动力成为可能的工业革命，发生在了恰当的时期，从而刺激并促进了棉花在任何有利可图的地方种植。在美国南部，以种植棉花为基础的效益农业的条件几近完美，只是仍需创造出一些能将棉籽从短绒

“陆地棉”中分离出来的方法。而天才的伊莱·惠特尼的贡献之一便是发明了一种轧棉机——相较此前人工每天只能分离一磅棉花，它使一个能干的工人一天能够分离完 50 磅棉花。而且随着动力在轧棉机上的运用，能够生产出来的纤维数量看起来似乎无穷无尽。

在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潮湿的海岸，那些曾经种植靛青的种植园主们也开始改种棉花了，甚至连一些稻田都被重新耕种以生产这一新兴的主要产品。棉花种植往北传播到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并越过山脉到达田纳西中部美丽的丘陵地带。19 世纪初，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的山麓地带成了重要的产棉中心；到 1820 年以前，这些州都在竞争着第一的位置，而南卡罗来纳以微弱的优势处于领先。

随着 1812 年战争的结束，棉花生产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向西的重大转移（见地图 8—4）。几乎毫无过失地，移居者们起初便在一片弧形的肥沃土壤上种植——从佐治亚延伸出来穿过亚拉巴马进入密西西比东北部。第二个主要的棉花种植地区便坐落在密西西比河及其支流下游的肥沃的低洼地。种植在这片极其富饶的土地上的棉花，甚至有生长出更长的绒的倾向。棉花种植传播到田纳西西部以及阿肯色东部；而棉花种植进入得克萨斯则预言了棉花生产的趋势。

视角 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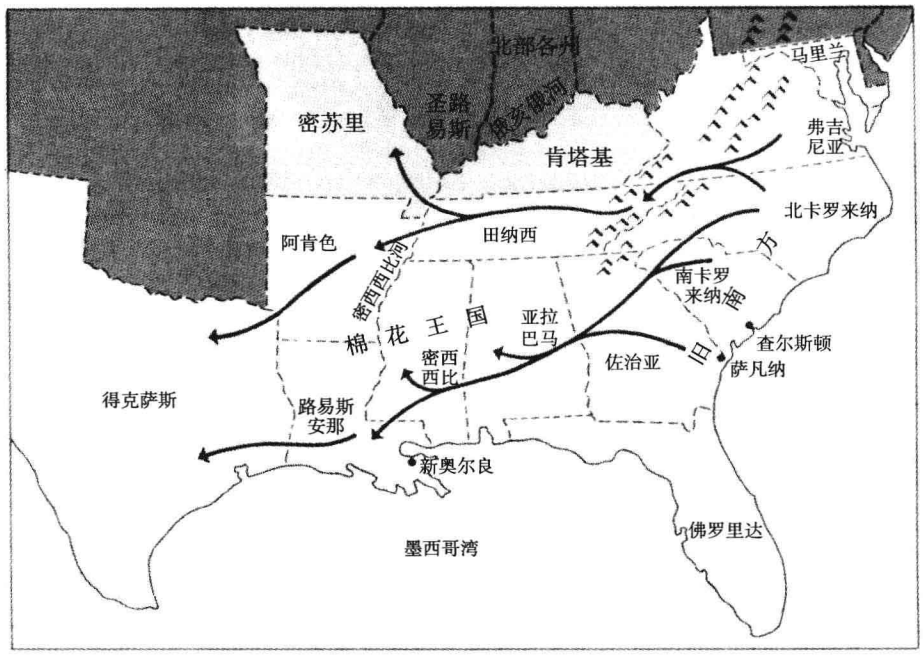
美国东南部印第安人的强制移民

《西北土地法令》中所描述的杰斐逊关于西部定居点的远见卓识的一部分便是对印第安人公平且恰当的对待。除了废除奴隶制的条款，西南部的定居点同样遵从了 1785—1787 年的法令，包括 1787 年法令的第三条：

要对印第安人遵守最高的诚信；非经他们同意不得夺走其土地和财产；非经国会授权的正义合法的斗争，他们不应在财产、权利和自由上受到任何侵犯或扰乱；而在仁义的前提下订立的法律应不断修改，以防止他们受到不公正对待，并维持与他们的和平与友谊。

在向西南部扩张的路线中有切罗基（Cherokee）、克里克（Creek）、乔克托（Choctaw）、契卡索（Chickasaw）和塞米诺尔（Seminole）部落的土地（见地图 8—4 和地图 8—5）。不管南方或北方，很多白人不顾杰斐逊的命令，开始要求这些部落移居到更西边的土地上去。尤其是 1828 年在切罗基人的土地上发现金矿之后，白人对切罗基人土地的渴求更强烈了。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和其他支持印第安人迁移的人，坚持认为切罗基人不可以在东部地区生存，因为他们赖以为食的猎物已经灭绝了。这仅仅是一种观点（经济推理命题 5）。戴维·威沙特（David Wishart）的研究（1999）证实切罗基人已经在超越对鹿及其他动物猎杀和剥皮的生活上取得了十分显著的进步。事实上，大多数切罗基人都已经是农民，从事一种非专业化的农业生产。他们在种植玉米上的生产率可以与类似白人土地上的生产率不相上下。其他切罗基人以从事市场活动谋生，如纺纱织布、开旅店、

经营渡船等等。少数人则运营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大规模种植园农业。从经济意义上讲，切罗基人与他们的白人邻居很相似，但当时这些事实却是无效的。实际上，他们在土地上所做的改良更是增强了白人想要赶走他们的欲望。1830 年，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移居法》（Indian Removal Act）。乔克托人、契卡索人和克里克人签署了放弃密西西比河以西的新土地的条约，而切罗基人一直坚持反抗，直到八年后的寒冬最终被武力强迫迁徙至今天的俄克拉何马州。估计有 4 000人（约为切罗基族人的四分之一）通过同化和特殊援助留在了北卡罗来纳州。大概有 50 个家庭放弃了他们切罗基族人的身份成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公民；其他来自雪鸟社区（Snowbird community）的家庭买回了他们 1 200 英亩的土地。州法律禁止印第安人拥有土地（直至 1864 年以后），但以一些有同情心的白人的名义购买的行为仍时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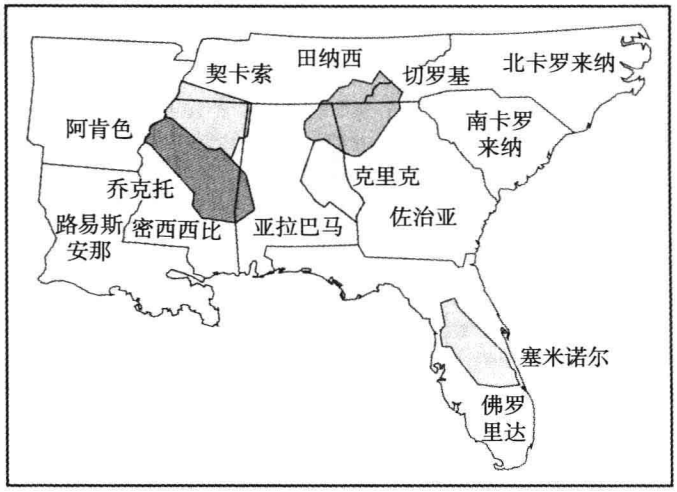


地图 8—4　棉花种植的转移

1812 年战争之后直至南北战争爆发，对棉花的需求的惊人增长，促进了棉花种植向西转移。

在更远的南方——佛罗里达，塞米诺尔人对同化和迁移同样抵制。1 万联邦军队、3 万民兵，以及 400 万美元的战争支出最终取得了胜利（七年多的战争和疾病导致 14%的人员伤亡），近 3 000 名塞米诺尔人被移居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土地上。

到 1840 年，早期的棉花生产州都已被赶超。1860 年，亚拉巴马、密西西比和路易斯安那在棉花产量上远远处于领先地位，而且仅密西西比州的产量就高于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两个州的总产量。棉花王国范围的变化，给南方经济带来了最深远的影响。



地图 8—5

1830 年以前，契卡索人、切罗基人、乔克托人、克里克人和塞米诺尔人部落的土地。

在南北战争前，可以毫无疑问地说棉花就是国王。正如道格拉斯·诺斯所评述的，我们对 1800—1850 年间棉花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①] 这一主要产品占据了美国出口总价值的一半以上；在美国的对外贸易中，其价值几乎 10 倍于最接近的竞争对手——北方的小麦和小麦粉。在国内，棉花种植者则为北方的纺织品制造商提供原料；这些纺织品制造商到 1860 年时出售的棉布已达羊毛制品的 1.5 倍。正如我们将在第 10 章看到的，棉织品在 1860 年是美国的主要工业制品，当年其在工业增加值上排名第一（若以雇佣人数来看则排名第二）。所以有一点并不奇怪：即使反奴隶制的力量在南北战争前的后期得到增强，南方人也几乎无法想象没有了他们的主要产品，北方乃至世界将会是什么样的。

对南方的新土地同时存在一个轻微的推动和一个主要的拉力。随着沿海低洼的土地开始丧失主要产品所需的自然肥力，对新土地的推动在殖民地时期已经开始。艰苦的环境迫使小农户搬迁到山麓地带。这种转变在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尤其显著，在那里艰苦挣扎的家庭倾向于穿过坎伯兰山口到达田纳西和肯塔基。边疆地区的居民——那些专业的拓荒者——当时到达了富饶的新棉花王国，他们中大多数来自佐治亚和南卡罗来纳，但也有部分来自田纳西甚至肯塔基。紧随而来的是自耕农，而几乎同时——这也明显地区分出南方的移民——种植园主也开始迁移，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并带着庞大的设施和奴隶。

和西北地区的经济高涨一样，19 世纪头 10 年、30 年代和 50 年代也是新的西南地区迅速发展的岁月。当然，正是对棉花种植预期的有利回报，导致了向西南地区大量的不规则的迁移。如图 8—3 所示，在棉花价格和亚拉巴马、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以及阿肯色出售的公共土地数量之间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再一次地，我们发现了个人对有利的经济机会的反应性。

① See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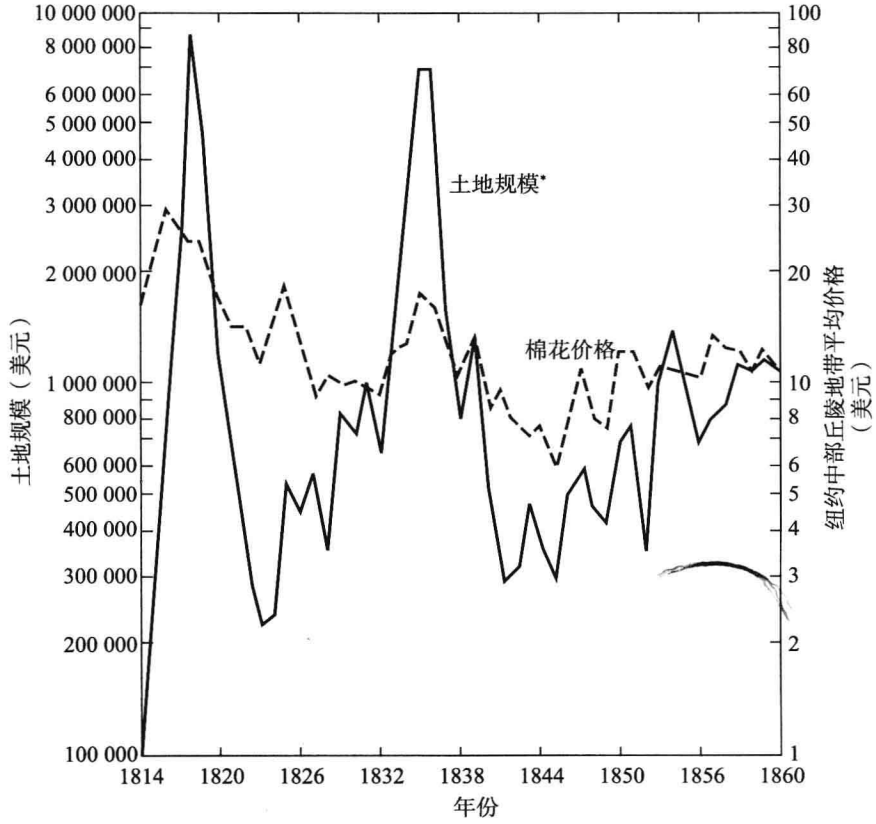


图 8—3　1814—1860 年美国公共土地规模与棉花价格

* 亚拉巴马、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以及阿肯色。

资料来源：Douglass C. North,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124.

向遥远的西部迁移

尽管与西北部和南部的迁移相比，其经济意义显得稍弱，但加州淘金热（California Gold Rush）却是在所有移民者对经济机会的反应中，讨论最广泛且最情绪化的一个。[①] 1848 年 1 月 24 日——与墨西哥的战争结束前仅 9 天——詹

① 另一次壮观的西部移民是摩门教徒的西移——19 世纪 30 年代末和 40 年代受到暴徒暴力的驱赶，从俄亥俄、密苏里和伊利诺伊而来；以及随后“圣徒”在锡安山（犹他州）的聚集。对这类特殊移民的描述，详见 Wallace Stagner, *The Gathering of Z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Leonard J. Arrington and Davis Bitton, *The Mormon Experience* (New York: Knopf, 1979); Gary M. Walton, *Chills along the Sweetwater* (Salt Lake City, Utah: Origin Book Sales, 1999); and Scott A. Carson, “Industrial Migration in America's Great Bas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3 (3), (2002), 387 - 404。

姆斯·W·马歇尔发现了金矿，当时他正在美洲河的南福克（South Fork）为约翰·萨特修建锯木厂。

萨特和马歇尔曾试图一边保守住这个秘密一边尽可能地争取对这块土地更有力的财产权。然而，一个男孩将发现黄金的事告诉了给锯木厂运送必需品的人，刚巧男孩的母亲也给这位司机送了一小块天然金块作为礼物。当这个男人随后回到“萨特堡”（Fort Sutter）用这个金块买酒时，消息便传播开来。

随着淘金热席卷全国，人们从全国各地蜂拥而至。1849 年最初的几个月，几乎有 20 000 人乘船离开东海岸去往加利福尼亚；而 1849 年共有近 40 000 人抵达旧金山。1849 年末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仅有约 107 000 人，而三年内却增长到了 260 000 人以上。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一个最吸引人之处，是最初没有土地产权，也没有能够实施法律并维持秩序的政府。例如，尽管对擅离职守的处罚十分严厉，但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士兵仍纷纷离开自己的岗位去寻找黄金（通常每月只能挣 7 美元并包食宿的士兵，在 1847 年有近 1 059 人，而到 1848 年就仅剩 660 人）。虽然最初没有法律和秩序的约束，但发生在金矿区的暴力事件却少得惊人。正如研究淘金热的主要权威之一约翰·昂别克所描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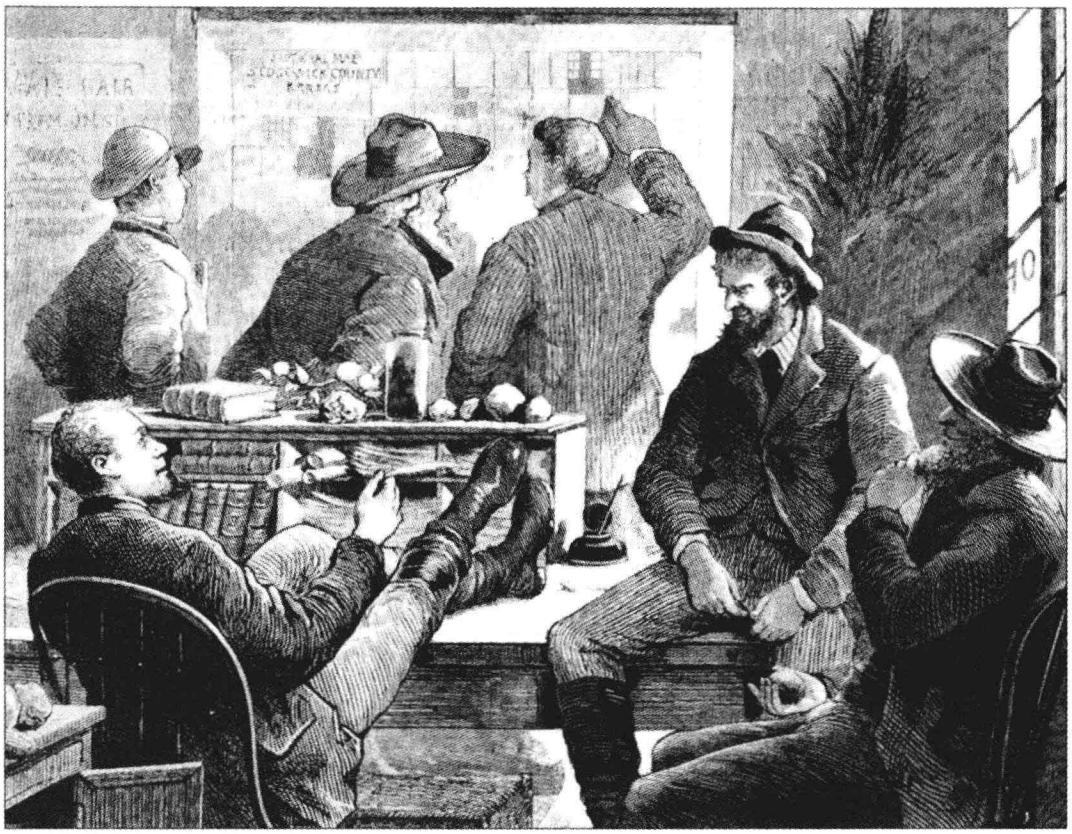
> 1848 年间……近 10 000 人涌向金矿寻求财富，在那里没有任何人享有独占权。此外，虽然几乎每一个淘金者都带着枪，却很少听说有什么暴力冲突。7 月，梅森长官视察金矿，他报告说淘金者们很尊重萨特的产权，而且“任何形式的犯罪都十分少见，没有小偷和强盗在金矿区犯过案……而让人惊讶的是，这样和平而安宁的状态竟能够持续下来”。①

只有在几批新的淘金者大量涌入后，这片金土地才变得恼人地稀缺起来，因而人们开始强烈要求排他的财产权或者所有权。几份第一手资料表明了这些权利的性质：

> 内华达城及其周围的金矿在刚开采时只限于沟谷地带……没有任何法律来规范淘金者的权利大小，一般而言，最早进入峡谷中的一批人拥有其独占权……随着人口的增长，这条规则便不能再长久维持。淘金者们意识到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因而召开了会议并制定了规则——每位淘金者可以拥有 30 平方英尺的金矿开采权。
>
> 据最保守估计，美洲河中福克（Middle Fork）的所有沙洲，即俄勒冈沙洲以北，在 1850 年夏天雇用了不少于 1 500 人；最初是合股干，共负盈亏，每天支付股份的估价，这样缺席者或醉酒者就没有份儿；然而不久这种分配方式便引起了不满，从而导致合作工作的终止及领属地工作的开始。所谓的领属地即河床上 15 英尺宽的一块地。

---

① 参见 John Umbeck，“The California Gold Rush：A Study of Emerging Property Righ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这并不意味着远西部地区不存在暴力，事实上，在沙龙和酒吧经常会发生斗殴、枪击以及谋杀事件。



“为升值而持有”，即土地投机，成为西进人口急剧增长的一个活跃的分流。图中是为投机活动提供了一个中心的堪萨斯土地办公室（Kansas Land Office）。

在相当短的时间里那条河上又汇集了一大群人，就分界线问题发生了争吵，最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每人可拥有 10 平方英尺的河床土地。

伍德河（Wood's Creek）两岸到处是淘金者，而我也在发现金矿后第一次明白何谓淘金者的所有权。1848 年，淘金者并不将土地划归个人所有——他们在富藏地带开采，并经常有四五个人在一个直径 6 英尺的圆坑内工作；但是……如今他们用卷尺量地以防出现土地划分引起的争议。①

“淘金者会议”确定协约细则（经济推理命题 4）以确立并执行所有权，防止所有权的转移。而各个“区域”再自行召开会议，之后每个淘金者用木桩标明自己的地界，并通常会出现类似这样的告示：

敬告诸位，根据《清溪区法律》（Clear Creek District Law），此矿地归本人所有，计河床地长 50 英尺。

擅入本人矿地者，一经发现即依法严惩。以上绝非戏言，若法律上需要，本

① 引自 Umbeck，215。

人亦会用枪维护自身权利，故请当心为要。[1]

以这种方式，产权及其他制度第一次出现在加利福尼亚的金矿地区；随之而来的是价值数百万美元黄金的流出。

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在淘金过程中的大规模自我雇佣现象及其创造的财富。[2] 这对那些不再被迫接受自己的地位并听命于斯的人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希望。而且时机合适！爱尔兰的马铃薯饥荒、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法国和德国的政治起义——所有这些都使得在美国的年轻人数量大大增加，许多在墨西哥战争（Mexican War）后解除兵役的人也纷纷到金矿区寻求财富。只是并非每个人都有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曾是一位很不成功的律师）或者卢修斯·费尔柴尔德（Lucius Fairchild，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店员，衣锦还乡时成为威斯康星州州长）那样的运气，但淘金热的确保证了与高耸的峰峦相匹配的梦想与冒险。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rrington, Leonard J. and Davis Bitton. *The Mormon Experience* (New York: Knopf, 1979).

Atack, Jeremy, Fred Bateman, and William N. Parker. "Northern Agriculture and the Westward Movemen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 000), 285 - 328.

Barrington, Linda, 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Boulder: Westview, 1999).

Berry, Thomas. *Western Prices before 186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Bidwell, Perey, and John Falconer.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620—186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5).

Billington, Ray A. "The Origin of the Land Speculator as a Frontier Type." *Agricultural History* 9 (October 1945).

——. *Westward Expansion: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New York: Macmillan, 1949).

Bogue, Allan C. "Farming in the Prairie Peninsula 1830—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March 1963).

——. *From Prairie to Cornbelt: Farming on the Illinois and Iowa Prairies in the*

① 引自 Umbeck, 216。

② 淘金热对加利福尼亚历史的更长远影响可参见 J. S. Holiday, *Rush for Riches: Gold Fever and the Making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Bogue, Allan C., and Margaret Bogue. "Profits and the Frontier Land Specul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March 1957).

Carstensen, Vernon, ed. *The Public Land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ublic Domai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Carson, Scott A. "Industrial Migration in America's Great Basin,"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33 (3) (2002): 387 - 403.

Cole, Arthur H. "Cyclical and Sectional Variations in the Sale of the Public Lands, 1816—1860."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 (1927).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ed. *The Public Lan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Danhof, Clarence. "Farm Making Costs and the Safety Valve, 1855—1860." In *The Public Lands*, ed. Vernon Carstensen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 *Change in Agriculture: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82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Freund, Rudolf. "Military Bounty Lands and the Origin of the Public Domain." *Agricultural History* 20 (1946).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ed. *The Public Lan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Gates, Paul W. "The Role of the Land Speculator in Western Development." *Pennsylvania Magazine of History and Biography* 66 (1942).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ed. *The Public Lan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 "Charts of Public Land Sales and Ent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March, 1964).

——. *History of Public Land Law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Public Land Law Review Commission, 1968).

Holiday, J. S., *Rush for Riches: Gold Fever and the Making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Hughes, Jonathon R. T. "The Great Land Ordinances: Colonial America's Thumb Print on History." In *Essays on the Economic Significance of the Old Northwest*, eds.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1 - 18.

Lebergott, Stanley. "'O Pioneers': Land Specul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Midwest." In *Essays on the Economy of the Old Northwest*, ed.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37 - 58.

Merk, Frederic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New York: Knopf, 1978).

North, Douglass C.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North, Douglass C., and Andrew R. Rutten. "The Northwest Ordina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Essays on the Economy of the Old Northwest*, ed.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 - 36.

Parker, William. "Agriculture." Chapter 11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arker, William, and Judith Klein. "Productivity Growth in Gra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800*, vol. 30, ed. Dorothy Brad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Primack, Martin. "Land Clearing under 19th Century Techniqu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2 (December 1962).

Riegel, Robert E., and Robert G. Athearn. *America Moves West* (New York: Holt, 1964).

Rohrbough, Malcolm. *The Land Office Business: The Settl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American Public Lands, 1789—1837*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Rothenberg, Winifred B. "The Market and Massachusetts Farmers, 1750—185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283 - 314.

Stagner, Wallace. *The Gathering of Zio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Steckel, Richar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East-West Migration during the 19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 (1983): 14 - 36.

Treat, Payson J. "Origin of the National Land System under the Confederation."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Report* (1905). Reprinted in Vernon Carstensen, ed. *The Public Land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21).

Umbeck, John. "The California Gold Rush: A Study of Emerging Property Right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192 - 226.

Walton, Gary M. *Chills along the Sweetwater* (Salt Lake City, Utah: Origin Book Sales, 1999).

Weiman, David F. "Peopling the Land by Lottery? The Market in Public Lands and the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of Territory on the Georgia Frontie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991): 835 - 860.

Wishart, David M. "Could the Cherokee Have Survived in the Southeast?" In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ed. Linda Barringt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9). 165 - 189.

Wyman, Walker D., and Clinfton B. Kroeber, eds. *The Frontier in Perspective*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57).

第 9 章　交通运输和市场发展

本章主题

美国 19 世纪的经济增长，在战略上受到多个方面的影响，包括：市场经济的扩张，资源从低使用价值领域（生存）向较高使用价值领域（为市场生产）的转移，以及生产活动中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发展。正如亚当·斯密以及一些 19 世纪早期时代的人所知悉的那样：生产力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市场规模，尤其是制造业。当然，市场规模也受到商品运输和谈判交易的成本的限制。而在早期时代，运输成本便是所有成本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基于诸多原因，我们有理由对交通运输给予特别的关注，而且事实上，这对于我们理解经济的长期增长以及人口和经济活动的地点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切实可行的交通运输系统是形成一个全国市场的关键（正如经济透视 9.1 所讨论的）。综合看来，从 1800 年至 1860 年交通技术的进步是如此惊人，以至于我们称其为“交通运输革命”也毫不为过。而这一革命的影响则可以在诸多方面看到，如获取信息以及运送人员和货物的成本下降、定居和生产模式、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而这些影响和我们如今所看到的信息革命的影响有许多相似之处。

美国内战前的交通运输革命

一旦发起西部迁移，对改善交通运输系统的需求也会急剧增长。投资于轮船、运河和铁路，是战前时期国内运输最重要的发展。可以肯定地说，交通的大力发展和货运费用的直线下降（如图 9—1 所示）不管在影响上还是在形式上都是革命性的，不仅是因为它们直接推进了向西扩张的进程以及农业、采矿业的重新布局（详见第 8 章），更是因为它们极大地改变了各地区在生产中的比较优势。例如，它们为新英格兰的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即愈来愈集中于制造业、促进高新技术的发展和运用、增进工厂设置中的生产组织形式（见第 10 章）。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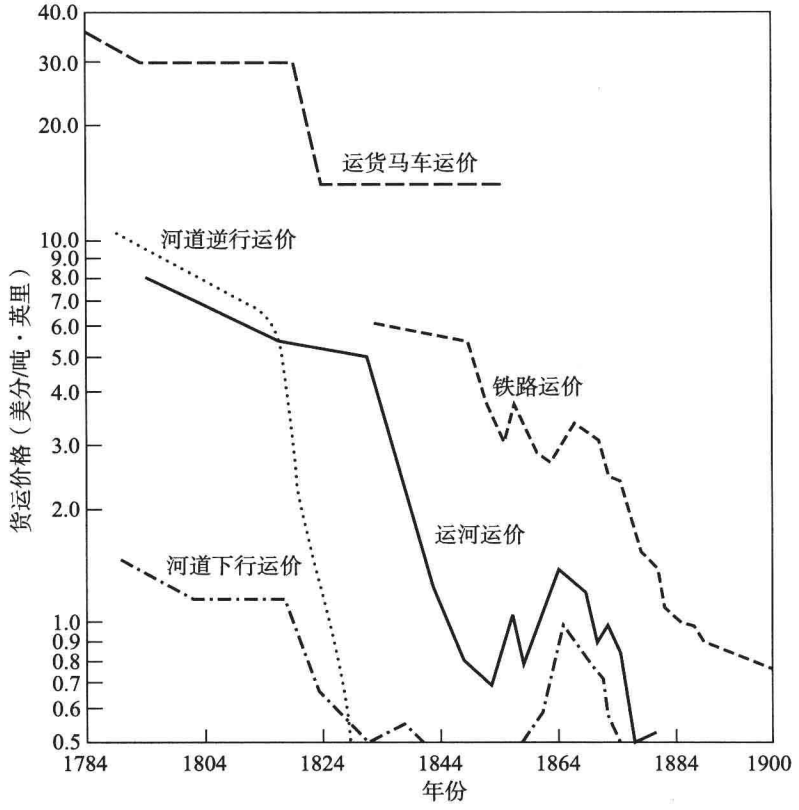


图 9—1　1784—1900 年国内货运价格

资料来源：Douglass C. North, *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Past*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73), 108; and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Vienna, August 1965, and published in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XIX^{e} Siecles, © 1965 by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Paris.

这些改变又为城市化、加强城市问题和劳工骚乱创造条件（见第 11 章）。运输和通信成本的下降，提高了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并为许多商品和服务提供了一个全国市场。在世纪之交，纽约和费城市场的平均价格下降 12 个月之后，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等地的西部市场的平均价格才会随之下降；尽管如此，到了 19 世纪 30 年代，这一滞后的时间已经缩短到了 3～4 个月。到 19 世纪 50 年代，这种滞后甚至进一步下降到仅一星期左右。最终，随着南北战争前几年区域间局势愈发剑拔弩张，由水路和铁道在东西间交织起来的交通网络，在约束这两个地区方面将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不管是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所以交通运输革命一词不仅仅意味着一系列新技术形式的引进。

交通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经济一体化日益发展的关键时期里，私人与政府主动性作用的对比。在英格兰，私人企业家建造并经营铁路和运河，政府参与少之又少。然而在美国，则同时存在私人和公共企业的参与。按照其占总投资的百分比，政府对运河和铁路的投资是很大的，而投资在公路上的公共资金占据了一个稍小的比例，在天然水道上的投资就更少了。政府在交通运输中积极而强大的作用早在 1807 年时便已经开始规划，当时的财政部长艾伯特·加勒廷被要求制定“一个运用国会权力范围内各种手段以修建公路和开凿运河为目标的方案”[①]。加勒廷巧妙的方案中有一个耗资 2 000 万美元的工程，但由于法律和一直以来的政治问题，联邦政府无法完成这一项目。许多人视宪法为一个主权地区（独立自主的各州）之间的协定，而贯穿战前大部分时期的“严格解释主义”导致联邦政府仅能完成部分工程，而且主要是那些由几个州同时通过的工程。然而，加勒廷的方案还是实现了，不是依靠联邦政府，而是依靠私营企业家，依靠州、地方和私人企业的混合投资。资金需求的庞大规模往往使得这种合作成为必要。政府官员和普通公民都促进了政府对交通投资的干预。有时候，私人经营者能够像现在的一些特殊利益群体（如农民）那样获得公共信贷（public credit）和特别援助；而在其他情况下，则是那些旨在改善本地交通运输条件的地方政客利用了私营企业家。

西部贸易的路线

美国内战前的一个时期，三条天然通道将西部的领土、州和这个国家的其他部分以及其他国家联系起来。第一条往东，连接五大湖和纽约。这是北方通道的主要干线，它沿着圣劳伦斯河往下游，又或者顺着哈得孙或莫霍克河谷而行。在这条路线上主要的投资包括：1825 年开通的伊利运河，以及于 1852 年竣工的纽约中央铁路、纽约铁路和伊利铁路。

第二条是东北通道，是由公路、运河以及其后的铁路系统相互连接而成的交

① Carter Goodrich,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27.

通网络；铁路系统连接了从匹兹堡（俄亥俄河沿岸）到费城、从惠灵（同样在俄亥俄河沿岸）到巴尔的摩的河流交汇点。西至惠灵的国家公路于 1817 年完成，而次年宾夕法尼亚州收费公路也开通至匹兹堡。19 世纪 30 年代，这两条路线上的竞争运河展开了一场较量；然后，到 19 世纪 50 年代，这些城市间的竞争通过铁路连接再度升温。

位于新奥尔良的南方通道，是南部地区的主要货物集散中心。对于密西西比河、密苏里河、俄亥俄河等主干河流以及其他通往这一通道的西部主要河流来说，最关键的事件莫过于 1811 年汽船的引进了。

图 9—2 显示了从西部内陆经由这些通道运往东部和国外的货物数量。[①] 总的发货量，从 1810 年的 65 000 吨增加到 1860 年的约 470 万吨；而这一增长证实了西部叹为观止的发展势头。我们也能发现，东北通道在其中只起到了一个很次要的作用，一般通过这里的西部货物还不到总数的 5%。北方通道的意义明显更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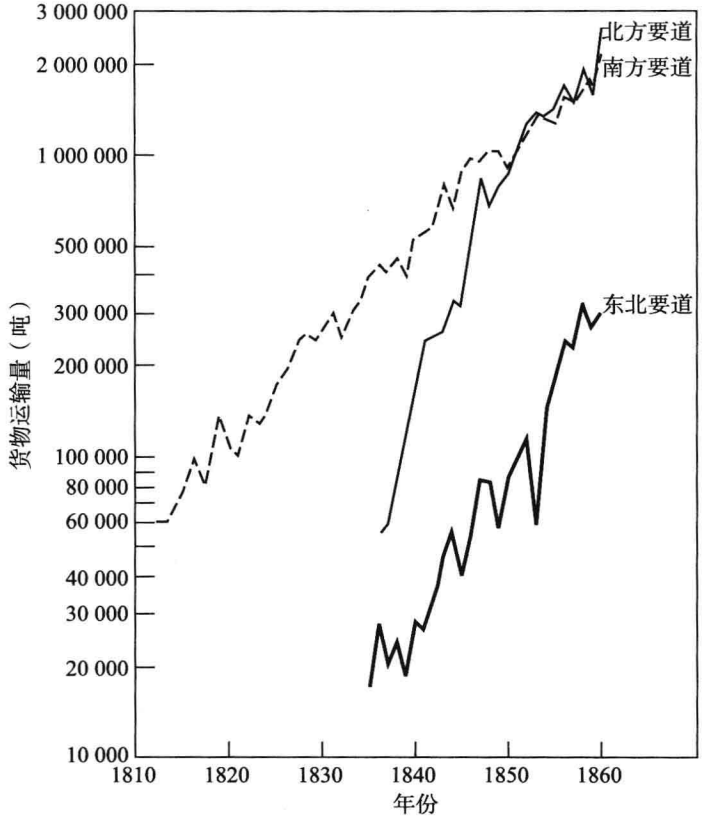


图 9—2　1810—1860 年从内陆经过西部要道的货物运输量

资料来源：Erik F. Haites, James Mak, and Gary M. Walton, *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 1810—18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7 and Appendix A.

① 入境载货量的数据更加零碎且不够完整，但它并没有改变各大通道在货物运输上的相对地位。

重要，但那也只是在19世纪30年代以后；在1825年伊利运河开通以前，几乎没有货物由这里运出；即使到了19世纪30年代早期，伊利运河上的货物也大多来自纽约州北部。所以，西部产品的出货载运，最主要还是依靠南方通道来完成——至少在南北战争前最后几十年是如此。包含了16 000英里西部河流的天然水道，其在交通运输中的优势引发了同时代的詹姆斯·兰曼于1841年的如下感叹：

> 汽船通航使西部开始移民！由于它使得到西部领土的距离缩短了9/10，从而为东部的产品和移民提供了动机……汽船让东部的城市挤满了西部的面粉和商人，而且载上来自东部的移民和商品再回到西部。它使全国移民和全国生产职业的出现提前了至少一个世纪！①

汽船和天然水道

在汽船抵达西部以前，内河运输是一件异常困难、十分危险且无比昂贵的事情。木筏和平底船尚能以合理的价格将乘客送往下游，但依靠步行和骑马的归途却显得既费时又危险。一般1 000英里的旅程，顺流而下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但返回却要3～4个月的时间。内河平底货船使逆流而上成为可能，但这却需要密集的劳动力参与劳累至极的工作。正如图9—1所示，逆流而上的成本通常高达顺流而下的成本的五倍多。

1807年，在罗伯特·R·利文斯顿的协助下，罗伯特·富尔顿发明了汽船克莱蒙特号（Clermont），并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试航——沿哈得孙河往上，用32个小时走完从纽约至奥尔巴尼（Albany）的150英里航程。随着这次处女航，从纽约到奥尔巴尼的定期客运服务展开，汽船的可靠性很快得到证实。美国航运史上新的一页由此揭开。

西部的汽船起源于匹兹堡的北部界标，在那里阿勒格尼（Allegheny）和莫农加希拉（Monongahela）汇合而成俄亥俄河，丰富的木材供应和当地的钢铁工业成就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造船业。在富尔顿-利文斯顿专利下，尼古拉斯·罗斯福（Nicholas Roosevelt）在匹兹堡建造了第一艘用于内河定期行驶的汽船。这艘名为新奥尔良号的汽船，于1811年10月20日离开匹兹堡启程前往墨西哥湾，尽管在途经密苏里的新马德里时遭遇地震，但它依然在两个半月多点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航行。六年之后逆流和顺流航行的定期服务才最终建立起来，但（如表9—1所示）行驶在西部河流上的汽船的吨位，到1819年时便已经超过1万吨。这一数字到1860年时增加到了差不多20万吨。发展最快的时期是1815年后的20年，但显著提升却在每个十年中均有发生。一直到19世纪80年代，西部河流上的汽船航行才出现明显的下降。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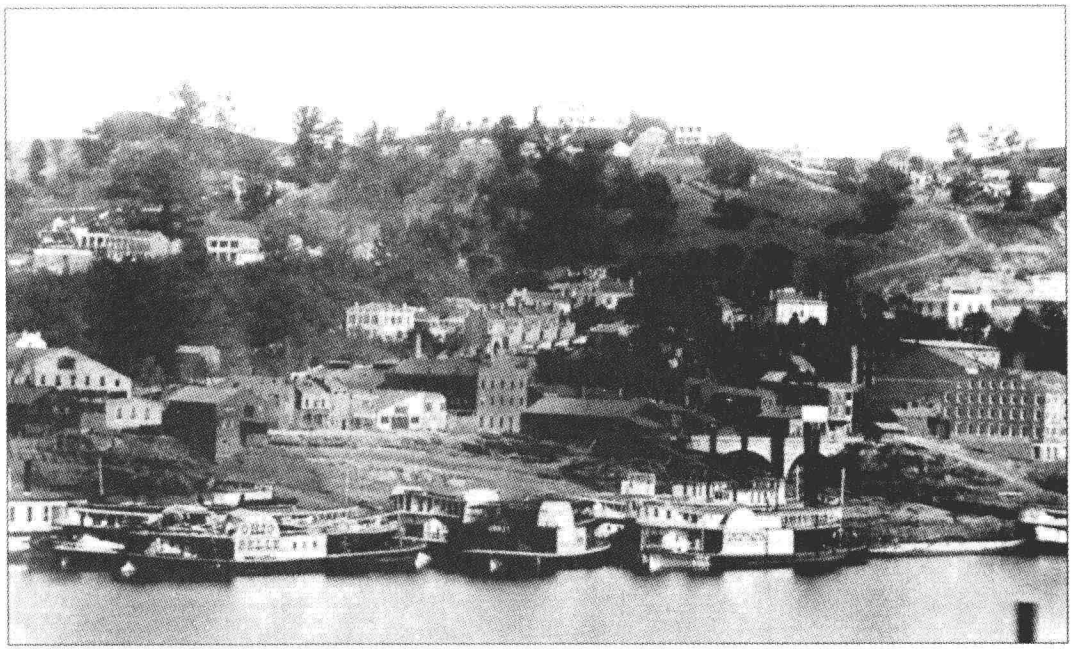
① James H. Lanman, "American Steam Navigation," *Hunt's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 Review* 4 (1841): 124.

表 9—1　1811—1868 年西部河流运行中汽船每年的建造量（总量与净量）和吨位

运行中的船舶			运行中的船舶		
年份	数量	吨位	年份	数量	吨位
1811	1	400	1840	494	82 600
1812	1	400	1841	504	85 200
1813	2	400	1842	458	76 500
1814	3	700	1843	449	80 000
1815	7	1 500	1844	509	90 300
1816	11	2 300	1845	538	96 200
1817	16	3 000	1846	578	106 300
1818	30	5 800	1847	638	122 400
1819	59	13 000	1848	666	133 400
1820	69	14 200	1849	648	130 100
1821	73	14 500	1850	638	134 600
1822	71	13 400	1851	660	142 900
1823	74	12 500	1852	676	152 900
1824	67	10 500	1853	711	169 300
1825	80	12 500	1854	696	169 000
1826	107	17 300	1855	696	172 700
1827	120	19 700	1856	761	188 100
1828	118	18 900	1857	800	199 600
1829	140	22 300	1858	779	196 400
1830	151	24 600	1859	779	192 800
1831	183	28 700	1860	817	195 000
1832	227	35 200	1861	665	165 100
1833	239	36 800	1862	666	157 300
1834	270	41 000	1863	778	160 200
1835	324	50 100	1864	919	193 200
1836	374	57 400	1865	1 006	228 700
1837	399	63 600	1866	1 028	238 400
1838	391	65 300	1867	976	232 300
1839	480	78 200	1868	874	212 200

资料来源：Erik F. Haites，James Mak，and Gary M. Walton，*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1810—186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130—131.

无论如何，内河航道上汽船的出现并不能解决所有的交通问题。河流高度的变化使得航行仍然很不确定甚至十分危险。春天的冰和夏天的沙洲一直存在着危险；残桩（生长于河里的树木）、岩石和沉船一直持续不断地破坏并导致船舶失事。除此之外，汽船也使得西部人民暴露在一些最早的工业化危险之下；高压锅炉频繁发生爆炸，在几十年中使数千人意外死亡。这促进了联邦政府的干预：1838 年以及 1852 年，通过了一些第一次涉及工业安全和消费者保护的美国法律。而 1852 年《汽船锅炉检查法》（steamboat boiler inspection law）尤其有效，它极大地减少了锅炉的爆炸和生命的损失（参考经济推理命题 4）。此外，联邦政府偶尔也会忙着从河里清除残桩和其他障碍物，这也同样减少了货物、船舶和人员的损失。



PUBLIC LIBRARY OF CINCINNATI AND HAMILTON COUN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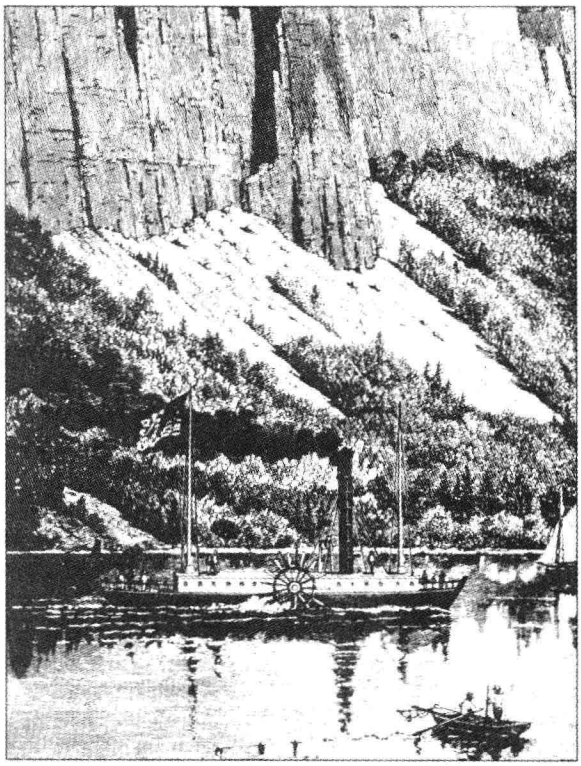
如辛辛那提等内陆航运港口，很快便成为主要市场，商品和服务的种类也日益增多。

竞争、生产力和濒危物种

西部内河运输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不同船舶之间存在高度竞争。这意味着对于西部的早期殖民十分关键的汽船的革命性影响是通过一个竞争性市场达成的。富尔顿和利文斯顿企图通过政府约束获得垄断，以阻止其他人在新奥尔良乃至整个西部提供汽船服务。[①] 然而他们对垄断权的要求最终被法院驳回，这再一次提醒

① See Gary M. Walton, "Fulton's Folly," in *Second Thoughts: Learning from American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ed. Donald McCloske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45 - 150.

我们经济推理命题 4 的重要性。这些以及其他团体都未能做到限制供应和阻止进入；而且没有政府干预，进入这一产业所需的最适度的资金要求确保了一个竞争市场的存在。


© HISTORICAL PICTURES STOCK MONTAGE

罗伯特·富尔顿于 1807 年建造的汽船克莱蒙特号，开创了美国河流的交通运输革命。

早期主要航线上存在着巨大的利润（30%甚至更多），但到 1820 年时，正常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一般约为 10%。只有在一些偏远且危险的支流上，可以特别获得高达 35%～40%的回报率，但那里贸易稀少而且不确定。

因为西部河船服务市场通常具有竞争性，由汽船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所带来的剩余会很快转移到消费者手中。而且正如表 9—2 中所阐明的证据那样，成本的下降十分明显。

当然，仅仅是蒸汽动力的引进便构成了运输成本急剧下降的主要原因。尽管如此，比起蒸汽动力的最早运用，新奥尔良号首次航行后的改进和提高的潮流则提供了更大的生产力提高。这一说法从费用的下降中可以查证；比起 1811 年到 1820 年间，1820 年以后，不管绝对量还是相对量，运费的下降都更加突出，特别是在实际值上。例如，以 1820 年美元的购买力为基准，从新奥尔良到路易斯维尔的航程，逆流而上的实际成本从 1815 年左右的 3.12 美元降至 1820 年的 2.00 美元，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时只有 0.28 美元。同样，顺流而下的实际成本也从 1815 年左右的 0.62 美元降到 19 世纪 50 年代末的 0.39 美元。

表 9—2　1810—1859 年路易斯维尔和新奥尔良之间的平均货运价格（每 100 磅货物），每十年一阶段（美元）

	逆流而上	顺流而下
1820 年以前	5.00	1.00
1820—1829 年	1.00	0.62
1830—1839 年	0.50	0.50
1840—1849 年	0.25	0.30
1850—1859 年	0.25	0.32

资料来源：Erik F. Haites, James Mak, and Gary M. Walton, *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 1810—18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32.

主要的改进都是针对船舶的物理性能方面。从最初类似于海船，汽船不断发展以满足西部河流的浅水条件。这些船只的重量不断变轻，并且有许多外部的甲板用于装载货物（也为乘客提供廉价的住宿）；在不增加船舶大小的情况下，它们的吃水深度也越来越浅。结果，船每吨位所能装载的货物数量大大增加。另外，即便是在水浅的月份里，能够正常运作的季节也延长了不少。随着在港时间和航行时间的减少，这就极大地增加了每年往返航行的平均次数。值得注意的是，航行时间的缩短仅仅部分地取决于更快的速度；而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学会了在夜间操作船只。而更短地停留在指定的燃料库也取代了花很长时间在树林里寻找燃料供应的情况。最后，正如之前提到的，政府清除河里残桩和其他障碍物的行为，也增加了船只能够正常运作的时间，而且使得河流运输更加安全——这几十年保险费用的降低就是证明。

仔细想来，很明显，这些改进中绝大部分并非源于技术进步。只有在最开始蒸汽动力的引进是源于基本原理方面知识的进步。而许多改进则来自于一个从实践中学习的过程，来自于对设计和工程原理的知悉基础上为适应浅水条件而进行的改造调整。实际上，它们充分说明了早期的工匠和机械师们突出的技能和创造力。

总而言之，所有的成就引起了生产率（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的不断提高，在 1815—1860 年间其每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 4%。在 19 世纪一个可比较的时间段内，这一增长率超过了任何其他的交通运输方式。[①]

随着汽船的成功，其他形式的河流运输不是进化发展了便是消失不见了。十分消耗劳动力的内河平底船，在新技术引发的竞争中体会到了最强烈的痛苦，并迅速在主干河流路线上的竞争摩擦中惨遭淘汰。内河平底船获得的收益中有接近

① See Erik F. Haites, James Mak, and Gary M. Walton, *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 1810—18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60 - 63.

90%是来自于那些逆流而上的行程——人们艰辛地或撑、或拉、或划，以非常辛劳的努力来对抗水流。正如表 9—2 所示，汽船最显著的影响就体现在逆流而上的费用上。只有在一些偏远且危险的支流，内河平底船才能从汽船红红火火的发展态势下找到其暂时的庇护所。

令人惊讶的是，平底船的发展命运却完全不同，它在整个战前时期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持续性。因为顺流而下的费用减少得相对温和一些，所以靠水流驱动的平底船受到的威胁就更少一些。另外，来自汽船的溢出效应也有助于平底船的发展。首先，汽船通过返回的平底船人员提供快速的逆流运输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力节省。它们不仅避免了长时间的、偶尔还危险的陆路旅程，而且使用汽船客运服务的机会引致重复的旅程，以及由此对知识和技能的获取。这导致了对平底船的大量采用，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运送每吨货物所需的劳动力。由于以上种种收益，19 世纪中期相对于其他任何时间，都有更多的平底船航行在西部的河流上。

总的来看，西部的河船为日复一日运输货物的辛苦差事和商业贸易带来了一种浪漫的气氛。富人和穷人可以同样地光顾布置奢华的密西西比江轮（Mississippi riverboat）。自耕农也热衷于他们有冒险性的平底船旅行。尽管如此，但这些发展本质上都是地域性的，而且它们的影响集中在南方通道。在东部的水路或者五大湖，汽船的重要性从未达到其在中西部地区的程度。运河和收费公路提供了可替代的交通手段，而且铁路系统在东部的起步更早。在东部，汽船主要用于运送乘客——巨大的舷侧明轮船（side-wheelers）为在两个主要城市之间旅行的人们提供豪华的住宿。在五大湖，与所预料到的情况相反，在整个战前时期，帆船在货运竞争中十分成功。尽管如此，在一些将人们的舒适度作为影响因素的地方，汽船则逐渐占据优势。即便如此，1860 年时五大湖上帆船的数量和吨位也远远高于汽船。

公共与私人：天然水路上的主动性

天然水路上的交通发展——尤其是南方通道上的各河流，当然北部交通途径也包括其中——主要是私人自发形成的。对于在船舶和河流发展上的总投资而言，政府投资其实占极小的一部分。私人企业拥有并且操作船只，而州和地方政府在河流问题上仅仅做出了很小的改善；这是因为对使用者而言，许多利益并不能单单在同一州的范围内获取。如果大多数利益是流向行驶过的船舶拥有者（或使用者），那么为什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要为改善河流而筹集资金？由于严格的宪法诠释，向联邦提出的改进河流状况的需求常常被忽视。除了零星的高收益的清除障碍规划，公共机构在天然水路交通上只提供了非常少的资本，大概不超过总支出的 1%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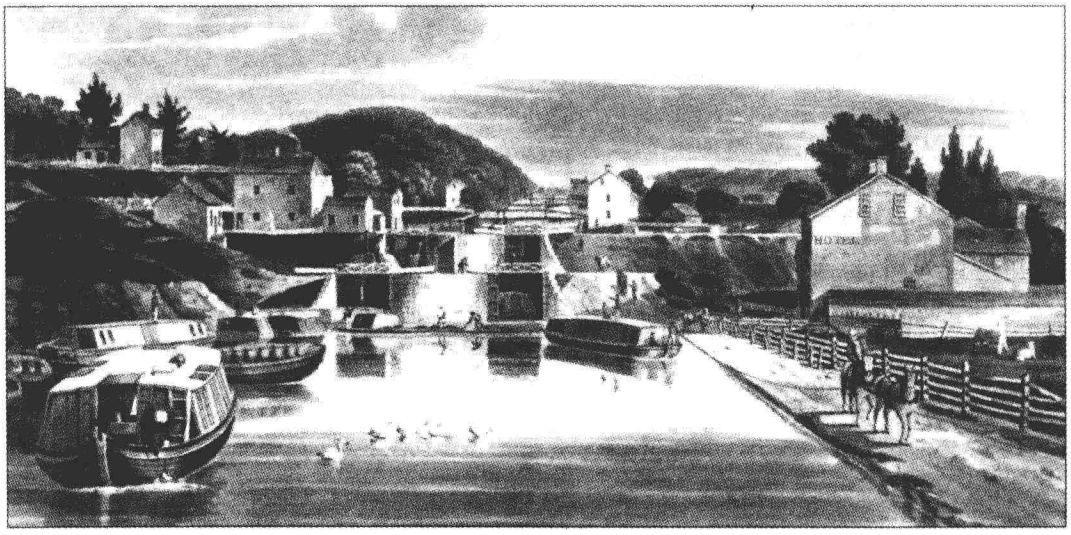
运河时代

尽管天然水路提供了一个庞大的交通设施网络，许多丰富多产地区却仍然在地域上和经济上被分离开来，一直到运河建立以及其他旨在将各个地区联系在一起的内在改良出现以前。第一个重大项目开始于1816年，当时纽约州议会批准了伊利运河和尚普兰运河的建造。在州长德威特·克林顿强大的指导精神下，伊利运河以极大的热情被推进，而且各河段一旦完工便立刻开通运输。很快人们就意识到一件显而易见的事情——运河将获得巨大的成功；甚至在1825年它竣工以前，“运河热”（canal fever）便已经席卷全国。在随后的修建热潮中，运河主要是用来连接三类地区，一些从“穷乡僻壤”流向沿海地区；一些横贯，或者试图横贯，旧有各州与俄亥俄盆地之间的广大地区；还有一些西部运河，将五大湖与一些流向东部的水路连接起来。战前时期修建的主要运河在发展北部和东北部通道方面十分重要。

在早期的运河中，伊利运河虽然绝对不是唯一有利润的运河，但却是最重要的。仍以一个扩充和改进过的形式即纽约州驳船运河（New York Barge Canal）存在的这一系统，是一项宏伟的工程。起始于哈得孙河上的奥尔巴尼，向西穿过纽约州到达伊利湖上的布法罗，全长364英里。这一工程花费了约700万美元，耗时9年完成。建造者们克服了不计其数的困难，尤其是他们自身对运河的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一个工程师曾参与过运河修建的工作，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有许多尝试都是必不可少的。运河的一些河段最开始会漏水，因而在工作完成后必须在内侧用黏土衬垫。船闸也带来了特别的难题，但精妙的设计和防水水泥（water-resistant cement）的及时发现，帮助解决了船闸建造的问题。

在最后完工时，伊利运河系统可抵达纽约州的大部分地方。卡尤加和塞尼卡（Cayuga and Seneca）、希芒（Chemung）以及杰纳西（Genesee）的延长部分（extensions）将南部的重要地区和运河连接起来。到奥斯威戈（Oswego）的一条分支提供了到安大略湖（Lake Ontario）的途径，而尚普兰运河则供应了抵达北方的通道。这一系统不仅为本州大多数地方提供了交通运输的渠道，而且以圣劳伦斯路线接通了五大湖地区，也连接了广大的俄亥俄地区。大约从1835年开始，来自西部运输的一大部分，以前曾经过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到达新奥尔良，现在都转道伊利运河，前往纽约州的港口。这就大部分地解释了图9—2中所显示的，北方通道向南方通道的逐渐靠拢，亦即迎头赶上。木材、谷物以及肉制品，是向东运输的主要商品；而纺织品、皮革制品、机械装置、五金器具以及进口的食物和药品，则运往西部作为交换。也有极大数量的乘客搭乘用马拉拽的船只，一天24小时能走完100英里的路程，这部分地弥补了狭小而且通风不畅的客舱所带来的不舒适感。

面对伊利运河的竞争，宾夕法尼亚的应对措施就是建立宾夕法尼亚公共工程干线（Mainline of the Pennsylvania Public Works）——一个1826年由州议会特许授权的铁路和运河系统。但是宾夕法尼亚运河的命运，却与纽约的运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宾夕法尼亚运河的主要劣势就在于其地理位置及地形。伊利运河到达西部边疆所穿越的地形，对于修建运河就已经足够困难，相对哈得孙河的奥尔巴尼上升了高达650英尺，这需要许多船闸来提升水位，但宾夕法尼亚西部的地形却是运河所无法克服的。这条干线横越过重重山峦，将乘客和货物运送到一个超过2 000英尺的高度后再将其放下，从费城往西，到约400英里以外的匹兹堡。所有这些都是依靠一个奇妙的组合式的交通完成的——用在这个国家曾出现过的那些交通方式。从沿海地带的费城到哥伦比亚，沿萨斯奎汉纳河西行81英里，是由一条用马作为动力的铁路来运送乘客和货物。[①] 在哥伦比亚铁路会合到朱尼亚塔（Juniata）或者宾夕法尼亚运河东段，从那里乘客和货物由运河沿着河谷往上运送173英里到达霍利迪斯堡（Hollidaysburg）的波蒂奇铁路（Portage Railroad）。在这里，勇敢的乘客会看见他们的船只被分离成了前后两个部分，然后搭载进火车车厢并由水下轨道运行至运河。接下来，一个在波蒂奇铁路上的长36英里的旅程就开始了。这个倾斜轨道，是依靠由固定式蒸汽引擎来旋紧滚筒上的缆绳从而拉动火车车厢的；它在东部斜坡上完成一个1 399英尺的上升到达顶点，然后在西部斜坡完成一个1 172英尺的下降到达位于约翰斯敦的另一条运河。从约翰斯敦到匹兹堡有105英里的距离，在这里水路旅程就变得相当容易了。



COLLECTION OF THE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G #34684

这幅图描绘了尚普兰运河和伊利运河的交汇处，这是一个处于贸易路线上的重要港口，并将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城市中心完美地联系起来。

① 尽管直到1829年美国都还没有使用蒸汽机车，但能实现顺利运输的铁路已经在美国和欧洲投入使用多年。

1834年，在费城自由厅举行了庆典来宣告这一巨大工程的完成。一幅旧的版画描绘了一艘用彩旗装饰的半船（halfboats），正被腾跃的万马拉离大厅。考虑到它运用了所有能用的交通方式，这条干线无疑是成功的；但由于波蒂奇铁路存在瓶颈以及这一系统的船闸数高达伊利运河的两倍的事实，它无法在西部贸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力。多年来，这条干线仅运送了伊利运河运输量的5%～10%，而让一州人民大失所望的是，比起其他运输方式在水路上花费了更多。

其他的州也在运河上花费了大量资金，借以吸引来自新西部的贸易。切萨皮克—俄亥俄运河原计划沿波托马克河流域往上抵达马里兰州的坎伯兰，再接通到俄亥俄河。运河公司在马里兰州议会的同意下由弗吉尼亚州特许设立，而且联邦政府也大力捐助了这一项目。然而，尽管有两个州和联邦政府的政治许可以及大量的资金支持，再加上一些当地政府的援助，但由于技术瓶颈的问题，这一工程仅完成至坎伯兰。

伊利运河耀眼的成功，以及城市和地区之间为商业运输展开的激烈竞争，都导致了许多在运河上毫无利润的投资。在重要的运河修建时期（1815—1843），一共投资了3 100万美元，其中有近3/4来源于政府，而且主要是州政府。虽然缺乏盈利，加之受到铁路的出现和现实证明的影响，但地区间的竞争还是刺激了第二波的运河投资浪潮，在1843—1860年间投资共达6 600万美元。其中几乎2/3的资金来自于政府，同样也主要是州政府经费。原本应该还有更多可能的投资。然而，1837年和1839年的商业危机和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引发了金融混乱，有9个州不得不中止支付它们的债务（主要是公债，许多出售给了外国人）。宾夕法尼亚、马里兰、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的主要运河都从未收回成本。

尽管大多数的运河投资在财政上都失败了，也无法以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来进行评判，但它们的确在开拓西部方面支援了天然水道。如果铁路没有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发展起来的话，一些曾被认为荒唐的错误，可能会被证明是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丰碑。运河引起了各种问题，这点毋庸置疑。除了对少数商品而言，用马作为动力的交通工具来运输货物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运河应该是能提供一个水路系统的，但往往较大运河里的船只是无法在较小的运河里通行的。洪水和干旱也经常使驳船的航行十分不确定。然而运河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铁路，铁路能够以一个快得多的速度运送人和各种各样的商品，而速度对于名副其实的交通运输革命来讲是不可或缺的。

火　车

尽管铁路拥有十分明显的技术优势，但在19世纪30年代早期美国引进第一条具有先驱性意义的铁路后近20年里，天然水道仍然是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除了来自水路运输的激烈竞争外，阻碍铁路运输发展的主要因素便是公众的反感——根源于无知、保守和既得利益。人们以为高达20～30英里的

时速会对乘客的身体造成危害。在马萨诸塞州至少有一个城市指示其在州议会的代表，要防止“成为一个有铁路经过的地方这样一个大灾难降临到他们的城市”。有许多人深信铁路运输不切实际、浪费资源，也无法提供像水路运输那般可靠的服务。

对铁路最强烈的反对来自那些经济利益受到这个新行业竞争冲击的集团，这不足为奇。已有数百万美元被用于建筑运河、河流、公路和栈道，而成千上万的人都要依靠这些运输企业谋生。酒店老板害怕生意受损；农民们预料随着“铁马”（iron horse）取代用来在运河上拖动船只和驾车的有血有肉的动物后，干草与谷物市场将不复存在。竞争利益集团联手向铁路运输发难，限定铁路只能用于运送乘客及其行李，或者只有在运河停运的几个月里才能运送货物。俄亥俄州的一家铁路公司被要求赔偿由铁路竞争对运河航运造成的任何损失；其他的铁路公司则被严令支付吨位税以支撑运河营运。

虽然遭到那些畏惧铁路的人们的极力反对（回顾经济推理命题 5），铁路建设仍在继续进行。在国内一些不能建造运河的地区，铁路为各种商品提供廉价的运输方式。不同于那些排斥铁路的市政当局，许多城市和乡镇及其州政府都大力支持铁路建设。当时，联邦政府对铁路的财政支持和推动，受到主流的政治哲学即严格的宪政主义（strict constitutionalism）的诸多限制。尽管如此，政府也做出勘测以确定开路权，并为铁路用的钢材免税。

到 1840 年，美国的铁路里程数尚未超出 1 000 英里的运河总长度，由水路运输的货物数量仍超过了铁路的运输量。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的经济萧条之后，铁路的投资也仍然在继续，且主要由政府资助；正如表 9—3 所示，到 1850 年这个国家已经拥有 9 000 英里的铁路了。现在回顾一下图 9—2，我们看见在 19 世纪 40 年代晚期，北方通道一举超过了南方通道，而到 50 年代，铁路的优势则更为明显。

1850—1860 年间，铁路运输系统又增加了 2 万多英里，因而在这十年的末期，铁路总里程已超过 3 万英里，铁路货运量与运河持平。[①] 在这十年中，密西西比以东的所有各州都通了铁路。东海岸与密西西比河水运系统实现了连接，墨西哥湾及南大西洋沿岸各州也能与大湖区铁路互通。伊利、宾夕法尼亚、巴尔的摩、俄亥俄等不断壮大的干线铁路公司完成了 19 世纪 40 年代就开始的建设工程，而短线铁路的会合提供了新的直达铁路线。到南北战争开始时，现有的铁路运输系统的东部架构已经建立，可以直接进行从纽约到芝加哥再到孟菲斯最后返回纽约的全程铁路旅行。

但是美国离建成一个完整的铁路系统仍然有很远距离。尽管 1860 年时 4 英尺 8 英寸的“斯蒂芬森轨距”（Stephenson gauge）（铁路轨道两条钢轨之间的距离）就已经普遍采用，但最终选择“标准轨距”作为全国统一标准却已经是 25 年之后的事。因为火车头和车厢都只按照一种轨距建造，而公司之间在运输工具的联运交易、联运提单和乘客车票、联运运价分配以及标准时间等诸多事项上缺

① 铁路从运河那里抢走了几乎所有的客运业务（除了那些横越纽约州的贫困的移民）以及轻便、贵重货品的运输业务。

乏统一协定，从而多样不一的轨距阻碍了连续的运输。[①]

尽管如此，铁路系统也有了诸多改进与更新，如表 9—4 所示，铁路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南北战争前 20 年间提高了一倍多。换句话说，即在相同投入下铁路的产出增加了一倍。根据艾伯特·菲什洛所言，技术进步在这 20 年中得到体现，火车头的平均拉力提高了一倍多。货车容量也增加了，到 1859 年八轮车厢已十分普遍，但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现有设备使用率的提高。存量资本以及其他要素的投入有所增加，但随着更充分地利用初始投入，产出水平提高得更快。

表 9—3　　1830—1860 年运转中的铁路英里数

年份	里程
1830	23
1835	1 098
1840	2 818
1845	4 633
1850	9 021
1855	18 374
1860	30 626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Series Q 15.

表 9—4　　1839—1859 年铁路的生产率变化（1910 年＝100）

	投入					
年份	产出	劳动	资本	燃料	总投入[a]	全要素生产率[b]
1839	0.08	0.3	0.8	0.07	0.5	16.0
1859	2.21	5.0	10.1	1.50	6.6	33.5

a. 劳动、资本和燃料的加权平均，权重是各自在总成本中的比例。

b.（产出÷总投入）×100%。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lbert Fishlow，“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ed. Lance E. Davis et al.（New York：Harper & Row，1972），499.

① George R. Taylor and Irene Neu，*The American Railway Network，1861—189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6－7，12－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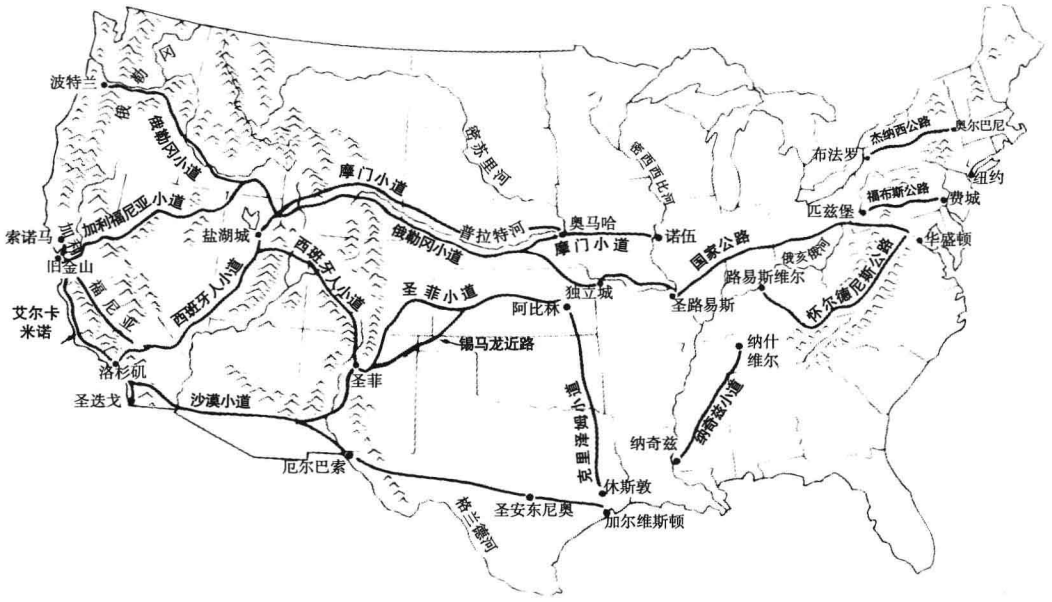
公　路

尽管技术上平淡无奇，但公路和铁路仍然是交通运输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好莱坞和西部电影，我们对于西部移民者所遵循的路线十分熟悉。地图 9—1 标示了这些陆上长途旅程的“交通要道”（highways）。向西迁移、拓殖和贸易的陆上路线通常是遵循印第安人狩猎和战争的旧有路径，这些道路又依此沿着河谷修建而成，从而提供了最方便的旅途路线。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丹尼尔·布恩开拓的怀尔德尼斯路（Wilderness Road）。穿过坎伯兰山口的高山屏障，在现在肯塔基州的米德尔斯伯勒附近，然后这条道路往北并向西进入俄亥俄地区。在这条道路上，有许多地方都只是一个做了标记的小径，却涌入了成千上万的移民。[①] 尽管大多数的陆路道路在雨季泥泞不堪而在旱季又尘土飞扬，但仍有一些道路，其全程的一部分是被很好地建造并保养的。

表面平整的公路里最著名的就是坎伯兰公路，也经常被称为“国家公路”，它是在多次的辩论后由联邦政府修建而成的。1811 年从马里兰的坎伯兰开始动工，至 1818 年时这条公路已开通至俄亥俄河沿岸的惠灵，其后又修建至圣路易斯。这个主要的政府工程，是艾伯特·加勒廷于 1808 年提出的联邦公路系统计划的一部分。虽然有很多人支持一个内部改良的综合计划，但这也是联邦政府在早期建造的唯一一条主要公路。像这类对联邦工程的反对，表面上是基于联邦参与这些活动是违宪的这一主张。回顾经济推理命题 1、2 和 4。区域间竞争在阻止被提议的建设项目上起到了主要的作用。西部一直持续且强烈地要求建造一个全国性公路系统，而且一开始中大西洋地区各州也倾向于赞同。但是纽约和宾夕法尼亚在修建了它们自己通往西部的路线之后，便不再希望联邦政府出资以促进来自其他地方的竞争。而本身拥有相当好的公路的新英格兰人，甚至不愿鼓励人口的进一步流出，也不愿改善波士顿的竞争对手的商业地位。至于南部，虽然自身受困于泥泞的道路，但对于任何可能增加政府财政需要或使进入西部无奴隶地区更加容易的计划，都是非常反对的。虽然存在诸多反对，国会还是无法避免为邮政和军用道路拨出越来越多的款项；但在境内改进的地域分配上的区域间竞争，容许了一个极为原始的公路系统，并很好地持续存在到了 20 世纪。

---

① 同样类型的道路和有标记的小径也出现在向西海岸的陆路迁移过程中。俄勒冈小道（Oregon Trail）上的旅途开始于 19 世纪 40 年代早期，共 2 000 英里长并能将移民者运送到西北太平洋沿岸地区和加利福尼亚。由布里格姆·杨在 19 世纪 40 年代晚期开创的摩门小道（Mormon Trail），平行于沿着普拉特河南岸的俄勒冈小道并与之存在一段距离。而一些由西班牙人标示出来的更早的路线，则对于早期的探险家和贸易商来说是十分有价值的，例如圣菲小道（Santa Fe Trail）——进入现在的新墨西哥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加利福尼亚的艾尔卡米诺（El Camino Real），即王者大道（King's Highway）。



地图 9—1　西进的旅途

拓荒者们面临着大量自然障碍，而遵循诸如俄勒冈、摩门或者圣菲小道等著名的路线，则能将这类障碍减至最少。值得注意的是，摩门教徒有意沿着普拉特河以北而行，这样是为了避开南部俄勒冈小道上对他们存在敌意的马车队。

收费公路

在许多地区，尤其是那些不能使用其他交通方式的地区，则由私人收费公路公司来建造公路。这些公司收取通行费，并在选定的地点设置用长矛或长枪组成的大门，以此来让缴费者通过。收费公路时期始于 1789 年，其时费城和兰开斯特收费公路修建完成；而结束于约 1830 年，在那之后只有少数私人公路尝试作为商业经营。在这个时期里，宾夕法尼亚州特许授权 86 家公司共建造了超过 2 000英里的公路。到 1811 年，纽约州有 1 500 英里的公路，由 135 家公司建造而成；新英格兰则准予约 180 家公司修筑收费公路的特权。尽管有权收取通行费，但那些为公共事业而修建公路的公司中，只有少数盈利；事实上，是否有公司能够赚到接近其资本回报的现行利率都是令人怀疑的事情。卡车司机千方百计地逃避通行费用，而不诚实的守门人又经常中饱私囊。但最大的困难还是公路所能吸引的唯一的长途贸易只有驿站马车的乘客和移民，而这一点是大多数支持者所未能预见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货运无法承受长距离陆路运输的成本，而没有货运交通，收费公路就完全不能获得利润。最终它们面临着来自汽船、运河和铁路的广泛竞争，但到这时，投资资本回报率已经显得十分令人失望了。一些收费公路被迫放弃，其后又为州政府所购得以加速公共公路系统的发展；其他的则

被当地政府收购并转变成为免费公路。[①]

栈道是一种特殊的收费道路，在收费公路的建造下降后不久便发展起来。栈道的修建首先是按照行驶的方向放置纵枕木，然后再将宽厚的木板铺设其上；它在全天候使用方面具有优势。美国的第一条栈道，于 1837 年在锡拉丘兹（Syracuse）修建而成，在随后的 20 年里，共有几千英里的栈道被修筑起来，在木材丰富的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尤为集中。这些栈道大部分是私人和地方融资修建的，但也有部分由州政府资助。[②]

美国内战前区域间增长假说

美国内战前区域间经济增长假说就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对早期全国市场发展的重要性，提供了另一种观点。道格拉斯·C·诺斯提出一个论点，在他早期研究的数量证据的基础上，又加入了理论规范和架构。简而言之，诺斯认为 1815—1843 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英国对南部棉花的需求推动的，从而鼓励南部地区专业化生产棉花。这又转而提高了南方对西部粮食和便宜的东北部工业制品（主要是为奴隶提供靴子、鞋以及粗纤维衣服）的需求。全国市场规模的发展，通过降低交通运输成本，实现了大规模生产经济和更强的区域经济专业化。随着东北部地区在制造业方面更加专业化且更加城市化，南部对西部粮食的需求增长也进一步加强。每个地区都沿着其各自在生产上的比较优势而发展，对其他地区生产的产品的需求数量也越来越大。在 1843 年以后，主要的启动作用（initiating role）即国外对棉花的需求逐渐减弱，国内市场力量的重要性上升。连接西部和北部的铁路，也促进了南方的启动影响力的削弱。西部移民的时机与浪潮、土地售卖以及关键的区域主要产品的价格等诸多证据都支持诺斯的论点。尽管如此，但在唯一能提供可靠的粮食生产数据的时间，即 1840 年以后，南部的粮食生产表明，南方的粮食在相当程度上能够自给自足。[③] 然而，正如劳埃德·默瑟所阐述的，南方粮食短缺的地区也许能够给西部的面向市场的粮食生产带来重大的影响，尤其是在 1840 年以前。[④] 此外，自给自足的程度也可能严格地取决于如何定义“南方”。例如，拥有大量肉类剩余的肯塔基和田纳西这样的边界

---

① 一些私人公路延续到了 20 世纪，但所有那些现在所剩余的就只有赋予一些公路系统的重要干线的“收费公路”这一名字。这些高速公路不同于以往的收费公路之处是，其现代企业是由公营公司所拥有的。

② 关于栈道修建热潮的精彩分析，详见 John Majewski, Christopher Baer, and Daniel B. Klein, “Responding to Relative Decline: The Plank Road Boom of Antebellum New York.”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1993): 106 - 122。

③ Albert Fishlow, “Antebellum Interregional Trade Reconside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May 1964): 352 - 364; 也可参见 Robert W. Fogel, “Discu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77 - 389。另外，参见 Robert E. Gallman, “Self-Sufficiency in the Cotton Econom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Agricultural' History* 44 (1970): 5 - 23。

④ Lloyd Mercer, “The Antebellum Interregional Trade Hypothesis: A Reexamin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ds.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71 - 96.

州，应当被认为是南部的州还是北部的州？[①] 尽管关于这一激烈的辩论尚无定论，但这个假说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分析框架，并为研究在交通运输革命的重要时期里，地区间的发展和联系以及全国性经济的形成提供了一个国际视角。

海　运

除了国内交通运输有众多发展，长期传统的商船也取得了很大进步。得益于大胆的企业家精神，纽约的黑球班轮公司（Black Ball line）于1818年创立了横跨大西洋的定期航班。最开始仅有四艘船，在每月的第一个星期，都有一艘船从纽约起航前往利物浦，同时也有另一艘船开始其利物浦—纽约的航程，正如这条航线的广告所宣称的，保证船舶“无论装满还是未装满”（full or not full）都如期航行的做法包含了极大的风险，因为一艘船一年可能完成三次往返航行（而定期贸易商通常是往返两次），而它的船舱却远没有装满。[②] 但是，靠专门运载乘客、硬币、邮件以及“优质的货物”，班轮设法成功运转超过100年。19世纪20年代，黑球班轮公司将其往返航班增加到每月两次，并很快开通了其他纽约和欧洲港口之间的班轮航线。自此以后，乘客可以指望在某一天的特定时刻起航，而商人也能够预定舱位，而不是一个它将及时到达的模糊希望，从而使有利可图的交易成为可能。通过保证一个预定的时间表，黑球班轮公司降低了海外贸易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经济透视 9.1

☞

全国性的市场形式

国内交通的迅猛发展使得西部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以及国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塞缪尔·F·B·莫尔斯在19世纪40年代发明的电报也有助于市场统一并降低交易成本。电报线平行于铁路贯穿全国。到1852年，有23 000英里的电报线进入运转，加快了通信交流并减少了不确定性。1866年，欧洲铺设一条海底电缆，进一步深化了美国和欧洲经济的一体化。

尽管经济一体化还远没有完成，但其显著收益在南北战争前夕已经被意识到了。如早前所阐述的，局部价格变动描绘了经济一体化的进展。正如托马斯·贝里（Thomas Berry）所说：

早期（1788—1817年），由于一般行为的差异，很难指出任何西部相对于东

① Robert Sexton, “Regional Choice and Economic History,” *Economic Forum*, 16 (1) (Winter 1987).

② Robert G. Albion, *The Rise of New York Port 1815—1860* (Hamden, Conn.: Archon, 1961), 4.

部的一致性滞后；然而可以保险地说，在1793—1797年以及1810—1817年间的第一重大的运动中，存在着一个滞后，经测量为略多于一年的时间长度……再分析之后的一段时间间隔（1816—1860年），纽约、新奥尔良和辛辛那提的每月价格的加权总指数，显示了相互之间令人惊讶的一致程度……在1819—1820年，辛辛那提的价格滞后了一年左右时间，但在1839年的转折点它们仅滞后于沿海市场3～4个月，而对1857年的恐慌则是同时做出了反应。①

一个切实可行的交通运输系统对于完善全国市场和连接各个地区都至关重要。最早是西部河流上的汽船，然后是运河，最后是铁路，这些使得西部与沿海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如表9—5所示，西部价格相对于东部价格的百分比急剧地增长。下图为解释表9—5的证据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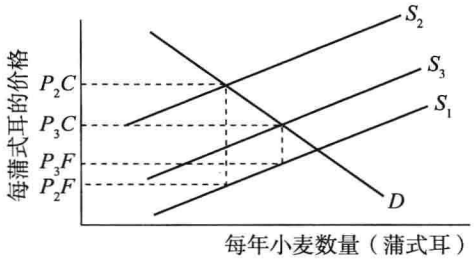


表9—5　辛辛那提批发价格分别占费城、纽约、新奥尔良三地批发价格的百分比，1818—1860年[a]（%）

	商品											
	面粉（每桶）			小麦（每蒲式耳）			玉米（每蒲式耳）			膳食猪肉（每桶）		
时期	费城	纽约	新奥尔良	费城	纽约	新奥尔良	费城	纽约	新奥尔良	费城	纽约	新奥尔良
1816—1820	63	66	72	45	48	—	51	48	—	56	58	63
1821—1825	52	52	56	39	38	—	38	32	30	63	67	76
1826—1830	68	67	67	50	48	—	49	41	29	67	68	78
1831—1835	73	74	76	57	56	—	55	49	36	77	77	85
1836—1840	73	73	77	59	61	—	56	51	47	87	85	86
1841—1845	77	73	86	68	65	90	53	47	65	82	79	84
1846—1850	78	71	87	68	63	88	51	48	62	81	90	88
1851—1855	82	79	90	73	61	90	61	59	74	85	90	92
1856—1860	88	95	89	79	70	86	70	66	72	91	94	93

a. 辛辛那提和港口城市的价格在1816—1820年到1856—1860年这一时期的差距。

资料来源：Erik F. Haites，James Mak，and Gary M. Walton，*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1810—1860*（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5），7 and Appendix A.

① Thomas S. Berry，*Western Prices Before 1861*（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3），97－99.

令 S_1 代表西部地区小麦的生产成本加上任意本地（短途）运输成本，令 S_2 表示 S_1 加上 19 世纪早期区域间运输成本，而 S_3 等于 S_1 加上 19 世纪中叶的这些成本。消费者为每蒲式耳小麦的花费从 P_2C 下降到 P_3C，而农民每蒲式耳获得的收入由 P_2F 上升到 P_3F。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均有收益。

农民获得了他们的作物销售价格中越来越大的份额。此外，在消费者支付的购买价格中运输和其他营销成本的份额也减少了。随着货物运送成本下降，开发新的未拓殖地区是有利可图的，并能增加国家的经济活动。正如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所说，扣除质量因素的平均土地价格，从 1810 年到 1860 年，增加了一倍多，也可能是两倍多。[①] 交通状况的改善显著地促进了经济的专业化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革命”正在使我们这个时代的世界实现与此相似的变化。

横越大西洋的班轮，完全确立了纽约作为美国主要港口的地位。沿海班轮主要是驶往新奥尔良，但也会前往查尔斯顿、萨凡纳以及莫比尔（Mobile）；在东向的海运中将棉花带往纽约，而往南则运送很大一部分来自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产品。事实上，在战前大多数时间里，棉花港口和纽约之间的贸易，不管是在数量上还是金额上都远高于远洋贸易。[②] 这些定期班轮与西部河流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相得益彰，而西部河流主要是通过新奥尔良的南方通道从内地输出产品。

1820—1860 年间，大帆船令人瞩目的设计变革，引发了它在吨位和效率上的增长。在 19 世纪 20 年代，美国帆船的平均规模仅有 300 吨，而到 50 年代便增加到了 1 000 吨，而且负重 1 500 吨的船舶也屡见不鲜。船的长幅比（length-to-beam ratios）有显著增长，普通班轮的航行范围也明显扩大，而船舶最宽部分趋向于中心的古老惯例也被废止了。借鉴于法国的设计师，北方的造船公司生产了一种特殊的船只，并在南北战争前最后的 30 年里几乎统治了海洋。这就是著名的快帆船，它牺牲部分运载能力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速度。快帆船是有着三根桅杆的外观优雅的船，是横帆的但又配备了丰富的纵帆，使其在风中拥有极大的优势，从而提升了它的速度。相比外国注册的船舶，一艘快帆船可由更少的人手来操纵，因此可以一天 24 小时地行驶，而不需要在晚上休息 7～8 个小时。

第一艘美国（或“巴尔的摩”）快帆船是安·玛金号（Ann McKim），于 1832 年下水。它的建造者唐纳德·麦凯成为一个传奇人物，而他设计的一些船的名字即使到现在也耳熟能详：飞云号（Flying Cloud）、海上君王号（Sovereign of the Seas）、大共和号（Great Republic）和闪电号（Lightning），拥有内凹的舷侧和船首以及在甲板之上高耸 200 英尺的船帆，都显得异常漂亮。在闪电号首次横跨大西洋的航行中，它的航海日志里记载了一个记录，即以 18 英里每小时的平均速度一天航行 432 英里。即使是现在，很多远洋船舶也达不到这个速度。

快帆船是为了能在长途运输中快速地运送乘客和贵重货物而设计的。在大西

---

① Peter H. Lindert, “Long-Run Trends in American Farmland Values,” *Agricultural History* (Summer 1988): 60.

② Robert G. Albion, *Square-Riggers on Schedu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8), 49 - 50.

洋的航程中，由于装载容量的限制，它们并没有利润。但是它们主导了同中国的贸易，而且1849年以后，在淘金热中它们凭借运送乘客和货物前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而为其所有者赚了不少钱。从纽约出发绕过合恩角（Cape Horn）前往旧金山的航线，全程16 000英里，飞云号创造了仅用89天多便完成航行的纪录，而那时快帆船航行的平均时间大约是100天。[①] 相对于长达三个月的普通航海旅途，这就意味着时间的节省，因而一些商人和旅客愿意为此支付一个好价钱。

然而在美国的商船队中，快帆船并不是唯一的船舶。宽舷梁的、肥首型的运货船，是一种比快帆船慢很多的船，但也是这个国家商船队的骨干船只。这些船只由将航海视作传统且相当有社会声望的专业人士作为船长，配备的人员是以海为生的全体美国船员，由大胆又有远见的商人拥有，就像费城的斯蒂芬·吉拉德。来自纽约、波士顿以及缅因州海岸的海路的造价低廉但颇具专业水准的船舶，一直到南北战争都是伟大的海洋货物运输工具。

在此期间，英国人取得了技术进步，从而使他们能够挑战美国的海上霸权，并最终获得胜利。英国人的主要革新就是汽船的采用，发明起初是为了能在河流上使用，并为了保护水域而在外海航行。英国人完成了两项基本变革，其一是在修造船体上用铁代替木材，其二是利用阿基米德的螺旋原理（screw principle）取代桨作为推进力。对于运输蒸汽时代早期的重型机械的安全来说，铁质船体是有必要的，而且相较于木制船它们还拥有更高的强度、更大的浮力以及更好的耐久性。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英国人很快就解决了建造铁船的问题。铁骨木皮船，有铁制的骨架和木制的船壳，但橡木木材的酸性会腐蚀掉钢铁。而一旦英国人完善了铆接和使用铁皮钢板的技术，他们在建造铁船方面就拥有绝对的优势——正如美国曾在木船制造方面的巨大优势那样。

早期蒸汽引擎的低效率和慢速度是无止境的困难的根源。很长一段时间，汽船都不得不装载比货物重得多的煤，而且引擎的速度低下使得效率低的桨轮（paddle wheel）成为必要——虽然它存在着理论劣势。尽管如此，经过约20年的发展之后，横越大西洋的汽船每年已经能够完成6次航程——是与之竞争的帆船班轮的两倍。10年之后，塞缪尔·丘纳德能成功建立一条横越大西洋的定期服务航线并不完全是偶然；到1848年，设计出的引擎已能够维持较高的速度。那时螺旋桨迅速地投入使用，而燃料消耗量也大大缩减。在19世纪50年代，汽船的数量和注册吨位都飞速地增长，而且它们几乎赢得了所有的乘客和贵重货物。

1860年，帆船的运输量仍然占了世界范围内国际货运的大部分。然而到这个时候，未来的形势已经有目共睹了——除了顽固的美国企业家，他们无法理解他们漂亮的木船何以迅速地过时淘汰，因而也未能采取有力措施来与英国竞争。请回顾经济推理命题5。虽然政府对美国汽船营造商的补贴早在1845年就已经开始，但这些既不足够且管理不善。而且即便是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美国的营造商们也几乎无法在成本上与拥有极大优势的英国钢铁行业竞争。趋势只有有识之

① 帆船航行的这一纪录一直保持到了1988年。

士才能把握。在19世纪20年代，美国的船只运输了美国对外贸易量的近90%；而到了50年代，这一数据便下降到大约70%。时代已经改变，而财富之手已放在别人的肩膀上。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lbion, Robert G. *Square-Riggers on Schedul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38.

——. *The Rise of the New York Port, 1815—1860*. Hamden, Conn.: Archon, 1961.

Berry, Thomas S. *Western Prices before 186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3.

Chandler, Alfred D., Jr. *The Railroad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5.

Cootner, Paul. "The Role of the Railroads in the United States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1963).

David, Paul. "Transport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ofessor Fogel On and Off the Rail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2 (3), 2d series, (1969).

Fishlow, Albert. "Antebellum Interregional Trade Reconsider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May 1964): 352 - 364.

——.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43 - 642.

Gallman, Robert E. "Self-Sufficiency in the Cotton Econom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Agricultural History* 44 (1970): 5 - 23.

Goodrich, Carter H. *Government Promotion of American Canals and Railroads, 1800—18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0.

——. *The Government and the Economy, 1783—1861*. Indianapolis: Bobbs Merrill, 1967.

——. "Internal Improvements Reconsider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June 1970): 289 - 311.

Goodrich, Carter H., et al. *Canals and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Haites, Erik F., James Mak, and Gary M. Walton. *Western River Transportation: The Era of Early Internal Development, 1810—186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Hunter, Louis. *Steamboats on the Western Riv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Jenks, Leland H. "Railroads as a Forc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In *Enterprise and Secular change*, ed. Frederic C. Lane and Jelle Riemersma. Homewood, Ill.: Irwin, 1953.

Lindert, Peter H. "Long-Run Trends in American Farmland Values." *Agricultural History* (Summer 1988): 60.

Lindstrom, Diane L. "Demand, Markets and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 Philadelphia, 1815—18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5 (1975): 271 - 273.

Lindstrom, Diane L., and John Sharpless. "Urban Growth and Economic Structure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3. Greenwich, Conn.: JAI, 1978.

Majewski, John. "Who Financed the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Regional Divergence and Internal Improvements in Antebellum Pennsylvania and Virgini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 (1996): 763 - 788.

Majewski, John, Christopher Baer, and Daniel B. Klein. "Responding to Relative Decline: The Plank Road Boom of Antebellum New York."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1993): 106 - 122.

Mak, James, and Gary Walton. "Steamboat and the Great Productivity Surge in River Transport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2): 619 - 640.

McIlwraith, Thomas F. "Freight Capacity and Utilization of the Erie and Great Lakes Canals before 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December 1976).

Mercer, Lloyd. "The Antebellum Interregional Trade Hypothesis: A Reexamination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ds.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ch, and Gary M.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71 - 96.

Niemi, Albert W., Jr. "A Further Look at Regional Canals and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1820—184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7 (1970): 499 - 522.

——. "A Closer Look at Canals and Western Manufacturing in the Canal Era: A Repl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423 - 426.

North, Douglass 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 "The Role of Transportation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North America." A 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Historical Sciences, Vienna, August 1965, and published in *Les Grandes Voies Maritimes dans le Monde XV^e-XIX^e Siecles*. Paris: Ecole des Hautes Etudesen Sciences Sociales, 1965.

Ransom, Roger L. "Canals and Development, A Discussion of the Issu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4 (1964): 365 - 376.

——. "Interregional Canals and Economic Specialization in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5 (1), 2d series, (Fall 1967).

——. "Social Rates of Return from Public Transport Investment: A Case Study of the Ohio Ca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 (1970): 1041 - 1060.

——. "A Closer Look at Canals and Western Manufacturing in the Canal Er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8 (1971): 501 - 510.

Scheiber, Harry. *Ohio Canal Er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69.

Stover, John F. "Canals and Turnpikes: America's Early-Nineteenth-Century Transportation Network." In *An Emerging Independent American Economy, 1815—1875*, eds. J. R. Frese and J. Judd. Tarrytown, N. Y.: Sleepy Hollow Press, 1980.

Taylor, George R. *The Transportation Revolution, 1815—186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51.

Taylor, George R., and Irene Neu. *The American Railway Network, 1861—189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Thompson, Robert. *Wiring a Continent: The History of the Telegraph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2—186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7.

Walton, Gary M. "River Transportation and the Old Northwest Territory." In *Essays on the Economy of the Old Northwest*, eds.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87, 225 - 242.

第 10 章　市场扩张和第一次产业转型

本章主题

从宪法实施到南北战争爆发，美国的经济实现了结构转变，并为成为一个工业大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最开始仅有几个小型工厂，且主要是木材厂，而到1860年时这个新国家的制造业已经仅次于英国了。然而在1860年，以现在的标准看来其工业企业依旧很小，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不过许多重要的转变已经发生，这标志着工业化的到来。最重要的是新的生产要素结合方式的发展，引发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并需要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商业利益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已变得十分明显，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各州引领了工业部门的发展。在诸多方面，交通运输的发展都对增进区域专业化和经济一体化起到了重要作用。西进运动、棉花王国的兴起和工业化三者同时展开而使得它们更加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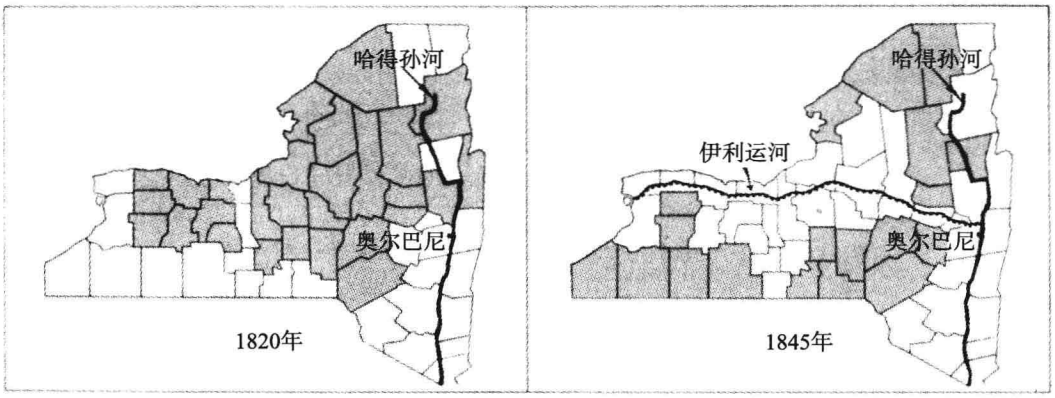
美国制造业的早期变化

家庭生产的衰落

当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91年在国会发表他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Re-

port on Manufacturers）时，他估算道，全国有 2/3 到 4/5 的服装是由家庭生产的。食品加工也大多数是在家里完成。水力还尚未运用到纺织生产中，而主要是用于碾磨谷物、切割木材以及其他用途。城镇的工匠依靠手工生产鞋子、帽子、壶、锅以及各种工具。

然而到 1830 年，在东部的家庭制造业表现出了一个显著的衰退；且此后，除了那些最不易受影响的地方，供应当地市场的家庭制造和小工匠商店都全线持续性大幅衰退。造成衰落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组织和现代交通的发展。不管在哪里，只要有汽船行驶，或者运河、公路和铁路被建造起来，其家庭和手工匠的制造品都迅速下降。即使是在边疆地区，到 19 世纪中期以后，大多数家庭也已接触到由美国和欧洲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地图 10—1 显示了由交通运输导致的家庭制造品对于工厂生产的产品带来的影响。两张地图上纽约州的阴影部分表示的是，在 1820 年和 1845 年这两个不同年份里，由家庭制造的羊毛制品，其人均产出最高的 1/3 的县。注意到在 1820 年，在奥尔巴尼的下游沿着哈得孙河的县都没有在这前 1/3 里。而到 1845 年，伊利运河穿过的各县，在家庭制造产品的数量上也存在着类似的下降。相比之下，迟至 1865 年，田纳西几乎所有的农村居民——尤其是山区居民——都仍穿着家庭制作的衣服。原始的运输延长了对家庭制作服装的穿着。回顾经济推理命题 1 和 2。



地图 10—1　运河效应

1820—1845 年，沿伊利运河一带，家庭制造的羊毛制品（判断与商业路线隔离程度的指标）经历着一个剧烈的变化。阴影部分区域表示这一时期由家庭制造的羊毛制品的人均产出最高的 1/3 的县。

资料来源：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from *American Wool Manufacture*, Volume 1, by Arthur H. Co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 280, copyright 1926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手工作坊与磨坊

一直到大约 1850 年，制造业产出的大量增长都还受到独立运营或者在手工作坊的工匠的影响。工匠从事的是“订制”（bespoke）工作，他们根据订单制作

商品并在质量上维持最高标准，然后通过自己的小商铺出售。但在1815年以后，由独立工匠生产的产品迅速减少。在那个时期及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更重要的都是手工作坊，由一个师傅经营并雇用几个帮工和学徒。有时候，正像康涅狄格州丹伯里市的帽商那样，有一大片聚集的手工作坊，将大量产品出售给批发商人，以在广阔的市场内分销。

在殖民地时期，几乎所有的地区都有小型的制造厂被建立起来，而1860年的全国普查显示，国内有近2万家锯木厂和1.4万家面粉厂。除了极少数例外，制革厂、酿酒厂、啤酒厂、锻铁厂的生产也都是用于供应当地市场的。在1860年以前美国工业的分散得益于水力的运用，也通常受到较高短途运输成本的保护，从而产生了往往构成有效的地方垄断的小企业。

尽管如此，在1860年以前，已经有一些制造厂利用典型工厂的制造方法实现了大规模生产。此外，还有两个行业的大型制造厂在某些界定相当明确的地区趋于集中。即便是在殖民地时期，面粉生产就已经被吸引到切萨皮克地区，并持续在那里聚集——由于马里兰和弗吉尼亚的农民不种小麦而改种烟草。随着城市越来越大，对建筑材料的需求也逐渐上升，从而大的伐木公司将开采木料的地点选择在远离市场的地方也变得有利可图了。最典型的就是到1850年时位于流经新英格兰、纽约和宾夕法尼亚的河流的上游河段的那些公司。

美国工厂的出现

工厂（factory）一词通常用于具有以下特征的制造单位：

（1）生产出的大量标准产品在一个广阔的市场范围内销售，而不仅限于当地市场。

（2）在一个或毗邻的几个厂房里进行复杂的生产作业，从而大量投资于固定厂房设备、生产过程的机械化以及动力的使用是暗含的。

（3）有在一定的组织管理下进行操作的工人。

美国的工厂首先从棉纺织业发展起来。1793年建成并开始运作的阿尔米（Almy）制造厂、布朗制造厂及斯莱特制造厂通常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工厂。摩西·布朗和威廉·阿尔米在新英格兰的商业传统中属于富庶之人。同其他许多美国企业家一样，他们曾经尝试照搬英国的纺织机械，但均以失败告终。1789年，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一位年轻的机械奇才——来到罗得岛，他曾在英国米尔福德的阿克赖特和斯特鲁特公司（firm of Arkwright and Strutt）里工作过好几年。记下了水力纺纱机的每一个细节后，斯莱特和阿尔米及布朗走到一起，并答应为机械化纺织厂仿制一套设备。虽然规模较小，这家公司却成为操作工们的训练场和经营者们可以仿效的试点企业。

类似斯莱特制造厂（Slater mill）的一些小型棉纺厂很快便如法炮制，但由于其创办者未能着眼于大市场，大多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便都以失败告终。

直到 1807 年《禁运法案》颁布以及由此引起的英国纺织品供应短缺刺激了对国内制造品的需求，一大批纺织厂才涌现出来。1805—1815 年间，在新英格兰新建了 94 家棉纺织厂，而不断加剧的竞争促使阿尔米和布朗把他们的市场向南部和西部推进。到 1814 年，所有货物的 70%都经由费城被运往中西部。在阿克赖特机械被引进美国之后仅 20 年，纺纱市场已扩展到全国，纺织工序像在英国一样成为真正的工厂化操作。

洛威尔工场和沃尔瑟姆制度

有两个事件促成了这些变化。一个是动力纺织机被成功引进美国制造业；另一个则是生产的有序组织，使得棉布制造的四个过程，即纺、织、染、剪，可以在同一工厂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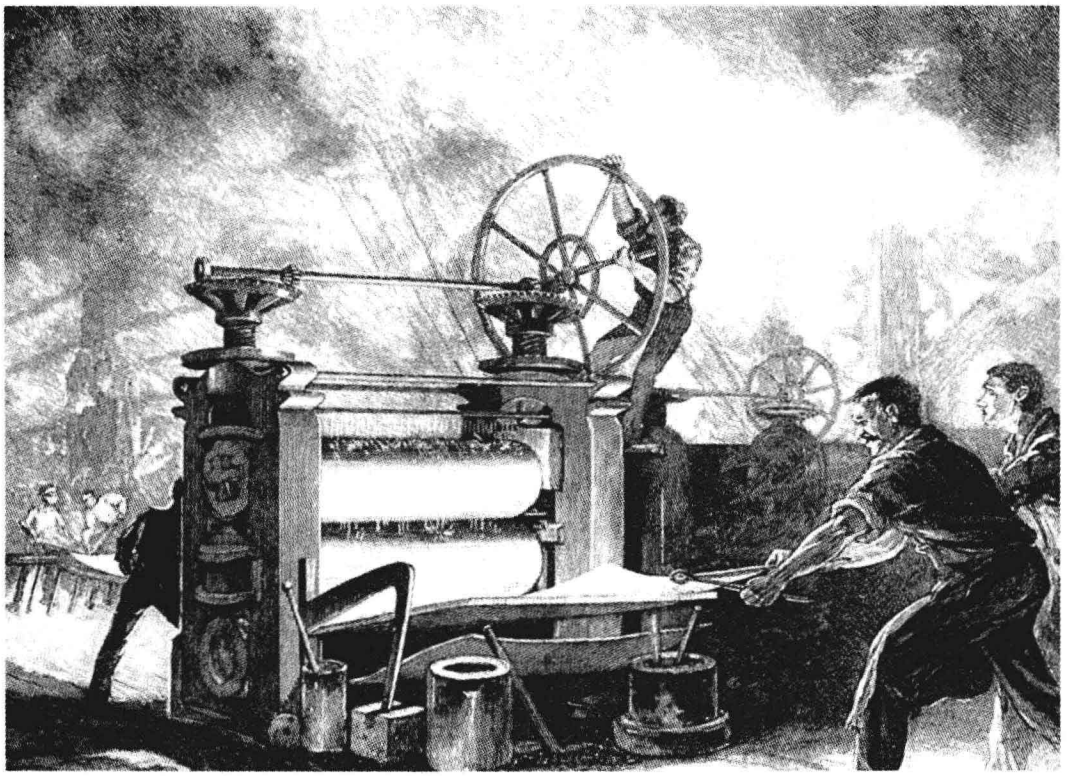
© CULVER PICTURES

本图描绘了一个棉纺织工厂（约 1839 年），在那里棉花完成了梳理纤维、拉伸以及纺成粗纱（拧成一股）的工序；它很好地反映了机械化工厂的复杂性以及与之相关的庞大的经济规模。

在仔细观察了英国纺织机器的操作过程后，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威尔——一位新英格兰商人——掌握了机械化纺织方面的大量秘诀，从而使他能够在一位天才技师的帮助下造出一台当时最先进的动力纺织机。然而洛威尔做出的更卓越的贡献还是在企业经营方面。他说服几位富人在沃尔瑟姆同他一起建立了一个企业，它具备工厂生产的一切基本特征（经济推理命题 1）。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制

造公司（Boston Manufacturing Company），是所谓的波士顿协会（Boston Associates）有兴趣的几个类似公司中的先驱。沃尔瑟姆工厂专业化生产粗布，并在美国各地销售。由于将纺织品生产的各个工序集中在一个工厂内完成，从而降低了生产成本（经济推理命题 2）。众多的专业技术工人按部门组织起来，由不必懂技术的主管人员监督。工厂由于使用了动力机械而可以大量生产标准化商品。

在梅里马克制造公司（Merrimack Manufacturing Company）遵循了沃尔瑟姆模式的洛威尔，以及在曼彻斯特和劳伦斯，工厂制度都获得了长久的立足点。在新英格兰纺织业的第二大中心，普罗维登斯-波塔基特地区（Providence-Pawtucket region），也存在着一个类似趋势，尽管那里的工厂更少而且更小。而坐落于帕特森和费城附近的第三大地区，主要是小型制造厂，完成一个单一的主要工序并生产高质量的织物。但到 1860 年，新英格兰的工业拥有几乎 4 倍于大西洋中部产业的纱锭，并占据了这个国家棉织品总产出的 3/4。工厂开始在纺织业领域表现出它的优势。



© HISTORICAL PICTURES STOCK MONTAGE

如图中描绘的鼓风炉和轧钢机，钢铁生产的技术进步集中展现了“现代化”的 19 世纪工厂。

其他行业采用同样的组织形式也仅仅是时间问题。由于羊毛生产的技术进步更慢，因而相比于棉织物生产，羊毛制品生产倾向于仍保持小型制造厂。但在 1830 年以后，羊毛制品工厂也开始采用沃尔瑟姆制度，而且到 1860 年时美国最大的纺织工厂是羊毛纺织工厂。再一次地，关于生产要素在大单位里相结合方

面，新英格兰远远超过了本国其他地方；1860 年全国的羊毛制品产出有 2/3 来自于新英格兰。[①]

铁厂及其他工厂

对于其他大多数产业来说，19 世纪 30 年代同样是个大发展以及尝试新方法的时期。在主要的炼铁工业，19 世纪 40 年代建成的铁厂使 25 年前的作坊相形见绌。例如，到 1845 年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西部的布雷迪的本德钢铁公司（Bend Iron Company）就已拥有：

> 近 6 000 英亩矿区以及阿勒格尼河沿岸 5 英里的地段。该公司自己开采煤炭、矿石、石灰石、火黏土及黄铁矿，并自行炼焦，且拥有 14 英里的配套铁路。工厂本身由 4 个炼炉、一个铸造车间及一些轧钢机组成。工厂装备齐全，可以完成所有的工序——从采掘矿料到把制成的钢轨和金属型材运送给用户，而每年可以生产 1 万～1.5 万吨钢轨。它的 538 户劳动家庭住在公司自己的公寓中。这个拥有 100 万美元实际投资额的公司在南北战争前是美国最大的公司之一，尽管还是有一些公司具有几乎与之相当的生产能力和类似的组织形式。[②] 123

到 19 世纪 50 年代，东部的无烟煤地区已经实现了炼炉与轧钢的工厂作业，而美国的工厂也开始生产军火、钟表及缝纫机。

一个产业如何受另一个产业技术进步的带动而采用新工艺可以通过这样一个事实来证明：由于缝纫机的大批量生产，鞋类行业的生产也具备了工厂特征。火车车厢甚至农具最终也是大批量生产。最终，在市场更广阔、固定厂房设备投资巨大、工人受到规范化组织管理的地方，除了纺织与炼铁行业外，其他一些传统的制造行业也达到了工厂状态。巴尔的摩和罗切斯特的大型商业化面粉厂即属于此列，纽约、费城、巴尔的摩以及（1840 年后）辛辛那提的一些大型包装厂也是如此。

法人组织的兴起

除规模和组织形式外，企业的法律概念也有所变化——从个人独资和合伙制的组织方式逐渐转化为企业法人组织（经济推理命题 4）。企业法人组织逐渐成

---

① 还有一点也很值得重视，即原材料被带往家庭进行加工（纺羊毛、棉或者织纱）后再运往市场交易的村舍制造（cottage manufactures）和外包制，虽然在英国十分盛行但在美国却很少见。详见：Kenneth L. Sokoloff and David R. Dollar, "Agricultural Season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Early 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Contrast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7)。

② Victor S.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6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16), 446.

为主流，是因为个人或少数几个人无法提供部分商业活动所需的全部资本。在1810年以前，企业法人形式仅常见于银行、保险公司以及收费公路建设公司；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运河、铁路的开发建设也只是利用了各种资金来源：从小商人、相关专业人士，到千里之外的英国资本家。

最初出现在美国的法人企业公司并不具备当今企业一般来说具有的许多特征。许可证需经由立法机构的特殊法案颁发，股东的责任义务也尚无定论。法人企业相对于单一所有制与合伙制有着显著优势，而它在法律上又比股份公司有着更精确的界定。除了能吸引更多投资者这一明显的优势外，法人企业最显著的优越性在于其稳定性和灵活性。合伙制和个人独资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缺点：若某一合伙人或独资者去世，公司的运营也将随之结束。虽然该公司也能在另一合伙人或另一独资者的掌控下继续运营，但其运营的可持续性仍然是以特定个人的生命存续为前提的。而法人企业却可以通过投资者（无论大小）对其持有股份的转让，在投资者本身做出进出行业决策时不损伤企业的组织结构。

早期的法人企业并不具备如今其拥有的一些特定优势，如有限责任等。英国股份公司的股东就承担着“加倍责任”（double liability），即股东以其所持股份对公司负责，同时负有与持股值等量的投资额度责任，一些州还尝试颁发将企业指定为双重责任或无限责任的许可证。但在1830年后，很多州通过了企业有限责任的法令，到1860年，有限责任原则已被广泛接受。在此原则下，破产企业的股东可以只损失其投资额。

初期，银行、保险公司、运河和铁路的法人创立者必须通过州立法机构特许法案获得许可证，这（对相关投资者来说）其实并不总是一个障碍。对于那些拥有政治关系的人来说，其中的不确定性很小，且花销不大；同时，他们还有很大可能获得条款十分宽松的许可。但是那些在政治上不利的人，则有可能为了获得一份企业许可花费数年的游说仍徒劳无功。早在1800年，那些认为以特殊法案批准成立法人组织的原则并不民主的人，就开始推动通过关于创立法人组织的“普通法案”，以期使得任何群体都能获得许可，并使许可证颁发程序公开，且符合一定的要求及规范。另一些人，由于担心他们的当选代表不能逐一审核申请而使得法人企业扩张过于迅速而反对出台普通法案。1837年，康涅狄格州通过了《康涅狄格州注册公司普通法》（Connecticut General Incorporation Act），这是第一部将注册公司规定为任何人均可拥有的个人权利的普通法。

自此以后，许可普通法（permissive general acts）（允许，但不要求法人组织必须经过其许可的议定书）逐步被列入各主要工业制造州的成文法典中；而在1861年前，13个州的州宪法要求法人组织的注册成立必须遵从普通法律。而在那些法律比较宽松的州，直至1870年，法人创立者仍然通过获得特殊许可来组成公司，而以此方式，法人创立者能够获得比一般法律下更宽松的条款。[①]

① 1811年，纽约州通过一部法律，允许资本在10万美元以下的特定制造业法人企业的创立，无需其他特殊许可。

1860 年的主导产业

家庭生产的衰落和手工作坊、制造厂、工厂的兴起使得制造业的构架和选址有了巨大的改变。截至 1860 年，制造业劳动力约为 153 万（此时农业就业者为 588 万）。超过 96%的制造业劳动者集中在十大产业。在表 10—1 中，按照其工业增加值（价值以总产值减去原材料价格计算）排序列出了这十大产业。从 50 年前就发展起来的棉纺织业位列第一，木材业紧随其后。从雇员数量来看，鞋业（增加值第三位）是吸收劳动力的第一名，而男士制衣业（增加值第五位）与棉纺织业并列第二。若将钢铁业和机械制造业划入同一产业类别，则其增加值将稳居第一。1850—1860 年间，主要钢铁产品和机械制造品的产值翻番基本预言了美国工业的未来。

表 10—1　　1860 年美国制造业

项目	雇员数量（人）	原材料成本（美元）	总产出价值（美元）	制造增值（美元）	按增值排序
棉纺织业	114 955	52 666 701	107 337 783	54 671 082	1
木材业	75 595	51 358 400	104 928 342	53 569 942	2
鞋业	123 026	42 728 174	91 889 298	49 161 124	3
面粉业	27 682	208 497 309	248 580 365	40 083 056	4
男士制衣业	114 800	44 149 752	80 830 555	36 680 803	5
钢铁业（浇铸、锻造、轧制和锤炼）	48 975	37 486 056	73 175 332	35 689 276	6
机械制造业	41 223	19 444 533	52 010 376	32 565 843	7
毛纺织业	40 597	35 652 701	60 685 190	25 032 489	8
造车业	37 102	11 898 282	35 552 842	23 654 560	9
皮革业	22 679	44 520 737	67 306 452	22 785 715	10

资料来源：*Eigh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Manufactures*，*1860*.

这些工业主要集中于东北部地区：棉纺织业和鞋业主要位于新英格兰，木材业虽然在向西部和南部转移但在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各州仍然保持强势。表 10—2 中给出了关于工业分布的总结，其内容足以证明东部在制造业发展早期的

首要地位。因为统计中将最小的锯木厂和磨粉厂都划归为“制造业机构”（manufacturing establishments），从而西部和南部的高数值是具有误导性的。无论采用何种标准，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各州都是当时制造业的主要地区。而中西部的数据也部分地展示了美国南北战争前俄亥俄流域的工业快速增长以及芝加哥地区的工业萌芽。

表 10—2　　1860 年制造业，按地区统计

地区	公司数量（家）	投资额（美元）	雇用人数		产品年价值（美元）	制造增值（美元）
			男工	女工		
新英格兰	20 671	257 477 783	262 834	129 002	468 599 287	223 076 180
中大西洋地区	53 287	435 061 964	432 424	113 819	802 338 392	358 211 423
中西部地区	36 785	194 212 543	194 081	15 828	384 606 530	158 987 717
南部	20 631	95 975 185	98 583	12 138	155 531 281	68 988 129
西部	8 777	23 380 334	50 137	67	71 229 989	42 746 363
（未正式成为州的）地区	20 282	3 747 906	2 290	43	3 556 197	2 246 772
总计	140 433	1 009 855 715	1 040 349	270 897	1 885 861 676	854 256 584

资料来源：*Eigh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Manufactures*，*1860*.

从 1810 年到 1860 年期间，制造业产值从约 2 亿美元增至接近 20 亿美元，增长了近 10 倍。农业作为提供民生经济的支柱产业仍然位列第一：1860 年制造业的工业增加值总和也远不及美国三大主要作物——玉米、小麦和草料，而工业资本投入加总还不及农耕地和建筑的价值的 1/6。然而如前所述，美国在制造业上仅次于英国。[①] 不久，美国就成为世界工业、农业的领头羊。那么，美国是如何取得这不同寻常的成就的呢？

工厂生产的先决条件

高速、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要求有机器和技术的引进、项目产品的标准化、生产连续流程的组装生产线以及新的动力能源。上述方面的进步推动了工厂对于家庭手工业、外包制以及手工作坊的替代，并成为一个革命性的进程，这就是后来

① 《美国第十二次经济统计报告》（*Twelfth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引自 Mulhall 的《工业和国家财富》（*Industries and Wealth of Nations*），将美国排在第四位，居于英国、法国和德国之后。但道格拉斯·C·诺斯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美国应位居第二，详见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1790 to 1860*（Englewood Cliffs，N. J.：Prentice Hall，1961），v。

所说的工业革命。

机器与技术

一直到1845年以后，上述那些老旧的生产方法已经过时这一事实才变得日渐明了。然而19世纪50年代“工厂制度”发展进步之迅速，连当时最漫不经心的观察者都不可能不被震撼。

18世纪晚期起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并非是美国工厂制度快速兴起的保证。事实上，英国一直致力于防止新发明的各种细节在国外传播。英国议会分别于1774年和1781年颁布法律禁止新工业机械的出口，这与在冷战时期禁止向苏联出口高科技产品并无不同。1782年，英国还颁布法律以禁止劳动力外流，即禁止拥有高级技术的英国技工被引至外国。虽然这些做法延缓了美国引入新机械与新技术的步伐，但技术转移始终存在。举例来说，拿破仑战争前夕，斯科菲尔德兄弟从约克郡出发抵达新英格兰，并在那里建造了水动力羊毛梳理机械。而在他们之前，正如前面所介绍的，塞缪尔·斯莱特已于1789年抵达美国，并与来自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摩西·布朗以及威廉·阿尔米合作建成了美国水力纺织厂。在其后的十年间，新英格兰有十几个以此为原型的小型制造厂建成并投入使用。

由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相对较高，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国的经营者们更倾向于使用机器，这些机器具备某一特定的功能，而且基本是全自动的。更重要的是，他们成功地创新出了一种组织生产的方法，这一方法可以节省每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他们的主要贡献是提出了可互换的零部件和持续的制造过程两个基本的想法，而这两个想法创造出了19世纪美国制造业的辉煌。这两项进步都与机器工具的发展和应用动力技术的变革有关。

标准化的可互换零部件

将一件产品及其各种零部件标准化的想法最早源于18世纪早期的瑞典，在1800年之前，法国、瑞士和英国都有所尝试。在标准化之后，一件产品上的零部件就可以换到另一件类似产品上使用，同时便利了制造和修理的过程。首次将这一想法长久地成功应用是在美国的军火工业。在19世纪初的时候，伊莱·惠特尼和西米恩·诺斯几乎同时利用了可互换零部件的方法，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制造枪支的合同。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于将首次成功利用可互换零部件进行的制造归功于惠特尼，但并没有证据证实这一说法。记录显示，早在1807年，诺斯在制造手枪时就已经应用了“划一原则”（uniformity principle）。而将这一想法以可推广的方式首次应用的人则可能是约翰·H·霍尔，他是哈珀渡轮兵工厂（Harper's Ferry Armory）的投资人和工程师，直到1817年，他一直在创立一个

使用金属切割和木工机床的系统。[①] 在任何情况下，军火工业的重要创新需耗时两年以上。而船长霍尔的模式则大大减少了为不对称步枪枪托定型的时间。1827年前后成功引进了使用模具的模锻法。在塞缪尔·科尔特发明六发式左轮手枪的几年后，到1855年，他建立了一家军工厂，工厂里面高精度的机械加工工作都由熟练的操作员完成。大约从19世纪中期开始，最终的精密工具便不再是手锉了。

连续流程和流水线

虽然磨面粉的过程并不需要进行装配作业，但是连续流程的制造方法却是在磨坊中首次得到应用，在以这种方法进行生产时，原材料持续不断地在厂房内输送。最早成功应用的人中有一位名为奥利弗·埃文斯的美国发明家。1782年他在费城开办了一家面粉厂，整个生产过程中谷物的运送全部利用重力、摩擦力和水力等，中间无需人工插手，工人只负责引导和监督。今天最重要的连续过程制造的形式是由马达驱动的流水线，很像当年亨利·福特为了生产汽车而发明的流水线；这种形式则是可互换零部件在武器、钟表、缝纫机以及农具的生产过程中成功应用后自然发展的结果。19世纪50年代，农具公司事实上使用了传送带来依次装配主要配件，并为20世纪初产生的众多生产技术埋下了伏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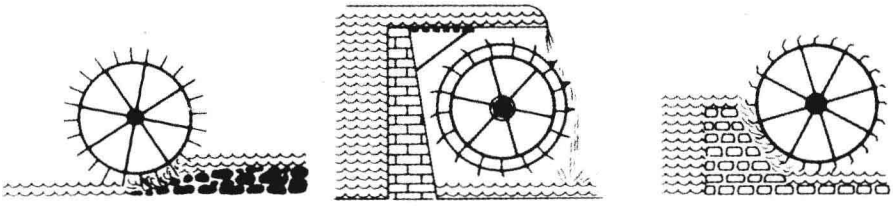
动力和能源

在美国制造业的早期，大部分动力是由水车提供。水量丰富且水流稳定的河流保证了这一动力的可靠来源，而且水车的技术改进又进一步保证了稳定的水能。

水车通常都放置在水平轴的垂直位置，并依靠水流的直接作用以较低的速度运转。根据水流驱动水车转动方向的不同，可将水车进行分类(见图10—1)。在殖民时代以及其后一段时间内的边疆地区，使用的水车类型是下冲式水车；这种水车被放置在河流中，这样水流从水车下方流动并推动水车转动。下冲式水车虽然便于安装，但是效率较低，只能传递作用于水车上的水能的40%。上射式水车的外圈装有存储桶，河水从水车轮的上方流入存储桶中，存储桶的重力使得水车顺着水流流向转动。这种水车的效率更高，安装也比较便利，凡是水位落差较大的地方使用效果都令人满意，但是它所提供的能量还不足以满足重工业的需求。所以大型的制造企业几乎都一致使用腰部进水水轮。这一类型的水车也装备有存储桶，但水流冲击水车时低于其轮轴，所以水车的转动方向与河流流向相反；这样水流的推动力加上存储桶中水的重力，使得此种水车可以输出作用于水

① 参见 Robert S. Woodbury, "The Legend of Eli Whitney and Interchangeable Part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2 (1), (1960): 235-253。在伍德伯里看来，可互换零部件的制造包括四个要素：(1) 精密机床；(2) 精密量规或其他测量工具；(3) 统一的测量标准；(4) 机械制图技术。

车上水能的75%之多。19世纪早期，由多件组装到一起的中射水车为当时最大的工业企业提供了足够的马力。例如梅里马克制造公司的机器的运转需要8台中射水车，每台直径为30英尺，存储桶则有12英尺长。



（a）直刃下冲式水车　（b）上射式水车　（c）弯刃下冲式水车（中射水车）

图10—1　水车设计

图中是水车的三种主要的工程设计，它们都为早期的纺织和木工业提供动力。

这些运转缓慢且笨重的水车能够提供好几千马力，但它们也有很明显的缺陷。水车提供的能量由木制的轴和齿轮传递，而且与整个机械装置的强度有关。此外，工厂的选址受限于河流周围，于是工厂的选址问题（特别是在工业区）成为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将水车和能量输送部分由木制改为金属可以部分解决第一个困难；改善大坝和运河的设计则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在立轴上方旋转的水力涡轮机比水车效率更高，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大大增加了国家的动力潜能。

最后出现的是蒸汽动力，尽管由于受几个原因的影响，它在美国制造业中的应用比较缓慢。起初蒸汽引擎的运作成本非常高，经常出故障，而且专业维修技术十分欠缺。在交通运输中，蒸汽引擎能够以一定的加速度拖动非常重的装载量，这一优点就足以抵消其缺陷；但是在工业生产中，在很长时间内水能动力的价格都低于蒸汽动力。据估计，1812年，只有11台由奥利弗·埃文斯研制的高压型引擎仍在这个国家使用。①

在随后的20年中，蒸汽引擎在南部和西部更加普及，但大多数是用于制铁业和玻璃业等对能源有其他需求的行业里，或是用于不便于建在水边的制造厂中。1840年左右，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地区各州的制造工厂估计显示，蒸汽动力每马力的年均成本是水力的5～6倍。在之后的20年内，金属加工技术的改良降低了蒸汽引擎的成本，并同时提高了机器的效率和可靠性。到19世纪50年代，在利用热能的行业中以及水流不稳定的地区（俄亥俄河沿岸流域），蒸汽引擎逐渐取代水车。到19世纪50年代，在新英格兰，由于合格的能源站严重缺乏，纺织厂都安装蒸汽引擎来提供能源。从1860年起，虽然水能还是主要的能源，但水车剩余的使用年月已经屈指可数了。

在蒸汽动力地位上升的同时，煤的使用则出现了滞后，虽然煤最终成为能源的主要新来源。因为即使美国木材以及木炭很便宜，但相比之下，美国煤的使用量的增速仍慢于其在英国的推广速度。煤和水一样，对工厂的选址有较大影响。

①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60*, 409.

© H. ARMSTRONG ROBERTS

这是比较典型的上射式水车。1860 年国家的官方统计显示 20 000 家锯木厂和 14 000 家面粉厂使用该类型的水车。

在具备便利的交通条件之后，煤动力越来越推动在城市中心设厂。1830 年后，由煤驱动的工厂逐渐成为美国制造业向上发展的一个特点。

工厂比例和技术的借鉴与改进

英国在机器制造方面的领先造就了英国人在制造业上的极大优势。他们的机器通常具有具体的技术形式，能够反映本国劳动力、资本和原材料等成本的相对价格。这些投入的相对成本不同于美国，在 19 世纪，美国人的劳动力和资本短缺，但拥有丰富的原材料和自然动力能源（例如水）。美国的企业家们不仅要仿造英国的机器，还要改装它以节约劳动力，而这可能会以牺牲原料的使用为代价。他们成功的一个例子就体现在各国纺织业的比较中。与美国的 7 000 枚纱锭和 163 台织布机相比，英国纺织企业平均有 17 000 枚纱锭和 276 台织布机。罗伯特·泽文对纺织品的研究表明美国的棉纺织业在纱锭上只有英国的 20%，在工

人数量上只有英国的25%，但是却能加工英国棉花数量的40%。很明显，美国人已经成功地改造他们的设备以节省稀缺的劳动力和资本。

拉斯·桑德伯格和之后威廉·拉佐尼克的关于技术选择及其应用的著作表明在大西洋两岸并不存在统一的技术。在纺织业方面，英国人不断增加劳动力密集度并降低其原材料投入质量。美国人则通过升级机器以及采用更高级的原棉或原毛材料来节省劳动力。因为美国工人不像英国工人那样成立工会，且具有更高的灵活机动性，所以美国经营者更容易用新的机器替代来减少对劳动力的依赖和劳动成本。克劳迪亚·戈尔丁和肯尼思·索科洛夫则提出了另一个因素：早期生产制造主要依赖妇女和小孩作为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是低廉的，正如在新英格兰，那里农业生产提供的是较为贫穷的生活，妇女和小孩相对更有可能为工厂提供劳动力。这就促使制造业在那儿选址，并且提供了能接纳技术进步的劳动力。戈尔丁和索科洛夫提出的这些观点已经通过了李·克雷格和伊丽莎白·菲尔德-亨德利的细察和检验，并得到了支持。①

在纺织、军火、钟表及许多其他项目上，标准化、可替换零部件以及流水线生产作业中劳动力分工的理念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1851年，在伦敦的万国工业博览会（从某种意义来说相当于今天的世界博览会）上美国产品获得了主要的关注。虽然设计简单，既不精美也不持久耐用，但它们实用性强、便宜而且功能强大。毕竟，它们反映出了一些特点，而这恰是一个由大量农民、拓荒者以及往往谦虚又实际的工人所要求的。回顾经济推理命题1。1855年，英国一个议会委员会前往美国参观以查明后来为人所知的“美国制度”的秘密。他们惊讶地发现，美国机器在技术上比英国的机器要精密得多。“美国人的智慧”已经成为世界的奇迹。

但仍然存在一个悖论。在美国，资本相对稀缺——与英国相比，其利率是很高的。那么，为何是美国人而不是英国人发明了设计独特的机器？答案是美国的熟练劳动力更加稀缺。这会促使美国人在那些需要熟练工人的产业中（如军火）用资本和自然资源（如水力）去替代熟练工人。而在那些需要较少熟练工人的产业中，美国的人均资本量却比同类英国产业更少。

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

刚讨论过的促进生产率提高的各种不同源泉所产生的综合作用，是显著地提高了美国东北部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表10—3给出了不同类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年增长率的估计数据。这些是其增长的百分比的变化范围，并按照资源密集

① See Lee A. Craig and Elizabeth B. Field-Hendr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arnings Gap: Regional and Sectoral Tests of the Goldin-Sokoloff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0 (1993): 60 - 80.

型产业和通常规模较小的非资源密集型产业分为两类。

表 10—3　　1820—1860 年东北部地区特定制造行业中，平均每位工人工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

资本密集型行业	劳动生产率变动（%）
棉纺织行业	2.2～3.3
钢铁业	1.5～1.7
酒业	1.7～1.9
面粉/磨粉业	0.6～0.7
纸业	4.3～5.5
制革业	1.2～1.7
毛纺织业	2.7～2.8
其他行业	
鞋业	2.0～2.1
马车业	2.0～2.4
家具/木工业	2.9～3.0
玻璃业	2.5
帽业	2.4～2.5
烟草业	0.1～2.4

资料来源：Kenneth L. Sokoloff, "Productivity Growth in Manufacturing during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1860," in *Long-Term Factors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d.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698.

这两类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进步的可比比率强烈表明，资本深化并不是提高人均产出的先决条件，就是在一些特定产业里，比率也不是特别高。大范围的制造工业展现出了高生产率，甚至包括作坊、制造厂及那些依靠有限的机械化和原始动力源的小公司也是如此。这加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经济增长是整个经济中许多渐进式发展的累积效应，这就类似于我们在第 9 章对汽船航运中的生产力进步分析中所观察到的模式。

防止外国竞争

在 1815 年和平到来后，从美国商业的角度来看，英国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在 1815 年以前，对国外商品征收关税，虽然原本旨在保护，但设定的税率却是无计划的马虎方式（in a hit-or-miss fashion）以最大化

政府收入为目的的。东北部日益增长的贸易保护主义观点得到了从西部到南部足够的支持，这保证了1816年《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16）的通过。

1816年关税对大部分工业制成品从价计征20%～25%，对原材料征税15%～20%。一般来说，虽然廉价棉花因从量税（即每码收多少税）而被国内市场拒之门外，但是工业制成品的关税水平却无法阻止当时大部分产品的进入。此外，对原料特别是原毛的税收，降低了使用原毛作为投入的国内产业的发展潜力。

从1816年直至1832年，贸易保护主义潮流高涨；美国的棉花、羊毛、玻璃、铁制品的生产商获得了最大的好处，连同原毛和麻的生产商也分得了一杯羹。图10—2描绘了以税率（亦即按应纳税进口产品价值的百分比征收的关税）衡量的美国关税历史。它显示了1828年《关税法案》（Tariff Act of 1828）实现的创纪录的高关税，而一直到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才再次出现与之相当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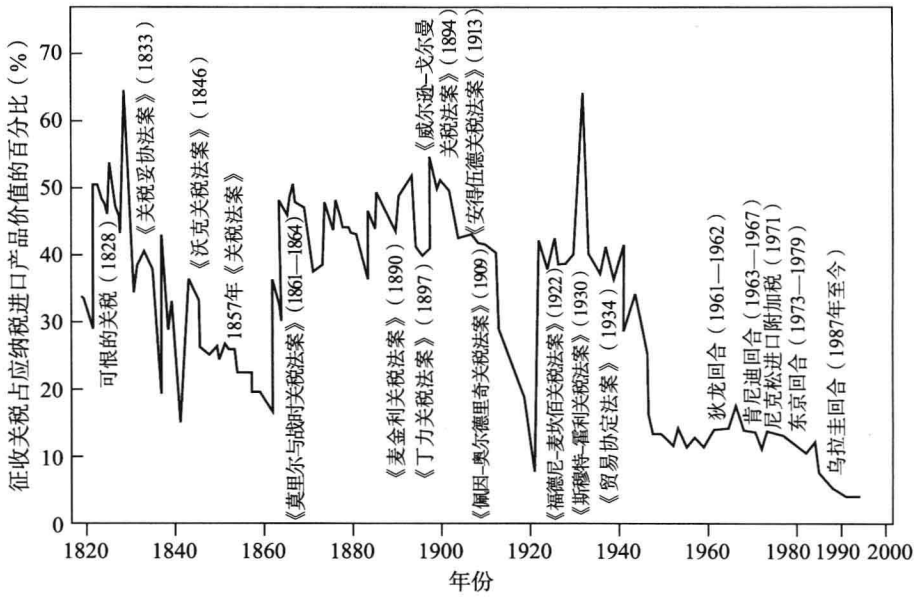


图10—2　1820年以来美国关税率

美国的关税率一直忽上忽下，这说明在国会关税是一个政治难题。进口竞争行业偏好高关税。我们曾有过的最高关税是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关税以及1828年的“可恨的关税”。

一般而言，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偏好高关税，南部各州却并非如此。政治把戏导致了1828年的高关税，亦即“可恨的关税”，这促成了南方的焦虑并在短短几年内迫使其达成妥协。事实上，南方对联邦的严峻威胁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令废止权条例》（Nullification Ordinance），而该条例甚至是在1832年提出下调进口关税后被立法的。1833年《关税妥协法案》（Compromise Tariff of 1833）规定十年内所有的关税都将被降至从价计征最高20%的水平。

但在1842年关税达到20%的最高水平后仅仅两个月，刚刚控制白宫的辉

格党便通过了一个法案，将关税税率恢复到了10年前的保护性水平；而总统约翰·泰勒尽管身为南方人也接受了这一法案，因为他认为此举能够为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随着1845年民主党重新掌权，较为缓和的关税制度被迅速确立；1846年《沃克关税法案》（Walker Tariff of 1846）则树立了一个榜样并一直沿用至18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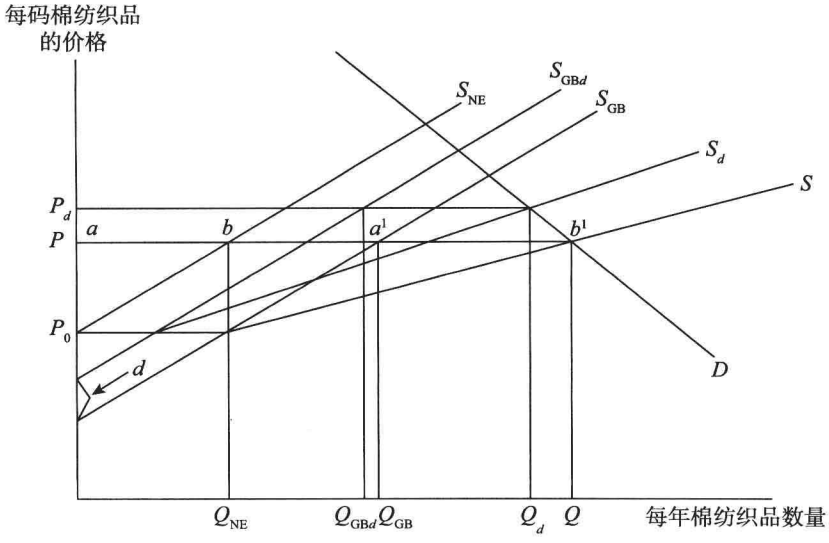
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时期和随之而来的进口增长增加了关税收入，从而使政府获得了极大的财政盈余。在美国财政部里越积越多的资金，导致了税率的普遍下降，且很多商品被列入免税名单。就在南北战争前，美国看起来可能作为一个自由贸易国加入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正如图10—2所示，1860年关税平均低于应纳税进口货物价值的20%（所有进口货物价值的15%），而该水平只有适度保护的意义。

经济透视 10.1

关税的影响范围

正如南卡罗来纳州针对“可恨的关税”（1828）做出的反应——《联邦法令废止权条例》所表明的，南部对高关税并没有热情。它与高关税作斗争，正如东北部和中大西洋地区各州争取高关税一样，都考虑到明显的经济收益。

下图说明了关税（d）对国外棉纺织品的影响。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水平加总新英格兰（S_{NE}）和英国（S_{GB}）的供给从而获得总供给曲线（S）。在价格水平P上，新英格兰提供的量为Q_{NE}，等同于ab段长度；英国提供的量为Q_{GB}，等同于aa^1段的长度；总供给此时为Q，是Q_{NE}和Q_{GB}之和。在图中，a^1b^1与ba^1相等，故Q等于ab^1段长度。现在，加入需求曲线（D），其中S和D两线相交，并于价格P和产量Q处达到均衡。



为了理解关税 d 对英国棉纺织品的影响，我们把它加到 S_{GB} 上，从而得到一个新的更高成本的含税的供给曲线 S_{GBd}。对于英国厂商而言，税收相当于进入美国市场的附加成本。结果产生一条新的生产计划曲线 S_d，由原来的 S 曲线以税收量 d 的份额平行上移。新的均衡是在价格水平 P_d 和产量 Q_d，政府收到 $Q_{GBd} \times d$ 的税收。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个变化后的均衡与历史问题相联系。

关税是部分由消费者支付的应纳税进口货物上的一种税收。关税提高了所有商品的价格（P 到 P_d），无论是否是进口的；而因为应纳税商品是大规模进口工业品，例如纺织品，当关税上升的时候，消费者需要为这些产品支付更多，从而降低了购买这些纳税商品的消费者的实际收入。但是，东北部的制造商获得了市场份额和利润。（通过观察在价格线 P_d 上新英格兰和英国提供的税后产品量可以发现这一点。）消费者的损失大于制造商的收益，但是厂商有更好的组织性，并且能够影响立法者。

高关税以另一种方式给南部地区带来损失。当美国进口更少时，它放在外国人手中的美元就更少了。例如，英国人从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中获得越来越少的美元，他们用于购买美国的出口产品的外汇就更少了。而美国的主导出口产品是什么？出口给谁？棉花，出口给英国。

给新英格兰送来更多的棉花只是部分抵消了运往英国方面的损失。更高价格的棉纺织品意味着更低的需求量（Q_d 而非 Q），这反过来也就意味着对原棉材料的更低需求。南部种植园丢掉外国消费者的速度快于它们获得国内消费者的速度。

我们可以看到关税把货币转移到那些受保护的产业，帮助了那里的资本所有者和雇佣工人。而它从消费者和外国生产商手中拿走货币。政府从上缴的税收中获利。简而言之，关税从一个群体中拿走钱，然后把它给予另一群体。就像约翰·詹姆斯（1978）所说，战前的高关税重新分配了财富和资源，从南部转向东部工业，而这种转移正是南部人所痛恨的。从南部的角度看，贸易条件恶化了；他们的出口品的价格下降了，而进口品的价格却上升了。

关税因其政治声望而值得注意。例如，一些政治家为了使美国工人免于沦为“廉价”外国劳动力而鼓吹关税，但是这并不是支持美国关税的最初论据。关税的政治经济含义首先在 1789 年的《第一关税法案》（the first Tariff Act）中初次得以表述：

鉴于支持政府的必要性，为了卸下美国债务和鼓励制造业，对进口的商品、货物征税。

所以关税的最初目的很明确：为了产生政府收益，为了保护新兴的美国工业。起初，关税成功增加了政府金库的税收。1790 年，联邦总收入的 99.9%是来源于关税；1860 年，也仍然有 94%的比重。（今天，其比重还不到 1%，相应的，我们从未或者很少听到有关于此的争论。）那么关于其他目的呢？保护新兴产业？这方面的成功显得可疑。

当和平在 1815 年到来时，随着战争引起的免于国际竞争的保护结束，低品质的英国纺织品如洪水般涌入美国市场。1816 年，弗朗西斯·洛威尔向国会要

求对这些与其工厂产品竞争的低品质纺织品征税。这些在罗得岛州的新兴工厂生产的高级棉布没有得到任何保护。简而言之，洛威尔工厂获益了，但是罗得岛新兴产业却没有。获得的保护主要是政治问题。谁首先会为受关税保护的低级布料支付更高的价格？是南部在支付，因为这些低品质纺织品主要是用于奴隶的纺织品。

那么，后来更高的关税是制造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吗？我们注意到在1830年，当废止权的争论激烈进行时，应纳税项目的关税率超过了60%。到1860年，关税率已低于20%。总之，制造业发展迅速的30年（虽然19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更快于40年代），关税保护是一直在下降的。但是关税似乎对美国棉纺织业具有重要意义。根据马克·比尔斯、彼得·特明和尼克·哈利的独立研究，失去了高关税保护，美国的大部分棉花制造商将不敢与英国制造商正面竞争。①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mes, Edward, and Nathan Rosenberg. "Changing Technological Leadership and Industrial Growth." *Economic Journal* 13 (1963).

Atack, Jeremy. "Returns to Scale in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Manufactur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337 - 359.

——. "Fact or Fiction? The Relative Costs of Steam and Water Power: A Simulative Approac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6 (1979): 409 - 437.

Atack, Jeremy,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 "The Regional Diffusion and Adoption of the Steam Engin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June 1980).

Bateman, Fred, and Thomas Weiss. "Comparat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Antebellum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Bateman, Fred, James Foust, and Thomas Weiss. "Profitability in Southern Manufacturing: Estimates for 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1975): 211 - 232.

Bils, Mark. "Tariff Protec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U. 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033 - 1045.

Brito, D. L.,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Skilled Labor and Nineteenth Century Anglo-American Managerial Behavio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① See Mark Bils, "Tariff Protection and Production in the Early U. S.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033—1045; Peter Temin, "Product Qu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891 - 907; and C. Knick Harley,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559 - 584.

(1973): 235 - 252.

Broadberry, S. N. "Manufacturing and the Convergence Hypothesis: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December 1993): 772 - 788.

Chandler, Alfred D. "Anthracite Coal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72): 141 - 181.

Clark, Victor S.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860*.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9.

Cochran, Thomas. *Frontiers of Change: Early Industrialism in Ame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Relating to the Steam Engine." http://www.history.rochester.edu/steam/.

Craig, Lee A., and Elizabeth B. Field-Hendr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arnings Gap: Regional and Sectoral Tests of the Goldin-Sokoloff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0 (1993): 60 - 80.

David, Paul. "Learning by Doing and Tariff Protection: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ase of the Antebellum United States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0): 521 - 601.

——. "The Horndal Effect in Lowell, 1834—1856: A Short-Run Learning Curve for Integrated Cotton Textile Mill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1973): 131 - 150.

Davis, Lance E. "Sources of Industrial Finance: The American Textile Industry, A Case Stud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0 (4), 1st series (1957).

——. "The New England Textile Mills and the Capital Markets: A Study of Industrial Borrowing, 184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1960): 1 - 30.

Engerman, Stanley L., and Kenneth Sokoloff.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ization, 1790—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7 - 401.

Field, Alexander James. "Sectoral Shift in Antebellum Massachusetts: A Reconside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146 - 171.

Fogel, Robert. "The Spec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September 1967).

Goldin, Claudia, and Kenneth Sokoloff.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December 1982).

——. "The Relative Productivity Hypothesi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Case, 1820 to 185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9 (August 1984).

Habakkuk, H. J.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Search for Labor Saving Inven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lsey, Harlan I. "The Choice between High Pressure and Low Pressure Steam Power in America in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1981): 723 - 744.

Harley, C. Knick.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of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559 - 584.

Hounshell, D. *From the American System to Mass Production*.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Hughes, Jonathan.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James, John. "The Welfare Effects of the Ante-Bellum Tariff: A General Equilibrium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231 - 256.

Lazonick, William H. "Production Relations, Labor Productivity, and Choice of Technique: British and U. S. Cotton Spinn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491 - 516.

Lindstrom, Dian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Philadelphia Region, 1810—18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

Livesay, Harold. "Marketing Patterns in the Antebellum American Iron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1971): 269 - 295.

Livesay, Harold, and Glen Porter. "The Financial Role of Merch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 S. Manufacturing, 1815—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1): 63 - 88.

North, Douglass 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1.

Passell, Peter, and Marie Schmundt. "The Financial Role of Mercha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U. S. Manufacturing, 1815—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1): 35 - 48.

Pope, Clayne. "The Impact of the Antebellum Tariff on Income Distrib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375 - 422.

Rosenberg, Nathan. "Factors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of Technolog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1972): 3 - 34.

——.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okoloff, Kenneth L. "Inventive Activity in Early Industrial America: Evidence from Patent Records, 1790—184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813 - 850.

Sokoloff, Kenneth L., and David R. Dollar.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rtisanal Shop to the Nonmechanized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Gains i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U. S. Manufactures Censuses of 1820 and 1850." *Explora-*

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351 - 382.

——. "Agricultural Seasonality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 Early Industrial Societies: The Contrast betwee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997).

Temin, Peter. "Steam and Water Power in the Early 19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1966): 187 - 205. Reprinted in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ed.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Product Quality and Vertical Integration in the Early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891 - 907.

Terrill, Tom E. "Eager Hands: Labor for Southern Textiles, 185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84 - 99.

Uselding, Paul. "Factor Substitution and Labor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1839—189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670 - 681.

Uselding, Paul, and W. Douglas Morgan. "Technical Progress at the Springfield Armo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269 - 290.

Williamson, Jeffrey. "Urbanization in the American Northe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5 (1965): 592 - 608.

Williamson, Jeffrey, and Joseph Swanson.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1870."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4, 2d series, (Supplement) (1966).

Zevin, Robert B. "The Growth of Cotton Textile Production after 1815."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The Growth of Manufacturing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New England*. New York: Arno, 1975.

第 11 章　早期工业时代的劳动力

本章主题

在 1860 年以前，大多数美国居民都还住在农村地区，且大多数工人都是在农场和工匠作坊里自己经营的。然而，在 1812 年战争之后，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是在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改变了许多以劳动为生的美国人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水平。1820—1860 年间，实际工资（根据生活成本调整后的货币工资）上升；而由于外来移民增加了非熟练工人的供应，非熟练工人的收入相比于熟练工人也在下降；且随着越来越多的工人由自雇转变为为雇主工作，工作环境也变得不如以前那么个人化。这一时期，美国开始出现第一次劳工运动，投票权在西方世界广泛传播。这些转变都是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提高和工业化的发展与扩张而出现的。

劳动力和人口的增长

在 19 世纪的前 50 年里，美国的人口增长十分迅速。1800 年，美国人口有 5 308 000 人；而到 1860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31 443 000 人，达到了每年约 3%的增长率，远高于当时其他各国。人口的快速增长来源于两个方面——自然增长率上升和移民率居高不下。

共和国早期的家庭普遍比较庞大。尽管证据不够完整，也能表明1800年时女人们的平均结婚年龄很小，一般在20岁以前，并会生下7个左右的孩子。也很少有男人或者女人保持单身。然而19世纪的前50年里，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成为常态以前很久，农村地区便已经开始出现生育力下降的趋势。经济史学家们曾提供了一些假说来解释这一相当令人费解的生育力下降现象。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之一安场保吉（Yasukichi Yasuba）提出了“土地的可获性”（land availability）假说。他认为：随着人口和土地价格上升，农民赋予其子女一份田产的成本也上升，因此双亲会选择拥有更小的家庭，从而为他们的孩子保证一个物质优裕的生活。威廉·A·森德斯特罗姆和保罗·A·戴维曾描述了一个有趣的变化。农村地区非农就业人口的增长迫使农民让其子女“待在农场上”（down on the farm）从而为其提供更多的经济机会。马里斯·A·维诺维斯基斯（Maris A. Vinovskis）则指出更多的传统因素，如城市化、工业化和文化水平，也同样发挥了作用。

在共和国早期死亡率也很高，1岁以下白人婴儿的死亡率达到了近20%的水平。虽然存在生育力下降和高死亡率，但由于出生率也十分高，自然因素引发的人口增长仍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势头。

尽管在总人口的快速增长中，高出生率占据了主导地位，但移民也同样有显著影响，尤其是在劳动力市场上，因为流入的移民中有大量的工作年龄的非熟练男工。图11—1很好地描述了这一点，它显示了来到美国的工人数量。而这一阶段末期移民的大量增加是由欧洲的各类事件引起的——爱尔兰的马铃薯荒（同样也影响了欧洲大陆，尽管程度较轻），以及欧洲的政治动荡。从1820年到1825年，移民仅占美国总人口增长的3%，而从1845年到1860年，它占了25%～31%的比例。之后我们将会讨论快速的移民带来的不同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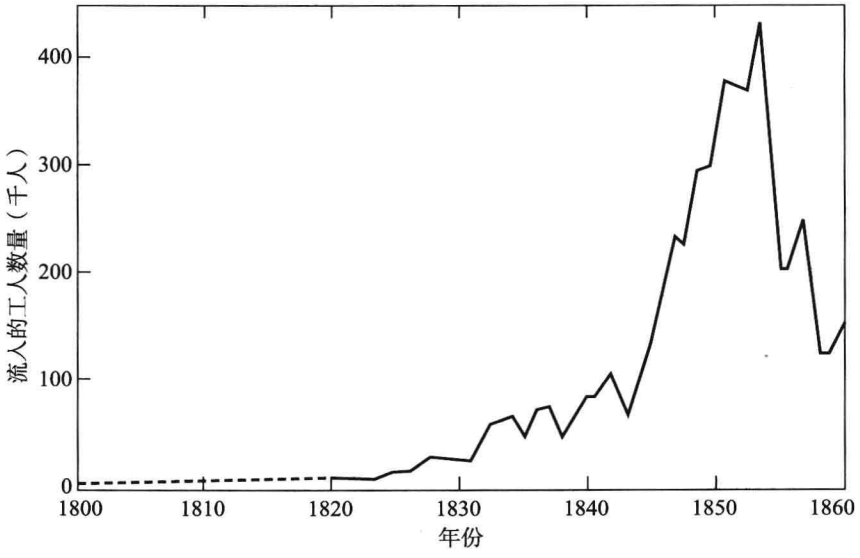


图11—1　1800—1860年移民带来的美国劳动力的增加

1845年以后，劳动力以庞大的数量涌入这个土地资源丰富且资本存量快速增长的国家。

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分布和构成

表 11—1 显示了整个时期农业都持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也显示了在 1810 年和 1860 年劳动力分配是如何的不同。采矿业实现了最大规模的飞跃，很大程度是由于加利福尼亚淘金热，但更重要的是制造业工人数量高达 20 倍的增长。在南北战争前夕，制造业有 150 万个工人，且大多数都集中在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就绝对数字而言，农业劳动者增加得最多，但相对增长最快的是制造业工人。经济结构正从一个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转变，而这恰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正常模式。

表 11—1　　1810—1860 年劳动力分布（千人）

年份	总计	农业	渔业	矿业	建筑业	制造业	运输业	商业	服务业
1810	2 330	1 950	6	11	—	—	60	—	82
1820	3 135	2 470	14	13	—	—	50	—	130
1830	4 200	2 965	15	22	—	—	70	—	190
1840	5 660	3 570	24	32	290	500	112	350	285
1850	8 250	4 520	30	102	410	1 200	155	530	430
1860	11 110	5 880	31	176	520	1 530	225	890	715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tanley Lebergott,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510.

工厂和工人

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城市中心的发展，以及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产品得以在更大规模且更具综合性的市场上销售。另外，正如表 11—2 所示，公司规模也在扩大，这反映在每家公司的雇员数量上。例如，1820—1850 年间，棉纺织业平均每家公司的工人数量是毛纺织业的近三倍，是帽业的两倍以上。在以牺牲产品工艺为代价换取更高产量的极大压力下，小型手工作坊也日渐让位于工厂。公司规模的扩大十分明显，不仅在已实现机械化或者说正在实现机械化的产业（棉毛纺织）方面，而且在如帽业、图书业和鞋业等非机械化产业方面。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生产单位规模扩大的趋势。而另一个关键性转变则是劳动力分工的加强，它减少了一般技能工人的比例和作用。在细心监督下以标准化产品为目标的一个更紧张的工作环境，是质量控制的早期形式。B. E. 哈泽德曾在其研究中描述过在非机械化作坊里的这类转变：

基甸·霍华德(Gideon Howard)，一个在马萨诸塞州南兰道夫(South Randolph)的鞋商；他拥有一“群”员工，在他12英尺长的作坊里量尺寸、做鞋和抛光：一个做鞋楦、一个钉缝鞋底、一个做前边缘、一个上鞋跟并“修平”，且在手工缝制鞋的情况下，还需要两三台缝纫机，以保持群里的其他人一直忙碌……由于更高的标准和对产出速度的要求，市场对专业化提出需求，从而在这个12英尺长的作坊里，这个群体中的人们也开始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并非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成为受过正规培训的鞋匠，也许只有一人，而且他还是老板的承包商（contractor），也就是按照特定数量和交货日期去完成从中心店带出的大量合同的人，雇用那些“习得”某一个程序知识的制鞋工人，并在自己的监督下安排他们的工作。在这个团队中，包括一个做鞋楦的人，一个钉鞋底的人，一个边缘制作者，以及一个磨光者。有时候，随着业务扩大和增长，每个程序的操作员人数都要加倍。这些工作废除了古老的七年学徒制度。①

表11—2　1820年和1850年东北部地区制造业平均每家公司雇员数量

	1820年		1850年		
	每家公司雇员数	观察到的公司数量	每家公司雇员数	观察到的公司数量	1850年公司规模与1830年公司规模的比例
鞋业	19.1	15	33.6	72	1.76
棉纺织业	34.6	92	97.5	5 856	2.82
面粉和谷物加工	2.4	90	1.8	5 128	0.75
玻璃行业	56.9	8	64.6	76	1.14
帽业	8.4	32	17.0	812	2.02
铁及铁制品行业	19.5	73	24.2	1 562	1.24
酒业	2.7	165	5.0	633	1.85
纸业	14.3	33	22.4	12	1.57
制革业	3.8	126	4.2	3 233	1.11
毛纺织及混合纺织业	10.6	107	24.5	1 284	2.31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the 1820 and 1850 Gensus of Manufactures, as provided in Kenneth L. Sokoloff,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rtisanal Shop to the Nonmechanized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Gains i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U. S. Manufactures Censuses of 1820 and 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354.

① From Kenneth L. Sokoloff,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Artisanal Shop to the Nonmechanized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Gains i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U. S. Manufactures Censuses of 1820 and 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357.

还有一个向大型企业——至少是最初的大多数制造企业——的关键性转变是由妇女和儿童组成的这部分劳动力比例的扩大。一般来说，大型企业中具有很大数量的简单而相对界定分明的工作。许多企业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雇用到非熟练但有能力的工人。在新英格兰，这些工人一般是妇女，尤其是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的大移民潮到来前更是如此。

罗得岛制度和沃尔瑟姆制度

纺织行业里的作坊和工厂的所有者，一般通过两种方法之一来解决他们的雇工问题。一种是罗得岛制度（Rhode Island system），即雇用家庭全体成员，分配给父亲、母亲和孩子与其体力和能力相当的任务，并让他们一家一户地住在公司建造的公寓里。在波士顿南部，几乎全是采用罗得岛制度，一部分是由于在对英国法（English method）的模仿中童工最早是在那里推行；也部分是因为这一地区典型的走锭纺纱（mule spinning），重型和轻型工作都需要。第二种方法被称为沃尔瑟姆制度（Waltham system），由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威尔（Francis Cabot Lowell）和波士顿协会（Boston Associates）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推行。它雇用20岁左右的女子在大工厂里做工。姑娘们住在集体宿舍或寄宿舍里，受到女舍监的严格看管，以免这些年轻姑娘的名誉受损（经济推理命题1）。

对于沃尔瑟姆制度的一个关键推动力，是在新英格兰地区的农业中女性与男性工资的比率很低。这一观点首先由克劳迪亚·戈尔丁和肯·索科洛夫提出，并得到了李·克雷格和伊丽莎白·菲尔德-亨德利的肯定支持。[①] 相比之下，在女性与男性工资的比率较高且较稳定的南部，则直到很久以后才开始工业化。而在使用沃尔瑟姆制度的北方，工厂生产率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在那里工作的女工的价值和收入。从1815年至1860年，随着女工占主导地位的产业经历着高于平均水平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初很低的女性与男性工资的比率也上升了。在这45年里，女工的收入从约为男工工资的1/3上升到近一半。简言之，女性劳动力的低成本对工业化起步做出了重大贡献；而反过来，也正是由于工业化，在美国内战前时期新英格兰的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有所上升。此外，由于将妇女从农业中解放出来，在北方，沃尔瑟姆制度和其他工业中的女性就业机会都增加了那些仍留在农场务农的妇女的相对价值和收入。从1830年到1860年，农家妇女以及雇用的农场“姑娘”的周工资增加了一倍以上。

早期的工厂工作时间是难以置信的漫长。12小时工作日被认为合理，半小时吃饭时间是个标准。平常从早到晚可以不用人工照明操作机器，而在冬季，蜡

① See Lee A. Craig and Elizabeth B. Field-Hendre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arnings Gap: Regional and Sectoral Tests of the Goldin-Sokoloff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0 (1993): 60 - 80.

烛提供的照明足以使工作延续到晚上。由于早期的机器速度慢，工作节奏不快，因此，每周工作 72 小时，女工和童工的身体都还能熬得住。

新英格兰纺织工人的生活是十分无聊且单调的，尽管它并不明显比一个贫穷的新英格兰农民的生活更糟，而农民由于从早到晚的生活作息，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可以休闲或发展其他爱好。如前所述，工厂为年轻的女子提供了一个从农场生活的低工资、乏味以及孤立隔绝中逃离的机会。她们次优的替代工作（经济推理命题 2），则是具有代表性的务农或者说同她们的母亲一样手工缝制或制作草帽、棕榈叶帽子和鞋子。从另一个角度看，新英格兰工厂的工人普遍避免了一种恶劣的境况——英国工人在工厂制度的最初十年里所经受的惨况。毫无疑问，主要是由于更严重的劳动力稀缺，美国制造商被迫维持了一定标准的福利，以此来吸引并留下他们所需要的劳动力。也没有证据显示美国工厂的所有者对待童工也如同一些英国雇主那般残忍。

不管是在英国还是美国，那些工业化带来的最消极的方面，都是在城市里最早得到见证。最糟糕的条件是在所谓的“血汗工厂”里，纽约、费城及波士顿服装业的工人们每天工作 14～16 个小时。由于来自移民劳工的激烈竞争阻碍了实际工资的增长，向运输公司、城市建筑商或工厂主出卖劳动的工人发现自己的处境愈发为难。然而，对大多数工人来说，南北战争以前的这段时间是工资与物质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的时期。

移民的影响

类似于劳动力当前的变化，主要来自亚洲和西班牙的移民促进了来自移民的构成变化。如表 11—3 所示，在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的移民浪潮中抵达的大批移民主要来自三个国家：英国、爱尔兰和德国。直到南北战争的十年时期，一直有一个稳定的移民流从英国流入美国；爱尔兰人和德国人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中期则以一个持续增长的数量移民而来，一方面是受到国内恶劣环境的驱赶，一方面也受到新土地上经济机会的吸引。1845—1847 年的马铃薯荒增加了爱尔兰移民的数量。为了能够逃离饥饿和可恨的在外地主（absentee landlords）的压迫，爱尔兰人找到了作为普通劳动者和工厂工人的工作。（随着许多美国工人向西迁移加入淘金热，就业机会也向这些新来的移民敞开。）1850 年的统计报告显示，在美国有近 100 万爱尔兰人，其中 40％住在大城市里——在那里他们的“棚户区”成了这一时期臭名昭著的贫民窟。随着 1848 年民族民主革命的失败，德国人在略晚的时间到来，15 年内就已达 130 万人次。仅拥有很少资本的德国人，大多数是在中西部的农场上定居，但他们中的几乎 1/3 增加了诸如辛辛那提、芝加哥、密尔沃基以及圣路易斯等繁荣城市的人口。移民对劳动力的性别构成也有影响。到 1860 年，妇女仅占制造业劳动力的 1/5，这表明了纺织业相对重要性的

© AFL/CIO/PHOTO RESEARCHERS

纺织行业中使用童工的情况十分普遍，尤其是在波士顿南部地区；以家庭为基础的劳动制度，亦即众所周知的罗得岛制度，在那里发祥。

减弱，以及来自廉价的移民劳动力的激烈竞争，且其中多数为男性。正如现在一样，这是一个妇女社会角色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但后来的趋势却是朝着家庭事业（domestic pursuits）。棉纺织行业仍然雇用了最多的女性（其中有很多是儿童）；而服装业和鞋业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排在毛纺织业之前。然而，正如帕梅拉·尼克利斯曾指出的，尽管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存在着从女工为主到以爱尔兰男工为主的转变，但纺织工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仍然快速且稳定，1836—1860年间达到了平均4.5%的年增长率。[①] 此外，贫民窟和最初恶劣的劳动机会，并未使爱尔兰人及其他移民受困于贫困。向上流动和财富积累伴随着移民的工作和场所的变化，提高了他们的福利。[②]

① Pamela J. Nickless, "Chang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Utilization of Native Women Workers in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1825—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288.

② See Joseph P. Ferrie, "The Wealth Accumulation of Antebellum Immigrants to the U. S., 1840—1860,"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4 (1994): 1-33.

表 11—3　　1845—1860 年按来源统计的年均移民数量（千人）

年份	总计	英国	爱尔兰	德国	其他
1845—1850	233	34	107	66	26
1851—1855	350	47	139	129	35
1856—1860	170	38	44	61	27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58），Series C，88－114.

制造业中男工的工资

尽管在战前时期女性收入相对于男性收入上升；但在 1820—1860 年间，在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制造企业里工作的成年男性，其平均工资也有显著增加。这些工人的年平均工资收入为 1820 年 267 美元，而 1832 年则为 292 美元，1850 年为 341 美元，到 1860 年时已达 360 美元。[①] 若以现在的货币计算，大约需要 7 400 美元，才能买到 1860 年时其年收入所能购买的同样数量的商品和服务。

从 1820 年到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消费价格有所下降，然后上升，到 19 世纪 30 年代末时已略微高于 1820 年的价格水平。而到 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价格又下降到 30 年代中期的最低水平以下。然后在 19 世纪 50 年代初再次上升。要解释这些波动，我们必须用一个消费价格指数来调整货币工资；这将显示出具有不变购买力（constant purchasing power）的工资的变化。表 11—4 提供了这些调整，并按照地理区域、城市化水平和企业规模列出了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指数（indexes of real wages）。就所有工人总和来看（最底行），1820—1860 年间，实际工资增长在 60%到 90%之间（从 101 增加到 159～191）；平均起来，工资每年增长在 1.2%到 1.6%之间。

仔细观察表 11—4 可以发现许多有关工人工资的重要特征。1820—1832 年是实际工资增长最快的时期——范围在每年 2.2%～3.7%，依地方和公司规模的不同而不同。1832—1850 年，增长的步伐减缓至 1.1%～1.5%。而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几乎无增长则发生在 19 世纪 50 年代期间。

① See Kenneth L. Sokoloff and Georgia C. Villaflor, "The Market for Manufacturing Workers during the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1860,"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 ed.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6.

表 11—4　1820—1860 年东北部地区制造业中成年男子的实际工资指数，按照地理区域、城市化水平和企业规模分类统计

加权值[a]	1820 年	1832 年	1850 年	1860 年	年均增长率，1820—1860 年(%)
中大西洋地区	100	122～143	159～202	157～188	1.2～1.6
农村	90	118～139	131～166	166～199	1.6～2.1
城市	111	150～176	165～209	154～185	0.8～1.3
主要城市	115	—	171～217	151～180	0.7～1.2
小型	81	93～108	129～163	140～168	1.4～1.9
中型	106	128～151	142～180	163～195	1.1～1.6
大型	110	123～144	171～216	159～190	0.9～1.2
新英格兰	101	131～154	149～188	164～197	1.3～1.7
农村	95	133～156	143～181	156～187	1.3～1.8
城市[b]	110	130～153	150～190	165～198	1.2～1.5
主要城市	122	170～200	154～195	182～218	1.0～1.5
小型[c]	90	125～147	159～201	172～206	1.7～2.2
中型	99	127～149	152～193	163～195	1.3～1.8
大型	110	133～157	146～185	164～196	1.0～1.5
总计	101	128～150	155～197	159～191	1.2～1.6

a. 加权平均值，是按照每个组别的雇员数量进行加权的。

b. 城市的公司，是指那些坐落于有 10 000 及以上人口的城市的公司；大城市则要求人口达 25 000及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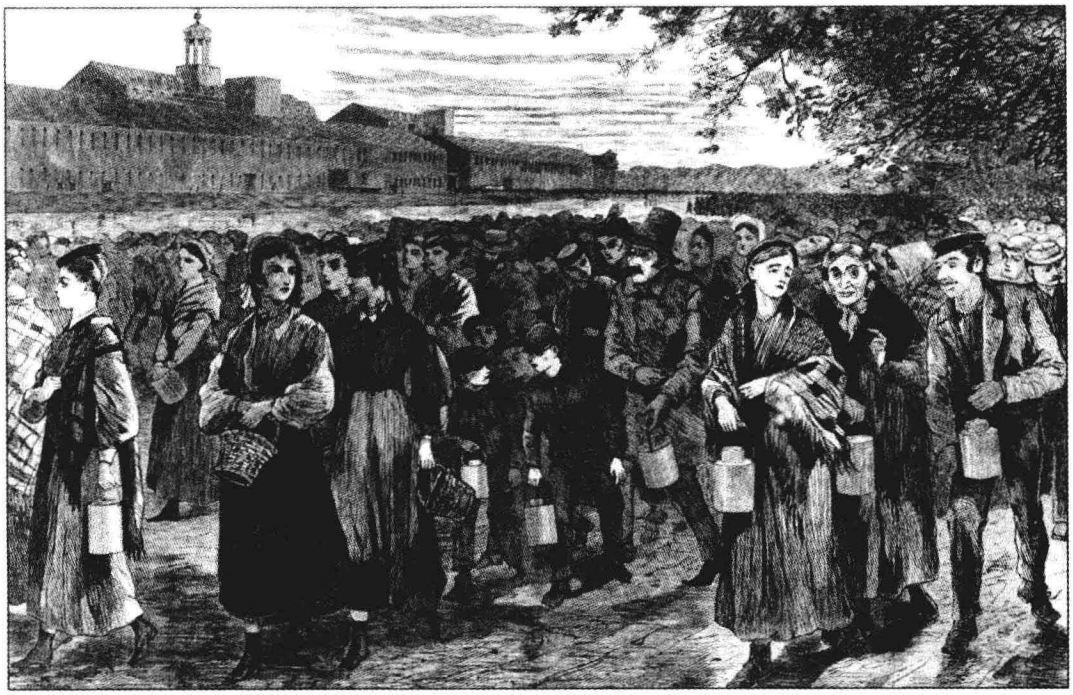
c. 小型公司，有 1～5 个工人；中型公司，有 6～15 个工人；大型公司，有 16 个工人及以上。

资料来源：Kenneth L. Sokoloff and Georgia C. Villaflor, "The Market for Manufacturing Workers during the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The American Northeast, 1820 to 1860,"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 eds.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6.

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的工资基本是维持在同一水平，且其增长速率也差不多相同。它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劳动力市场，其中有工人和雇主，前者做出反应（正如产品市场上卖方和买方考虑边际量），而后者移除以及/或者提出套现地域工资差距的条款。若以（非实际）货币计量，1820 年在新英格兰制造业的年度工资，仅比大西洋中部各州高出 1%；到 1860 年，这一差距仍只有 5%。

从表 11—4 可以看出，在 1820 年，农村地区制造业工人的收入低于城市地区的工人，而城市地区工人的收入又低于主要城市地区的工人。类似的比较关系，也可参见不同规模企业的工人之间的收入差别：企业越大，薪酬越高。但是到 1860 年，这一比较关系便不再符合事实了。农村地区制造业的实际工资增长得要比城市快，而较小企业的工资增长也快于较大规模企业。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工资差距的减少。交通运输情况的改善，提高了劳动力的流动性，并使得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更具竞争性。随着可通航水道的扩张和修缮以及铁路的发展，市场更加一体化，而工资率也趋于统一。这些市场力量给乡村地区和边远内地都带来了异常重大的影响，即将它们卷入市场并提供了专业化的机会。



LIBRARY OF CONGRESS

工资远远低于男人的妇女，构成了早期工业劳动力的很大部分。在接近南北战争的时期，男女间的工资差距也开始有所缩减。

英—美工资差距

尽管在工业化的各州之间工资差距很小，但交通成本却维持了英国和美国之间显著的工资差距。当 19 世纪早期美国的工业开始发展时，其成年劳动力的工资就远高于英国或其他国家。表 11—5 以内森·罗森伯格的研究为基础，显示了 1820—1821 年根据不同熟练程度分类的工资差异。比较所有列出的熟练程度种类，美国的工资都高于英国。

表 11—5 1820—1821 年按照熟练程度分类统计的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工资差异（英国工资＝100）

工人	美国工资
熟练工人	
木工	150
泥瓦工	147
最好的机器制造工人、铁匠等	77～90
普通机器制造工人	114～129
非熟练工人	
普通工人	135
农业工人	123～154
仆人、女佣	149～224
棉纺厂的普通走锭纺织工人	106～137
毛纺厂的普通走锭纺织工人	115
手织机的织工	122
棉纺厂女工	102～153
毛纺厂女工	128
10～12 岁的男童工	115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Nathan Rosenberg,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in the 18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226.

基本上，这些工资差异可以归因于一个事实，即工业部门工人薪金的底线，是根据农业部门的报酬确定的。进入 19 世纪后，在美国，没有任何无法逾越的障碍，无论是距离还是费用，能够阻止人们获得一块肥沃的土地。农业部门单位工人的产出相对较高，而 19 世纪早期农业技术的演进也提高了人均产出量。此外，美国的农民通常自己拥有土地，他们除了自己和家人的报酬之外，还可以获得租金和利润，而在英国这些租金和利润往往为地主所有。因此，美国丰富的土地资源，加剧了美国和英国工人之间的表面工资差距，这也使得普通工人之间收入和财富差距相比工资差距更大。

国际劳动力流动无法弥补这些显而易见的工资差异——至少在 19 世纪早期是如此。而在 19 世纪 30 年代末以及整个四五十年代，急剧增加的移民引发了美国和英国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缩减；即便如此，根据大量证据的一致观点，1860 年美国工业部门的工资底线仍相对较高。

熟练—非熟练工人工资比

从自由的美国工人的角度看，更重要的也许是不同“等级”或技能水平的工人之间相对工资的变动。在19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一如绝大部分的殖民时期，在美国支付给工匠技能的溢价普遍比在英国支付的少。我们所说的“溢价”，是指支付给熟练劳动力的工资高于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的额外金额。虽然美国熟练工人的收入比英国的熟练工人多，但美国的熟练—非熟练工人工资比却要低于英国。然而，表11—5中的证据也显示，上述观点也并非一律正确。当与普通或农业劳动力相比时，较低的熟练—非熟练工人工资比在机器制造工人的技能类别中体现得更为明显。

美国在19世纪早期熟练工人相对较低的溢价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一是农业扩张对非技术工人的较大吸引力，还有就是大移民浪潮开始之前到达美国的英国熟练工人比例的增加。①

然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这种技能溢价开始提升。例如，表11—6显示了南北战争前马萨诸塞州城市内的机械工人与一般工人的日工资比率。参见经济透视11.1对这一趋势所引发问题的探讨。虽然说这些不断扩大的工资差异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地区性差异，但它们普遍反映了技术溢价提升的广泛模式。②

表11—6　1825—1860年马萨诸塞州城市的机械工与普通工人的日工资比

年份	百分比（%）
1825	150
1831—1840	156
1837	185
1845	169
1841—1850	190
1851—1860	220

资料来源：G. D. Wright, *Comparative Wages, Price, and Cost of Living* (Boston: Wright & Potter, 1889), 22, 54, and 55. As quoted in 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Peter H.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71.

① See H. J. Habakkuk,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② 关于这一观点进一步的证据，详见 Jeffrey G. Williamson and Peter H.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70-75。以军用设施的劳动合同为基础的挑战这一观点的研究，详见 Robert A. Margo and Georgia C. Villaflor, “The Growth of Wag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1987): 873-896。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不断增大的工资差异也许会促进不断增长的阶级意识。工资差异无疑加剧了已增加的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根据杰弗里·威廉森和彼得·林德特提供的有关财富趋势的证据，我们发现在1774年至1860年之间，财富集中显著增长。日益增长的不平等，尖锐打破了殖民地时期普遍流行的总财富的集中稳定（但不平等）的模式。1774年，总资产的12.6%由最富有的前1%的自由财富持有者所持有，而最富的10%的人持有的资产仅略少于总资产的一半。到1860年，最富有的1%的人持有美国总资产的29%，最富的10%的人则持有总资产的73%。[①] 简言之，最富有的1%的人所持有的份额增加了一倍多，而最富有的10%的人持有的资产则激增了差不多其之前水平的一半。威廉森和林德特强调了它们的广泛影响力："走向财富集中的运动发生在区域之内，正如它看起来发生在特定年龄组之内一样，在本国出生人口和外国出生人口之间，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之内。"[②] 杰里米·阿塔克和弗雷德·贝特曼的进一步研究支持了这个观点，该研究说明在1860年，相对于城市地区和南方农村地区，财富分配在北方农村地区则较为平等。

托马斯·杰斐逊有一个平等主义的梦想，即个体小农满意的一个强大、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其他人的共同愿景。但是，工业革命的影响力越过了大西洋，从大英帝国来到这里。著名的旅行家兼评论员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1839年对不断增长的财富集中现象发出了警告。他担忧产业精英的崛起会破坏美国平等主义的基础：

> 我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在我们眼皮之下崛起的制造业贵族已经成为目前存在的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支持民主的朋友们应当紧紧盯住事态发展的方向；因为如果地位和阶级的长久不平等……会渗透入美国，可以预料到，这将是一个它们进入的大门。[③]

就经济最终结果（收入和财富）而言的美国平等主义仅仅是一个梦想，现在也同样如此。但是在南北战争前，工业革命和经济增长率的提升对许多人来说是机遇的引擎（engines of opportunity），虽然并不平等。和其他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经济体相比，美国的转型引起了更大的不平等。穷人并没有变得更穷，但和这个社会的富人相比，其收入增加的速度明显更慢。

---

① Williamson and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36.

② Ibid., 46.

③ Ibid., 37 - 38.

早期的工会运动

随着制造业工人人数的增加，工人为自身利益组织起来进行的活动越来越多。一些人认为工人运动的起源和最初的劳工—管理问题来源于工人与生产工具的分离。据称，一旦资本家提供生产工具，这些拥有谋生工具的工匠就会失去自己的身份和独立性。就像大多数概论一样，这一论点有其作用，但也可能导致错误的结论。经济推理命题 5 在这里适用。工业革命将大批工人置于不确定且不安全的境地，使他们必须依赖变幻莫测的经济波动和雇佣者的仁慈。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工人运动的最初推动力却来自于那些并没有和劳动工具分离的工人。18 世纪 90 年代，费城、纽约和波士顿的工匠们组建了工艺劳动者协会（craft labor societies），它是现代工会的雏形。大多数这样的协会建立起来，旨在确保实际工资的增加（即推动名义工资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品价格），尽管也在缩短工作时间、建立并保留只雇用工会成员的封闭式工厂制度（a closed shop）、调整学徒条件等方面做了各种努力的尝试。始终如一的是，对这些协会也存在着相当友好的激励，因为以同种方式生活的人们很容易锻造出一种社会联系。几乎在所有的大城市，鞋匠和印刷工是第一批成立“工人协会”的工人；而木匠、泥瓦工、制帽工人、装配工以及裁缝，也都发现它值得去组建。另外，这些组织是按照行业分类并由熟练工人创办的（经济推理命题 1）。

经济透视 11.1

南北战争前的劳动力市场

南北战争前的劳动力市场有两个特点，尚待经济学家做出更明晰的经济学解释。第一，为什么在 19 世纪早期美国制造业实际工资的快速上涨到了 50 年代就减缓到了几乎为 0 的水平（表 11—4）？第二，为什么 1830—1860 年间熟练工人的工资相对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有所上升（表 11—6）？供给和需求将成为我们的分析指导，并且我们能用人口统计学证据对这些假说给予实证支持。

图 11—2 对第一个问题做了解释。在 1850 年以前，需求的增加超过了供给的增加，所以工资上涨。在 1850 年以后供给的增速快于往常，与需求的增加量基本持平，所以工资基本没有变化。

图 11—3 对第二个问题做了解释。虽然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的需求和供给较往常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是 19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非熟练工人的供给（S-1840 到 S-1860，图 11—3B）的增速加快，相对于熟练工人的供给（S-1840 到 S-1860，图 11—3A）而言，其供给增加。这导致相比之下，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要少于熟练工人的工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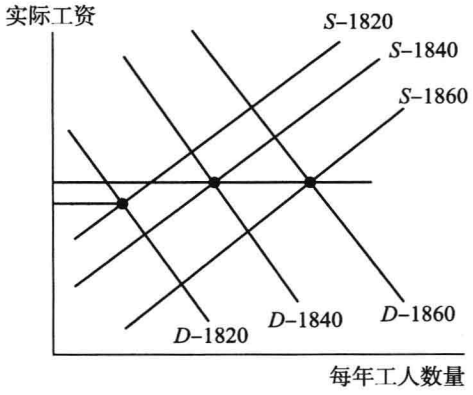


图 11—2　制造业工人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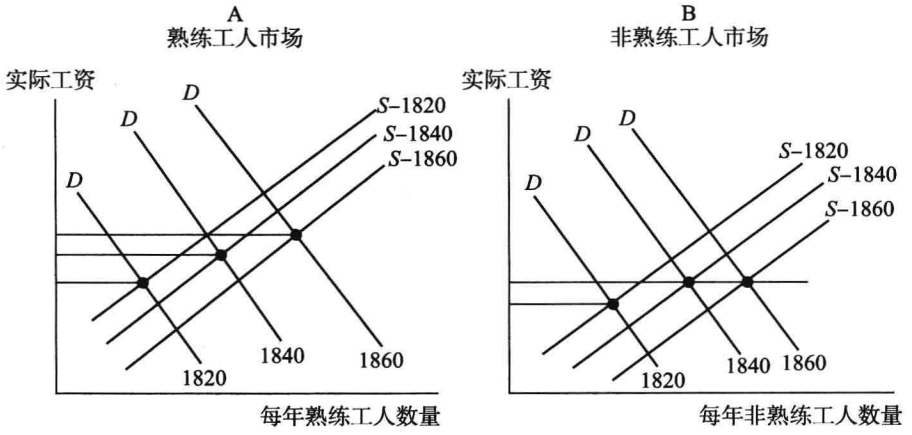


图 11—3　按照熟练程度区分后的制造业工人市场

接下来分析人口统计学证据。表 11—7 中的人口数据反映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整体的基本增速达每年 3.3%。当时所有的欧洲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增长速度，甚至连一半都不到。而且移民潮发生在 1840 年之后（见图 11—1）。从表 11—7 中可以看出，1820—1825 年间，移民只占据了每年人口增长的 3.0%，但到 1845—1860 年间，移民所占比例已高达 25%～31%。

表 11—7　　1790—1860 年基本人口数据

年份	人口（百万人）			百分比（%）		此前十年内净移民在人口变动中所占比例（%）
	总计	白人	非白人	非白人	城市人口	
1790	3.9	3.2	0.7	17.9	5.2	n. a.
1800	5.3	4.3	1.0	18.9	6.1	n. a.
1810	7.2	5.9	1.3	18.1	7.3	3.3

续前表

年份	人口（百万人）			百分比（%）		此前十年内净移民在人口变动中所占比例（%）
	总计	白人	非白人	非白人	城市人口	
1820	9.6	7.9	1.8	18.8	7.2	2.1
1830	12.9	10.5	2.3	17.8	11.7	3.8
1840	17.1	14.2	2.9	17.0	10.8	11.7
1850	23.3	19.6	3.6	15.5	15.2	23.3
1860	31.5	26.9	4.5	14.3	19.4	31.1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series A2, 45, 46, and 195.

自然增长和移民的综合效应将人口的平均年龄（中位数）从16岁升高到19岁，并增加了处于工龄的人们的比例以及劳动人口的比例。1820—1860年间，有酬雇用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从33%上升到36%，增幅为9%（3/33）。此外，城市居住人口的比重在1820—1850年间上升了一倍多，而在1840—1860年间上升了近一倍（表11—7）。人口统计学证据与观察到的工资变化是一致的，但一致性不是因果关系的证明。其他的假说同样也可以解释这一记录。请回顾经济推理命题5。

法律上的挫折与进步

这些早期的工艺协会通常都很短暂，维持最久的工会是费城皮匠协会（Philadelphia Cordwainers，1794—1806）。周期性经济低迷通常使工人的集体行动受到破坏，工资削减虽然受到抵制，但在经济不景气时司空见惯。对于工会化，一个更稳定的遏制因素来自法院诉讼。保守的法官们在给陪审团的指示中声称工会行动本身是非法的。根据英国普通法，工人协会被认为是阴谋集团，而阴谋集团的定义是“两个及以上的人组成的联盟，通过间接手段去伤害个人，或者做出非法的或对社会不利的行为”。这个中世纪晚期在英国发展起来的教条因此在约500年后被用来约束工匠们的工会化。在1815年著名的匹兹堡皮匠案（Pittsburgh Cordwainers）中，法官坚持认为鞋匠师傅和临时工都是被迫的：

没有鞋匠敢接受以偏低价格进行工作的人，或者非协会成员。也没有工头必须雇用他，否则会受到失去他所有工人的惩罚。此外，在某些情况下，图谋阻止他人自由贸易或从事某一职业是可以被起诉的。同样，图谋强迫或协助他人成为某一特定协会成员，也是可被起诉的触犯法律的行为。[①]

① 引自J. R. Common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ociety*, Vol. 4 (Glendale, Calif.: Clark), 82, 83。

在这一案例中，陪审团同意鞋匠师傅、临时工以及公众都受到了来自职工协会（association of journeymen）的危害，并正式裁决为共谋罪，尽管法庭只判罚了被告每人1美元的罚款外加诉讼费。

此后的判决维持了这一法律观点，直到著名的英联邦诉亨特案（Commonwealth v. Hunt）。1840年秋，波士顿靴匠协会（Boston Bootmakers' Society）的亨特和其他会员因为试图坚持一家工厂只雇用工会会员而被送交到了市法院。再次地，受到一个来自法官的认为工会活动只会导致“可怕专制”（frightful despotism）的严厉指控，被告被定罪。案件上诉到了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在1842年，首席法官莱缪尔·肖（Lemuel Shaw）做出了一项里程碑式的判决，这项判决曾树立了一个先例，并为其他案件开启了通向更自由的裁决的道路。首先，他认为，除非联合的目标是违法的，否则工会会员的联合本身并不属于犯罪；仅仅是组织起来这一事实并不构成非法共谋。其次，他坚持一个原则，即工会成员有权向工厂施压要求只雇用工会会员，也有权举行罢工以维持工会会员安全。肖法官并不是激进派，也没有对劳工运动的事业特别同情，但是他清楚地意识到经济现状已经迫使工人联合行动。虽然这项裁决并不意味着工会摆脱了进一步的法庭对抗，但不再有强制力将仅仅组织团体这一事实规定为刑事犯罪，并且自此以后，人们对使用工会的任意武器对社会有害这一假定保持一定沉默。

组织上的进步

尽管如此，肖法官的裁决并没有立即给工会带来复兴；19世纪30年代末直到40年代初期长时间严重的经济萧条，摧毁了大多数在1824—1837年间的行业工会复兴中形成的协会。工人协会在19世纪50年代才再次得到恢复（在1854—1857年的衰退时期又遭遇挫折），但重要的是要记住，在1860年以前，工会成员从不超过总劳动力的1%。工厂工人、农业工人、奴隶以及家庭佣工几乎全在工会运动之外。早期工人组织的主要获益者是工人中的少数精英，即技工们。但是，工会组织的重要作用在于，它为工人运动带来了实质的组织上的进步，以及一系列政治上的收获。

首先，劳工学会了集体谈判的技巧，敢作敢为的工会开始大胆而巧妙地运用罢工与抵制等武器。规定一个公认的工会会员作为雇佣条件签订的封闭式工厂协议，很快被证明为是维护工会成员安全的手段。劳工组织的仁慈和保护目的趋于消失，战斗精神也取代了早期的犹豫和不愿意采取行动。

其次，迅速增加的各行业协会开始联合起来。地方联合会及全国性的组织机构相继出现。1827年，费城不同行业的工会联合成立了一个“城市总工会”或“行业工会”，即技工工会联合会（Mechanics' Union of Trade Associations）。六年后，在纽约的工人协会也成立了行业联合总会（General Trades' Union）。随后三年，几个主要城市也陆续成立城市总工会。这些总工会被建立起来，并非如这

类组织的现代功能那样是为了交流信息和参与政治活动，更多地是为了协助这些工会参与到与雇主的斗争中。随之而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内成立总工会的尝试。1834 年，纽约的城市总工会——行业联合总会，号召这些城市的联合会召开了一个全国性代表大会，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全国总工会（National Trades' Union）。同时，一些行业协会开始意识到遵循严格行业界线的全国性工会组织的优势，于是在 1835—1836 年，至少五个这类全国性工会陆续成立。其中最强势的是由鞋匠和印刷工组织起来的工会。

普通劳动人民的政治进步

选举权

正如视角 11.1 所讨论的那样，工人们最重要的政治进步是选举权的扩大。在美国成立的最初几十年，人们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不动产或支付一定数额的税才会有政治发言权。争取选举权的斗争发生在最初的 13 个州；只有 4 个新加入联邦的州没有为成年男子的选举权设置任何财产或纳税的条件。到 19 世纪 20 年代晚期，选举权充分扩大到使男工人能参加人口大州的选举。最先取消的是对拥有财产的要求，到 1821 年只有 5 个州还保留着这个要求。30 年后仍有 5 个州设置了纳税这一限制条件，但那也仅仅是名义上的要求。[①] 总的说来，到 1860 年，美国的白人男性公民都能参加选举；在纽约和新英格兰，黑人男子也有选举权；而在农业区西北部，外侨男性也可以参加选举。

公共教育

范妮·赖特虽然不能参加选举，但她不知疲倦地为教育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新英格兰以外的地区，穷人的孩子只能接受很少的教育或者无法接受教育；即使在新英格兰，这种早期的培养也是低质量的，并且存在着很多人反对的宗教倾向。赖特和她的支持者提出州应当建立寄宿学校，从而为富人和穷人的孩子提供无差别的教育，在那里阶级界限将被消除。其他没有如此激进的人，则提出了建立免费公立学校的简单计划。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扩大教育机会有了一定发展；艾伯特·菲什洛（参见他 1966 年在《经济史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曾指出，到 19 世纪中叶，GNP 中有大约 1%被用于教育（相比现在几乎为 8%）。普通公立学校在北方已经十分普遍，在那里政治上的关怀和努力也是最大的。请回顾经济推理命题 1。

---

① 相比于全民选举总统，我们发现在选民数量上存在着两个重大的飞跃：从 1824 年至 1828 年（3.2%～9.3%），以及从 1836 年到 1840 年（9.6%～13.6%）。

视角 11.1

☞

选举权的进步

美国成年男子赢得的选举权的进步，也同样发生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和法国——两个在工业化道路上领先的国家。正如表 11—8 所示，法国处于领先地位，这部分是因为来源于世纪之交的法国大革命的力量。法国是第一个同意无记名投票和成年男性百分之百选举权的民主国家，领先于德国和美国二三十年。法国在妇女选举权法（1845）方面也是个领先者，所有其他国家则滞后了 75 年或者更久。

表 11—8　　各国公民获得选举权的年份

	无记名投票权	妇女获得选举权	完全男性普选权	1900 年投票人口所占比例（%）
美国	1849	1920	1870	18.4
英国	1872	1918	1948	16.2
德国	1848	1919	1872	15.5
法国	1831	1845	1848	28.2
阿根廷	1912	1947	1912	1.8
巴西	1932	1932	1988	3.0
智利	—	1949	1970	4.2
秘鲁	1931	1955	1979	—
委内瑞拉	1946	1945	1946	—
哥斯达黎加	1925	1949	1913	—

债务、兵役和监狱

在劳动人民心中，除了教育改革，最需要的改革就是废除因债务而坐牢的制度。每年有成千上万的人因无力偿还几美元的债务而身陷囹圄，因而可以理解人们对这种不公平的强烈不满。有几个州的民兵制度并不公正，它们对富人有利，这使得穷人怀恨在心，因为他们要么选择服兵役要么就只能蹲监狱。这些及其他目标——消除犯人劳动力之间的竞争、获得在雇主拖欠工资时对其财产提出留置

权的权利，都鼓舞了众多劳动者、小商人以及具有较高社会责任感的专业人士的情绪。民兵制度最终变得不若以前那般繁重，机械工的留置权法也在许多州得以通过，而因债监禁制度从大多数州的法律中被废除。回顾经济推理命题 1、2 和 4。但是 1832 年以后这类最初的运动却逐渐失去了动力，因为在随后的繁荣时期，工人们将精力转移到了推进工会组织的事业中，然而 1837 年时工会组织也土崩瓦解。

10 小时工作日

尽管此后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的运动以及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事件带有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式空想（以罗伯特·欧文、查尔斯·傅立叶和乔治·亨利·埃文斯为代表）的特点，但有一项运动迅速减轻了劳动者的痛苦，即为 10 小时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这一目标早在 1835 年就已提出，但当时实现这个目标的希望很渺茫。而 1840 年马丁·范布伦为联邦雇员规定了 10 小时工作日后，希望重新燃起。一些行业工匠的工作时间已经不再超过 10 小时，但工厂工人仍然要每天工作 12～14 小时。19 世纪 40 年代中期，新英格兰工厂的工人加入到争取更短工作时间的运动中。1847 年，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构通过了第一部监管法，为每天工作时间规定了一个 10 小时的上限，但其中有个漏洞。这部法律规定，如果工人同意工作更长时间，那么可以超过 10 小时上限。倘若不同意，工人便会受到解雇的威胁，结果工人们发现他们的境况并没有变好。其他州的立法机构也遵循同样的模式通过了相关法规；只有在一些将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 10 小时的法律里，才没有包含这条可恶的“合同”条款。

也许争取监管法律的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施加给雇主的公众舆论压力。许多大型工厂纷纷自发建立了 11 小时工作日制度。到 1860 年，10 小时工作日成为所有手工业的标准，而此时 8 小时工作日的新标准也在小心翼翼地酝酿着。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dams, Donald R., Jr. “Wage Rates in the Early National Period: Philadelphia, 1785—18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1968): 404 - 426.

——. “Wage Rates in the Iron Industry: A Com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Fall 1973): 89 - 94.

Craig, Lee A., and Elizabeth B. Field-Hendrey.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arnings Gap: Regional and Sectoral Tests of the Goldin-Sokoloff Hypo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0 (1993): 60 - 80.

Crowther, Simon J. “Urban Growth in the Mid-Atlantic States, 1785—185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624 - 644.

Dawley, Allan. *Class and Community: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Lyn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ublin, Thomas. *Women at Work: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rk and Community in Lowell, Massachusetts, 1826—186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Dunlevy, James A., and Henry A. Gemery.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Responses of Old and New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901 - 917.

Fishlow, Albert. "The Common School Revival: Fact or Fancy?"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Two Systems*, ed. Henry Rosovsky. New York: Wiley, 1966.

——. "Levels of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Investment in Educ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1966): 418 - 436.

Goldin, C.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Goldin C., and K. Sokoloff. "Women, Children,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the Early Republic: Evidence from the Manufacturing Census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2): 741 - 774.

Gutman, Herbert. *Work, Culture,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ing America*. New York: Knopf, 1977.

Habakkuk, H. J. *American and British Technolog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

Haines, Michael R.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920."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143 - 205.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Higgs, Robert. "Mortality in Rural Americ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Winter 1973): 177 - 196.

Lebergott, Stanley. *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 "Labor Force."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Leet, Don R. "The Determinants of the Fertility Transition in Antebellum Ohio."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359 - 378.

——. "Interrelations of Population Density, Urbanization, Literacy, and Fertilit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October 1977): 388 - 401.

Lindstrom, Diane.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efore 1840: New Evidence and New Dir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289 - 302.

Margo, Robert A. "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7 - 243.

——. *Wages and Labor Marke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20—1860*.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for the NBER, 2000.

Margo, Robert A., and Georgia C. Villaflor. "The Growth of Wag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New Evidenc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1987): 873 - 896.

Neal, Larry, and Paul Uselding. "Immigration: A Neglected Source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790 to 1912."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4, 2d series (March 1972).

Nickless, Pamela J. "Changing Labor Productivity and the Utilization of Native Women Workers in the American Cotton Textile Industry, 1825—186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287 - 288.

Pessen, Edward. *Most Uncommon Jacksonians: The Radical Leaders of the Early Labor Movemen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67.

Potter, J.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America, 1700—1860." In *Population in History*, eds. D. V. Glass and D. E. C. Eversley. New York: Aldine, 1965.

Rosenberg, Nathan. "Anglo-American Wage Differences in the 18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221 - 229.

Ross, Steven J. *Workers on the Edge: Work, Leisure, and Politics in Industrializing Cincinnati, 1788—189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Rothenberg, Winifred B. "The Emergence of Farm Labor Market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Rural Economy: Massachusetts, 1750—185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537 - 566.

Smith, Merritt R. *Harpers Ferry Armory and the New Technology: The Challenge of Chang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Sokoloff, Kenneth L. "Was the Transition from Artisanal Shop to the Nonmechanized Factory Associated with Gains in Efficiency? Evidence from the U. S. Manufactures Censuses of 1820 and 185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351 - 382.

Soltow, Lee. "Economic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eriod from 1790 to 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 (1971): 822 - 839.

Steckel, Richard H. "Antebellum Southern White Fertility: A Demographic and Economic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331 - 350.

Sundstrom, William A., and Paul David. "Socio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Interstate Fertility Differenti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850 and 1860."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6 (1976): 375 - 396.

——. "Old-Age Security Motives and Farm Family Fertility in Antebellum Americ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5 (1988): 164 - 197.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is a source of historical statistics on population, http://www.census.gov.

Uselding, Paul. "Conjectural Estimates of Gross Human Capital Inflow to the

American Econom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Fall 1971): 49 - 62.

Vinovskis, Maris. "Mortality Rates and Trends in Massachusetts before 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184 - 213.

Williamson, Jeffrey. "American Prices and Urban Inequality since 182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June 1976).

Williamson, Jeffrey G., and Peter H.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Yang, Donghvu. "Notes on the Wealth Distribution of Farm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 A New Look at Two Manuscript Census Sampl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January 1984): 88 - 102.

Yasuba, Yasukichi. *Birth Rates of the Whit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800—1860: An Economic Analysi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2.

Zabler, Jeffrey F. "Further Evidence on American Wage Differentials, 1800—183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Fall 1972): 109 - 118.

——. "More on Wage Rates in the Iron Industry: A Repl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Fall 1973): 95 - 99.

第 12 章　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银行业

本章主题

宪法获得通过后，这个新国家面临着为货币体系建立一个法律框架的问题。但在实现稳定的货币购买力以及建立一个健全且能自由提供货币信贷的银行体系这两个货币体系的根本目标上，并未达成很多共识。本章描述了在试图实现这些难以捉摸的目标的过程中，年轻的共和国进行的多次尝试。这些尝试不仅对当时的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持续地影响了美国人应该怎样对金融体系进行监管的信念。本章还介绍了影响经济发展过程的宏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经济萧条和金融危机。

美国的货币单位

由于之前的国际贸易使得西班牙银元（西班牙比索的一个统称）及其分支货币大大超过了在美国海岸沿线的商业中心所使用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硬币，所以承认西班牙银元的结算成了一种习惯（尽管在美国独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有些商家仍然继续使用英镑、先令和便士）。因此，元被采纳为记账单位，并且对我们大家而言，幸运的是采用了十进制的货币转换，而不是计算起来比较麻烦的英国

人的英镑制度，先令（1磅＝20先令）和便士（1先令＝12便士）。托马斯·杰斐逊与罗伯特·莫里斯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道，是采取十进制体系的最重要的倡议人，在他1783年向国会的报告中，他提出如下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论点：

最简单的乘法和除法运算是乘以或除以十，每个人都知道十进制算术的方便。大家都记得，原先学习货币换算时的困惑，计算法新的时候，一个便士等于四个法新；计算便士的时候，十二个便士等于一先令；计算先令的时候，二十个先令才等于一英镑；但是当货币单位成了英镑的时候，此后只需要用十进制来进行加减。如此令人困惑的计算确实很麻烦，因为我们中很多人终其一生也只接受过小学的教育水平。①

比十进制货币换算更为重要的决定是确定货币本位这一问题。货币的价值是基于纸币本身？基于黄金？基于白银？还是黄金和白银？没有人同意以纸币作为货币本位。美国革命期间以及《联邦条例》下的一些州的通胀经验表明，纸币本位很容易被滥用：政府能印制太多的纸币。相比而言，在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重要的货币金属里选择则困难得多。最终决定采用金银复本位制（Bimetallic standard）。黄金能增加货币体系的信誉，并且可以作为高面额的货币；白银则主要是小面额货币。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指出，银元实际上在各州普遍使用，人们很容易接受它作为货币单位。他说，唯一的困难是西班牙比索中纯银的含量各不相同。因此他建议对流通的比索进行检测（测试），看看它们纯银的含量。新的合众国银元中的含银量只需是流通中西班牙比索中含银量的平均数即可。由于当时黄金的价值大约是白银的15倍，在同样的面额下，金币只包含1/15的金属作为同一面值银币。他的这些想法最终被写入1792年的《铸币法案》。在实行将近四分之三个世纪里，实行金银复本位制这一决定饱受争议。

金银复本位制

采取金银复本位制是一回事，但是真正维持金银复本位制则是另一回事。维持金银复本位制的问题在于黄金与白银之间的相对价格的不断波动。即使在1792年，金银铸币之间15∶1的比例很接近市场比例，但是世界市场上的金银供需变化如此强烈，在18世纪90年代，世界市场上的金银价格比已经上升到15.5∶1，到了1808年，这个价格比已经变成了16∶1。在市场价格比例为16∶1而金银铸币比例为15∶1的情况下，黄金的价值在造币厂被低估。在这种情况下，将金币出口至国外然后再在欧洲将黄金兑换成白银，这些白银带回国内在造币厂重新铸币就有利可图。

数百年来，观察者发现被低估的货币都有被窖藏然后再出口的趋势。人们会尽可能地以面值花掉贬值了的货币而持有被低估的货币。对这种效应的通俗说

① Paul Leicester Ford, ed., *The Writings of Thomas Jefferson* (New York: Putnam's, 1894), 446-447.

法，是“劣币驱逐良币”或“廉价货币取代贵重货币”，并且在各种语言中使用。作为伊丽莎白一世的造币厂负责人的托马斯·格雷欣爵士，他关于这一现象的分析被人们广泛熟知，通称为格雷欣法则。在这里，我们最好将这一法则作这样的解释：在两种不同的货币以固定比率流通的情况下，在造币厂被高估的货币将驱逐在造币厂被低估的货币。

在一篇著名的题为“格雷欣法则还是格雷欣谬论?”的论文中，阿瑟·罗尔尼克和沃伦·韦伯指出，如果人们愿意以货币的市场价值使用硬币，那么就没有理由会出现一种货币驱逐另一种货币的情况。例如，如果人们认为一黄金美元与 1.05 个银币价值相当，这个比例就反映了硬币中所含两种金属的市场价值，那么黄金和白银会一起流通，哪怕黄金在造币厂被低估。但正如罗伯特·格林菲尔德和休·罗考夫以及乔治·塞尔金所说，法律、习惯和便利性往往是迫使人们使用硬币的面值进行交换的强大力量。在 19 世纪初的美国，金币持有者更加容易窖藏货币以出口而不是以高于金币的面值在日常交易中使用。回忆经济推理命题 1～4。

格雷欣法则有时也被用在更广泛的情况（通常没那么严格）。例如，有些大学教授担心学生会选择简单的课程，因为对学分绩点而言，在一门简单课程中获得 A 与在一门较难课程中获得 A 的效果相同：简单的课程将驱逐较难的课程。在这里格雷欣法则适用于大学课程，因为与市场和造币厂对货币价值的评价不同一样，学生与学校对于课程的评价也有差异。

1834 年 6 月通过了两个法案，将造币厂的货币价值比例上调至略高于 16∶1。黄金在当时被高估，于是黄金开始慢慢取代白银，而白银既没有被窖藏也没有被出口。1848 年加利福尼亚州金矿的发现加快了美国走向纯粹金本位流通的趋势。

金银复本位制下的国际货币流动是一件麻烦事。往往无法得到与面额相等的货币，而且流通中的货币被严重磨损。尽管经常被人忽略，金银复本位制还是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好处。市场上某种金属的价格变化，比如说黄金，可以反映一种金属的缓慢增加的供给与其需求之间的变化。如果一个国家钉住一种金属，那么一般价格水平会下降。但在金银复本位制下，廉价金属货币可以取代贵重金属货币，因此有助于维持货币存量以及价格水平。

银行票据成为纸币

虽然宪法禁止州发行纸币，但保留了其成立公司的权力。在开始于 1793 年的商业繁荣之后，在一些州政府的特殊许可下成立了大量银行。从美国的历史来看，这些银行是全新的机构，因为商业银行在这之前从来没有在殖民地出现过。全美在 1790 年之前只出现了 3 家商业银行，但到 1800 年，已经拥有了 20 家，到了 1811 年，一共有 88 家银行。除两家银行属私人所有之外，州政府授权成立的银行能够发行它们自己的票据，这些票据能够赎回黄金或白银。

在许多方面，银行票据类似于银行存款。当银行贷款给客户时，采取的方式

是向顾客提供银行自己发行的票据，这些票据能够像现金一样流通，或者采取银行存款的方式，顾客可以在这个存款的基础上开出支票。当然在今天，银行不再发行这样的票据，而是由美联储发行人人接受的纸币。另外，现在公司的贷款采取直接将金额打到公司账户的形式。但是在美国内战之前的一些时间，甚至在美国内战结束后的一些乡村地区，银行仍然自己发行票据而不是直接将金额数目打到顾客的账户之中。

在通常情况下，只有附近地区的银行发行的票据才会按面值被接受。从遥远的城市来的人需要将他们持有的银行票据兑换成当地银行票据，通常他们会被收取折扣，一美元外来票据可能只能换得 0.97 美元当地票据，3%是折扣率。为了他们与其他的地方商人获得资金这一目的，票据经纪人从距离遥远的银行以及拥有标明了各种折扣率的出版物的“银行票据发布人”处购得银行票据。加里·戈顿和霍华德·博登霍恩通过研究这些折扣率发现，这些票据的定价非常类似于今天货币市场上短期债券的定价。虽然距离发行银行太远是折扣产生的主要原因，但也有一些其他因素在起作用。通常的情况是，刚成立的银行发行的票据的折扣更大，可以预料，随着某个银行拥有了健全的名声后，该银行发行的票据的折扣率会越来越低。

这样的一个货币体系鼓励了票据造假。到 1860 年，有超过 1 500 家国有银行发行票据，平均而言，每个银行有将近 6 种不同面额的票据。因此，至少有9 000 种不同类型的债券在流通。一些造假者印发一些不模仿任何一家银行的票据；另一些则主要集中模仿那些真票据。也许最成功的假冒方法是使一个破产银行的票据变成一个有偿付能力银行发行的票据，或者把低面值的票据改成大面值的。还有一些造假者则专门在商业终端造假；还有造假者是最终使用者，能够把假钱用出去。为了打击造假，银行成立了打假委员会，雇用卧底来查处假钞制造者。

很显然，在通常情况下很难确定一张票据的真实性以及这一票据应当被收取的折扣。如果一张票据显得比较旧，或者被银行出纳像针一样的订书钉多次穿孔，那么可以推断这张票据是真的。那些经常收取纸币的人，通常能够获得银行票据发行人和假币检测器的更多帮助。汤普森银行的票据和商业记者，每周都有一个按州字母分类的各银行的票据和各个票据折扣的清单，另外还有对已经被查获的假票据的描述。汤普森银行不定期出版的票据描述清单，包含对美国以及加拿大各银行真实票据的文字描述。尼古拉斯银行的票据记者（Nicholas' Bank Note Reporter）一次列出了 5 400 张假的票据。实际上这么多假票据中只有一小部分同时流通，但是可能是其中的任何一张。霍奇银行的票据安全部门（Hodges' Bank Note Safeguard）保有 360 张真正发行了的票据的赝品。

虽然这个货币体系在今天看来十分陌生，因为我们的货币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因此很容易将困难夸大。今天，商家仍须与空头支票和被盗的信用卡斗争，而使用自动取款机通常需要支付的服务费也类似于票据经纪人曾经收取的费用。的确，今天许多人依靠提供支票兑现的服务，这一商业服务非常类似于战前票据经纪人提供的服务。不过，毫无疑问的是，这一时期的许多人对这样的货币体系非常不满，他们希望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提供一种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使用的货币。

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

本图是出自约翰·特朗布尔之手的肖像画，所绘的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1775—1804），他是这个新国家宪法和经济政策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后来在与亚伦·伯尔的决斗中身亡。

美国第一银行

在国会的批准下，为了给战争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在困难时期开展金融活动，罗伯特·莫里斯于1781年组建了美国第一家国家银行，即美国第一银行。不过我们通常认为美国第一家中央银行成立在10年之后，参见经济透视12.1中关于中央银行定义的讨论。

在成为美国财政部长之后不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撰写了一份关于国家银行的报告，在其中，他提议创立一个美国国家银行。汉密尔顿的报告中显示了他对合众国金融问题的深刻见解。他认为国家银行将会提升一国资本的活力或者说生产率。在这里，它是指银行发行的纸币能够替代流通中的金银，这些节省下来的金银则能够流动到海外，用于购买食物与服务。更进一步来说，货币存量将保持年度增长以适应商业活动的增加。如果存在一个发行货币的银行，美国就不需要在未来的时间内迫于增加货币存量的压力而增加出口。

对汉密尔顿本人同样重要的是，国家银行通过借钱给美国财政部的方式将对经济产生影响。另外，国家银行还能充当政府财政代理的角色，储存政府资金，并将资金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转移，国家银行还能成为收税代理。最后，政府和私人共同持有国家银行，因此还能够加强一个刚起步的国家与商业领袖（巨头）之

间的关系。①

汉密尔顿的报告出来不久，创立国家银行的法案很快就提出来了。这一法案遭到了很多反对，即使是在联邦主义者最多的国会也是这样。这些反对主要针对：(1) 法案违宪；(2) 法案会造成货币供给的垄断，会危及人们的权利与自由；(3) 这个法案可能对于偏重商业的北方各州有利，但是对于南方的农业州毫无益处。随后，部门对法案进行投票，华盛顿总统于 1791 年情人节签署了这一法案。国家银行的授权期限是 20 年，这一期限也引发了将来的争论。

COURTESY OF JP MORGAN CHASE

图中为美国第一银行发行的 10 美元票据，当它们破损以后，便会在其表面划上三四个×以表示取消使用。在任意银行网点这些票据可按要求迅速兑换为美元（很可能是墨西哥或者美国银元）。

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发行的票据很快以面值或者接近面值在全国范围内流通起来。② 换句话说，银行发行的 1 美元纸币就等于用白银表示的一美元。正如汉密尔顿所设想的，许多州立银行开始形成使用美国第一银行的票据或者存款作为储备从而节省白银的习惯。在当时，美国第一银行持有美国很大部分的白银，在美国第一银行存在的最后三年的时间里，其持有的白银很可能有将近 1 500万美元，大约是所有州立银行持有的白银的总和。

相对于州立银行而言，美国第一银行采取了一种比较保守的借贷政策。因此，美国第一银行接收到的其他州立银行的票据一直比州立银行接收到的美国第一银行的票据要多。换句话说，美国第一银行成为了各州立银行的债主（所有人），美国第一银行定期向各个州立银行兑现，因此有效抑制了州立银行随意发行各自票据的行为。

尽管不论是从法律还是传统上来说，美国第一银行都没有职责帮助其他银行，但是在实际运作中，美国第一银行（与英格兰银行一样，也是私人银行）成

① 联邦政府购买 1 000 万美元初始股本的 1/5，并用银行为维护自身股票安全而发放的 200 万美元贷款来支付；政府采用十年分期付款方式来偿还银行贷款。这样，在操作初期，政府不花一分钱便分享了私人融资企业的收益。

② 截至 1800 年，该银行在波士顿、纽约、巴尔的摩及查尔斯顿都建立了分支机构，1802 年又设立了华盛顿和萨凡纳的分行，1805 年设立了新奥尔良分行。

了最终贷款人。另外，美国第一银行也成为政府的财政代理，持有国库的主要存款，作为回报，美国第一银行免费将政府的资金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在1800年之后，美国第一银行在有分支机构的城市帮助收取海关公债，然后又通过支付政府公共债券利息的方式支持美国政府，为美国财政部提供外汇操作，为造币厂提供金块与外国货币。总之，可以说，在1811年国会拒绝再次继续授权时，美国第一银行正很好地朝着中央银行的路上发展。

回头看，支持美国第一银行继续运行的理由十分充分。在美国第一银行存续的20年间，美国经历了一个有序的信用扩张，此外，美国的货币币值稳定。与1791年之前的货币相比，18世纪90年代与19世纪初美国货币困难更加严重。美国第一银行给予了整个国家一个更好的货币体系，而这在1791年是想象不到的。

相比那些基于感情与偏见的观点，基于经济事实的政治主张往往少有成效。那些反对美国第一银行继续存在的人们提出的论点与20年前这个问题刚出现时提出的观点差不多：他们认为美国第一银行违宪，美国第一银行已经成为一个金融怪物，最终将会控制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剥夺人们的自由。除此之外，一条新出现的反对理由是，银行已经落入主要是英国人的外国人的控制之中。外国人的所有权占美国第一银行的70%，将近700万美元。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外国人持有相同比例的美国国债。实际上，美国第一银行的授权许可就是为了防止外国人对银行的政策施加太多影响，只有持有美国第一银行股份的美国公民才能成为银行主管，外国所有人不得通过其代理人进行投票表决。然而仍然有人认为英国持股人能够通过与他们有密切商业联系的银行主管对银行政策施加影响。

经济透视 12.1

中央银行

并不存在所有专家都一致认可的关于中央银行的精确定义，由此就不存在一家大银行转变成中央银行的确切的时间点。一般来说，当经济学家们在谈到中央银行时，他们的观念中有下列几个标准：(1) 中央银行是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的最后贷款人，中央银行通过在危机时期借款给其他银行和金融机构从而向它们提供帮助。这一做法有助于防止一些大型金融机构的倒闭，中央银行从而就能够防止人们对现金持有的恐慌。瓦尔特·巴杰特在他著名的作品《抵押贷款街》(Lombard Street) 中分析了中央银行的这一功能，在书中他敦促英国银行去宣布其作为最后贷款人的决定以及去获取与它的责任对等的黄金储备。巴杰特规则(Bagehot's rule) 就是指在金融危机期间，中央银行以很高的利息率自由地放贷(为了鼓励在危机之后的尽快还款)。(2) 中央银行必须对货币存量具有相当大的控制，并且利用这一控制去调整信贷上的、价格上的或是经济中的其他方面的波动。如果国家是以金属货币为本位，刚好这种情况是我们正在检验的，那么由于它自身的金属储备的风险，中央银行就不能随心所欲地发行太多的货币。(3) 中央银行监管其他的银行，惩罚那些不谨慎的银行。(4) 最后，我们就得到了中央

银行的现代定义：它借给政府大量的货币。

个人政治因素也是一个原因。在很多场合下，托马斯·杰斐逊都谈过他对美国第一银行的看法，他认为美国第一银行违宪，而且是对人们自由的一个威胁。尽管在美国第一银行出现续约问题时，杰弗逊已经不是总统，但是他的影响仍然十分巨大。很多他的追随者对美国第一银行的违宪问题没有怀疑，就是被他的观念所影响。不过最终出现的有关美国第一银行决定性的反对票是出于对艾伯特·加勒廷的个人敌对，艾伯特·加勒廷虽然在杰斐逊政府时期任财政部长，但他却是国家银行的支持者。在国会内，银行的重新授权许可因为投票结果为 65：64 而被无限延期。在参议院，同时是麦迪逊与加勒廷的反对者的副总统乔治·克林顿投了银行反对票，从而打破了 17：17 的僵局。

美国第二银行

1812 年战争债务以及 1814 年暂停货币兑现之后，随之而来的严重通货膨胀使得人们相信需要第二家国家银行。经过持续两年的国会对 6 个独立的提案的争论之后，准许经营的法案得以通过。最终美国第二银行在 1816 年获准经营，有效期还是 20 年，同样这个续约条款为日后的斗争设立了舞台。

美国第二银行的经营许可效仿美国第一银行。资本设为 3 500 万美元，其中五分之四被个人、企业和州政府认购，剩下的五分之一由联邦政府持有。美国第二银行资本的主要构成是政府债券，但是个人对其中四分之一债券的认购必须以金属货币支付。银行设 25 个执行主管，其中 20 个由个人股份持有者选出，另外的 5 个由总统任命。银行的主要办公地点设在费城，其他分支机构的办公地点由银行主管或者国会决定。

美国第二银行对美国最大的贡献是在 1823 年以后，1823 年尼古拉斯·比德尔被任命为第二银行的第三任行长。比德尔文雅，见多识广，受过良好教育，是典型的美国早期的贵族。他的财富、权力和智慧，使他能够经营这个国家最大的企业。他还很傲慢，没有畏惧，不想仅仅做一个普通公民。

在比德尔的领导下，根据事前设想好的，美国第二银行有意识地尝试采取一些对银行体系进行监管的措施。首先，第二银行成为各个州立银行的最后借款人，州银行不需要将它们的储备存在第二银行，但是当它们出现危机的时候，会求助于第二银行，并向其借取特别款项来履行其义务。第二银行之所以能够满足如此大的需求是因为它依靠发行的纸币而持有的货币储备比例比其他银行大得多。当其他银行没有能力或者不愿意借贷的时候，美国第二银行也会向处于困难中的企业贷款。因为美国第二银行的这些举措，很多人将其视为银行体系中的最终储备机构。

美国第二银行形成了一项政策，即定期向州银行兑现。通过将各州银行票据兑换为货币的方式，第二银行使各州银行稳健地发行货币。第二银行不仅形成

© CULVER PI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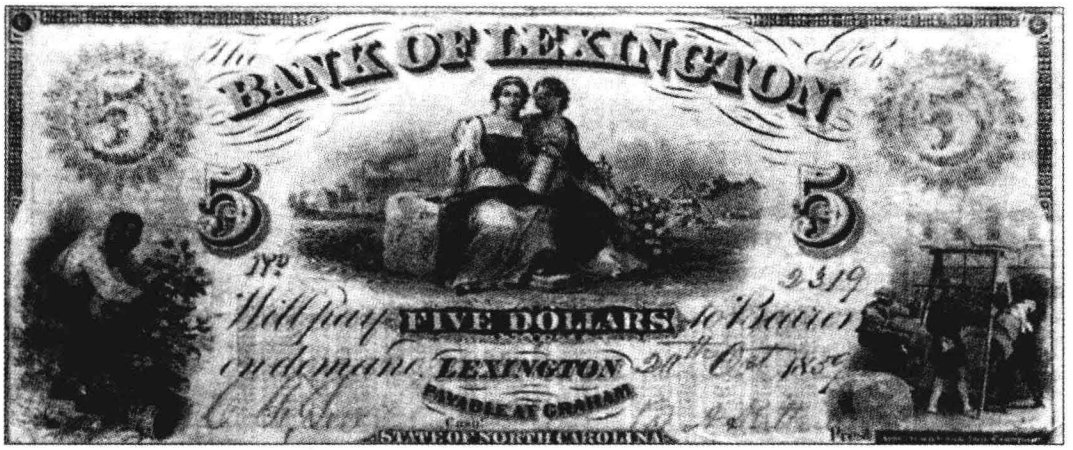
费城贵族尼古拉斯·比德尔（1780—1844），曾任美国第二银行行长，他提倡中央银行控制，是安德鲁·杰克逊的主要对手。一些人认为正是他的傲慢使银行未能延续执照；而其他人则相信无论如何华尔街都将取代切斯纳特街。

了全国范围内统一价值的货币，而且还消除了各州货币流通时要被收取的名义折扣率。到19世纪20年代末，美国的纸币处于一种令人满意的状态。比德尔试图通过调整银行贷款的扩张与收缩来影响美国的整体经济环境。更进一步，比德尔还使得第二银行成为美国最大的外汇交易银行，这样能够使国家避免遭受铸币流失的风险，铸币流失意味着一个不利的货币储备的紧缩。在19世纪20年代，远距离的支付已经和国与国之间的汇款一样。因此国内交易变成一个很繁荣的商业活动，第二银行占有很大比例的国内交易业务。

直到1829年，美国第二银行的地位看上去都很有保障，发展得很好而且很有前景。从很多方面来看，它已经成为一家中央银行。第二银行在海外享有盛誉，以至于当1829年西班牙银行改编的时候，它完全照搬了美国第二银行。尽管第二银行也有树敌，但是其国家机构的观点已被广泛接受，甚至是那些坚持认为它已经成为金融怪兽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第二银行有利于商业发展。国会也曾对第二银行进行零星的攻击，但收效甚微。然而，遗憾的是第二银行一直存在不过是种幻象。

1828年，安德鲁·杰克逊当选为总统。在他连任两届总统的时期内，由于深受人们爱戴，他获得了人们的全力支持。在他还没当选总统之前，杰克逊就决定要反对支持各种银行，尤其是美国第二银行。在田纳西州，当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曾经收到一个费城商人给他的票据，用以支付他的6 000英亩地。当他后来试图使用这些钱的时候，他发现这些票据一文不值，因为那个费城商人已经破产了。为了履行他自己的义务，杰克逊遭受了好几年的财务危机，同时还耗尽了自己的土地。后来，他与他的商业合伙人发现在奥尔良和东部城市，他们总是被银行家和票据经纪人收取高昂的费用。[①] 杰克逊曾经强力地反对在田纳西州

① Claude A. Campbell, *The Development of Banking in Tennessee* (self-published, 1932), 27 - 29.



© STEVEN LUNETTA. CURRENCY COURTESY OF R. E. WALLACE, FORT WORTH, TEXAS

图中是南北战争前一家私人银行发行的银行票据。当时像这样的票据如货币一般在民众手中流通。

新设立一家州立银行，到1826年的时候，他参与了反对废除自己所在州禁止设立美国银行的法律的活动。

在杰克逊给国会的第一次年度国情咨文里，此时距离第二银行经营许可到期还有七年，他就提醒大家第二银行经营许可的到期，“设立美国第二银行的合法性与权益性都受到大多数公民的质疑”，并且推测：

> 如果这样的一个机构被认为对政府的财政运作不可或缺，那么我将遵从立法机构的见地，即同意构建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建立在政府支持与自身利益之上的这样一个银行，但是这一机构可能并不能按其所设想的一样，在逃避宪法问题的同时却能保证国家与政府的利益。

经过他的顾问的修饰，我们听到了民主主义的伟大发言。这也是“银行战争”的开端。

比德尔起先尝试获得杰克逊对银行的支持，但是他的努力没有成功。亨利·克莱，一个受人欢迎的国民共和党（辉格党）的总统竞选人，最终说服比德尔让他在1832年的竞选中以银行的授权作为竞选议题。在夏季的时候，国会中还有足够多的人支持杰克逊强烈否决对银行再许可经营的提案，杰克逊总统声称：(1) 美国第二银行是违宪的；(2) 在第二银行的股权中外国人持有的比例过高；(3) 国内对第二银行的所有者过于集中在东部。这一发言的主题就是：银行是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这样一种工具有如此大的能力，但是却对人们不负有责任，这将最终会破坏民主，因此应当被废除。

西部与南部地区的农民认为银行的保守政策限制了对农业的信用供给。[①] 而此时，华尔街也反对第二银行的再经营许可，因为华尔街试图取代费城（美国第二银行总部所在地）成为国家金融中心。

---

① 西部和南部人民坚定地认为利率异常高且政府应该有所举措，这种信念一直萦绕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我们在第19章会提到，在民粹主义时代，这种思想再次盛行。而实际上，直至今天政治家们仍在催生这个问题。

COLLECTION OF THE NEW-YORK HISTORICAL SOCIETY, NEG #42459

在这幅漫画中，安德鲁·杰克逊（左）用他的手杖（他的否决权）对多头蛇（美国第二银行）展开攻击。其中最大的头是银行行长尼古拉斯·比德尔；剩余的头代表银行及分支机构的其他官员。杰克逊得到了马丁·范布伦（中间）的协助。

经过激烈的竞选之后，杰克逊以较大幅度胜出并当选为总统。他本人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选民在银行问题上对他的支持，他广受欢迎是因为他对废除第二银行的巧妙处理，这些都加强了他立即对银行进行约束的决心。[①] 1833 年秋，政府不再将联邦存款存放在第二银行。《波士顿邮报》的编辑格林深受触动，为第二银行写下墓志铭《比德尔，被骗了，完了》。

但是比德尔并没有认输。从 1833 年 8 月初至 1834 年秋，第二银行紧缩信贷，持续将其手中的州立银行的票据拿去兑现。比德尔认为这样为银行的流动性做准备很有必要，尽管毫无疑问的是，这种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报复动机。但是不管怎样，他的行动造成了 1834 年的短暂而确定的信用紧缩。

而政府当局仍然保有终止第二银行的经营许可的坚定决心，美国第二银行在 1836 年按照宾夕法尼亚州的立法转变成为一家州立银行。尽管被剥夺了官方地位，但是宾夕法尼亚美国银行仍然是全美最强大的金融机构。在 1837—1838 年的经济

① 废止的原则于 1828 年由 John C. Calhoun 阐明，任何一州如果认为联邦规约有失公允，都有权拒绝，直至四分之三的州认可该约束。南卡罗来纳州曾于 1832—1833 年的关税法案争议期间尝试实行这项原则，但最终未能抵过杰克逊的反对。

波动下，除了他的资源外，比德尔构思了一个宏大的计划，以用来支持棉花以及其他主要农产品的价格。换句话说，比德尔将银行赌在农产品价格会上涨这一基础之上。如果农产品价格真的上涨，那么银行将会挣得一大笔钱，农民会认为银行增加了农业收入，比德尔自己也将成为一个大英雄。但是这个最后的奋力一搏引起一系列复杂的后果，最后在1841年，即比德尔退休两年之后，银行破产了。

经济波动和美国第二银行

在比德尔执掌美国第二银行的早期，经济沿着相对平坦的道路前进，没有大的衰退也没有较大的通胀。可以在图12—1中看到，19世纪20年代，因为经济中流通的金属货币总体上大致不变，货币缓慢上升，因此价格水平下滑。毫无疑问，货币存量的增长没有赶上商品交易增长中需要的货币增长。

随后，新的情形开始：19世纪30年代中期产生了第一次通货膨胀，在1839年到1843年期间产生了大衰退。历史学家曾一度将这些经济波动归咎于第二银行的消亡。这种观点认为，第二银行的消亡降低了对很多不负责的银行的约束，货币供应量增加和价格水平上升被认为是一个直接结果，而19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崩溃和19世纪40年代初期的萧条是此前过激行为的必然结果。位于图12—1上端的两条线似乎支持这一论点：即货币存量（记住，这包括纸币、硬币以及存款）大幅上涨，价格也一样上涨。

在杰克逊总统否决了第二银行的再经营许可后不久，他将联邦存款转出了第二银行然后存放到了所谓“宠物银行”（pet banks）的一些州银行中。据称，随着比德尔对各州银行兑现的行为渐渐退却之后，许多银行开始不顾后果地增加它们的纸币发行量。只关心快速致富的银行所有者形成了新银行。这些声名狼藉的银行被称为“野猫银行”（wildcat banks），这一名字很贴切。这一词的起源有点模糊。有一个故事，大概是说这些银行设立在一个叫猫村的偏远地区，以防止人们兑现。

但是乔治·麦克思奇和彼得·特明后来的研究表明，通胀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可以归咎于杰克逊对第二银行的攻击。必须清楚，美国当时仍然受到外界事件的很大影响。巧合的是，在第二银行消亡的时候，墨西哥正经历政治和经济动荡，美国开始接受大量墨西哥的白银。从英国和法国以各种方式流向美国的资本提高了美国此时的货币金属存量。此外，一个稳定的流向中国的货币资本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幅下跌。从历史上看，中国过去的国际收支盈余消失，同时，中国商人也开始接受票据支付，而不是要求真金白银支付。①

从图12—1中可以看到，货币存量在1833—1837年迅速增长。由于银行能发行的纸币主要受到它们自己的储备限制，随着货币金属供应的增加，纸币与存款也慢慢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流入的货币金属解释了货币与价格水平的上涨。

① 中国对外贸的封锁，尤其是对鸦片贸易的抵制，最终导致了中英鸦片战争（1839—1842）。

纸币和银行存款之和与货币金属之比实际上的增加并不多。换句话说，即使在杰克逊否决了第二银行继续经营之后，在19世纪30年代期间，银行部门也没有不负责的行为。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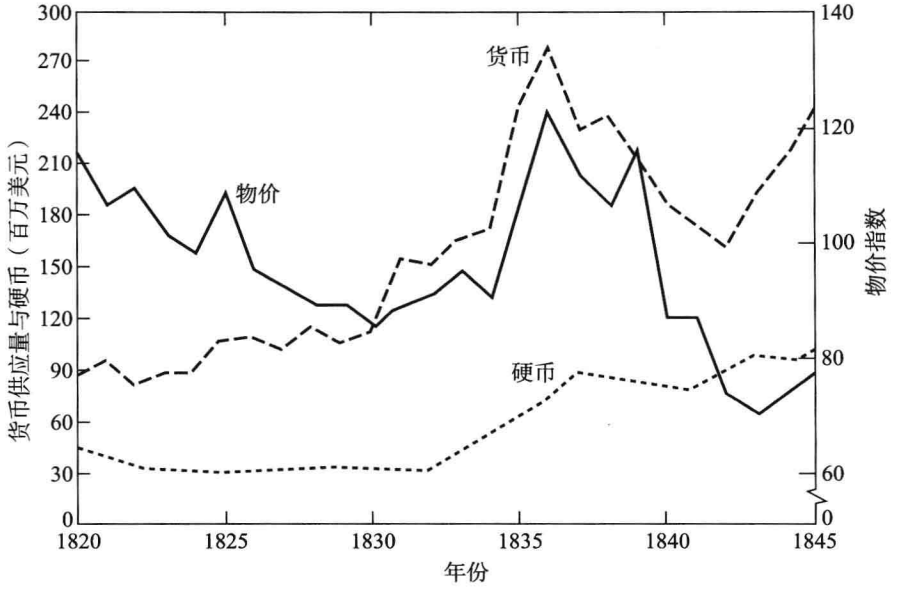


图 12—1　1820—1845 年美国物价、货币以及硬币

资料来源：Hugh Rockoff，"Money，Prices，and Banks in the Jacksonian Era，"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New York：Harper & Row，1971），Table 1，45.

这个插曲表明，有时候可能事实表面上支持一种解释，但是经过完整的分析之后可能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在杰克逊执政期内，将通胀归咎于杰克逊很自然，但是通胀的真正源泉则完全不同。这样我们又一次回到第5个经济推理命题，证据很重要。进一步的解释见经济透视12.2。

尽管杰克逊对第二银行的攻击并不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但是这确确实实以其他的方式影响了经济。在整个比德尔执掌第二银行的19世纪20年代以及19世纪30年代初期，由于第二银行的领导以及健全的银行措施，人们对银行的信任逐渐增加。因此，人们手中持有的金属货币比例逐渐下降。② 人们对纸币的信心在19世纪20年代以及19世纪30年代初期达到最高点。但事情起了变化首先就是由于杰克逊在1832年对第二银行的否决。随后是1836年使用金属通货的公告，公告要求大部分联邦土地的购买必须用金属货币进行支付。随着价格水平上涨以及人们对纸币的信心减弱，越来越多的人去银行将纸币换回金银货币。当大量的票据持有人试图这样做时，银行没有办法进行兑付，于是就发生银行恐慌。（强有力的第二银行通过作为最后贷款人，有可能防止人们的恐慌。）结果就是

① 关于银行战的佐证与重释，参见 Peter Temin，*The Jacksonian Economy*（New York：Norton，1969），71。

② 同上，159页。

1837 年暂时的大幅衰退，最后演化成为 19 世纪最糟糕的衰退，一直从 1839 年持续到了 1843 年。[①]

经济透视 12.2

休谟的价格货币流动机制

依据休谟的价格货币流动机制（以 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的名字命名），我们的陈述是有道理的。

一国货币存量的突然增加将提高那个国家相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价格，但是它接着将启动最终恢复最初均衡的力量。当价格上升时进口相对于出口将上升，因为进口品变得相对便宜而出口品变得相对昂贵，硬币将流向世界其他地方。硬币的流失将降低货币存量和价格，这一过程将继续直到价格回落到与世界贸易均衡一致的水平。

自从休谟的时代，经济学家开发出了许多限定条件和替代方法来证实他的预测。比如，国际收支平衡的货币数量论的支持者认为，国际贸易商品的价格通过商品套利（在商品便宜的地方购买，在商品昂贵的地方卖出）能够一直保持均衡。他们企望通过在实行复本位制的国家普遍的通货膨胀来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做出解释。他们预期在通货膨胀期间货币存量增加，只是因为更高的价格水平要求更大的货币存量。

新理论迫使历史学家去考察可能被忽视了的信息（这里，指的是世界价格水平以及货币和价格变化之间的滞后）。同时，对历史事件的考察能够帮助经济学家选择并改善他们的理论。

规范州立银行的尝试

在南北战争之前各个州建立起来的银行体系简直令人吃惊。有些州禁止设立银行，有的州允许不收费的银行，这个清单可以开得很长很长。由于体系众多，经济学家被吸引到这个时代，研究哪些银行体系运行良好以及哪些银行体系运行糟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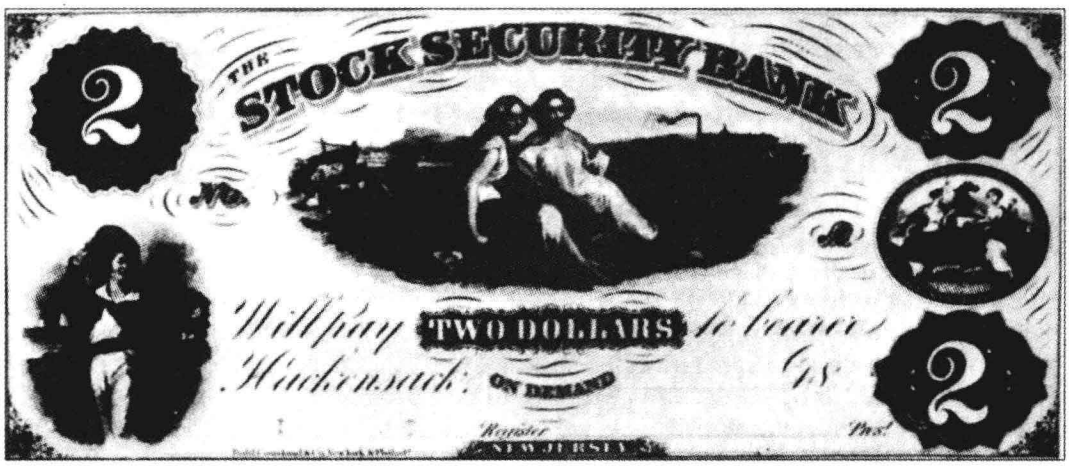
萨福克银行制度和《安全基金法》

乡村银行发行的纸币在波士顿广泛流通。在 1824 年，波士顿的 6 家银行和

① 另外，英格兰银行由于金属货币向美国源源不断地外流而于 1837 年开始回笼货币（销售债券）。

波士顿萨福克银行联合创建了一个银行体系，通过其持有的大量纸币向乡村银行兑现，使得乡村银行提高货币金属储备。不久之后，乡村银行同意将存款保存在萨福克银行，萨福克银行也逐渐发展成第一家为偏远地区的银行发行的货币进行结算的机构。

这些乡村银行在萨福克银行的存款是没有成本的资金来源，使得萨福克银行成为美国最盈利的银行之一。另外的六家波士顿银行通过它们在萨福克银行里持有的股权来分享利润，所以这一安排并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的做法。然而实际上，这一安排的结果却使得银行纸币的折扣普遍下跌。到 1825 年，乡村银行的纸币能以面值在萨福克银行体系里流通和兑付。因此，“新英格兰”地区分享了一个统一的货币。



© STEVEN LUNETTA. CURRENCY COURTESY OF R. E. WALLACE, FORT WORTH, TEXAS

图中为由新泽西的一家自由银行所发行的一张票据。这家银行的名称强调了一点，即其票据受到了政府债券的支持。

一直到 1858 年，萨福克银行都作为新英格兰地区的货币结算中心，波士顿的一些对萨福克银行的专营政策不满意的新成立的银行与其他乡村银行组成了一个与之竞争的机构。不久之后，国家银行立法在取消了州银行纸币的同时也就取消了对这种地区性制度的需要，但萨福克银行这一组织形式是现在对美联储成员银行设立存款准备金要求这种做法的前身。

除了某些个体的对银行进行监管的行为之外，在 1827 年，纽约州呼吁对银行进行监管。为了加强对存款人和票据持有人的保护，纽约州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银行股东要承担自己持有股票价值两倍的债务。1827 年，纽约通过了《安全基金法》(Safety-Fund Act)，要求新设立的银行和那些被获准继续经营的银行将自己资本的 3%投入一个共同基金，当银行出现问题，这一基金将作为储备使用。第一个州存款保险计划在 1837 年的银行恐慌中失败，但其他人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尝试。州存款保险计划虽然总体来说一直不成功，但却是 20 世纪 30 年代发起的联邦存款保险的前身。

自由银行制

在银行所经历过的尝试中，最重要的是自由银行法。1838 年纽约议会通过了第一部这样的法律。实际上，在从最初鼓动纽约体系直到这一法律的最终通过的时期内，密歇根州的一项法令也提供了类似计划，但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主要是来自纽约的法律规定。“自由”这一形容词表明了该法律最重要的内容。在该法条的规定下，任何个人或组织在遵守相关法规的情况下，都可以开设新银行。根据旧规则，必须在一个特殊的立法赋予的前提下，个人或组织才具有开设银行的权利。银行业竞争的增加保证了银行服务的改善，减少了立法腐败。

为了保护票据持有者，有时也是为了增进国家的信用，自由银行法通过州银行管理机构要求银行储存债券，通常是联邦债券或在该银行所在州发行的债券。如果银行拒绝将纸币兑换为硬通货，货币持有人可以向州银行管理机构提出抗议，而银行管理机构将出售该银行的债券并向其兑现所有纸币。关于银行储存债券的数量与类型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一体系的成败息息相关。如果规则对每一种发行的票据要求过多的债券储备，那么几乎不会有新银行的成立。如果债券储备要求过低，那么新设立的银行很可能成为野猫银行。如果对于债券储备的要求既能保护票据持有人，同时又允许银行具有合理的利润，那么该系统就能有效运作。

拿纽约这个最重要的例子来说，自由银行法很成功。这一规则迅速流传开来，很少有失败的例子。实际上，纽约与俄亥俄州的自由银行体系很有可能是美国内战时期全国银行效仿的典范。不过密歇根 1837 年的银行自由法则促成了很有名的野猫银行的出现。尽管具有包括安全基金这一明显的安全措施，但密歇根自由银行法案允许银行用不确定的证券对纸币进行赎回。

根据密歇根自由银行法案的规定，一个银行想营业的话，它只需要出示其手上拥有的硬通货即可。银行企业家在欺骗检察人员方面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而且因为银行危机，现货付款在全国范围内被停止，所以这些准野猫银行家们根本就不用害怕即刻的资金回撤。两名银行委员会委员注意到多家银行清查单上金库中的硬通货惊人地相似，后来发现在他们从一家银行赶往另一家银行时，有一辆由快马拉的雪橇总是在他们之前先到。他们说，硬通货以魔术般的速度在密歇根州飞来飞去。在 1840 年以前，几乎所有基于这样方式运行的银行都破产消失了，不幸的是，它们不是在受害的大众无法处理他们手上不值钱的通货之前破产消失的。

福斯塔尔银行制度

一般来说，一个健全的银行体系往往产生于一个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州。1842 年路易斯安那州设立的福斯塔尔银行制度成为健全与保守银行的典型并非

偶然。作为仅次于纽约的第二大港口，路易斯安那州与生产力发达的内陆与世界其他地区都有经济联系。

路易斯安那州关于银行的法律最显著的特点是，它要求银行保持与其持有的票据与存款负债的三分之一数额相对等的金属货币储备。在1863年之前，一些州开始要求对票据进行实物储备，比例从5%到33%不等。但路易斯安那州和马萨诸塞州是例外，这两个州不要求针对存款的储备。存款和银行票据就是货币的这一看法还没有被普遍认可。一部分是福斯塔尔制度本身的原因，新奥尔良银行因为其稳定性而获得了当之无愧的声誉，他们的票据广泛流通。一种可能的猜测是，南方被称为迪克西之地就是因为新奥尔良银行所发行的10美元面值的货币的背面有法语dix（10）的字样。

到此为止我们讨论的金融动荡都是政客和商人的结果。但是从1848年开始的金融动荡有一个非常不同的原因。

淘金热的经济后果

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不久世界各地的男人（几乎没有妇女）都涌向加利福尼亚（Holiday，1999）。最初，淘金的方法很简单。金子首先在河床被发现，挖出沙砾来然后在平底锅里洗干净；较重的黄金留下来了，而较轻的部分被冲走。如果说没有黄金，那么就说沙砾没有洗出黄金。随后矿工们开始建造可以洗涤更大量沙砾的机器。此外他们还意识到，更大的金矿还隐藏在他们所工作的地区的溪流交错的山间。但是，主矿脉到底在哪里呢？主矿脉被发现之后，常规开采就开始了。

因为黄金是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来自加州的黄金（以及不久之后在澳大利亚发现的金矿）增加了世界的货币供给。表12—1显示了黄金增加给美国带来的结果。美国的货币存量指数从1849年的100上升到1856年的182的最高值，将近8.5%的年度增长率。[①] 如表12—1中第4栏的GDP所示，其结果就是出现一个长期的经济繁荣，如表中第4栏所示，这一时期的价格水平大幅上升。

表12—1　　1849—1859年货币、收入和物价指数

年份	货币	GDP	商品价格	所有农产品价格	化学和药品价格
1849	100	100	100	100	100
1850	120	113	112	115	101
1851	129	114	101	115	101
1852	143	120	107	124	103

① 实值除以1849年的实值并乘以100。

续前表

年份	货币	GDP	商品价格	所有农产品价格	化学和药品价格
1853	160	135	118	134	111
1854	161	148	132	150	114
1855	169	161	134	158	117
1856	182	168	128	135	116
1857	151	181	135	153	113
1858	173	163	113	123	111
1859	179	174	116	132	111

资料来源：货币：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Table 14, column 3, 232。GDP: Thomas Senior Berry,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since 1789* (Richmond: Bostwick, 1988), Table 9, 26。这里给出的数字实际是GNP。理论上GNP和GDP的区别是GNP包括在海外的美国人的收入而不包括外国人在美国的收入。在这一时期，这一区别是如此之小以致难以度量。价格：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series E52 (all commodities), E53 (farm products), and E60 (chemicals and drugs)。

我们怎么能确定是货币存量的上升导致了通货膨胀而不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呢？我们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相关关系并不代表因果关系。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采用一个“自然实验”方法。我们知道这一时期美国货币存量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发现加州金矿这一幸运因素。不论随后的通货膨胀是碰巧发生的，还是由货币存量的增加导致的，通货膨胀都不会导致黄金数量的增加。参见经济推理命题5。

在通货膨胀期间不是所有的物价水平都以相同的速度上涨。表12—1最后两栏给出一个例子，相比化学品与药品价格的增长，农产品价格上涨更快更高。到了1855年，与化学品与药品的价格以17%的速度增长相比，农产品的价格上涨了58%；化学品与药品价格的增长速度比农产品价格的增长速度慢了41%。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各自市场中具体的因素可能会影响相对价格：当我们讨论相对价格时，好收成与坏收成、科技进步和消费者偏好的改变等等诸如此类的一些因素都必须加入我们所考虑的情形之中。货币扩张可能也在发生作用。可能正如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所认为的，在一个比如农业这样竞争更为激烈的市场中，其产品的价格对货币扩张做出更快的反应。

这个长期的货币扩张在1857年危机的时候结束，这可以很明显地从表12—1中货币与（一年之后的）价格的突然下降中看出。这场危机似乎像一个晴天霹

雳。俄亥俄州人寿保险与信托公司这样一家大力投资于西部铁路债券并因其稳健投资而享有良好声誉的大银行（尽管起源于俄亥俄州，其主要机构位于纽约）的破产震惊了金融界。人们对银行的不信任开始蔓延。不久，银行出于保护自己这一目的，取消贷款并拒绝提供新的贷款。其结果是经济的大幅衰退，并且失业率上升，纽约还经历了面包暴动。除此之外，这场危机还加剧了国家将出现分裂的紧张局势。在北方，新成立的共和党认为这场危机还表明了传统的政党不知道如何管理经济。在南方，主张分裂国家的人认为，危机对南方的温和影响说明了棉花为王，如果没有北方的话南方的经济将会发展得更好。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dams, Donald R. "The Role of Bank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Old Northwest." In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The Old Northwest*, eds.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Bodenhorn, Howard. "Capital Mobility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585 - 610.

——. *A History of Banking in Antebellum America: Financial Marke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n Era of Nation-building*.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Bodenhorn, Howard, and Hugh Rockoff. "Regional Interest Rat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 eds.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159 - 187.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Bordo, Michael,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y and Pri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 Old Debate Rejoine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61 - 67.

Calomiris, Charles W., and Charles M. Kahn. "The Efficiency of Self-regulated Payments Systems: Learning from the Suffolk System."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8 (1996): 766 - 797.

Calomiris, Charles W, . and Larry Schweikart. "The Panic of 1857: Origins, Transmission, and Contain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991): 807 - 834.

Catterall, Ralph.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3

Davis, Lance E., and Jonathan R. T. Hughes. "A Dollar-Sterling Exchange 1803—189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13 (August 1960).

Engerman, Stanley. "A Not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8(July/August 1970): 725 - 728.

Fenstermaker, J. Van.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n Commercial Banking, 1782—1837*. Kent, 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5.

Ferguson, E. James. *The Power of the Purse: A History of American Public Finance, 1776—1790*.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1.

Fraas, Arthur.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An Instrument for an Interregional Monetary Un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1974): 447 - 467.

Gorton, Gary. "Reputation Formation in Early Bank Note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4 (1996): 346 - 397.

——. "Pricing Free Bank Not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44 (1999): 33 - 64.

Green, George D. "The Louisiana Bank Act of 1842: Policy Making During Financial Cri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7 (Summer 1970): 399 - 412.

Greenfield, Robert L. and Hugh Rockoff. "Gresham's Law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7 (November 1995): 1086 - 1098.

Hammond, Bray. *Bank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from the Revolution to the Civil Wa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Holiday, J. S. *Rush for Riches: Gold Fever and the Making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Kahn, James A. "Another Look at Free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881 - 885.

Knodell, Jane. "The Demise of Central Banking and the Domestic Exchanges: Evidence from Antebellum Ohio."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1998): 714 - 730.

Macesich, George. "Sources of Monetary Disturbances in the U. S., 1834—184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0 (1960): 407 - 434.

Martin, David A. "1853: The End of Bimetal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825 - 844.

——. "The Changing Role of Foreign Money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2—185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1009 - 1027.

Museum of American Financial History at http://www. financialhistory. org/.

Neu, Irene D. "Edmund Jean Forstall and Louisiana Bank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7 (Summer 1970): 383 - 398.

Ng, Kenneth. "Free Banking Laws and Barriers to Entry in Banking, 1838—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877 - 889.

North, Douglass C. *The Economic Grow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New York: Norton, 1961.

Olmstead, Alan L. "Investment Constraints and New York City Mutual Savings Bank Financing of Antelbellum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811 - 840.

Redlich, Fritz. *The Molding of American Banking: Men and Ideas*. 2 Vols. New

York: Hafner, 1947 and 1951.

Rockoff, Hugh T. "Money, Prices and Banks in the Jacksonian Era." Chapter 33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 W.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The Free Banking Era: A Reexamination*. New York: Arno, 1975.

——. "Banking and Finance, 1789—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43 - 684.

Rolnick, Arthur J., and Warren E. Weber. "New Evidence on the Free Banking Er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1983): 1080 - 1091.

——. "The Causes of Free Bank Failures: A Detailed Examination of the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4 (1984): 267 - 291.

——. "Gresham's Law or Gresham's Fallac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February 1986): 185 - 199.

——. "Explaining the Demand for Free Bank Note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1 (1988): 47 - 71.

Scheiber, Harry N. "The Pet Banks in Jacksonian Politics and Finance, 1833—1841." *Journal ofEconomic History* 33 (1963): 196 - 214.

Selgin, George. "Salvaging Gresham's Law: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Illegal."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 Banking* 28 (1996): 637 - 649.

Smith, Walter B., and Arthur H. Cole. *Fluctuations in American Business 1790—186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5.

Sylla, Richard. "Early American Bank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rporate Form." *Business and Economic History* 14 (1985): 105 - 123.

Sylla, Richard, John B. Legler, and John J. Wallis. "Banks and State Public Finance in the New Republic: The United States, 179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1987)*: 391 - 404.

Taylor, George R., ed. *Jackson and Biddle: The struggle over the Second Bank of the United States*. Boston: Heath, 1949.

Temin, Peter. *The Jacksonian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69.

——. "The Anglo-American Business Cycle, 1820—186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7 (May 1974): 207 - 221.

Timberlake, Richard H., Jr. *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Trescott, Paul B. *Financing American Enterprise: The Story of Commercial Banking*.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3.

Willett, Thomas D. "International Specie Flows and American Monetary St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1968): 28 - 50.

第 13 章　奴隶制的保卫和地区冲突

本章主题

作为一种经济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奴隶制度，几千年来在任何地方，人们从法律上和道德上都接受了它。然而，一旦废奴主义的力量发挥了作用，大约从1776 年到 1888 年之间存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奴隶制度在美洲垮台了。首先出现在加勒比地区，然后是整个南美地区，屈服于废奴主义者的观点和压力的政治家们给予了奴隶自由。然而在美国南部，基于种族的奴隶制度在美国内战前的年代里却越来越牢固。对奴隶的投资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奴隶的生产率和种植园效率也高，并且主导了南方政治的富有的种植园主们非常清楚，如果废奴主义者的目的达到了，对他们而言，将意味着财富的损失。随着国家紧锣密鼓的西进运动，废奴主义者的道德目标与南方经济利益之间的冲突一直在持续着，一直要等到双方的军事力量在战场上解决这一问题。

西半球的非洲奴隶

在 19 世纪 60 年代，非洲的奴隶贸易结束了，这意味着三个半世纪的对将近

1 000 万非洲人跨越大西洋的强制移民的结束。整体来看，他们主要的经济活动是生产蔗糖。如图 13—1 所示，大部分奴隶被运往巴西（36%）和加勒比海海域（40%），这些地区的经济都是以蔗糖生产为基础的。美国只是获得了跨越大西洋的奴隶总数的 6%。到了 1825 年，奴隶的分布情况与他们刚到达美洲时的情况显著不同。图 13—2 揭示了这一点。在 1825 年，美国是拥有奴隶最多的国家，拥有西半球奴隶总数的 36%。在人口自然增长率上的差别是，在很长时期内巴西和加勒比地区的人口自然增长率是负的，而在美国却很高，这一差别导致了明显的人口统计方面的调整。虽然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中扮演着次要的角色，但美国最终却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中激烈反对废除奴隶的堡垒。这一反对几乎全部发生在美国南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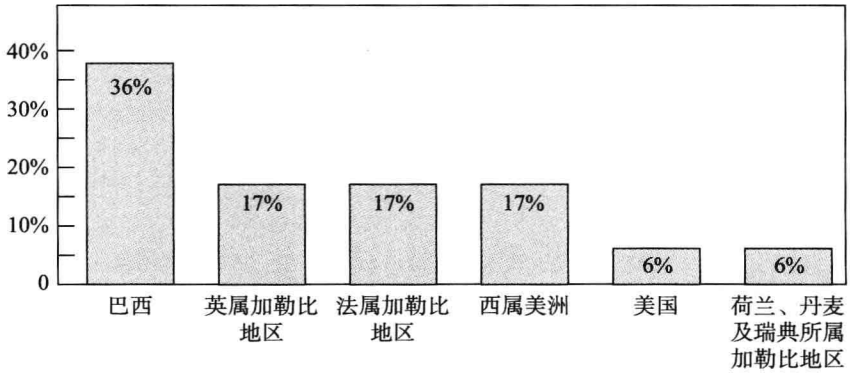


图 13—1　1500—1870 年被带往新大陆的奴隶的分配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14. © 1974 by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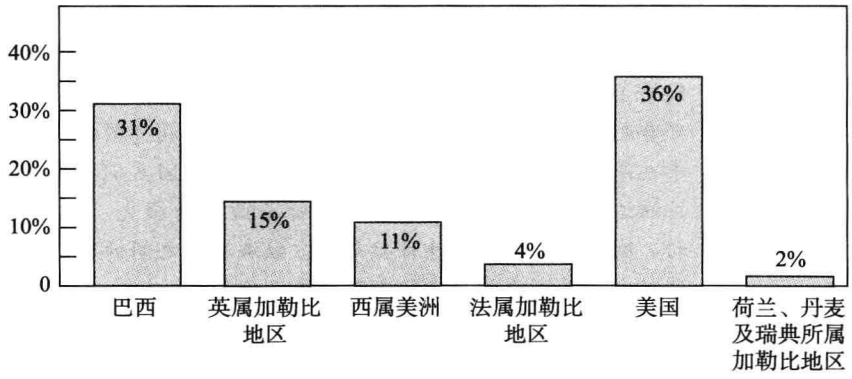


图 13—2　1825 年西半球奴隶数量分布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28. © 1974 by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至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感到吃惊的是美洲的奴隶制度垮台得如此快。几千年来，政治家们、哲学家们、神学家们以及作家们已经不加批评地将奴隶制的合法性和有用性接受为经济和社会组织的一种“因古老而受尊敬的”形式。教皇、女王以及公众都乐意接受它。早期反对它的活动都遭到了奚落，诸如田纳西的日耳曼教贵格派成员（兄弟会），他们在1688年谴责奴隶制度违背了金本位。一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推动公众认同废除奴隶制度这一观点的行动，那一年费城的贵格派谴责了奴隶贸易以及拥有奴隶。兄弟会中的成员一旦违背，将会被排除出兄弟会。

在大西洋的另一边，英国兄弟会在1774年进行投票，驱逐任何从事奴隶贸易的成员。正如表13—1所示，一年以后奴隶制度在马德拉被废除；废奴运动不断升温并且四处蔓延，一直到美洲的最后一个奴隶制度的堡垒——巴西，它在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度。

表13—1　　解放奴隶的年代，1772—1888年

1772	英国高等法院的王座庭庭长曼斯菲尔德判决认为奴隶制不受英国法律支持，从而为解放英国的15 000名奴隶奠定了法律基础。
1774	英国基督教公谊会投票同意开除任何从事奴隶贸易的成员。
1775	马德拉废除奴隶制。
1776	英国和宾夕法尼亚的公谊会要求成员们释放他们的奴隶，否则将面临被开除。
1777	佛蒙特州宪法禁止奴隶制。
1780	马萨诸塞州宪法声明：所有人生而自由平等；1783年一个法院判决将这一条款诠释为禁止奴隶制的一股力量。宾夕法尼亚采取了一项逐步解放奴隶的政策，即所有在1780年11月1日之后出生的奴隶的孩子，在他们20岁生日那天都将获得自由。
1784	罗得岛和康涅狄格州通过了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
1787	英国成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
1794	法国国民公会在所有法国领土内废除奴隶制；但这项法律在1802年遭到拿破仑撤销。
1799	纽约州通过逐步解放奴隶的法律。
1800	美国公民被禁止出口奴隶。
1804	海地废除奴隶制。 新泽西州采取逐步解放奴隶的政策。
1807	英国和美国禁止从事国际奴隶贸易活动。
1813	阿根廷采取逐步解放奴隶的政策。
1814	哥伦比亚开始实行逐步解放奴隶的政策。
1820	英国开始使用海军力量以查禁奴隶贸易。

续前表

1823	智利废除奴隶制。
1824	中美洲废除奴隶制。
1829	墨西哥废除奴隶制。
1831	玻利维亚废除奴隶制。
1838	所有英国殖民地废除奴隶制。
1841	《五方条约》(The Quintuple Treaty) 签署，英国、法国、俄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同意在公海可相互检查船只，以查禁奴隶贸易。
1842	乌拉圭废除奴隶制。
1848	所有法国和丹麦殖民地废除奴隶制。
1851	厄瓜多尔废除奴隶制。 巴西终止奴隶贸易。
1854	秘鲁和委内瑞拉废除奴隶制。
1862	古巴终止奴隶贸易。
1863	所有荷兰殖民地废除奴隶制。
1865	随着《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的通过和南北战争的结束，美国废除奴隶制。
1871	巴西开始逐步解放奴隶。
1873	波多黎各废除奴隶制。
1886	古巴废除奴隶制。
1888	巴西废除奴隶制。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Slavery*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33 - 34. © 1974 by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Used by permission of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美国对奴隶制度的最初约束

在 1780 年，在美国被奴役的人口总计将近 575 000 人。这些人中的 9%居住在切萨皮克的北边；其余的居住在美国南方。作为最大的宪法妥协的一部分，在 1787 年国父们允许奴隶制度的继续存在但并不允许在 20 年以后输入奴隶。（因此在 1807 年，国会禁止对外奴隶贸易，在随后生效。）也是在 1787 年，《西北土地法令》禁止在西北地区存在奴隶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对奴隶制度的争论和讨

论，从时间上来说，导致同样的时间范围内在国会内以及在法令中对奴隶制度的限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度在美国的发展是有局限性的并且受到地区性的限制。当然，走私的载人船舱并不常见，而且多种估计表明了在 1860 年之前，至多只有 25 万名黑人被非法输入美国。但是，非法的人口输入对于已经受到束缚的人口的总体数量而言，仅具有很小的增加，并且到了 1860 年，外国出生的黑人仅占被奴役人口的一个非常小的比例。实际上，大多数黑人是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美国人。正如我们早就提到过的，在 1800—1860 年间平均每年 2.4% 人口扩张的自然化来源，在奴隶数量的增加中起主导作用。在 1863 年，奴隶数量几乎达到了 400 万人——他们全部居住在美国南部。

讨价还价下的北部黑奴解放

甚至在宪法的起草之前，有些州在取消奴隶制上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在 1777 年至 1804 年之间，东北的八个州各自通过旨在解放它们的奴隶人口的法案。在佛蒙特、马萨诸塞以及新罕布什尔，含糊不清的宪法条文使得必须在法庭里面对面地进行奴隶的解放。不幸的是，很少有人能知道这一过程的结果意味着什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三个州定居的黑人只占北部黑人的一个非常小的部分——在 1780 年，也许只占 10%～15%。正如表 13—2 所示，宾夕法尼亚、罗得岛、康涅狄格、纽约和新泽西各自通过了解放奴隶的法律，正好在禁止奴隶输入之前。在这些州所采用的解放奴隶的过程是渐进的，而且现有的奴隶人口并没有获得自由。实际上，对于刚出生的奴隶而言，他们在成年后才能获得解放（并且被认为是“自由新生”）。

解放奴隶的形式说明了很多——也许是大多数——政治上占主导地位的人更关心的是奴隶制度方面的政治问题而不是奴隶本身。除了并没有解放现有的奴隶，在任何一个州里都没有什么机构去执行这些法令。另外，法令本身包含重大的漏洞，比如把奴隶卖往南方的可能性。

然而，在奴隶解放的过程中确实也意识到了财产权和成本的问题。这些“渐进解放规划”对纳税人没有增加任何成本，而且奴隶拥有人不能因为他们的奴隶被解放了就能直接获得经济上的补偿。但是足够令人称奇的是，通过奴隶拥有人保持对“自由新生”奴隶的奴役一直到他们支付给奴隶拥有人抚养成本这一手段，所有人几乎间接地得到全部的补偿。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当奴隶们到了 25 岁前后他们才成为自由身。在出生后的前几年内，一个奴隶的存活成本取决于超过他或她的服务（或产出）价值的部分。在将近 10 岁的时候，奴隶的年产出的价值通常能刚好与食物、衣物和住房的成本相匹配。因此，产出的价值超过了年度存活成本，并且一切正常的话，到了 25 岁或 26 岁的时候，奴隶已经充分地补偿了奴隶拥有人。

表 13—2　　北方为出生自由而进行的奴隶解放

州	法律颁布日期	获得自由的年龄	
		男性	女性
宾夕法尼亚	1780[a]	28	28
罗得岛	1784[b]	21	18
康涅狄格	1784[c]	25	25
纽约	1799[d]	28	25
新泽西	1804[e]	25	21

a. 宾夕法尼亚州在最后一次统计中没有任何奴隶的年份是在 1840 年。

b. 废除所有奴隶制是在 1842 年。

c. 1797 年将获得自由的年龄改为 21 岁。1848 年，废除所有奴隶制。

d. 1817 年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截至 1827 年 7 月 4 日，释放所有奴隶。

e. 1846 年，所有奴隶获得解放，但对于奴隶的小孩来说学徒制度仍然存在，并被推广到已获得自由的奴隶。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Philanthropy at Bargain Prices: Notes on the Economics of Gradual Emancipation,"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3 (2), (June 1974): 341.

因此，奴隶自身承受了几乎所有的北方奴隶解放的成本。最终获得自由身的新生奴隶们的抚养成本充分地补偿了他们的所有人。在法律生效之前出生的男性奴隶的所有人没有遭遇财富损失。在法律生效之前出生的女性奴隶的所有人以及那些能够或最后将生育的女性奴隶的所有人招致了一些轻微的财产损失，因为他们损失了他们奴隶的后代的价值。大约年轻女性奴隶价值的 10%在于她们后代的价值，而且也许在全体被奴役人口中有多达 30%的正处于生育期以及前生育期的女性。[①] 结果是，由于遵守这些法令，北方的奴隶所有人仅仅损失了全体奴隶财富中的 3%（30%中的 10%），但是这一百分比也许更接近零，因为奴隶所有人可以通过钻把奴隶卖往工作更辛苦的南方这一法律漏洞，从而减少了抚养成本。

南方奴隶制度的持续

除了对奴隶进口的宪法限制以及北方州的"渐进解放规划"，奴隶制度并没有寿终正寝。表 13—3 反映了南方人口增长的概况，表明了奴隶人口的增长稍快于自由南方（废除奴隶）的人口的增长。被奴役人口的比例从 1800 年的 49%增加到了 1860 年的 53%。

① 全体女性奴隶占奴隶总数的 37%。

表 13—3　　1800—1860 年按种族统计的南方人口（百万）

年份	白人	黑人		奴隶与自由人的比例（%）
		奴隶	自由人	
1800	1.70	0.86	0.06	49
1810	2.19	1.16	0.11	50
1820	2.78	1.51	0.13	52
1830	3.55	1.98	0.18	53
1840	4.31	2.43	0.21	54
1850	5.63	3.12	0.24	53
1860	7.03	3.84	0.26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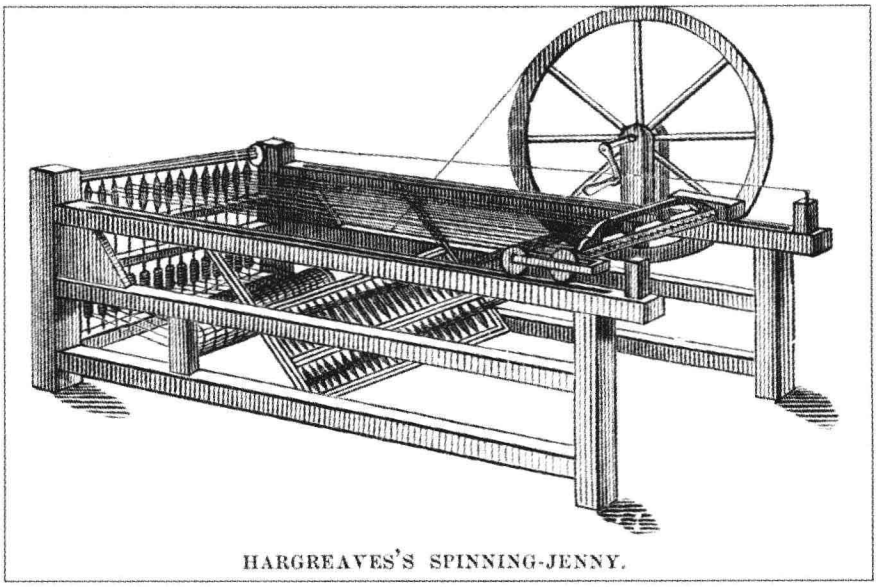
注：总数经四舍五入。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1960*（Washington，D. C.：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Series A，95－122.

自从伊莱·惠特尼在 1793 年发明了棉网后，在把棉花的种子从短绒棉种类中分开的工作中，机械化方法取代了手工方法。南方的土地和气候，尤其是新西南方，使得它在供给棉花原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供给对象刚开始是来自英国后来是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厂，它们对棉花的需求巨大且不断增长。棉花很快成为这个国家具有最高附加值的出口商品，而且当我们已经在第 8 章讨论过的西南部的移民帮助了新西南部土地上的奴隶们时，产出也扩张了。依据罗伯特·福格尔和斯坦利·恩格尔曼的估计，将近有 835 000 个奴隶离开了老南方（主要是马里兰、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他们大多数去往亚拉巴马、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东得克萨斯这些盛产棉花的土地。三个刺激人口迁徙以及土地销售的因素出现了：第一个因素出现的时间正好在 1812 年战争结束之后，第二个因素出现在 19 世纪 30 年代中期，第三个因素出现在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我们在图 8—2 中利用图形表明了这一点。基于奴隶劳动的种植园是棉花生产的组织形式，它确保了棉花巨大且经济的供给。

种植园的效率

在棉花王国的全盛时期，南方的种植园在数量上和规模上的增长是惊人的。当然，很多小的家庭农场单元为了供给市场也同样生产棉花和相关产品，但是在南北战争前的时期内，南方农业真正鲜明的特点是种植园。因为种植园建立在强迫劳动的基础之上，它就既代表了经济上的宏伟壮观同时也代表了南方经济的社



COPYRIGHT © NORTH WIND PICTURE ARCHIVES/NORTH WIND PICTURE ARCHIVES—ALL RIGHTS RESERVED.

传统的纺织工具——手纺车——每次仅能生产一轴纱线，而哈格里夫斯多锭纺纱机（1764）则使单独一个纺纱工人同时生产 8 锭纱线成为可能。很快，正如图中所示，机器逐步改善，一个工人能够同时生产的纱线更多了。

会悲剧。

虽然绝大多数对奴隶制度的谴责都局限于道德和社会问题，还是有一些指责延伸到严格的经济方面。在有些时候，黑人的被迫劳动被谴责是无效率的，要么是基于种族的原因，要么是因为奴隶制度本身被认为是经济上无效率和低生产能力的。例如，当时的白人观察家卡修斯·M·克莱（Cassius M. Clay）就说过，非洲人“远不如我们能更适应平稳的、不间断的劳动”①。另一个同一时期的人弗雷德里克·奥姆斯特德报道说，“在具有同等的智力水平和相同的激励之下，与黑人相比，白人劳动者可以砍两倍的树、分开两倍的围栏以及一天内可以锄三倍的玉米地。”②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以及不断增加的证据去拒绝那一时代人们的断言并且可以用经济推理命题 5 来举例证明。例如，加文·赖特已经证明，86%的南方棉花作物生长在超过 100 英亩的农场单元上，同时这些农场拥有 90%的奴隶。③ 而且，在 1820—1860 年间，棉花产出以 11～12 倍的速度增加，然而奴隶人口同期只增加了 2.5 倍，这就反映了在每一个奴隶的棉花产出上 4～5 倍的增加。显而易见，基于奴隶劳动力的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增长。也可参见经济透视 13.1。

---

① C. M. Clay, in *The Writings of Classius Marcelius Clay: Including Speeches and Addresses*, ed. H. Greeley (The New Yorker, 1848), 204.

② F. L. Olmsted, in *The Cotton Kingdom*, ed. A. M. Schlesinger (New York: Knopf, 1953), 467－468.

③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1978), 28.

经济透视 13.1

奴隶的资本资产价值

在20世纪的头十年内，著名历史学家菲利普斯·乌尔里克声称在南北战争之前，到了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南方的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已经无利可图了。这使得有些人错误地相信，由于市场经济的力量奴隶制度将最终消亡。

菲利普斯的分析基于两个时间序列：正如在下页图里的主要耕地劳动力的价格，以及棉花价格的趋势。棉花价格逐年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棉花价格通常是0.09美元，在19世纪50年代其平均水平是0.10美元。同时奴隶价格也在上升，尤其是从1845年到1859年，但是棉花的价格增长并不明显，菲利普斯的理由是在奴隶上投资的增加导致了损失。他进一步断言由于相对于1820年或是1830年，奴隶在1860年已经不再努力地工作了，这样一来损失肯定会出现。

在两位经济学家的工作之前，菲利普斯的这些结论被广泛地接受，阿尔弗雷德·康拉德和约翰·迈耶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花了很大的心思去实际测量奴隶投资上的回报率。他们利用最简单形式的资产定价模型来计算年度期望产出价值：棉花价格（P_c）乘上奴隶的边际物质产出（MP_s），再减去年度存活成本（M），然后在奴隶寿命的期望长度基础上对其求总和（$t=0$，…，30）。利用贴现率（r）对总和贴现后就得到了支付给奴隶的价格（P_s）。可以用下一公式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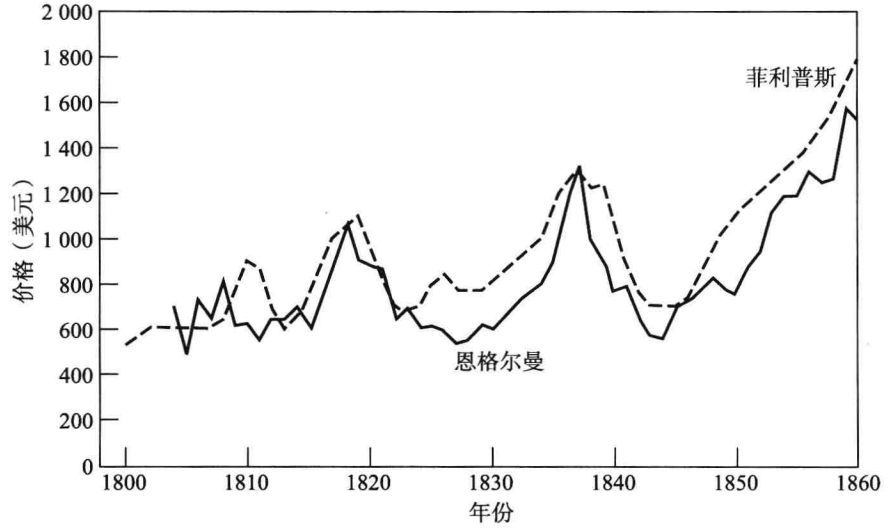
$$P_s = \sum_{t=0}^{30} \frac{(P_c \times MP_s - M)_t}{(1+r)^t}$$

正如公式所说明的，如果棉花价格上升、工人的平均产出增加或者奴隶的存活成本下降，那么利润将上升，推动奴隶的价格下降。这些计算以及随后的很多估计表明了回报的变化区间，一般来说是从8%到12%，这与当时的替代投资相比是有挑战性的或者说它高于正常水平。

那么，如果棉花价格不上升的话，奴隶价格是否同样会上升呢？我们现在已知道答案：奴隶将具有更高的平均产出。菲利普斯错误地忽视了这一时期的生产率收益的上升——收益来自当种植园发展时的规模经济、来自诸如任务分派的其他组织方式的进步、来自向其他生产率更高区域的迁移（向西南部的移民）以及其他渠道。忽略生产率进步的其他来源，菲利普斯的一个观察也许是正确的，那就是奴隶在1860年的时候相比以前工作不努力以及采用相同的生产技术。

而且，也没有证据可以说明奴隶制度会自然而然地消亡。即使是在对奴隶的过度投资时期——也就是说，对奴隶的购买要价很高——也不支持这一结论。实际上，在1818—1820年以及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奴隶价格已经很显然地超过投资，并且价格被重新调整到更低的水平，减少了在“开价过高的奴隶”上的损失从而恢复到正常的回报率水平。事实是在整个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奴隶产

出的价值远高于他的抚养以及存活成本。只有当奴隶产出的价值减少到其存活成本之下时，奴隶主才能从给予奴隶自由中获利。



1800—1860 年新奥尔良一个典型男性奴隶的价格

资料来源：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 The Burden of Slavery and the Impact of Emancip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Summer 1988): 155. As reported there, the original sources to these two series are Phillips and Engerman, as follows. Phillips: Prices for 1800, 1801, and 1812 are estimated visually from Ulrich Bonnell Phillips, *Life and Labor in the Old South* (Little, Brown, 1929), p. 177. All other figures are from Alfred H. Conrad and John R.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 (April 1958), reprinted in Alfred H. Conrad and John R.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and Other Studies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ldine, 1964), Table 17, column 6, p. 76. Engerman: Data were supplied by Stanley Engerman. 它们是新奥尔良的奴隶销售清单样本中包括的价格的平均值。每年的样本规模是在 2.5%～5%之间。平均价格是指"18～30 岁的男子，他们没有技能，不存在生理或其他疾病"。恩格尔曼使用每一个奴隶价格单独列出的情形。在大多数年份里，大约 15～20 个观测值被用于准备假设的平均数。

另外一个观点是把种植园直接与自由农场相比较。有大群奴隶工作的种植园比自由家庭农场单元是更有效还是不那么有效？当奴隶制度变得越来越牢固的时候，南方是否面对日渐增加的经济延迟？

在一头扎进证据之前，我们必须承认特定的附加说明。测量相对效率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激烈的学术争论的一个来源。农业的产出比较，实际上是有价值的产出的比较而不是物理产出的比较。土地类型以及方位上的方差导致了测量问题。

当然，因为它们的规模，种植园比南方自由家庭农场生产更多的棉花、其他商品以及食物。但是当比较每单位投入（资本、劳动以及土地）的产出，至少得部分地调整在土地质量、方位、工作日和工作年的长度和其他因素上的方差，很

明显，大型种植园相对于小型种植园或是没有奴隶的农场有高得多的生产效率。[①] 表 13—4 是南方的农场和种植园的这些生产率的比较，以及拥有不同奴隶数量的种植园的比较。最有效的单元是那些使用 50 个或者更多奴隶的单元。小规模的农场就每单位的雇佣投入而言的生产率比较低，而且在南方自由家庭农场与雇用一些奴隶的小型农场之间的效率方面的差别很小。因此，看起来种族因素对生产率并没有显著的影响。除白人拥有的资本和土地之外，小单元农场拥有的作为资本和土地补充品的黑人工人与在单一家庭农场工作的白人劳动者的生产率是一样的。相应地，拥有规模化数量奴隶的种植园效率格外地高。很明显，规模经济或是其他的生产率收益的来源为大规模化的种植园提供了优势。

表 13—4　按照农场类型和规模比较南方农业的效率（南方自由农场的指数＝100）

奴隶数量	每单位投入的产出的指数
0	100
1～15	101
16～50	133
51 或更多	148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June 1977): 285.

对为什么会存在这些差别这一问题的最后一个答案仍然使我们感到困惑。然而，一般来说，主要的差别看起来是把奴隶组织成通常称为团伙（gangs）的生产单位、为了特定的用途按技能仔细地挑选奴隶以及每小时内奴隶被驱使工作的密集程度。

在很多方面，大型的战前种植园比农场更像工厂，对于很多加勒比地区和南美的特大甘蔗种植园而言，这一差别就更加明显了（Fogel，1989）。在甘蔗生产中，团伙体系更加突出、特别严厉并且团伙中奴隶的寿命也更短。奴隶组织化劳动类似装配线工人。即使仅仅就棉花而言，当时的报道也强调了这一特点：

> 棉花种植园不是一个农场所能包容的，正如通常的农场所做的，种植园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包容了大量的职责和组织，一个人命令半打的部门去工作一天或是一个星期。棉花种植园的劳动几乎组织得像棉花工厂的劳动。有马车夫、扶犁的人、锄手、挖沟的人、铁匠、车匠、木工、饲养参与工作的家畜的男人、饲养猪和家畜的男人、照顾婴儿室的女人……为所有人准备饮食的炊事员……在实际

① 关于测度奴隶制相对效率的问题的生动且高技术性的探讨，参见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9 年 3 月卷及 1980 年 9 月卷下述学者的观点：Paul David, Peter Temin; Gavin Wright, Donald Schaefer, Mark Schmitz; Robert Fogel, Stanley Engerman。

运作中没有一家工厂能比棉花种植园更有条理地行动，也没有一家工厂能比Canebrake棉花种植园在对劳动力的实际使用中会消除更多的歧视。

当种植时期到来时，人手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最好的人手，包含那些具有良好判断和快速移动的人；第二个层次，最弱的以及最无效率的层次；第三个层次，第二个层次的助手。如此分类之后，第一个层次的人将领头并且挖开一个7～10英寸的坑，第二个层次的人将会往坑里面扔进四五颗棉花种子，第三个层次的人跟着并且用耙子耙土把这个坑覆盖住。[①]

视角 13.1

奴隶家族

在20世纪30年代，工作规划管理委员会和菲斯克大学编辑了将近2 200份对当时奴隶的问卷。这一关于奴隶制度下的生活的独特信息来源，虽然无可置疑地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仍然向我们提供了在奴隶家庭方面的有价值的洞察（进一步的细节以及讨论，参见Crawford，1992，关于以下证据的来源）。

表13—5给出了奴隶制度下家庭结构的分布，表明了这些被调查过的人中的一半多是来自与双亲生活在一起的家庭里的孩子。另外的12%也有父母双亲，但是父亲居住在另外一个种植园，并且一般来说只允许每周一次的探亲。官方的通行证给予那些“获得同意的探亲”，但是很多人在调查中报告说父亲经常由于偷偷地探亲而被鞭打。在母亲持家的家庭里（33%），其中有15%～25%比例的家庭是由于父亲是白人。其余的单身母亲的家庭是由于父亲的去世以及由于父亲被卖出而与家庭分开。相比大型种植园，在小型种植园里女性奴隶与白人之间的性接触更频繁。一旦婚姻由于死亡、遗弃或是出售而破碎，奴隶们很少再婚（在叙述中很少见到对继父的描写）。

在表13—6中说明了每个奴隶家庭里孩子的平均数量，比较大的数量与白人奴隶主喜欢在奴隶家庭内部形成奴隶的观点是一致的。

虽然奴隶被卖出了，其结果是瓦解了他们的婚姻，但是这一奴隶家庭的破坏对于奴隶主而言并不是毫无成本的。父亲被卖走的数量并不清楚，但是孩子被卖走无疑比他们的父亲或是母亲被卖走频繁。表13—7说明了孩子按照年龄被卖出家庭的概率。一个长到16岁的孩子通常面临着20%的被卖出家庭的可能性这一风险。如果不是出于体恤的话，那么只有谨慎行事才可能减少小孩子被出售的概率。

① 同时代的这些引文是分别关于Canebrake种植园及McDuffie种植园的。完整的引文及其他例子参见Jacob Metzer，“Rational Management，Modern Business Practices，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Antebellum Southern Pla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April 1975)：134－135。

表 13—5　　奴隶家庭出身的家庭类型分布

家庭类型	绝对频数	样本内所占百分比（%）
双亲，一起居住	694	51.1
双亲，分开居住	168	12.4
单亲，女性家长	451	33.2
单亲，男性家长	24	1.8
孤儿	20	1.5
总计	1 357	100.0

注：家庭出身是根据奴隶从家庭被售出或释放时的家庭结构给定的。

资料来源：Stephen Crawford，“The Slave Family：A View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eds.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331－350.

表 13—6　　平均每个奴隶家庭的子女数量

家庭类型	子女数量
双亲，一起居住	7.2
双亲，分开居住	8.0
单亲，女性家长	5.7

资料来源：Stephen Crawford，“The Slave Family：A View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eds.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331－350.

表 13—7　　按照年龄统计孩子从原生家庭售出的概率

	售出比例[a]（%）	期望售出数量[b]	累计售出数量	给定年龄及以上的奴隶数量[c]	累计售出概率[d]
年龄	(1)	(2)	(3)	(4)	(5)
3	4.8	5.23	5.23	1 833.6	0.002 8
4	7.1	7.74	12.97	1 764.6	0.007 3

续前表

年龄	售出比例[a]（%）（1）	期望售出数量[b]（2）	累计售出数量（3）	给定年龄及以上的奴隶数量[c]（4）	累计售出概率[d]（5）
5	7.1	7.74	20.71	1 695.6	0.012 2
6	7.1	7.74	28.45	1 599.9	0.017 8
7	14.3	15.59	44.04	1 519.4	0.029 0
8	14.3	15.59	59.63	1 423.6	0.041 9
9	2.4	2.62	62.25	1 308.6	0.047 6
10	9.5	10.36	72.61	1 222.4	0.059 4
11	11.9	12.97	85.58	1 118.9	0.076 5
12	2.4	2.62	88.20	1 021.2	0.086 4
13	4.8	5.23	93.43	915.8	0.102 0
14	4.8	5.23	98.66	785.6	0.125 6
15	4.8	5.23	103.89	705.1	0.147 3
16+	4.8	5.23	109.12	561.4	0.194 4
总计	100.0	109.0			

a. 来源于所有记录了售出年龄的前奴隶中在给定年龄售出的奴隶所占的比例。

b. 本栏数据是将纵栏（1）的比例值乘以 109 得到的，而 109 就是完整样本中从其家庭被售出的前奴隶总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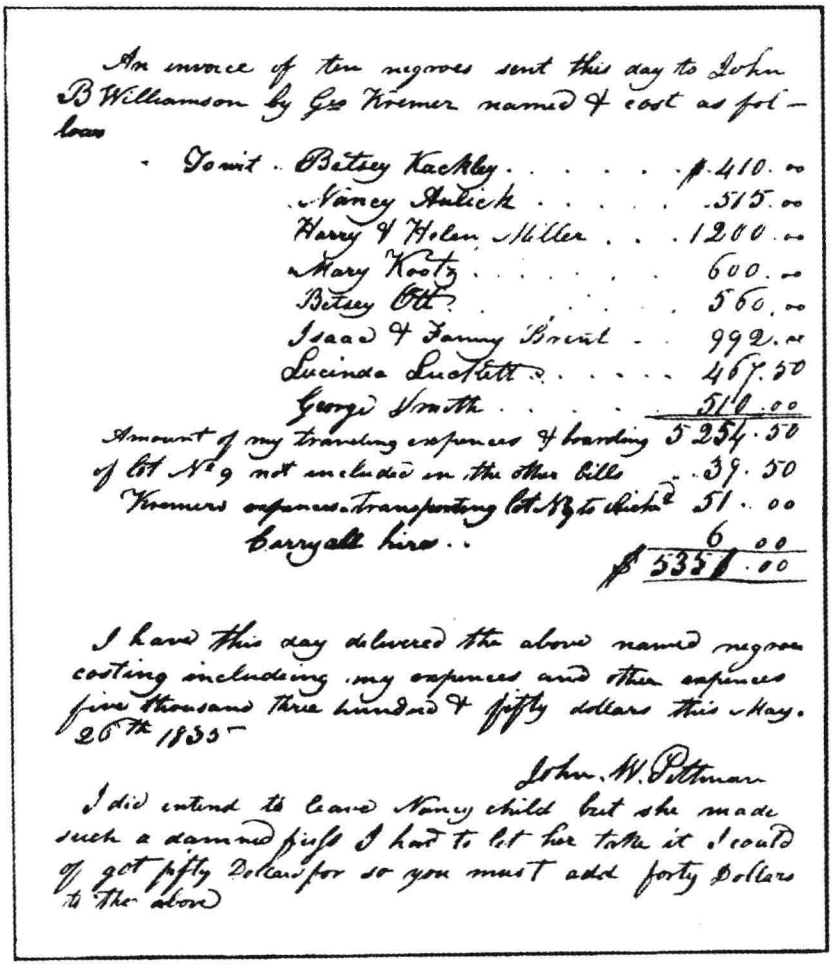
c. 来自于从 1 916 个完整样本中选出 1 167 名记录了确切年龄的前奴隶的二次抽样中的年龄分布。

d. 纵栏 3 除以纵栏 4。

资料来源：Stephen Crawford，“The Slave Family：A View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eds.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331－350.

在南北战争前对奴隶劳动的榨取是有利可图的，可能主要是由于加快了工作的速度并且要求更密集的工作，而不是更长的劳动时间，并且效率的收益主要来自工作——任务的选择以及每小时的工作密集程度。事实上，大种植园的奴隶们通常有更长的休息间歇，并且与他们的白人竞争对手相比，大种植园的奴隶们在星期天工作的更少。实际上，这些条件对于达到施加在奴隶身上的工作密集程度的水平是必需的。很明显这些生产率优势并不是出于自愿的。本质上，他们要求或是强迫奴隶劳动。在这一时期，没有出现自由劳动的种植园。并且正如我们将会见到的，在奴隶获得解放之后的时期里，在劳动参与、工作密集度和组织化水

平方面出现了显著的下降。[①]



An invoice of ten negroes sent this day to John B Williamson by Geo Kremer named & cost as follows

Jo wit. Betsey Kackley $410.00
Nancy Aulick 515.00
Harry & Helen Miller . . . 1200.00
Mary Koontz 600.00
Betsey Ott 560.00
Isaac & Fanny Breal . . 992.00
Lucinda Lucastle 467.50
George Smith 510.00
Amount of my traveling expences & boarding 5254.50
of Lot No 9 not included in the other Bills . . 39.50
Kremers expences transporting Lot No 2 to Richd 51.00
Carryall hire . . 6.00
$5351.00

I have this day delivered the above named negroes costing including my expences and other expences five thousand three hundred & fifty dollars this May. 26th 1835

John W. Pittman

I did intend to leave Nancy child but she made such a damned fuss I had to let her take it I could of got fifty Dollars for so you must add forty Dollars to the above

© BROWN BROTHERS

图中是1835年一张出售奴隶的费用清单。最后两句属于特殊兴趣的内容。

经济剥削

毋庸赘述，黑人奴隶被榨尽了血和汗。他们没有政治权利，而且种植园的法

① 近期关于美国南部黑人与白人疾病发病率差异的研究为生产率差异提供了新的解释。黑人的疟疾和钩虫病（南部常见病）发生率远低于白人［参见 Philip R. P. Coelho and Robert A. McGuire, "Biology Diseases, and Economics: An Epedemiological History of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s* 1 (1999), 151-190］。这种差异也许会造成黑人和白人劳动力生产率的差异，但具体影响多大仍是未知。从南部白人自由农场和小种植园的相似生产率来看，这种影响并不大。

律和管工的一时兴起都是奴隶直接面对的蜘蛛网。出于非常明显的理由，所有人并不是无心地虐待他们的奴隶。通过我们测算，以 1999 年价格计算，一个主要在田地里进行劳动的男性奴隶的价值将近 30 万美元（参见经济透视 13.2）。

各种形式的惩罚和奖赏压迫奴隶成为温顺的劳动者。奴隶们目睹或者感受鞭子抽打的剧痛以及纠缠他们的对逃脱无望的恐惧，这些使得在奴隶所有人控制奴隶方面很少遭遇失败。奴隶们的生活水平很低但足够自我维持；如果他们总产出的价值能够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的话，他们的生活水平一定会提高很多。然而，因为他们劳动和产出的产权持有在白人所有者手中，他们的产出由所有者获取。

理查德·韦德尔已经试图去测算南方地区对奴隶的经济剥削。他的测算基于基本的经济定理，在竞争行业诸如棉花生产中的工人倾向于被支付的报酬数量与他们的劳动对产出的边际贡献相等。额外的工作增加了一定价值的产出。在劳动者增加的产出的价值与他或她所得到的之间的任何持续的差别可以被合理地当作是经济剥削。

对于奴隶的平均水平而言，这一差别（增加的产出的价值减去存活成本）除以增加的产出的价值，至少是 50%甚至高达 65%。①

经济透视 13.2

以今日美元价值计算的 1860 年奴隶的价格

在 1860 年，一个主要的不熟练男性农场奴隶劳动力的成本大约是 1 800 美元。但是如果以今天美元的价值计算，这大约值多少钱呢？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是使用生活成本指数（消费价格指数）。

一个较好的针对 2000 年消费价格指数的估计认为其大约是 1860 年水平的 20.6 倍。因此使用消费价格指数去通胀化（使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奴隶的成本，结果就是以今天美元的价值计算它大约是 37 000 美元（1 800 美元乘以 20.6）。然而，也存在其他的把历史价值转换成今天货币价值的方法。在 1860 年不熟练劳动力的工资也许是每小时 0.10 美元。今天的不熟练劳动力的工资，至少是在国内的一些地区大约是每小时 7 美元。使用通胀化的工资计算的数值接近于 125 000美元（1 800 美元乘上 7 美元除以 0.10 美元）。第三种把 1860 年的 1 800 美元转换成今天货币的方法是使用资本的平均收入。在 1860 年，资本的平均收入大约是 128 美元；在 1999 年，资本的平均收入大约是 21 181 美元。因此，使用资本的平均收入去通胀化奴隶的价值，得到以今天货币计算的数字大约是 30 万美元。

正如这一例子所说明的，把这些方面转换成今日美元价值的方法并不唯一。

① 更多阐释参见 Richard Vedder，"The Slave Exploitation (Expropriation) Rat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October 1975)：453－458。如 Vedder 所注，1820 年新英格兰棉花纺织厂（以 71 家公司为样本）的相对剥削为 22%；同年铁厂（以 101 家公司为样本）工人为 28%。Roger L. Ransom 和 Richard Sutch 在 *One Kind of Freedo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3 中也计算出了相似的剥削程度（分别为 24%和 29%）。

在特定的情形所采用的最好的方法依赖于提出问题的原因。对消费价格指数的通胀化告诉我们因为拥有奴隶人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消费方式。例如，如果我们想获得由于给予奴隶自由，而不是出售他，某人将付出多大的牺牲，那么采取第一种计算方法则很适合。其他的计算方法将告诉我们奴隶主在他生活的社会里究竟拥有多大的势力，利用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的术语来说，也即是有多少（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地位的）“干扰”是由奴隶主制造的。如果我们想知道奴隶在生产过程中的资产价值，也许高达 30 万美元的数字是最适用的。

当然，剥削问题所包含的方面更多，而不仅仅是简单地讨论那些收入的二分之一方面。对工人的俘获阻碍了他们物质上的进步，要不然就是剥夺了他们对自我改进和收益的激励。

在美国奴隶制度的经济条件方面，也许能说出来的最好的一面就是他们与其他地方奴隶制度的经济条件相比并不坏。在加勒比地区和巴西的奴隶人口的急剧的相对下降，证明了那些地方具有极其残忍的工作条件。两相比较，南部合众国提供了生命存活的条件。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奴隶们所体验的物质舒适的标准是低的，但是这比他们当时所处世界中很多地方平民们的标准高出不少。

经济巩固与地区收入

尽管在种植园中奴隶体系被证明是有效的，但它的优势并不是在其他地方都广泛地适用。结果是，在南北战争之前的年代里，南方经历了很少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南方工业化的过程很慢，部分是由于其奴隶体系。有些奴隶实际上已经是熟练的工匠，并且奴隶已经被雇用到棉厂、煤矿、铁厂、木料加工厂和铁路中。在大规模范围内为工业生产性的岗位培训奴隶，很少会招致什么成本，然而，那时他们只能做好准备并被驱使从事农业中有利可图的工作。

而且，南方经历了非常少的来自欧洲或其他地方的移民。并不是南方的“奇怪的制度”使得欧洲移民敬而远之；移民在奴隶解放后并未增加。欧洲人倾向于在某些纬度定居，因为这些地方有着近似于他们以前国家的气候。然而，落户于南方的主要障碍是因为局外人认为在那里缺少机会；移民们害怕他们变成“贫穷的白人”。到了 1860 年，只有 3.4%的南方人口属于在国外出生的，与之相对比，在中部的州这一数字是 17%，并且在新英格兰是 15%。

当我们把种植园奴隶制度看做是一种商业时，毫无疑问它是获利的。规则就是在大多数棉花带地区的极高的净回报并且在南方腹地的大部分地区所获得的利益至少等于替代的资本雇佣所获的利益。也不存在起作用的经济力量会使得奴隶经济体自我瓦解。没有证据会支持奴隶劳动过度资本化这一观点，也不会有证据支持奴隶明显地充分再生产以维持劳动就业人数的增长的观点。另外，从一些老

南方州向新的棉花带地区的内部移民用实例证明了南方经济体的灵活性。

体现在向西部的移民中的灵活性对南方来说特别重要。表 13—8 表明了在 1840 年和 1860 年各个地区的收入指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整个自由南方而言，收入上有将近 44%的增长，从 105 美元增加到 150 美元，高于在南方的任何次区域的内在增长（大约老南方是三分之一，新南方是 15%）。相比那些在北方的人口，南方移民在平均上是从更穷的地区移往更富的地区，这就从整体上促使了南方的收入增长。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因为明显合理的经济上的原因，南方极其关注向西部土地扩张奴隶制度的权利。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南核心区域所处的相对地位，在那里棉花和蔗糖占据统治地位。这里也是这个国家里收入最高的区域。并且不管在人口指数中是否包括奴隶，这些相对较高的地位依然如故。当仅仅比较那些自由人口的人均资本收入时，即使是老南方较不富裕的地区也表明了这一水平确实很高。[①] 毫无疑问的是，在美国内战前夕，南方实际上是一个很富裕的地区。

表 13—8　　南北战争前的人均收入（美元，按 1860 年物价）

	总人口		自由人口	
	1840 年	1860 年	1840 年	1860 年
全国平均	96	128	109	144
北方	109	141	110	142
东北部	129	181	130	183
中北部	65	89	66	90
南方	74	103	105	150
南大西洋地区	66	84	96	124
东南中部	69	89	92	124
西南中部	151	184	238	274

资料来源：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Table 8, 335. © 1971 by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pearson Education, Inc.

然而，从道德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视角来看，这一体系成为人类体面和社会进步的一个巨大阻碍的缩影，从很多方面来看，它与人们深刻向往的美好典范背道而驰。怀抱着近似于宗教般的热情，废奴主义者的羽翼日渐丰满，从此这个国家逐渐分化了。

①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1974)，以 20 美元作为奴隶人均年收入来估计自由人口的收入情况。在这二人及其他学者的后续研究中提高了奴隶的年均消费。因此南方自由人口数需要下调，但这并不显著影响原结论。

当反对奴隶制度的道德化的观点获得更多支持的时候，奴隶解放的经济成本也上升了。表 13—9 按年代衡量了南方持有奴隶所包含的财富。在 1830 年后，价值的增加是极其巨大的，在 1860 年几乎达到了 31 亿美元。根据兰塞姆和萨奇的研究，持有奴隶的价值代表了在 1859 年主要的棉花生长州全部财富的 44%，并且奴隶房屋的价值占了全部财富的 25%。[①] 增加 31 亿美元的税收是否就能为奴隶解放而补偿奴隶所有者呢？所有者们会自愿地放弃这一财富吗？再进一步考虑，在 19 世纪 30 年代后期南方人已经目睹了英属西印度群岛快速的奴隶解放的后果。在那里，当团伙体系消失以及劳动力从田地上退出时，土地价值垂直下降。土地价值损失的前景增加了无补偿的奴隶解放的财富损失，这就增强了南方的保存奴隶的寡头们的决心。加重对暴乱以及帮助逃脱这些行为的惩罚的法律在南方得以通过：有 11 条法律对奴隶参与暴乱施加了死刑，还有 13 条法律对于自由人鼓动奴隶参与暴乱施加了资本惩罚。一些州开始要求立法者在逐项检验的基础上就奴隶解放问题取得一致。有 7 个州要求刚获得自由的奴隶离开他们的领地。自由黑人逐渐被剥夺了拥有武器的自由、集会的自由以及销售液体的自由。通过这样一些以及其他方面，奴隶制度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变得更加牢固。

表 13—9　　1810—1860 年美国的奴隶总价值

年份	总价值（百万美元）
1810	316
1820	610
1830	577
1840	997
1850	1 286
1860	3 059

资料来源：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 The Burden of Slavery and the Impact of Emancip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Summer 1988): 150 - 151.

政治妥协与地区冲突

对于大多数生活在奴隶制时代的美国人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对它进行遏制，而不是对它进行根除。实际上，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妥协的基础首先在《西

①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 The Burden of Slavery and the Impact of Emancip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Summer 1988): 138 - 1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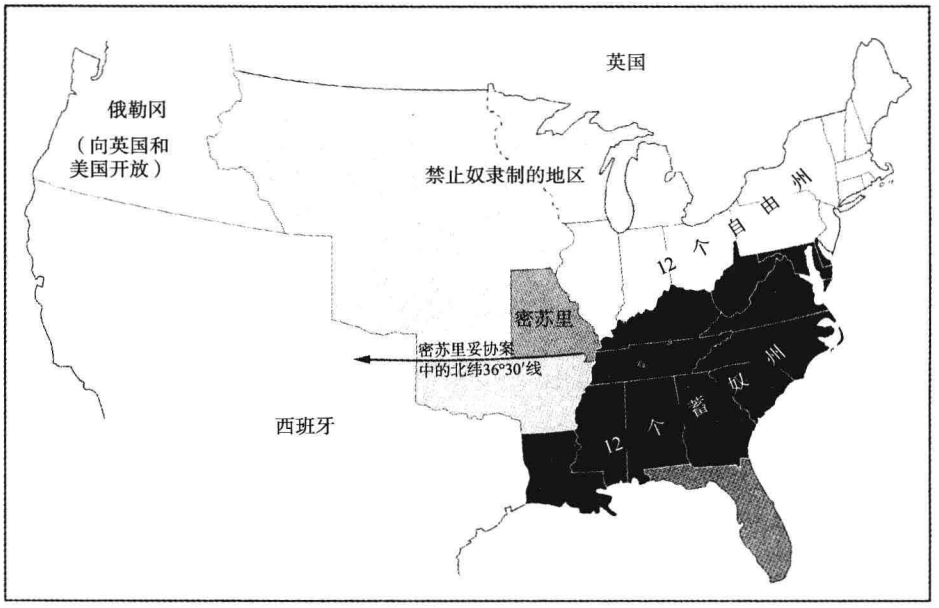
北法令》中得以确立，在1787年，国会全体一致地通过了它。该法令第六条说："在该地域内不得有奴隶制度或强迫奴役，但因犯罪而依法判决之受惩者不在此列。兹规定，倘若任何人逃入该地域，而原来之13州内任何州对该逃亡者之工作及劳役有合法之权益，则应依法将该逃亡者交还，并且交给对该逃亡者前述之工作及劳役享有权益者。"事实上，1787年法令宣布了后来变成俄亥俄州、印第安纳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和明尼苏达州的土地上的奴隶制度为非法的。这就开启了在其他领土上控制奴隶制度扩张的第一步，使得一些新加入联邦的地区至少是没有奴隶的，但是这一重要的立法并未提供最终的解决办法。

图中是当时一个常见的场景——奴隶在白人监工的监督下采摘棉花。由于北方农业的劳动力往往十分分散，其监督成本也更高。

西部移民，既包括北方人也包括南方人，继续使得奴隶制的问题提上了日程。作为一个政治单元，南方的关键问题是在参议院中至少必须保证其平等的席位。南方达到了这一目标并且赢得了一系列的妥协，从而使得它能够扩张奴隶制度并且反对废奴主义的破坏。

在1819年，参议院是平衡的：有11个奴隶州和11个自由州。到了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被颁布时（参见地图13—1），密苏里被认为是一个奴隶州而缅因被认为是一个自由州，因为它禁止在路易斯安那购置领土的其他地区以及北纬36°30′以北的任何地区存在蓄奴制。将近30年后，被允许加入联邦的州在组成上，通常是一个奴隶州对应着另一个自由州，到了1850年，有15个奴隶州和15个自由州。在那一年，在西北领土、在路易斯安那购置领土的北纬36°30′以北的地区和俄勒冈领土都禁止奴隶制度——而这是一个巨大的区域，但是却没有办法在其中扩展奴隶体系以牟利。因为允许这一地区里的某些州有可能将通过墨西哥割让给美国，导致了暴力反对的兴起。墨西哥割让条款要求这一地区永保自由，

但是国会在1848年已经拒绝了禁止在西南部的蓄奴制的威尔默特提议，然而在西南部奴隶制的扩张在经济上是可行的。最后，在1850年，加利福尼亚被承认为是一个自由州。然而，在犹他和新墨西哥的区域却允许蓄奴。奴隶制度上的最后一个决定是由居于未成为州的领土上的人们所做出的，这是为了适用于联邦对其加入的许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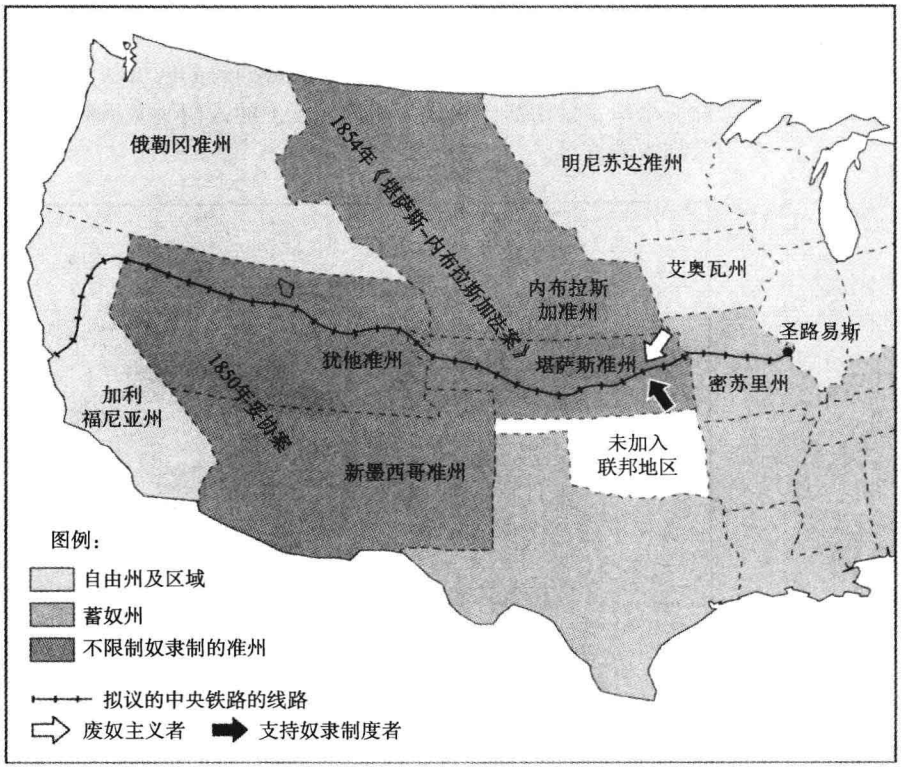


地图13—1　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

在这一法规之后，人们认为持续加剧的地区争端应当成为过去。在一段时间内，局势得以缓和。

19世纪50年代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事件，就是看起来需要多长的时间，南方可以获得最后的胜利。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 of 1854）（参见地图13—2）通过对在路易斯安那购置地上到目前为止仍未确定归属的部分规定“民众主权”，实际上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结果导致了发生在堪萨斯的流血冲突。在德雷德·斯科特裁决（Dred Scott decision，1857）中，最高法院走得更远，宣称国会在这些领土上不能禁止奴隶制度。南方人在这一时期竭力阻挠农夫向奴隶制度不繁荣的地区移民，他们成功地阻碍了《宅地法》的通过，因为该法令规定向定居人分发自由土地。

然而，只有当来自北方和西北方的民主党愿意与南方结盟时，南方才能取得法律上的成功。在19世纪50年代行将结束时，北方的废奴运动变得不可阻挡。在很大程度上，运动是由那些基于纯粹的道德原因反对任何人被奴役的人所领导的，但是经济利益强化了这一利他主义的动机。西北的农民们也反对种植园体系的扩张，因为他们害怕与这样的大型组织进行竞争。而且当向东部核心区域的交通得到改善后，尤其是通过北方的大门口，流向中部亚特兰大州以及欧洲西北部的产出增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西北部的人们发现他们的经济利益更紧密地依



地图 13—2　新的居留地

1850 年妥协案和 1854 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试图进一步阻止地区冲突演变为战争。而法案中提出的“民众主权”这一概念，导致了堪萨斯的冲突。

附于东部的企业家们，而不是南方的种植园主。巨大数量的爱尔兰和德国的移民，因为他们与奴隶制度没有利害关系，也有助于 19 世纪中叶前后的经济和政治利益的转变。成立于 19 世纪 50 年代中叶的共和党，从这一经济利益的转型中获益匪浅。当老的政治联盟减弱时，共和党迅速地从主要是那些反对奴隶制度领土扩张的人群中汲取了力量。

1858 年 10 月 13 日，在伊利诺伊州的昆西，亚伯拉罕·林肯在他与斯蒂芬·A·道格拉斯的第六次辩论的公开演讲中，就奴隶制说道：

我们充分认识到在我们这个国家存在着奴隶制度……共和党认为它是一个错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道德上的、社会上的以及政治上的错误。我们认为它是一个错误并不是仅就它存在的地区的人民和州而言的，而是在它的趋势方面，从最低的程度上来说，这一趋势危害到了我们国家的存在……我认为这涉及它事实上在我们国家存在，同时涉及我们宪法的职责，我们根本无权对它们存在的州施加干涉，而且我们承认在我们拥有更多的权利之前，我们无意去干涉它……一旦它寻求自身的扩张，我们将把它作为邪恶而反对它。我们坚持应该有政策将它局限在现在的领土范围内……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德雷德·斯科特裁决……我们

提议要一直反对它，直到我们能够改变它为止，并且就这一问题确立一个新的法律规则。

林肯号召把奴隶制度禁锢起来，而南方认为他的号召违背了联邦宪法。棉花业在得克萨斯正欣欣向荣。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预告了棉花耕种的扩张形势很喜人。在19世纪40年代，从墨西哥获取了这些充满希望的土地。南方人难道将被排除在这些土地之外？

从南方人的角度来看，林肯在1860年的当选仅意味着两种选择：屈服或是脱离。对于有钱并且踌躇满志的南方人来说，屈服是无法想象的。[①] 相反，对林肯而言，合众国内的各州则必须保持联合。

维护联合的大屠杀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人员伤亡超过美国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战争。尽管从一开始，解放奴隶并不是北方军事努力的目的，但它还是变成了这一战争的最终道德上正当的理由。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The American Memory Historical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Web site provides access to the WPA Slave Narratives, the African American pamphlet collection, and other valuable sources. http://memory.loc.gov/.

Aufhauser, R. Keith. "Slaver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36 - 50.

Blassingame, John. *The Slave Community: Plantation Lif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Canarella, Georgio, and John A. Tomaske. "The Optimal Utilization of Slav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621 - 629.

Coelho, Philip R. P., and Robert A. McGuire. "Biology Diseases, and Economics: An Epidemiological History of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Journal of Bionomics* 1 (1999): 151 - 190.

Conrad, Alfred, and John Meyer.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6 (1958): 95 - 130.

Crawford, Stephen. "The Slave Family: A View from the Slave Narratives."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 eds. Claudia Golden and Hugh Rockoff.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331 - 350.

Curtin, Philip 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① 回想小说《飘》中的情节，战前南方的士兵认为这将是场必胜且短暂的战争，唯独瑞德·巴特勒持相反意见。

David, Paul, Herbert Gutman, Richard Sutch, Peter Temin, and Gavin Wright. *Reckoning with Slave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Douglass, Frederick.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8.

Elkins, Stanley M. *Slavery: A Problem of American Institutional and Intellectual Life*. New York: Grosset & Dunlap, 1959.

Eltis, David. "Free and Coerced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 Some Comparis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 (1983): 251 - 280.

Engerman, Stanley L. "Slaver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Sou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Ⅱ,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29 - 366.

Engerman, Stanley, and Eugene Genovese. *Race and Slaver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Quantitative Studi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Fleisig, Heywood. "Slavery, the Supply of Agricultural Labor, and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the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572 - 597.

Fogel, Robert W. "Three Phases of Cliometric Research on Slavery and Its Afterma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May 1975): 37 - 46.

——.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1989.

Fogel, Robert W., and Stanley L. Engerman.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ry: A Comparison of Northern and Southern Agriculture in 186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8 (Spring 1971): 353 - 367.

——.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Slavery*, 2 vol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4.

——.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June 1977): 275 - 296.

——. "Explaining the Relative Efficiency of Slave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South: A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September 1980): 672 - 690.

Genovese, Eugene. *Roll, Jordan, Roll: The World the Slaves Mad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6.

——. *From Rebellion to Revolution: Afro-American Slave Revolts in the Modern World*. Baton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

Goldin, Claudia. *Urban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Gray, Lewis.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the Southern United States to 1860*, 2 vol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33.

Gunderson, Gerald. "The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915 - 950.

Gutman, Herbert. *The Black Family in Slavery and Freedom*. New York: Panthe-

on Books, 1976.

Hutchinson, W. K., and Samuel H. Williamson. "The Self-Sufficienc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Estimates of the Food Suppl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 (1971): 591 - 612.

Kotlikoff, Laurence J., and Sebastian E. Pinera. "The Old South's Stake with Inter-Regional Movement of Slaves, 1850—18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434 - 450.

Metzer, Jacob. "Rational Management, Modern Business Practice, and Economies of Scale in the Antebellum Plantation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April 1975): 123 - 150.

Olmsted, Frederick L. *The Cotton Kingdom: A Traveler's Observations on Cotton and Slavery in the American Slave States*. New York: Knopf, 1953.

——. *The Slave States*. New York: Capricorn Books, 1959.

Parker, William, ed. *The Structure of the Cotton Economy of the Antebellum South*. Washington, D. C.: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1970.

Passell, Peter. "The Impact of Cotton Land Distribution on the Ante-Bellum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 (1971): 917 - 937.

Phillips, Ulrich B. "The Economic Cost of Slaveholding in the Cotton Belt."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June 1905).

Ransom, Roger L.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Emancipa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ansom, Roger L., and Richard Sutch. "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 The Burden of Slavery and the Impact of Emancip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Summer 1988): 133 - 160.

Schmitz, Mark D., and Donald F. Schaefer. "Slavery, Freedom, and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July 1978): 327 - 337.

Steckel, Richard H. "A Peculiar Population: The Nutrition, Health, and Mortality of American Slaves from Childhood to Matur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1986): 721 - 741.

Steckel, Richard H., and Richard A. Jensen. "New Evidence on the Causes of Slave and Crew Mortality in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1986): 57 - 77.

Sutch, Richard. "The Treatment Received by American Slave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Evidence Presented in Time on the Cros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October 1975): 335 - 438.

Thomas, Robert P., and Richard N. Bean. "The Fishers of Men: The Profits of the Slave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885 - 914.

Vedder, Richard K. "The Slave Exploitation (Expropriation) Rat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October 1975): 453 - 458.

Washington, Booker T. *Up from Slavery*.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3.

Wright, Gavin. "Slavery and the Cotton Boo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October 1975): 439 - 452.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Households, Markets, and Weal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Norton, 1978.

第3部分 重新统一的时代：1860—1920年

经济和历史回顾：1860—1920 年

1. 在 1815 年后将近 100 年的时间里，民族国家同盟之间都没有爆发大型的战争。而我们曾经历过的最血腥的美国内战，却是这样一段长时期的全球和平中一个粗暴的例外。

2. 美国内战结束后，北部的快速工业化以及重新恢复的西部扩张使得国家能够保持高的总体增长。而因为战争及奴隶解放，南方在产出方面却有巨大的绝对下降，并且，产棉区域缓慢的增长速度预示着南方落后和地区不平等的年代。

3. 奴隶解放使得财富和收入从白人奴隶主向黑人重新分配，但不幸的是它同时也产生了奴隶制的遗产——南方黑人尤其是在南部腹地的贫穷。

4. 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已跻身于世界工业强国之列，并且到 1910 年，它已经超出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德国将近两倍多，而英国已滑落至第三。

5. 技术进步、规模经济以及大规模生产等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

6. 增长的路径远远谈不上平滑。通货紧缩时期、金融危机，以及对财富集中的恐惧导致了改革经济和金融体系的需求。

7. 美国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达到了 1 亿的高峰；合众国里有 48 个州；把联邦、州以及地方支出加在一起，达到了创纪录的 GNP 的近 10%。

第 14 章　战争、复苏和地区分化

本章主题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民主党分化，从而使得共和党的候选人亚伯拉罕·林肯以仅仅 40%的公众投票赢得 11 月份的选举。林肯在北部和西部所获得的支持是稳固的，但是他的名字甚至没有出现在南方 10 个州的选票上。南方的政治策略一直是控制参议院和总统任期。可是南方在 1860 年在这两方面都失败了。

当林肯在 1861 年 3 月 4 日就任美国总统时，南方 10 个州跟随南卡罗来纳州决定脱离联邦。林肯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面对来自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要塞的威胁。他发布了加强萨姆特要塞的命令，南卡罗来纳州以此为借口寻求开火。

奴隶制是美国内战的根本原因。合众国在 1776 年和 1790 年都对奴隶问题模棱两可。1850 年的最后一次“奴隶停战协定”基于西方殖民地普遍的宗主权，并且在下一个 10 年之后将结束。到 1860 年，南方已经准备好为挽救他们基于种植园奴隶的社会秩序而斗争。而北方也已经为斗争做好了准备，不仅为了挽救联邦，还为了挽救共和党的胜利，这一胜利同时意味着“最终在合众国的政治框架里包含奴隶的权利”①。允许南方各州独立将使国家分裂，从而会使南方采取独立的对外政策、犯下扩张奴隶制的罪行。

---

① Roger Ransom,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Emancipa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and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7.

如同南方的错误判断一样，林肯主要的错误判断就是他相信强大的军队实力将使得战争迅速结束。但南方在布尔河取得了美国内战爆发后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增加了南方的自信从而下定决心维持反抗的过程。

事实证明战争比在刚开始时所做的任何权威预测都要更加持久，并且更具有破坏性。有估计表明，62 万名美国士兵和海员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生命，这几乎与美国在其他战争中所牺牲的人数总和一样多。到战争结束时，美国的社会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最重要的变化是 400 万奴隶获得了自由。另外，几乎经济生活的每个方面的制度框架（经济推理命题 4）——包括金融、教育、土地政策以及关税政策——都在一些方面得到改变。北方和南方的部分地区快速地从战争中复苏。但与此同时，在南方的部分地区，美国内战后发展起来的制度框架阻挡着昔日奴隶和贫穷白人快速融入美国经济的主流。

战争的经济学

尽管南方对战争拥有大量的自信、天赋以及信念，可结果是，南方悲哀地发现，他们并没有为战争的无限期拖延做好准备。图 14—1 提供了双方所拥有的具有潜在战斗力的可用人员的草图，而且，在实际情况中，南方的 120 万名处于军事年龄中的奴隶不能被用在前线作战，而且在有资格从军的边界地区的白人中，也许只有不到 30%的人认同南方的立场。①

实际上，南方还得使用宝贵的人力去镇压奴隶劳动者的军队。而且，只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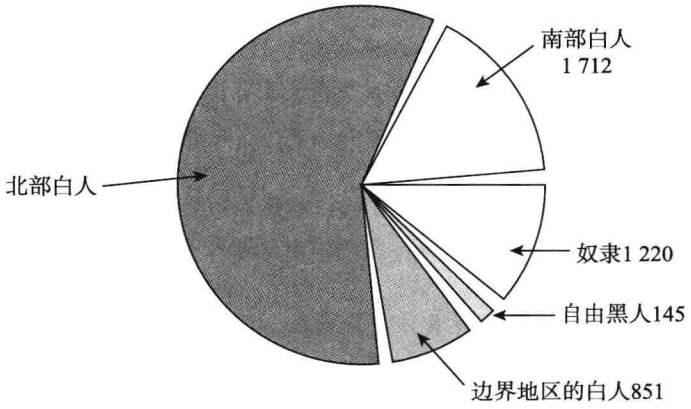


图 14—1　1860 年 10～49 岁男性人口的数量（千人）

资料来源：Roger Ransom，*Conflict and Compromis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Emancipation，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New York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Figure 6. 2.

① Roger Ransom，*Conflict and Compromise：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Emancipation，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New York and 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196.

环境允许，奴隶和自由黑人就会加入联邦军队，这进一步使得军事实力对比朝有利于北方的方向扭转。到战争结束时，联邦军队中的黑人在数量上超过了邦联军队的人数。在计算一支进攻部队战胜一支防守部队的人数时，通常的军事智慧是采用 2 对 1 的比率。到最后，这些计算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北方军队在人数上胜过南方三倍或更多。

在工业生产能力方面，这一比较更加不平衡。依据弗雷德·贝特曼和托马斯·韦思的估计，在 1860 年，北部制造业的价值增值总计 16 亿美元。[①] 在南方，这一增值仅有 1.93 亿美元，而弗吉尼亚就占了一半。弗吉尼亚的里士满也是南方唯一的加农炮制造地点。（现存的原始建筑依然耸立在詹姆斯河边。）最初，任何一方在武器生产方面都不具有明显的优势，并且双方都依赖武器进口。但是北方能够迅速地加快生产，南方却对此束手无策，而且在 1863—1864 年，在联邦海军的封锁切断了南方的国外供给后更深入地击溃了其匮乏的国内制造。

特别是在北方控制密西西比河以后，尤其令南方苦恼的是缺乏运输网络，从而不能充分地向部队提供食物和供给。南方有限的铁路网运载能力已经不堪重负，但主要的短缺是马和骡子方面的短缺。因为战争多数在南方的土地上进行，所以随着战争的继续，南方的动物存量相对于北方在下降。

然而，这些比较并不意味着南方决定进行战争是不理智的。南方希望北方将最终因为不能承受战争造成的巨大人员伤亡，从而同意让南方自行其是。革命军队已经提供了一国从一个军事和经济更强大的敌人手中赢得独立的强有力的例子。（对于罗伯特·E·李来说，这个例子是他家庭历史的一部分：他的父亲轻骑手哈里·李在大革命时期是一位杰出的骑兵部队指挥官。）即使南方遭受了多次失败，在 1864 年夏天，看上去沉闷的战争仍会使林肯再次当选的企图遭受失败——实际上，林肯本人也在怀疑他是否会获得胜利——并且林肯的继任者也许已经签订了一个保留奴隶制的和平协议。然而，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在 9 月份占领了亚特兰大，这使林肯的命运之火再次点燃，而林肯的再次当选也就决定了南方的命运。

南方和北方的贸易与金融政策

除了两家新的由政府建设及运营的军工厂以外，南方维持着农业的中心地位。南方在棉花王国的地位上一开始就很自信，而且战争似乎很快就会结束，这两个方面促使南方采取可增强其薄弱的战争准备的贸易政策。

北方海军的封锁直到 1863 年才起到了实际作用。正因为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南方得以生产并出口其特色农作物，尤其是把棉花运往英国以交换军火及制造品。然而，邦联政府却不鼓励出口，寄希望于迫使英国政府做出支持南方的努力；在 1861—1862 年期间，南方的 400 万捆棉花收成中仅仅出口了 13 000

①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 *A Deplorable Scarc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捆。南方政府还发布了禁止把棉花销往北方的禁令。虽然“棉花灾荒”给英国的雇主和工人强加了苛刻的成本，英国却不能偏离它的中立地位。事后看来，很明显这些政策削弱了南方在战争时期的努力。

除了生产和贸易问题，南方同样也面临财政困难。尽管有一些由棉花支持的债券在欧洲出售，绝大多数外国人不愿意借款给邦联政府，特别是在北方海军的封锁开始发挥实际作用的时候。同时，因为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采取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来征税也被证明是艰难的。因此，南方的战争原料和支援主要是依赖通货膨胀的手段——发行纸币。它的支出只有40%是以税收或借款为基础。

在图14—2中，南方的价格与货币指数清晰地表明了与货币存量相比，价格的上升速度更快，并且在最后的月份已经是恶性通货膨胀。有两个原因可以解释价格与货币之间存在的断开的缺口：南方的产出以及对南方通货信心的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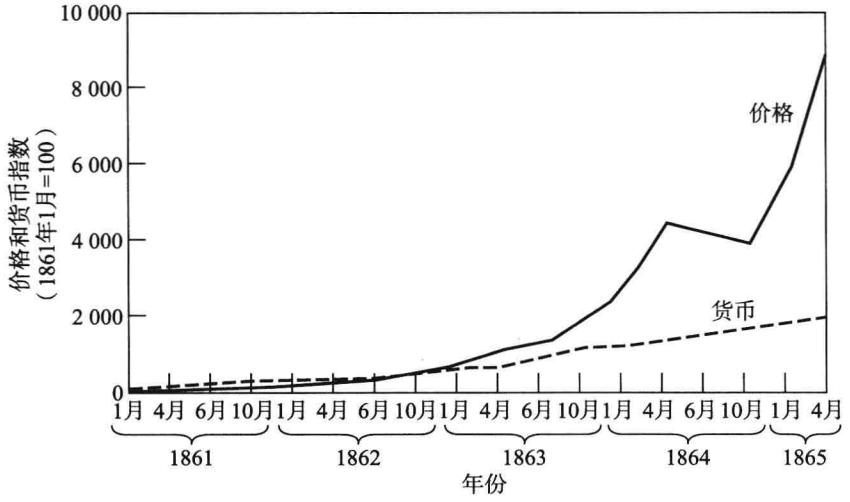


图14—2　邦联的高通货膨胀

在美国内战刚开始时，通货膨胀率并不是很高，但是邦联货币的价值到战争结束时大约相当于其初始价值的1%。

资料来源：E. M. Lerner，“Money，Wages，and Prices in the Confederacy，1861—1865，”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3 (February 1955)：29.

一份1864年有关交换的日记账揭示了对邦联货币的信心的下降：

她为5打鸡蛋向我要价20美元，然后她说可以接受邦联钞票。那么，我非常乐意给她100美元。但是如果她向我要求支付纺纱的话，我会在纺纱上与她讨价还价，锱铢必较！当他们要求邦联货币时，我从来不会犹豫。为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快乐地支付给他们20或50美元。①

① 日期为1864年3月7日，摘自 *Mary Chesnut's Civil War*，ed. C. Vann Woodward (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749。

尽管邦联显示了英雄主义以及冒险精神，联邦军队日益扰乱并且占领了越来越多的南部领土。到1861年晚些时候，联邦军队控制了密苏里、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在1862年春，他们攻占了新奥尔良，切断了主要的南方贸易出口。到1863年，多亏尤利西斯·S·格兰特领导的光辉战役，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都处于联邦军队的控制之下。谢尔曼的部队在1864年穿越了佐治亚，在那里他遵循一个蓄意破坏该地区的生产力的政策，使得邦联分裂，从而切断了北部弗吉尼亚的李的部队的重要供给途径。

一旦联邦的胜利指日可待，邦联中自信心的衰减就更加迅猛，在战争期间的最后月份里，南方经历了天文数字般的通货膨胀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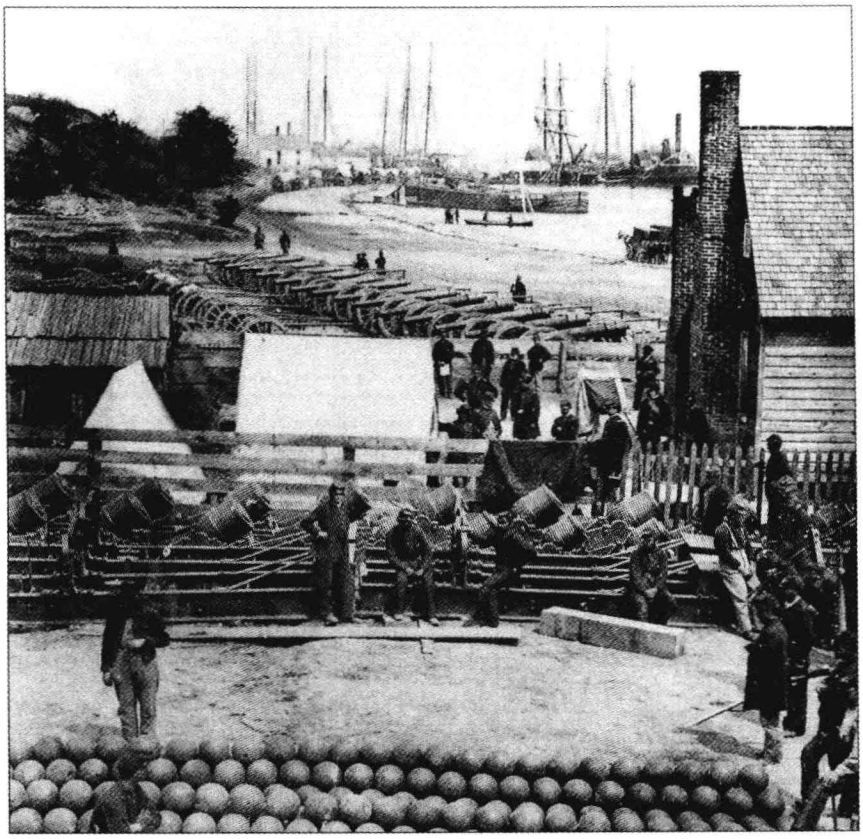
在北方，战争所造成的经济上的紧张没有南方经历的那么严重，但即使如此，战争的代价也是极其高昂的。大部分的劳动力都被重新配置到战争人员中去，同时因为棉花贸易的中断和南方债务方面的大量违约行为，产出的组成部分也发生了变化。在1861年的刚起步阶段发生了急剧的金融恐慌，而且银行延迟支付硬币。由于美国财政空虚，政府迅速增加税收并销售公债。税收方面的变化包括个人和公司收入的第一联邦税。但是最明显的增加是在关税以及更大范围商品的国内税收——包括酒类、烟草（今天依然存在）以及铁、钢和煤——以及制造业出口的特定税种。尽管这些方面的税收有所增加，但公债销售却带来了将近三倍的税收收益。

联邦政府同样也求助于通过通货膨胀来融资。纸质票据得以发行，因为它们的颜色而被称为“绿背”纸币（同样也因为它们是由绿墨水而不是被金银所支撑）。它们广泛地流通，但其价值相对黄金而言却下降了。[①] 在1864年，一单位黄金美元与2.5单位绿背纸币等值，同时以绿背纸币衡量的1864年的价格是1860年价格的两倍。不过，北方还是避免了困扰着南方的恶性通货膨胀。

美国内战与北部工业化

当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和路易斯·哈克（Louis Hacker）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作时，提出了对美国内战的迷人的经济解释，即战争刺激了北方的工业扩张。比尔德-哈克命题强调了政治权力从南方耕种者向北方工业资本家的转移。当在国会拥有新的势力后，北方立法者通过的法律倾向于统一市场以及推进工业化。从战争期间所设项目的范围来看，非常显而易见，包括国家银行体系的设立、关税的增加（为了保护美国工业而避免来自国外的竞争）、赠地大学法案，以及为横贯大陆的铁路赠与土地。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里详尽地讨论这类立法的效果；在此有必要特别指出随后的研究对这些变化的整体效果提出了疑问，虽然这并不否认其在个人和地区上的重要作用。经济中

① 绿背（纸币）是私人还贷的法定货币（包括银行对储户存款的偿还），但却不是支付关税的法定货币——这需要用黄金来支付。



南方无法与北方生产的大量军火相提并论。

的总产出无论如何有可能是几乎一样的。

比尔德-哈克命题同样强调战争刺激了经济并且增加了投资。在随后的研究中，这一部分的命题基于对经济活动的估计同样被驳回，而在其观点（经济推理命题5）形成之时并不能够对经济活动进行估计。当我们发现在每一年都有接近100万名男子——或者说是在750万名劳动力中占几乎15%的劳动力——加入了战争时，也许这一点就毫不奇怪了。在这些正处于工作年龄的士兵中，259 000名邦联男子以及360 000名联邦男子牺牲了，并且还有251 000名南方人以及356 000名北方人受伤。1个牺牲的人以及1个受伤的人分别对应着6个奴隶获得自由以及使得10个南方人维持在合众国的框架里。克劳迪亚·戈尔丁和弗兰克·刘易斯估计这些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经济推理命题2）的持久损失有将近18亿美元的经济价值（北方承受了10.6亿美元的损失，而南方的损失有7.87亿美元）。而且，北方对战争的直接支付达23亿美元；南方通过直接的政府开支支付了10亿美元。另外有相当于15亿美元的财产遭到了破坏，它们大部分处于南方。这些加总起来达66亿美元，也许是我们1860年国民收入的两倍多，超出1860年全体制造业价值增值的8倍多。

美国内战的悲剧掺杂在1860年的现实中，当时奴隶的市场价值大约为

30.6 亿美元。[①] 战争的成本是购买奴隶的成本的两倍多。这并不意味着在战前和平废除奴隶制是现实的。自 1845 年以后，像英国在西印度群岛所采取的和平废除奴隶制的做法在南方被认为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南方人确信西印度群岛的经济举步维艰，而且奴隶所有者在解放奴隶的过程中丧失了财富。

斯坦利·恩格尔曼和罗伯特·高尔曼的研究提出了更充分地拒绝比尔德-哈克关于内战刺激战后工业化这一观点的理由，如表 14—1 所示，全体商品产出和制造业产出的增长速度在战后并不高于战前，甚至可能还低于战前。

表 14—1　　1840—1899 年间产出平均增长率（%）

年份	美国经济	制造业部门
1840—1859	4.6	7.8
1860—1869	2.0	2.3
1870—1899	4.4	6.0

资料来源：Robert E. Gallman, "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 in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24, Series on Income and Wealt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即使在北方的各种各样的军工厂，也并未出现产出的巨大增长。大体来说，北方产出的新方向在多种部门内被适当调整。事实上，在战争年份里最令人吃惊的方面是，对制造业而言只具有短暂的刺激。用于小型武器的铁的产量增加了，但是用于铁路建设的铁的产量减少了。虽然军人的衣服和长筒靴的需求的增加刺激了制造业，但南方市场的丢失足可以冲抵这一方面。例如，在马萨诸塞州——靴和鞋的生产中心——在战争期间，重要产业中的雇员和产出几乎都减少了1/3。类似地，没有棉花原料，纺织品制造工厂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确实，对适龄男子的征募改善了失业率，投机倒把活动对于一些被挑选出来的少数人而言提供了一个发财的机会。然而总的看来，联邦政府的支出并没有刺激快速的工业化或者经济扩张。

我们一直在细节上考虑关于比尔德-哈克命题的争论，因为它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定量证据的重要性。一个命题也许具有说服力，同时它也许有大量的事实证据支持，但它同样可以是错误的（经济推理命题 5）。

①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 The Burden of Slavery and the Impact of Emancip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3), (Summer 1988): 151.

南方经济发展滞后

从南方和北方的相对地位来看，战争的经济后果是一个显著的逆转。如表14—2所示，1860年北方的人均实际商品产出略低于南方（74.8美元比77.7美元）。到1870年，北方的人均资本产出比南方多出接近2/3（81.5美元比47.6美元）。这一优势在1880年继续保持。这一逆转的主要来源并不在于北方和中西部的进步，而是在于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的短时期内南方产出戏剧性的绝对减少。

表14—2　按地区分类的平均资本的商品产出（美元，以1879年价格计算）

年份	南方之外	南方
1860	74.8	77.7
1870	81.5	47.6
1880	105.8	61.5

资料来源：Stanley Engerman，"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 (Spring *1966*)：*181*.

然而，由此认为整个南方的经济都陷于停滞是不正确的。1870年和1880年的人均资本商品产出的图形表明，南方的增长率最初很快并且接近北方2.6%的年增长率。然而，如此高的增长未能持续，而且在南方地区之间分布得也并不均匀。表14—3估计了南方腹地最依赖棉花的五个州（路易斯安那、佐治亚、密西西比、南卡罗来纳以及亚拉巴马）的以实物衡量单位资本的个人收入的增长率，并估计了自1879年至1899年间其他的八个州的情况。很明显，南方各州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有一些州的增长率是组成南方腹地的州的两倍多。

表14—3　在1877—1899年间，按州分类的每资本的个人收入的固定美元份额的年度增长率

州	每资本的个人收入的年度百分比增长率（%）
路易斯安那	0.44
佐治亚	0.81
密西西比	0.96
南卡罗来纳	0.98
亚拉巴马	1.14

续前表

州	每资本的个人收入的年度百分比增长率（%）
5 个棉花州	**0.86**
北卡罗来纳	1.38
肯塔基	1.42
阿肯色	1.43
田纳西	1.89
弗吉尼亚	2.15
西弗吉尼亚	2.26
得克萨斯	2.53
佛罗里达	2.64
13 个南部州总计	**1.54**
美国	**1.59**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Richard Easterlin, "Regional Growth of Income: Long-Term Tendencies, 1880—1950," in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nited States 1870—1950*, vol. 2, *Analyses of Economic Change*, eds. S. Kuznets, A. R. Miller, and R. A. Easterlin (Philadelphia: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1960), 185.

正如这一证据所表明的，南方的制造业比南方的农业更及时地从战争中反弹。到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南方的制造业已经接近其战前水平，而且南方的交通网络（以蒸汽机、公路和铁路为基础）已经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这一新生非常轻松，除了修复和重置以及谨慎地增加资本外，其他要做的并不多。事实上，正如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美国内战前所注意到的，快速的战后复苏在历史长河中很常见：

> 敌人用烈火与刀剑给一个国家留下一片废墟，摧毁或是带走了几乎所有能移动的值钱的东西；所有的居民都没落了，然而在一些年以后，每一件事都会与它之前的一样……迅速修补巨大灾难的可能性主要依赖于这个国家的人口是否减少了。如果它的有效人口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被消灭，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内也不会挨饿，然后，因为人们拥有与之前一样的技能和知识，因为他们的土地及其持久的改进未被破坏，还有就是更坚固的建筑未遭受损失，或者仅仅是部分受损，那么他们就获得了创造原先产出的几乎所有的必需品。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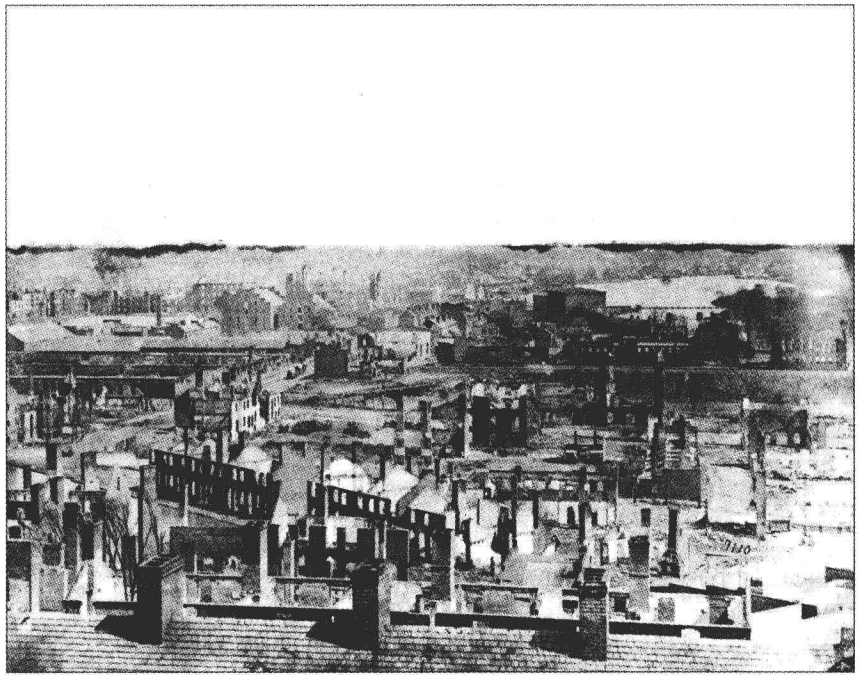
快速的更新通过消除瓶颈得以推动。例如，南方的铁路网在战争结束时已经停止运行，大部分归咎于缺乏机车，也有部分原因是铁轨被破坏；路基、专业劳动技能以及相当多的铁轨仍然保持完好但不能继续使用。迅速投资在根本上互补（机车与损坏的铁轨）的资源，将会重新启用其他现存的资源（劳动力、路基以

① J. S. Mill,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8, Book I, chapter 5, section 7, http://socserv2.socsci.mcmaster.ca/~econ/ugcm/3113/mill/prin/index.html.

及可用的轨道)。这将启动更新的迸发，并且与其他类似的迸发一起，从而能导致一个短暂的高增长阶段。在这些并不常见的投资机会被充分地挖掘出来以后，重新维持一个长期、缓慢的增长过程。①

然而在农业方面，南方的复苏前景却迥然不同。林肯的《奴隶解放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对白人和黑人来说，改变了南方农业社会的构成方式。结果就是农业方面产出的巨大下降，尤其是在战争末期以及战后几年。由于缺少奴隶，南方的农业部门在一些年里肯定是靠自力更生，但是，由废奴活动所带来的政治、社会及经济方面的调整在很多年里都延缓了更新。

南方的产出减少，尤其是在产棉的南方腹地更是如此，这一衰退比单纯由战争所造成的破坏更加深入。实际上，从 1857 年至 1879 年，南方腹地的农业产出平均每年下降 0.96%。



RECORDS OFFICE OF THE CHIEF SIGNAL OFFICER; NATIONAL ARCHIVES

在弗吉尼亚的里士满，美国内战带来的破坏。

南方腹地的衰落

南方腹地五个主要的产棉州——南卡罗来纳、路易斯安那、佐治亚、亚拉巴

① 更多关于更新式增长理论的阐述参见 Donald F. Gordon and Gary M. Walton, "A New Theory of Regenerative Growth and the Post-World War II Experience of West Germany," in *Explorations in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Douglass C. North*, ed. Roger L. Ransom, Richard Sutch, and Gary M.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2), 171 - 192。

马以及密西西比——已被证明经历了巨大的挫败（表 14—3）。这一骤然衰落源于三个主要原因。

第一，高效的种植体系被破坏了，并且对种植方法的复兴方面所作的尝试被证明是无效的。自由黑人逃避流水线式、从早到晚被驱使的高强度的团体劳动方法，正如他们一直以来总是被自由白人所驱使的那样。在种植区兴起了许多更小型的单位——有一些是拥有，多是租佃，还有许多分成耕种（拥有土地的人与佃农之间分享收成）。表 14—4 描述了在 1860 年至 1870 年之间南方腹部地区农场规模的变化。虽然在 1860 年有 61%的农场规模少于 100 英亩，在 1870 年则有 81%的农场规模在 100 英亩以下。基于密集驱使奴隶劳动的规模经济消失了。

表 14—4　　五个主要棉花州的农场规模的分布情况

增加的英亩数	按规模分类的农场所占的百分比（%）		按土地规模分类的百分比（%）	
	1860 年	1870 年	1860 年	1870 年
3～49	36.9	60.9	7.4	20.2
50～99	24.2	19.8	12.0	19.6
100～499	32.0	17.2	47.6	49.1
500 以上	6.9	2.1	33.0	11.0

资料来源：Roger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1.

第二个密切相关的原因是劳动力非常明显地退出土地，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毫无疑问，人力的再配置增加了家庭产出并提高了生活质量，但它还是带来了从 1860 年至 1870 年间南方腹部地区的人均农业产出 30%～40%的下降。

第三，因为来自印度、巴西以及埃及的竞争，同时因为世界需求的增长减缓，对南方棉花需求的增长放缓了。美国南方在 1860 年曾经主导世界市场，占据 77%的英国进口。[①] 然而在战争期间，当大门向新的竞争者打开后，英国仅有 10%的棉花进口来自美国南方。南方的市场份额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期曾有过强劲的反弹，然而它再也未能恢复到 1860 年的高水平。

南方腹地在战后即时开始衰落是在人们的预期之中。悲剧的是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南方的农业生产仍然令人沮丧。南方腹地的衰落最令人困惑的方面是棉花产业上的集中。与战前的小型南方农场不一样，战后的小型农场，尤其是那些昔日奴隶所耕种的地方，在棉花业方面转变成高度的专业化。在 1860 年，五个主要的棉花种植州，82%的非奴隶农场（占所有农场的 85%）种植棉花，而到了

① See Thomas Ellison, *The Cotton Trade of Great Britain* (Augustus Kelley, 1968), cited in Gavin Wright, "Cotton Competition and the Post-Bellum Recovery of the American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611. Also see Gavin Wrigh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New York: Norton, 1978), and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1870年，97%的农场都在种植棉花了。[①] 而且，与1860年相比，在1870年，每个农场都将更多的土地用于棉花生产。事实上，虽然在战前，多数奴隶种植园在食物方面自给自足，但现在南方腹地却成了粮食进口地区。大多数以种植棉花为生者是黑人农民，棉花占他们庄稼收成的85%，而白人农民的这一数字是60%～70%。白人土地所有者在棉花方面投入的土地更少；白人佃农的棉花产出几乎是白人土地所有者的两倍，黑人佃农的产出则几乎是白人土地所有者产出的四倍。尽管棉花价格在19世纪70年代下滑，却出现了对棉花种植的更多依赖。

棉花生产的集中是不理性的。斯蒂芬·德卡尼奥（Stephen DeCanio）已经论证了南方在棉花生产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并且南方棉农对棉花价格与北方麦农对小麦价格一样反应灵敏（经济推理命题3）。[②] 不过，棉花经济所能提供的有限经济替代将昔日奴隶终生束缚在受贫困折磨的生活上。要明白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必须探讨从奴隶制到自由的转变，以及新的经济组织如何取代旧的经济组织。

战争的不平等

美国内战中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低收入群体的男性。当全民动员的需求日益明显时，战斗双方都努力去获取男性战斗人员，而且双方都允许应征入伍者通过聘请愿意替代他们去应征的人员来全部买断他们的服务。从这个时候开始，战争就被广泛而且恰当地看做是“富人的战争和穷人的战斗”。虽然这一政策使得穷人背负战争的负担，但它无疑具有效率上的优势。交易是自愿进行的，并且如果更高的劳动机会成本被更低的劳动机会成本所替代，那么战争的总成本就减少了。然而不平等仍然存在。

在北方，城市里出现了最强烈的不满，尤其是在有大量移民居住的纽约。特别是爱尔兰人，他们认为应征入伍的重担将降临到他们头上。在1863年7月，示威人潮连续四天汹涌在纽约大街上；2万联邦军队被急派来镇压这场骚乱，从而导致了105人死亡。

大规模的征兵也许被认为通过减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从而提高了大后方工人的实际工资，但这并未发生。

如图14—3所示，在北方，价格的上升快于工资的上升。因此，实际工资（工资除以价格），即工作1小时所能购买到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下降了。第一个研究这一问题的人韦斯利·C·米切尔认为，由于工人（同他们的雇主）受工资的习惯性条例影响，工人实际上很难有效地更新合同。他相信，由于工资的停滞增长，使得能在战后被用于投资的利润急剧增加了，另外一个理由就是战争促使工业化进程加速。[③] 然而雷本·凯塞尔（Reuben Kessel）和阿门·阿尔奇安

① 数据来源于Ransom，*Conflict and Compromise*，Table 7-3，257。

② Stephen DeCanio，*Agriculture in the Postbellum South*（Cambridge，Mass：MIT Press，1974）.

③ Wesley C. Mitchell，*A History of the Greenbacks*（Chicago，1903），347.

(Armen Alchian) 指出，真实工资的下降同样可以用税收和进口商品价格的提高，以及其他实际因素来解释。[①] 随后，斯蒂芬·德卡尼奥和乔尔·莫凯 (Joel Mokyl) 的研究表明通货膨胀预期的错误可以解释大约 2/3 的实际工资的下降，而实际因素可以解释大约 1/3 的下降。[②] 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北方的劳动者在收入方面出现了大幅下降，但是劳动力市场却无力快速应对通货膨胀，这使得该情况更加恶化，而本来他们可以做得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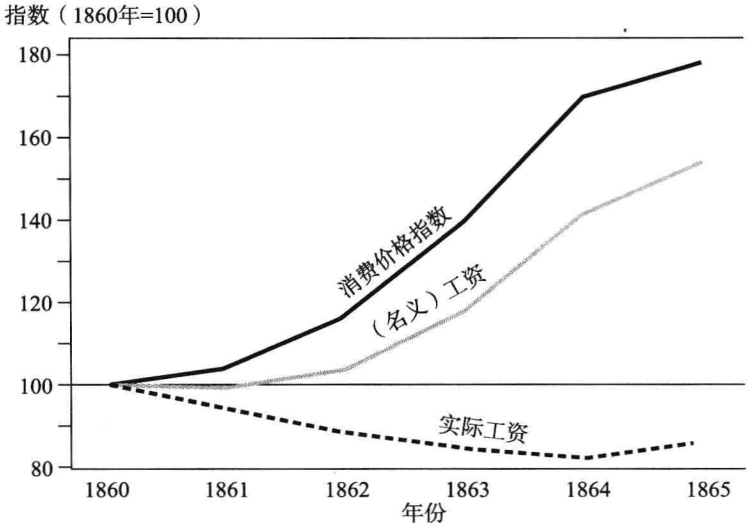


图 14—3　美国内战时期的工资停滞

资料来源：Reuben A. Kessel and Armen A. Alchian, "Real Wage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 Mitchell's Data Reinterpreted,"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460.

南方的不平等状况更值得注意。在 1862 年 10 月，南部募兵法转而允许任何一个拥有 20 个或更多奴隶的人免税。尽管免税只惠及极少数人，但它却造成了极大不满。小农场主主要依赖于自己的劳动，对他们的农场经营状况恶化感到非常担忧，然而富人的种植园却依然如故。弗吉尼亚的 R. M. 布拉德福德在 1864 年 10 月致信邦联军队的秘书：

> 人们不会总是屈服于这样不平等的、不公平的以及有偏见的利益分配，还有对身体健全的全部贫穷白人的征兵而有钱的健康男性却处在极度安逸之中。[③]

南方没有利用奴隶参加战争，因为奴隶主和奴隶都知道敌人提供了通往自由

① "Real Wage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 Mitchell's Data Reinterpreted,"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② "Inflation and Wage Lag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311 - 336.

③ R. M. Bradford to James Seddon, quoted in Paul Escott, *After Secession: Jefferson Davis and the Failure of Confederate Nationalism*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8), 119.

的途径。[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因为受19世纪60年代早期格外高的价格所刺激，奴隶努力种植棉花，结果却受挫于南方对英国的贸易政策。当这些堆积如山的棉花在乡村和码头日渐腐烂，这些极其重要的劳动大多数被浪费了。

奴隶制度的遗产

《宪法第十三修正案》使得所有奴隶获得了自由；《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确保没有“州可以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如果不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的话”，并且保证“居民投票的权利不被剥夺”。战后这些修正案被迅速地通过了，但是这对于确保黑人能取得不断的进步却并不充分。新自由的起始阶段毫无疑问对于黑人而言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有很多南方白人也从中受益。图14—4刻画了按种族分类的再分配以及收入水平的变化。除此之外，就1860年南方腹地白人持有的平均财富而言，种植园主持有81 400美元，拥有奴隶的小农场主持有13 300美元，没有奴隶的农场主持有2 400美元。在1870年，南方腹地白人平均持有3 200美元。对北方佬以及对黑人的愤怒反映了白人财富的下滑及其对北方控制的憎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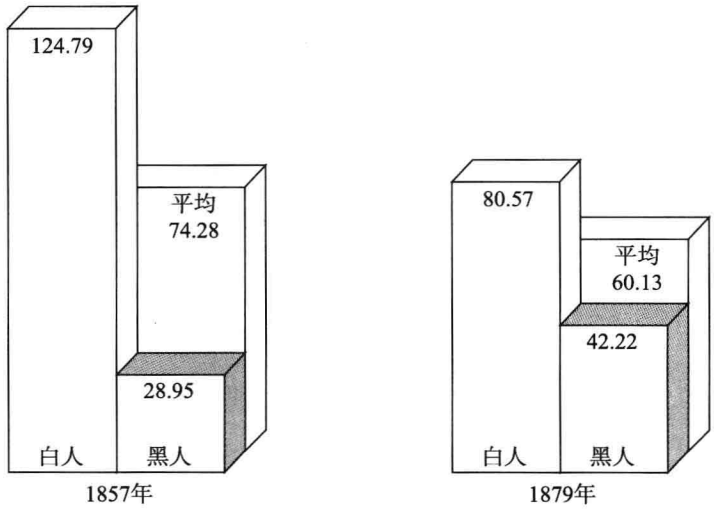


图14—4　1857—1879年间南部腹地按种族分类的人均农业产出的分布（美元）

资料来源：Richard Sutch，“Growth and Welfare in the American South，” in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ew South 1865—1900*，eds. Gary M. Walton and James F. Shepherd (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1)，145.

土地改革瓦解了南方种植园，并把土地给予昔日奴隶，这一改革是由国会中

①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南方政府曾有雇用奴隶作战的计划。

激进的共和党所推动的。这也许使得南方，最终是整个国家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历史过程。众议院和参议院都通过了给每个黑人家庭 40 英亩土地的议案，但是时任总统的安德鲁·约翰逊否决了该议案。除了在一些分离的地区，如佐治亚的爱尔兰海域以及邦联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的前种植园，那里的土地改革在推动一个稳定的农业社会方面被证明是成功的，大多数的土地仍然掌握在战前持有这些土地的人手中。罗杰·兰塞姆和理查德·萨奇证明了在 1870 年最富有的 1/5 的人仍然掌握着 70%的土地，仅仅比 1860 年下滑了 2 个百分点。[①] 而且，通过保护昔日奴隶的国内权利，北方共和党旨在确保南方有稳固政治根基的权力是受全国范围内的经济条件制约的，并且也受制于南方有效供给的缺乏。当法庭支持约翰逊总统签署的对宣誓效忠联邦的南方任何人实行特赦这一总统令时，老的邦联分子开始夺权——通过暴力手段的协助，包括新近形成的三 K 党（Ku Klux Klan）。保护黑人权利的宪法修正案被颠覆了，而且黑人最终被剥夺了选举权。

受战争的即时余波影响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在州与州之间迁移的昔日奴隶。这些活动多数可以被解释为，昔日奴隶想重新组织因奴隶时期所造成的破碎的家庭。也有可能是很多昔日奴隶想再去他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看一眼，这一权利在奴隶时期是他们所不具有的。然而，从 1870 年至 1890 年，如菲利普·E·格雷夫斯、罗伯特·L·塞克斯顿和理查德·K·维德尔所表明的，南方内部的黑人移民与南北战争前的时期相比减少了。[②] 虽然每当更多地考虑经济上的因素时，奴隶所有者通常都会迁移或者是出售奴隶，昔日奴隶同样能权衡离开家庭朋友以及熟悉的组织的成本（经济推理命题 1 和 2）。一直到 1910 年后，前往美国北方的黑人移民才真正多起来，也就是在那时候，由于北方工资的提高、对更好的生活的迫切愿望以及早一代移民所提供的信息等诸多因素，鼓励了大规模的人员外出。这一重要的北迁浪潮向黑人开辟了拥有新的工作岗位的机会并且激励他们向具有更高收入的群体流动。[③] 不过，在 1910 年之前，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不得不以南方的农业为生。大多数只是靠双手去挣取极低的工资。然而很多人仅仅作为佃农在土地上劳动，或许还有数量少得令人吃惊的土地所有者。

经济透视 14.1

美国内战期间北方的劳动力市场

下面的劳动力供给需求图表明：即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在美国内战期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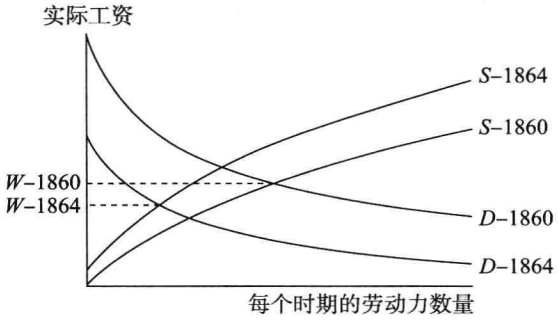
①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79.

② Philip E. Graves, Robert L. Sexton, and Richard K. Vedder, "Slavery, Amenities, and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A Note on Migration and Freedom,"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 (1983): 156 - 162.

③ Thomas N. Maloney, "Migration and Economic Opportunities in the 1920s: New Evidence on African-America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Nor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1), (2001): 147 - 165.

的北方实际工资也会下降。$S-1860$ 是内战之前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1860$ 是内战之前的劳动力需求曲线。

对于 $S-1864$ 曲线而言，因为军队的扩大，从而减少了劳动力供给。如果其他方面不变，这将会提高实际工资。但是对劳动力的需求源于对最终产品的需求。产品税的提高（国内货物税）以及进口产品成本的增加都减少了利润以及对劳动力的需求，1860 年的劳动力需求曲线 $D-1860$ 向下移动到 $D-1864$。因为需求的变化大于供给的变化，从而使得 1860 年的均衡实际工资 $W-1860$ 下降到 $W-1864$。



正如图 14—5 所表明的，黑人拥有耕地的 30%，而白人拥有 70%。在 1880 年，将近有 70%的农业劳动力是黑人，但他们仅拥有不足 10%的土地。（由图可见，如果从事农业的 30%的人都是黑人，并且其中仅有 32%的土地所有者是黑人，那么，黑人仅占有 0.3×0.32 或者说 9.6%的土地）。如果还有来自南方白人的抵制和敌意的话，很难想象黑人还能拥有这些已经少得可怜的土地。土地的 2/3 由黑人租佃，这 2/3 的土地的所有者分成收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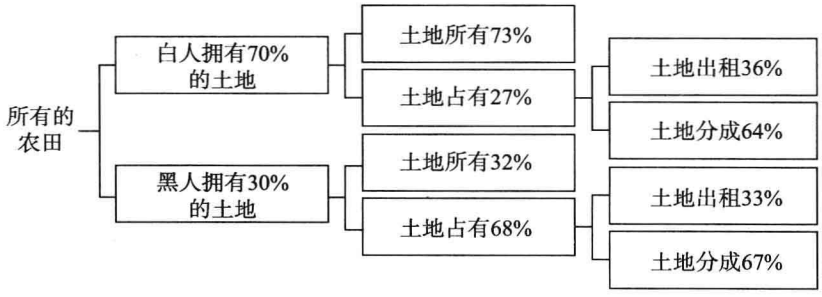


图 14—5　1880 年按种族分类的南方腹地的农田所有权和使用情况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Roger L. Ransom and Richard Sutch,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84.

正如以上我们所表明的，分成收租的基本理念非常简单。与为使用土地而以美元支付一个固定的年度总额不同，收成分成是在收获庄稼后与土地所有人分取收成。标准的年度合约是土地所有者与佃农之间五五分成。经济史学家们一直对

分成收租的利润和成本争论不休。对于兰塞姆和萨奇而言，租佃农业，尤其是分成租佃，是一场灾难，因为这迫使昔日奴隶依赖棉花，无论如何还使昔日奴隶处于类似于奴隶时期俗称“负债累累的苦工时代”的境况。

然而，其他一些收成分成的效仿者们则认为至少与其他可采用的替代方法相比，它具有很多优点。昔日奴隶们和贫穷白人从日复一日的被人指手画脚的生活中赢取了独立，得到了挣钱的机会。收成不好的年份里的风险——也许是因为农作物不好的生长情况或者是不常见的低价格——得以与土地所有者分担。而且，正如同约瑟夫·里德所指出的，这一分成合约使得土地所有者在整个农作物生长季节里有激励去保持对农场的兴趣，并且有动力去与佃农分享诸如农作物产出的价格此类的信息。[①] 在大型农场，这样的信息分享会变得很困难，这都是由租佃关系引起的。[②] 正如同分成的租佃人可与土地所有者分担一部分收成不好的风险一样，他同样可以部分地分享他自己努力劳动的成果。佃农有激励去巧妙地计划长期投资。佃农之间的竞争以及构建租佃合约的激励只能部分地抵消在包含长期投资上进行租赁的消极影响。

与此同时，信贷体系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乡村信贷的来源是白人拥有的乡村商店。农民从这里购买他所需的包括食物的大部分供给。典型的情况是，乡村商店通常有两种价格体系，一种是用现金购买商品的价格，另一种是赊买但在收割庄稼后进行支付的价格。加价是十分昂贵的，赊买通常意味着每年 40%～70% 的利率。在收割后未能清偿债务的农民通常不得不抵押下一年的庄稼以获得连续的信贷。在很多州通过的“作物留置权”法使得这一交易成为可能。作物留置权是一种强有力的控制手段，而且店主（在整个南方乡村有将近 8 000 个）很快就学会了坚持要求以棉花支付债务，从而他们能长时间地控制他们的债务人。佃农也由此被棉花“锁住”了。[③]

高利息率是店主的信贷高成本、店主面对的高风险和店主占有的地方垄断势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战后南方农村银行体系的缓慢恢复也直接影响店主做生意的成本以及维护他们的垄断地位的成本。《国家银行法》设定的最低资本金要求使得在小城镇里很难开设国有银行并且也通常很难同时开设两家或两家以上。[④] 银行立法同时使得各州不可能特许银行发行银行票据，而是直接把国家银行通过发行票据所获得的资金用于联邦债券而不是用于给当地的贷款。在 20 世纪初，随着州和联邦银行监管体系的放松，存款银行的发展带动了南方利息率与国内其他地方的利息率水平相一致。至于店主索要的高利息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垄断势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供给信贷的高成本，人们存在着一些不同意见。

---

① Joseph Reid, “Sharecropping as an Understandable Market Response: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106 - 130.

② Lee Alston and Robert Higgs, “Contractual Mix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since the Civil War: Facts, Hypotheses, and Te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2): 327 - 353.

③ 更多关于战后南方的讨论，参见 Ransom & Sutch (1977) 所著 *One Kind of Freedom* 及论文集；Gary M. Walton & James F. Shepherd, eds.,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ew South 1865—19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January 1, 2001) 在 *One Kind of Freedom* 的特刊。

④ 直至 1880 年，深南部才有 42 家国有银行，而全国共有 2 061 家。

但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对于那些处于债务陷阱中的农民而言，结果都是极端贫困，以及能自由选择的机会更少了。

表 14—5 是对 1859 年奴隶的真实收入以及 1879 年分成佃农的真实收入的估计。就可使用的收入（可用于食物、衣服和住房）而言，废除奴隶制对奴隶而言仅仅是中等程度的恩惠。分成佃农具有更大的自由去支配他们有限的收入，而在 1859—1879 年间，黑人的真实可支配收入仅以平均每年 1.87%的速度上升。而且，描绘 1879 年情形的图形也适用于所有的黑人分成租佃者。对于那些必须以劳役偿债的人来说，其收益更是少得可怜。只有当可以对所增闲暇时间的货币价值进行补贴时（减少的工作时间乘以农业劳动的工资），从废除奴隶制中获得的物质收益才会真正变得很大。①

表 14—5　　奴隶和分成租佃者

	1859 年大种植园里的奴隶（美元）	1879 年分成租佃者（美元）	年度增长率（平均每年的百分比，%）
收入（1879 年美元）	27.66	40.24	1.87
增加的闲暇时间的价值	—	33.90[a]	—
总计	27.66	74.14	4.93

a. 对高数值和低数值的平均估计。

资料来源：Kenneth Ng and Nancy Virts, "The Value of Freedo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December 1989): 959.

对于整个南方而言，用劳役来偿债这一问题并非是难以摆脱的。回想一下表 14—3 的证据，诸如弗吉尼亚、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这些州，它们在战后显示出显著的复苏以及持续的提高。普赖斯·菲什巴克的研究表明，19 世纪 80 年代佐治亚的分成农民一般都能在收割后清偿他们的债务，而且他们的债务负担是不断减少的。② 罗伯特·希格斯和罗伯特·马戈的研究表明，在有些地区，尽管黑人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但他们却能够攀升到农业阶层的顶端并且成为他们所在农场的所有者。③

由于多种因素起作用，劳役偿债这一紧张局势因而渐渐减弱。非常奇怪

① 了解战后南部的贫穷状况，我们可以应用数据方法和其他学科的原理，一个很好的例证是 Jerome C. Rose,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Segregation and Economic Deprivation: A Post-Slavery Population from Southwest Arkansa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1989): 351 - 360。Rose 通过研究黑人遗骸来分析其疾病和营养问题。

② Price V. Fishback, "Debt Peonage in Postbellum Georgi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6 (1989): 219 - 236.

③ Robert Higgs,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1982): 725 - 735; Robert A. Margo,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One: Comment and Further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768 - 776; and Higgs,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777 - 7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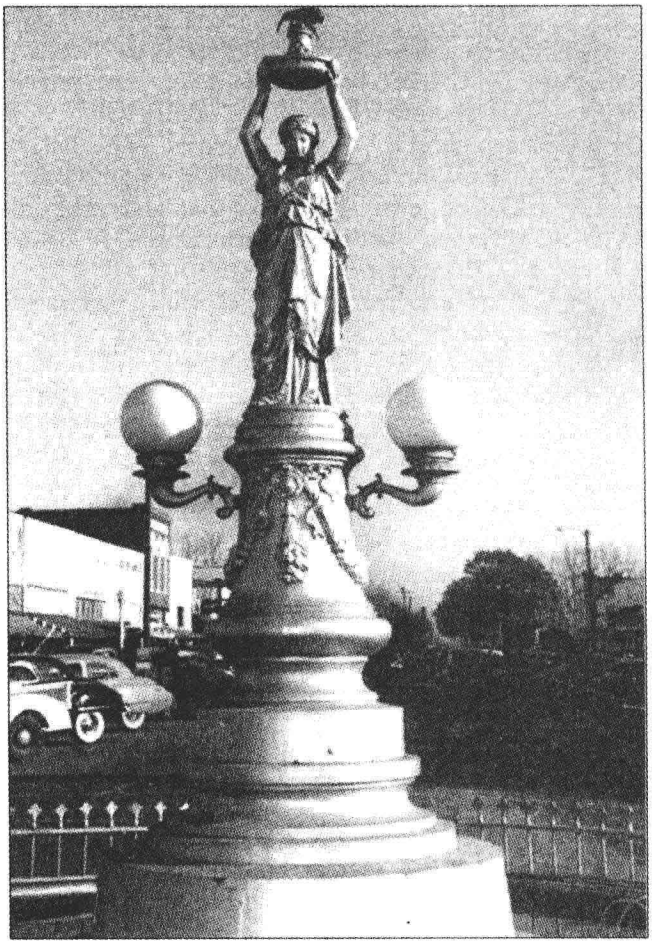
© CULVER PICTURES

这张于 1875 年拍摄的夫妇合影，是美国内战后南方许多黑人的典型写照——在奴隶解放 12 年后，仍陷于贫困之中。

的一个因素是棉铃象鼻虫，这是一种攻击棉花并且在世纪之交后逐渐在南方腹地蔓延开来的昆虫。对于个体农户来说，棉铃象鼻虫可以看做是一场悲剧，因为他们的庄稼被摧毁并且他们很难用已被昆虫大肆破坏的土地去获得信贷。然而，在有些地区，长期的后果却是有利的：棉铃象鼻虫迫使农民转种其他农作物，这也被证明是有利可图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改进后的公路以及汽车也逐渐削弱了当地店主的垄断势力。在芝加哥，日益增多的大型邮购商铺也使得店主在供给特定种类的农业机械方面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换个角度来看，是否是分成租佃者从最低一级的梯子沿着农业社会的阶梯向上攀升也许并不必要。正如詹姆斯·R·欧文和安东尼·帕特里克·奥布莱恩所证明的，在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从农业劳动力向佃农的转移是引人注目的经济进步的来源。它揭示了在此地区为什么工资如此之低。①

然而，比上述因素更重要的是整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为农业提供了替代选择的机会。南方的工业化是由南方的政治家、报界人士和教会领导者所宣称的“新南方”运动的目标。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如伯明翰的工业、北卡罗来纳的烟草工业以及移往南方的棉纺织

① James R. Irwin and Anthony Patrick O'Brien,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African-American Incomes in the Mississippi Delta, 1880—191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2001): 166 - 180.



SERIES VII.1, PHOTOGRAPHS, BOX 7.1/3, FILE "I PHOTOGRAPHS - BOLL WEEVIL MONUMENT, ALABAMA." USDA HISTORY COLLECTION, SPECIAL COLLECTIONS, NATIONAL AGRICULTURAL LIBRARY.

本图为棉铃象鼻虫纪念碑。当棉铃象鼻虫摧毁了靠近亚拉巴马州恩特普赖斯的农民的棉花时，他们改种花生，这被证明有利可图。有些讽刺意味的是纪念碑上写着："因感激棉铃象鼻虫及它作为繁荣的使者所做的一切，这座纪念碑由亚拉巴马州科菲县恩特普赖斯的市民于1919年12月11日建造。"

业——但是南方推动工业化的前进步伐十分缓慢。最终，北方的工业化及其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使得很多南方黑人脱离租佃农耕。①

除了适度的劳动力大批外迁以及有限的工业化进步，南方尤其是南方腹地的经济，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一直维持在一个非常低的工资水平上。加文·赖特的《老南方和新南方》（*Old South and New South*）解释了趋向地区平等这一迟缓的步伐。在赖特看来，南方一直存在着一个分离的劳动力市场。许多人离开了，同时进入南方的人却很少，但是快速的人口自然增长却

① See Fred Bateman and Thomas Weiss, *A Deplorable Scarc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维持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①]。当农场的规模缩小后，棉花种植方面的劳动力日益密集。到19世纪晚期，绝大多数南方农场的规模小于北方农场，这刚好与南北战争时期的情形相反。机械化程度很低，工资和收入水平也很低。

南方白人曾经试图通过使黑人处在经济阶层的底层从而维护他们的地位。到世纪之交时，“黑人法典”以及“吉姆·克罗（Jim Crow）”法对黑人进行种族隔离并且保持他们的贫穷状态。在黑人能够工作和生活、饮食、搭乘公共交通以及上学的地方，这些法律都在起作用。正如赖特所强调的，北方人逃避在南方进行投资，其结果就是北方与南方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工资差距。[②] 南方的相对落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毫无疑问地归因于它的教育体系。南方每个学生的平均公共支出仅仅是北方这一支出的一小部分。富裕的南方人认为对穷人，尤其是对黑人进行教育，只会鼓励他们向北方移民去追求更高的工资。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son）中认为，只要针对黑人的种族隔离教育是平等的，那么它就是符合宪法的。人们虔诚地遵循“隔离”，然而对“平等”却不是这样。正如罗伯特·马戈在他的《南方的种族与教育》（*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一书中所写的，花在白人学生身上的钱远多于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例如，马戈发现在1910年，花在黑人学生身上的支出与花在白人学生身上的支出比是，从路易斯安那的17%一直到特拉华的75%。[③]

对黑人学校教员的歧视部分地体现了这一差异，但是对教育质量的其他测量方法，比如班级的大小，显示了同样的差异。教育支出上的不足也许满足了富裕的南方人的需要，但其结果是未能为参与现代经济增长准备好足够的劳动者技能。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ldrich, Mark. “Flexible Exchange Rates, Northern Expansion, and the Market for Southern Cotton, 1866—187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399 - 416.

Alston, Lee, and Robert Higgs. “Contractual Mix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since the Civil War: Facts, Hypotheses, and Tes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2): 327 - 353.

Alston, Lee J., and Kyle D. Kauffman. “Competition and the Compensation of Sharecroppers by Race: A View from Plantations in the Early Twentieth

① See Richard Vedder, Lowell Gallaway, Philip E. Graves, and Robert Sexton, “Demonstrating Their Freedom: Ther Post-Emancipation Migration of Black American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10 (1986): 213 - 239.

② 了解这些初始制度对20世纪发展的重要影响，参见 Lee J. Alston and Joseph P. Ferrie, *Southern Paternalism and the Rise of the Welfare State: Economics,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U. S. South 1865—1965*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③ Robert A. Margo,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 188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21 - 22.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2001): 181 - 194.

Andreano, Ralph, ed.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Cambridge, Mass.: Schenkman, 1964.

Bateman, Fred, and Thomas Weiss. *A Deplorable Scarcity*.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1.

Cochran, Thomas. "Did the Civil War Retard Industrialization?"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48 (September 1961).

DeCanio, Stephen. *Agriculture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74.

——. "Productivity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422 - 446.

DeCanio, Stephen, and Joel Mokyr. "Inflation and Wage Lag during the American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311 - 336.

Engerman, Stanley. "Th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Some Economic Factors in Southern Backwardnes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in Regional Economics*, eds. John F. Kain and John R. Mey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Fishback, Price V. "Debt Peonage in Postbellum Georgi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6 (1989): 219 - 236.

Fogel, Robert W. *Without Consent or Contract: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Slavery*. New York: Norton, 1989.

Goldin, Claudia, and Frank Lewis. "The Economic Cost of the American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294 - 326.

Graves, Philip E., Robert L. Sexton, and Richard K. Vedder. "Slavery, Amenities, and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A Note on Migration and Freedme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 (1983): 156 - 162.

Hacker, Louis.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0.

Higgs, Robert. "Race, Tenure,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 Southern Agricultur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149 - 169.

——. "Patterns of Farm Rental in the Georgia Cotton Belt, 188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468 - 482.

——. *Competition and Coercion: Black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2 (1982): 725 - 735.

——.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I: Repl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777 - 781.

Kauffman, Kyle D. "The U. S. Army as a Rational Economic Agent: The Choice of Draft Animals during the Civil War." *Eastern Economic Journal* 22 (1996): 333 - 343.

Kessel, Reuben A., and Armen A. Alchian. "Real Wages in the North during the Civil War: Mitchell's Data Reinterpreted."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Lebergott, Stanley. "Through the Blockade: The Profitability and Extent of Cotton Smuggling, 1861—1865."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867 - 888.

Lerner, Eugene. "Money, Wages, and Prices in the Confederacy, 1861—1865." *Journal of Political History* 63 (February 1955).

Maloney, Thomas N. "Migration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in the 1910s: New Evidence on African-American Occupational Mobility in the Nor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1), (2001): 147 - 165.

Mandle, Jay R. "The Plantation States as a Sub-Region of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732 - 738.

Margo, Robert A. "Accumulation of Property by Southern Blacks before World War One: Comment and Further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September 1984): 768 - 776.

——.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 188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McGuire, Robert A., and Robert Higgs. "Cotton, Corn, and Ris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other View."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9): 167 - 182.

——. "A Portfolio Analysis of Crop Diversification and Risk in the Cotton Sou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 (1980): 342 - 371.

Ransom, Roger L. *Conflict and Compromis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lavery, Emancipation, 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Ransom, Roger L., and Richard Sutch. "The Ex-Slave in the Post 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131 - 148.

——. "The Impact of the Civil War and of Emancipation on Southern Agricultur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January 1975): 1 - 28.

——. *One Kind of Freedom: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mancipa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Capitalists without Capital: The Burden of Slavery and the Impact of Emancipation."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Summer 1988): 133 - 160.

Reid, Joseph. "Sharecropping as an Understandable Market Response: The Post-bellum South."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106 - 130.

Rose, Jerome C. "Bi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Segregation and Economic Depriva-

tion: A Post Slavery Population from Southwest Arkansa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1989): 351 - 360.

Sellers, James L. "The Economic Incidence of the Civil War in the South."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14 (September 1927).

Temin, Peter. "The Post-Bellum Recovery of the South and the Cost of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898 - 907.

Vedder, Richard, Lowell Gallaway, Philip E. Graves, and Robert L. Sexton. "Demonstrating Their Freedom: The Post-Emancipation Migration of Black Americans."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10 (1986): 213 - 239.

Walton, Gary M., and James F. Shepherd. *Market Institutio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New South, 1865—1900*.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Wright, Gav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Cotton South*. New York: Norton, 1978.

——.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Wright, Gavin, and Howard Kunreuther. "Cotton, Corn, and Risk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526 - 551.

第 15 章　农业的西进运动

本章主题

在美国内战后的25年里，美国的边界一直在平稳地向西推移。到1890年，定居点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人们宣称边界已经消失。向西部领土蜂拥的先锋是矿工以及牛仔们。矿工被诸如内华达的著名的康斯托克银矿（Comstock Lode of Silver）以及南达科他的黑山金矿等矿山所吸引。尽管矿工在传说中被看做是酗酒成瘾、夸夸其谈之人，但他们却是那些能够发展出精确设定的有效产权的所有商人中的第一批人，而这却始于他们为了采矿临时搭建的帐篷的简陋规则。①

牛仔们的到来，刺激了经过长途跋涉把牛赶入市场交易的活动。出自得克萨斯的赶牛活动开始于1866年，并且到了19世纪80年代，从得克萨斯到蒙大拿到处可见蕴含着巨大财富的牛群。赶牛活动的目的地是最近的铁路终点站：在更早的时候，是密苏里的锡代利亚，但后来是阿比林（著名的奇泽姆铁路的终点站），稍后是堪萨斯的道奇城（可通往芝加哥）。长距离赶牛活动的兴起和衰落是令人着迷的历史和华丽的民间故事。② 在1885年，长距离的驱赶活动戛然而止，并不是因为带铁刺的围栏的出现（人们通常如此认为），而是因为北方的养牛人

① See Gary D. Libecap, "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The Case of Western Miner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338 - 362.

② 推荐由John Wayne和Montgomery Clift主演的经典电影*Red River*及CBS电视台特别节目*Lonesome Dove*。另外参见Lewis Atherton, *The Cattle King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尽管富裕的东部家庭的继承人如Richard Trimble和Teddy Roosevelt无法抗拒西部的诱惑，大部分经摸爬滚打而成功的人士是中西部和南部的乡下人和牛仔，他们刚刚脱离在牛顿市和道奇城嗜酒的生活。

组织起来并且创立了新的制度，从而限制了北方牧场的过度蓄牧。《隔离检疫法》的通过及其加强把遥远的得克萨斯的牧群排除在外。①

不管矿工及牧人作为道路的开辟者有多重要，安顿下来的从事农业的家庭开启了西部持久的经济形态。这一章将讲述他们的经济史：他们是如何获得他们土地的所有权凭证，他们种植了什么样的农作物，以及他们是如何耕种的，他们的产品获得了怎样的价格，为什么大量农民对现存的经济体系不再抱有幻想以及需要来自州政府的援助，最终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援助。

耕地的扩张

参与新土地开垦的大多数人，从几年前的殖民地区而来。迁入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达科他以及稍后的蒙大拿和科罗拉多的人们往往经过短暂的旅程就到了新地方。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先前居住在密苏里或艾奥瓦、明尼苏达或是威斯康星、印第安纳或是伊利诺伊；另外一些则是先前移民的子女。对于定居者来说，在落户的州里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不断迁徙这一现象并不常见。无论这些筚路蓝缕的开拓者们历经了多少困苦，无论他们在处女地上的生活是多么单调以及劳而无功，但只要能向更远的西部开辟土地，则可以始终存有对更好生活的向往。

表 15—1 显示了 1860—1920 年按十年计算的农户总数和以英亩计算的农田数量。增加得最快的年代是 19 世纪 70 年代和 19 世纪 90 年代。在这几个年代里，土地投入的增加也尤其突出：耕种的土地在 1870—1900 年间总计增加了两倍多。②（参见经济推理命题 2 和 3 中涉及选择和成本的方面。）上述情况有可能成为现实，是借助于迅速地使土地的所有权转移到农民和土地使用者手中——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使政府的土地私有化。

表 15—1　　1860—1920 年按年代计算的农场和面积的总体数量

年份	农场数量（百万个）	百分比增加（%）	面积数量（百万英亩）	百分比增加（%）
1860	2.0		407	
1870	2.7	35	408	0.2
1880	4.0	48	536	31

① 长途驾驶在 1885 年突然被禁止的原因的深度解读，参见 David Galenson，“The End of the Chisholm Trai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2)，(June 1974)：350－364。

②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农场数量大幅增加，而总面积却未见增长。如第 14 章所述，这个时期很特殊，因为那时南方种植园解体。

续前表

年份	农场数量（百万个）	百分比增加（%）	面积数量（百万英亩）	百分比增加（%）
1890	4.6	15	623	16
1900	5.7	24	839	35
1910	6.4	11	879	5
1920	6.5	2	956	9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Series K4 and J51.

联邦土地政策

在美国内战期间，因为南方民主党的缺席从而使得由共和党把持的国会颁布了1862年《宅地法》。回想第8章中的这一立法，它规定向每一宅地提供160英亩的土地（每一对配偶提供320英亩），延续了联邦土地政策的自由化进程。在1862年立法之时，在西艾奥瓦、西明尼苏达以及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和达科他的东部，原始的富饶的土地归谁所有仍然不明确；然而，在法令颁布后，它立刻就有了实效，除了在大平原的100度经线的西部地区（年降雨量少的地区）或是在大量的山区，归属不明的土地已经所剩无几了。在这些平原和山区的大部分地区，由于这些土地适宜放牧，从而一个160英亩的宅地在实际上亟须变大一些。其结果就是，在1870—1900年间，在增加的5英亩农地中仅有不到1英亩的土地属于宅地。

对采矿以及伐木的兴趣也迫使国会倾向于土地政策的自由化，结果又有了四个法令。

（1）1873年《植树法》（Timber-Culture Act of 1873）。表面上它是鼓励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植树，《植树法》实际上使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160英亩的土地，只要他答应将这些土地的40英亩用来植树。

（2）1877年《沙漠土地法》（Desert Land Act of 1877）。就这一法律而言，任何人都可以以1.25美元每英亩的价格购买640英亩的土地，只要他同意在3年之内都会对土地进行灌溉。该法律严重的不足之处就在于它对灌溉缺乏清晰的定义。

（3）1878年《木材和石头法》（Timber and Stone Act of 1878）。这一法规认可以每英亩2.50美元的价格出售位于内华达、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的含有名贵木材和石头的土地。

（4）1878年《伐树法》（Timber-Cutting Act of 1878）。这一法律授予特定区域的居民免费砍伐生长在政府土地上的树木的权利，并且规定树木必须用于农

业、采矿以及住房建设方面。

从公共土地向私人土地的转移同样包括《优先购买权法案》规定下的政府拍卖中的购买。正如第8章所提及的，这一法律通过对那些在公共销售土地出现之前已经到达并且在土地上工作过的住户的优先出售权，在实际上鼓励“擅自占地”[①]。而且，政府主导的巨大的土地面积的赠与是作为给西部铁路工人和州的补贴，因为各种各样的目的反过来都售给了拓殖人。根据1887年《道斯法案》(Dawes Act of 1887）及随后的法案，有将近1亿英亩的来自印第安纳的领地允许公开购买，无视其对美洲印第安人许下的承诺。

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所采取的步骤使得对公共土地采取的措施越来越严厉，然而国会却没有通过任何重大法律，一直到1891年通过《一般修正法案》(General Revision Act of 1891)，这才修补了关键的漏洞。另外，《优先购买权法案》以及对灌溉定义的规定都是对1877年《沙漠土地法》的补充。国会废除了1878年《伐树法》，这就移除了在所有滥用土地法中千真万确地属于滥用的法规。最后，总统被授权可以处置森林保护方面的事务——在保护运动方面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第一步，并且获得了广泛的大众支持。

20世纪初，为了使拓殖人获得具有实际作用的规模的农田，《宅地法》得以修正。始于1904年的西内布拉斯加，一整块的土地（1平方英里，或者是640英亩）可以成为宅地。几年之后，扩充的《宅地法》使得有可能在很多地方都可以免费获得半块土地。再后来，居住年限减少为3年，并且1916年《畜牧业宅地法》(Stock-Raising Homestead Act of 1916）规定，只有出于种草目的，640英亩的宅地才可被允许存在。虽然在1900年之前，增加的每5英亩农田中只有1英亩来自宅地，但在1900—1920年这一比率则为每增加的10英亩农田中有9英亩来自宅地。

从一个委员会给总统的报告中关于1904年之前公共土地的处置，我们可以明了土地究竟是怎样分配的。从1789年至1904年，美利坚合众国的公共领土包括14.41亿英亩。其中，有2.78亿英亩被私人用现金购买。另有2.73亿英亩的土地被赠与州政府和铁路，在后面的第16章，我们将详述这一点。私人免费获得或是私人可获得的土地（大多数通过《宅地法》）总计1.47亿英亩。除了五花八门的赠与之外，公共土地的剩余部分要么是政府存有（2.09亿英亩），要么是未被占用（4.74亿英亩）。在1862—1904年间，成为宅地的土地已经超过了政府以现金销售给个人的土地。不过，如果我们计算来自铁路和州的购买，土地的最终持有者的购买量，将是从1862年至1904年间人们通过《宅地法》免费得到的土地数量的两倍。

在1904年后，美国土地政策变得不再慷慨大方了，相反，到那时，几乎所有的农地、绝大多数第一等的采矿用地以及大部分临近市场的林地都已经分配完毕。在1904年至1920年之间，在干旱区域和以山地为主的地区有超过1亿英亩新土地成为宅地。在这同样短的时期内，政府保有大约1.75亿英亩的土地。在

① 直至1891年，在公共土地法的约束下，个人一次只允许最多购买1 120英亩土地。人们可以以更高的价格——尽管是虚价，从铁路公司和州政府购买无数量限制的土地。

原本属于政府公地的土地中，到 1920 年仍然有 2 亿英亩待处置的土地仍未被处置。[①]

联邦土地政策的影响

联邦土地政策的主要目标——政府收入、广泛的可获性（或者说公平）以及快速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随时间而变化，后两个目标的重要性在增加。显然，美国土地政策最突出的特征是它使有价值的农地、矿地以及林地迅速地转移到私人手中。另外，使得人们可以广泛地获取土地的这一目标也获得极大的成功，尤其是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内。但是，不论就其过程还是其结果而言，都主张人人平等。正如我们刚强调过的，大部分土地都流向了公司和富人。特别利益集团受到优待，并且就某一段时间而言，向铁路赠与土地被认为是正常的公共政策。此外，向州政府赠与大量土地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提高了增长，不管是出于支持交通事业的冒险还是出于教育的目的（土地赠与学院）。参见经济推理命题 2。

逐渐地，优良土地被矿业和林业公司或投机分子以欺诈手段获得。在松懈的土地法的管理的帮助下，大的经营者能够说服个人做出宅地登记或者是先以一个最低的价格购买然后转移土地凭证。随着受贿官员的纵容（经济推理命题 3），登记经常是由那些从来就不存在的人做出的。正如加里·利贝卡普和罗纳德·约翰逊已经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的，欺骗最终却具有了积极的经济意义：它有助于经济资源转移到大公司手中，从而使得大公司可以利用规模经济的优势。资源法由于认清了经济现状，并且允许巨大面积的土地直接销售给最终的使用者，就有可能减少欺骗和腐败。[②]

一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美国历史学家们一致同意的是，联邦土地政策在经济上是无效的，并且减少了总产出。由于具有各种各样的周边环境的各种人在土地上定居，在最低限度的竞争中存在着高比率的失败风险——定居人最后将失去他们的土地，从而要么成为贫穷的佃农，要么沦为挣取低工资的农场工人。更为重要的是，对公共土地的快速分配将使种地者无需考虑农业的现代化，而是引导过多的资本以及劳动力进入农业，并由此妨碍了工业化进程。

毫无疑问，联邦土地政策造成了特别的错误以及强加的无效，然而很难由此断定联邦的土地政策一般是无效的。部分原因是由于资源的快速增加这一结果，新西部的农作物的生产以如此快的速度增加，以至于粮食和原材料的消费者们享受了 30 年内不断下降的价格。而且，根据罗伯特·福格尔和杰克·拉特纳的研究，在土地改进、家畜、农村住房以及农业机械方面的平均投资回报等于或者超

① 宅地准入在 20 世纪 20—30 年代有很多，而在 20 世纪中期近乎于零。一些宅地至今在阿拉斯加州仍然存在。

② Gary D. Libecap and Ronald N. Johnson, "Property Rights, Nineteenth-Century Federal Timber Policy,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129 - 142.

过其他的短期投资回报，而且，相比那些制造业地区，在南方以外的新的农业地区，实际收入在增加。[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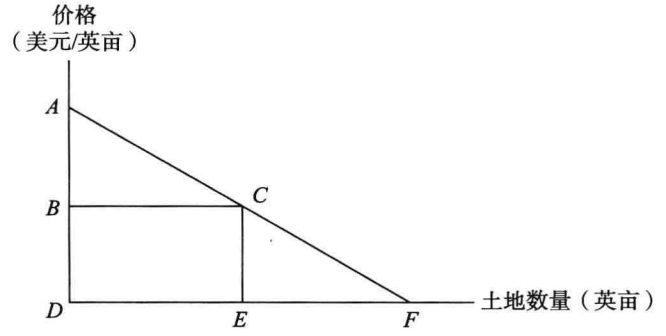
经济透视 15.1

全国化市场

什么样的联邦土地价格将使实际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答案出乎人们意料，在很多地区，土地的价格应该为零。在下图中，纵轴表示土地价格，横轴表示对其质量高低做过调整后的土地数量。实际上，*ACF* 是对新处置区域内的耕地的需求，并且联邦政府在刚开始的时候拥有所有的新处置区域内的土地。

联邦政府也许为了使得政府收益（*BCED*）最大化，会为联邦土地设定一个相对高的价格，即 *BD*。因为收益能够公平地在人民中间进行再分配，这看起来似乎是最好的政策——当然，假设收益不是由特殊利益集团首先获得。但是假定 *BD* 价格减少了土地的产出，从最大化的 *DF* 数量减少到 *DE*。我们该如何测算与排除和 *EF* 数量的产出相关的损失呢？在横轴上的点与需求曲线之间的距离告诉我们收益的最大化将会使得农民为部分土地支付机会成本的代价（假设由于农民的资源在替代性用途上可以生产其他财富）。因此，三角形区域 *CEF* 测算了如果土地的价格设定在 *BD* 并且在产出中排除了 *EF* 以后，未来收入的价值损失。把价格设定为零将会消除福利损失的三角形区域。

对公平、农民的理性以及对环境影响的关注也许会使得人们拒绝国民生产总值最大化的政策。但是人们至少应该意识到关于正确政策的有力的经济观点（经济推理命题 5）就是下述观点：使联邦土地快速为生产率更高的那些人所得。



① 更多佐证和讨论参见 Robert Fogel and Jack Rutner, "Efficiency Effects of Federal Land Policy, 1850—1900," in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ed. William Aydelotte et a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 and Susan Previant Lee and Peter Passell, *A New Economic View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79), 318 - 322。

正如经济推理命题5所强调的，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定量证据的重要性。美国农村经历了无数的艰难时刻，并且在19世纪晚期，政治上的不安宁塑造了中西部和大平原一定方面的特征，但是这些不应该被用来主导我们对联邦土地政策的判断。[①]

农业增长及其变革

耕种的新地区与新方法

一旦某个地方适合安顿下来，人们就倾向于专门种植特定的农作物。在地图15—1中，针对某一地区主要的农作物做了地理上的分类。小麦和玉米种植带在该世纪一直在向西部延伸，春小麦带主要分布于西明尼苏达和达科他，冬小麦主要分布于中西部的南方区域和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以及俄克拉何马。[②]

虽然烟草固定于老南方，但棉花生产在密西西比河流域蛙跳般地排列。到了1900年，得克萨斯领衔棉花生产并成为家畜的主要产地。跟随先前新英格兰的农民旅行过的道路，五大湖周围的农民发现从谷类转向乳牛畜牧业是有利可图的。在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以及其他温带气候地区，水果、蔬菜和特色农作物变得很重要——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引入配有冷冻车厢的火车机车后，开创了全国市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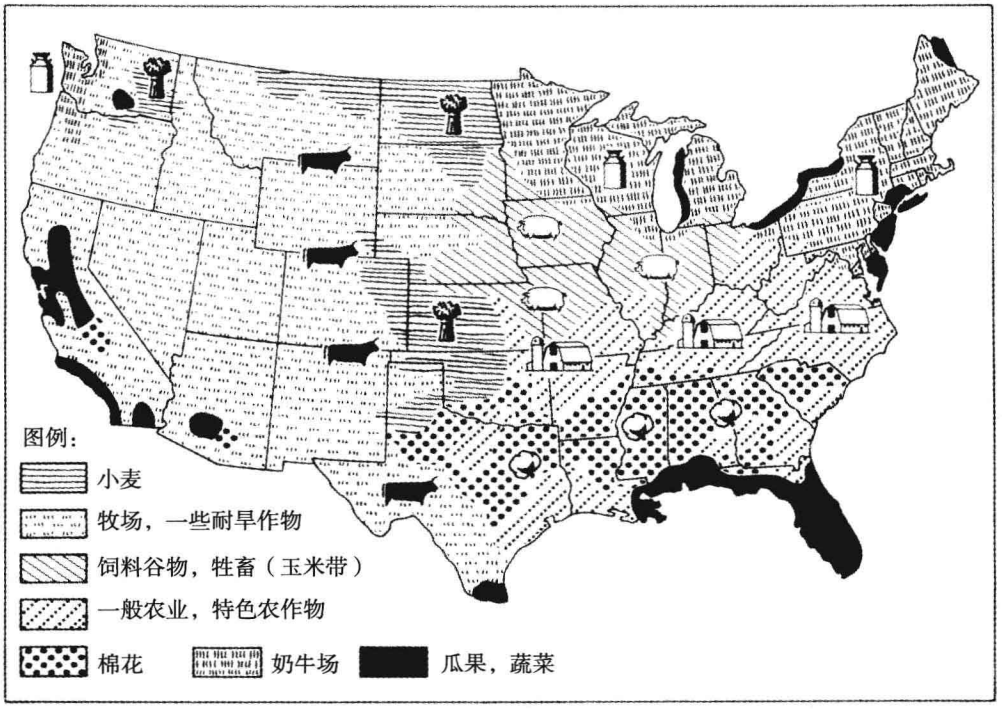
而且，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正如包括《美国经济史》早期版本在内的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所体现的），19世纪以及20世纪初期出现了生物创新的潮流，它们中有很多都成功地改进了植被和生长环境。幸亏有了奥尔姆斯特德和罗得的研究，我们才能更明了在植被、灌溉系统、施肥以及种植方面有益于使用土地的其他生物创新方面的变革。[③] 这些变革沿着两条线起作用：（1）新的小麦种类的发现（以及杂交），从而允许北美小麦带可以向南部及西部推进数百英里；（2）研究者和农民，他们发现了战胜昆虫和病害的新方法，其中有一些来自利用欧洲以及其他地区的新种类（种子）进行实验的结果。这是早期全球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的一个极好的例子。表15—2表明在1870—1910年间玉米和小麦的增长以及每种农作物每英亩的收成。即使有的话，证据也显示每英亩以蒲式耳衡量的土地生产率的增长非常少。不过，在这些年代里，玉米和小麦的劳动生产率却有极大的增长。根据罗伯特·高尔曼的说法，在1850—1900年间，这两种作物的劳动

---

① 有关联邦土地政策的政治评论，参见 Paul Gates, "An Overview of American Land Policy," in *Two Centuries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ed. Vivian Wiser (Washington, D.C.: Agricultural History Society, 1976), 213-229。

② 冬小麦在秋季播种，在晚春或早夏收割——取决于纬度。寒冷之地种植春小麦。冬小麦的新品种耐寒能力强，可种植于南达科他州的南部，至少北及皮埃尔。

③ Alan L. Olmstead and Paul W. Rhode, "The Red Queen and the Hard Red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Wheat, 1800—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2 (2002): 929-966.



地图 15—1　19 世纪晚期主要经济作物在地理上的分类

值得注意的是分类地区边界上的变化以及很多作物依然在各种作物地带生长。

生产率以每年 2.6%的速度增长。[①] 在 19 世纪的前 25 年，这一数字是 0.4%。图 15—1 提出了更多的有关产出—投入比的证据，它描绘了相对于投入（土地、劳动和资本）的总体农业产出。图 15—1 清晰地表明了自 20 世纪 20 年代及其后的化学和生物进步的“奇迹”。它同样也揭示了具有同样重要作用的机械化的影响，正如高尔曼对于 19 世纪的发现所揭示的。

在 1848 年，赛勒斯·霍尔·麦考密克在 1834 年曾因他的收割机获得专利，现在他又勇敢地把他的厂房搬到芝加哥，并从此确保可以向中西部稳定地供给他生产的收割机。手持镰刀和一匹马拉着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正如来自 1857 年《科学美国人》的一篇社论所认为的：

> 每一个有 100 英亩农田的农民至少应该有下述几件东西：一台混合收割机兼一台割草机，一把马耙，一台播种机，以及一台割草机……一台打谷机和谷物清选机，一台便携式自用磨粉机，一台玉米脱壳机，一匹马，三把耙子，一台碾轧机，两台耕种机以及三把犁。[②]

---

① 摘自 Robert E. Gallman, “The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U. S.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History*, eds. David C. Klingaman and Richard K.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② 引自 C. Danhof, “Agriculture,” in *The Growth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ed. H. F. Williamson (New York: Prentice Hall, 1951), 150。

表 15—2　　1870—1910 年谷物产出和土地投入

年份	玉米[a]（百万蒲式耳）	玉米耕地[b]（百万英亩）	每英亩的玉米产量（蒲式耳）	小麦（百万蒲式耳）	小麦耕地（百万英亩）	每英亩的小麦产量（蒲式耳）
1870	1 125	38.4	29.3	254	20.9	12.1
1890	1 650	74.8	22.1	449	36.7	12.2
1910	2 853	102.3	27.9	625	45.8	13.7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Series K502，K503，K506，and K5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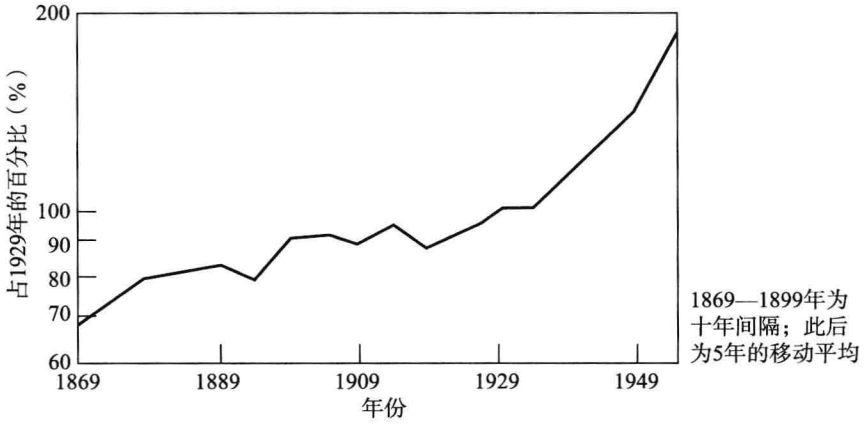


图 15—1　1869—1955 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本图表明农业产出相对于土地、劳动和资本产出进行加权的价格的比率。

资料来源：John W. Kendrick，*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Princeton，N. 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362－364.

每个工人资本投入的增加以及新的资本设备中蕴含的新技术，提高了劳动的生产率。即使每英亩的产量变化不大，机械化也使得农民可以在农场里增加更多的农田，由此扩大了每个农场的产出。然而，机械化农场并未立刻取代传统农业，但进步是从未间断的。[①] 在美国内战后，谷物生产者（用手收割的人）

① 保罗·戴维认为一部分原因是农场的最低规模过大而为了盈利需雇用收割者。但是艾伦·奥尔姆斯特德证明农场主可以雇用收割者，亦可将之与邻居分享。参见 Paul David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in the Antebellum Midwest," in *Technical Choice，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5）；and Alan Olmstead，"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and Mowing in American Agriculture，1833—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June 1975）。

的工资增加了，而且每个农场种植谷物的面积也增加了，并加速了对收割机的引进。

到1857年，约翰·迪尔在伊利诺伊州莫林市的新工厂每年生产1万把钢犁，替代了铁犁，而这正如奥尔姆斯特德和罗得所报告的在大草原紧密的草层上被证明是不起作用的：

1850—1860年之间的普查表明，生产收割机和割草机的企业从20家激增到73家，并且年产量增加了大约10倍，约为2.5万台。这一扩张开启了战争期间的销售爆发。到1864年，大约有200家企业生产收割机和割草机，总产出大约为9万台。①

谷物播种机、耕种机、割草机、耙子以及打谷机，还有农业机械上的无数附件以及设计精巧的配件在这一世纪的最后25年内为农场的机械化增色不少。在1860—1920年，单个农民供养的人口增加了将近一倍，从而为工业准备好了自由劳动力，但是同时带来了经济混乱以及个人困苦。

农民的艰难年代：1864—1896年

我针对农业史，把自美国内战结束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段时期分解为两个相对应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864年至1896年，这一阶段是农业困难以及政治不平静的阶段；第二个阶段，从1896年至1920年，它代表了在大多数农场人口持续增加的阶段。表15—3定量地反映了这一增加，它刻画了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内实际的农场收入平均每年增长百分比的轨迹。值得注意的是，从1864年至1896年间，实际收入一直在增加，但是其增长速度看起来很平缓，并且平均水平掩盖了西部农民在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80年代经历的很多困苦，正如他们所宣称的，“在天堂，我们信任；在堪萨斯，我们控诉。”

表15—3　　农民收入和生产率的趋势（年均百分比变化，%）

年份	人均资本的实际收入	平均工人的实际收入
1849—1859	2.0	2.0
1859—1869	0.8	0.9
1869—1879	0.8	0.3

① Alan R. Olmstead and Paul W. Rhode, “Beyond the Threshold: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of Early Reaper Adap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5 (1995): 27-57.

续前表

年份	人均资本的实际收入	平均工人的实际收入
1879—1889	0.7	0.3
1889—1899	2.2	2.1
1849—1899	1.3	1.0
1869—1899	1.2	0.7

资料来源：Robert Fogel and Jack Rutner, "Efficiency Effects of Federal Land Policy, 1850—1900," in *The Dimension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History*, eds. W. O. Aydelotte, A. G. Bogue, and R. W. Fogel, © 1972 by the Center for Advanced Study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Table 2, 396, adapted by permission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农民知道他们的生活是艰难的，尽管没有数据可以证明这一点。边疆的环境特别艰难，沉闷的环境以及艰苦的物质条件在这些地方同时存在，还夹杂着经济生活的困难，它包括下降的价格、无处借贷以及必须从工厂里购买很多商品和服务，而工厂在当地看来是日益集中的经济力量。

在1875—1895年间，所有的价格都在下降，但正如表15—4所示，相对于其他产品的价格，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得更多。稍有不同的地方是，农民的贸易条件——农民所购买商品的价格除以农民所出售商品的价格——恶化了。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实际收入的下降（回忆一下表15—3，它实际上在上升），因为就贸易条件而言，它仅仅考虑价格而并未考虑生产率。[①] 然而，它确实意味着农民必须快马加鞭，就为了不会失利。到1895年，要达到表15—4中的低水平点，农民不得不比1870年多生产16%以抵消贸易条件的下降。

表15—4　　1870—1915年间农民的贸易条件

年份	农产品批发价格	消费价格	贸易条件
1870	100	100	100
1875	88	87	102
1880	71	76	94
1885	64	71	90
1890	63	71	89
1895	55	66	84
1900	64	66	97
1905	71	71	100
1910	93	74	127

① 其他定义和更多数据参见 John D. Bowman and Richard H. Keehn, "Agricultural Terms of Trade in Four Midwestern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592-609。

续前表

年份	农产品批发价格	消费价格	贸易条件
1915	90	80	112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Series E42，E53，and E135.

为什么农民的贸易条件恶化了？部分答案是由于农产品供给的快速增加。就全世界而言，新地区进入了争斗。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以及美国，肥沃的新土地变得跟农业生产能力一样重要。仅在美国（如表 15—1 所示），在 1870—1900 年间，农场按英亩计算的面积就增加了两倍多。通过机械化有可能导致的产出的增加强化了这一趋势。

同时，在需求层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国内需求方面有个令人满意的影响是人口方面的连续快速增长。在 1870 年后，美国的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但是一直到 1900 年，美国的人口仍然维持高增长。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19 世纪 80 年代，人口增长率略超过 25%，而在 19 世纪 90 年代，它也超过了 20%——也就是需要供给的人口有了大量的增长。然而也存在相互抵消的因素：在 1870 年，美国人将他们当期人均收入的 1/3 花费在农产品上。而到了 1890 年，他们花费更小的部分，仅略微超过 1/5，并且在随后的几年内花费更少的比例。由此，尽管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在此期间增加了，同时尽管美国人在食物上的绝对支出并不少，然而这些收入中农民所赚取的比例却下降了。（用专业术语来说，对于大多数农作物而言，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 1。）在经济透视 15.2 中，我们将利用恩格尔曲线来讨论这一评论。

部分是因为国外对美国农作物需求的上升才抵消了这些效应。在 20 世纪前，对农作物出口的需求一直在稳定地增加。在 1901 年，小麦和面粉的出口达到了顶峰，在那时将近 1/3 的国内小麦产量销往国外。类似地，在 1900 年之前肉和肉类制品也越来越多地销往国外，也是在这时，这些出口同时出现了下降。总体来说，农产品出口额从 1870 年的 2.97 亿美元上升到 1900 年的多于 8.40 亿美元。这些年代中的农产品出口有助于扩张农产品市场，但是这些对于减轻农业的艰难困苦是远远不够的。

农民们并不倾向于把他们的困难当作是冷漠的市场竞争的结果。反之，他们把问题归结为垄断以及共谋：银行家们（有人认为尤其应该谴责犹太人银行家）提高了利息率并且操纵货币，从而取消了农民的抵押赎回权；谷物运输商收取的利息使农民不堪重负；工厂主对农业机械以及消费商品也收取高价；铁路对运输收取垄断运费，等等。

这些人们臆测的贫困的来源很多都没有证据支持，这表明农民只是注意到了表面现象而并未探究出潜藏的真正原因。图 15—2 表明了西部工业制品价格相对于农产品价格的下降；图 15—3 表明了运输成本作为农业价格的一部分也同样有了下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的每一个抱怨都是毫无根据的。例如，虽然在这

一期间用铁路长途运输货物的费用相对于农业价格有了极大的下降，但是铁路的某些垄断部门在短途运输上允许歧视性垄断价格的存在。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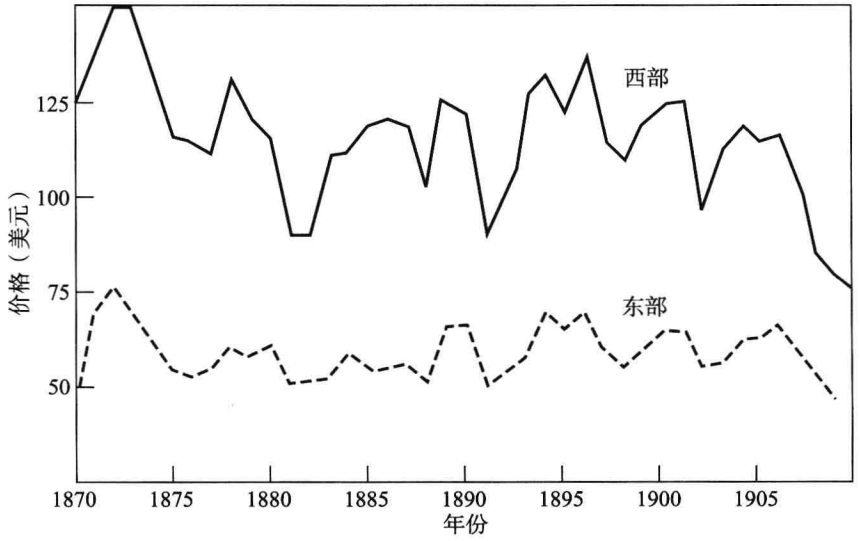


图 15—2　1870—1910 年间相对农产品而言的工业产品的价格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Jeffrey G.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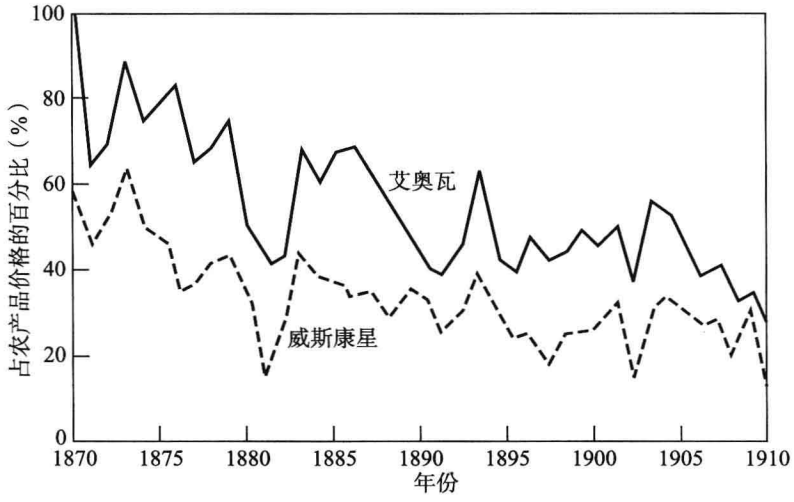


图 15—3　1870—1910 年，纽约的来自艾奥瓦和威斯康星的小麦的运输成本占农产品价格的百分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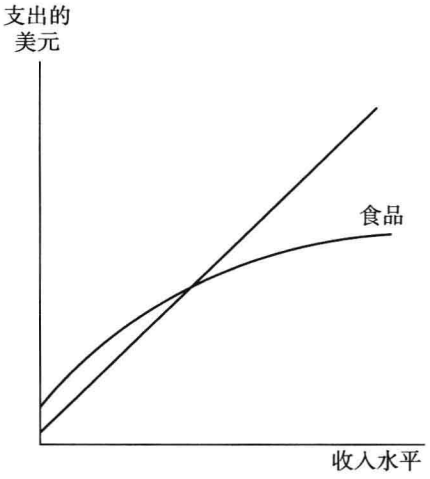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Jeffrey G.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261.

① See Robert Higgs, "Railroad Rates and the Populist Uprising," *Agricultural History* 44 (July 1970).

经济透视 15.2

恩格尔曲线

对农产品需求的缓慢增长反映了恩格尔曲线的斜率。恩格尔曲线以 19 世纪的普鲁士统计学家恩斯特·恩格尔的名字命名，它一般是根据家庭开支的样本做出的，并且它刻画了与每一个收入水平对应的食品的平均支出（或者其他商品和服务上的平均支出）。经济增长使得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向上移动，但是食品支出的增加更慢，并且食品开支所占的比例下降了。只要农产品的恩格尔曲线的斜率等于图形的 45°线，农民就能够保持他的食品在总支出中所占的份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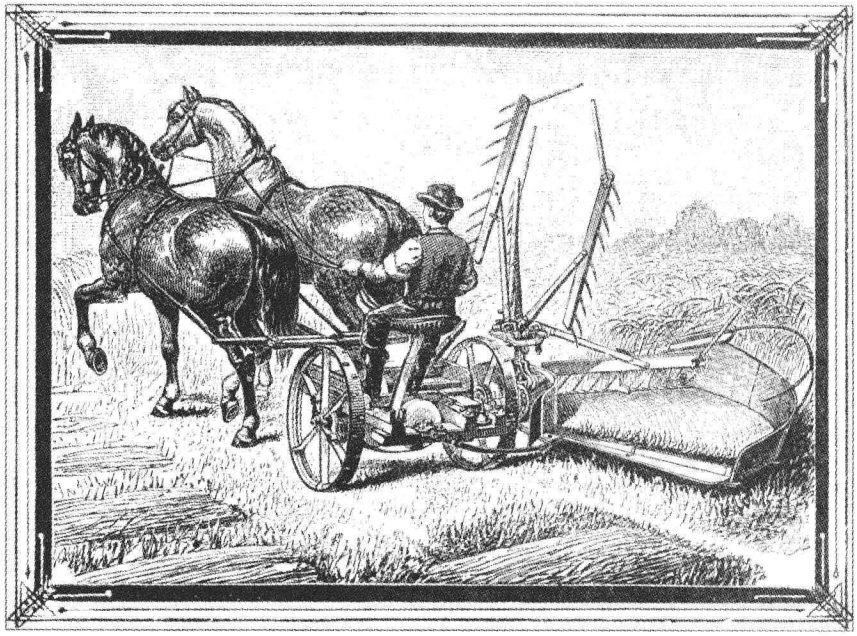


最终，在这些年代，无论是名义利率还是实际利率，中西部农民抵押贷款的利息率都下降了，如表 15—5 所示。这些利率都高于东部的利率，由于东部的资本更充裕，同时投资的风险一般都很低，但是东部的利率比西部下降得更快。实际上，就农民在信贷市场所遭遇的垄断价格而言，应该谴责规模较小的西部银行而不是东部的金融家。理查德·西拉（Richard Sylla）和约翰·詹姆斯首先提出了这一点。[①] 然而，即使如此，后续的研究在农民的信贷问题上也局限于地方银行垄断势力的潜在作用。[②] 农民的抵押利率以及短期利率都非常高，尤其是在 19

① Richard Sylla, "Federal Policy, Bank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Capital 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3—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9 (1969): 657 - 686, and John Jam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al Money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6 (1976): 878 - 897.

② See Gene Smiley,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591 - 662; Richard Keehn, "Market Power and Bank Lending: Some Evidence from Wisconsin,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591 - 620; and John J. Binder and David T. Brown, "Bank Rates of Return and Entry Restrictions, 1869—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1991): 47 - 66.

世纪70年代，但它看起来却是高贷款风险以及其他因素而不是垄断势力的产物。[①]



由罗伯特·麦考密克以及他的儿子赛勒斯·霍尔·麦考密克开发的机械化收割机，引领了美国小麦丰收的革命并且创造了一个重要行业。

表15—5　1870—1900年中西部农产品抵押贷款的真实（名义）利率（%）

年份	伊利诺伊	威斯康星	艾奥瓦	内布拉斯加
1870	17.0 (9.6)	15.4 (8.0)	16.9 (9.5)	17.9 (10.5)
1880	11.4 (7.8)	10.8 (7.2)	12.3 (8.7)	12.7 (9.1)
1890	7.6 (6.9)	6.6 (5.9)	7.7 (7.0)	8.5 (7.8)
1900	4.3 (5.8)	3.4 (4.9)	4.0 (5.5)	4.8 (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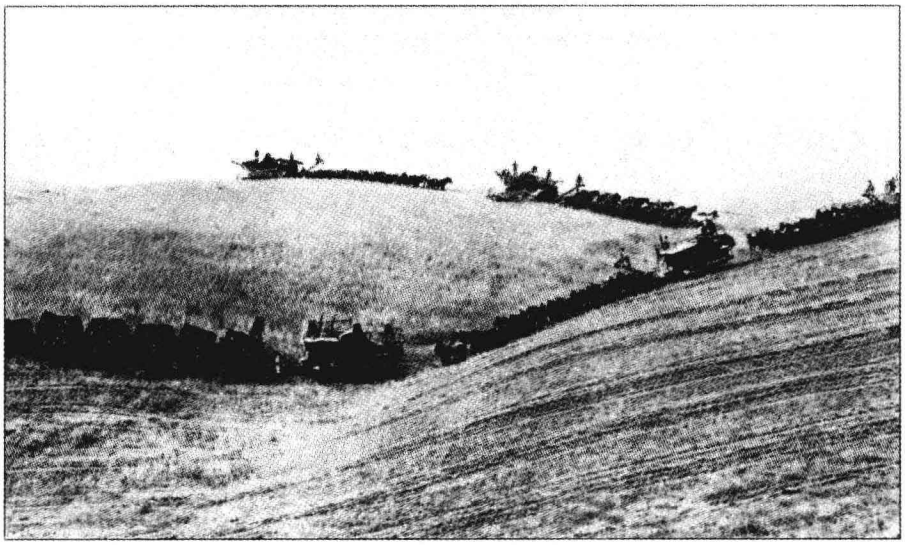
注：真实利率是名义利率加上通货紧缩率或减去通货膨胀率。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Jeffrey G.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152.

在这一时期，对于农业不尽如人意的部分解释是，商业化以及全球化过程创

① See Barry Eichengreen, "Mortgage Interest Rates in the Populist Er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995-1015, and Kenneth Snowden, "Mortgage Rates and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7): 671-692.

造了一个农民受困于经济波动的世界，而对于经济波动，农民既不能控制它又不能充分理解它。正如安·梅休（Ann Mayhew）所强调的，为了跟上经济进步的步伐，农民需要更多的设备——收割机、播种机和犁——以及更多的土地和灌溉设施。这就意味着更多的债务。[①] 当农产品价格下降时，取消抵押权赎回或暂停信贷发放都会损害农民。而且，农田价格由于受国际力量的影响而上涨。农田价格的涨跌与美国的天气好坏及收成好坏无关。每样东西也许都依赖于国外，而这是农民不能直接观察到的。罗伯特·A·麦圭尔已经证明了西部各州的政治扰乱与这些州的经济不稳定之间存在着很强的相关性，而且价格波动对农民收入的不稳定具有特别重要的影响。[②]



© CULVER PICTURES

在由蒸汽和汽油发动的拖拉机出现之前，大马力是可能的。

即使当代研究已经拒绝了于19世纪晚期提出来的很多观点，我们仍然需要对由农民的不满而引发的政治力量做一个近距离的观察，因为由平均地权论的保护者们提出的改革有助于塑造美国经济的制度框架。

农民的政治性组织

在反对私权巨头的“三十年战争”中，为农民的权利而战形成了大量规模不

① See Ann Mayhew, "A Reappraisal of the Causes of Farm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464 - 475.

② See Robert A. McGuire, "Economic Cause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835 - 849.

同的组织。[1] 城市产业工人影响了一些组织，而且平均地权论的很多观点都源于东部的城市激进主义者。[2] 西部和南部的农民主导了——即使不能说是全部的运动——起码四次相当著名的运动。

格兰奇

第一个重要的农业组织是全国农业保护者协会（National Grange of the Patrons of Husbandry），简称格兰奇。正式的组织成立于1867年，会员发展得很迅速。到了1874年，它已经拥有了2万个地区分会以及大约150万名会员。在保持了7年的支配地位后，它开始转向衰落，并在1880年，除了如密西西比流域的高地以及东北部这些少量强势地区外，大多数会员都退出了。

尽管该组织的规章制度严厉禁止格兰奇从事正式的政治活动，但成员们却参与了非正式的政治会议以及游说改革团体确保管理立法的通过。在一些位于西部地区的州，在对铁路、仓库以及升降机公司设定最高收费额的法律方面，以及在通过委员会（美国政治中一个全新的概念）设立针对这些公司的管理条例方面，格兰奇都取得了成功。在1877年芒恩诉伊利诺伊案（Munn v. Illinois，1877）中，最高法院认为如果商业“涉及公众利益”，那么诸如此类的监管就是合法的。然而在1886年，最高法院认为州不能监管跨州的商业活动，因此改革者们不得不求助于联邦政府来管理铁路。州际商业委员会（我们将在第16章继续讨论它）成立于1887年，就是这项活动的结果。

格兰奇为了反对不公平的商业活动还发展了另一个武器。如果商业收费太高，那么农民就应该也进入商业，这一点足够灵活。格兰奇所创立的最成功的商业模式是合作社，这是为了向格兰奇会员物主销售一般商品以及农业设备而形成的。合作社（以及销售存货的常见的公司）是为了与农业生产过程相一致而设立的，格兰奇还创立了第一家大型邮政会员机构，即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Montgomery Ward and Company），以出售给格兰奇。

绿背纸币运动

有些农民由于对格兰奇在支持农业价格方面没有取得更多令人满意的成果感到失望，转而联合劳动者的力量去形成一个独立的全国性的党派，并在1876年选举中加入了候选人。令人失望的是，这一团体失败了，但是由同样的人组成的“绿背劳动党”（greenback labor party）在1878年选举中取得了进步。为了给美

---

① 关于农场运动和政治活动的更多信息和长远的视角，参见 Morton Rothstein，“Farmers'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Numbers，Gains，Loss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3)，(Summer 1988)：161－188。

② See Chester McArthur Destler，“Western Radicalism，1865—1901：Concepts and Origins，” *Mississippi Valley Historical Review* 31 (December 1944)：335－368.

LIBRARY OF CONGRESS

图中描绘的是在伊利诺伊的斯科特举行的一次格兰奇运动中的会议场景，与大多数格兰奇运动中的会议一样，成员们关注他们对大城市作风、垄断、关税以及农产品低价格的不满，通过这一途径形成对农业的组织化的支持。

国内战融资，政府亟须发行纸币，即通常所称的“绿背纸币”，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后期，发行类似纸币的建议吸引了贫困的农民。“绿背劳动党”的政治纲领，比其他任何党派的纲领都更关注通货膨胀（他们也许曾称它为通货再膨胀）。尽管绿背劳动党的候选人在1880年参选总统，但因为劳动者们缺乏有效的参与，他们获得了非常少的公众选票。在1884年和1888年大选中，绿背纸币煽动者们仍继续努力地活动，但是收效甚微。

这些运动值得铭记应归因于两个方面。首先，绿背纸币的宣传活动构成了农民在全国范围内第一次尝试的政治活动。其次，这一团体的主要信条后来成了共和党试图用来赢得19世纪90年代大选最重要的一部分。

联　盟

在同一时期，格兰奇变得多样化，独立的农民俱乐部正在西部和南部形成。独立的俱乐部乐意合并成州“联盟”，这反过来又形成了两个主要的团体——北方联盟与南方联盟。在1898年，努力把这两个联盟合二为一的尝试失败了，尽管它们具有相似的目标。联盟鼓吹的货币改革类似于那些绿背团体所督促的，同时，与格兰奇相似，它们乐意支持政府监管以及商业冒险的合作。而且，联盟的成员们对交通和通讯设施归国家所有感到满意。

每个联盟都提出了一个具有高度现代内涵的建议。南方联盟提议由政府为储

藏不易腐烂的商品设立一个仓库系统，结果是农民能够获得超过储藏产品价值80%的低利率贷款。北方联盟建议联邦政府提供以美元计价的超过农场价值50%的长期贷款。由于它们的革命特点，这些理念很难获得来自选民的支持。

民粹主义者

自19世纪80年代末期温和的繁荣时期以后，经济活动经历了另一个衰落，并且农民和工人的境况再次变得艰难起来。在1891年，联盟成员与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聚集在辛辛那提以形成平民党。1892年在奥马哈举行的党会上，著名的平均地权者以及演说家詹姆斯·维沃将军（General James Weaver）当选为主席。维沃，一个老绿背分子，在1892年选举中赢得了22张选票。两年以后，平民党赢得了一些国会席位，并且看起来它在这条道路将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民粹主义（populism）由于30年的社会不稳定而兴起——主要是农业的衰落，但它是与城市相关联的。就其支持者而言，民粹主义在促进经济好转方面远不止是一个煽动口号：它是一个信念。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含义是该信念的一部分，因为它们有益于更长远的经济目标。反对垄断控制的政治口号——反对公司、银行和资本家施加的压力——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与反垄断这一关键原则相伴随的是，它主张采取强有力的集体主义信条。民粹主义者认为只有通过政府控制货币系统以及通过政府拥有对银行、铁路和交通工具的所有权，垄断的罪恶才能消除。实际上，一些民粹主义者鼓吹政府拥有基础产业厂商的所有权的活动，使得政府获得信息从而能判断厂商究竟有没有收取垄断价格。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将提供一个尺度，通过它可以衡量私有企业的表现。

在美国国内那些比较老旧的地区，平民党的激进分子疏远了已经定型的农民。如果1898年联合平民党和共和党的领导者们没有选择支持或者反对通货膨胀这一议题，那么很难说明白这一联合的未来将会怎样。但是通货膨胀对于有少量财产或者没有债务的人来说，是极其讨厌的，并且在关键时刻，乡村与城市的财产所有者联合起来支持“完备”货币。

联邦援助农业的开端

尽管就短期目标而言，农民通过组织来改善状况的尝试并不成功，但这一方法开启了立法和联邦援助。当然，19世纪的土地法令为新农民带来了收益，但是它们很少被认为是农业“系统”的一部分。类似地，在19世纪后期以及20世纪早期通过的很多管理立法，虽然是在民粹主义组织内形成的，但其产生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在农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联邦对农业的援助是为了帮助个体农民提高生产力，旨在收集并散播信息；它并不是旨在减轻穷困，这正如后来的新政立法。

农业部

早在1839年，一个农业部门已在专利局设立。国会在1862年创建了农业部，但是它的领导却取决于农业委员会的任命，直到1889年它才跻身内阁。

在1920年之前，农业部在三个主要方面起到了作用：（1）在植被开发、植被和动物饲养以及害虫与疾病控制上的研究和实验；（2）在公众中发布农业信息，建立农业实验站，以及乡村管理工作；（3）通过宣告有病的动物不安全这一权力管理农产品质量，禁止州际商业中运载被掺兑和贴有假商标的食物及药品，以及在州际贸易中检验肉类和日用品。农业部有义务向农民提供实际帮助，这一点可以由整个时期农业部定期地分发免费的种子的事实作证。回过头来看，在这些早期岁月农业部的关键贡献就是它竭尽所能使得农民相信了“科学的”农业所具有的价值。

农业教育

把农村教育项目并入教育体系的尝试始于地方的努力，但是联邦的援助对于维持充足的计划是必要的。尽管到1860年有些州已经成立了农业大学，但直到1862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2）才推动了大学层次的农业训练。《莫里尔法案》设立了土地赠与学院，并逐渐在农业研究上被认为是全州的领导者。1887年《赫克法案》（Hatch Act of 1887）向州立农业试验站提供资助，它们大多数是用州的资金设立的。《赫克法案》同样给农业部设立的农业试验站点的管理办公室提供资助，以方便农业部的工作与各州的工作相衔接。在1900年后，对于初级中学的兴趣开始兴起。1917年《史密斯-胡格斯职业教育法案》（Smith-Hug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ct of 1917）决定向那些同意在高级中学水平上扩展农业、贸易以及家庭经济方面的职业训练的州提供援助。

这些以及由改革者们带来的其他可见的进步促使联邦介入农业部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在1920年以后，这一影响有极大的增长。类似地，结束对自然资源的浪费的口号增强了政府在控制及使用土地、木材及其他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

自然资源保护：第一阶段

正如欧洲人及同一时期的其他人所观察到的，北美自然资源的浪费可以回溯到殖民地时期。例如，很多殖民地农民忽视了“先进的”有利于保持土地肥力的欧洲农耕方法，偏向于砍伐树木并且在树桩周围种植，如果土地肥力耗尽了就转

向其他地方。因为土地充裕，他们所关心的并不是土壤的保护而是劳动力和资本的短缺。

类似地，在19世纪早期，木材是十分充裕的，尤其是在美国的东半部，那里有5/6的原始森林。实际上，在大多数新定居地区，直立的树木通常是障碍而不是资源。最晚到1850年，基于燃料的90%以上的能源都来自木材。

然而到了1915年，美国木材的供给不到供给燃料的能源的10%，并且在大平原和其他的西部地区，树木变得日益稀少。[①] 铁路的西进（它耗尽了19世纪70年代所伐树木的近1/4）和人口向西部迁移给有限的西部和遥远的东部的木材供应施加了新的压力。而且，从实际用途来看，在公共土地上未被砍伐的木材的市场价值为零。这一对木材的法律权利缺乏清晰界定的事实，促使人们尽可能快地去砍伐公共土地上的木材（经济推理命题3）。结果是产生了大量的浪费，并且各种各样的环境灾难更趋于极端。其中包括了水土流失，而这增加了洪灾以及导致土地腐蚀加速。更为重要的是，大量砍伐的集聚（树枝以及堆积的其他木材）产生了严重火灾的风险。在19世纪末期，过度砍伐的大型地区明显变得危机四伏。例如，在1871年，威斯康星的“佩斯泰格大火”（Peshtigo fire）造成128万英亩森林毁于一旦，且有1 000多人罹难。造成类似巨大损失的大火也发生在1881年的密歇根以及1894年的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这些及其他因素，诸如以欺骗手段获取土地，都呼唤立法以及改革。[②]

对土地、水以及树木的保护

改革主要的第一步就是1891年《一般修正法案》。正如早就提到过的，这一法令废除了曾经容易导致土地欺诈的方案，使得公司和富人更难以偷取木材和矿产。对偷窃的预防很少会形成保护，但是1891年的另外一项立法赋予了总统在森林保护方面的权力，则是一个真正的保护方案。在1891—1900年间，5 000万英亩有价值的林地禁止私人进入，虽然遭到了来自西部一些州的利益集团强烈且日益增加的反对。尽管不充足的拨款使得森林部不可能去保护森林保护区以避免森林大火以及来自木材偷窃者的劫掠，但是森林保护的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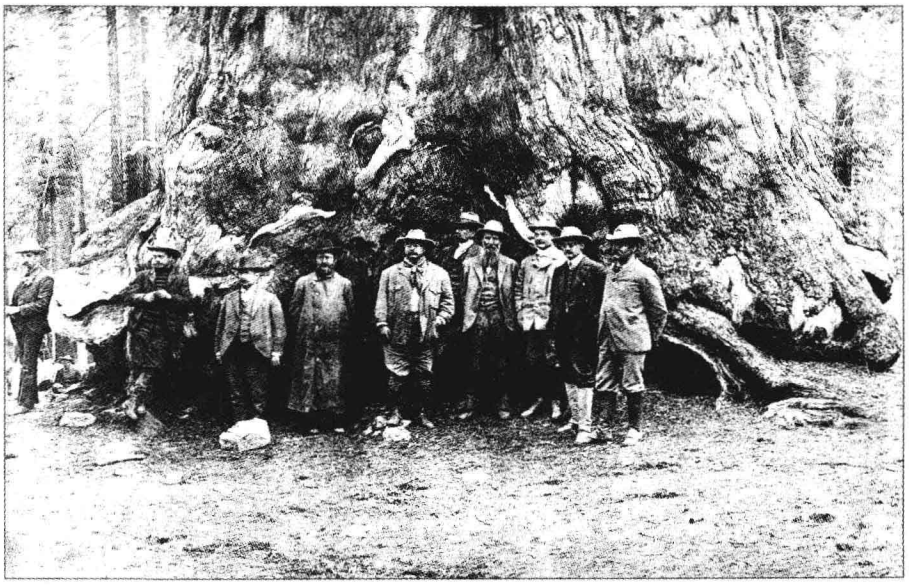
当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成功当选总统时，国会和整个国家都对保护问题持有广泛的一致意见。怀着想象力、荣誉以及热诚，罗斯福在他的两个任期内寻求通过立法以提出一个一致的并且影响深远的保护计划。到1907年，他已可以指出一些主要的成就：

（1）国家森林总计1.5亿英亩，其中有7 500万英亩的森林包含有市场价值

---

① 了解在自然资源的消耗和供应改变时的反应过程，参见 Nathan Rosenberg, “Innovative Responses to Material Shortag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3 (May 1973)。

② See Alan L. Olmstead, “The Costs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Vol. 2 (New York: Scribner's, 1980), 863 - 881; and Marion Clawson, “Forests in the Long Sweep of American History,” *Science* 204 (June 15, 1979).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西奥多·罗斯福和自然主义者约翰·缪尔在约塞米蒂国家公园。作为一个热情的户外生活者，罗斯福扩展了联邦政府在保护美国森林和自然资源方面的作用。

的木材。在1901年设立了森林部，它在1905年成为国家森林服务机构。在吉福德·平肖（Gifford Pinchot）的帮助下（他是罗斯福总统的所有涉及保护事务的主要顾问），一个科学的森林体系得以创立。国有森林不仅受到保护，林木的收成持续保持高产并且被出售，从而保证了具有更好前景的未来收益。

（2）7 500万英亩蕴藏矿产的土地得到了保护，避免了被出售和拓殖。大多数含有金属矿的土地已被私有化，但是政府仍保有巨大数量的煤、磷酸盐以及石油。

（3）明显意识到了水电站在将来的重要性。虽然确立了把国有水电站在一个约定时期内承包给私人厂商的政策，但在此期间实际的所有权仍然由政府控制。

（4）出于控制水流的目的，政府的适当角色是实施公共作业体系这一原则被采用。1902年《垦荒法》（Reclamation Act of 1902）规定干旱的州销售土地所获的收入应被用于资助水库和灌溉系统的建设，在一段时期内由移居者来偿还。然而事实上，为这些水利项目埋单的是全体纳税人，而不仅仅是西部的移居者。

尽管这些成就看起来比较一般，但应该想到这是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很多人都愤懑于对私人开发现存公共土地的任何干扰。政府在水控制、堤坝以及灌溉系统方面的大多数支出的增加还有待于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的第二次当选来解决。但是由西奥多·罗斯福政府所设定的先例开启了现今时代的能源奇迹，它使得西部农业从基本谷物的旱地种植以及牲畜饲养的脚镣中解脱出来——这对于纳税人意味着相当大的成本。尽管踌躇不安，但它们仍然开创了一个对自然空间、矿藏、森林以及水资源采取更大保护力度的新方向。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rrington, Leonard. *Great Basin Kingdo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Atack, Jeremy. "Tenants and Ye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3), (Summer 1988): 6 - 32.

Atack, Jeremy, and Fred Bateman. *To Their Own Soil: Agriculture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Atack, Jeremy, Fred Bateman, and William N. Parker. "Northern Agriculture and the Westward Movement."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85 - 328.

Bateman, Fred. "Improvements in American Dairy Farming, 1850—1910: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3 (1968): 255 - 273.

Bogue, Allan. *From Prairie to Cornbelt: Farming on the Illinois and Iowa Prairi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Bowman, John D.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Midwestern Farm Land Values and Farmland Income, 1890 to 1900." *Yale Economic Essays* (Fall 1965).

Bowman, John D., and Richard H. Keehn. "Agricultural Terms of Trade in Four Midwestern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592 - 609.

Carstensen, Vernon. *Farmer Discontent, 1865—1900*. New York: Wiley, 1974.

Coelho, Philip, and James Shepherd.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Prices: The United States, 1851—188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551 - 591.

Craig, Lee A. *To Sow One Acre More: Childbearing and Farm Productivity in the Antebellum Nor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Cronon, William. *Nature's Metropolis: 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 Norton, 1992.

Danhof, Clarence H. *Change in Agriculture: the Northern United States, 1820—187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David, Paul.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in the Antebellum Midwest." In *Technical Choice,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Essays on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Eichengreen, Barry. "Mortgage Interest Rates in the Populist Er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December 1984): 995 - 1015.

Galenson, David. "The End of the Chisholm Trai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1974): 350 - 364.

Gallman, Robert E. "Changes in Total U. S. Agricultur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gricultural History* (January 1972).

——.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the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U. S. Experie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Essays in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eds. David Klingaman and Richard Vedder.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5.

Gates, Paul Wallace. *The Farmer's Age: Agriculture, 1815—1860*.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Guilloches, Zvi. "Hybrid Corn an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Science* 132 (July 29, 1960).

Harley, C. Knick, "Western Settlement and the Price of Wheat, 1872—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865 - 878.

Hays, Samuel P. *Conservation and the Gospel of Efficiency: The Progressive Conservation Movement, 1890—192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Hicks, John D. *The Populist Revolt*.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61.

Higgs, Robert.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865—1914: An Essay in Interpretation*. New York: Wiley, 1971.

Jones, Lewis.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and Mowing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451 - 455.

Kantor, Shawn Everett. *Politics and Property Rights: The Closing of the Open Range in the Postbellum Sout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Libecap, Gary D. "Economic Variab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aw: The Case of Western Mineral Righ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338 - 362.

——. "Bureaucratic Opposition to the Assignment of Property Rights: Overgrazing on the Western Rang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151 - 158.

——. "Property Rights in Economic History: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3 (1986): 227 - 252.

Libecap, Gary D., and Ronald N. Johnson. "Property Rights, Nineteenth-Century Federal Timber Policy, and the Conservation Move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129 - 142.

Lindert, Peter H. "Long-Run Trends in American Farm Valu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3), (Summer 1988): 45 - 85.

Mayhew, Anne. "A Reappraisal of the Causes of Farm Protes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464 - 475.

McGuire, Robert A. "Economic Causes of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grarian Un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835 - 849.

Merk, Frederick. *History of the Westward Movement*. New York: Knopf, 1978.

Olmstead, Alan. "The Mechanization of Reaping and Mowing in American Agricul-

ture, 1833—187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June 1975).

Olmstead, Alan L. and Paul W. Rhode. "Beyond the Threshold: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Behaviors of Early Reaper Adopter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5 (1995): 27 - 57.

——. "The Red Queen and the Hard Red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American Wheat, 1800—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2 (2002): 929 - 966.

Parker, William. "Agriculture."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s.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Petulla, Joseph M. *Americ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The Exploitation and Conserv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San Francisco: Boyd & Fraser, 1977.

Rasmussen, Wayne 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on American Agriculture, 1862—196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2 (December 1962).

Rothstein, Morton. "Farmers' Movements and Organizations: Numbers, Gains, Losses." *Agricultural History* 62 (3), (Summer 1988): 161 - 181.

Shannon, Fred A. *The Farmer's Last Frontier, 1860—1897*.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8.

Snowden, Kenneth A. "Mortgage Rates and American Capital Market Development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1987): 771 - 791.

Swierenga, Robert P. *Pioneers and Profits: Land Speculation on the Iowa Frontier*.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lt, 1921.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A history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provided at http://www. usda. gov/history2/.

Williamson, Jeffrey G. "Greasing the Wheels of Sputtering Export Engines: Midwestern Grains and American Export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7 (1980): 189 - 217.

Winters, Donald L. "Tenancy as an Economic Institution: The Growth and Distribution of Agricultural Tenancy in Iowa, 185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382 - 408.

第 16 章　美国铁路和经济变革

本章主题

很少有其他发展能像美国铁路一样吸引历史学家以及当代观察家们的注意力。快速强劲、能到达任何地方的美国铁路逐渐主导了美国的疆域以及美国的移民。火车成为现代美国的象征，是美国经济占据工业化世界领导地位的缩影。

要想讲明白铁路的许多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不厌其烦地很快就列出一大堆问题来。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四个问题上：

1. 这些横跨大陆的投资是建立在需求之前，还是铁路是定居过程的跟随者？

2. 建造者们如何获得资本？巨大的土地赠与（包括联邦和州），以及其他金融资助的方法都被使用了。这些土地赠与是无用的免费样品么？或者是对空闲空间的滥用吗？从全局来看，它们到底有多重要？

3. 另外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因素是在经济中不断增加的政府干预，正如在铁路监管中所表明的包括州和联邦层面的干预（经济推理命题 4）。关键的法律解释为政府对经济进行新的控制铺平了道路。铁路管理机构的监管过程是否存在俘获，还是监管主要是使得使用者获益？

4. 最后，铁路对经济的总体增长率有什么影响？它是仅仅在边际上优于其他交通形式，还是它对于美国的经济繁荣是绝对必要的？在第 9 章中我们曾观察到的南北战争时期铁路的生产率提高的步伐，是否会在战后持续？

自铁路建成之后，这些问题被每一代经济史学家们追问。正如我们将会看

到的，答案随着新发掘的数据来源以及新应用的分析工具时有变化（经济推理命题 5）。

横贯大陆铁路[①]

1849 年的淘金热使人们了解到太平洋海岸的富裕以及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巨大空间。有三条道路可以到达那里，但是都非常艰难。马车队去往加利福尼亚和太平洋西北，要忍受冬天的暴风雪、夏天的干旱以及在所有季节里印第安人的攻击这些苦恼。途经巴拿马地峡的最短的海路，将使得绕过合恩角的 6～8 个月的旅程减少到 6 个星期。但是从地峡的东部港口查格雷斯河去往巴拿马城的话，则是借助原始独木舟和骡子的 5 天的旅程，并且在巴拿马城，旅行家在获得去往北部的通行证之前要等很长一段时间。对于那些可以负担得起的人而言，最好的去往加利福尼亚的道路是通过快速航船，它使得绕行合恩角的时间大约在 100 天。（在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最快纪录是 88 天，是由飞云号快速航船在 1854 年创造的。[②]）因此，我们就毫不奇怪当时的人们非常急切地向往一条连接太平洋海岸的安全航路。

从一开始，政府参与就被认为是必需的。通常认为虽然国家的获利将是巨大的，但是对私人投资家而言，其利润将不足以补偿此类项目所含的巨大风险。到 1853 年，人们使国会确信了建设一条通往西海岸的铁路的可行性并派遣政府的工程师实地考察路线。工程师们提出了五条可能的路线，花了很多年才真正开始建设，而这却是因为来自对铁路路线把东部作为终点站的挑战。从明尼阿波利斯到新奥尔良，沿着密西西比河的城市都为了通往西部的大门口的位置展开了竞争，吹嘘各自的优势以及贬损对手的声明。美国内战爆发从国会中将南方路线的拥护者排挤出去，并且在 1862 年，北方的普拉特河路线被选中，因为它已经被小马速递、公共马车和货运四轮马车使用过。

1862 年《太平洋铁路法案》（Pacific Railway Act of 1862），国会赠与特许成立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它被授权去建设一条从艾奥瓦的布拉夫斯地方议会到内华达的西部边境的铁路路线。中太平洋铁路公司（Central Pacific Railroad）在 1861 年《加利福尼亚法案》下被合并，同时也被授权建设铁路的西部部分，即萨克拉门托到内华达边境。政府同意在两个方面提供财政资助：公共土地的十个部分（五个交替使用的部分，在每一边拥有路权）被赠与每一英里的路轨铺设。政府答应将来会对每一英里的铁路建设借款给公司；贷款将由第一抵押债券（first-mortgage bond）来进行担保。因为 1862 年法案没有吸纳到足够的私人资本，法律在 1864 年得以修订，赠与土地的数量翻

①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我们有时泛指的铁路实际上应为“西部横贯大陆铁路”。

② 这个纪录保持至 1989 年，直至一个名为“星期四小孩”的高科技帆船在两名船员的操纵下，于 80 天内完成这段旅程。

番并提供政府贷款的第二抵押证券（second-mortgage security），因此使得铁路可以把第一抵押债券销售给公众。为了提高建设的速度，中太平洋铁路公司被允许越过内华达边境建设150英里的铁路；后来它又被授权向东推进，一直到能连接上联合太平洋。

铁路建设最后两年的特点是，通过在两家公司之间开展分层的竞赛看谁能铺设更多的铁轨。因为已经获得允许向东建设连接联合太平洋的铁路，中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领导们希望尽可能多地获得每英里的补贴。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依靠退伍军人和爱尔兰移民，已经铺设了1 086英里的铁轨；中太平洋铁路公司，依靠华工，铺设了689英里铁轨，部分是穿过山区的铁轨。联合太平洋和中太平洋的接轨引发了巨大的欢呼，并且在1869年5月10日，在犹他州的奥格登*西边几英里外的突顶山（Promontory Summit）（通常被称为突点）会议上进行了庆祝。通过电报，尤利西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总统从华盛顿发出钉下最后一颗道钉的命令。榔头钉下这颗黄金道钉的声响被正等待回应的人群听见，刹那间也引发了东西海岸人们巨大的庆祝活动。这一情感可以表示为，农民和劳动者的成果现在可以快速且廉价地从海岸这一端被运往另一端，或者是从内陆地区被运往海岸。借助铁路，大陆至少是贯穿了；虽然贯穿大陆的铁路旅行不能说不会有不舒适甚至危险，但是可怕的陆上和海洋路线的试验已经结束了。参见视角1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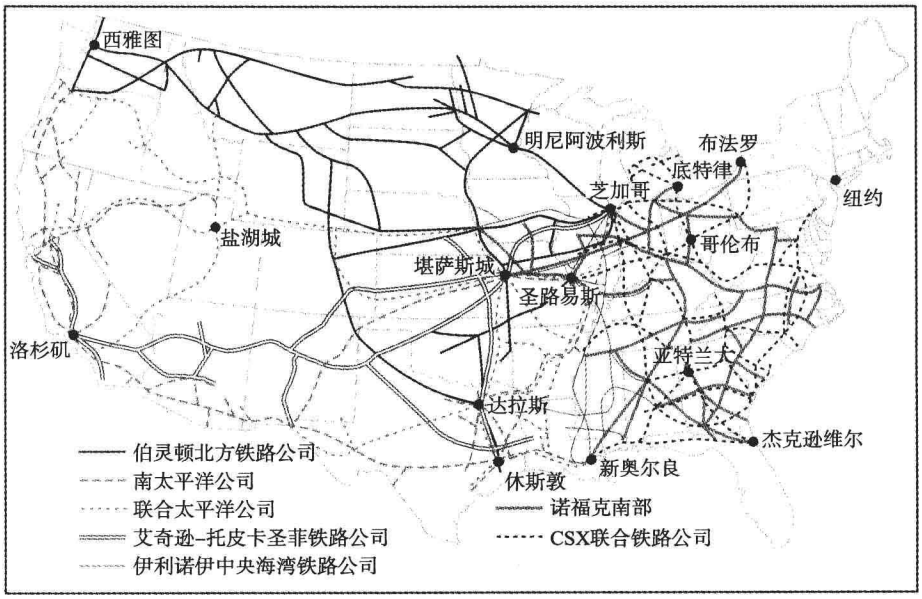
总体建设：速度和模式

由于第一次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趋向结束以及其他铁路建设的增加，在定居地区通过的铁路交通已经形成了纵横交错的网络（参见地图16—1）。所有的主要线路都尽力确保能成功地通往东部的纽约和西部的芝加哥以及圣路易斯。而在更北一些的线路上，到1877年，纽约中心已经完成了一条从纽约到芝加哥的完整线路，几年之后伊利也同样完成了这样一条线路。19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干线填补了线路图上的缺口，从而能够通往辅助的铁路中心并且在从北到南的方位上建起了汇入主干道的线路。

从1864年到1900年，占最大比例的轨道都铺设于大平原州内，它们从占全国年度建设总量的1/3增加到将近占1/2。芝加哥成为主要的铁路终点站，是通往北部、西部以及南部的铁路网的中心。圣路易斯、堪萨斯城、明尼阿波利斯、奥马哈以及丹佛成为二级铁路中心。

东南部和西南部在铁路建设方面落后，同时在把当地的线路合并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方面也处于落后地位。人口稀疏以及战争引发的贫穷可以部分地解释东南部的落后，但是沿海岸线的运输方面的竞争也是其铁路增长的一个阻碍物。在1880年之前，南方唯一可用的穿山的交叉道口是切萨皮克和俄亥俄，并且除了

* Ogden，美国犹他州北部城市，位于盐湖城北部。——译者注



地图 16—1　美国今天主要的铁路网

美国现代铁路网反映了 19 世纪发生的铁路建设的巨大浪潮。

南部本身的线路，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前，南方也没有主要的南北走向的线路。

记住主干线铁路网络的增长速度是因不同地区而异的，表 16—1 表明了全国性的按英里计算的全部线路的扩张。有个特征一点也不奇怪：增加的英里数量上的百分比上涨最终减缓了。

表 16—1　　正在运行的干线铁路轨道（千英里）

年份	英里数	变化的百分比（%） （以 5 年为时间间隔）
1860	31	
1865	35	13
1870	53	63
1875	74	42
1880	93	26
1885	128	38
1890	167	30
1895	180	8
1900	207	15
1905	238	15
1910	266	12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Series Q15, 49 - 50.

视角 16.1

铁路和摩门教手推车车夫

在1869年5月10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突顶山的接轨点接通了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形成了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国家最终通过铁路形成一个整体。而且，这一衔接结束了长距离邮递站点式的路线、快马速递以及美国历史上最独特的一种移民形式。

甚至在摩门教先驱逃离在伊利诺伊所受迫害并于1847年首先进入犹他大盆地并且重新在那里建设他们的教堂（今日的盐湖城）之前，当时在英国和北欧劳作的摩门教传教士就已在吸纳新成员加入教会。在1854年之前，摩门教徒们搭乘马车队向西迁移到他们的锡安山之地。

从1854年到1868年，在犹他落脚的新摩门教徒中绝大多数来自欧洲濒海国家，他们先是乘船到达美国，然后坐火车到达艾奥瓦市西边的铁路终点站（后来成了奥马哈），再步行一公里。很多人所熟知的手推车车夫用可以装货的手推车装载他们的财物，这类手推车类似于中国的人力车。因为太穷付不起马车的费用，他们在教会的指导和经济资助下向西步行。在1856年11月的早些时候这些人遭受了一个灾难般的重大打击，当时各自拥有将近500辆手推车的两个车队，在维利队长和马丁队长的领导下“在季末”离开了艾奥瓦市。这两个独立的队伍在距离怀俄明州西部大分界线近8 000英尺的地方遭受了初冬的暴风雪打击。在获取暴风雪来临的信息以及得知人们在路途中所遭遇的情况并且已经疲惫不堪后，前方营救队伍迅速施援。由29人组成的营救队伍迅速从盐湖城出发。有1 000多个滞留的人得到了营救，但是有两三百人因饥寒交迫去世。

今天，为了缅怀人们在美国历史上自愿向西部移民的过程中曾经历过的最巨大的灾难，在怀俄明州有两个向公众开放的历史博物馆建立在两个队伍苦苦支撑以及等待天气好转的地方。尽管后来的手推车队伍得知并且避免了维利车队和马丁车队曾遭遇到的残酷风险，但是手推车车夫的长途跋涉并没有结束，一直到1869年春天铁路的优势才使得他们相形见绌。

诺贝尔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和阿瑟·伯恩斯在半个世纪前的开创性工作中各自揭示了一个典型特征，即快速的铁路扩张伴随着逐渐变小的增长速度。[①] 所有的伟大创新和产业增长模式都表明了这一特征，举几个例子来说，这与我们早就在烟草生产、棉花生产和蒸汽机机船生产中所观察到的是一样的。然而，仍

① Simon Kuznets, “The Retardation of Industrial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Business History* (August 1929), and Arthur F. Burns, chapter 4, “Retardation in the Growth Industries” in *Production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7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34).

然值得津津乐道的是，在1910年之前的25年内，铁路的全部绝对英里数翻了一番。艾伯特·菲什洛的工作揭示出在19世纪后期主要的铁轨建设形式中的三个主要高潮：1868—1873年，1879—1883年，以及1886—1892年。[①] 这些建设高潮时段的戛然而止主要是由每一时段的重大金融危机推动：1873年、1882年以及1893年。正如J. R. T. 休斯所认为的，当我们回想到铁路建设严重依赖于借款时，这一点并不会使我们感到惊诧莫名。[②] 铁路建设对总量需求和商业周期有非常强的影响。在19世纪70年代，它占据了美国全部资本构成的20%，在19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是15%，而且在1920年之前，它在其余年代的总量中一直保持在7.5%。这些投资增强且对应于商业周期中的起伏。在1920年，铁路就业达到了顶峰，几乎每20个工人中就有一个是铁路工人。

生产力的提高与下降

铁路建设方面迅速但逐渐变慢的增长步伐同样也出现在铁路生产力的进步方面。正如表16—2所示，在1870—1910年间的40年内，铁路的全要素生产率几乎翻了一番多。在其他的成熟部门和产业中，铁路经历了连续但逐渐变缓的提高。正如在第9章我们曾观察到的，在1840—186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非常迅速，在最初的20年内它几乎翻了一番。

表16—2　　1870—1910年铁路部门的生产率（1910年＝100）

年份	产出	劳动力	资本	燃料	总投入	全要素生产率
1870	7	14	17	5	14	47
1880	14	25	32	12	26	54
1890	33	44	62	29	49	67
1900	55	60	72	46	63	87
191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注：参见第9章的表9—4中对内战前生产率的类似衡量。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508.

① Albert Fishlow,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500.

② 参见胡格斯经典著作，*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0), 120。

产出相对于投入的持续快速的增长主要归因于两个方面的生产力进步。正如菲什洛所证明的，首先是来自正运行的规模经济的收益，在那个时候几乎占据了铁路生产力提高的一半。另外一半来自四个方面的创新。按其重要性来排列的话，它们是：(1) 更强有力的机车以及更有效的货运车辆，使火车的容量翻了三番；(2) 更结实的钢轨，允许更重的载运；(3) 自动化的连接装置；(4) 空气车闸。这后两个装置使得火车具有更大的运行速度且运行得更安全。①

除了被预期到的铁路生产力的提高变缓之外，从此时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整个历史时期，生产力仍然在持续地提高。它具有 2%的年增长率，并且超过了总体经济生产力增长的速度，而总体经济生产力的增长大约是 1.5%每年每单位。就它们自身来说，铁路并不是 19 世纪美国经济快速进步的原因，但是对于很多代的美国人而言，它们标志着企业家活力永不停止，并且是引起经济进步的技术进步。

铁路建设与铁路需求

约瑟夫·熊彼特——20 世纪早期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之一，认为很多中西部的铁路项目“意味着建设在需求之前，而且这也是这一阶段最大胆的设想”，以及“在绝大多数投资家不敢设想的这个时期内，中西部和西部的项目并未被预期能用其收益支付其成本”②。熊彼特的观点意味着为了开拓西部，政府对铁路的资助是必要的。

为了检验熊彼特的断言，艾伯特·菲什洛分析了在南北战争之前的铁路投资的收益率。他具体化并且大胆地检验了熊彼特的假设，赢得了同行经济学家们的赞扬。③ 菲什洛的推理是这样的，如果铁路是建设在没有人定居的地区，那么对铁路服务需求的初始水平将非常的低，这将导致价格低于平均成本。当定居点出现之后，需求曲线将向上移动，结果是平均收益将最终超过平均成本。这就使得他可以对三个方面进行检验：(1) 政府的资助应该广泛分布；(2) 初始化利润率应该小于替代投资的利润率水平并且当铁路存在的时间更长后它应该上升；(3) 居住在铁路附近的人口数量应该低于居住在东部铁路附近的人口数量。

在对以上三个方面进行检验后，菲什洛的发现不支持熊彼特关于铁路的建设先于需求的断言。政府对铁路的资助通常都很少，却对已经在建的铁路具有更多的直接指导，使得它通过某一个特殊的城镇而不是另外一个。利润率通常在起始阶段相对高，此后却在所有阶段下降。而且当铁路开始运行时，居住在铁路附近

---

① 关于生产力提高的来源问题，更多深入分析参见 Albert Fishlow,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509-510;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② 引自 Fishlow,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165, 167。

③ See Robert W. Fogel, “The Specification Problem in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296; Meghnad Desai, “Some Issues in Econometric Histo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1, 2d series (1968): 12.

的人口数量通常近似于东部乡村地区的居住在铁路附近的人口数量。

这个自相矛盾的结果到底是由什么造成的呢？毕竟，看起来证据确凿的是人们不会在铁路建造之前迁往一个地区，而且在农民到达之前铁路也不能建造起来。中西部市场能够与经济发展相协调吗？菲什洛发现了他所谓的“期待着的定居”。农民和商人非常清楚新的地区能够通过铁路得以开发。他们移往一个地区，拓荒、种植庄稼并且发展辅助的商业，尽管此时铁路仍处于建设之中。一旦铁路建成，此时庄稼就正好等待上市。然而，菲什洛总结说，“一套类似的标准偶然地用于战后在更西的州内的铁路建设，表明了这种情况是一个真实的建设先于需求的插曲。”①

判定菲什洛关于战后横贯大陆铁路的尝试性答案正确与否的工作，是由罗伯特·福格尔和劳埃德·默瑟完成的。利用菲什洛的评判标准，他们证明：事实上，铁路的建设是先于需求的；铁路具有相对较低的初始化利润率，并且它们的利润率随时间的推移在增长。最后，福格尔和默瑟检验了另一个解释铁路建设先于需求的观点。横贯大陆铁路在实际运行中是否最终赢得了足够高的利润率，从而可以证明没有政府补贴的私人投资的有效性？或者说，它们的平均回报率（剔除来自出售土地的收益）在数个年代内是高于还是低于替代投资的平均回报率？默瑟的发现证明了混合的结果。中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它们成为第一条横贯大陆铁路的一部分）和大北方（最后一条）在长期内，其私人回报率高于替代投资。如果私人投资者能预期到这一结果，在没有政府资助时他们也将会更愿意投资铁路。其他三家——得克萨斯和太平洋、圣塔菲以及北部太平洋——没有出现这一情况。这些发现表明战后横贯大陆的铁路都是建立在需求之前，其初始利润是很低的。然而，政府补贴这三家高盈利的铁路公司是否有必要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从长期来说，这些铁路产生的额外利润足够去补偿投资人早期的低回报。②

土地赠与、金融资助与私人资本

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太平洋铁路法案》之前，美国最大的制造厂仅仅具有50万美元的资本投资或者说拥有1 000名雇员。与此形成对比，那时的5条铁路每一条都有超过2 000万美元的投资并且拥有上万名雇员。建设横贯大陆铁路是一个巨大的工程，而且就运行而言，这个固定设备不可分割的特点增加了吸引资本的问题。

正如我们曾在运河以及南北战争之前的铁路中所观察到的，补贴对于大型交

① Fishlow,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204.

② Lloyd Mercer, “Building Ahead of Demand: Some Evidence for the Land Grant Railroad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492-500; 也可参见曾参与此过程的 Robert Fogel,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A Case of Premature Enterprise* (Baltimore: John Hopkins Press, 1968)。

通项目而言是很常见的。州和自治市为它们认为能带来持久繁荣的铁路线路展开竞争，坚持帮助铁路，虽然是在相比早期更小的规模上。它们购买或是对铁路债券进行担保、给予免税政策并且提供铁路终点站的设施。有些州认购了铁路的股本，希望分享利润。密歇根建造了三条道路，并且北卡罗来纳控制了这三条道路的过半数董事。北卡罗来纳、马萨诸塞以及密苏里接管了不成功的铁路，这些铁路是由州基金不受限制地资助。来自州和地方组织的公开捐款也许达到了 2.5 亿美元——相比 1880 年铁轨和装备的 100 亿美元的价值，这个总额很小，在 1880 年来自地方政府的资助已经停止。

相比南北战争之前的时期，此后来自联邦政府的财政资助超过了来自州和自治市的财政资助，尽管超出多少我们并不能确定。也许有 1.75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贷给了联合太平洋、中太平洋以及其他四家横贯大陆的铁路公司，但是自诉讼案件之后，大多数贷款都被清偿了。一般是 200 英尺宽的通道使用权、站点位置、建设在公共领域上的终点站设施以及来自政府土地上免费的木料和石料构成了其他四种形式的资助。但是最突出的联邦补贴形式是来自公共领域的土地赠与。

在这一形式中，国会把公共领域上仍未处置的一部分土地给予铁路公司，作为给予货币或信贷的替代。按照以前在 1850 年给予墨比尔（Mobile）和俄亥俄以及俄亥俄和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标准，道路任何一边的土地都可供选择，尺寸上的变化是从 6 英里到 40 英里，这些土地都被公开地给予已经建成的每一英里的铁路。之所以做出这个二选一的提议，是因为政府预期可以分享土地的增值，而由于新的交通工具，这也是可以预期的结果。在 1871 年以后，因为公众的反对，利用土地赠与补贴铁路公司的做法并未得以持续，但是在此之前的 79 个赠与总计 2 亿英亩土地，虽然通过没收减少到刚刚超过 1.31 亿英亩，却已经被赠与给了铁路公司。[①] 这一数量大约是在 1789—1904 年间所积累的美国公共领地的 9%，稍少于赠与各州的数量。

然而，必须注意到对铁路公司的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国会要求那些获得了赠与的公司，它们在运载邮件、军队和政府财产时，必须减少收费。（在 1940 年，国会减轻了土地赠与铁路的所有费率，军事行动除外；在 1945 年，军事行动也被移出降低运费率的范畴。）虽然土地赠与费用实际上起作用，政府获得了大约多于 5 亿美元的削减——几倍于它们赠与的土地的价值，大约等于铁路公司从土地赠与中所获得的价值，因为铁路公司获得了土地价值长期增加的补贴。而且，土地赠与在某些方面比替代补贴具有更好的激励。通过快速地建设一条好的铁轨，铁路能够更好地实现土地赠与的价值。相反，基于完成铁轨的英里数的现金补贴或者是类似标准鼓励了劣质的建设（经济推理命题 3）。在 19 世纪 70 年代早期，补贴增加了利润，并且由此增加了铁路建设者的激励，但是包括新资本和重置资本中的大部分都来自私人渠道。和早就计划好的路径一起，将会有农民、小工业家以及一般公众从铁路交通中获益，这一点被它的推动者们用热烈的言语

① 五大体系获得了 75%的赠地。其中有联合太平洋（包括丹佛太平洋和堪萨斯太平洋）；艾奇逊，托皮卡，圣达菲；北太平洋；得克萨斯和太平洋；中太平洋（包括南太平洋铁路）。

赞美过。地方投资家们反应很热情，有时甚至是冲动，他们花费的资金部分是由他们所处社会的经济增长的实现以及他们依赖于新的交通工具的个人财富的增加所推动的。然而，除了在企业中和东北的城市中，当地的渠道不能提供充足的资本，因此推动者们不得不利用东部城市和欧洲的财富。

因此，作为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大公司，铁路公司通过向中产阶层的投资者们销售证券，在发展募款技术上做了表率。甚至在1860年之前，铁路公司通过各种类型的资产引入了广泛的债券担保。[①] 在美国内战之后，这些有价证券激增是因为铁路吸引了人们，而这些人在战争期间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已经开始投资了。尽管保守的投资者们回避通常的铁路股票，这些股票的增值极大增加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发行以及交易的股票数量。

现代投资银行机构看起来就像是介于南部及西部的铁路资本寻求者与东部及欧洲的投资者之间的中间人，投资者们却不容易估计提供给他们的股票的价值。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投资银行家在美国金融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利用在富裕地区形成的资本，将它们配置在那些正寻求资本的人之间。J·皮尔庞特·摩根（J. Pierpont Morgan），一个位于华尔街的小公司——达布尼和摩根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在1859年与凤凰城的德雷克塞尔（Drexel）联合，组成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Drexel，Morgan and Company）。和温斯洛·拉尼尔（Winslow Lanier）公司以及奥古斯特·贝尔蒙特公司（August Belmont and Company）一起，通过销售铁路股票，摩根机构变得富有且强大，尤其是他们还在国外市场销售铁路股票。欧洲的投资人最终拥有几条铁路的大多数股票；在其他持有者中，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股票持有者们构成了重要的少数团体。在1876年，欧洲的持有者们总计拥有86%的伊利诺伊中央铁路的普通股票，并且在某个时候，芝加哥和西北人的两种股票的控股权落在了荷兰人手中。到1914年，欧洲人（其中大多数是英国人）拥有了所有著名铁路股票的1/5。

不择手段的金融活动

铁路推动者们经常从事有问题的活动，甚至是欺骗性的活动。常见的是，这些规划涉及建设铁路以及如铁路推动者般行事的建筑公司。

铁路与建筑公司之间的合约，规定在一个具体的每英里数量的地基上建设一定英里数量的道路。然后铁路公司就会面临用现金（由向公共出售债券所得）支付成本的问题以及对建筑公司发行股票。另外，政府补贴（土地赠与，州和地方债券等）也被传递给建筑公司。在一个复杂但被广泛使用的制度下，公共股票转变成对它的销售允许低于票面价值，而这在一些州是被法律禁止的。铁路公司最初是按面值发行股票的，当到了乙方手中时，也就是建筑公司，它们可以折价出

① 铁路金融创新的其他细节，参见 Alfred D. Chandler Jr.，*The Railroads—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1965），43－94。

售股票，而这并不违反法律。合约价格被设定得很高，使得建筑公司在出售股票的时候向投资的公众提供一个合约并且仍然可以获得利润。[①] 这种融资方法虽然缓慢复杂，但当考虑到铁路公司在发行股票方面所受到的约束时，这一方法仍然能提供通过其他途径也许不能获得的资金。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是这一制度非常容易被滥用。建筑公司的所有者通常是“内部人”（insiders）——这就是说，他们是铁路公司的官员和领导。建筑公司所收取的价格越高，对铁路股东们的分红就越少（银行破产的风险也就越大），但是内部人在建筑公司内的投资所获得的利润将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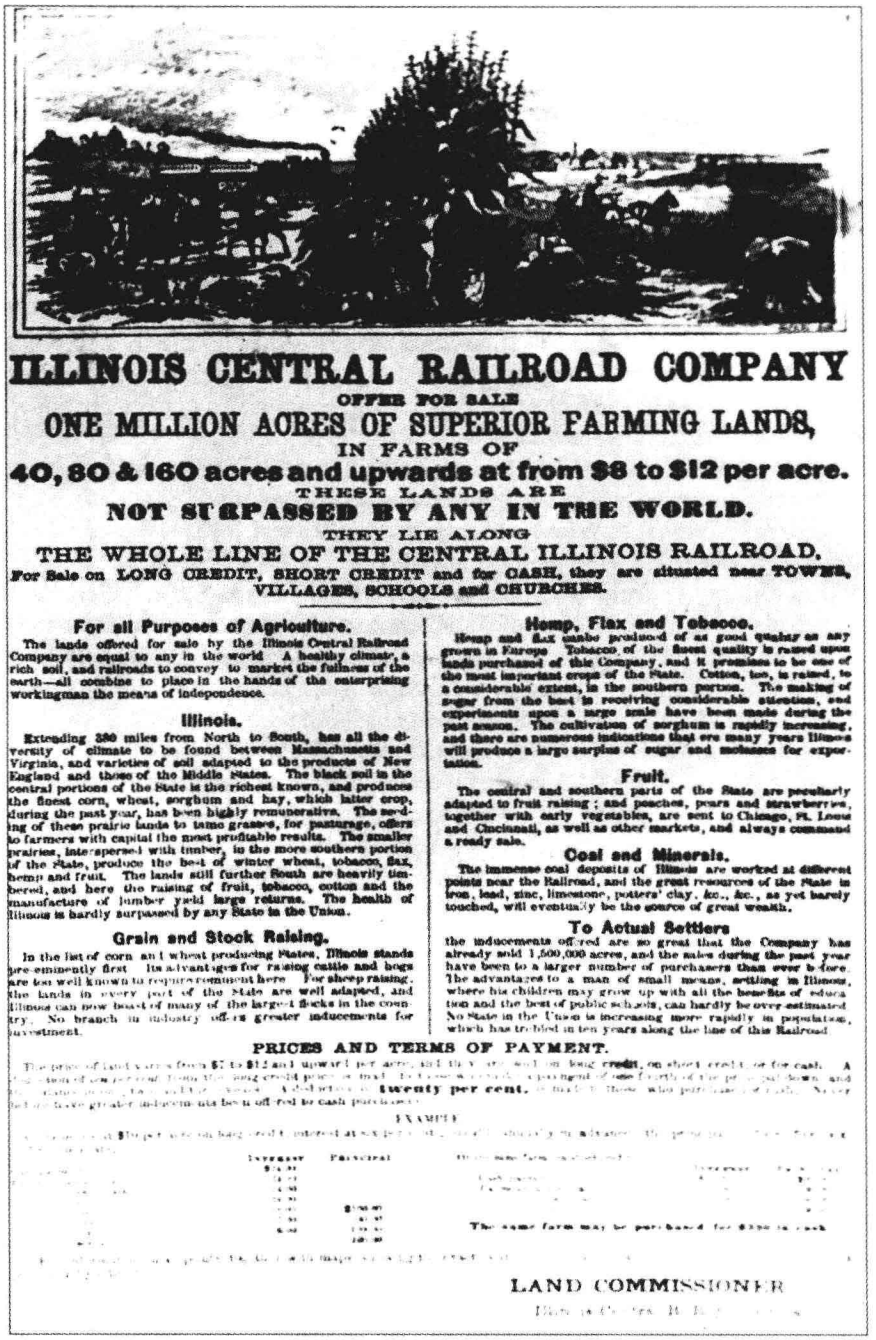
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铁路建筑都是通过内部建筑公司进行融资的，但是这一方法很常见——尤其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并且所有横贯大陆的铁路都是如此运作的。就股票的发行过程而言，加上补贴的价值，再将实际建设一条铁路的成本变成两倍，这一过程并非不常见。公司内部最臭名昭著的是美国动产信贷公司（Credit Mobilier of America），它是根据宾夕法尼亚法律获得特许权的。它建立了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在格兰特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公司的运营引发了一个全国性的丑闻。一定数量的国会成员（以优惠价格）购买或是被给予了股份。它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利益冲突。在对土地赠与和现金补贴铁路进行投票时，他们使得他们自己变富了。两个国会议员受到指责，并且其他人（包括即将离职的副总统舒伊勒·科勒法克斯）的职业生涯也被玷污了。代理人詹姆斯·A·加菲尔德也牵涉其中，但是他否认了所有的错误并且后来还当选为总统。美国动产信贷公司获得了巨额利润。1873年的一份国会报告指出这家公司以1 000万美元的投资实现了2 300万美元的现金利润——并且这些现金再融资后在股票上有高于5 000万美元的利润。通过使建筑成本膨胀，内部建筑公司使得铁路承担了巨大的债务负担，这反过来又缠住了它们，尤其是在萧条的19世纪90年代。

铁路市场中的价格设定及监管

在1870年之前，每一条铁路在它运行的区域内通常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垄断势力。然而，当铁路网络形成后，在19世纪70年代增加了4万多英里的铁路以及在19世纪80年代增加了7万英里，东部的干线甚至是西部的横贯大陆铁路开始忍受竞争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大部分公司在当地交通中通常不会遇到一点竞争，因此它在为相对较短的运输设定价格上具有相当大的弹性，但是就主要城市之间的长途运输而言，它们通常得面对两个或更多的竞争对手。结果就是，在短途运输和长途运输之间每英里收取的价格方面存在变化。逐渐地，价格歧视的实行引发了强烈的不满。

---

① 股票和债券投资者很快实现了投入1 000美元现金而获得2 500美元甚至更多的收益（转换为2000年价格，需乘以20.6）的目标。1860年后的50多年来，人们几乎不敢相信个人会在不利用债券降低风险的情况下，就去购买一个新公司的股票。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MPANY

OFFER FOR SALE

ONE MILLION ACRES OF SUPERIOR FARMING LANDS,

IN FARMS OF

40, 80 & 160 acres and upwards at from $8 to $12 per acre.

THESE LANDS ARE

NOT SURPASSED BY ANY IN THE WORLD.

THEY LIE ALONG

THE WHOLE LINE OF THE CENTRAL ILLINOIS RAILROAD,

For Sale on LONG CREDIT, SHORT CREDIT and for CASH, they are situated near TOWNS, VILLAGES, SCHOOLS and CHURCHES.

For all Purposes of Agriculture.

The lands offered for sale by the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Company are equal to any in the world. A healthy climate, a rich soil, and railroads to convey to market the fullness of the earth—all combine to place in the hands of the enterprising workingman the means of independence.

Illinois.

Extending 380 miles from North to South, has all the diversity of climate to be found between Massachusetts and Virginia, and varieties of soil adapted to the products of New England and those of the Middle States. The black soil in the central portions of the State is the richest known, and produces the finest corn, wheat, sorghum and hay, which latter crop, during the past year, has been highly remunerative. The seeding of these prairie lands to tame grasses, for pasturage, offers to farmers with capital the most profitable results. The smaller prairies, interspersed with timber, in the more southern portion of the State, produce the best of winter wheat, tobacco, flax, hemp and fruit. The lands still further South are heavily timbered, and here the raising of fruit, tobacco, cotton and the manufacture of lumber yield large returns. The health of Illinois is hardly surpassed by any State in the Union.

Grain and Stock Raising.

In the list of corn and wheat producing States, Illinois stands pre-eminently first. Its advantages for raising cattle and hogs are too well known to require comment here. For sheep raising, the lands in every part of the State are well adapted, and Illinois can now boast of many of the largest flocks in the country. No branch of industry offers greater inducements for investment.

Hemp, Flax and Tobacco.

Hemp and flax canbe produced of as good quality as any grown in Europe. Tobacco of the finest quality is raised upon lands purchased of this Company, and it promises to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rops of the State. Cotton, too, is raised,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 the southern portion. The making of sugar from the beet is receiving considerable attention, and experiments upon a large scale have been made during the past season. The cultivation of sorghum is rapidly increasing, and there are numerous indications that ere many years Illinois will produce a large surplus of sugar and molasses for exportation.

Fruit.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of the State are peculiarly adapted to fruit raising; and peaches, pears and strawberries, together with early vegetables, are sent to Chicago, St. Louis and Cincinnati, as well as other markets, and always command a ready sale.

Coal and Minerals.

The immense coal deposits of Illinois are worked at different points near the Railroad, and the great resources of the State in iron, lead, zinc, limestone, potters' clay, &c., &c., as yet barely touched, will eventually be the source of great wealth.

To Actual Settlers

the inducements offered are so great that the Company has already sold 1,500,000 acres, and the sales during the past year have been to a larger number of purchasers than ever before. The advantages to a man of small means, settling in Illinois, where his children may grow up with all the benefits of education and the best of public schools, can hardly be over estimated. No State in the Union is increasing more rapidly in population, which has trebled in ten years along the line of this Railroad.

PRICES AND TERMS OF PAYMENT.

The prices of land vary from $7 to $12 and upward per acre, and they are sold on long credit, on short credit or for cash. A discount of one per cent. from the long credit prices will be allowed for cash. One-tenth of the purchase money down and the balance in six annual payments with interest at six per cent. payable annually in advance. Deeds given when full payment is made. Those who purchase for cash, or within three years after date of purchase, will be entitled to a deed at the end of three years, and will be charged interest only at the rate of six per cent. per annum. A rebate of twenty per cent. will be allowed to cash purchasers.

EXAMPLE.

Interest	Principal	
$ 4 80		
4 32		
3 84		
3 36		
2 88	$100 00	
2 40	80 00	
1 92	60 00	The same farm may be purchased for $320 in cash.
1 44	40 00	

LAND COMMISSIONER

Illinois Central R. R. Co.

COURTESY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ARCHIVES, THE NEWBERRY LIBRARY, CHICAGO

作为补贴被赠与给铁路公司然后被转售给定居者的公共土地是资本资金的连续来源。如图所示的广告经常出现在城市报纸中，引诱着成千上万的美国人及移民西进。注意到对一个州的各个地区皆有详细描述，以便农民们能购买到适合种植自己擅长的作物的土地。

铁路管理者用很高的固定成本来管理公司，因此他们总是尽力以各种方法设

定价格，因为这将确保工厂和设备得到最大可能的使用。一旦有可能分离市场，管理者们就利用价格歧视的方法设定价格，回想经济推理命题 2。例如，对诸如煤炭和矿石这些大宗货运所设定的每吨价格远低于对制造业商品所设定的价格。如果交通在一个方向上是占主导地位的，那么在回程线路上的装载价格会设定在很低的水平，因为获得的任意收益都比空车返回不装载任何货物高。对于承运商来说，这一常见的问题被称为“回运问题”（backhaul problem）。然而对于拖运车辆满载而不是对于更小的零碎载运收取更低的运费是公平的，因为移动一节满载的车厢比只装一半的车厢多花费的成本很少。

另一种价格歧视的出现是由于同一铁路相对一定的顾客处于垄断地位（例如，中西部的农业机械制造商）以及相对于其他顾客处于竞争地位（一个位于较好区域的产煤商有可能转向水运）。不满意这种歧视价格或者是坦率争论的运输业者，自然会对这种特殊对待感到愤慨。铁路公司通常在城市和城镇中间也实行歧视，这一行为特别令农民和该地点的零售商不满，因为他们发现其他地区的人获得同样的服务，支付的价格却更低。

对于这些活动有一个可能的经济证明：通过在消费者当中实行价格歧视，铁路能够增加它的总产出并且可以降低它的成本。低成本的服务提供给一些使用者，换句话说，必须依赖于通过向其他人收取更高的价格而形成的收益。实际上，如果被迫对所有人收取同一种价格，铁路也许就不能够弥补它的成本和在经济中存活。但是支付了较高价格的个人一般不会这么看，因此，监管诸如此类活动的压力开始迅速增加。请参考经济推理命题 4。

因为倾向于固定价格这一趋势，对铁路的反对得以加强。到 1873 年，铁路行业因其巨大的装载容量过剩而苦恼。通过削减全程运输的价格，一条线路能争取到生意，但却必须以牺牲另一家公司为代价，然后它们就会发现货物运输量超过了自己的装载容量。在 19 世纪 70 年代衰退期间爆发的价格战引发了为停止“灾难般的竞争”的努力（正如铁路所有人以及管理者所见的）。铁路公司的反应是在全程运输价格上相互捆绑。它们在竞争线路中安排好各自生意的份额，在地区内的竞争和联合铁路之间结成联盟。虽然通常并非如此，在高昂的固定成本和超额的装载容量之下，这些协议被证明是脆弱的。为了隐匿运费削减，货主也许会支付已经公布了的价格，并且会收到一个来自铁路公司的秘密回扣。但有关折扣的这些信息迟早将会被泄露，结果又将重回到价格战的老路。

为了给维持价格提供一个更强有力的基础，艾伯特·芬克利用正在形成的地区化联盟作为领头人，使得其要么在运输方面要么在利润方面联合。第一个是南方铁路和蒸汽机航船的联合，它在 1875 年形成，芬克是它的总干事。然后是在 1879 年，干线铁路组成了东部干线联合会。但是当弱小的铁路或公司由有野心的经理人或所有者掌控时，比如杰伊·古尔德就打破了联合并开始削减价格，联盟最终被解散了。[①] 货主和一般公众自然也对联合不满，正如他们对价格歧视不

① Chandler, *The Railroads—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161. Also see Chandler's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especially chapter 4.

满一样。结果就是对政府监管铁路的广泛支持。

州监管

第一波的铁路监管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大体上是因为对个人和地方歧视的证据日益增加（经济推理命题2和3）。在稍后的年代里，当农场收入下降时，农民也产生了很大不满。正如在第15章里所强调的，中西部的农民指责他们在铁路方面所遭遇的巨大痛苦。很多农民已经将他们的储蓄投资于铁路项目上，却是基于对肯定将由改善的交通带来的繁荣的不切实际的承诺。当反对能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时，农民们进一步要求用立法来监管价格。在这一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畜牧业出资人全国格兰奇会员，这是一个成立于1867年的农业组织。因此，要求州通过监管铁路、谷物升降机以及公共货仓的法律措施的运动逐渐演变成所谓的“格兰奇运动”（Granger movement），这一立法被称为格兰奇法律（Granger laws），由最高法院进行的法律审查被称为格兰奇案件。

在1871—1874年间，伊利诺伊、艾奥瓦、威斯康星以及明尼苏达通过了监管的法律。伊利诺伊的法律和明尼苏达的法律具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最大化价格的明细表的安排是通过委员会而不是通过成文法。西部农民不能忍受的一种常见活动，就是对短途的货物运输收取的价格超过对相同线路同一个方向更远距离的运输所收取的价格。格兰奇法律中包含的按比例分摊条款（pro rata clause），禁止铁路对短程托运人的收费高于他们合理的分担成本，决定矫正这一靠不住的不公平，并且它是现在州际商业法中长途和短途运输条款的先驱者。涉及个人及地方的歧视一般是违法的，尽管产品歧视并不如此。最后，委员会被赋予权力去调查存在的不满以及实行针对违法者的法律程序。

几乎在格兰奇法律出现在法令全书中的同时，已经有人尝试以其与《宪法第五修正案》相矛盾而宣布格兰奇法律违反了宪法。该修正案认为在没有同等补偿的前提下，禁止对私人财产的剥夺。例如，他们认为在对谷物升降机商人收取费用的限制方面，该限制将约束他们的收益从而剥夺了他们财富的价值。六个诉讼案件也考验了这一立法。主要的一个是芒恩诉伊利诺伊案，一个涉及谷物升降机的案件。伊利诺伊州法院发现芒恩和他的合伙人斯科特已经违背了州仓库法，因为他们未获得在芝加哥城经营谷物升降机的许可而且他们所收取的费用超过了州法律所设定的费用，这一案例在1877年又出现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从一个纯粹的经济观点来看，谷物升降机运营商所做的阐述有一定的理由。不管是政府拿出一块地去建设铁路（需要补偿的典型案例）还是政府强加一个最高价格，在这两种情形下，财富的损失是等同的。

但是最高法院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案例（以及在此之前的其他五个类似的铁路案例）：它维护州监管这些商业的权力。首席法官莫里森·雷米克·维特（Morrison Remick Waite）陈述了多数人的观点：当商业活动“涉及了公众

利益”时，由公共机构对其进行的监管是合乎宪法的。[①] 芒恩案确立了州对铁路公司以及特定州内的其他企业监管的合宪性——但不是在州与州之间。

在1886年，对瓦巴斯、圣路易斯以及太平洋铁路公司诉伊利诺伊（Wabash, St. Louis and Pacific Railway Company v. Illinois）案的判决对区别州监管以及联邦监管的范围做出了关键的描述。州政府发现瓦巴斯对从伊利诺伊的吉尔曼（Gilman）到纽约城的短途运输收取了比从皮奥里亚（Peoria）到纽约城的长途运输更高的价格，州下命令必须调整价格。最高法院坚持认为伊利诺伊不能监管州与州之间的运输价格，因为宪法明确了联邦政府监管州际商业的权力。这一看法是应用在格兰奇案例中的法庭观点的拓展，在那一案例中铁路公司的一种论点是格兰奇法律干预了州际商业，并且由此干预了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因为缺乏联邦立法，瓦巴斯判决给不受控制的装载行为遗留下巨大的空间；监管由此不得不被上升到国家层面上来，或者根本不需要。

联邦监管[②]

早在1887年，国会通过且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签署了《商业管理法案》（Act to Regulate Commerce）。它的主要目的是想把从事州际商业的所有铁路都置于联邦政府的监管之下。州际商业委员会被设立，由参议院建议和同意且由总统任命的5个成员组成，并且它的职责也被详细地列出。第一，委员会被要求检查铁路公司的商业活动；为达到这一目的，它可以传唤证人并且要求他们提供账册、合约及其他文件。第二，委员会被要求倾听由可能违反这一法律而引发的不满，并且如果违法活动被揭露的话，它有权发布“停止令”。委员会的第三个职责是它要求铁路公司基于统一的会计体系提交年度报告。第四，委员会被要求向国会提交它自己的年度运营报告。

《商业管理法案》看起来禁止了所有可能不道德的业务。第一部分阐明了铁路价格必须是“公正且合理的”。第二部分禁止了针对个人的歧视；不能通过“特价、折扣、反馈及其他方式”实施更低的价格。第三部分提出对于任何运输业者、任何地方或是任一特殊形式的交通运输，不会有由铁路给予的不适当的任一类型的优惠。第四部分以较不严格的形式，把格兰奇法律的按比例分摊条款制定成法律。禁止在大多数相似的环境和条件下，对于客运或者是相似类型的财产的运输，在同一方向、同一线路上，对短距离相对长距离而言收费更高，较短距离的运输将被包括在较长距离的运输中。联营也是不允许的。

州际商业委员会是第一家永久的独立联邦管理机构。它的形成代表了政府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直接干预经济的开端。然而，在州际商业委员会起始的15年

---

① 大法官斯蒂芬·约翰逊·菲尔德对此持相反意见，反对公众的模糊语言；他认为公共机构对很多企业有兴趣，如果就这样延续公众的推理，就会使规定松散并官僚化。结果证明，菲尔德大法官是有先见之明的。

② 该规定的调研情况参见 Thomas K. McCraw, “Regulation in America: A Review Articl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9 (1975): 159 - 183。

内，充斥着铁路公司对法院的质疑。为了更明确其所代表的国会赋予的权力，包括州际商业委员会和铁路公司都急切地寻求新的立法，特别是价格歧视的相关条款。

《埃尔金斯法案》

1903 年《埃尔金斯法案》单独用于处置针对个人的歧视做法。这一法律使得任何背离已公布价格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并且它授权给法院命令铁路公司从继续背离公布价格中和制造不合法的价格歧视中退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埃尔金斯法案》代表了绝大多数铁路公司的愿望，因为这使得它们可以避免那些强有力的承运商对折扣的要求，以及可以使得政府给予它们补贴，以强化由干线联合会设定的卡特尔价格。这一法案阐明了铁路公司应该对其任何不合法的违背歧视条款的行为负责。在此之前，仅有官员和公司雇员对他们的歧视行为负责；从今以后，公司自身同样必须承担责任。第二个条款使得回扣的接收者因为违背法律而获罪，即使该回扣是由承运人自愿提供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但是这部法案最重要的条款是处置背离公布价格的行为。在此之前，法院通过要求歧视或是对类似商品的其他承运商的伤害必须是能被证明的，已经在执行公布价格方面推翻了委员会。

《赫本法案》

为了补上剩余的漏洞，尤其是在其他的歧视性定价行为上，国会通过了 1906 年《赫本法案》。这一法律拓展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对私人汽车公司的司法权，私人汽车公司经营联合快运、油箱以及卧车等商业活动。诸如储藏、冷却以及提供通风设备这样一些服务，如果是由铁路联合其他交通设施来提供的，那么它们也归委员会管制。委员会对铁路交通的这些侧面的司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铁路的管理者可以利用这样的服务在承运商中实行价格歧视。例如，铁路一般会对储藏和冷却收取费用；如果任何一些承运商没有被收费，那么就会导致歧视。也许比这一权力的扩张更重要的是执行州际商业委员会命令的程序方面的变化。在 1906 年之前，州际商业委员会不得不在法院审判之前证明这一案例已经宣判了。《赫本法案》把证实的责任放在承运人肩上。不遵守委员会的命令将会导致 5 000 美元的惩罚，而违反的每一天构成一个单独的罪行。司法审查的权力得到了承认，但是铁路公司——而不是委员会——不得不呼吁，并且其前提是支持——而不是反对——委员会。

俘获监管者

一开始，州际商业委员会显然努力保护消费者免遭歧视，同样是一开始铁路

企业就明显对州际商业委员会不满。在1892年，芝加哥、柏林顿和昆西铁路的主席查尔斯·E·珀金斯致信给他的律师理查德·奥尔尼（他后来成为美国的首席检察官），珀金斯在信中认为已存在五年的委员会应被取消。奥尔尼高明的回复值得引用：

> 我的感想是，从一个铁路公司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它并不是明智的……这一尝试好像也不会取得成功；如果它不成功，则是因为它是以委员会的无效率和无用为基础，其结果很有可能是它将获得它现在所缺乏的权力。正如它的作用一直被法院约束着，委员会已经在或者能够给铁路带来更多用处。它满足了公众希望由政府来监管铁路的要求，同时这一监管几乎完全正常了。而且，当委员会存在的时间越来越长时，它就会越加倾向于从商业和铁路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它因此就成了一种保护，反对敌视铁路利益方面的仓促和粗糙的立法……这部分的智慧不是去破坏委员会，而是去利用它。①

在多大程度上，奥尔尼的分析（经济推理命题5）能被证明是一个精准的预测呢？铁路是否俘获了州际商业委员会并且利用它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在1965年，著名的历史学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认为铁路经营者们确实利用州际商业委员会作为其稳定利润率和确保卡特尔管理的其他优势的一种方法。②

尽管铁路经营者们公开地支持《埃尔金斯法案》以确保通过监管在竞争的承运人中形成类似的定价行为，我们发现值得信任的阿尔布罗·马丁的学术研究表明，州际商业委员会的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是为了使用者的利益——承运商和乘客。③ 在1896年，当长期价格下降开始逆转时，州际商业委员会不允许价格充分地上涨以使其与一般价格水平的上涨相一致。铁路的反应是减缓对其资本存量和设备的修补和重置。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铁路运行成本的上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滋生腐败并且在财务上遭遇困境。如果存在经营活动俘获监管过程的话，那么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的事例中很难发现这一点。实际上在1917年，联邦政府出于作战实力的考虑，通过对铁路的国有化赢得了最关键的俘获。战后，铁路重新回到私人所有者手中。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所看到的，“俘获命题”适用于其他情形，但是在早期的州际商业委员会行动的事例中，经营者并非一开始就俘获并控制监管过程。铁路没有成功俘获州际商业委员会的一个可能的原因也许是很多大型承运商几乎具有相同的激励去监督州际商业委员会并且承运商在华盛顿也具有与铁路一样多的影响力。当有利于被监管产业决策的成本被广泛地分散时，俘获命题更有可能适用。

---

① Robert C. Fellmeth, *The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 (New York: Grossman, 1970), xiv-xv.

② Gabriel Kolko,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对科尔科理论的首个评论，参见 Robert Harberson,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Conspiracy or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230-242。

③ Albro Martin, *Enterprise Denied: Origin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ailroads, 1897—19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铁路与经济增长

我们在本章一开始就表明了约瑟夫·熊彼特关于铁路的建设早于需求的观点，他同时认为铁路领导了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转型。[①] 熊彼特论证说增长是一个应用包括发明和创新的重大技术进步的动态过程，并且铁路是这些不断形成的力量日益增加的缩影。沃尔特·罗斯托稍后认为在国家向现代经济增长的起飞阶段，铁路是一个领先部门，从而对该观点进行了补充。[②]

在20世纪60年代的某一年内，艾伯特·菲什洛和罗伯特·福格尔各自完成的著作引发了雪崩般的争论。[③] 他们的目的是使用实际数字去固定铁路对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尽管他们的代表性研究在风格和方法上存在不同，但他们的目的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测算在1859年（菲什洛）和在1890年（福格尔）铁路的社会节省（social saving，额外的可以被归因于铁路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数量）水平。参见关于铁路交通的社会节约的经济透视16.1。尤其是福格尔的研究引发了尖锐的批评，也许是因为他那充满感情的修辞手法以及他对经济现实的探索意愿。[④]

福格尔从评论“不可缺少公理”（axiom of indispensability）的演变开始了他的研究，现在“不可或缺公理”这一术语在描述铁路的作用时已经被广泛接受了。主要是19世纪后期摆脱政府控制的斗争使得“铁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或缺性被提升到公理化事实的位置”[⑤]。在菲什洛的工作和福格尔的研究成果被发表之前，在美国经济史课程中被最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把美国铁路描绘成具有“关乎经济的生或死的力量”或者是“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⑥]。因为菲什洛和福格尔以及其他学者们的努力，这些观点已经过时了。

菲什洛测算了在1859年用铁路的最优替代物去运载所有货物和乘客的成本。换句话说，要以如下方式估计1859年的运载货物或乘客的成本：我们要使得铁路好像忽然消失了，从而运载货物和乘客要依赖水运或马车。通过这些古老的交通方式来运载铁路乘客和货物所产生的更高的成本，经计算后大约是1859年国民生产总值的4%。

---

① Joseph Schumpete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9).

② W. W. 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③ Fishlow,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and Robert W.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④ See Donald McCloskey, *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chapter 6.

⑤ Fogel,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7.

⑥ See ibid, 9, for various exampl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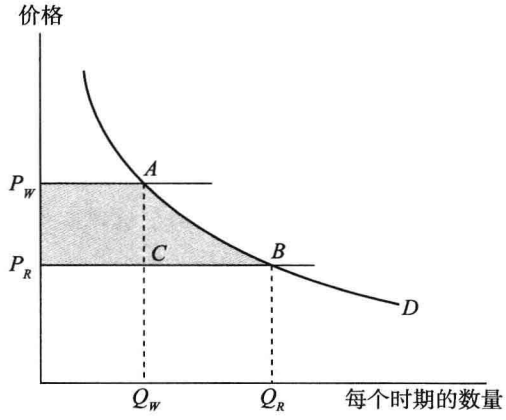
经济透视 16.1

来自铁路交通的社会节省

下面的图形说明了社会节省的测算。交通的数量（也就是说，以标准吨—英里来测算）在横轴上测算；收取的价格在纵轴上进行测算。D 是需求曲线。P_W 是通过水路交通的价格，P_R 是通过铁路交通的价格。Q_R 是实际供给的占主导地位的铁路交通的数量，Q_W 是在铁路不存在的反现实世界中经由水路交通的数量。为了简化，假设在相应的范围内供给水路交通和供给铁路交通的成本是固定的。

从铁路中获得的社会节省由阴影部分的面积 P_WABP_R 给出。为什么呢？需求曲线下方的区域来自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并且它表示了用于生产这些最终产品的交通的价值。因为水路交通会产生较高的成本，所以对水路交通的一些使用要么是被放弃（面积 ABC），要么是通过使用更多的资源来生产并由此减少了其他部门中的产出（面积 P_WACP_R）。

当然，诀窍是去估计实际曲线的位置和弹性。只有接近 B 的点有可能直接观察到；其他的必须通过一些方法进行估计。例如，关于水路交通供给曲线形状的论战已被触发。但是仅仅以这一方法处理这个问题就与“不可缺少公理”有互相抵触的地方。全部铁路收益在 1890 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少于 10%，因此可以针对需求弹性以及水路交通成本的增加作一些极端的假设，从而使得社会节省能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显著比例。



福格尔挑选 1890 年来进行对社会节省的估计，挑选一个年份，在该年份铁路的成本优势超过其他的替代交通，而且经济的联合产出尤其有利于铁路。他想得到一个社会节省水平估计的上界，因此如果估计证明其上界是小的，那么“不可缺少公理”成立这一假设很值得怀疑。

福格尔集中在农产品的运输上。很奇怪的是，当仅考虑直接的交通成本时，人们发现水运的交通成本通常小于铁路运输的交通成本。例如，从芝加哥运输小麦到纽约，平均的全程铁路运输的价格是每英里每吨 0.52 美元，而平均的全程水路运输的价格是每英里每吨 0.14 美元！显而易见的是，其他成本使得水路运输的总体成本变高。例如，从芝加哥通过水路运载谷物到纽约不得不在布法罗从大湖轮换成运河驳船；必须加上这一成本从而得到水路运输的总体成本。

然而，水路运输最重要的额外成本是它在所有季节里都更慢，并且在冬天并不适用。如何测算缓慢的成本呢？答案就是，因为要通过水路来运输，所以东部的商人们将被迫保持更大存量的谷物存货。全气候快速交通的优势可以通过对东部存货减少的估计来进行测算。

福格尔同时也指出，在计算真实的社会节省时，在不存在铁路的同样的地方之间，假设同样的商品已被装运是错误的。反之，产出在一定的地区已经增多了而在其他地区却减少了。在铁路上的投资将进入改善运河和水路网络以及经济的其他领域。真实的社会节省将实际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与在缺乏铁路的条件下完全调整过的真实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他的研究中最具创造性的部分之一是，福格尔研究了诸如运河网络的扩展以及公路网络的改善这些铁路服务的可能替代品的影响，尤其是它们对于农业土地租金的影响。这有可能是因为美国军工局已经做了大量的计划准备去扩展运河网络，而且公路局也做了类似的研究。福格尔的确发现“可行的农业的分界线”已经被铁路向外推移了。假如铁路体系没有发展，那么有些土地将不会被耕作，但是被耕种的土地在理论上减少，它比一些围绕着铁路的雄辩言辞所认为的更少。即使铁路从未被发明过，大草原也将被耕种。

在福格尔的“反事实检验”的世界里，运河被修建并且注入了水、公路被改善了以及卡车和汽车的发展提速了，这些被证明是随后的争论和分析中尤其令人兴奋的部分。传统的历史学家不会喜欢历史学家这种耐心地探索“想象的”世界的观念。但是更年青一代的在经济学上受过培训的经济史学家们对于从相关替代的角度来评价历史的发展充满了热情。

总的来说，福格尔发现铁路已经在产出和农产品的交通方面大约节省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6%。他没有发动全部的努力去测算针对其他类型的货运或是乘客的社会节省。在他对全部货运的初步估计中不允许对不存在铁路的世界作充分调整，这很近似于菲什洛的测算：全部货运的社会节省大约是 18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4.7%。随后，其他人计算了 1890 年铁路乘客的社会节省，包含乘客的时间价值的节省。[①] 通过水运或是公共马车运输，这些铁路乘客的全部超额成本总计是 1890 年国民生产总值的 2.6%。

对铁路的直接影响的测算（它也许夸大了这一影响）认为如果在 1892 年之前没有铁路的话，人均资本产出将达不到它在 1890 年的水平。简而言之，铁路影响到了大约两年的增长，或者说，没有建设铁路仅仅将经济增长延后了两年。

---

① J. Hayden Boyd and Gary M. Walton, “The Social Savings from Nineteenth Century Rail Passenger Servic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233 - 255.

菲什洛和福格尔的先驱杰作揭穿了被长期保持的美国铁路不可缺少的神话。虽然很难想象任何其他单独的创新曾产生过类似的大量经济成果，铁路只不过是对美国经济增长做出过贡献的很多发展的其中一种。①

然而，我们从这些充满趣味的学术争论中能迅速学到的，并不是最终作为菲什洛和福格尔的主要贡献的计算有多么重要，尽管它们很重要；更确切地说，重要的是他们聚焦于论点、使得一个可检验的假设具体化以及提出使得分歧变窄的证据的能力。简而言之，他们提高了分析的水平以及同行们对一般经济增长方面尤其是美国经济史方面重要问题的理解水平。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oyd, J. Hayden, and Gary M. Walton. "The Social Savings from Nineteenth-Century Rail Passenger Servic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233 - 254.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Photographic Museum, historical section. http://cprr.org/.

Chandler, Alfred D. *The Railroads: 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5.

Cochran, Thomas C. *Railroad Leaders, 1845—1890, The Business Mind in Ac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Coelho, P. R. P., R. P. Thomas, and D. Shetter.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1968): 184 - 189.

David, Paul. "Transport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Professor Fogel On and Off the Rail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 2d series (1969): 506 - 525.

Dick, Trevor J. O. "United States Railroad Inventions, Investment since 187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1974): 249 - 270.

Engerman, Stanley. "Some Economic Issues Relating to Railroad Subsidies and the Evaluation of Land Grant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443 - 463.

Fishlow, Albert. *American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nte-bellum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 "The Dynamics of Railroad Extension into the West." In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Internal Transport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① 对菲什洛和福格尔的观点提出质疑的学者列举了很多间接影响，如工业中更大的规模经济和更高的资本形成率，参见 Jeffrey G. Williamso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chapter 9。福格尔的回应，参见 "Notes on the Social Savings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1 - 55。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ma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43 - 642.

Fleisig, Heywood. "The Central Pacific Railroad and the Railroad Land Grant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552 - 566.

Fogel, Robert W.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A Case of Premature Enterpri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0.

——. *Railroads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4.

——. "Notes on the Social Saving Controvers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9 (1979): 1 - 54.

Fogel, Robert W., and Stanley Engerma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Gates, Paul W. *The Illinois Central Railroad and Its Colonization Work*.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Greeves, William S. "A Comparison of Railroad Land Grant Policies." *Agricultural History* (1951).

Grodinsky, Julius. *Transcontinental Railway Strateg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2.

Harbeson, Robert.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Conspiracy or Public Intere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230 - 242.

Heath, Milton. "Public Railroad Construc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 in the South before 186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9 (1949).

Hidy, Ralph, and Muriel Hidy. "Anglo-American Merchant Bankers and the Railroads of the Old Northwest, 1848—1860."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4 (1960).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2d 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Hunt, E. H. "Railroad Social Saving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7 (1967): 909 - 910.

Jenks, Leland. "Railroads as an Economic Force in American Development." Reprinted in Thomas Cochran and Thomas Brewer, eds. *Views of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Vol. 2.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Kolko, Gabriel. *Railroads and Regulation, 1877—191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Lebergott, Stanley. "United States Transport Advance and Externalit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6 (1966): 437 - 461.

——. "United States Transport Advance and Externalities: A Reply."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1968): 635.

MacAvoy, Paul.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5.

Martin, Albro. *Enterprise Denied: Origins of the Decline of American Railroads, 1897—191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 *James J. Hill and the Opening of the Northwe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McClelland, Peter D. "Railroads,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New Economic History: A Critiqu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1968): 102 - 123.

McCraw, Thomas K. *Prophet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rcer, Lloyd. "Land Grants to American Railroads: Social Cost or Social Benefit?"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3 (1969): 134 - 151.

——. "Rates of Return for Land Grant Railroads, The Central Pacific Syste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0): 602 - 626.

——. "Taxpayers or Investors: Who Paid for the Land Grant Railroads?"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6 (1972): 279 - 294.

——. "Building Ahead of Demand: Some Evidence for the Land Grant Railroad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492 - 500.

Ripley, W. Z. *Railroads: Rates and Regulations*. New York: Longmans, Green, 1912.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Stover, John. *American Railroa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Ulen, Thomas S. "The Market for Regulation: The I. C. C., from 1887 to 192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1980): 306 - 310.

——. "Railroad Cartels before 1887: The Effectiveness of Private Enforcement of Collusion."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Greenwich, Conn.: JAI, 1986.

Union Pacific Web site, historical section. http://www.uprr.com/aboutup/history/.

Weiss, Thomas. "United States Transport Advance and Externalities: A Com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8 (1968): 631 - 634.

第 17 章　产业的扩张与集中

本章主题

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经济呈现出了很多方面的现代特征。令人印象最深刻的变化就是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以及生产力提高的速度，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速度。虽然这一转变在整个 19 世纪一直在进行，但在 19 世纪 80 年代之前的美国，农业仍然是主要的收入产生器。然而，1890 年的统计表明，制造业产出在其美元价值上大于农业产出，并且到了 1900 年，制造业的年度产出价值比农业产出的两倍还多。

与工业和经济的进步相伴随的是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但是我们在此主要关注的是，随着这个时期主要的技术和其他生产力的提高，工业的扩张规模和商业企业的集中以及垄断的威胁刺激了新一轮的政府干预、法律以及制度变革。简而言之，我们主要着眼于供给、产出、商业组织以及公共政策反应等诸多方面的变化。至于产出分配、城市化以及其他市场的变化等方面，我们将在第 20 章里进行评论。

结构变化与产业构成

像先于它的英国工业革命一样，美国的工业（制造业）部门的繁荣是现代经

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特征。一组鲜明的数字就是，在农业和制造业的年度生产商品的比例分布上，1869 年和 1899 年这两年刚好是一个精确的逆转：在 1869 年，在这一分布上，农业的数字是 53%，制造业的数字是 33%，矿业和建筑业合并的数字是 14%。30 年后，与 1869 年相对应的数字分别是 33%、53% 以及 14%。[①]

正如在第 15 章里所强调的，农业扩张主要出现在这些年内，但是因为在其他方面增加得更快速，它同时也是相对下降的。表 17—1 表明在 1910 年一些部门相对于 1860 年就业水平的劳动力的倍数。例如，在 1910 年，3 750 万的全部劳动力大约相当于 1860 年 1 110 万的 3.4 倍。然而，农业劳动力仅增加了 2 倍，在 1860—1910 年间，从 590 万增加到 1910 年的 1 180 万。与此相比，在这 50 年内，制造业的全部劳动力增加了 5.4 倍，而铁路增长了 23.2 倍。

表 17—2 表明了在一些产品种类上产出所增加的倍数。产出的倍数远大于在可比类别上的劳动力增加的倍数。例如，在 1910 年，全部制造业产出是 1860 年这一项上的 10.8 倍，然而，制造业的劳动力仅增加 5.4 倍。煤炭和水泥的增加倍数表明为了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需要消耗巨大的自然资源；它们同样远大于采矿劳动力增加的倍数。所有这些选择的种类都揭示了产出增加的倍数高于全体劳动力增加的倍数或是部门劳动力增加的倍数（表 17—1）。

表 17—1　1860—1910 年的劳动力扩张：选择 1910 年作为 1860 年的倍数

农业	2.0
棉纺织业	3.0
建筑业	3.7
教育	5.2
全部制造业	5.4
贸易	6.0
采矿	6.7
初级钢铁	7.1
铁路	23.2
全部劳动力	**3.4**

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或地区，美国在制造业产出上的收益同样是非凡的。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成为世界工业的领导力量，并且在 1910 年，

① Robert E. Gallman, "Commodity Output, 1839—1899," in *Trend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26.

它的工厂源源不断地生产出的商品是离它最近的竞争对手——德国——生产的商品价值的将近两倍。在1913年，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产出的1/3以上。

表17—3列出了在1860年排名前十位的制造行业（按工业增加值）以及50年以后的这一数据。有明显证据表明，随着工业扩张的展开，制造业的“组成”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场力量的推动以及高程度的资源可流动性为这一变化提供了可能。而且，美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同样在国内和国外扩张，我们将在第20章里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然而，大多数美国制造商并不积极地寻求出口到外国去，一直到19世纪末期这一情况才得以改变，因为国家自身提供了一个扩张自由贸易的场所。对于1860年每美元的购买力而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上升了近6倍（按实际值）。

表17—2　1860—1910年的产出扩张：选择1910年作为1860年的倍数

食品和同类产品	3.7
纺织业和纺织业制品	6.2
全部制造业产出	10.8
钢铁和钢铁制品	25.2
烟煤	46.1
水泥	70.7
铁路客运里程数[a]	17.1
铁路货运里程数[a]	98.1

a. 铁路倍数选择1910年作为1859年的倍数。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Series M, 178, Part 1; Edwin Frickey,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38－43, 54; and Albert Fishlow, “Productivity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the Railroad Sector, 1840—1910,” in *Output, Employment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1 800*,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3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585.

表17—3表明了这一变化之下巨大的社会转型。四种新兴产业——印刷和出版、麦芽酒、烟草以及铁路车厢——均在1910年的前十大产业排名中，然而面粉和谷物粗粉、羊毛制品、四轮马车和轻便马车以及皮革制品已经滑落到了更低的位置。对面粉制品和羊毛制品的低收入需求弹性，加上新技术（铁路机车取代了四轮马车）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生产力进步，这些可以解释大多数转型（经济推理命题1和2）。而且，品味也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棉料和尼龙、雪茄和卷烟以及商店出售的酒精饮料的增加或许取代了以前也许是在自家生产的其他物品。

表 17—3　　1860 年和 1910 年按增值计算的十大行业（百万美元）

1860 年价值增值		1910 年价值增值	
棉制品	55	机械	690
木材	54	木材	650
靴和鞋	49	印刷和出版	540
面粉和谷物粗粉	40	钢铁	330
男装	37	麦芽酒	280
铁	36	男装	270
机械	33	棉制品	260
羊毛制品	25	卷烟制造	240
四轮马车和轻便马车	24	铁路车厢	210
皮革制品	23	靴和鞋	180
所有制造业	815	所有制造业	8 529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0*, vol. 3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61), 733 - 742; and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ensu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0*, Vol. 8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3), 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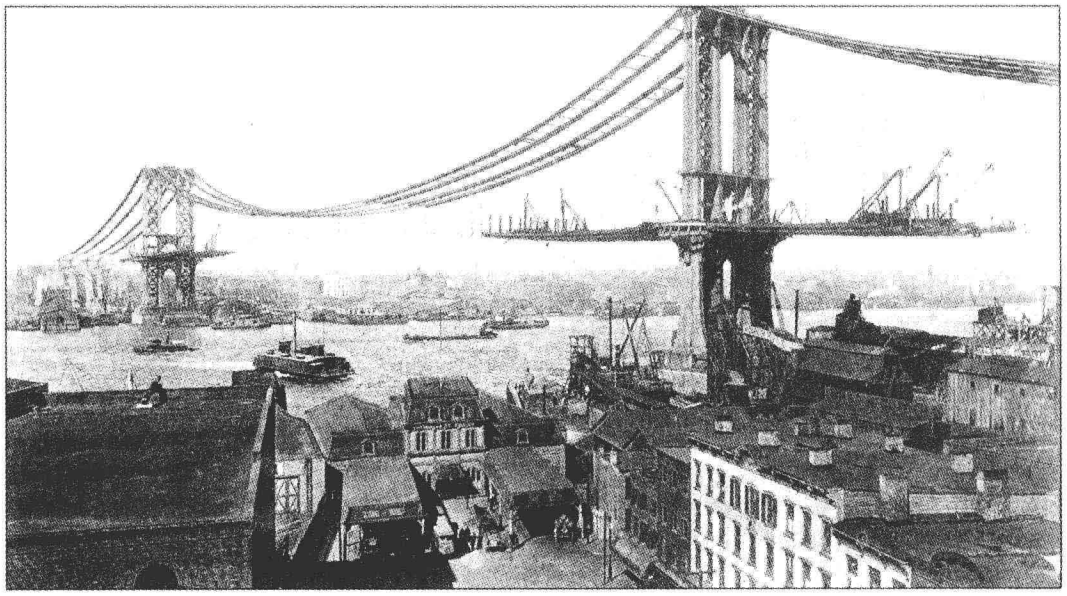
新技术

技术变化、人力资本投资和新能源可以增加市场的宽度，带来新的有组织的商业结构、规模经济以及使资源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从农业流向工业）这一结构变化，这些结合在一起导致了预期的长期趋势。

技术变化尤其有助于从一个产业到另一个产业的彻底变革。没有单一的产业能明显地代表经济整体，但是每一个产业的进步都是建立在发明和创新之上的，而这两者是技术变化的双重部分。发明意味着某些新东西的发现，诸如蒸汽机或电力。创新则表示新的使用方法被找到以及采取新的观念去对待现存的产品和服务。

技术变化大量涌现，且无处不在，尤其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19 世纪 80 年代。下列新技术的例子在这些年代内一点也不少见：处理燕麦和面粉的滚筒辗粉机；肉类加工业的冷藏车厢；罐装肉类、蔬菜和汤所用的封罐；石油工业中的钢底蒸馏锅、长距离输油管道以及钢制油槽车；制钢中的酸性转炉和平炉炼钢法的改进（参见表 17—4）；铝生产中的电气冶金的改进；新类型的机械以及各种高

速的器具；打字机、有轨电车等等。[①] 经济透视 17.1 和表 17—4 更详细地讨论了两种新的炼钢法。这些新技术允许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以及通过规模经济形成更低的单位成本。增强这些工厂规模和生产率提高的是横贯大陆铁路这一基础设施以及一个全国化的电报网络。结果是到 1880 年，一个在范围上真正横贯大陆的经销体系形成了。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耗资 1 510 万美元（约合今天的 20 亿美元）于 1883 年建成的布鲁克林大桥，是美国的工业和技术地位领先的一个象征。

表 17—5 显示了这些新技术、大规模生产的经济体以及其他种类的进步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它列出了包括 1860 年和 1910 年前十个最大行业中的六个行业的每工人价值增值的增长。除木材行业之外，棉花工业是每工人产出增长最低的行业，到了 1860 年，棉花工业已经完全成熟了，并且在任一其他领域都没有像棉花工业那样成功应用的电力驱动的机械。因此，美国内战之后的大多数时期仅是棉纺织上的创新和更大的自动化的一个阶段。表 17—5 中列出的人均产出提高最快的行业是男装制造业，在美国内战期间，因为得益于部队为了士兵的服装一致而使用的标准化尺寸，男装制造业的机械化水平迅速提高。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旋转切割机以及往复式割刀使得瞬间切割布料最厚密的部分成为可能。到了 1895 年，缝纫机已经改进到可以使用电力驱动，它们能够以每分钟 1 600 次、2 200 次或 2 800 次缝线的速度运行。

就每个工人的价值增值而言，靴和鞋制造行业增长速度排第二，同样因为发明和产品标准化创新得到明显改变。仅仅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十年左右，鞋子

① 更多阐释参见 Anthony P. O' Brien, "Factory Siz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Great Merger Wave of 1898—190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648 - 649。

被设计成朝向左边并且按右脚的大小来设计；结果是，很多女士和先生保持了他们（她们）穿鞋的习惯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制造商们最后意识到对尺寸和舒适度的设计、制作以及关注对于为工厂制造的鞋子确保一个更广大的市场非常必要。

经济透视 17.1

19 世纪 60 年代钢铁工业的创新

新技术的传播通常很缓慢，这一发现很重要；换句话说，对于新技术发明，通常不是立刻而是逐步地采用它。此处，我们分析炼钢行业内两项新颖且相互竞争的技术——贝西默酸性转炉炼钢法以及平炉炼钢法——并且把它们与在钢制造中提高生产率和减少单位成本的其他技术进步联系起来。

第一个在制造钢铁数量上成功的方法，是在 19 世纪 50 年代后期和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几乎同时由英国工程师亨利·贝西默和美国制铁厂厂长威廉·凯利发明的。在贝西默和凯利发明了大体上相同的生产过程之后，仅过了一段时间，平炉炼钢生产法已经处在实验阶段了。发明人正竭尽全力地寻找一种制造廉价钢铁且不侵犯贝西默专利的方法。他们同样竭尽全力地克服贝西默炼钢法的一些不足。这些不足包括，这一方法如此迅速以至于没有充足的时间来测试钢铁中的碳含量，结果是制造商不能确定对于一个给定的产量它的合适用途是什么。在这方面，最好的工作是由英国的威廉和弗里德里希·西门子以及法国的埃米尔和皮埃尔·马丁完成的。到 1868 年，平炉炼钢法或者说西门子-马丁炼钢法的主要特色已经得到了发展。与可能像巨大的水壶一样倾斜的圆筒状的转炉不同，平炉炼钢法采用有漏斗的、装有熔化了的生铁、废铁、石灰石甚至一些铁矿石的有开口容器的熔炉。

出于某些方面的考虑，平炉炼钢法比贝西默酸性转炉炼钢法更经济。平炉炼钢法能满足针对大约 12 小时的巨大的装料要求，与此相对应的是贝西默炉炼钢法的 10～15 分钟“冒泡”的时间，而且在提炼阶段，平炉炼钢法能进行抽样检验，并且它的化学成分能按照确切的要求进行调整。平炉钢熔炉比贝西默转炉更具有成本优势，因为废铁和铁矿石能够与昂贵的熔化生铁一起装料。由于平炉钢熔炉使用从附近的焦煤炉汲取的热气或者通过向熔炉吹气来熔化和提炼填料，再生的原则是高度有效的。

紧随这些变化的是熔炉尺寸的增加及其运行效率。在 1860 年，优质的吹气熔炉一天能生产 7～10 吨的生铁；25 年之后，一天 75～100 吨就是其最大的产出水平了；到了 1900 年，日产出 500 吨或是更多已经很常见了，并且伴随着明显更少的焦煤消耗。在这些年内，处理材料的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为气流不断加热的方法更加发达了，鼓气装置得到了改进，以及把焦煤的完全替代品——无烟煤和含沥青的煤作为燃料。

另一个主要成就是对于工序的整合导致在供热方面的巨大节省。焦煤炉最终设置在靠近鼓风熔炉的地方以避免热能损耗。反过来，鼓风熔炉又设置在靠近炼钢熔炉的地方（贝西默或是平炉），因此熔化的生铁能直接被移送进炼钢熔炉。

最后，转炉和平炉定位在靠近开坯机的地方，因此第一次的滚压使用最小量的重新加热过程将尽可能快速地完成。

毋庸置疑的是，整合导致了其他一些方面的节省——尤其是，对材料处理方面的节省以及对整体过程管理方面的节省。

如表 17—4 所示，到 1870 年，一半以上钢的生产都采用新方法。到 1880 年，老旧的使用罐锅和坩埚炼钢的方法被彻底淘汰了。

表 17—4　　1870—1910 年钢产量

年份	合计[a]（千吨）	贝西默[a]（千吨）	平炉[a]（千吨）	百分比（%）	
				贝西默	平炉
1870[b]	69	38	1	55	2
1880	1 247	1 074	101	86	9
1890	4 277	3 689	513	87	12
1900	10 188	6 685	3 398	66	33
1910	26 095	9 413	16 505	36	63

a. 计算结果四舍五入到千吨。

b. 在 1870 年，大部分钢仍使用老旧的使用罐锅和坩埚的方法进行生产。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Series P203－207.

表 17—4 同样表明了，虽然在贝西默方法之后不久就引入了平炉方法，但是在 1900 年之前，平炉炼钢法一直远远滞后于贝西默炼钢法。贝西默炼钢法大大满足了对新产品具有最大需求的铁路。然而，当工程师们最终熟悉了钢的特性后，他们确信贝西默钢的板材和结构化形状包含一些不足，而这些在平炉炼钢法中却不会出现。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有些开坯机工厂针对新出现的需求，不得不建立平炉熔炉。而且，平炉炼钢法的成本大大低于贝西默炼钢法，不仅是因为对废铁的再利用，还因为小型经营商可以建立和经营远低于贝西默炼钢法所需规模的工厂。更进一步来说，小型所有者无需担心被控制贝西默矿砂的大型公司“打劫”。到了 1910 年，平炉已经真真切切地打败了贝西默酸性转炉：在这一年总共有 2 600 万吨的钢产量，其中采用平炉炼钢法生产的占据了 63%，而采用贝西默炼钢法的仅占据了 36%；从这时起，采用贝西默方法的钢年产量稳定地下降。①

在 1875 年，他们引进了固特异贴边工艺（Goodyear welt process），从而使得鞋底紧贴着鞋帮，这样趾甲和缝线就不会穿透进鞋子的内部。大约是在随后的

① 钢铁产出变化的更多细节参见 Peter Temin，*Iron and Steel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Cambridge，Mass.：MIT Press，1964）。

20年内，机器被设计成可以处理耐久性、打孔、制作后跟以及诸如此类的工作。到了1914年，这一行业已经高度机械化了。

表17—5　1860—1910年在所选的主导行业中平均每个工人的价值增值

	1860年（美元）	1910年（美元）	变化百分比（%）
木材	710	930	31
棉制品	480	680	42
机械	810	1 290	59
钢铁	720	1 370	90
靴和鞋	400	910	128
男装	320	1 180	2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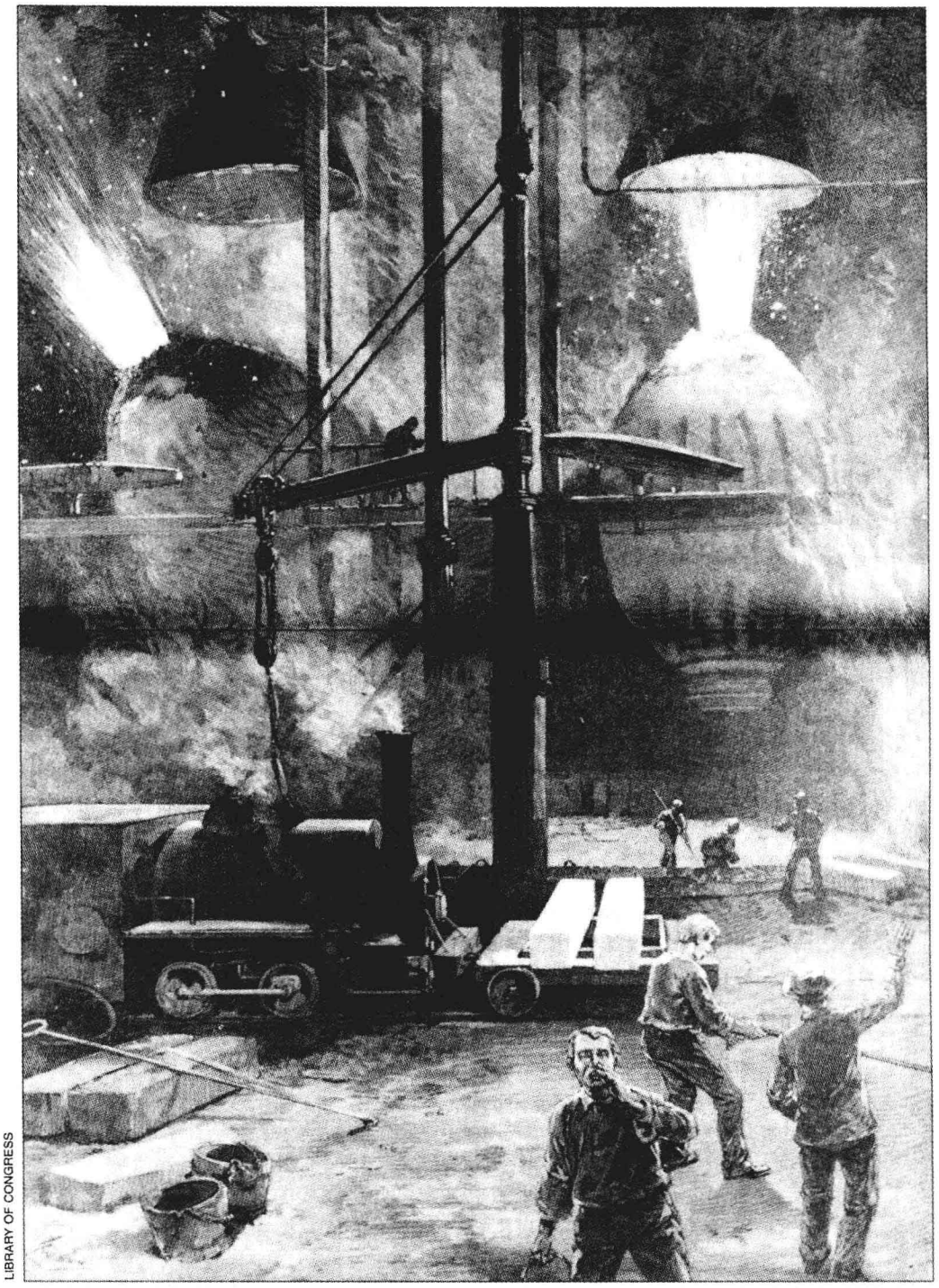
注：价值增值测算了产品的总价值减去原材料成本；因此平均每个工人的价值增值反映了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

资料来源：Simon Kuznets,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Incom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ince 1870," *Income and Wealth Series II* (London: Bowes & Bowes, 1952), 30. Used by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钢铁加工中的改进以及在非铁金属，尤其是铜和铝方面的改进，使得金属加工机器有可能取得迅速的提高，金属加工机器行业从1860年最大的制造行业中的第七位上升到1910年的第一位。金属加工机器包含两种主要类型的电力驱动机械：(1) 设计用于压挤、锻造和锤打以及使得金属成型的机器；(2) 切割金属的机器，诸如齿轮、研磨以及铣床。在19世纪90年代期间，这一方面有两个主要的技术进步：(1) 机床成为自动化或是半自动化的；(2) 压缩空气和电力被用于驱动高速的切割工具和压榨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自动化工业的需求以及对武器设备和航空器的需求使得机器工业走向成熟。维克托·S·克拉克的报告表明，在美国内战结束后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金属加工的精确度从0.01英寸的公差极限（tolerance limit）提高到了0.001英寸的公差极限，并且0.000 1英寸的公差极限已经在小规模的生产中取得了。到了1919年，金属加工机器已经在功率方面取得了与在精确度方面一样好的提升。电力驱动的大剪刀可以切割钢板达到12英寸厚和44英寸宽，并且巨大的冲压机能够把自动化机身的部分快速地冲压成形，充分使得制造"大块头"的产品成为可能。而且，这一产业在从它的出现地点向经济中其他部门传播技术知识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正如内森·罗森伯格中肯的评论：

> 机械行业是获取和传播在机械制造型经济中唯一需要的技能和技术的中心。它的作用是双重的：(1) 作为对特定顾客的需求做出反应的新技能和新技术在此地发展；(2) 一旦获取，机械行业充当了主要的把新技能和新技术传递到经济中的全部机器使用部门的传播中心。①

① Nathan Rosenberg,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98.



LIBRARY OF CONGRESS

钢铁制造业需要的资本量前所未有，其资本形式有大熔炉和辅助机械设备，以及熟练工人。如图所示，这些熟练工人能判断出什么时期刚好是贝西默转炉揭盖的好时机。

能源的新形式及新来源

在186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从依赖风力和水力以及人和动物的体力运用到其他形式的能源的转变。这一转变始于19世纪上半叶，但在19世纪后半叶获得了长足进展。在1850年，超过3/4的总动力是由动物能贡献的，并且人力生产远高于机器生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美国，水能远比蒸汽能量重要。在19世纪70年代，作为能量来源的蒸汽超过了水。然后两种主要的额外影响加快并最终淘汰了古代的水轮以及近期发展起来的水力涡轮机：(1) 蒸汽机的效率不断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压强锅炉的安全性的提高；(2) 由交通革命带来的巨大的煤开采量及其似乎永不停息的供给。这一事例描绘了资源的可用性与技术进步的互相依赖。到1890年，相当少的工厂——绝大多数在纺织业和造纸业——使用直接的水能，尽管磨坊和锯木厂仍然利用这一途径获得动力。

另一种利用水的流势的方法被发明出来。正当蒸汽机已经获得了无异议的支配地位的时候，电力也已经作为一种动力登上历史舞台。像蒸汽一样，电力也不是一种新的能源形式；它是一种新的方法，利用的能源要么由水的流动形成，要么由煤的燃烧形成。但是电力给利用旧形式的能源方法带来了异常的改进。因为电力的灵活性以及可分性，电厂可以与制造厂相距很远，将蒸汽机的往复运动转变成旋转运动然后将这一运动传递下去，这一过程所需的烦琐设备已经不再需要。而且，能量要求变成小的或是大的已经准备好“随时调用的”发动机。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全国工业动力的1/3由电力来提供，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所有的城市住所中有将近1/2使用电灯，尽管有超过98%的农村居民在天黑后使用煤油灯。

然而，电力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不应该使我们的注意力从其他基本的能源形式转移开。在1890年，煤在所有提供给制造业的能源中占据90%的比例；在1920年之前的几年内，煤在所有的工业能源中至少保持80%的比例。但是石油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且水力发电的重要性也正在回升。在此后的25年内，石油和天然气将成为战略性燃料，尽管迟至1920年，交通业和制造业在煤炭时代的地位仍然很牢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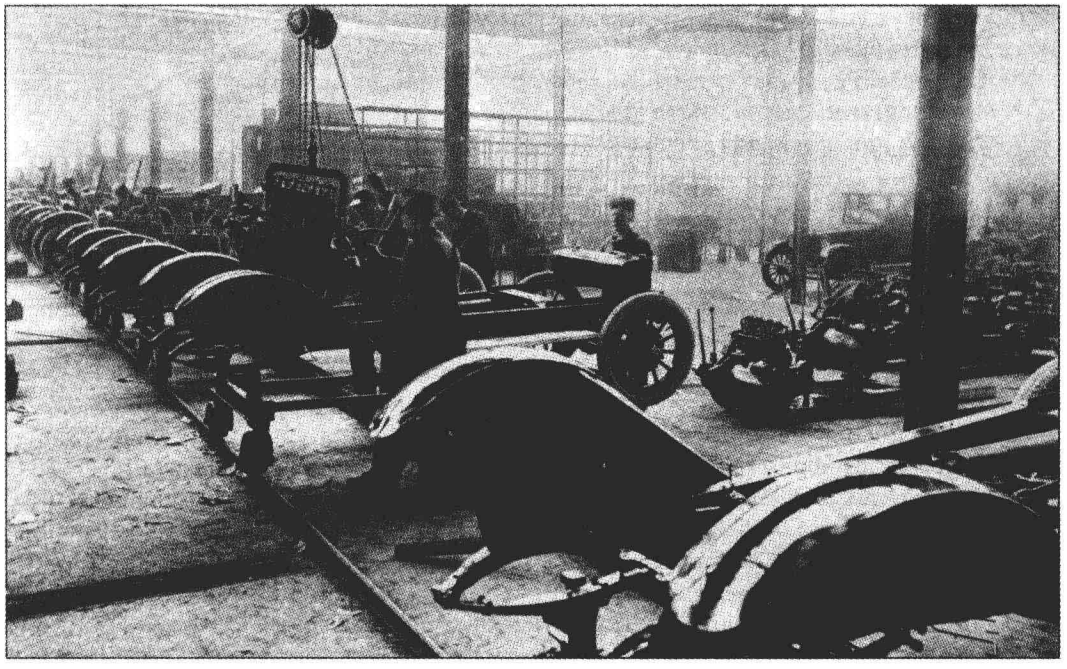
管理变革

技术变革、新的动力来源、基于多样化股权的公司发展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使得现代大型商业企业得以出现。在巨大的铁路公司出现之前，大多数商业企业即使是最大的也通常是由单一的所有人或是合伙人进行日常经营。不时地会有管理者参与其中，但所有人通常都监督商业活动并且做主要的经营决策。铁路引领了商业的变化。

在遇到难以处理的规模以及复杂性时，铁路发展出许许多多的管理实践和观

念。管理创新和组织变革对于更好地协调数以万计的雇员们的行动非常必要，雇员们从事着开火车、售票、装货、维修铁轨和装置以及其他的无穷尽的工作。在19世纪50年代，伊利铁路公司的主席，来自纽约的丹尼尔·麦卡勒姆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具有广泛潜在的应用的管理原则。首先，管理者做决策的权利应该与他们的职责大小相一致。内部报告体系（会计体系）应该被用来发现困难以及允许快速地提出解决办法。对于相似的雇员和管理层的业绩评估应该常规化。19世纪后期其他的大型商业企业迅速采纳这类以及其他的管理体系，而且一直到今天，在差不多所有的大型商业组织中麦卡勒姆的观念已经是常规性的了。①

在美国内战结束后有两个相对较新的想法像野火一样在蔓延：大规模生产以及科学管理。大规模生产意味着两个基本生产过程：连续流程（continuous flow）和可互换部件（interchangeable parts）。科学管理意味着商业过程具有实验室般的精准度。企业家们不断地寻求更高级的生产方法。从自然法则上来讲，为了实现从生产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很有必要去设计机械化的系统运输材料的方法。从智力上来讲，要求经理们做出详细的计划以及指挥组装的过程。同样必要的是，在组装一个复杂的产品时，经理们的目标应该是使得工人们耗费的时间最少。



THE GRANGER COLLECTION, NEW YORK

在20世纪的早期大规模生产有助于改变工业的面貌。

自奥利弗·埃文斯在1780年第一次尝试连续流程的碾磨以后，企业家们已经理解了通过生产过程去获得不断的移动材料的优势。在肉类处理以及卷烟中的

① 了解早期铁路在这些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参见 Alfred D. Chandler, *The Railroads: The Nation's First Big Busines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5)。

应用证明了其潜在的利润，但是伟大的汽车企业家亨利·福特设计了第一个先进的流水线体系用于生产巨大而又复杂的成品。在1914年，一般要在12小时内组装好的底盘可以由250英尺的生产线在比1.5个小时稍多一点的时间内组装成功。在1920年之前，发动机驱动的传送带以最适宜的高度并且以最适宜的速度把马达、车体和底盘移向被极大地延长了的生产线旁边的工人。到这时，移动生产已经在所有的汽车企业、电力企业以及正初露头角的家用电器企业中传播开来。

随着工厂规模以及布局复杂性的增加，一大批劳动力所遇到的效率问题变得越加突出。弗里德里克·W·泰勒是关注该问题的最著名的贡献者，泰勒认为工人效率的提高可以通过：(1) 仔细地分析所从事工作所要求的行动；(2) 采用实验的方法去确定最适宜的规模、最合适的工具的重量以及最适宜的提升；(3) 为突出表现提供激励。从这个思考出发，泰勒接着发展直接与商店或工厂中合理的体力设计有关的确定原则、正确的工作程序以及为了生产目的确立精准的计划。①

这些强化生产率方面的改进有助于推动实际工资上移，稍微平复了工人对变化和更快速的生产过程的不满。但是竞争使得变化仍然会出现并使得商业规模不断扩大。

规模经济与产业集中

关于大型商业兴起的讨论的中心，是大型商业的出现是否是它对技术变革和其他规模经济优势的反应，或者对垄断势力和市场控制力的追求是否也是大型商业出现的一个根本动力。

早期的商业联合

在联合上的第一个尝试是通过两种简单的策略：(1)“君子协定”，通常用来设定和维持价格；(2)“联营”——分割市场并且给每个卖方分配一个份额。在联营中，市场按照产出来进行分割（每个生产者都可以自由地出售一定数量单位），或者是按照地域来进行分割（在自己拥有的保护区域，每个生产者都可以自由出售产品）。或者是销售者可以形成一个“利润分享安排”，将净收入支付给一个中心基金，随后在一个给定时期按照其在总销售中所占的比例进行分割。尽管甚至在美国内战之前，联营就已经形成了，但是直到1875年，它们才变得常

① 了解泰勒对管理革命的不同维度不同层面的影响，参见丹尼尔·尼尔森的重要著作，*Frederick W. Taylor and the Rise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0）。对泰勒主义的批判性评价，参见David F. Noble，*America by Design：Science，Technology & the Rise of Corporate Capitalism*（New York：Knopf，1977）。

见。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之间，强硬的联营协议在大量的重要产业中已经确立：威士忌制造商、产盐商、产煤商、肉类制造商、炸药制造商、钢轨制造商、钢架制造商、铸铁管道制造商以及某些烟草生产商通过联营协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铁路公司在干线区域也取得了成功。联营相当于欧洲的卡特尔；它与欧洲同行不同的地方主要在于：这些协议在美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英国普通法的一个传统）以及这些协议在法庭并不能得到执行。

尽管“君子协定”以及联营暂时都起了作用，但它们通常不能持久。第一，就它们在提高价格以及获取“垄断”利润方面所获成功而言，它们鼓励了新的企业进入这一领域。第二，欺骗性诱惑很强烈。单个的经营者可以通过超出他们所分配的产出来获利，也可以通过侵占另一个区域来获利，并且不存在依靠法律来反对违背者的情形。

信托与控股公司

为了克服这些不足，一个新的联合策略得以创立：信托，一个古代受托人策略的歪曲，这个受托人持有财富，服务于个人或是机构的利益。根据一个信托协议（trust agreement），有一些通常处于竞争中的营运公司的股东把他们在公司中的份额移交给一组信托人并且作为交换得到“信托凭证”。受托人因此对营运公司具有表决控制权，并且前股东可以因他们的信托凭证获得分红。这一策略（经济推理命题4）对于整个公司的集中控制非常成功并且对股票的持有者而言也有利可图，以至于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早期形成信托去控制煤油、糖、威士忌、棉花籽油、亚麻籽油、铅、盐、橡胶鞋子和手套以及其他产品的产出。但是信托形式存在一个严重的缺陷：协议只是一份备案资料。一旦它们的目的被清楚地认识到了，州和联邦都会通过立法宣布它们的行为非法，而且通过在州法院的成功的普通法律程序，一些信托被解散了。

然而，敏锐的公司法律顾问们想出了另外一个链接经营者与金融机构的方法。很偶然地，特殊的公司执照允许一家公司能够拥有另一家公司的股票，这一条款被添加进来以允许水平扩张。在1889年，新泽西的立法机关修改了一般公司成文法，允许所有的公司持有一家或多家附属公司的股票。当信托在一些州被宣布为不合法时，它们中的很多依“控股公司”这一条款就可以简简单单地在新泽西获得执照。[①] 集中控制的主要目的听任单一公司凭它们的执照自由运营，因而这一目的也能够通过一个相对简单的策略来获得。从理论上来说，控股公司不得不持有它们的一些子公司50%以上的有表决权的股票。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尤其是当份额变得普遍分散时，控制权可以通过更小比例的有表决权的股票来得

① 执照散播对新泽西有利，这产生了相当一部分的企业收费收益。后来，其他州——如特拉华州，削弱了新泽西州的垄断。

以维持。控股公司在此种情况下就可以得以保存了，尽管它们不得不时时回击来自司法部门的代理律师们的攻击。

产业集中运动的两个阶段

无论合并的道路是怎么样的，也不论最终选择何种组织形式，到 1905 年，大型企业已经是美国制造行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变大是否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该如何去解释发生在 19 世纪后期屈指可数的几个年代内和 20 世纪早期岁月内的这一重大转变呢？我们已经说明了工业集中的一个原因是自然运动，被竞争的压力所鼓舞、趋向更大以及更有效的规模，并且另一个原因是企业有意地以获取垄断势力为目标。我们现在不得不仔细地考察推动企业走向控制很多重要行业的大部分产出的力量，因为显而易见的是，追逐垄断利润的贪婪自负的愿望不会突然使得美国企业昂首阔步地进入巨大的合并。

幸亏有了艾尔弗雷德·钱德勒的工作，在反映这一时期内的合并运动出现的两个主要阶段中，我们才发现了企业走向合并的动力的线索。在第一个阶段（1879—1893 年），主要是对生产旧的基本消费食物的企业的水平合并。在第二个阶段（1898—1904 年），主要是垂直合并，大多数发生在制造生产品的企业里，但是也有一些发生在为不断增长的城市市场制造新产品的制造消费品的企业里。[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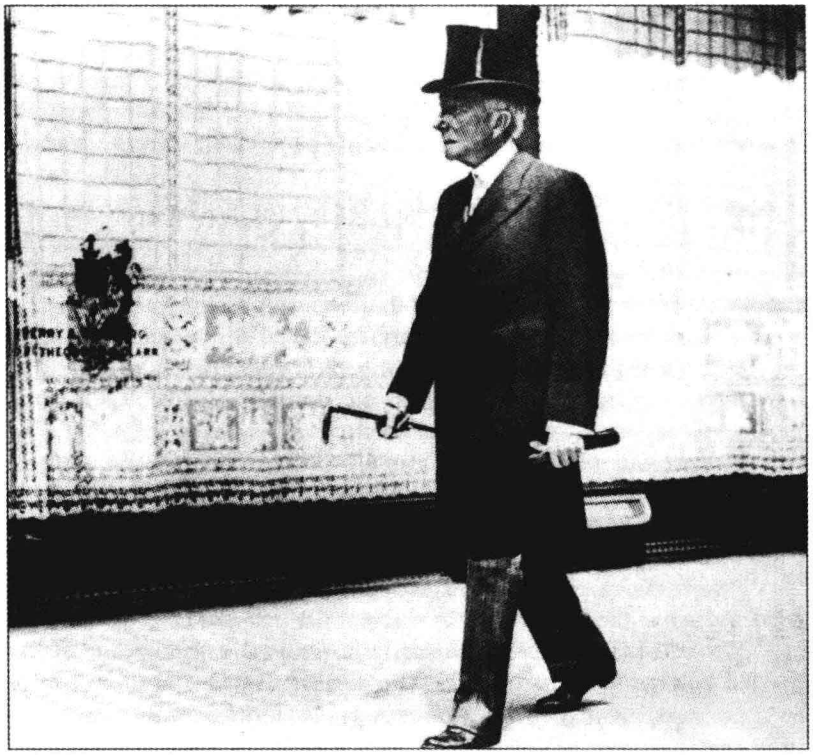
阶段 1：水平合并（1879—1893 年）

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到 19 世纪 80 年代之间，由于铁路扩展了全国市场的组成部分，人们对很多现有的小型消费品企业的商品需求有了引人注目的增加。紧接着就是扩展生产设备以更好地利用新的市场机遇。然后，在很多地区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设备以及“生产过剩”。当这一情况出现后，价格降至一些企业的单位产出平均成本之下。为了避免破产以及最终的失败，很多生产皮具、糖、盐、威士忌、葡萄糖、淀粉、饼干、煤油以及橡胶鞋子和手套的小型企业（这些可以称得上是最重要的）水平合并起来以形成更大的单位。[②]（水平合并就是合并生产相同或近似产品的企业。）然后他们使生产过程系统化、标准化，关闭最缺乏效率

① 接下来的分析密切基于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的开创性工作，应感激他为集中运动提供了新的解释。钱德勒在不同阶段关于替代能源的理论的最初说法，参见“The Beginnings of ‘Big Business’ in American Industry,”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33 (Spring 1959): 1 - 31; “Development, Diversification and Decentralization,” in *Postwar Economic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ed. Ralph E. Free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0), 235 - 288; *Strategy and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62)。钱德勒最新的论述，参见 *The Visible Hand*, Part 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② 如我们所观察到的，在众多产业中，形式松散的组织纷纷合并为单一的大公司。

的企业以及创设采购、营销、融资以及会计部门以更好地为现在的单位提供服务。到了1893年，联合和集中运行良好，主要是在制造一直在使用的基本家用物品的消费品企业里。通过这种方法创立的最典型的大型企业有俄亥俄的标准石油公司（在1899年以后更名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酿酒人与养牛人信托、美国糖业加工公司以及合众国橡胶公司。



© CULVER PICTURES

约翰·D·洛克菲勒是19世纪商人的典范，给混乱的石油行业带来秩序和规则，从一个小股东和身家起步直到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身家（以今日货币计算大约是200亿美元），他捐出数百万美元财产，利用牛奶、高尔夫和航船这一养生之道得享天年，卒于96岁。

在第一个集中阶段变得巨大的企业当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标准石油公司。自1860年起，石油加工行业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就是行业内存在数量众多的小企业。到1863年，行业内的企业数量超过了300家，尽管这一数字到1870年减少到也许只有150家。竞争是残酷的，并且这个行业如同感染了瘟疫，普遍地拥有过剩设备。“以最保守的估计”，哈罗德·威廉森和阿诺德·多姆写道，“在1871—1872年间，全部的加工设备每年至少可以生产1 200万桶，这是炼油厂所收原油的两倍多，它在1871年合计是532万桶，而在1872年是566万桶。”① 一个在固定厂房和设备上进行投资从而能够制造当前销售量的两倍容量的行业，不可避免

① Harold F. Williamson and Arnold R. Daum, *The American Petroleum Industry*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59), 344.

地具有重复犯错的特征（通常在商业周期的下行阶段），并且即使是在最有效率的企业里也存在着高度可变的利润。

约翰·D·洛克菲勒的企业——成立于1869年，以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命名——也许是最佳的经营，它拥有两家巨大的炼油厂、一家造桶厂以及成群的油槽车。[①] 在19世纪70年代，标准石油的控股稳定地增加，大多数是通过对位于匹兹堡、凤凰城、纽约以及俄亥俄的炼油厂的收购完成的。标准石油要求并接受了在油品装运方面的回扣（以及甚至是竞争者装载上的缺点），这家公司在吸收独立的提炼竞争者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到1878年，标准石油要么拥有要么租借了国内90%的从事提炼的生产容量。仍然保持成功的中立派仅仅是因为它能够生产高边际利润的物品，比如拥有商标的润滑油，它并不需要高容量以及低制造成本。

为了巩固公司的地位，在1879年，标准石油采用了一个信托协议，凭借该协议，三家信托公司将经营俄亥俄标准石油的财产并且它们将服务于标准石油的股东们的利益。在1882年，这一协议被修订并加以改良；与标准石油有关的40家公司的股东们把他们的普通股移交给了9家信托公司。至于托管的财产价值设定在7 000万美元，与此相对的是发行70万个信托凭证（票面面值100美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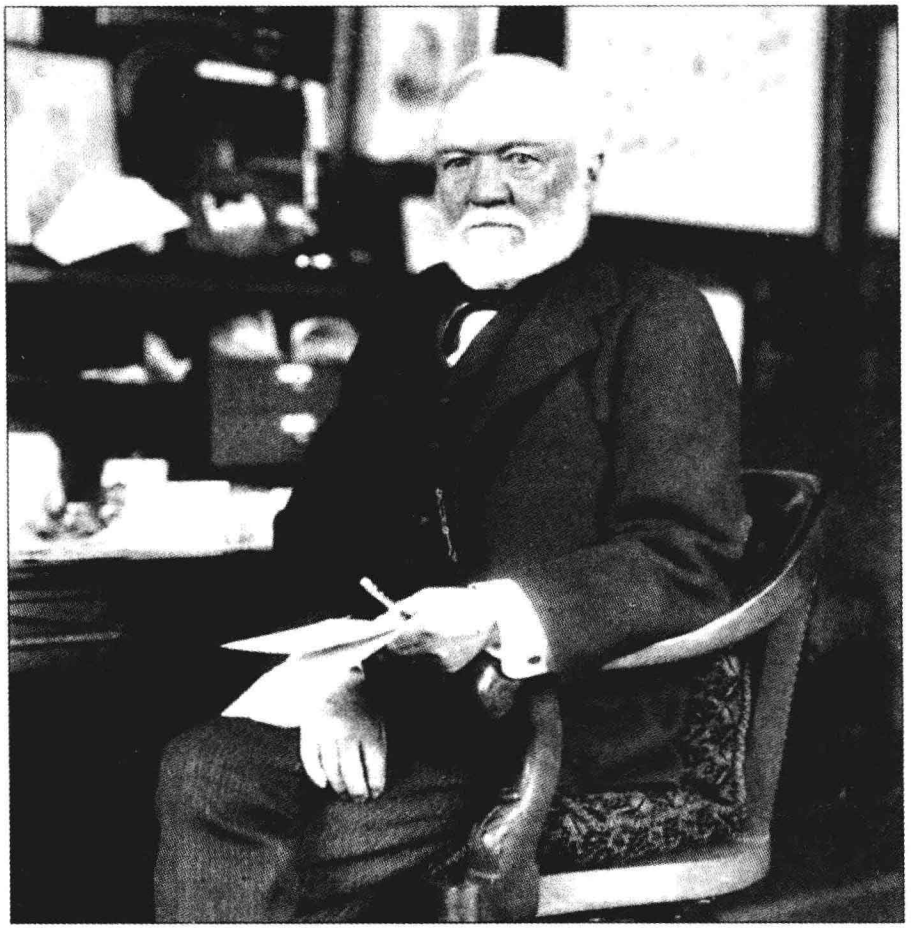
为了那些位于其他州、命名为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纽约标准石油公司以及诸如此类的公司的形成，协议被更进一步地提供。俄亥俄的最高法院在1892年的一个裁决中命令标准石油信托解散，在此之后，通过在主要的炼油公司中保持其董事会的紧密联结，合并仍然在好几年内维持有效。由于受到了更进一步立法行动的威胁，公司的官员们把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从一家运营公司转变为一家控股公司，把它的股本从1 000万美元提高到1.1亿美元，因此它的股票可以与它所持有的子公司的股票进行交换。因此，它确保了信托形式的所有优势，并且至少就当时而言，没有招致任何的法律危险。结果是，在早已成功实现合并之后，标准石油公司从一家信托公司转变成一家控股公司。

阶段2：垂直合并（1898—1904年）

一家垂直联合的企业是指由企业内部的不同部门对从原材料的生产到最终产品的销售这一生产过程的每一个阶段进行管理。在19世纪后半叶，在一个接一个的行业里，逐渐由巨大的垂直联合形成企业主导。例如，古斯塔夫斯·F·斯威夫特和他的兄弟埃德温，在对装载以及冷冻肉的储藏进行试验之后，在1878年成立了一家合伙企业，并且在随后的20年内成长为一家巨大的联合公司。它的主要部门——营销、管理、采购以及会计——都由芝加哥的总部控制。其他的肉类加工商，比如阿尔莫和莫里斯也建立起类似的组织，而且到了19世纪90年代后期，几家具有高度集中以及官僚主义的管理特点的企业主导了肉类加工行

① 约翰·D·洛克菲勒于19岁创业，当他与莫里斯·B·克拉克合伙后充当代销商和托运人。在美国内战结束前累积了适量的财富，他于1862年进入石油行业，在一系列合伙制的基础上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

业。在1884年，詹姆斯·B·杜克为推销他的机制卷烟，以相似的方式，开始着手创立一家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组织。在1890年，他把公司与五家竞争厂商合并，组成了美国烟草公司。在不到15年的时间内，在经过一系列的合并之后，美国烟草公司在卷烟行业获得了垄断地位。



© BROWN BROTHERS

安德鲁·卡耐基是一个伟大的商人，他所建立的联合钢铁公司与摩根和穆尔的推动一起在1901年形成了美国钢铁公司。在那个时候他出售了他所持有的股票，并成为这个世界上杰出的慈善家之一。

在钢铁业方面，到19世纪90年代早期，卡耐基公司已经使它的一些制造业资产合并成一家拥有巨大的煤铁存量的联合企业。当卡耐基的利益日益增加时，其他的商人正创造更强大的钢铁公司。在1898年，联邦钢铁公司在J. P. 摩根公司的赞助下成立。它的合并行动以及产品与卡耐基公司的非常相似，但是在与生产高标准的最终产品的国家管道公司、美国桥梁公司结成了一个紧密的联盟后，它就拥有更长远的优势。国家钢铁公司是由W. H. 摩尔创立的，它是第三大的铸铁和基本型钢生产商，并且与其他制造最终产品的摩尔企业紧密相连：美国锡铁公司、美国钢箍公司以及美国钢板公司。当卡耐基在煤（通过与洛克菲勒的联

盟）和铁矿石上变得愈加强大时，它所遭遇的向前整合成成品的威胁就越大，卡耐基促成了引起摩根注意的合并行动。结果就是1901年成立的联合钢铁公司，它拥有超过10亿美元的资本存量，并且从很多方面来讲，它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它控制了全国钢铁交易的60%，除了它的高炉与工厂之外，联合钢铁公司还拥有苏必利尔湖区域里大量矿石储备的一大部分、5万英亩蕴藏丰富炼焦煤的土地、超过1 100英里的铁路以及成群的大湖轮和驳船。当需要保护它在原材料方面的地位时，公司巨头们就能阻止在具有高固定成本的产业中的价格战争。

1893年发生的严重衰退，造成各种形式的合并运作进入了事实上的停顿。然而，当1896年后期经济恢复生机时，一个新的势头发展起来了。在1898—1904年间，超过3 000例的合并受到了影响。在1903年的前四年内，几乎占据了美国制造业一半产能的公司参与了积极的合并，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垂直合并。

为什么这些垂直合并的庞大的公司逐渐主导了如此众多的美国制造企业呢？用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非常刺耳的语言来说，就是为什么在如此众多的营业范围内，庞大公司看得见的手取代了市场看不见的手？钱德勒的答案以技术开始。当工厂能够连续运行时，建立工厂是为了利用生产线技术来使得生产成本最小化；任何原材料流入的中断或是最终产品销售的中断都会使得成本上升。因此，为了使成本最小化，经营者们需要一丝不苟地规划好持续生产。经营者们必须使得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分配过程处于他们的完全控制之下，这才可能实现最小化成本的目标。当一种生产技术不存在时，期望能从垂直合并中获得利润通常被证明是不现实的。美国烟草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一种被称为邦萨克（Bonsack）的新机器能够以流水生产技术生产优质的卷烟。结果是，美国烟草能够利用这一新技术，建设一家垂直合并并且垄断了该行业的企业。另一方面，如果可以在生产线的基础之上生产优质卷烟的机器不能被建造起来，那么美国烟草商垄断卷烟行业的努力也会遭遇失败。当然，成本最小化并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如果一家企业能够成功地在一个行业中营造一个垄断位置，它仍然能够通过限产以及提价来极大地增加它的利润。正如内奥米·拉莫罗（Naomi Lamoreaux）已经表明的，垄断利润是关于合并的故事的重要部分（Lamoreaux，1985）。[①]

为什么是美国引领了大型公司发展的道路呢？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流水生产装置也正处于建设之中，但是这一过程在美国更加深入而且更加快速。部分的答案是美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而且这一国内市场因为人口增长以及城市化过程能够持续地扩张。正如加文·赖特所强调的，另一部分的答案是成功的新技术亟须充沛的自然资源：煤、铁、铜、石油、农产品等等。而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美国巨大的比较优势。[②]

---

① Naomi R. Lamoreaux,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Gavin Wright,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990).

立法与法律行动

旨在控制垄断势力的法律的通过同样对于第二波集中行动起到了关键影响。我们在第15章中已经讨论过农民呼吁用立法来反对垄断。加里·利贝卡普非常有说服力地论证了畜牧者联合会对于导致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通过的政治影响力。[①] 争论的对象是“芝加哥肉类加工中的垄断者们”，也就是斯威夫特兄弟以及阿尔莫和莫里斯，他们认为这些垄断者从饲养家畜中汲取了他们所有的利润。出售新鲜肉类的小型屠宰场以及其他小商人和农民联合畜牧者一起强烈要求通过反垄断立法。托马斯·黑兹利特对利贝卡普的观点作了补充，集中在参议员约翰·谢尔曼（威廉·特库姆塞·谢尔曼将军的兄弟）身上，他是实行高关税的鼓吹者，他与反垄断者“交易”立法选票来确保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案》（McKinley Tariff Bill of 1890）的通过，《麦金利关税法案》建议对应税商品实行高达51%的税率。看起来就好像是支持反竞争的行动（更高的关税）的选票与支持保护竞争的政策（更强硬的反托拉斯法令）的选票之间进行了一场交易。[②]

与《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起因一样有趣的是它的影响。作为一部成文法，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看起来足够简单。它宣称“每一个合约，如果它包含信托的形式，或者它是密谋对一些州之间的贸易进行约束”，那么这一合约就是非法的。它规定了将对于“任何将垄断或是尝试垄断或包含垄断成分又或是密谋……去垄断一些州之间的任一部分的贸易或商业的个人”实施罚款或是监禁的惩罚。首席检察官通过在联邦法院中引入民法或者刑法程序承担执行这一法令的任务。由此，对该法律的解释权限归联邦裁决。

联邦法院事实上并不热衷于执行这一法令，这一点可以从它对1895年的美国诉E. C. 奈特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E. C. Knight Company）的判决中看出来。美国糖业加工公司与凤凰城的其他三家糖业加工商一道取得了E. C. 奈特公司的股票，从而将它在美国糖业加工市场上所占份额从65%提高到了98%。首席检察官采取了反对糖业信托的行动；但是法院基于这家公司从事制造业——并不是从事州与州之间的商业——这一理由并未采用《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且国会倾向于禁止对仅属于州与州之间的商业采用这一法令。法院认为，糖业加工生意“与州与州之间或是与国外之间的商业不具有直接联系……是继制造业之后的商业，并且不是它的一部分”。法院更进一步地暗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并不阻止大型企业通过购买财产形成的增长——也就是说，通过合并或是联合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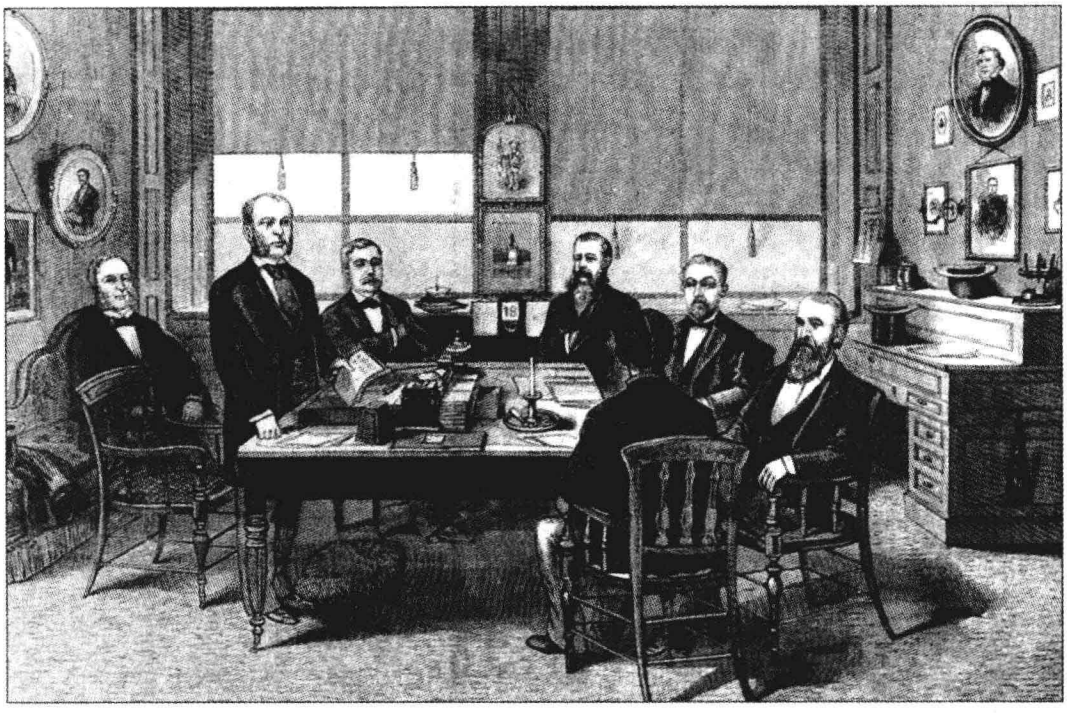
---

① Gary D. Liebcap, “The Rise of the Chicago Packers and the Origins of Meat Inspection and Antitrust,” in a symposium: Economics and 100 Years of Antitrust, eds. George Bittlingmayer and Gary M. Walton, *Economic Inquiry* 30 (2), (April 1992): 242 - 262.

② Thomas W. Hazlett, “The Legislative History of the Sherman Act Re-examined,” in a Symposium: Economics and 100 Years of Antitrust, eds. George Bittlingmayer and Gary M. Walton, *Economic Inquiry* 30 (2), (April 1992): 263 - 276.

结果是自1895年以后，合并被广泛地认为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地消除不公正的价格竞争的比较安全的方法。1898年后新一轮合并的涌现，部分上是因为在1898年美国诉阿迪斯顿管道和钢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Addyston Pipe and Steel Company）的判决中所采用的规则。在这一案例中，法院清晰地表明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确适用于在那些被认为是相互竞争的企业中的串谋协议，但是合并在表面上仍然是合法的。乔治·比图林梅亚（George Bittlingmayer）报道说：

《铁器时代》（*Iron Age*）是钢、铁和五金行业的行业出版物，它用了一整个版面的社论进行总结，指出合并现在也许已经取代了价格固定。"新的决定也许严重地影响到了不同行业的制造商中大规模存在的协议，在这些行业中对于价格的控制是通过普遍的关注而获得的，并不是通过在它们的商业活动中各自单独的行动而获得的。乍一看，虽然这一决定必须推动它们去变成事实上的联合，但是它实际上更倾向损害公众的利益而非对损失和暂时协议的轻视。"（1898年2月17日）一个月之后，《铁器时代》报道说，"在过去一个星期里，制造商举行了很多会议，都是着眼于一些计划，它们能成功去除具有锋利的*刀刃*般伤害性却不受控制的竞争。"（1898年3月17日）①



© BETTMANN/CORBIS

这幅1890年的绘画描绘了公司董事会的一次会议的一个场景——他们也许是在讨论如何应付国会刚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

① George Bittlingmayer, "Did Antitrust Policy Cause the Great Merger Wa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5): 90 - 91.

正如这一行业出版物所认为的，立法的意图与法律的效果之间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这一例子中，法律本身是导致联合——通过合并——的强大力量，而联合是人们所憎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可用的证据非常强有力地说明了导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集中运动的第一个阶段（1879—1893 年）与第二个阶段（1898—1904 年）相比，实际上更少是由寻求垄断势力所激发的。正如安东尼·奥布赖恩告诉我们的，在 19 世纪 70 年代至 19 世纪 80 年代之间，工厂在规模上的增长尤其快于在随后年代的增长。[①]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这些年代里，技术变革的步伐尤其独特。内奥米·拉莫罗的总结表明，第二个合并阶段是巨大的合并浪潮，它实际上主要是由阻止价格竞争的意愿所推动的。[②] 奥布赖恩同样总结道："在这一合并浪潮中，集中行动的增加更多是来自削减价格竞争的动力而不是对规模经济的利用。"[③] 不管它主要的激励缘由是什么，世纪之交时期巨大的合并浪潮成为一个吸引人的政治目标。参见经济透视 17.2。

法律改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遗留下来的两个决议中，通过合并形成的大型企业有效地避免了被分拆的威胁，因为占主导地位的企业的行动并不能排除市场中的竞争。在美国诉新泽西联合鞋业机械公司以及其他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United Shoe Machinery Company of New Jersey, et al.）中，约瑟夫·麦金纳（Joseph McKenna）法官以初审中法庭发现组成的公司并不是竞争者这一点作为他做判决的基础——它们实际上互为补充而不是在制鞋方面具有同样的功能。法院没有否认联合鞋业机械公司的垄断势力；它仅是认为公司的垄断势力并不违法，因为组成的公司从来就不是竞争厂商。对美国诉联合钢铁公司案（United States v. United Steel Corporation）的判决甚至使得已经合并成的公司处于更加安全的位置。又一次站在法庭一边的麦金纳发现这家公司既不拥有垄断势力也不具有强加垄断控制的企图。在对联合钢铁公司的历史的检查中揭示了它没有石油和烟草案例中所抱怨的任何掠夺行为，法庭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一点印象深刻。法庭获知了这家钢铁公司与其竞争对手之间的大量联系，声明联合钢铁公司的势力"当且仅当与它的竞争对手合作时，它才是有效的，并且因此它应该与它们在联合的权宜之计、合作、贸易协商方面达成一致以及最后同处于一个宴会体系中，该体系由公司主席 E. H. 加里于 1907 年开创，被称为'加里宴会'"[④]。但是这家公司：

---

① O'Brien, "Factory Siz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Great Merger Wave of 1898—1902," 639 - 649.

② Naomi R. Lamoreaux,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 especially chapter 4.

③ O'Brien, "Factory Size," 649.

④ 40 Sup. Ct. 251 U. S. 417, 295.

诉之于不包含任何从其他的合并案例中归纳出的蛮横或是粗暴……它在市场中并不拥有垄断势力而且它自身也并不包含，并且它所施加的控制仅仅是通过与它的竞争者的联合而存在。因此，正如它曾经的冒犯一样，它的冒犯不同于它们的并且仅在假设它在公布以及改善政策方面所拥有的领导权这一方面与它们有显著的区别。它放弃了这一领导权并且在这一法律开始实行的时候它已经停止了这一冒犯。[①]

麦金纳法官认为联合钢铁公司并未获得垄断势力，尽管它控制了50%的行业产量。他的判决认为正常价格在时间中的变化形式可以在一个竞争市场中出现，这与在一个串谋市场中一样容易，这一点也清楚地被证据所证明。政府关于公司规模是行业竞争的一个潜在威胁的断言被否定了。相反，法庭认为“法律不能仅凭其规模就做出违法的判决，或者凭其存在用不完的势力就做出违法的判决”。在该判决之后，只有最乐观的司法部门的律师们能明白仅仅因为一家企业规模大就利用法律反对它的观点的合理性。

经济透视 17.2

作为托拉斯破坏者的最高法院

早在1902年，西奥多·罗斯福就觉察到了破坏托拉斯的政治价值，并且在1904年的竞选运动中他许诺将大力起诉垄断。在他的任期内，起草了反对一些大公司的法案，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烟草公司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这些企业在公众心目中是垄断的典型例子，而且最高法院在这些针对它们的案例中的判决将会显示其期望《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能达到的执行力度。

在1911年决定正式宣判的时候，最高法院发现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存在非法的垄断势力，并且命令它们必须解散。但是最高法院实际上是基于相当有限的理由而做出上述决议。首先，它过于看重仅具有垄断意图的证据。法院检查了在公司的成长阶段曾经出现过的掠夺性活动以及公司利用其垄断力量的方式。因此石油托拉斯就被认定为通过不公平地从铁路公司获得回扣以及通过在价格战之后收购精炼公司，从而在市场中获取了有利的位置。类似地，烟草托拉斯被谴责为通过价格战使得竞争公司尾随其后，并且在收购这些竞争公司之后又逐渐关闭它们。而且，记录显示老的美国烟草公司施行了一个强劲的买方独家垄断（单一购买人）势力，当作物在年度竞价市场中进行销售时，这就打压了烟农的价格。其次，法院在限制贸易方面采取了“合理准则”（rule of reason）；由于针对所有的违反行为采取行动明显是不可能的，所以就必须利用法院来实施判决：

在这一原则之下，限制了竞争的联合被认定是合法的，只要这些限制并不是不合理的。因为没有可对竞争的限制合理程度进行精准测算的经济标准，所以法

① 40 Sup. Ct. 251 U. S. 417，295－296.

院对大型公司在获得以及保持它在市场中的位置时所采取的活动进行检查。掠夺性活动表明了对市场进行垄断的意图，而且通过不断的联合获取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的公司之间的联合也许将会被解散。即使它们的规模在市场上获得了势力，那些更值得效仿的方式并没有冒犯法律。①

标准石油公司和美国烟草公司是仅有的由最高法院判决解散的两家公司，但是即使法院继续下令解散或整顿，也不太可能恢复到经典竞争下的情形。美国烟草公司之后的4家主要的后继者在卷烟制造上组成了坚固的寡头。标准石油公司的33家后继公司里的股票按比例地分配给控股公司的股东，但是无论解散有何种好处，价格竞争上的增加并不明显。②

联邦贸易委员会

在1914年，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国会通过了《克莱顿法案》(Clayton Act)，这一法案的意图在于通过规定某些特定的行为违法来消除现有反托拉斯法中的含糊之处。购买者之间的价格歧视被禁止，对弱化竞争起到影响的排他销售以及捆绑合约同样被禁止。一个新设立的、由5名被任命的成员组成的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执行该项法律，而且联邦贸易委员会所做出的决定可以上诉至联邦巡回法院。从它自身的意图出发或是基于被损害团体的抱怨，委员会同样执行调查。如果已经发现了违法行为，委员会可以发布“停止并且终止”的命令，违法者则有权上诉至联邦法院。

《克莱顿法案》是如此的弱势以至于它对政府强化竞争的力量帮助不大。一旦判决违法行为存在，法庭不得不判定它们的作用是弱化了竞争还是提高了垄断。正如我们已经观察到的，到1920年，法庭能够一致认定的行为就是明显的存在于独立的生产商或是销售商中的串谋。一方面有大企业的“合理的”垄断行为，另一方面有“脆弱”形式的串谋，而这两者都不受惩罚。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作用就在于编辑了对经济学家有用的大量数据，并且通过反对冒牌商品以及虚假广告提升了市场竞争的道德。只有它能基于对消费者的伤害而不是基于对竞争者的伤害采取行动，否则公众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努力中获益不大。

因此，1920年之前所进行的社会对商业控制的巨大实验收效甚微。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采取了更强有力的执行反托拉斯法律的手段，不过这对于产业中的大型化问题已为时太晚。但是到那时，有一种竞争日益清晰，这是保护消费者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制定者们没预见到的类型。通信成本和交通成本的下

① George W. Stocking, “The Rule of Reason, Workable Competition, and the Legality of Trade Association Activ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1 (4), (Summer 1954): 532 - 533.

② 关于这几十年来价格上涨刚性的有趣阐述，参见 Austin H. Spencer, “Relative Downward Industrial Price Flexibility 1870—192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1 - 19。

降使得地区市场与全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紧密结合，从而削减了地方垄断势力。[①] 我们将在第 20 章考察这些新的竞争渠道的作用。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duddell, Robert M., and Louis P. Cain. "Public Policy toward the 'Greatest Trust in the World.'"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55 (Summer 1981): 2.

Allen, Robert C. "The Peculiar Productivity History of American Blast Furnaces, 184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605 - 633.

Asher, Ephraim. "Industrial Efficiency and Biased Technical Change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Manufacturing: The Case of Textil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431 - 442.

Atack, Jeremy.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2 (1985): 29 - 52.

Berck, Peter. "Hard Driving and Efficiency: Iron Production in 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879 - 900.

Bittlingmayer, George. "Did Antitrust Policy Cause the Great Merger Wav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April 1985): 90 - 91.

Cain, Louis P., and Donald G. Paterson. "Factor Biases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Manufacturing: The American System, 1850—191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341 - 360.

Chandler, Alfred D.,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Scale and Scope: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1990.

Chandler, Alfred D., and Louis Galambos.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Modern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0 (1970): 201 - 217.

Clark, V. S.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607—1914*, 2 vols.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28.

Feller, Irwin. "The Urban Location of United States Invention, 1860—191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8 (1971): 284 - 304.

Floud, R. C. "The Adolescence of American Engineering Competition, 1860—190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37 (1), (February 1974).

Frederick W. Taylor project, http://atilla.stevens - tech.edu/intro.html.

① See Jeremy Atack,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rpor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2 (1985): 29 - 52.

Frickey, Edwin.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7.

Galambos, Louis. *The Public Image of Big Business in America, 1880—1940*.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5.

Gallman, Robert. "Gross National Produc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34—1909."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30.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Gallman, Robert, and Edward S. Towle. "Trend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Since 1840."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Hughes, Jonathan. "Industrialization: Economic Aspects." In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edition, ed. David Sills, vol. 7.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252 - 270.

——.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History: Theses and Conjecture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70.

——. *The Governmental Habit: Economic Controls from Colonial Times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 *The Vital Few: American Economic Progress and Its Protagonis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Hurst, James Willard. *The Legitimacy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780—1970*.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70.

Josephson, Matthew. *The Robber Barons: The Great American Capitalists, 1861—1901*.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4.

Kirkland, Edward. *Industry Comes of Age: Business, Labor, and Public Policy*, 1860—1897. 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1.

Lamoreaux, Naomi R. *The Great Merger Movement in American Business, 1895—1904*.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Entrepreneurship, 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Economic Concentration."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03 - 434.

Livesay, Harold. *Andrew Carnegie and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5.

McCurdy, Charles W. "American Law and the Marketing Structure of the Large Corporation, 1875—18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631 - 649.

McGee, John. "Predatory Price Cutting: The Standard Oil (N. J.) Cas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58): 137 - 169.

Mulligan, William H., Jr. "Mechanization and Work in the American Shoe Industry: Lynn, Massachusetts, 1852—188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59 - 63.

O' Brien, Anthony P. "Factory Size, Economies of Scale, and the Great Merger Wave of 1898—1902."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 (1988): 639 - 649.

Porter, Glenn. *The Rise of Big Business, 1860—1910*. New York: Crowell, 1973.

Pratt, Joseph A. "The Petroleum Industry in Transition: Antitrust and the Decline of Monopoly Control in Oil."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815 - 837.

Romer, Christina D. "The Prewar Business Cycle Reconsidered: New Estimates of Gross National Product, 1869—1908."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7 (February 1989): 1 - 37.

Rosenberg, Nathan. *Technology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98.

——. "American Technology: Imported or Indigenou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1977): 21 - 26.

Stocking, George W. "The Rule of Reason, Workable Competition, and the Legality of Trade Association Activitie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1 (4), (Summer 1954): 532 - 533.

Troesken, Werner. "Antitrust Regulation before the Sherman Act: The Break - up of the Chicago Gas Trust Compan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2 (1995): 109 - 136.

Wright, Gav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990): 651 - 668.

第 18 章　美国劳动者意识的出现

本章主题

在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的工作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移民以及人口的自然繁殖，劳动力供给增加得非常迅速。因为在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资本积累、技术以及其他生产力的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更快。实际工资上升了。但是在衰退时期的失业率和实际收入上升或下降打断了生产力的提高过程，并且非熟练工人的待遇非常低，从而从劳动者及中产阶级中产生了立法保护以及提高大多数普通工人的工资条件的需求。

阶级意识在美国从来就不像它在欧洲一样根深蒂固。然而，在美国内战后的50年内，第一个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出现了，并且劳动者逐渐具有了一定的政治影响。其结果就是，立法以及法院的判决都更多地考虑了劳动者的感受。

人口统计学变化及劳动力供给

劳动者作为有组织的团体变得越来越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简单的算术。在1860年，有一个制造业工人相应地就有三个农民；到了1910年，该比率变成一比一。而且，总人口中工人数量所占的比例也在上升，同期从33%增加到了

40%。表 18—1 表明了相对增长：在 1870—1920 年间，人口以 2.7%的比率增加，劳动力以 3.2%的比率增加。正如表 18—1 所示，移民大大增加了总人口，而对劳动力的增加甚至更多，因为移民大多数集中处于工作年龄，但是增长的主要来源还是居民和移民的自然增长。

表 18—1　　1870—1920 年人口和劳动力

年份	人口（百万人）	百分比增加（%）	全体移民（百万人）	劳动力（百万人）	百分比增加（%）
1870	39.9			12.9	
1880	50.3	26	2.8	17.4	35
1890	63.1	25	5.2	23.3	34
1900	76.1	21	3.7	29.1	25
1910	92.4	21	8.8	37.5	29
1920	106.5	15	5.7	41.6	10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Series A6，C89，and D167.

出生率和死亡率

按现代标准来衡量，生育率很高，但其趋势是下降的，正如表 18—2 所示，该表计算了自 19 世纪早期开始的人口增长趋势。每一千人的出生存活率在整个 19 世纪几乎下降了一半，从 1800 年的 55（这是对白人而言；黑人在 1860 年前的数据不可得）下降到 1900 年的 30.1。在世纪之交，美国人越来越认同有两个孩子的家庭是“正常的”家庭。[①] 这一趋势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继续，出生率小于 1900 年的一半。城市化是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因为在城市里多生一个小孩的抚养成本非常高。其他起作用的方面包括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就达到一个合意的家庭规模所需的数量而言，这减少了新生婴儿的数量）、女性就业的上升（这增加了多生小孩的机会成本）以及义务教育（这就延长了小孩在经济上依赖父母的时间）。

然而，即使有上述因素，却仍然不能充分解释生育率的下降。城市化是重要的，但在 19 世纪的农村地区，生育率也同样下降了。土地价格上升促使农民积累更多的金融储备或者持有更少的土地也许就是答案。而且，生育率在美国一般都低于欧洲（法国除外）。如果城市化和对童工的限制是解释生育率下降的关键

① Paul A. David and Warren C. Sanderson，“The Emergence of a Two-Child Norm among American Birth Controllers，”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3 (1987)：1－41.

因素，那么这就是一个令人奇怪的比较。[①] 同时，死亡率——如表 18—2 所揭示的，通过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来表示——自 19 世纪 70 年代后也开始了较长时间的下降。奇怪的是，特效的医疗也许不是一个主要的定量性因素，一直到进入 20 世纪后才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相反，死亡率下降的第一个阶段的关键原

表 18—2　　1800—1990 年出生率和预期寿命

年份	白人出生率（每千人）	黑人出生率（每千人）	出生时白人的预期寿命	出生时黑人的预期寿命
1800	55.0	na	na	na
1830	51.0	na	na	na
1850	43.3	na	38.9	na
1860	41.4	56.8	40.9	na
1870	38.3	55.2	44.1	na
1880	35.2	53.7	39.6	na
1890	31.5	48.1	45.7	na
1900	30.1	44.4	49.6	na
1910	29.2	38.5	51.9	na
1920	26.9	35.0	57.4	47.0
1930	20.6	27.5	60.8	48.5
1940	18.6	26.7	65.0	53.9
1950	23.0	33.3	69.6	60.8
1960	22.7	32.1	70.7	63.6
1970	17.4	25.1	71.7	65.2
1980	14.9	22.1	74.4	68.1
1990	15.0	23.1	76.0	70.3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2），65，76；and Michael R. Haines，"Birthrate and Mortality，" in *The Reader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History*，eds. Eric Foner and John Garraty（New York：Houghton Mifflin），104. © 1991 b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① Michael R. Haines，"American Fertility in Transition：New Estimates of Birth 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1910，" *Demography* 26（1989）：137－148；and "Western Fertility in Mid-Transition：Fertility and Nupti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elected Nations a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Journal of Family History* 15（1990）：23－48. 这些是比较高深的论文，但是细读可以提供一个人口统计学的视角，这对经济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因是公共卫生水平的提高，特别是更好的水供应以及污水处理。[①] 美国的特大城市一直以来公共卫生水平尤其不佳；但是自 19 世纪 90 年代，它们开始运营大规模的项目来提供自来水、对水进行过滤和加氯消毒、下水道系统以及公共卫生管理等服务。这些改进使得由霍乱、伤寒感冒、胃肠感染以及其他疾病导致的死亡出现了下降。

移　民

图 18—1 刻画了在经济波动的范围内移民数量的轨迹。主要的激增出现在 19 世纪 80 年代早期以及 19 世纪 90 年代晚期。在 1880—1920 年间，超过2 300 万名移民开始在美国安家。他们对劳动力市场的作用是巨大的。在 1920 年，移民占铁路工人的 33%，占铁路工头的 22%，占珠宝匠和制表匠的 33%，占警察的 17%。更一般地，移民占制造业工人的 25%，占矿工的 35%，占交通行业工人的 18%，并在其他部门的劳动力中占很大一部分。[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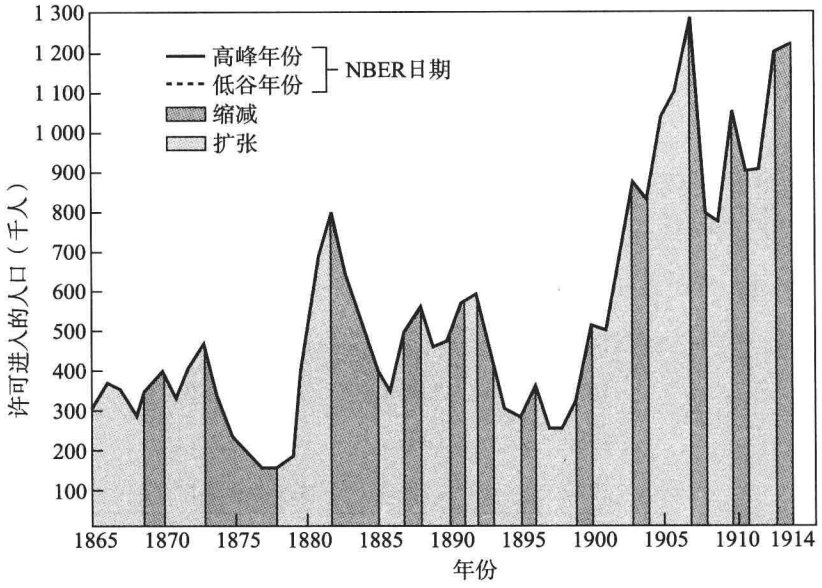


图 18—1　1865—1914 年美国的移民和经济周期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Series C88; business cycle dates from A. F. Burns and W. C. Mitchell, *Measuring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47), 78.

① Edward Meeker, "The Improving H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5,"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353 - 374; Robert Higgs, "Cycles and Trends of Mortality in 18 Large American Cities, 1871—19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6 (1979): 381 - 408; and Michael R. Haines, "Inequality and Childhood Mortality: A Comparison of England and Wales 1911,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885 - 912.

② Albert W. Niemi, Jr., *U. S. Economic History*, 2d ed.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 262.

如图 18—1 所示，移民数量在经济较好的年份增加而在经济较差的年份下降。经济活动以及就业的上升拉动移民以惊人的数量增加；当发生经济萧条以及工作岗位消失后，美国机遇对外国移民的吸引力也就减退了。移民涌入的峰值年份与严重衰退的开端相伴或者短暂落后。在 1873 年、1882 年、1892 年、1907 年以及 1914 年，移民人数达到了峰值。显而易见，由于航行线路被切断以及人们正在从事更苛刻的经济活动，移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巨大的减少。①

布林利·托马斯在 20 世纪 50 年代的工作对潜在的移民形式进行了说明。移民的流入——与国外资本的流入相伴随——有助于推动美国经济上升，并且减缓了移民来源国的增长步伐。事实上，美国经济的增长加速阶段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缓慢扩张相伴随，并且当欧洲经济增长加速时，对应的是美国经济较慢的扩张阶段。

移民、政治以及经济影响

表 18—3 显示了从 1821 年至 1920 年间，有一个在移民的来源地方面的显著转变。在 19 世纪 80 年代，来自北欧和西欧的人的涌入减少，而来自南欧和东欧的人则有一个增加的涌入。通常我们把来自大不列颠、爱尔兰、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移民称为“旧”移民，以区分那些来自匈牙利、波兰、俄罗斯、塞尔维亚、希腊以及意大利的“新”移民。在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的移民中有 80%以上来自北欧和西欧；而到了 1910 年，每年新增移民中有 80%来自南欧和东欧。1896 年被看做是一个分水岭，在那一年，每年新增移民中“新”移民占大多数。

表 18—3　　1821—1920 年移民的来源地（%）

	北欧和西欧	中欧、东欧和南欧	其他
1821—1890	82	8	10
1891—1920	25	64	11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Series C88－114.

一旦认为经济对移民来源的地理上的转变具有重要影响时，那么我们可以讲出很多故事。在文化特征上，老移民中的瑞典人和德国人不像那些曾殖民过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另一方面，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俄罗斯、意大利以及来自新地区的其他人，他们具有不同的文化习惯、不同的宗教信仰以及不一样的语言——并且他们看起来也不太一样。对于很多世纪之交时期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而

① 1860—1920 年，外国出生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率仅从 13.1%上升到 14.6%。这个异常现象的解释有多种，包括本地出生人口的增加，大萧条期间大规模的移民，或是由于数据统计的误差，把未报出生地的人口记作本地出生。

言，新移民看起来在技能、文化背景以及潜能方面都处于劣势。偏见通常是不加掩饰的。在移民峰值时期到来的移民群体被注定是低人一等的：先前一代移民中“住在简陋小屋里的爱尔兰人”和“又聋又哑的瑞典人”受到了与后来的“疯狂的从东欧来的低技术工人”一样多的轻视。20世纪的美国人紧紧抓住假设的南欧人和东欧人的“弱点”，并且把它作为排挤他们的一个依据。

新移民能够取代老移民有两方面的原因。当经济机会在英格兰、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增加的时候，对于这些国家的人们而言，美国就不再具有吸引力了。同样重要的一点是19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交通运输的快速改进。蒸汽机航船使得地中海离美国更近了，而且从东欧内陆地区到地中海海港的铁路为南欧人提供了出行工具。在美国工人所获得的经济机会——即使是非熟练工人——与在欧洲国内的农民所能得到的经济机会之间存在着无比巨大的差别。由交通障碍被移除所创造的吸出效应是不可抗拒的；铁路、蒸汽机航船公司以及美国的制造厂和美国的工厂经理们通过促进性的广告和金融资助加速了这一人口流动。

我们也许只能猜测在1880年后到达的移民是否比早期移民的劳动技能及教育水平更低。也许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结构不同，从而使得他们更难融入美国的民主和劳动队伍。不过，老移民和新移民在经济上的作用差不多是相同的。新来者，不管他们的母国是哪里，通常都是加入非熟练工人的阵容。斯洛伐克人、波兰人和意大利人在煤田和钢铁厂取代了爱尔兰人、德国人和瑞典人，并且与他们的前辈们一样，在社会阶层中处于最低的位置。

外国工人和美国劳动者

这些外国人对美国经济有什么样的影响？大量的主要移民都进入了新英格兰州、中大西洋各州、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伊利诺伊州的劳动力市场，在这些地方他们主要集中在大的工业城市。在拥挤的厂房和血汗工厂里为低工资而工作，住在不清洁的城市贫民窟内的公寓大楼里，移民使得诸如贫民窟、一般犯罪、青少年犯罪和城市腐败这样一些城市社会问题复杂化了。

对于大多数方面来说，绝大多数欧洲移民的困难并不是由在雇佣和工资方面所遭遇的歧视而导致的。在调整教育、工作经验、技能和类似因素后，本土和外国出生的工人的比较工资差不多是相等的。换句话说，不熟练的移民与在美国出生的不熟练工人挣得的工资相差不大，同样，熟练的移民与在美国出生的熟练工人挣到的工资也差不多。①

美国的商家从不熟练以及半熟练工人的无穷供给中挣得盆满钵满。把这些移民带到美国的蒸汽机航船公司以及把他们带到目的地的铁路公司是最先获利的。工厂主和矿业公司是所有商家中获利最多的：移民使得他们能够扩张生产从而为

① Martha Norby Frauendorf, “Relative Earning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me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211 - 218; Peter J. Hill, “Relative Skill and Income Level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1975): 47 - 60; and Peter R. Shergold, “Relative Skill and Income Level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rkers: A Re-examin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3 (1976): 451 - 461.

不断增长的市场提供供给。移民的涌入同时意味着美国的零售商们有了更多的顾客，更多的廉价制造品购买者，以及一个变得极其巨大的住房市场。美国的消费者们也因商品和服务供给的增加获益匪浅。

新观点

当代的问题以及历史的教训

在20世纪80年代有超过700万名移民来到了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又有近800万名移民登陆美国，大多数来自墨西哥和拉美。他们也缔造了这个移民国家的最近一次移民浪潮。今天，只有不到1%的人口是美洲印第安人。现在的居民们抱怨新移民者、他们的怪异、他们与已定居者的差别，以及更常见的，他们被认为是低人一等的。很多专家和批评人士认为，新的合法或者不合法移民并没有带来过去的欧洲移民所带来的进步，原因就在于他们拒绝融入美国社会（例如他们对双语教育的需求），不断地回到他们的原居住国，带有种族歧视。在这个问题上，第一个和第三个观点反复出现，与那些反对爱尔兰人（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意大利人以及来自其他南欧国家的移民（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头10年）时所出现的观点没什么区别。

在融入美国社会以及在融入经济时的效率上，有种看法是墨西哥人和其他拉美移民比欧洲移民的效率更低，该看法不能依赖直观印象。这一主张是一个可检验的命题，并且正如我们在经济推理命题5中所断言的，必须通过证据来接受或是拒绝假设。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詹姆斯·史密斯使用最近一个世纪的人口调查资料发现，出生于1905年至1910年间的墨西哥男性移民接受正规教育程度的平均时间是4.3年。他们的儿子辈是9.4年，他们的孙辈是12.0年。同一时期的欧洲移民从一开始就接受近9年的较高程度的正规教育，他们的孙辈是13.5年。拉美男性移民在1900年前后的薪水大约是本土白人男性薪水的55%，但是他们的孙辈挣得的薪水是白人男性薪水的近90%。在大多数方面，拉美移民与早期的不管是爱尔兰移民、意大利移民还是东欧或南欧移民具有了同样形式的经历。

然而，非熟练工人供给的快速增加使得大量工人不能尽快地提高其工资水平。结果是一些已经定型的美国工人，由于不能脱离非熟练工人的阵营，遭受了相反的影响。参见经济透视18.1。但是管理工作以及熟练工作都给予了本土的美国白人，而且在大量不熟练的新移民增加的同时，这些可获得的好工作的数量也在增加。正如威廉·桑德斯特罗姆已证明过的，到世纪之交时，美国厂商井井有条地招募和培训现有的雇员去获得更高级更熟练的岗位。提升的阶梯是常见的，尤其是在大型企业中。[①] 而且，从事设备制作工作的工匠的工资水平被用在不熟练以

① William Sundstrom, "Internal Labor Markets before World War I: On the Job Training and Employee Promo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5 (1988): 424-445.

及半熟练的多数工人身上，而工资毫无疑问是上升了。就作为也许是由廉价劳动力生产的低价格的制造品的消费者而言，本土出生的美国工人也获利了。

经济透视 18.1 讨论了限制移民的运动。

经济透视 18.1

就供给和需求而言的移民

供给与需求模型有助于阐明移民对经济的影响。图 A 和图 B 描述了 19 世纪后期的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的劳动力市场。在图 A 中，我们假设所有的移民都是不熟练劳动力，当移民改变劳动力供给曲线时，会使得 L_1 右移到 L_2，那么不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假设需求方面不发生任何变化)将从 W_1 下降到 W_2。区域 b 衡量了在现有的劳动力供给下的收入(工资率的变化乘以劳动力数量)损失。如果这些减少的劳动力数量转换成生产的其他要素(土地和资本的所有者和熟练劳动力)，并且当总产出以 $e+d$ 的数量增加时，损失所占的份额进一步以 d 的数量扩大。

有没有逃脱移民降低了现有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这一逻辑的办法呢？图 B 表明了一种可能。如果熟练劳动力是不熟练劳动力的补充，那么不熟练移民流入劳动力市场实际上提高了对熟练劳动力的需求（需求从 D_1 向右移动到 D_2）。正如图 B 所推导出的，这种效应使得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从 W_3 上升到 W_4，与由于移民导致的不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的减少相反。然而，当不熟练劳动力是熟练劳动力的替代时，就会产生一个相反的工资影响。也许很多熟练和不熟练的工人都反对移民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假设了在生产过程中熟练劳动力和不熟练劳动力是相互替代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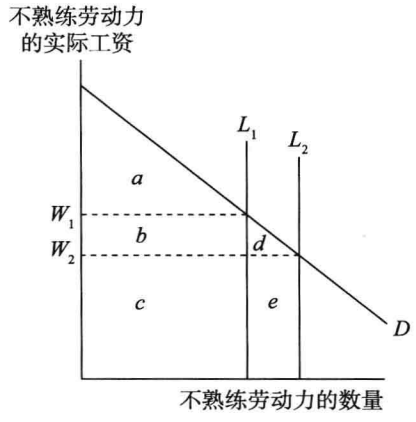


图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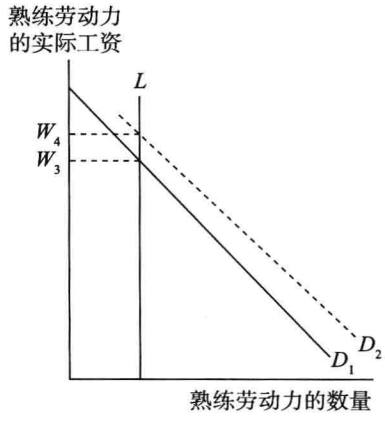


图 B

战后时期工人的收益

工作时间和工资

除了在劳动力供给方面的快速增长外，美国工人在美国内战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间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在1860年非农业雇员中，工人平均每天的工作小时数接近10.8小时。在1890年，制造业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小时，而且人们通常一星期工作6天。[①] 建筑业中的熟练工匠在1860年每天工作10小时，在1890年，平均每天也许不多于9.5小时。另一方面，在1890年的新英格兰以外的纺织厂，每天工作12～14小时的情况仍然很常见，并且在钢铁厂、造纸厂以及酿酒厂仍然停留在每天12小时，每周工作7天。

视角 18.1

移民限制

从美国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在移民限制这一问题上始终如一地存在着反对者与提倡者之间的争论。在1864年，因为美国内战造成了劳动力短缺，在制造商利益团体的要求之下，国会通过了《劳动合同法》。该项新法律认可在国外制定的引进外国工人的合同，并且允许设立美国移民公司作为美国商人的代理机构。《劳动合同法》在带来劳工方面具有实际影响，但是这些劳工的地位与受契约束缚的契约奴并没有明显的差别，他们的交通成本将用他们在美国挣得的收入来清偿。然而，这是一部失败的法律，它在1868年被废除了。很少有欧洲人会自愿履行这一合同；越洋的交通成本不再是高不可攀了，并且很多签约的人在很早的时候就离开了他们的雇主。雇佣劳动者有效地争取到了对《劳动合同法》的废除，并且继续为争取对移民的额外限制而斗争。

首先感受到移民限制运动的影响的是中国人。他们对所处的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位于西海岸，从1850年到1882年有近30万中国人来到了那里。由于需要支付的长距离交通费用是他们年工资的四倍，很多中国人负债而来。6家由中国人所有以及由中国人控制的巨大公司持有绝大多数债务的索偿权并且可以使用和出租移民劳动力，有计划地从移民的工资中收取以确保清偿。这些中国移民通常在

① Clarence D. Long, *Wages and Earning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0—1890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尤其是3～12页和109～118页。

监督清偿债务的工头的领导下采取团体式的劳动（例如建设铁路）。这六家公司已经与轮船公司达成一致，即使工人离开了团体，如果没有来自公司的宣告他清偿债务的证明书，轮船公司也不会向任何移民出售返程船票。这些公司可能会采取联合抵制行动从而使得处理移民来回船费的轮船公司的所有者与这些公司达成妥协。在这种情形下，仅仅是缺少实际的服务契约期限，但是并不存在合约或是交换。这些非正式但是谨慎控制的解决办法是合法的，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将自由和起作用的施压相结合。①

特别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其他劳工，担心并且鄙视来自这些廉价劳动力的竞争，并且劳动者团体［Workingman's Party，也被称为“沙滩捕鲨人”（sand lotters）］提出排除所有亚洲人。由于1882年《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移民限制赢得了第一个胜利，并且这一法案使得中国工人来到美国的独特体系终止了。因为他们的第一个主要的努力就取得了成功，限制论者施压要规定任何不能读或写英文的移民为不合法的移民。这样的立法要求移民必须通过国会认可的读写能力测试，但是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以及继任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否决了它们。多年以来，劳动力不得不满足于对无限制移民原则的逐步削减。在后来的立法中，对于患有疾病的移民、无业游民以及无政府主义者施加了更进一步的限制。在1917年，国会最后通过了一个读写能力要求——此时越过了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否决——并且自由移民美国的持久障碍在1920年正式建立起来。

到了1910年，在所有工厂里标准的工作周是55小时；在1920年，它已经降到了50小时。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标准工作周包含5天的9小时工作日以及星期六上午的4～5小时。高技能的行业再一次获益更多，在1920年获得了40小时的工作周。另一方面，不熟练的劳动者依旧是9小时的工作日，每星期工作6天，并且在金属冶炼行业仍然保持着每天工作12小时的规定。

在制造业的每日工资以及年度工资在1860—1890年间大约增加了50%。在美国内战期间价格上升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实际工资在1860—1865年间大幅下降。但是从那时起，生活成本降低了，虽然并不稳定但却是持续的，最终使得美元恢复到战前的购买力。因此，实际工资和收入在1860—1890年间都增加了大约50%。② 制造业的日工资从1860年刚超过1美元上升到了1890年的1.50美元，并且年收入从1860年的略少于300美元增加到了1890年的超过425美元。在建筑业，实际工资和实际收入上升得更多，也许增加了约60%。如果我们再把工作周大约缩短了7%这一方面加以考虑，在这30年的时期内，小时货币或者实际工资上的净增长率大约是60%，或者是按每年1.6%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在1860年和1890年，行业之间的工资差别非常大：工资最高的行业支付的工资大约是行业最低工资的两倍。这些差别反映了技能上的差别以及工

---

① 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生动描述，参见 Patricia Cloud and David W. Galenson, “Chinese Immigration and Contract Labor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4 (1987): 22-42。

② 这里及此段中提到的其他平均工资的数据来自 Long, 1960, 109。

作协议和工作条件上的差别。例如，烟煤矿工们比其他行业的工人挣得更高的小时工资，这是为了对其在开采时遭遇的危险以及不合意的工作条件进行补偿。①

在1890年以后的年代里，实际工资继续向上攀升。制造业工人的真实所得在1890—1914年间上升了37%（1.3%的年复利率）。② 他们在战争期间得到了更多的收益，因此在1891—1920年间的总体年度增长率仅略小于前30年所取得的。

图18—2总结了在美国内战后由工业、农业以及服务业的生产率的增长所推动的非农业工人的平均实际收入的增长。始于1870年的序列假设劳动者工作一整年；而始于1900年的序列考虑了失业率。因为上述原因，后一序列更清晰地反映了商业周期的影响。但是即使如此，1900年前的序列由于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严重衰退而变得非常陡峭。要牢记的是，这些平均水平是就所有非农业工人而言的，其中隐藏了非熟练工人在一个不断被新增移民扩充的市场中参与竞争时所遭遇的困难。

© CULVER PICTURES

拥挤不堪的船只把上百万的工人送往美国，通常签订的合约里规定，在到达美国后被雇用的第一年里不会加薪。

① Price V. Fishback, *Soft Coal, Hard Choic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chapter 6.

② Albert Rees, *Real Wages in Manufacturing, 1890—1914*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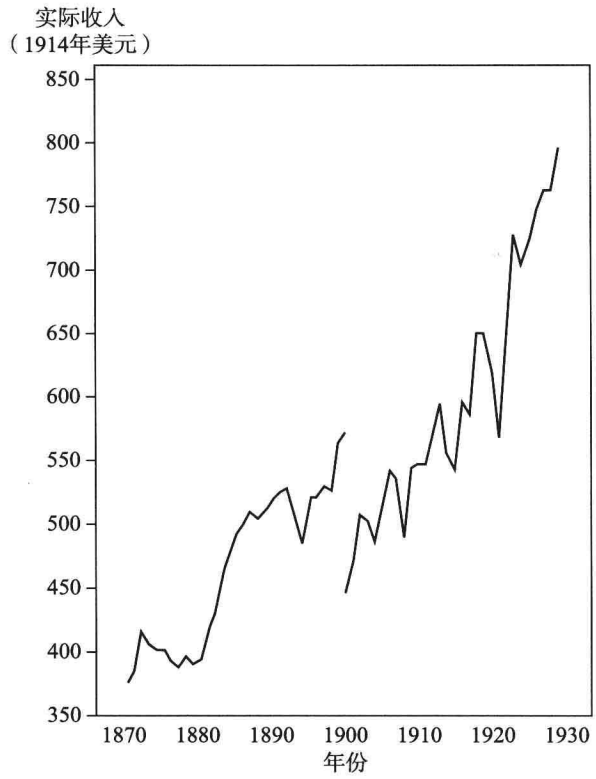


图 18—2　非农业雇员的实际收入

资料来源：Stanley Lebergott，*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New York：McGraw-Hill，1964），524.

妇女与儿童

在这一时期，女性在社会和劳动群体中的角色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将近19世纪中叶时，许多州相继通过了给予女性对财产具有更清晰的所有权的法律、经商的权利、收入保障的权利以及对专利和智力财富的财产权。正如佐里纳·卡恩对19世纪女性的专利和商业活动的研究所表明的，美国女性非常积极地应对法律和制度变革，而这也引发了她们的创造性以及商业和市场实践。[①] 在1880年，占劳动群体15%的250万名女性在家庭之外工作。而在1900年时，占劳动群体18%的530万名女性在家庭之外工作。到了1920年，有850万名女性，或者说有偿雇佣人数的1/15，从事某项工作而不是做家务。

① Zorina Kahn，"Married Women's Property Laws and Female Commercial Activity：Evidence from United States Patent Records 179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1996）：356－388.

在城市商店里的销售工作以及专业化的工作，尤其是教学，成了对家庭服务非常有吸引力的替代。在美国内战后很快就被引入的打字机，引领了一场在19世纪90年代才扎根的办公室革命。到了20世纪之交，打字机以及其他办公室设备为年轻女性创造了一个主要的就业市场。正如埃利斯·罗泰拉（Elyce Rotella）所表明的，文职工作人员作为非农业工人群体的一部分，其比例由1870年的1.2%增长到1920年的9.2%，然而在这50年内，女性文职工作人员在所有文职工作人员中所占的比例由2.5%上升到49.2%。①

然而，劳动岗位仍然以性别区分。女性被局限在周而复始的文职工作中，而私人秘书以及其他可以做出决定的工作岗位仍然属于男人的领域。（这一新的文职工作同样也有种族歧视：黑人女性很少被雇用。）对劳动岗位的性别隔离维护了工业化劳动力的社会规范。女帽制造商（制帽人）通常是女性，然而肉类加工人员通常都是男性；在棉纺织业里，工厂里大约50%的从业人员都是女性，卷轴工（其工作是把线从线轴中拉出来再缠绕在线轴上面）几乎都是女性。劳动群体的性别隔离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男性和女性之间在经济上的差别：女性对劳动群体的忠诚通常都少于男性的，因此，有些不想对很快就会离开工作岗位的人进行培训投资的企业发现，把男性和女性区别对待是方便可行的，即使它们这样做将会犯错。但是性别和种族歧视的主要来源是强有力的社会规范，它主导了女性和黑人的工作机会。

然而，这些社会规范由于经济上的势力以及政治上的反对日益被侵蚀。例如，打字和销售工作，即使它们把女性局限在劳动岗位中的次要部门，它们仍然改变了对于女性角色的传统看法。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深远地动摇了隔离雇佣背后的潜在观念：急切地雇用女性，把她们作为那些为战争服务的男性的替代，雇主们发现女性与男性一样能令人满意地从事很多方面的工作，并且在某些工作中她们的表现优于男性。然而，还是得需要半个世纪的时间，对从业人员进行性别隔离的观念才终于开始大规模地被粉碎。

为女性设定最长工作小时数和最低工资的条例到1920年才很常见。这部分是由对女性工作的实体环境、对她们的健康所受影响和对她们照顾小孩的能力日益增加的关注而激起的。条例也获得了来自工会领导们的支持，他们认为对女性能够工作的时间进行约束将会约束其与男性工人的竞争，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将约束男性工人的工作时数，因为他们的工作与女性工人的工作互为补充。实际上，实证研究揭示了对女性进行工资和小时限制在约束男性和女性的工作时数上都起到了作用。而且，这种约束对女性就业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很少有雇主仅仅因为女性的时间受到监管而决定不雇用她们。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数年中，对童工问题的关注迅猛增加。在1880年，100万个年龄介于10岁到15岁之间的男孩和女孩被“获利甚丰地雇用”，并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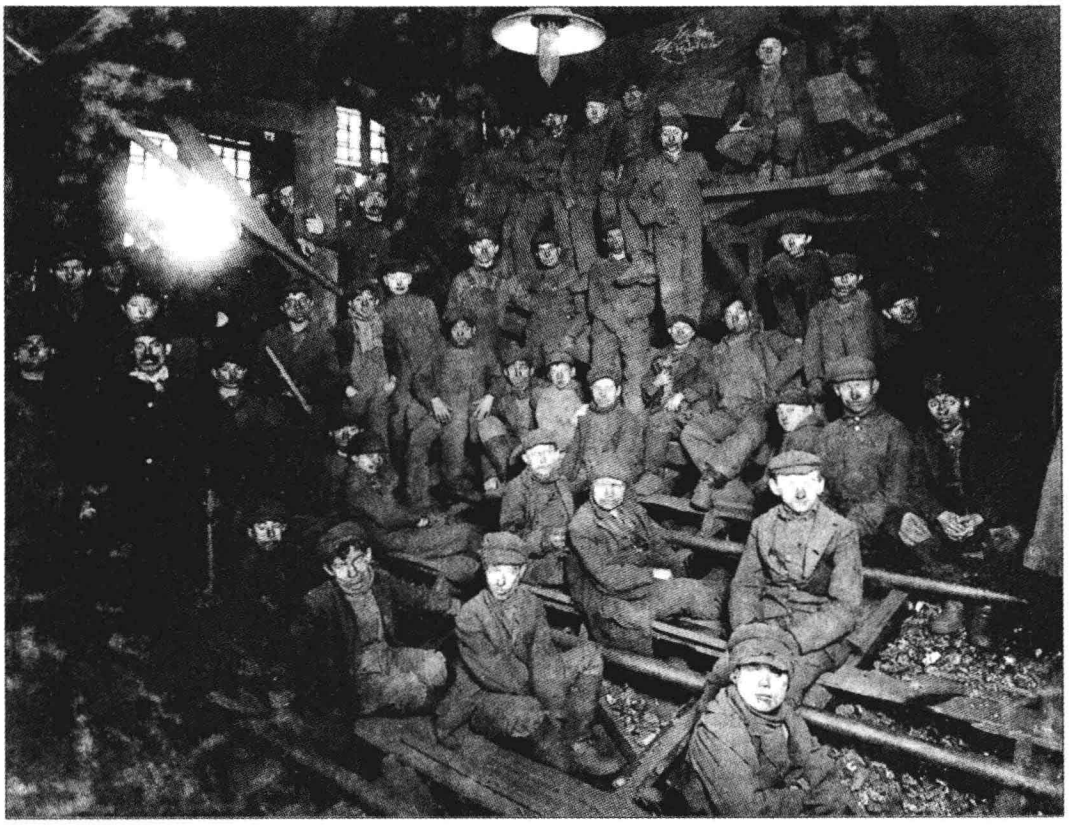
① Elyce J. Rotella,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Office: Changes in Employment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52.

②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95 - 199.

在1886年，由于需求有限以及财政上的困难，迫使菲洛·雷明顿出售了其打字机公司。到了1890年，打字机的生意日趋繁荣，打字机成为办公室的标志并把大量女性带入有偿劳动力市场。

且到191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将近200万。在1910年，年龄介于10岁到15岁之间的所有年轻人中，有1/5的人拥有工作，并且他们构成了劳动力大军的5.2%。但是在1920年，这一劳动力市场中全部被雇用的人数再一次少于100万；儿童只占全部从业人员的2.6%，并且在年龄介于10岁到15岁之间的年轻人中，只有1/12的人在工作。确实，除了在农村地区，正从事工作的儿童所占的比例总是很小的，而且在美国的这一数字可能低于其他工业国家。但是，以现代标准来看儿童的工作条件，有时是不安全的，而且是很残酷的。

童工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宣传，包括宗教团体和贸易联合会，这些宣传致力于在州范围内为童工获取立法保护。马萨诸塞在一段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儿童劳动立法无效，直到1903年，才出现了第一个严厉的州立管理条例，在那一年伊利诺伊州通过了一项法令，把儿童的劳动时间限定为每天8小时。限定工作时间的州立法、要求最低工资以及设定年龄限制到1920年变得很常见，但是在有些州，诸如在棉花带区域和中南部及西部的一些工业化州，亟须更多的保护。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州内，反对使用童工的斗争间接通过提高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来进行。宣布童工为不合法的联邦立法在1916年得以通过，但是



FROM THE COLLECTIONS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当引起公众的关注后，像图中 20 世纪之交时宾夕法尼亚年轻的拣矸工的恶劣的工作条件赢得了中产阶级对劳动者工作条件的关注和同情。

最高法院驳回了它，坚持认为联邦政府无权管理一州内部的商业事务。童工不能得到联邦政府有效管理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那时最高法院进行了自我修正。

工会、雇主及冲突：1860—1914 年

在美国内战之后，地方性的工会停滞不前，直到 1872 年，其在数量上才有所增加，那时在全国范围内总计有将近 30 万名工会会员。1872 年民意调查遭受的失败减弱了工会的力量，但是一个新的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劳工骑士团在 1885 年拥有了史无前例的总计 75 万名会员。当 1886 年 5 月反对铁路的大罢工未能争取到 8 小时工作日时，会员们丧失了信念，到了 1890 年，会员人数下降到只有 10 万人。那时，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已经取得了对绝大多数工会工人的领导权。美国劳工联合会是两个联合会的合并：

美国行业组织和工会联盟（印刷工人、玻璃工人、钢铁工人、焊接工人以及烟草工人）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包括一些从劳工骑士团中脱离的全国性工会）。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塞缪尔·龚帕斯的领导下，1905 年，会员数上升到了 150 万人。

美国劳工联合会的一个一致的原则就是在每一行业内控制工作机会以及工作条件。这一原则意味着，由从事同样工作的工人组成的有组织的单位，在缺乏集体行动的时候，工人之间不得不相互竞争，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害。因此，行业工会可以足够快地对雇主施加压力。

PICTURE COLLECTION, THE BRANCH LIBRARIES, THE NEW YORK PUBLIC LIBRARY, ASTOR, LENOX, AND TILDEN FOUNDATIONS

这些罢工纠察员能够将劳动立法的日程生动地表达出来。

同样值得强调的是，没有严格而持久的斗争，就不会有劳动者组织的胜利，到 1920 年在这一点上仍然没有答案。虽然在 19 世纪后期罢工很频繁，但仍未被合法化，并且罢工也并不总是受了工会的煽动。有时罢工的爆发仅仅是无组织工人的自发反应，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获得胜利的罢工导致了工会的形成。无论如何，得到了中产阶级的舆论以及政府当局支持的雇主持有这样的观点：当工会的力量增强的时候，他们的权利以及私有财产制度将遭受打击。

管理者和劳动者之间最具暴力的冲突发生在 19 世纪的最后 25 年内。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经济衰退的那几年内，当罢工被用武力镇压时，工人们付出了血的代价。这一系列冲突的顶点是在 1877 年，混乱的顶点始于匹兹堡的铁路罢工并且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罢工。在宾夕法尼亚的无烟煤地区，一个被称为“莫利社”（Molly Maguires）（以爱尔兰反地主组织的领导者的名字命名）的爱尔兰裔美国人的秘密组织，因为无数的谋杀以及其他暴行而遭到谴责。他们做过什么

以及他们没做过什么，到现在仍然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在经过法庭审判之后，他们的实力最终被瓦解了，这一次审判依据平克顿的代理人所提供的口供，他宣称已经潜入该组织，最终法庭判决了 20 个男人死刑。①

© CULVER PICTURES

劳动者的领导权最终由萨缪尔·龚帕斯执掌，他是 1881 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第一任主席。

暴行不仅是单方面存在。劳工经常不得不避开收费的暗杀团、州国家卫队以及联邦部队的人身攻击。看起来好像是被故意地在时间上均匀隔开的三起严重的事件，是对劳工事业的最大限度的损害，成为这些重大争论的非常明显的标志。

发生在 1886 年 5 月 4 日的臭名昭著的秣市事件（Haymarket affair），是劳工骑士团为了确保能在芝加哥地区举行一场工人大罢工这一努力的悲剧性的顶点。

① 关于美国劳工运动相对缺乏激进主义的讨论，推荐阅读 Gerald Friedman，“Strike Success and Union Ideology：The United States and France，1880—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8（1988）：1－25；Sean Wilentz，“Against Exceptionalism：Class Consciousness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 Class History* 26（Fall 1984）：1－24；Werner Sombart，*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America?*（1906；1st English ed.，White Plains，1976）；Selig Perlman，*A Theory of the Labor Movement*（New York：1928）；Seymour Martin Lipset，“Radicalism or Reformism：The Sources of Working Class Prote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77（March 1983）：1－18。

一枚炸弹投向了试图驱散在秣市广场进行的大型集会的警员们，导致了几人死亡。作家们和出版社决定行动起来。有7个人，他们也许是清白的，却因谋杀而被处死。尽管惩罚的不公正在同情劳动者的人中激起了巨大的不满，反劳动者的宣传者们却把这一事件作为一个激进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通过暴力手段破坏美国制度的可怕的例子。

© BROWN BROTHERS

交战，导致了多个芝加哥工会同时罢工，与强硬的警力相接触导致了流血冲突。

6年之后，当反劳动者的情绪开始平息时，位于匹兹堡的卡耐基霍姆斯特德工厂的管理层决定驱逐钢铁工人联合会，因为它试图把农庄劳动者组织起来。罢工表面上是因为公司拒绝在工资条款上达成一致意见。亨利·弗里克，卡耐基的一个亲密的主管，带来了300名平克顿警卫兵以解散罢工和维持秩序。罢工的工人们与平克顿警卫兵展开了一场激烈战斗，俘虏了一些人，并使很多人严重受伤。州人民自卫队被召集来恢复秩序，工会遭到了失败，从而使得钢铁工厂里的劳动者组织倒退了几十年。

公众从霍姆斯特德这一幕中产生的不利看法由于1894年普尔曼罢工事件(Pullman Strike of 1894)而加剧了。尽管普尔曼大罢工是由性情温和的尤金·V·德贝斯领导的，它实际上并不拥护社会主义信条，冲突应该归因于其他激进领导人的非美国化的观念。骚乱在整个芝加哥地区蔓延，而且在有望恢复平静之前，即联邦军队以借口保护美国邮政为名被派遣的时间，很多人被杀害了或是受伤。劳工问题的严重程度又一次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事件，同时也成为人们不合理的反对劳工事业的理由。另一方面，普尔曼大罢工可以看做是对保守的工会领导人的一个警告，暴力只会扰乱工会并且会损害它们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而且，对德贝斯以及其他劳工领导人做出终身监禁决定的电文认为，判决他们终身监禁是因为其轻率的行动，他们不遵守法庭做出的反对鼓励工会成员参加罢工的禁止

令，这一事件可以看做是一个使人清醒的重击。任何长期策略都将不得不致力于抚慰选民以及在法庭中强化劳动者的位置。退一步讲，1920 年前在这两方面的成功是非常有限的。

始于 1902 年，雇主改变了他们的策略。他们开始了向美国人出售开放商店的利润的重要运动——针对雇主、工人和公众。为了使得他们的宣传深入人心，他们成立了一些组织机构。最突出的是全国制造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和美国反抵制联合会（American Antiboycott Association），两者都获得了来自雇主贸易联合会的物质支持。同样有效的是雇主们的努力，甚至保守的劳动者领导们都体会到了日益增加的来自雇主们联合起来反击的压力。

作为回应，塞缪尔·龚帕斯和其他人通过教育与宣传的手段对雇主们发起反击。与国家公民联盟（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一个包括富有的东部资本家、公司管理人员、编辑、专业人士以及劳工代表的联合会）一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们寻求从选民中获取一个更满意的态度。国家公民联盟为调和与安抚争论保留了一个部门，努力确保集体性讨价还价决议能被更广泛地接受，并且鼓吹一个信条，即劳动者最大的责任就是更少的失业以及为了所有人有更好的生活。很难说清楚国家公民联盟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好影响。但毫无疑问的是，它在抵消雇主们有组织的努力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或许这个联盟在一定时期诱使具有工作责任心的工会分子成为超保守主义者，而就当时而言，社会正呼唤很多激进的政策。无论如何，雇主的核心地位几乎与以前一样牢固，尤其是对于中西部的实业家而言，更是如此。

然而，美国的工会活动，特别是当把它与在欧洲的劳动者的活动进行对比时，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政治性的，至少就全国范围而言是这样。从来就没有过作为政治实体出现的国家劳动党，而且工会很少与全国性的议题联合在一起。相反，主要的对抗都处于政治场所之外而且对抗压倒性地是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对抗。也许，就因为这一点，美国的罢工在时间上长于欧洲的罢工，即使它没有获得法律的许可。①

工会化与法庭

到 19 世纪末的时候，劳动工会存在的权利已经确立了；然而雇主强迫雇员进入反工会合约的权利在这一时期快要结束的时候仍然得到维护。正因为这样，很多雇主把保持非工会会员身份作为雇用的条件。例如，在科佩奇诉堪萨斯（Coppage v. Kansas，1912）一案中，法庭撤销了一部已通过的宣布反工会合同为非法的州法律——在那时被工人称为“灰狗合同”（yellow-dog contracts）。科佩奇，一位铁路雇员，因为拒绝从一家工会退出而被解雇了。因为他的退出将会使他失去

① 对美国罢工历史特征的分析，参见 P. K. Edwards，*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New York：St. Martin's，1981）。

在工会的 1 500 美元的保险福利，堪萨斯州最高法院认为该法规可保护他免于受到强迫，而且是有效的。但是合众国最高法院撤销了这一裁决，认为雇主具有宪法赋予的从雇员那里获得一个反工会合同的权利；法庭认为，一部法令违反了这一权利，就触犯了宪法第 14 修订案，因为它削减了雇主选择合约的自由。

最晚到 1917 年，合众国最高法院决定，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反工会合约，借助于一个法庭发布的强制令能够得到保护。在赢得了一场罢工的胜利后，希克曼煤炭公司（Hitchman Coal and Coke Company）已经雇用了黑人矿工，条件是当他们受雇于公司的时候，他们不能成为美国矿工联合会（United Mine Workers）的会员。后来，工会组织者尽力去说服矿工答应在一定的时间之后，他们将会重新加入工会。在一家美国地区法庭上，公司请求并且获得了一项强制令，禁止在组织工会上花费更多的努力。最高法院认同了这一裁决，认为即使矿工仍然没有加入工会，但他们可能正被组织者引诱去中断与雇主的合同，由此雇主有权获得强制令保护。

州和联邦政府通常是坚定地站在资方一边反对劳动工会。召集部队去中止罢工被认为是合法地使用警力。这些行为都得到州和联邦法庭的容许，它们被证明是管理者尽力镇压代表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的无价盟友。强制令作为用来约束工会活动的工具特别有效。雇主可以走进法庭，依法制止劳工领导人号召或继续一次罢工。不遵守强制令的后果意味着触犯法律者的牢狱之灾，而且“通过强制令管理”被证明是反工会兵工厂中最强有力的武器之一。

劳动者收益与工会

在 1920 年，美国的工厂工人能够看到在过去的 66 年里有了大量的改进。实际工资上升了，工作时数缩短了，而且劳动者、儿童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女性都受到了法律的保护。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日益被广泛地讨论，而且明晰立法的胜利者们已经赢得了减少由工业事故造成的困难的斗争。另外，所有类型的城市居民都目睹了巨大的改进，它带来了死亡率方面急剧的长时期下降。

这些收益中究竟有多少应该归因于劳工运动呢？很明显，工会具有的控制劳动力供给的能力，并由此控制工作条件以及期限的能力在从美国内战到大萧条的整个时期是有限的，因为劳工运动无能力组织起更大一部分的就业人员，尽管他们付出了英勇的努力。表 18—4 给出了关键的数字。在 1886 年工会已经组织了大约 8%的非农业劳动人员，达到了 19 世纪的峰值。即使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峰值，工会也只能号召 17%的非农业劳动人员。因此，工会很难直接去提高实际工资的平均水平或是提高通常的工作条件。工会能够提高工会化部门的工资；但是通过约束这些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在非工会化部门内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以及更低的工资水平，使得工会获得了不合意的结果。

表 18—4　　选择年份的工会成员

年份	所有工会成员（千人）	工会成员占劳动力的百分比（%）	工会成员占非农劳动力的百分比（%）
1860	5	0.1	n. a.
1870	300	2.4	4.6
1880	50	0.3	0.5
1886	1 010	4.8	8.2
1890	325	1.4	2.3
1900	791	2.8	4.7
1905	1 918	5.9	9.3
1910	2 116	5.8	8.6
1917	2 976	7.4	10.0
1920	5 034	12.2	16.7
1929	3 625	7.6	9.7

资料来源：Stanley Lebergott，"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d. Lance E. Davis et al.（New York：Harper & Row，1963），220；and *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Series D4，D7，D8，D12，D17，D940，D943.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工会能够对它们的会员宣称具有其他的一些重要收益。因为直接的所有者管理减少以及管理变得非个人化，工头的权力增加了。工会有助于抵消和减少雇佣和解雇中的独断专行，以及通过人性化的管理抵消和减少其他残酷的条例。另外，有些特别强势的工会为它们的会员争取到了大量的工资差额。例如，在含沥青煤（浅煤）的行业中，会员获得了大量的工资差额，在这一行业里会员工人所得的工资大约高于非会员工人工资的 40%。[①] 虽然对于大多数非熟练工人来说，工会会员的工资仅比非工会会员高出一点点，也许是几个百分点。

最后，在政治系统中，工会已经成为代表劳动者的重要力量。劳动节从 1894 年起开始作为国家法定节日进行庆祝；在 1913 年，内阁层次的地位给予了劳动部。劳动者不断增长的政治权利的一个体现就是，在对因工作受伤的工人进行补偿方面的管理规则上的变化。历史上，被受伤的工人起诉的雇主有三个法律辩护理由：（1）工人已经了解并且接受风险；（2）工人不够谨慎；（3）工人受伤

① H. G. Lewis，*Unionism and Relative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3）.

是因为他同事的疏忽。[①] 在1910—1930年间，劳动者赢得了在州立法中清除这些保护的变化，很明显这是经济推理命题4的一个实例：规则很重要。最后，保险体系最终得以确立；雇主和雇员都对补偿受伤工人的公积金（common pool）做出了贡献。结果使受伤工人获得了更多的补偿。但是，正如普赖斯·菲什巴克已经指出的，负作用通常不同于预期的效果。一直以来寄希望于雇主来获取更安全的工作岗位，而且实际上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在开采含沥青的煤这一工作中致死事故的比率上升了，因为工人具有更少的激励去避免风险，同时也因为雇主发现支付额外的索赔比尽力减少事故发生率更为廉价。

有组织的劳动者支持满意的立法的力量注定是要成长的，并且我们也会看到，它在大萧条时期有所收获。然而，就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者而言，把劳动者在19世纪所取得的进步更多地归功于经济增长和生产率上升，而不是更多地归结于工会的力量，这种做法是公平的。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etween a Rock and a Hard Place: A History of American Sweatshops, 1820—Present." A virtual exhibit created by the Smithsonian Institute. http://americanhistory.si.edu/sweatshops.

Bernstein, Irving. *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20—1933.*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0.

Brody, David. *Steelworkers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Labor in Crisis: The Steel Strike of 1919.* 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65.

Carlson, Leonard A. "Labor Supply, the Acquisition of Skills and the Location of Southern Textile Mills, 188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65-71.

Commons, John R., et al. *History of Labour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Kelly, 1921.

Dubofsky, Melvyn. *Industrialism and the American Worker, 1865—1920.* Arlington Heights, Ill.: Harlan Davidson, 1975.

Dunlevy, James A., and Henry A. Gemery.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he Responses of the 'Old' and 'New' 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901-917.

Easterlin, Richard. "Economic-Demographic Interactions and Long Swings in Eco-

① 这些保护在南方各州收效甚微。实际上，南方奴隶法加速了非奴意外伤害法律的演化，在奴隶制下，当向他人租用的奴隶受伤时，须赔偿雇主，这种制度早已在南方法庭确立。参见Jenny B. Wahl, "The Bondsman's Burd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Jurisprudence of Slaves and Common Carrier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1993): 495-526。

nomic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1063 - 1104.

——. *Population, Labor Force, and Long Swings in Economic Growth: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

——. "Population."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 "Population Issues i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Survey and Critique."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ed. Robert Gallman. Greenwich, Conn.: JAI, 1977, supplement.

Erickson, Charlotte. *American Industry and the European Immigrant 1860—1885*. New York: Russell & Russell, 1967.

Ermisch, John, and Thomas Weiss. "The Impact of the Rural Market on the Growth of the Urban Workforce, U. S., 1870—19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Winter 1973—1974): 137 - 154.

Fishback, Price V. "Workplace Safety during the Progressive Era: Fatal Accidents in Bituminous Coal Mining."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3 (1986): 269 - 298.

——. *Soft Coal, Hard Choices: The Economic Welfare of Bituminous Coal Miners, 1890—193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Frauendorf, Martha Norby. "Relative Earning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me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211 - 220.

Galloway, Lowell, and Richard Vedder. "E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Kingdom to the United States, 1860—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 (1971): 885 - 897.

——. "Population Transfers and the Post-Bellum Adjustments to Economic Dislocation, 1870—192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143 - 150.

Galloway, Lowell, Richard Vedder, and Vishwa Shukla.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Immigrant Popu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conomic Analy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1974): 213 - 226.

Goldin, Claudia. "The Work and Wages of Single Women, 1870—192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81 - 88.

——.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Gompers, Samuel. Papers at http://www.inform.umd.edu/EdRes/Colleges/ARHU/ Depts/History/Gompers/web1.html.

Grob, Gerald. *Workers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Ideological Conflict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865—1900*. New York: Quadrangle Books, 1969.

Harber, Samuel. *Efficiency and Uplift: Scientific Management in the Progressive Era, 1890—192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4.

Higgs, Robert. "Race, Skills and Earnings: American Immigrants in 190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1 (1971): 420 - 428.

——. "Mortality and Rural America, 1870—192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1973): 177 - 196.

——. "Landless by Law: Japanese Immigrants in California Agriculture to 194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205 - 225.

——. "Cycles and Trends of Mortality in 18 Large American Cities, 1871—190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6 (1979): 381 - 408.

Hill, Peter. "Relative Skill and Income Levels of Native and Foreign-Bor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1975): 47 -60.

Jenks, Jeremiah, and Jeff Lauck. *The Immigration Problem*. New York: Funk & Wagnalls, 1926.

Jerome, Harry. *Mi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26.

Kirk, Gordon W., and Carolyn J. Kirk. "The Immigrant, Economic Opportunity, and Type of Settlement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8 (1978): 226 - 234.

Kuznets, Simon. "Notes of the Pattern of U. 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Fogel and Stanley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Two Centuries of Economic Growth: Reflections on U. S. Experi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 (1), (1977): 1 - 14.

Kuznets, Simon, and Ernest Rubin. *Immigration and the Foreign Born*.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4.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Livesay, Harold. *Samuel Gompers and Organized Labor in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1978.

McGouldrick, Paul F., and Michael B. Tannen. "Did American Manufacturers Discriminate against Immigrants before 191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7 (1977): 723 - 746.

Margo, Robert A. "The Labor For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07 - 243.

Meeker, Edward. "The Improving Health of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4."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1972): 353 - 374.

Neal, Larry, and Paul Uselding. "Immigration, A Neglected Source of U. S. Economic Growth, 1790—1913." *Oxford Economic Papers* 24 (1), 2d series, (March 1972).

Nelson, Daniel. *Managers and Workers: the Origins of the New Factory System*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0—1920.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5.

——. *Frederick W. Taylor and Scientific Management*.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0.

Nevins, Allan, and Frank Hill. *Ford: The Times, the Men, and the Company*. New York: Scribner's, 1954.

Niemi, Albert W. "The Role of Immigration in United States Commodity Production, 1869—1929."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52 (1), (June 1971).

Rosenbloom, Joshua L. "Was There a National Labor Market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Evidence on Earnings in Manufactur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 (1996): 626 - 656.

——. "Strikebreaking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89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1998): 183 - 205.

——. "The Extent of the Labor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14."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2 (1998): 287 - 318.

Rotella, Elyce J. *From Home to Office*. Ann Arbor, Mich.: UMI Research Press, 1981.

——.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Office: Changes in Employment and Technolog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51 - 57.

Taylor, Philip. *The Distant Magnet: European E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Thomas, Brinley.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4.

Wahl, Jenny B. "The Bondsman's Burden: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Jurisprudence of Slaves and Common Carrier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3) (1993): 495 - 526.

第 19 章　战后时期的货币、价格和金融

本章主题

在美国内战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这 50 年的时间跨度里，充斥着关于美国货币体系的持续的、密集的公开争论。两个问题——滞胀和银行恐慌——使得所有其他的问题相形见绌，并且也引发了改革货币体系的不断尝试。

在美国内战之后，滞胀开始出现，并且除了其中短暂的间断之外，持续了 30 年。债务人忍受着这一似乎永无尽头的滞胀，尤其是农民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正如 19 世纪 80 年代流行的一首民歌所描绘的："农民是这样的人，在秋天到来之前一直靠举债度日，因为利率是如此的高，同时，由于抵押人除了他自己之外一无所有，这就很让人奇怪为什么他仍然能活在这个世界上。"① 农民和其他债务人直言不讳地表达他们对于滞胀的不满并且支持许多通货膨胀式的计划。然而，很多美国人已经从革命年代和内战时的高通货膨胀中获得了足够多的教训，并且他们不会这么快就忘记。政治界与金融界的领导们坚持"健全货币"。他们一般都能在反对利用通胀来改革货币体系方面获得成功。

这是个典型的金本位年代。至少在一定范围内，它几乎是一个关乎一国的通货能够转换成一个固定比例的黄金的诺言的条款。包括美国在内的先进的工业国都遵循这一政策。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固定汇率以及对货币的长期价值的信心。但同时

① Pete Seeger, *American Favorite Ballads* (New York: Oak, 1961), 57.

也存在成本：很难通过调整货币供给以应对价格或收入上的相反趋势。

滞胀以及对于大多数美国人而言的生活水平的上升不时地被来自银行倒闭、工厂和铁路的破产以及使上百万人失去工作的金融危机打断。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衰退尤其严重。在 1894 年 4 月，“科克西失业请愿军”（Coxey's Army）到达了华盛顿，请求联邦解困。它预演了这个国家不一样的未来，其中有一点就是：政府给失业者提供直接的援助。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衰退之后紧接着就是价格开始上升，但是不幸的是在 1907 年，又一次出现了银行恐慌。

尽管金融体系方面的问题可以很容易地确认，但是要在解决方案上达成一致却异常艰难。特殊利益集团使用即时可用的每一种方法去预先阻止变化或是迫使它朝向他们自己满意的方向发展。例如，白银制造商活跃在反滞胀浪潮的前沿阵地，并且帮助指导它的过程。由于国家银行家们的游说导致出现了数千家独立的地方银行，因此使得这个容易遭受银行恐慌侵害的体系持久化。

这些法律的限制对那些渴求金融资本的工业企业的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质上是股票和债券的专业经纪机构，投资银行开始填补这一空白并且在美国的金融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情况与英国的情况很不一样，在英国大型的银行业联合企业由于被允许变得更大，从而就可以满足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绝大多数的金融需求。

到 1913 年年底，虽然在利益集团中也存在着冲突，合众国基于与它早期的形式不太一样的协议又一次拥有了一家中央银行。这些被编进了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签署的《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然而，正如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将证明的，联邦储备体系并非对国家从滞胀和恐慌中辛苦获得的教训万无一失的解答。

新形式的通货

在美国内战之前，流通中所需的货币数量取决于通过对外贸易流入和流出这个国家的铸币（金属形式的货币）以及来自美国开采的金属的流量。到了 1862 年，黄金如此快地流出这个国家以至于政府和银行被迫延迟对金币的支付。自从 1834 年《货币法案》之后曾经在铸币厂被低估的白银，几乎没有流通过。[①]

因为并未从美国财政部债券（至少在政府愿意支付的利息率上）的销售中获得发动战争的大量收益，财政部在 1862 年发行了一种新的不兑现货币，也就是俗称为“绿背”的美国纸币。而且，在 1863 年《国家银行法》（National Bank Act of 1863）中得以通过，从而创造了一套新的银行制度（国家银行）以及另一种新的货币（国家银行票据）。在图 19—1 中显示了新纸币巨大的发行量，并且在图 19—2 中表明了其结果，在美国内战的年份内价格上升的势头尤其迅猛。绿背、

① 造币厂为银转换为纸币定价，如果银在金条市场能卖得更高的价钱，造币厂就低估了银价。参见第 12 章的讨论。

国家银行券以及银币和金币或者金银元券，加上小的辅币，就构成了货币全体。然而，正如在图 19—1 中所表明的，在货币中增加绿背的供给使得价格在美国内战期间急剧上升。稍后的黄金供给增加了公众日常持有的货币数量。这些类型的通货提供了货币供给的基础。然而，正如图 19—3 所表明的，总量货币供给的增加大部分是由银行存款的增加所创造的——储蓄以及通过贷款所创造的支票存款。然而，新的通货对于货币总量尤其关键，因为它组成了银行体系的储备。这些储备的增加允许银行存款的增加以及货币总量供给的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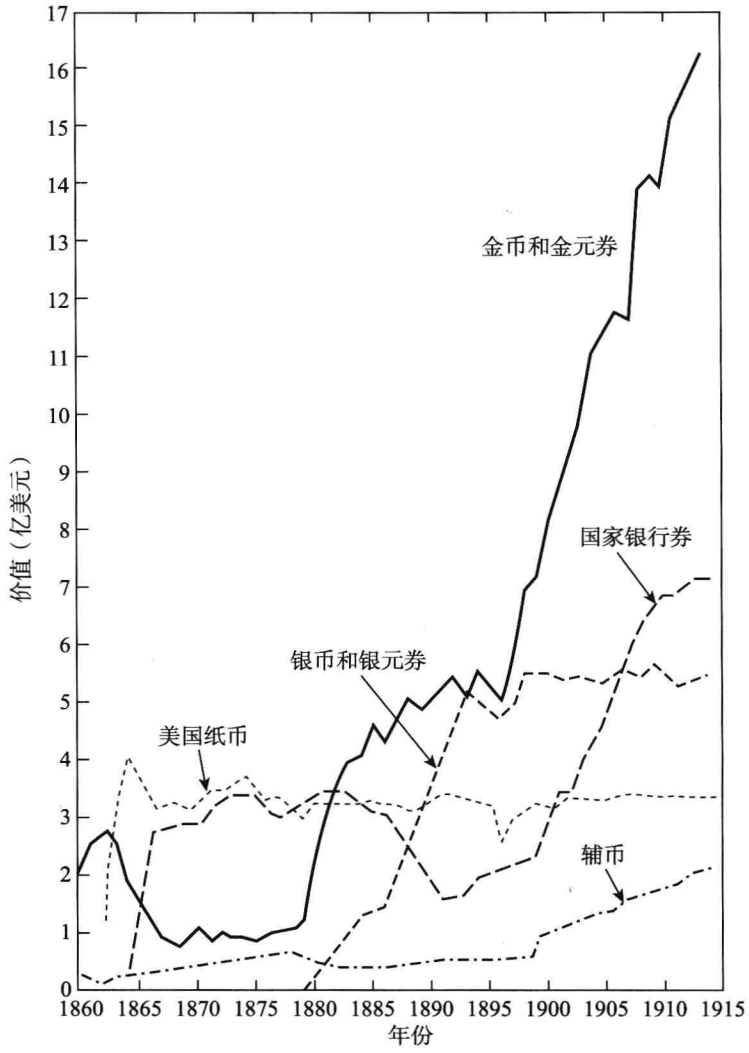


图 19—1　1860—1915 年美国货币的形式和价值

从 19 世纪 70 年代晚期到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国家的金银货币存量获得了大量增加，但仍不足以阻止通货紧缩。不过，在 1895 年以后，黄金存量增加变得更快，而通货紧缩变成了通货膨胀。

资料来源：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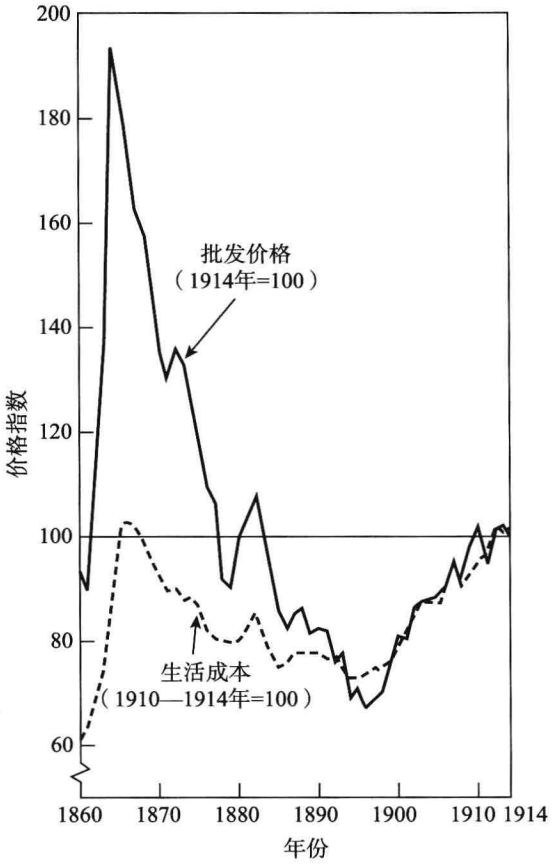


图 19—2　1860—1914 年价格

从美国内战结束到 19 世纪 90 年代，价格通常下降，然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则上升。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Series E1，101，157.

绿背解决了两个问题：在战争期间为政府提供额外收入的即时问题以及在整个国家内提供具有统一价值的货币的长期问题。在这个国家的很多州银行饱受折磨的地区，尤其是在西部，“林肯绿”（Lincoln Green）非常流行。为什么后来国会创造了国家银行体系呢？保守的共和党人担心如果使得绿背持久化，将会创造一个脆弱的对发行更多纸币的尝试的管理。因此，他们创造了一种新的制度，也就是所发行的纸币将由政府债券支撑并且在整个国家具有统一的价值，由此就解决了由绿背已经解决的同样的问题。然而，国家银行票据的发行将会落入私人手中，结果是消除了过度发行的危险。

每一家国家银行为了确保它的纸币的发行，都被要求以它实收的资本存量的美元数量的 1/3（稍后是 1/4）等值购买美国政府债券，通过这一条款没有一家银行会购买多于 5 万美元的债券。每一家银行将以美国财政部的名义存入它的债券并且将会收到纸币，这是一个在纸币上刻字的标准设计，但是发行银行的名字印在纸币的正面，并且以存入债券的票面价值或是市场价值（价值较低的那个）

的90%的数量发行。一家国家银行可以在它的资产组合上拥有任一数量政府债券，但是它的纸币未偿付债务的数量不能超过它的以美元数量衡量的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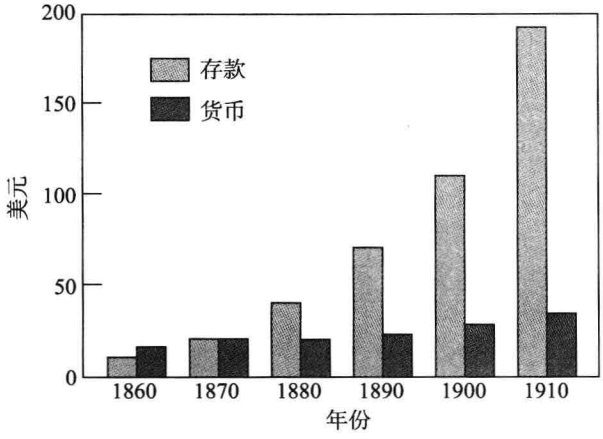


图 19—3　流通中的人均存款和货币

资料来源：Data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789—1945*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25, 262, 263, and 274.

双轨银行制度

尽管1863年《国家银行法》创立了一种新型的银行，但是它并没有取消州特许的旧的组织机构。为了使得国家银行看起来比州银行更健全，严厉的法定储备要求被强制执行，并且在国家银行的存量上采用双边流动性。

因为从州到国家化的成文法的转化的早期步伐比较迟缓，在1864年6月，针对州纸币强制征收比例为2%的税收，并且在1865年3月这一税收提高到10%的比例。之后转化的速度突飞猛进。绝大多数州银行转变成由联邦管辖；在1866年，仍然存在的州银行不到300家。

就当时而言，通常的设想是也许看起来州银行体系将会很快萎缩消亡，而这一想法被证明是出其不意地犯下了错误。银行不再需要通过发行票据才能存活；银行仅仅通过发行存款也能做得很好。而且通常来说州立银行运行的监管规则不如国家银行的监管规则繁杂。州立银行的复苏大约始于1870年。正如表19—1所示，到了1914年，州立银行的数量多于国家银行，并且州立银行加总资本的数量多于国家银行的加总。美利坚合众国以一个双轨银行制度（dual banking system）而告终。银行家们权衡成为国家银行体系成员的优点（吸引存款人的声望以及发行票据的权利）及其成本（更严格的监管）并且选择承诺最大利润的特许授权。立法人和监管人也同样不得不做出选择。他们是否应该针对储备、资本以及诸如此类制定更严格的监管规则？这将保护存款人并提高他们体系的声望，但是它同样鼓励银行家们去选择不同的特许。（正如经济推理命题2提醒我们的，

选择通常是在权衡成本与收益中做出的。）

表 19—1　　1860—1914 年美国的商业银行

年份	州立银行数量[a]	州立银行的资产（百万美元）	国家银行的数量	国家银行的资产（百万美元）
1860	1 562	1 000	0	0
1863	1 466	1 192	66	17
1864	1 089	721	467	252
1865	349	231	1 294	1 127
1866	297	197	1 634	1 476
1867	272	180	1 636	1 494
1868	247	164	1 640	1 572
1869	259	171	1 619	1 564
1870	325	215	1 612	1 566
1880	1 279	1 364	2 076	2 036
1890	4 717	3 296	3 484	3 062
1900	9 322	6 444	3 731	4 944
1910	18 013	13 030	7 138	9 892
1914	20 346	15 872	7 518	11 477

a. 包括互助储蓄银行。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57*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series X20, X21, X42, X43, X64, and X65.

黄金、绿背纸币还是金银复本位制？

在美国内战至 19 世纪末期之间，美国人长久地陷于关于他们国家的货币体系的争论之中。有些人乐意保留美国内战期间的纸币，也就是绿背纸币。有些人钟情于美元可兑换固定比例的黄金的金本位。另外一些人则偏好于一个金银复本位的货币体系，在这一体系内，美元可以兑换成固定比例的黄金或是白银。究竟哪一个体系能解决滞胀和银行动荡的问题呢？

美国内战结束之后恢复金本位制

正如我们已经提示过的，在美国内战期间美利坚合众国是以绿背纸币为本位的。只是法定提供的绿背既不需要黄金也不需要白银来支撑。实际上，正如美国人喜欢开玩笑所说的一样，它们仅仅由钞票背面的绿色墨水来“支撑”。很多人想重新回到美国内战前的情形，那时合众国实行金本位制，并且1美元可以兑换成23.22先令（稍少于1盎司的1/20）的纯金。然而，行胜于言。

在美国内战期间，合众国的物价水平相对于英国而言有了非常大的上升。事实上，正如表19—2的第一列和第二列所表明的，在1861年至1865年间，合众国的物价水平上升了76%，而同期英国的物价水平仅上升了5%。与此同时，正如第三列所表明的，英镑的价格已经从英镑兑美元的4.77上升到了英镑兑美元的7.69，大约上升了61%。这一货币升值抵消了英国商品的大部分吸引力。设想美国财政部在1865年决定采取以战前的美元可以兑换成黄金的利率，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一决定将会重新确定每英镑兑换4.85美元的战前汇率或者说“战前平价”，因为4.85美元可以兑换的黄金的数量在英国的银行中可以转换成1英镑。这一汇率将会造成将美元兑换成黄金的数量激增并且将黄金转换成英镑以购买相对廉价的英国商品。财政部将很快就会发现它的黄金储备被耗尽，而且合众国将发现它的金质硬币会被出口。

表19—2　　恢复金本位制

年份		（1）美国价格（GDP平减指数）	（2）英国价格（GDP平减指数）	（3）英镑的美元价格（美元）
1861	内战开始	100	100	4.77
1865	内战结束	176	105	7.69
1873	1873年罪案	129	113	5.55
1879	恢复金本位制	104	96	4.85

资料来源：（1）Louis Johnston and Samuel H. Williamson, “The Annual Real and Nominal GDP for the United States, 1789—2002,” *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 March 2003 at http://www.eh.net/hmit/gdp;（2）Lawrence H. Officer, “The Annual Real and Nominal GDP for the United Kingdom, 1086—2000,” *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 June 2003, at http://www.eh.net/hmit/ukgdp, and（3）Lawrence H. Officer,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Dollar and the British Pound, 1791—2000,” *Economic History Services*, 2001, at http://www.eh.net/hmit/exchangerates/pound.php.

在合众国成功地重新取得针对绿背纸币的黄金交换比例之前，合众国的价格

很显然不得不下降。与诸如绿背俱乐部等激进组织的成员们一起，很多民主党人认为恢复到金本位制的收益并不足以弥补肯定将遭受的经济上的痛苦。债务人在滞胀时期饱受折磨，并且人们也经历了失业的阵痛。

然而，操纵政治权柄的共和党则认为出于一些理由，重新恢复金本位制是必需的。第一，支付黄金给债权人才是公平的，尤其是对于那些已经借款给政府的人。在战争期间公债的价格一直保持稳健，这就意味着公债持有人获得了关于他们将得到黄金作为支付的隐含承诺。[①] 第二，货币的基础若是持久地受纸币的束缚将会很危险，因为拥有这一权力的政府很难获得人们的信任。第三，也许同时是最重要的一点，恢复到战前的黄金平价对于维持合众国在国外的信誉以及进入尤其是伦敦这样的国外资本市场是必要的。

财政部的官员们针对价格水平，已经求助于两种行动方法：

(1) 通过紧缩纸币的供给，价格水平能够被强制性地相当迅速地降低。而这可以通过销毁绿背纸币来实现。

(2) 一个稍慢的、更少痛苦的价格下降可以通过保持货币供给的固定以及利用经济体的增长带来价格的逐步下降来达到。[②]

第一种方法的替代是更严峻的货币紧缩，这是由安德鲁·约翰逊执掌财政部时期的秘书休·麦卡洛克首创的。国会在 1865 年 12 月通过了《紧缩法案》，赞同了这一策略。但是治疗滞胀的药物太苦，并且国会在 1868 年 2 月终止了《紧缩法案》。格兰特总统的财政部秘书乔治·S·鲍特韦尔采取了一个更简易的政策：更广泛地放松对货币市场的监管而不是更严格。[③] 在鲍特韦尔 1873 年离职后，助理秘书威廉·理查森采取了更加消极的政策。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当这个国家的经济成长到它现有的通货水平后，价格水平将会自然而然地下降。参见经济透视 19.1。

民主党在 1874 年大选控制了国会之后，投机的共和党人急匆匆地通过了一部在四年之内给使用黄金作为支付手段提供回报的法案。正如表 19—2 的最后两行所表明的，持续的滞胀恢复了（大约地）1861 年的合众国与英国价格之间的联系，并且使得它有可能在约定的日期里重新恢复到绿背纸币可以转化成黄金。出于当时技术上的原因，合众国并没有最终在法律意义上承诺金本位制，而且在随后的 21 年内也没有这样做。不过，在 1879 年至 1900 年间，政府在实际上维持了所有货币形式与黄金之间的平价，并且在这些年内，美国实际上实行的是金本位制度。

---

① 该政策于 1869 年《公共信贷法》中得到确认。

② 其他途径包括货币金属贬值，放弃硬币本位，或是单纯祈祷货币供给瞬间增加。参见 Richard H. Timberlake Jr.，"Ideological Factors in Specie Resumption and Treasury Polic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4 (1964)；James K. Kindahl，"Economic Factors in Specie Resumption：The United States，1865—1879，"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9 (February 1961)：30－48。

③ 鲍特韦尔打破了黄金的死角，由詹姆斯·菲斯克和杰伊·古尔德尝试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黄金交易大厅卖掉 400 万美元的黄金。参见 Larry Wimmer，"The Gold Crisis of 1869：Stabilizing or Destabilizing Speculation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1975)：105－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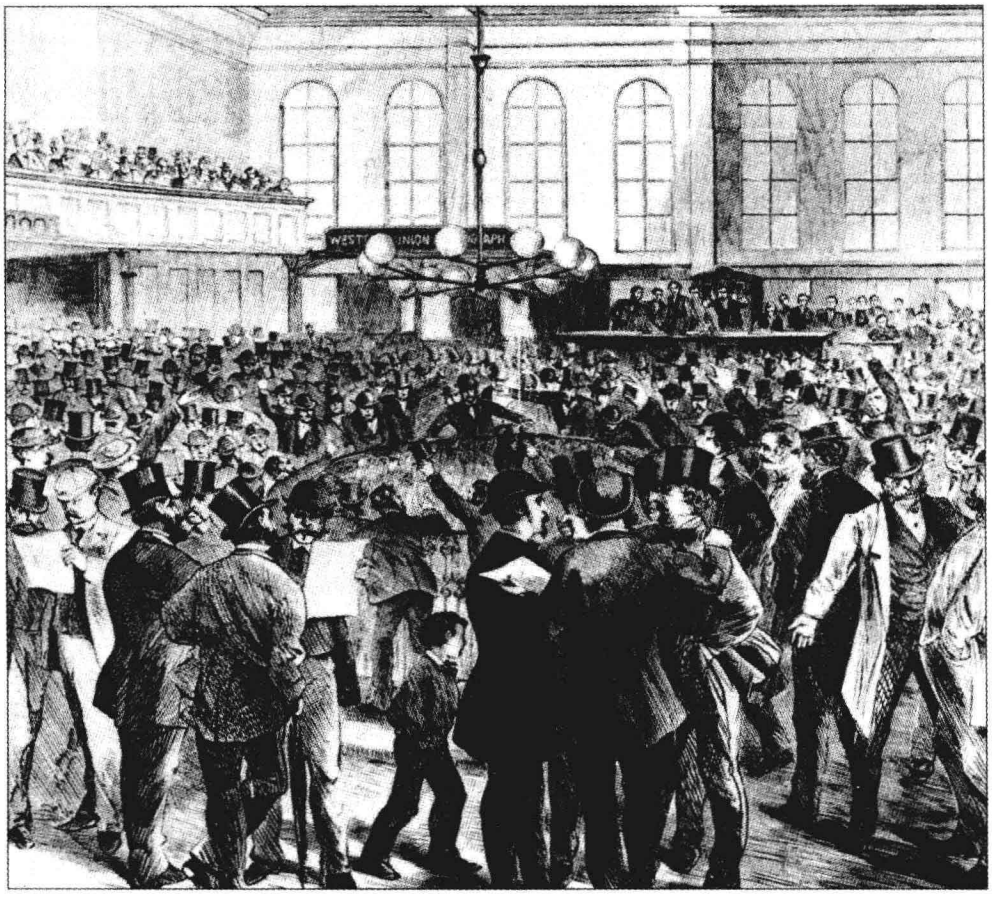
经济透视 19.1

货币数量论

货币数量论可以用下面的公式来表示：

$$M=kPy$$

M代表货币（绿背纸币、银行存款等）；k代表作为货币持有的收入比例，通常假设是相当稳定的；P代表价格水平；y代表实际产出。在绿背纸币时期的问题就是如何降低P使其与其他国家相一致。一个政策就是减少必要的M的数量。替代方案是保持M固定，并允许y的增加逐步降低P，从而使得“国家的增长能形成货币”。



© CULVER PICTURES

当黄金价格于1869年大起大落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黄金交易大厅成为前所未有的投机中心，在它的中央地带，青铜丘比特安静地喷着水，在讲台上，黄金交易大厅秘书不得不竖起他的耳朵才能倾听并记录交易。

© STEVEN LUNETTA, CURRENCY COURTESY OF R. E. WALLACE, FORT WORTH, TEXAS.

美元不断变换的外观反映了对健全银行体系和稳定价格水平的寻求。

1873 年罪案

大面值的银币在 19 世纪 90 年代已经退出了流通。在美国内战期间以及随后的几年内，即使是小面值的银币也退出了流通，首先是被无胶的邮票所取代，稍

后是被非常小面值的通货所取代——由政府发行的5分、10分、25分和50分面值的通货。因此，当国会在1873年寻求简化货币制度的方案时，白银美元彻底地从待铸的硬币中去除，这一点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了。一些高瞻远瞩的官员担心铸币厂将会增加白银供给，从而增加了货币供给以及促使价格上升，并且将延缓恢复。大多数国会成员都没有注意到当时的漏洞，因为在铸币厂的比率接近于16比1，白银在市场上的价值大于其在铸币厂中的价值。仅仅在3年后，1873年法案中对白银价值的忽视引发长达25年的抗议。①

引发随后的关于白银“非通货化”的激烈争论的原因就在于国际市场上白银的价格开始下降这一事实。美国西部银矿产出的增加以及西欧金银复本位制国家转向金本位制导致了白银的大量过剩。当1美元中包含的白银的市场价值实际上降到1美元之下时，白银生产商把白银送入铸币厂加以铸造。令他们沮丧的是，他们发现政府仅按照财政部所需的小面额辅助硬币的数量来接受白银。来自白银生产商的控诉振聋发聩。

诸如白银生产商这样一些相对较小的团体也许看起来并不具有多少实力。但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期间，很多西部的州已经加入联邦，每一个州在参议院中都有代表它们比较少的人口数量的两个席位，并且集中在这些州内的白银生产商获取了与他们在人口中的数量不成比例的政治代表权。滞胀的反对者们加入了白银生产商这一团体，强烈要求以旧有的16比1的铸造比例自由并且无限制地铸造白银。白银鼓吹者知道以这一比例，铸币厂将会大量买入白银，而且国家的货币储备、总量货币供给以及整体物价水平都将上升。

而白银的反对者则认为，如此黄金将被驱逐出流通领域，这样一来对于白银的鼓吹者来说于事无补，除了缓解失业的压力以及减轻债务者的负担。对于自由铸造白银的支持者而言，使得白银非通货化的1873年法案就变成了“1873年罪案”（Crime of 73）。

最后，国会在“健全货币”与自由铸造货币之间达成了一个妥协。第一个主要的白银法案是1878年《布兰德-阿里森法》（Bland-Allison Act of 1878）。这一立法允许铸造有限数量的白银。财政部长被指使每个月以当时的市场价格购买不少于200万美元且不多于400万美元的等值白银。在随后的12年内，在任的保守的财政部长们仅仅购买了最低数量的白银，但是到了1890年，财政部的白银货币（不计算辅助硬币）总计也将近3.80亿美元。

白银问题根本就无解。在1878年，1美元中所包含的白银的平均市场价值仅仅超过89美分。在接下来的12年内，除了购买价格之外，白银的价格持续下降。白银生产商和债务人都不希望通货膨胀平息下来。一个新的法案，也就是1890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Sherman Silver Purchase Law of 1890）得以小心翼翼地准备以避免被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否决。财政部部长被要求以市场价格每个月购买450万盎司的白银。为了对这些白银进行支付，他将发行一种被称为

① 1873年罪案的批评者们不可避免地将之归咎于国会被外国银行家腐化。其实并不是这样，尽管有些官员起草法案时会尝试为黄金保值。

财政部票据的新型纸币，并且他可以自行决定使用黄金还是白银对这些纸币进行赎回。在1890年白银价格急速上涨的时候，新法律授权每月购买相对前一法律所规定的几乎翻了一番的白银数量。白银供给扩张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它的市场价格几乎立刻就重新回到迅猛下降的老路。

© CULVER PICTUR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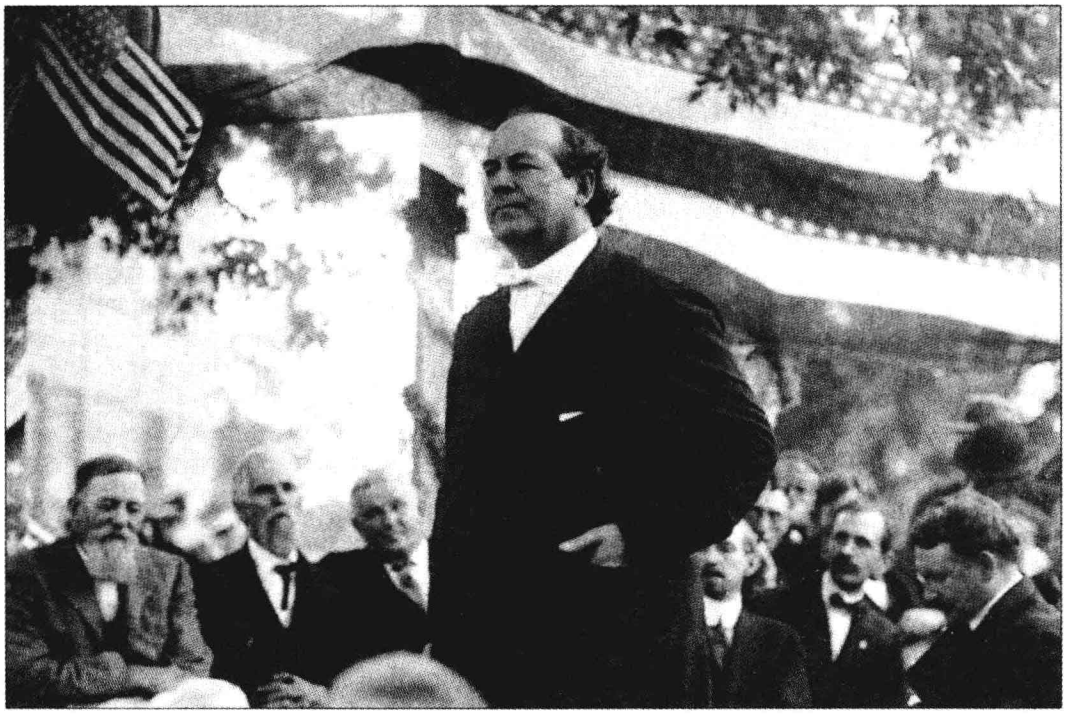
白银支持者们忧伤地发现白银被解除货币化，并且令他们持续沮丧和痛苦的是，黄金在美国金属货币中继续占据单一金属货币的统治地位。

在3年内，购买白银的美元数量略少于在旧有的法律规定下所购买的数量。在1893年，在属于民主党的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一个主张"健全货币"并且在这一问题上与其党派争论不休的人——的坚持下《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被废止。克利夫兰总统相信这一法案低估了美元的信心并且导致了金融恐慌。根据

该法案的规定，在三年多时间里，1890 年财政部票据的发行量超过了 1.5 亿美元；总体而言，在 1878—1893 年间（如图 19—1 所示）通过对白银的购买增加了 5 亿美元的货币供给。这对于白银势力而言不啻于是一个胜利。但是财政部购买白银并不能充分地防止白银价格的下降，而且整体物价水平仍然维持螺旋式的滞胀（如图 19—2 所表明的）。经济透视 19.2 讨论了反映通货膨胀和滞胀的利率趋势。

恪守金本位制

如图 19—2 所示，从 1879 年恢复黄金支付到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间，价格一直在下降。不仅在美国是如此，在其他金本位制国家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仅仅在银本位制的国家经历了价格上升。



© BROWN BROTHERS

威廉·詹宁斯·布赖恩在政治阵营中。布赖恩不仅是一个政治领导人，他同时对经济和政治改革的需要具有清醒的认识。尽管在货币问题上受挫，布赖恩的货币处方具有坚实的“新政声调”。

价格为什么会下降？基本问题就是对货币需求（并且最终是对黄金的需求，因为它是货币体系的基础）的增加快于其供给的增加。经济活动的迅速增加、金融复杂性的不断增加以及选择金本位制国家的增加都提高了对黄金的需求。与此同时，尽管用历史标准来衡量供给是以一个非常良好的比率增长，但仍然跟不上需求增加的步伐。

尽管 1878 年和 1890 年的白银法案使得白银权证可以通过要么是黄金要么是白银赎回，但在实际上，财政部授权只要有需要都以黄金赎回它们。在 1879 年后，财政部长和普通大众都逐渐认识到至少需要 1 亿美元的黄金储备才足够支撑纸币的流通。刚好在 1890 年财政部票据发行，政府的黄金储备开始向 1 亿美元的数量减少时，公众提出财政部票据和绿背必须使用黄金支付。到了 1893 年刚开始的时候，黄金耗费的问题变得非常严重，并且到这一年的中期，黄金储备实际上已经下跌到 1 亿美元之下。

在随后三年内的一些时候，看起来将不得不放弃实际上的金本位制度。从 1891 年到 1896 年，两种类型的耗费——“外在的”（国外）以及“内在的”（国内）——深深地折磨着财政部。回想在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保守派认为偏离金本位等同于宣布国家银行破产。困难就在于当放弃金本位的危险变得非常明显时，人们会蜂拥着去获取黄金从而就使得财政部不得不放弃金本位的可能性更大。管理机构主要是通过出售公债来获取黄金，这样无论何时当金本位看起来不得不丢弃的时候就补充了政府的储备。因为 1893 年《谢尔曼白银购买法案》的废止削减了财政部票据的数量，而此时公众正在提出把财政部票据与绿背一起赎回。在 1896 年夏天商品出口的增加，最后带来了国外黄金的大量涌入，从而提高了公众对金本位将会得以保存的信心。

1896 年的大选确立了将近 40 年的货币本位的实质内容。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领导下，民主党拥护以 16 比 1 的比例自由铸造白银——即使在那时市场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30 比 1。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布赖恩鼓舞了通货膨胀论者并且以他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Cross of Gold” speech）赢得了党派提名，他演讲的结束语极具煽动性：

> 我们的背后有全国和全世界的劳苦大众，有来自各地的商人、工人和劳动者的支持。我们将这样回答他们的金本位：你们不能以这样的一顶桂冠压迫所有的劳动者，你们不能将人类悬挂在黄金十字架上。[①]

共和党的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坚定地拥护金本位制度。[②] 西部和南部支持布赖恩；北部和东部支持麦金利。

经济透视 19.2

费雪效应

作为债务人，农民将从通货膨胀中获益，但是也许达不到他们所希望获得的那么多。尤其是在边疆的农场抵押借贷，通常具有比较短的 5 年或更少的还贷期限。如果在白银通货膨胀之后重新调整抵押成为可能，贷款人要求并且将会获得

① 演讲内容参见 http://www.tntech.edu/history/crosgold.html。

② 然而麦金利曾承诺围绕国际复本位制召开会议并兑现了诺言。

更高的利率。为了回应有关白银的争论，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发表了关于1894年的价格变化与利率之间联系这一细致的研究。他发现在通胀之后利率上升、在滞胀之后利率下降，但是具有长时间的滞后。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反映通货膨胀的利率趋势被称为“费雪效应”。它可以表示成以下方程：

$$i=r+p$$

这里i表示市场利率，r是实际利率，并且p是价格变化率。对白银鼓吹者的批评认为价格变化率p的上升，将使得实际利率不变，而仅仅带来市场利率i的上升。

在东部，工业企业雇主们给雇员们的投票带来了所有可能的合理或是不合理的压力。一个真正的问题是关税问题。像很多农业州的支持者们一样，布赖恩反对高关税，但是工人们已经被关税会保护工作这一观点说服。无论如何，与罗斯福在36年后的情形一样，布赖恩并没能吸引很多城市选票，并且当老农业州的富有的农民开始抛弃布赖恩时，就失去了目标。①

共和党在1896年的胜利并不是紧跟在通过法律手段结束争吵之后，因为自由银币的鼓吹者们仍占有着国会的多数席位。然而，通过黄金的新供给激发的繁荣的恢复使得国会接受了明确的黄金合法化。虽然部分是由高的黄金实际价格（铸币厂支付的价格相对于一般价格）所引起的，黄金的新供给在很大程度上是未被预期到的。包括异常丰富的南非金矿在内的世界上很多地方新的金矿被开采，并且通过使用氰化物一种新的黄金处理方法得到了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黄金供给的增加实现了银币支持者们的目标：货币供给的扩张以及通货膨胀。图19—1清晰地表明了1896年以后黄金货币的增加。

根据1900年《金本位制法案》（Gold Standard Act of 1900），美元完全按黄金计值，并且所有其他形式的货币都可以转换成黄金。财政部部长被要求维持1.5亿美元的黄金储备，它不能够被支取以用于当期的政府开支。为了防止19世纪90年代困境的重演，为应对不断出现的可能困难而购买的时期，制定了维持财政部对银币证明书以及绿背的赎回的条款。美利坚合众国最终通过法律承诺了它自身具有的金本位货币制度。

布赖恩和银币支持者，或是麦金利和“黄金臭虫”，他们中到底谁才是正确的呢？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已经给出了具有说服力的答案。他认为在1873年取消白银美元是一个错误，因为这造成了不必要的滞胀，但是到了布赖恩的时代，也许可能是已经太晚，怎么做都不能挽回了。② 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同时指出，对任一本位的坚定承诺好于已经发生过的长期不一致的本

---

① 关于本位的争论在L·弗兰克·鲍姆的同时代作品《绿野仙踪》中有所反映，虽然有人质疑这种说法。多萝西代表美国，稻草人代表农民，锡人代表工人，懦弱的狮子代表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等等。多萝西沿着黄砖（金本位）去翡翠城（华盛顿）寻找智慧，但是最后她发现自己可以用银鞋子（米高梅加入了红宝石拖鞋）解决一切问题。参见Hugh Rockoff, “The Wizard of Oz as a Monetary Alleg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August 1990): 739 - 760。

② Milton Friedman, “The Crime of 187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December 1990): 1159 - 1194.

位选择。[1] 从这一独特的滞胀经历中应该吸取的教训将在下面的新观点 19.1 中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国际金本位制

在 1896 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份里是金本位制最成功的时期。正如图 19—2 中的数据所显示的，价格以每年 2%的温和比率上升。因为大多数工业化国家是实行金本位制的，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国际汇率是固定的。实际上，最好说实际上只存在一种国际货币，也就是黄金；它仅仅是在每一个国家具有不同的名字而已。固定汇率以及适中的价格上升鼓励了国际范围内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伦敦是世界的金融中心。公债在那里被出售，使得资本流入世界上的欠发达地区。考虑到很多经济学家现在仍然认为这一时期是世界货币体系的标准时期，就一点都不奇怪了。

然而，金本位产生的成本与它获取的收益一样多。资源被用于开采位于南非和克朗代克河的金矿以及从加利福尼亚河中提取黄金。

新观点 19.1

滞　胀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很多年份而言，通货膨胀是货币经济学家们主要的忧虑。而今日美国，以及其他诸如日本这样的工业国家，却面临着滞胀的前景。滞胀是不是总是坏事呢？很多人认为如此，也许是因为发生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艰难时期与价格下降之间的相关性。美国内战之后美国的经历表明了滞胀，至少是就它的温和的形式而言，也许并不是太坏的事情。在 1865—1896 年间，美国的价格水平以大约每年 2.10%的比例下降，但是平均资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 1.35%的比例增长，并且总体工业产出以平均每年 4.76%的比例上升。当美国在世界独占鳌头时，其钢铁产量以令人吃惊的平均每年 6.38%的比例上升。当然，滞胀对每个人的影响并不是一样的。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签订了一个没有对滞胀指数化的合约，贷款人将以借款人的支出为代价获得一个意外的收益。如果从整体上来说这一时期处于快速的经济增长，虽然存在短时期的经济艰难的时刻，尤其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期和 19 世纪 90 年代早期的时候，对于贷款人而言也依然有利。而且，回顾这一时期将有助于我们从多样化的角度来思考把滞胀等同于经济停滞这一过于简化的看法。

①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34.

实行纸币本位可以使得这些资源用于其他的地方。而且，世界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取决于矿工和化学家的个体决策以及取决于已经把稀有的黄金矿层严严实实融入地球的自然力量。在1896年之后的年份内，最后的结果是黄金货币的世界存量以令人非常满意的比率增加。但是在1896年之前，这一情况却并不存在。而且在金融危机期间，坚持金本位就很难再向金融市场供给更多的货币。无论如何，相比诸如金本位的自动化机制，有大量的科学分析支持的中央银行家们总是被寄予厚望能够更好地控制货币的供给。

关于金本位的净收益的争论仍然很激烈。然而，通过历史化的比较可以缩小争论的范围。迈克尔·D·波尔多已经论证过了，在很多方面（最重要的是平均失业率），金本位的表现逊色于现代货币体系。仅仅在稳定长期价格方面，金本位可以说具有明显优势。我们又一次明白了利用证据检验猜想的价值（经济推理命题5）。

金融资本、投资银行与国家债务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州立银行纸币的征税保护了国家银行避免面对来自州立银行的竞争。由于国家银行的高资本要求所形成的障碍、对抵押贷款的约束以及在1875年之前对纸币发行的限制同样保护了许多农村国家银行避免面对来自新的国家银行的竞争。这就使得很多乡村国家银行可以实行差别价格：通过约束贷款以及对当地的借款人收取更高的利息率。乡村国家银行同样把它们的储备借给城市银行。这一活动与在乡村银行的缓慢扩张一起有助于乡村工业金融的增长。理查德·E·西拉是关于这一阶段银行历史的杰出作者，他总结说，国家银行体系“提升了进入银行业的阻碍，并且就这些阻碍而言，它们具有不同的地理上的影响，一旦与国家银行体系给予银行间的资金转换的流动性的增加连在一起的话，那么这一影响将非常有利于工业金融”[①]。

乡村银行的价格差别在借款利率上创造了地区差别，从美国内战到1900年，这一有差别的借款利率得以维持并且逐渐缩小。差别的缩小是由于很多方面的原因。美国内战后南方金融体系的恢复逐渐使得这一地区的利率与其他地区的利率一致。商业化纸币市场的扩展（在这一市场短期商业贷款被直接地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给州银行带来了更多的竞争。并且正如约翰·詹姆斯已经指出的，在很多州引入自由银行后增加了州立银行之间的竞争。[②] 在一定程度上，正如由霍华德·博登霍恩和休·罗考夫最近的工作所证明的，战后资本市场的混合标志着重新回到美国内战前的现状。对于南方而言，这一点尤其确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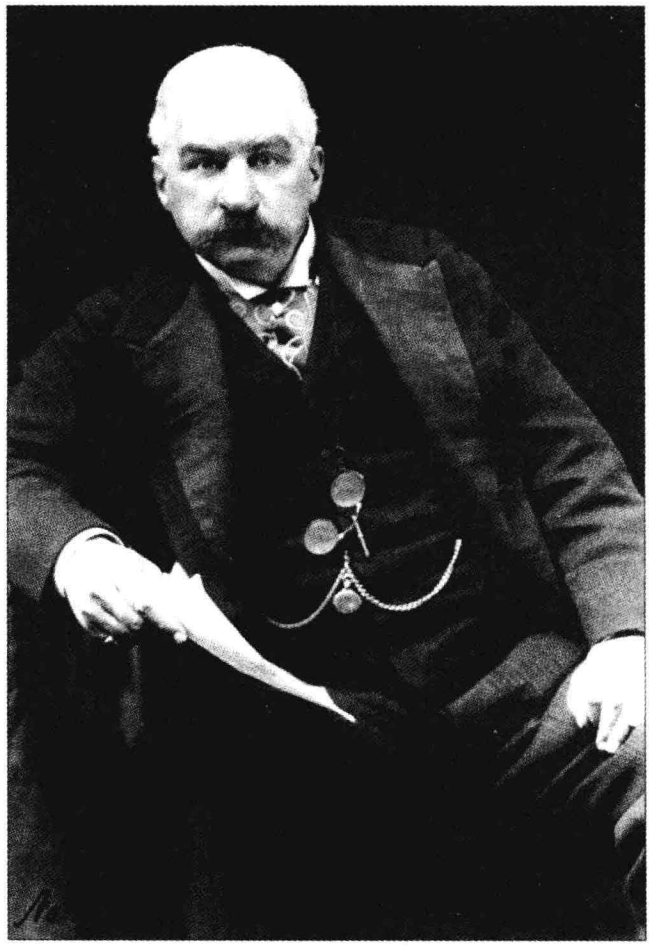
---

① Richard E. Sylla, “The United States, 1863—1913,” in *Banking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ome Lessons of Economic History*, ed. Rondo Camer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36.

② 深入讨论参见 John James, *Money and Capital Markets in Postbellum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投资银行的兴起

正如兰斯·戴维斯所指出的，英国的金融市场与美国的迥然不同。[①] 英国的工业家们可以造访他们当地的分支银行——劳埃德银行、威斯敏斯特银行或巴克莱银行——并且可以从巨大的国际体系中吸收到资本。另一方面，美国企业面对的银行资源更是有限。



© CORBIS

投资银行家 J. P. 摩根掌控了世界金融，在 1901 年，他创立了美国钢铁公司，世界上第一家有 10 亿美元资产的公司。当被问到市场将会怎样时，J. P. 摩根回答说，“它将会波动。”

因为这一局限，美国的投资银行开始为铁路的扩张、矿业公司以及大规模

① Lance E. Davis, “Capital Immobilities and Financial Capitalism: A Study of Economic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 (1), (Fall 1963): 88 - 105.

的制造企业提供服务。与商业银行不一样，投资银行无权发行票据（纸币）或是创造存款。相反，它们是作为联结出借人（股票和债券的购买人）与借款人（企业）的中介。J. P. 摩根大通公司是投资银行业的开路先锋，在 1879 年内，它在为范德比尔特以及他的纽约中央铁路提供顾问以及销售股票的服务上赚取了 300 万美元。查尔斯·施瓦布是安德鲁·卡耐基的一位雇员，他在 1900 年带了一张便条给摩根并且说至少需要 4 亿美元才能获得卡耐基钢铁公司的控股权。摩根迅速地做出了回应，“我接受”——从而建立了美国钢铁公司；那是到当时为止最大的合并。40 多年前，当卡耐基竭尽全力想提升仅占摩根在 1900 年给予他的很小一部分的金融资本的时候，他不得不去英国寻求，因为没有美国银行能够满足他的资本需求。

通过将大型投资机构的代理活动放在管理层的位置，投资银行家与大商人之间更紧密的关系被锻造得更加坚固。投资银行的批评者们抱怨这一活动压制了竞争，摩根与一些小型投资银行诸如在纽约的库恩雷波公司（Kuhn Loeb and Company）以及在波士顿的基德公司（Kidder Peabody and Company）一起似乎控制了包括证券的分配以及（通过互派领导层）控制了绝大多数主要工业企业的商业决策。在 1912 年，国会把这种“货币信托”置于普约委员会（Pujo Committee）更详细以及更严格的检查之下。布拉德福德·J·德隆（J. Bradford DeLong）近来的工作已经表明摩根与工业企业的结合同样具有积极的影响：投资银行家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该如何最有效地投资的信息（经济推理命题 5：证据是重要的）。

另外一个重要的有助于工业金融增加的推动力量是联邦债务的迅速而稳定的偿还。到了 1835 年，联邦债务已经完全偿还了（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并且在美国内战前夕仅存在着少量的债务。到了 1865 年，联邦债务达到了 23.2 亿美元，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5%；到 1877 年，这一数字减少到 6.48 亿美元，随后的几年一直在增加。到了 1893 年，17.3 亿美元的债务已经偿还了。在很大程度上，关税的征收给政府提供了允许债务偿还而保持财政盈余的机会。政府资金的流入使得其可以大量买进过去发行的公债——正如约翰·詹姆斯所说的，它是一种挤入——从而降低了私人资产的收益并促进了资本在私人部门的形成。[①]

银行恐慌与联邦储备制度的确立

除了其弹性增加了之外，1893 年的银行恐慌与 19 世纪 90 年代中期的萧条伴随着 1907 年更严重的恐慌以及接踵而来的萧条。又一次，美国人民激发了对根本改革的需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最痛苦的方面就是当个人和商业企业更加理解经济的前景时，个人和商业企业蜂拥着去银行把他们的存

① John A. James, “Public Debt and U. S.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April 1984): 192–217.

款兑换成现金。而银行的运行是遵循“部分储备金”制度的，并不能立刻就满足全部存款套现的需求。如果在那时，任一个健全的银行都能以有序的规则被清盘，那么它的存款和持有人都可以充分地清偿。另一方面，在银行恐慌期间，资产有序地转换成现金如果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也已经变得非常困难。因为很多银行在同一时间匆忙地出售公债（这是它们所拥有的最具流动性的资产），从而导致了公债价格的巨大下降。对于有些银行而言，即使“挤兑”已经停止，公债带来的损失随后也变得更大。相反，若是出售它的股票，如果银行收回它的贷款或是当贷款到期时拒绝续贷，那么它就把压力转嫁到顾客的头上。如果这些顾客不能履行他们的义务，银行将被迫破产。

减轻这些困难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在危机时期延迟现金支付。在美国内战之后，延迟就意味着银行以很多方式停止支付现金：在东南部和中西部，缺乏现金的结果非常严重以至于当地的票据交易所发行了一种即时抵押票据，从而使得人们能够继续开展经营活动。这些小面额的“票据交易所证书”（clearinghouse certificates）在其他的地方并未大量发行，但是美国所有的城市银行使用大面额的票据交易所证书去弥补应该支付给另一个的结存。正如加里·戈顿（1985）和理查德·廷伯莱克已经证明过的，票据交易所贷款证书的发行长期看来有助于缓解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是它却不能阻止危机的产生。①

尽管其严重性略微下降，但这一相关的问题几乎每一年都会出现。对货币的需求在秋天都会增加，因为需要给收割的工人支付工资并且农民也需要用货币购买商品。在冬天对货币的需求也会上升，这是由于在圣诞采购季节需要额外的货币进行支付。因为货币的供给，尤其是现金的供给是“无弹性的”，结果就造成了秋天和冬天期间利率的上升。就农民而言，这看起来包含着巨大的不公平：正当农民最需要借款的时候利率却上升了。货币需求的季节性波动内生性地存在于一个农业经济体中，但是当它们处于这一国家银行体系中情况就恶化了，因为国家银行体系使得银行很难适应银行票据的合意存款比率的变化。乔治·塞尔金和劳伦斯·H·怀特已经证明过，由于加拿大的银行具有把存款转换成纸币的更大自由，利率的季节性波动的严重程度更小。结果是，农民需要政府在应对利率的季节性波动上有所作为，就扩大到一般公众需要政府在应对银行恐慌上有所作为。

国家货币委员会

延迟现金支付以及发行票据交易所证明书都优于放任恐慌继续，但是公众希望出现一个同时能防止延迟支付的改革。回应就是1908年《奥尔德里奇-弗雷兰

① See Gorton, “Clearinghouses and the Origin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 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277 - 283; and Timberlake, *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法》(Aldrich-Vreeland Act of 1908)，它提出由不少于十家处于健全状态的银行组成“国家货币协会”这一组织形式。这些联合会的意图就是要使得构成联合会的银行为了保护它们资产组合中的公债和商业票据的安全性而发行即时票据。根据另一个条款创设了国家货币委员会（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它在其1912年的报告中严厉批评了美国银行体系：

> 在这一体系之下，我们的国内和国际信用运行体系是粗陋的、昂贵的并且对明智的人毫无用处……我们的银行以及银行家在外贸金融中居然并不重要，这对一个积极进取的国家而言尤其不光彩……我们的生产商在对外贸易中的无力同样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国内交易中。①

委员会关键的建议是设立一个新的中央银行；委员会的委员们相信亟须一个集中化的机构来保持商业银行的储备以及通过它自身的信贷授权来提高商业银行的储备。这样的一家中央银行同样可以对财政部提供帮助。在经历了美国银行业的第二次失败之后，联邦政府不得不维护它在财政部的独立代理人地位，并且通过立法使得财政部保持与银行体系的疏远状态。从未预期到的操作政府资金的方法出现了。到了1912年，对一个现代的、集中的财政代理机构的需求太强烈，从而无法推迟。

《联邦储备法案》

在1913年圣诞节的前两天，威尔逊总统签署了设立联邦储备体系的法令。这一体系由12家联邦储备银行组成，国家的12个大区各有一家，以保护不同地区的利益。与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银行立法仅存在20年的时间不一样，联邦储备的立法是持久有效的。

这一体系受由七个成员组成的联邦储备委员会领导，包括财政部长、通货监理官以及总统任命的五个官员。每一家联邦储备银行受由九位董事组成的委员会领导。联邦储备委员会将指派董事中的三位来代表“公众”；大区中的会员银行将选出剩下的六位。六位当地选出的董事中的三人应该是银行家；其余的三位董事将代表商业、工业和农业。如此，银行业共同体中在每一个大区的联储银行董事中拥有了少数代表地位。

《联邦储备法案》使得体系中的成员承担对国家银行的业务。在满足联邦的要求之后，州立银行同样可能具备成员资格。为了加入这一体系，一家商业银行不得不以它的包括资本和余额在内的3%去购买在区联邦储备银行中所具有的资本存量份额。结果是，成员银行在名义上就拥有了联邦储备银行，尽管它们以在联储银行所具有的资本存量而获得的年度收益被限制在6%的累计红利。一家成员银行同样不得不在区联邦储备银行存入大部分之前作为其储备的现金。在

① *Report of the National Monetary Commission*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2), 28 - 29.

1917年之后，成员银行的所有法定储备都以其在联邦储备银行中的存款来体现。①

人们曾经希望如果《联邦储备法案》能够得到认真遵守，货币动荡几乎就可以消除了。然而，正如我们在随后将看到的，除了对联邦储备体系抱有太高的期望之外，还有不合时宜的领导以及缺少对“联储”允许灾难性的货币动荡、银行恐慌以及剧烈的商业周期的理解。事实上，联储体系本身也是导致大萧条——美国最黑暗的经济时期——的部分原因。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odenhorn, Howard. “Capital Mobility and Financial Integration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585 - 610.

Bodenhorn, Howard, and Hugh Rockoff. “Regional Interest Rates in Antebellum America.” In *Strategic Factors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A Volume to Honor Robert W. Fogel*, eds. Claudia Goldin and Hugh Rockoff. 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Conference Repor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59 - 187.

Bordo, Michael D.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Some Lessons for Toda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63 (1981): 1 - 17.

——. *The Gold Standard and Related Regimes: Collected Essay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ordo, Michael D., and Anna J. Schwartz, eds. *A Retrospective on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1821—193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Calomiris, Charles, and Glenn Hubbard. “Price Flexibility, Credit Availability,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1894—1909.”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 (1989): 429 - 452.

Carosso, Vincent P. *Investment Banking in America, A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The Morgans: Private International Bankers, 1854—1913*.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ernow, Ron. *The House of Morgan: An American Bank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Modern Finance*.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1.

Davis, Lance E. “Capital Immobilities and Finance Capitalism: A Study of Economic Evo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ntrepreneurial History* 1 (1), (Fall 1963): 88 - 105.

① 所有法定存款准备金在1917年6月至1959年末都交存联邦储备银行，在一系列过渡步骤后，成员银行可以再次将库存现金计作准备金。

——. "The Investment Market, 1870—1914: The Evolution of a National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5 (1965): 355 - 399.

DeLong, J. Bradford. "Did J. P. Morgan's Men Add Valu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Financial Capitalism." In *Inside the Business Enterprise*, ed. Peter Tem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http://minneapolisfed.org/info/sys/history, poste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Also, see the Web site of the Museum of American Financial History, http://www.financialhistory.org, fo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Friedman, Milton. "The Crime of 1873."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 (1990): 1159 - 1194.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7*. Princeton, N. 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Garber, Peter M., and Vittorio U. Grilli. "The Belmont-Morgan Syndicate as an Optimal Investment Banking Contract."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30 (June 1986): 649 - 677.

Gorton, Gary. "Clearinghouses and 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 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277 - 283.

Hawtrey, R. G.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Longmans, Green, 1939.

James, John A. "The Development of a National Money Market, 1893—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6): 878 - 897.

——. "Cost Functions of Post-bellum National Bank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184 - 195.

——. *Money and Capital Markets in Postbellum Americ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Public Debt Management Policy 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192 - 217.

——. "Public Debt Management Policy and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192 - 217.

Jenks, Leland H. *The Export of British Capital to 1875*. London: Cape, 1938.

Keehn, Richard H. "Market Power and Bank Lending: Some Evidence from Wisconsin, 1870—190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45 - 52.

Kindahl, James K. "Economic Factors in Specie Resumption: The United States, 1865—1879."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Livingston, James. *Origin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Money, Class, and Corporate Capitalism, 1890—1913*.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Myers, Margaret. *The New York Money Marke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1.

Officer, Lawrence H. "The Remarkable Efficiency of the Dollar-Sterling Gold Standard, 1890—1906."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1989): 1 - 41.

Rockoff, Hugh. "The Wizard of Oz as a Monetary Alleg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990): 739 - 760.

——. "Banking and Finance, 1789—1914."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43 - 684.

Selgin, George A, and Lawrence H. White. "Monetary Reform and the Redemption of National Bank Notes, 1863—1913."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68 (1994): 205 - 243.

Smiley, Gene. "Interest Rate Mov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8—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5 (1975): 591 - 620.

Snowden, Kenneth. "American Stock Market Development and Performance, 1871—192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4 (1987): 327 - 353.

Sobel, Robert. *The Big Board: A History of the New York Stock Market*. New York: Free Press, 1969.

Sylla, Richard. "Federal Policy, Banking Market Structure, and Capital Mob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863—191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9 (1969): 657 - 686.

——. "American Banking and Growth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 Partial View of the Terrai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Winter 1971—1972): 197 - 228.

——. *The American Capital Market, 1846—1914*. New York: Arno, 1975.

Timberlake, Richard H. *The Origins of Central Bank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Unger, Irwin. *The Greenback Era*.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West, Robert Craig. *Banking Reform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1863—1923*.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White, Eugene 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nking Regulation, 1864—1933."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2): 33 - 42.

Wicker, Elmus. *Banking Panics of the Gilded 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Williamson, Jeffrey G.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Capital Immobilitie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Development: A General Equilibrium Histor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Watersheds and Turning Points: Conjectures on the Long-Term Impact of Civil War Financing."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4 (1974): 636 - 661.

Wimmer, Larry T. "The Gold Crisis of 1869: Stabilizing or Destabilizing Speculation under Floating Exchange R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2 (1975): 105 - 122.

Zecher, J. Richard, and D. N. McCloskey. "How the Gold Standard Worked, 1880—1913." In *The Monetary Approach to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eds. Jacob A. Frenkel and Harry G. Johnson. London: Allen & Unwin, 1976. Reprinted in B. Eichengreen, ed. *The Gold Standard in Theory and History*. London: Methuen, 1985.

——. "The Success of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Historical Evidence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Macroeconomics." In *A Retrospective on the Classical Gold Standard 1821—1931*, eds. Michael Bordo and Anna J. Schwartz.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第 20 章　国内外商业

本章主题

在 1880—1920 年间，就总产出以及平均的工人产出而言，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的领头羊：包括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数量都得到了提高。与他们在早期的以及比较简单的工业中所做的为了加工的需要而大量购买国内商品不一样，美国现在增加了对最终产品的依赖。值得信赖的品牌产品，通过广告得到了极大的推广，这在商品的经销中开始扮演日渐重要的角色。商品的新款式及其数量提高了越来越高比例的人口的生活水平。这些发展来自潜在的城市化趋势，以及正如我们在第 16 章和第 17 章所强调过的，来自交通和技术方面的进步。

城市化

选择在城市生活的人数超过选择在农村生活的人数是 19 世纪（以及后来）的一个主要现象，对大多数美国人居住的城市的长期进军体现在表 20—1 中，它表明在 1800—1840 年间，生活在中心城市的人口比例几乎翻了一番，在 1840—1860 年间又翻了一番，并且在 1860—1900 年间又翻了一番。到 1910 年，总人口

中的将近10%居住在三个城市——纽约、芝加哥以及费城——每一个城市都拥有百万以上人口。

表20—1　　人口的城市化比率，1800—1910年

年份	居住在超过2 500人的城镇中的人口（%）	居住在超过100 000人的城镇中的人口（%）
1800	6	0
1840	11	3
1860	20	8
1880	28	12
1900	40	19
1910	46	22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1975*（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Series A2 and A57-72.

在1860年之前，快速的城市化步伐主要是源于由交通革命刺激的地区间贸易的快速增长。中心城市是作为贸易的“集散地”而出现的，而且贸易在拉动人们进入城市和城镇方面比工业具有更强的吸引力。[①] 正如埃里克·兰帕德已经证明过的，在1860年，全国最大的15个城市中其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只占城市人口相对比较少的比例。[②] 城市在这一阶段提供的主要是交通以及为了扩展远距离贸易而提供的商业和银行业服务。

美国内战之后的城市化进程与美国内战之前不同。早期的产业簇聚现在转移到城市，它以前依靠城市内陆地区的主要资源。铁路以及交通和通信方式的进步在19世纪晚期使得工厂与城市几乎同时发生了变化。

许多来自国外的人们涌进了贸易与工业活动的中心地带。在1860—1910年间，有一半以上的城市新居民来自海外。城市人口增加中大约有10%的比例来自自然增长，并且其中多于1/3的增长来自国内农村地区对城市的移民。中西部和南方的城市，长期以来都是作为东部制造业的经销中心，但是现在它自身的工业也得以发展，当工人成群结队地涌入时，它的工业得到了异常迅猛的发展。芝加哥和底特律、克利夫兰和辛辛那提、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孟菲斯和新奥尔良以及亚特兰大和伯明翰姆都起源于那些向与自己的贸易区域相隔太远地区的货物装运。到了1910年，西部和南部达到了将近一半的东部制造业产品的铁路运载吨位。同时，大都市贸易区域中相对较小的城市以及西密西西比区域里人口比较稀少的城市定位在商业功能。正如在1910年之后汽车已在日常生活中很常见了，大型城镇和城市在小城镇和农村付出的代价的基础上获取了商业利益；到了

① V. S. Clark, *History of Manufac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2 (New York: McGraw-Hill, 1929), 2.

② Eric Lampard, “The History of Cities in the Economically Advanced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3 (January 1955): 119.

1920 年，中心城市的零售商吸引了来自几年之前不敢想象的边远地区的顾客。正如玛莎·奥尔尼已经强调过的，这些变化体现在经销商品的新形式中，并体现在新的市场组织中。①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STEREO BY J. CARBUTT)

在汽车变得日益重要之前，城市交通堵塞就已经存在，正如这幅 19 世纪中期芝加哥的照片所反映的。

营销与销售

在美国内战前夕，典型的商店的功能主要是处理销售订单而不是致力于商品的促销和营销。广告大多数局限于当地的报纸和全国性的杂志，以及在一些大城市偶尔可见的户外广告。“吸引顾客”并不是广告的目的；广告传达的信息也非常简单和直接。报纸广告通过开列销售的物品和地理位置不会浪费报纸本身的空间，但它通常不会同时列出价格。分期付款（installment）已经为人所知但是在 20 世纪之前却并不常见。参见视角 20.1。塞勒斯·麦考密克以当期支付价格的

① Martha L. Olney, *Buy Now-Pay Lat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20%、其余分四个月进行支付来“即时”销售他的报纸。辛格缝纫机公司的爱德华·克拉克（Edward Clark）在1856年创造了消费者信贷，以当期支付5美元，其余每月支付3美元来销售价值115美元的缝纫机。在美国内战之前属于直接销售先锋的麦考密克以及辛格是少见的例外。绝大多数制造商将产品直接销售给批发商或是促销商品的委托代理机构。相应地，很多批发商雇用“旅行促销员”进行促销，这些人也就是到处去旅行的销售人员，他们在城镇和乡村中“招徕”贸易以及募集订单。

批　发

形成于1840年后的提供全方位服务的批发机构以它们自己从制造商和进口商赊购来的商品出售给零售商，逐渐地改成以信贷来购买。在中西部不断涌现出来的城市中，成功的零售商在对消费者进行销售的过程中，开始起到某些方面的批发商的作用。当这些机构逐渐壮大起来时，它们经常丢下它们的零售业务不管，并且集中起来应付东部制造业中心的产出方面的业务。有些批发企业，尤其是位于诸如芝加哥和圣路易斯这样的主要经销中心的批发企业提供了各种形式的连锁经销的方式，但是它们通常将诸如五金器皿和纺织品这样一些商品定位在单一的“全方位经销渠道”。

从1860年至1900年，提供全方位经销渠道以及全方位服务的批发机构在从制造商到零售商之间的经销活动中并未遭遇到激烈的竞争。然而，始于19世纪80年代以及在1900年之后，它们面临来自大型制造企业的销售部门的竞争。[①]在1900年至1920年间，批发机构从绝对数量上来讲并没有减少——实际上，它们的销售额持续增加——但是，它们在商品的经销渠道中持有更小的份额。

批发销售相对下降的原因就在于新出现的大规模生产商在结构上的变化。很多产业中的企业逐渐采纳了“流水作业”的技术，在这一技术中原材料在工厂中保持稳定的流量，而不是被分批处理。

视角 20.1

信贷、分期付款购买与种族

虽然在19世纪，乡村商店里利用信贷进行购买的现象很常见，但是在20世纪早期之前，分期付款的购买并不常见。受惠于玛莎·奥尔尼的研究工作，我们获得了一个有趣的按种族进行分类的使用商店信贷和分期付款购买的轮廓。在

① 更多讨论参见 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s, 1977); Harold Livesay and Glenn Porte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1918年之前，通过从银行借款进行商品购买（不包括住房以及土地）并不多见。到了1918年，5%以下的家庭使用银行贷款来购买商品。表20—2列出了利用商品信贷和分期付款进行商品购买的家庭所占的比例，以及按种族分类的这两种购买手段的比较。黑人相对于白人采用负债更多的手段来购买商品，并且黑人相比主要依赖商品信贷的白人更有可能采用分期付款的形式。表20—3列出了使用分期付款来购买各种常见的“耐用品”的家庭所占的比例。虽然在所列商品项目的购买上黑人与白人家庭所占的比例之间的差别并不大，但是黑人家庭使用分期付款的购买几乎是白人家庭的两倍。奥尔尼的分析强有力地表明了黑人严重地依赖分期付款购买是因为商人（大多数是白人）更不乐意给予黑人商品信贷。这样的信贷并不正式并且不局限于特定的可以收回的条款。分期付款的合约是正式的并且是可以合法得到偿还的。如果关于支付能力的信息成本很高，并且也许种族因素起作用，商人通过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来减少违约风险。尤其是就耐用品而言则更是如此，奥尔尼总结道（p. 427）：

支付的下限通常是商品价格的10%～25%。合约的期限通常是12～18个月，大大短于商品的可使用期限。附属担保品的价值因此通常超过到期余额，尤其是在分期付款合约的头几个月内。无论商人是否关注耐用品的好坏，如果家庭在分期付款上违约，商人可以收回有价的附属担保品，如此商人或许已经考虑到了能够轻易地缓解在家庭的信誉度上的损失。

表20—2　　分期付款和商品信贷的联合使用（%）

	白人	黑人
使用分期付款或商品信贷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	38.6	48.9
在使用分期付款或商品信贷的家庭中		
仅使用分期付款所占的比例	35.2	55.6
仅使用商品信贷所占的比例	45.6	24.3
同时使用分期付款和商品信贷的比例	19.2	20.2

资料来源：Martha Olney，“When Your Word Is Not Enough：Race，Collateral，and Household Credi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2)，(1998)：412.

表20—3　　家庭分期付款购买的商品（%）

正购置的商品	在购买商品的家庭中所占的百分比		利用分期付款购买的商品所占的百分比		利用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钢琴和音乐设备	5.9	5.5	80.8	93.6	4.8	5.2
留声机	7.9	6.6	48.0	53.6	3.8	3.6
家具	45.9	47.9	20.7	52.8	9.5	25.6
椅子	21.0	24.6	26.5	56.2	5.6	14.0

续前表

正购置的商品	在购买商品的家庭中所占的百分比		利用分期付款购买的商品所占的百分比		利用分期付款购买商品的家庭所占的百分比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白人	黑人
床架	18.4	21.7	26.6	57.3	4.9	12.6
床垫	20.3	21.7	23.2	56.4	4.7	12.5
桌子	13.8	18.5	31.2	59.5	4.4	11.2
书桌	8.6	14.8	38.1	66.7	3.3	10.0
沙发	8.6	11.9	35.1	63.7	3.0	7.7
餐桌	5.4	5.4	38.6	67.4	2.1	3.7
橱柜	3.4	4.8	38.9	65.8	1.3	3.2
家用电器	62.8	69.0	14.6	23.8	9.2	16.6
炉子	24.5	24.7	20.1	40.3	4.9	10.1
缝纫机	8.0	8.0	45.3	72.1	3.6	5.8
冰箱	6.2	8.4	19.8	40.3	1.2	3.4
洗衣机	3.0	0.6	15.9	40.0	0.5	0.2
吸尘器	5.1	1.2	7.7	20.0	0.4	0.2

资料来源：Martha Olney "When Your Word Is Not Enough: Race, Collateral, and Household Credi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2), (1998): 413.

这就意味着最终产品的经销商的任何中断都会导致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如此这些企业就会通过直接与零售商联系寻求在一些方面获得对其经销渠道的控制。詹姆斯·B·杜克的卷烟营销演绎了这一点。在1884年，杜克在他的工厂中装备了两台邦萨克卷烟制造机器。相比一个熟练工人通过手动杜克机器每天可以生产出3 000支卷烟，每一台机器通过连续工作每天能够生产12万支卷烟，这就非常容易使得在1884年存在的卷烟市场饱和。为了为这些卷烟创造以及维持销售市场，以及为了确保产品能稳定地流向消费者，杜克建立了一个拓展的销售网络，既关注当地的广告又通过与企业中的其他部门密切合作来规划从生产机器到消费者的卷烟的流量。

品　牌

类似杜克的销售部门一样，企业的销售部门同样有助于设立和维持产品的商标，特别是通过强调更好的质量或是独特的服务。例如，诸如芝加哥的阿尔莫和

斯威夫特屠宰业的生产商要求控制装载时的温度，希望确保消费者认为他们的产品是以适当的温度抵达市场的。诸如全国性收银机的创始人约翰·H·帕特森的其他厂商需要确保消费者知道 NCR 在产品的功效、适当的服务以及信贷方面提供了充分的说明。制造商督促购买者特别针对它们的品牌提出要求。商标是保护消费市场的一个途径，它们从制造商以及伪劣商品中区分开来。它们是消费者保护立法的不同寻常的市场形成机制的替代。

零　售

在农村地区，那里的零售部门仍然保持小而独立的特征，批发机构维持了它的顾客群体。然而，当拥有周边贸易区域的城镇里的零售商开始专门从事特定的渠道时，“普通商店”在其他地方迅速地消失了，但是令人感兴趣的是，零售功能的专门化并没有带来传统批发业务的减少。代替发生的是新类型的零售专营店的发展，通常是以大型专营店的形式出现，以及制造商通过广告树立起牢固的消费者偏好方面的不断增长的能力。

© BETTMANN/CORBIS

F. W. 伍尔沃斯——一个连锁店经营先驱于 1879 年在宾夕法尼亚的兰开斯特开了第一家店。以今天的价格计算，这就是一家 1 美元或 2 美元店。

百货公司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在已经获得肯定接受的新的零售组织中，百货公司的运行与商业贸易中日益专门化的这一趋势反其道而行之。当城市变得更大以及更拥挤时，对所有人购物的便利性而言，必须使得商品集中在单一的商店中就成为日益增加的诉求。而且，百货公司提供送货以及信贷服务。早期大城市中的百货公司形成于美国内战之后，源于纺织品商店针对不断增长的成衣贸易而努力去替代商品损失。商店转变成独立的部门时肯定存在分离，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经营者、购买者以及店员；分离一旦变得泾渭分明，部门就逐渐地租借给个人或是公司。

首先，百货公司从批发商那里购买商品。然而，诸如纽约的梅西、费城的约翰·沃纳梅克以及芝加哥的马歇尔·菲尔德这样一些超大型百货公司利用它们不断增长的规模，通过直接去制造商那里订货或是作为它们的销售代理而获得价格削减。因为它们运行的规模，拥有大量店员的大型商店不得不对所有顾客设立同一种价格，而且过去通过商品的价格来处理货物的活动很快就过时了。百货公司的概念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到 1920 年，甚至小城市也经常能够幸运地拥有一家百货公司。小型百货公司通过正规的批发渠道进货，而且它们的部门区分并不是很清晰，以至于它们与早期的普通商店非常相似。

连锁商店

对于一些企业家而言，通过在他们自己的部门中实现代理和经纪的功能以及直接从制造商和加工商那里购买商品，在特定的渠道下经销商品的成本将会下降，这一点很快就变得非常明显。当时的例子包括博得书店（Borders Books）、家得宝公司（Home Depot）以及玩具反斗城（Toys“R”Us）。为了取得在谈判上的势力以促使他们进行直接购买，企业家们不得不大量地扩大他们的零售量。这一销售量通过一个集中化的购买和管理授权与很多空间上分离的“连锁”商店的联合来实现。通过缩减或是消除多数信贷和送货服务，将会取得额外的节省。

直到今天仍然存在的一种早期的连锁是成立于 1859 年的大西洋和太平洋茶叶公司。从最初仅局限于经销茶叶和咖啡，公司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进行扩张，从而囊括了对日用百货的经销。在 1879 年，F. W. 伍尔沃斯开设了各种各样的商店，店里的商品以不超过 10 美分铸币的价格出售，这样的冒险成就了他日后的富豪身家。到了 1900 年，售烟店和售酒店通常是以连锁方式组织起来的，而且五金器皿商店和旅馆在集中化的管理之下很快就开始回落。到了 1920 年，作为美国零售业景象的一部分，食品杂货、药品以及各种连锁店牢固地建立起来。一些公司因而具有上千个销售店，但是连锁商店数量的巨大增长出现在 20 世纪

COURTESY OF LEVI STRAUSS AND CO. ARCHIVES

美国内战期间统一的男性服装尺寸开启了制衣行业的标准化过程，并且美国长筒靴和鞋子的制造商们稳定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舒适度，采用大规模生产技术的经济体降低了制衣成本，而且邮购征集也有助于扩大市场。

2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伴随着物理布局的创新以及将招致独立商店愤怒的销售活动。

邮购商行

尽管美国的电子商务通过邮购已经极大地推动了邮购商品的复苏，但是对于现代城市居民而言，可能仍然很难想象“邮购商品”曾经给美国人带来的震撼。实际上，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几十年中的很多美国家庭而言，仅仅是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或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每年的商品目录的邮寄就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虽然蒙哥马利·沃德当初设立公司的动机仅仅是向格兰奇成员出售商品，但他很快就把其他的农民以及很多城市居民纳入他的顾客群体。蒙哥马利-沃德和西尔斯-罗巴克公司在迁到芝加哥之后都经历了巨大的增长时期——在这样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它们能以装运成本和时间的最优经济组合对热切的中西部农民和东西海岸进行销售。农村地区的免费送货以及包裹邮寄体系的设立对于邮购商行来说不啻于是天赐良机。然而，到1920年，农民自己能够容易地到达城镇进行购买。如果邮购商行想继续在商业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它们将不得不改进它们的销售方法。

产品差异和广告业

在美国内战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商人们已经利用广告作为销售的手段，但是一旦耐用品或是耐用品的半成品是为有钱人定制的又或是面向无差别的农民，而且一旦主食通过散装集装箱出售的话，那么广告的用武之地是有局限的。事实上，在广告上的第一次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地零售商而不是针对消费者。鲜明的例外是专利药物的制造商们，它们是美国第一个通过全国性的广告进行宣传的销售商。①

在美国内战之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广告宣传最终成为被广泛接受的商业活动。相伴随的是对于真正全国性企业的信任，它们的品牌以及商标都深深地印刻在消费者的脑海中。经济透视20.1讨论了由于品牌、广告和产品差别的增加导致的垄断竞争。任一地方的诸如烟草、威士忌、煤油或是鞋等产品都可以依据购买者的想法，以及依据旨在消除用户对正在供应的商品质量的顾虑的制度化广告的信任程度而实行差别定价。当非耐用商品的质量提高的时候，特别是在衣服、皮鞋、袜子、内衣以及男士套装和大衣的制造行业中企业家们发现可以通过对品牌进行广告宣传来赢得一个全国性的品牌忠诚度。到了1920年，广告成了蕴含

① 人们怀疑专利药物普及的相当一部分原因是高酒精含量。大部分顾客平时滴酒不沾，当他们服药后不会意识到舒适感是由酒精带来的，而认为是药物中的“有益成分”发挥了作用。

10亿美元价值的产业。在一些领域，企业不断增加的规模是其全国性广告宣传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广告也有助于其自身去获得更大的规模。

一家企业不得不通过广告去保持它在行业销售中的份额，这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的事实。人们同样意识到当竞争厂商采取扩张化的战略时，在整个行业内都会增加对产品的需求。这些都不过是开端而已。两个变化隐隐约约使得未来美国的广告业大型化。一个是收音机，它在十年的时间内使得广告相比之前更有效。第二个就是人们购买的耐用消费品种类的变化。在1869年，耐用消费品一半的产出为家具；30年后，同样的商品种类仍然占据着总产出中的一半以上。但是在1910年之后，首先是汽车然后是电器使得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并且家具在耐用消费品产出中所占的份额迅速地下降。家具是一个在人们关于成功程度的想法里没有什么差别的商品，尽管人们仍然努力地对家具的销售进行广告宣传。另一方面，汽车和家用电器的产品差异很鲜明，这就对美国广告行业的主管们提出了一个精彩的挑战。

消费者保护的发轫

1891年《肉类检验法》(Meat Inspection Act of 1891) 以及1906年《纯净食品和药品法》(Pure Food and Drug Act of 1906)，是联邦政府对于经济体引人注目的干扰，它们是为了保护不够谨慎的消费者从而要求生产商必须保证产品的质量标准。在1906年，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屠场》(*The Jungle*) 得以出版并且赢得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关注。辛克莱描绘了有碍健康的肉类生产装置并且断言了间或可见的对有病动物的加工，这些激起了媒体耸人听闻的报道以及公众的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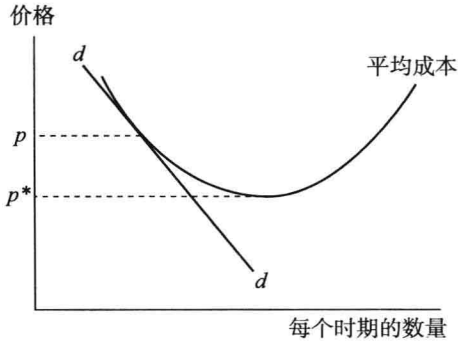
经济透视 20.1

垄断竞争

商标、广告以及产品差异的增加导致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垄断竞争。在1933年，出版了两本阐述新理论的著作，爱德华·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价值理论的重新定位》(*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 Re-orientation of the Theory of Value*) 以及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下图阐述了著名的“张伯伦切线解”。厂商所面临的需求曲线即 dd 向下倾斜，这表明厂商具有一定的垄断势力。即使厂商提高产品价格，因为它的有差异的产品，它也不会失去所有的顾客。例如，有些顾客就对李维斯牛仔裤或是C. V. 杰拉德博士 (Dr. C. V. Girard) 的生姜白兰地具有忠诚度，即使是当这些产品的价格相对其他同类产品上升的时候。这些厂商不会长时间地赚取额外收益。产业中的新进入者将会赢得一定的市场，从而将减

少对具有垄断势力的厂商的产品的需求，并且将迫使现有厂商采用更多的广告以促进销售，这样就增加了它们的成本。长期的均衡价格将处于 p 点。价格将等于平均成本，这就使得厂商仅获得一个正常的利润。

在某种意义上，在垄断竞争的产业里存在超额的生产能力。如果可以消除产品差别，也就是说通过广告以及要求厂商生产简单的、标准化的产品，结果将会是更低的竞争价格，近似地位于图形中的 p^* 点（近似是因为成本曲线与需求曲线一样会受到影响）。产业中将会有更少数量的厂商，每一家厂商生产更多的产品。然而，垄断竞争理论的批评者已经指出，产品的种类也许对消费者而言具有实际价值。尽管我们很容易取笑对于杰拉德博士生姜白兰地的偏好，但是就李维斯的铆钉牛仔裤而言，将会是另一件不同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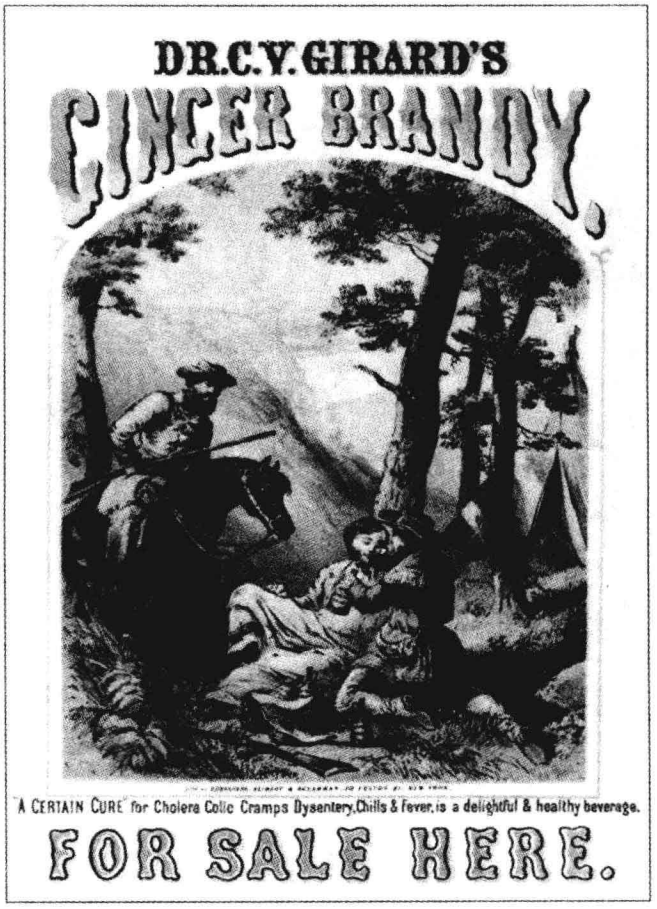


辛克莱的书是合时宜的，与 1898 年的“腐尸牛肉”丑闻接踵而至，这是有关西班牙—美国战争期间的事情，当时有人宣称掺假的牛肉提供给了部队。尽管辛克莱的断言以及涉嫌的丑闻在国会证词中最终发现是无根据的，这些法案却得以迅速地通过。

《纯净食品和药品法》的实施效果在刚开始是微不足道的，它仅简单地要求对一定的食品和药品的内容和商标进行联邦监管。为了执行这一法律，联邦政府向化学工业局提供了总额为 174 180 美元的经费。与此相对照，1906 年《肉类检验法》提高了畜牧局的预算，出于用于检查的目的，预算从 80 万美元增加到 300 万美元。

1906 年《肉类检验法》并不新颖。它仅仅是对 1891 年《肉类检验法》的一个修订，由于小型的地方性屠宰商及其合作组织通过冷藏的铁路车厢送往遥远市场的已放血、拔毛、去头、去内脏的肉是不卫生的，法律作为应付这些实际情况的手段而得以通过。[①] 诸如阿尔莫、斯威夫特、莫里斯以及哈蒙德之类的芝加哥肉类屠宰公司主宰了州与州之间的已放血、拔毛、去头、去内脏的牛肉的贸易。在 1890 年，它们在芝加哥的家畜屠宰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分别为 27%、26%、24%以及 12%。因为新的冷藏技术极大地降低了装运成本（已放血、拔毛、去

① Gary D. Libecap, “The Rise of the Chicago Packers and the Origins of Meat Inspection and Antitrust,” *Economic Inquiry*, 30 (2), (April 1992): 242 - 262.



© CULVER PICTURES

广告有助于增加消费者对诸如图中多用途饮料之类的新产品的需求。

头、去内脏的牛肉的重量大体上是完整牛肉重量的 1/3），这些屠宰公司以大大低于当地屠宰商的价格销售。出于反击的目的，当地的屠宰商尝试使人们怀疑冷藏过的牛肉，并且声明它并不是完整的牛肉。正如加里·利贝卡普告诉我们的，尽管这些声明是无根据的，大型屠宰商非常想看到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超大型的芝加哥屠宰商拥有私自的对于已放血、拔毛、去头、去内脏的牛肉的质量控制并且在保护它们的品牌声誉方面具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它们欢迎联邦对州与州之间的牛肉贸易进行检查，首先是因为联邦的检查会增加人们对其牛肉的信心，其次是联邦检查将会给每一家厂商提供关于其他厂商装运情况的清晰而又准确的公开信息。检查体系的公开性使得厂商在没有企业能够对销售份额协定进行欺骗的额外保证的基础之上采取联合或是市场分成协议。

1891 年《肉类检验法》对于跨州贸易的影响类似于 1890 年《食用肉法》对于出口的影响。两部法令通过在产品装运到国内和国外市场时强化每一家企业的质量控制标准，从而极大地满足了生产者的利益诉求。消费者是否从这些法律中

受益并没有证据来证实，但是通过第一批表面上是从消费者利益出发的检验法规，消费者保护的基础和先例已经确立起来。

COURTESY OF SEARS, ROEBUCK AND CO.

著名的西尔斯-罗巴克公司以及它的竞争对手蒙哥马利-沃德百货公司使得每个农民非常容易地就能买到大量价格合理的商品。

对外贸易

到了1900年，就总产出而言，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国家的领头羊。英国（世界上的第一个工业国家）排第二位，德国排第三位。到了1913年，美国的领头羊地位更是提高了，而英国则下落到了第三位。美国努力加强其在钢铁生产方面的前沿地位，而且美国和德国成为电气、化工和机械行业方面的领头羊。我们迟一点会再谈及，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产出已经下滑。相反，英国的产出持续增加。就资本的平均工业产出而言，在1900年英国仍然是世界的领头羊，并且在1913年英国仅仅比美国略低，而此时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是独占鳌头了。对于英国来说，仅仅是其他两个具有丰富自然资源以及经济运行体系更有利于增长的大国更迅速地增加了它们的产出而已。

在这一阶段，国际贸易的网络呈现出了它的现代化特征。工业化国家——美国、德国、英国以及随后的几个——生产制成品或是半制成品。作为交换，工业化程度不高的国家运送了前所未见的膨胀的粮食以及原材料，来支持日益增长的工业人口以及为工业厂房的设备和装置提供养料。

通信和交通方式的快速改善对于这一国际贸易体系至关重要。下面是一些例子。在1866年，第一次成功的跨越大西洋的电缆开始运行，在1869年铁路线路扩张到美洲大陆，在同一年苏伊士运河得以开航，而且在19世纪的后25年内海洋航行获取了巨大的生产效率收益。一个尤其重要的提高就是世界上很多地方铁路的发展，使得来自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俄罗斯和多瑙河流域，以及美国中部地区的廉价的粮食可以大量地涌入工业化国家。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以及19世纪80年代早期，船舶上的冷藏设备使得装运肉类、日常用品甚至水果均成为可能。供给增加的热带地区的农产品是：玉米、咖啡、可可、菜子油以及木薯。然而，在促使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分配方面，谷物的装运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进出口组成部分的变化

图20—1表明在1850—1900年间，美国对外贸易组成部分的变化。这一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描绘了美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在出口方面，图20—1表明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原材料的下降（诸如棉花），从占总出口的3/5下降到1/4。就天然的食品而言，从在1850年占总出口的约1%膨胀到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几乎占总出口的25%（反映了通过铁路从而使得西部贯通），而到了1900年下降到17%，并且在1915年之前持续下降。制造业食品一直相当稳定地攀升到占总出口的25%。如图所示，另外一个重要的趋势就是半制成品以及制成品的上升。（在1915—1920年间，半制成品以及制成品几乎占出口产值的一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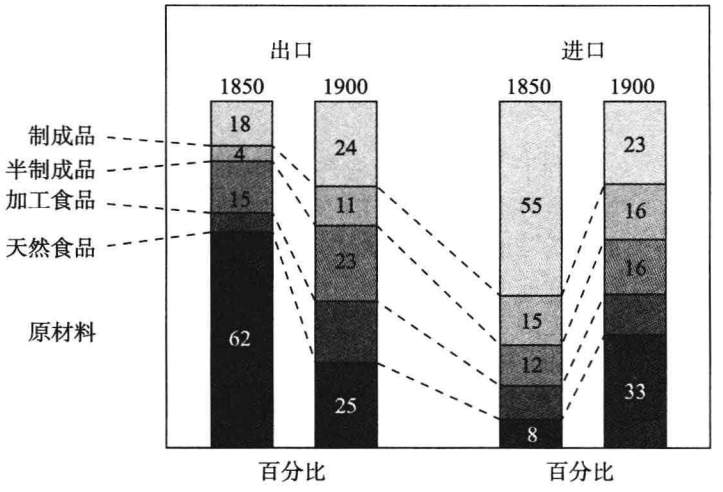


图 20—1　美国的外贸组成，1850 年和 1900 年（%）

资料来源：U. 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尽管并不是与出口方面同样明显，相反的转移可以从进口方面来发现。原材料的进口从在 1850 年占总进口的 1/12 上升到 1900 年的 1/3。进口的原材料——对于大型工业化必需而美国国内却还未找到的原材料——主要是橡胶、热带纤维以及诸如镍和锡这样的金属。天然食品的进口体现出不规则的上升或是下降，但是当美国开始进口咖啡、热带水果以及橄榄和椰子油时，进口的天然食品中所包含的物质内容在半个世纪中并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如果不进口，这些食品在国内的种植成本将非常高。对半成品的进口上升了一些，但是当美国产能上升时，对最终产品的进口有了重大的下降。

贸易关系同样发生了变化。尽管与之前相比，在美国内战之后欧洲成为美国更重要的购买人，但是在 1885 年左右，美国对欧洲的出口却出现了相对下降。在 19 世纪 70 年代和 19 世纪 80 年代期间，欧洲几乎接纳了美国所有出口中的 4/5；到了 1920 年，这一份额下降到 3/5。与此同时，美国仍然保持着欧洲最好的购买人这一角色。在 1915—1920 年间，由于受战时破坏的影响，美国进口中欧洲所占的比例急剧下降，而这也持久地伤害了两地之间的贸易。

在 20 世纪的前 20 年内，美国找到了位于亚洲和加拿大的新顾客，并且他们开始显现了对拉美市场的兴趣。在进口方面，亚洲国家以及加拿大正在供应大部分的原材料，这些原材料就成了美国典型的进口。南美已经在对美国供应咖啡以及特定的主要原材料上获得了稳固的地位。

到了 1900 年，美国在制造业方面能取得杰出成就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正如加文·赖特的研究已经证明过的，美国人的杰出成就并不是由相对丰富的资本、熟练工人或是技术知识所导致的，它是由相对丰富的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所

导致的。[①] 在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石油产量的65%、世界铜产量的56%、世界煤产量的39%、世界锌产量的37%、世界铁矿石产量的36%以及世界铅产量的34%，并且这个国家是世界上生产其中每一种材料的领头羊。在其他材料的生产上，它要么是领头羊要么是领导者之一。美国丰富的不可再生资源并不是由于自然界的一系列偶然造成的。制造商拥有的巨大而又稳定的国内市场以及在财产权设立方面富有弹性的制度，共同推动了对自然资源的探索以及开采。

在这一杰出成就上值得强调的是，对任一丰富材料的发现并不会在依赖原材料的基础上导致繁荣，正如我们在今日的世界中所见到过的石油资源丰富的很多国家一样。即使当自然资源用尽以及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进口的依赖增加时，对材料的扩张以及在制度上偏好多样化的生产和经销形式维持了增长。

贸易余额的变化

总结这一阶段的美国对外贸易历史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检验一系列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从而发现存在于主要项目上的变化。如表20—4所示，在1850—1873年间，美国总计支付了180万美元（第2栏和第3栏）。美国的居民实际上很满意商品和服务的流入并且对现有的外国投资支付利息和股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外国居民仍然对美国商业进行新的投资（第4栏），尤其是在铁路上进行新的投资。在这一时期另一个余额项目就是流入或者借给了美国的2亿美元外国货币通过移民或是他们的家庭转变成美元。此类支付被称为单边转移支付（unilateral transfers）（第5栏）。

表20—4　　美国分时期的国际收支（十亿美元）

(1) 时期	(2) 净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	(3) 净投资收入	(4) 净资本交易	(5) 单边转移支付	(6) 黄金货币存量的变化[a]	(7) 误差和遗漏项
1850—1873	−0.8	−1.0	1.6	0.2	−0.0	
1874—1895	1.7	−2.2	1.5	−0.6	−0.4	
1896—1914	6.8	−1.6	−0.7	−2.6	−1.3	−0.6

a. 负号表示美国黄金货币存量的增加。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1), 865-869.

① Gavin Wright,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September 1990): 651-668. 后面的矿产数据来自于该书661页。

从1874年至1895年，美国农产品以迅速增加的数量在世界市场上流通。当我们考虑美国的制造业同样变得日益有效率时，它实际上体现了美国依赖于矿产资源的产品所具有的日益增加的比较优势，这样当它们的出口增加时我们就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了。这些年，由于美国人利用外国人的服务的趋势不断增长，合意的贸易余额削减了。即使如此，美国人仍然在当期的信贷项目上拥有17亿美元的余额（第2栏），并且外国投资者蜂拥着向这个国家总计投入了15亿美元（第4栏）。支付给外国人的利息和股息20亿美元冲抵了这一信贷，并且在贸易余额上，当移民向他们原先国家里的朋友和亲戚寄回大量的货币时，单边转移支付发生了逆转。为了弥补这一贸易余额，美国进口了4亿美元的黄金（第6栏）。

在1896—1914年的繁荣时代，美国进入了拥有经济实力的年代。贸易余额迅速增长到90多亿美元，尽管通过从外国人那里购买其服务，这一数字减少到少于70亿美元。通过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息和股息进行支付、移民向他们家庭的汇款、对外投资以及黄金的流入，冲抵了这一贸易余额。国际资本流动的逆转虽然相对于美国的国内投资较小，但它仍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这就说明美国成为贷方而不是借方，这是一个成熟经济体的信号。

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采纳

美国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实行保护主义策略（除了英国，大多数欧洲国家也是如此），在美国内战爆发后更是如此。通过设定从所未见的高关税壁垒，美国人在有利于国家利益的政策中寻求控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图20—2刻画了关税，或者说常规关税在总进口以及进口关税中所占的百分比在100年中变化的轨迹。正如该图所表明的，在美国内战前夕，相比之前的年代保护是受到限制的。

在1861年，美国关税的最大百分比不超过24%，而且平均的课税商品比例小于20%。美国内战之前15年内全国性的繁荣看起来反驳了保护主义者关于一个健康的经济需要高关税支持这一观点。然而到了1864年，将近30年的趋势被急剧地逆转而且确切地使得美国的高保护关税的基础存在了将近3/4个世纪。不存在对于这一政策如此变化的广泛需求；仅仅在制造业中心，老一套的保护观点得到了热情的支持。为了赢得工业化东部的选票，在1860年大选中共和党鼓吹更高的关税。在恢复执政之后林肯就职典礼之前，国会通过了1861年《莫里尔法案》（Morrill Act of 1861），这是一系列对进口征收前所未见的高关税法律中的第一部。因此，在战争爆发之前，在南方的关税反对者脱离国会之后，国会实际上已经开始着手行动了。为美国内战融资的要求，当时进口关税以及国内货物税提供了主要的财政收入，这就为提升罕见的高关税提供了借口。到了1865年，关税的平均水平是48%，而且几乎对任何要求提供保护的商品都准予保护。

在战后的25年内，两个党派中的一些领导人尝试削减“战时关税”。在1872年，为了避开看起来即将发生的巨大关税下降，华盛顿的保护势力同意对所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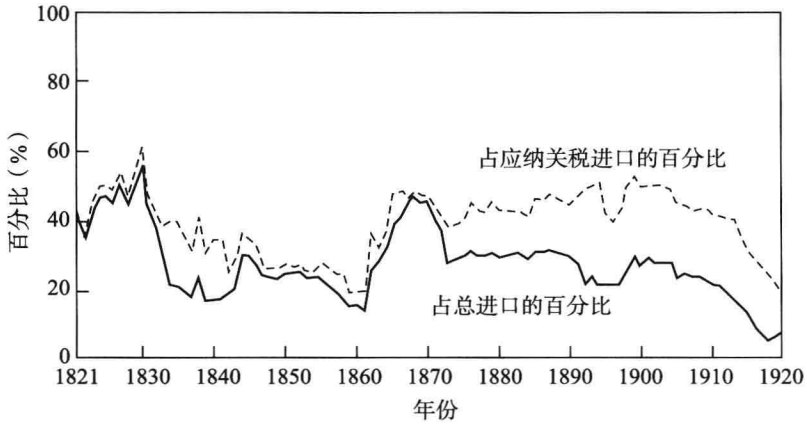


图 20—2　关税占总进口和应纳关税进口的百分比，1821—1920 年

关税在美国内战之前平稳地下滑，此后新政治事件导致了关税的急剧增加，并且这一新水平在 20 世纪初期之前一直得以保持。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1），888.

保护关税平缓减少 10%的关税税率。然而，在 1875 年，关税又恢复到早期的水平，并且在有些时候看起来消费者和选民顺从于持久的高进口税率。然而，人们也逐渐认同高关税实际上是提高了消费商品价格的一种税收这一观点，而且人们也逐渐对高关税水平的保护促进了商业联合的迅速增长这一观点产生了怀疑。在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他明确地把民主党置于主张更多自由贸易的一边，但是有两个民主党党员抨击保护体系导致了令人失望的中庸结果。克利夫兰在 1888 年的挫败激发了人们进行根本改革的向往。1890 年《麦金利关税法案》（McKinley Tariff of 1890）将关税保护的平均水平提高到 50%，它增加了关税征收列表上的商品条目，并且法案重申共和党一致地支持高关税。关税在克利夫兰第二个任期内（1893—1897 年）进行了并不明显的削减之后，1897 年《丁力法案》（Dingley Act of 1897）把关税税率提高到 50%以上。对很多商品将依据其价值征收进口商品关税，而不再认为它们是免税的。可想而知，免税商品大多数是原料以及需要进一步加工的半成品，但是甚至有些农产品、天然羊毛以及兽皮都置于受保护的目录之中。

1897—1914 年的繁荣使得非常容易地就可以对高关税进行辩护。保护主义者认为国家之所以经历了高水平的就业和经济活动，是因为高关税的存在。然而到了 1900 年，美国工业很明显已经成熟。美国制造商正在欧洲的市场中参与竞争；显而易见，尤其是在金属加工行业，绝大多数美国企业已经不再需要保护了。曾经享受了将近一个世纪高关税好处的美国纺织业向工人支付最低的工资，并且它拥有最高的失业率，而且相比任何其他类型的生产商，纺织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而且，到这一时期它充分地证明了对于消费者而言，进口关税通常提高了那些受保护商品的价格。在 20 世纪的前 10 年内，共和党人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升的压力，选民谴责高关税，而且民主党政治团体也在不断地利用这一政

治上的不稳定。1909 年《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Payne-Aldrich bill of 1909) 对原来的高关税没有任何的减轻，反而导致了广泛的关税保护。

在 1912 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承诺降低进口关税，而且在 1913 年《安德伍德-西蒙斯法案》(Underwood-Simmons bill of 1913) 中也提出要降低关税。这一法案对铁和钢免征进口关税，并且极大地降低了诸如棉纺织品和羊毛制品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项目的进口关税。结果就导致了尽管仍然具有保护主义的意味，但却是一个经过简化的关税结构，并且平均关税下降到了曾经存在了几十年的高关税的一半左右。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任期内，关税的平均水平略低于 25%——这与 1860 年之前的水平大体上一致。

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都接受关税保护将有利于国家的“幼稚”产业的观点。一家企业在刚起步的时候，因为工人和管理者并没有多少工作岗位上的培训，它的生产率会很低，同时企业也可能无法应付来自国外成熟企业的竞争。关税保护将会为国内企业的成熟赢得牢固的时间。但是到最后，关税保护将会被废除。在长期看来，消费者从朝气蓬勃的国内生产商那里所获得的收益将会抵消短期关税保护的成本。

体现在美国内战之后长期关税保护历史中幼稚产业的观点的问题就在于，这一时期的“幼稚”产业老是长不大。正如贝内特·巴克和爱德华·雷已经论证过的，整个 19 世纪后期的关税结构以及随后的保护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它是由已建立起来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所驱动的，而不是基于就经济的总体来说，需要对幼稚产业加以保护这一科学决断。①

尽管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批评为了建立产业需要对其加以关税保护这一观点，但是我们也不能夸大关税保护给美国人民带来的成本。在很多受保护的产业里，激烈的国内竞争是来自国外竞争的一个近似替代。在 20 世纪初期，进口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稍多于 6%，并且当时的人们很少会想到甚至在取消所有的关税保护之后，这一数字增加得异常快。实际上是因为关税保护的成本对个体消费者而言相对较小，结果是国会对寻求关税保护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敞开了大门。

所得税

特别是在南部和西部，反对保护关税的势力很强大。但是如果削减关税，联邦政府的收入将来自何处呢？按照民粹主义者以及其他改革派的说法，答案就是它将来自所得税。所得税并不是全新的观点。在美国内战之前偶尔在州范围内采用所得税，并且有时被提议在国家范围内采用。内战期间的所得税曾经是一个成功的挣钱机制。1894 年，国会通过了所得税法，但是在 1895 年，这一立法却被宣布违宪。推翻最高法院的决议则要求对宪法本身进行修订，由于对所得税的支

① Bennett D. Baack and Edward J. Ra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riff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0 (1983): 73 - 93.

持日益增加，从而使得对宪法的修订成为可能。

在两种类型的支出上，由所得税来为其融资被证明特别适用并且它也获得了更多的支持：更可观的军队退休金以及日益增加的尤其是海军上的军事开支。对海军建设的支持反过来又可以解释为美国在对世界殖民地和海军霸权的竞争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我们在后面将会讨论这一点）。到了1907年，西奥多·罗斯福把美国的大白舰队（Great White Fleet）派往全世界巡演，以主力舰的火力来算，美国舰队的实力已经是仅次于英国的第二位。而且，有些在早期反对所得税的州发现它们能从联邦的海军建设开支中获利。

在1909年，国会为了采用所得税而通过了一项宪法修订案；在1913年，这项法律正式生效。正如贝内特·巴克和约翰·雷在他们的经典研究中所归纳的，所得税并未造成政府支出在这个世纪内随后产生的巨大扩张，但是所得税实际上使得这一情况有可能出现。①

帝国主义世界中的美国

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西欧迷恋于拥有更多的陆地。② 在1875年之前几乎所有没有经过欧洲人勘探并且欧洲人在地图上也未标明的非洲内陆地区，现在被主要的欧洲国家瓜分完毕，仅有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保持独立。在亚洲，法国控制了英属印度的附属地缅甸，而且英国扩张了对马来半岛国家的控制。虽然中国避免了地理上的分裂，然而它不得不对主要的欧洲霸权国家采取经济让步。到了19世纪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处于被殖民的状态。

兰斯·戴维斯和罗伯特·赫滕巴克细致的研究证明了英国人民维持英帝国的成本超过了其所获得的经济利益，尽管有些英国居民及企业有所获益。③ 然而，特殊利益团体的联合、对欧洲其他霸权国家的恐惧以及对潜在经济获利夸大其词都使得争夺殖民地的竞争全力进行。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内，美国都远离了争夺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的竞赛。在美国内战之前，南方政治家把中南美洲看做是殖民地，并且它们也许可以作为蓄奴地区并入合众国，但是这些努力变得毫无价值。在北美地区，美国人紧盯着向西的扩张，并在有必要的时候从欧洲强权国家和美国原住民的手中强行抢夺控制权。可以肯定地说，这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但是在争论帝国主义的是与非时那个年代的美国人认为并非如此。

---

① Bennett D. Baack and Edward J. Ray,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Income Tax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607 - 625.

② 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有趣重释，参见 Stanley Lebergott, "The Return to U. S. Imperialism, 1890—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229 - 252。

③ Lance Davis and Robert Huttenback,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The Economic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美国在1898年前获得的大陆范围以外的唯一殖民地就是阿拉斯加（1867年），在那时这一殖民地被认为几乎没有一点价值。1893年，煽动强占夏威夷的活动出现了，但是美国人民在利用强硬手段对付当时的夏威夷政府上畏缩不前，并且这一岛屿在1898年之前没有被完全强占。正如本章的结尾所做出的解释，除了赫斯特（Hearst）和普利策（Pulitzer）报纸所发动的大国沙文主义运动之外，商业利益集团通常反对毫无必要以及灾难性的美国—西班牙战争，对于这一冲突最初并没有获得广泛的支持，直到1898年2月15日，因为美国海军的主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海港遭遇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此时才激发了美国人民的战争情绪。“辉煌的短期战争”（正如国务卿约翰·海向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所描述的）的迅速结束以及令人满意的结果促使美国人民更多地考虑向他们的大陆之外的地区进行扩张。

第一个决定主要是关于对西班牙的前殖民地古巴、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的处置问题。美国给予了古巴正常的独立，波多黎各保持殖民现状，但是1901年《普拉特修正案》限制了古巴的独立地位，以至于在实际上古巴成了美国的保护国。美国并没有准予菲律宾独立，它宣称菲律宾为美国的殖民地。随后出现了叛乱，美国军队残忍地镇压了这次叛乱。因为太平洋的这些岛屿以及它们与东方的贸易来往，美国坚持在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通俗地讲，也就是美国坚持与其他欧洲强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机会均等。在西半球，美国在1903年从新独立的巴拿马共和国那里永久租借了巴拿马运河区域，并且在1914年，运河的全线畅通确保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与中美洲地区的持久利益。

实际上，在运河开始建设的前两年，已经提出了所谓的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1904年致国会的便条中确切地说明了一个原则，也就是把门罗主义作为干涉拉美国家事务的一个借口。罗斯福认为一个积贫积弱的政府需要向一些“文明”国家寻求帮助以恢复秩序，并且按照门罗主义的观点，因为欧洲的干涉不可容忍，所以美国在“公然的错误和无能为力的情形下”就有可能被迫对这些国家执行治安权。欧洲并未受到这样一个国际化治安权设想的干扰，但是拉美国家却深陷其中——而且它们有理由感到恐惧。

没过多长时间，美国就等到了实施罗斯福推论的机会。当多米尼加共和国不能履行它的负债时，某些欧洲国家威胁通过武力来收取支付的款项。新罗斯福主义要求美国的干预必须对这样的行动先发制人。1905年美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签订的条约授予美国收取关税权，所收取关税中的55%支付给国外债权人。1916年，多米尼加政府竭尽全力想脱离美国的主宰，而美国则派出海军去镇压这次叛乱。1914年，海地变成了美国的保护国，同样也是通过海军的协助。美国军队如此频繁地在尼加拉瓜登陆，以至于此后持续不断的片段成了永久的笑话。

在反对独裁者波菲里奥·迪亚斯的1910年墨西哥革命之后，已经深陷在铁路和石油投资中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者迫切要求对墨西哥进行干涉并恢复其秩序。有一段时间，威尔逊总统鼓励拉美国家通过逐渐的吞食侵入墨西哥。但是

“留心等待”在因美国财产遭到破坏而产生的号叫中持续了太长的时间，而且美国的政治家们也不能容忍对美国尊严的不断冒犯。美国军队于 1914 年和 1917 年向墨西哥领土开赴——第二次是在“黑人杰克”（Black Jack）约翰·潘兴将军的领导之下——去捉拿“土匪”潘乔·维拉（Pancho Villa）。因为 1917 年墨西哥宪法得以采用，骚乱暂时地得以平息，在 1920 年初骚乱才又一次出现。

人们援引经济动机来解释美国的帝国主义式的冒险活动。回想一下经济推理命题 2 和经济推理命题 4。也就是说，美国寻求外国殖民地为美国资本提供了一个出口以及为原材料提供了廉价的来源。然而，很少有证据能支持这一解释。美国对外投资中仅有一小部分是投资在美国拥有政治控制的地区，并且美国从世界进口的原材料中仅有一小部分是来自这些地区。[①] J. P. 摩根以及其他大型商业和金融业的领导人反对美国—西班牙战争。其中，他们担心美国银行持有的西班牙股票的价值以及美国对古巴蔗糖产业投资的价值。如果以特殊利益集团对回收债务的担心或是保护其他利益集团为基础，那么我们就能够提出一个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然而，显而易见的是，非经济方面的动机是美国帝国主义化的主要推进器。人们普遍相信美国是不得不在全球权力政治的“伟大博弈”中扮演重要角色，并且它也这样做了，美国需要海外基地和殖民地，尤其是需要为它的舰队装煤的地方。

然而，很多美国人仍然不信服。1898—1918 年的这些年里，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美国人民不得不尴尬地相信诸如“显而易见的命运”以及“扩张自由区域”这样的委婉说法，但是这并不能长期掩盖美国使用强硬的手段获取其不断壮大的帝国的事实。而且人们对于美国使用的外交手腕也不可能保持赞同，这些外交策略主要用于推动或是保护私人的金融或是商业利益。对帝国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们则认为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寻求经济利益的投资者们应该独自去承受他们在不稳定的政府里进行投资的风险。正如经济推理命题 4 所声明的，“游戏规则”影响选择。

美国帝国主义冒险活动的经济后果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其外交结果则很重要。这些冒险活动迫使美国把其注意力转向国外并且提升了其军事实力。抵消这些得益的是来自于中南美洲自然形成的联盟中的人们对于美国的恐惧以及仇恨，对于他们的热望美国人在当时实在是应该抱以同情。新一代的美国人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消除这一情感上的冲突。即使如此，20 多年的残酷外交的损害不会轻易地被消除。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饱受欺凌的人们点燃世界革命的烽火时，由于美国早期的帝国主义化时期曾经让人们吃尽了苦头，我们就不难意识到它将会对美国的国际关系造成长期的负面影响。

---

① Robert B. Zevin,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March 1972): 316-370, and Stanley Lebergott, “The Return to U. S. Imperialism, 1890—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June 1980): 229-252.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aack, Bennett D., and Edward John Ray. "Tariff Policy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1870—1929."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1973): 3 - 24.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riff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1983): 73 - 93.

——. "Special Interests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Income Tax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1985): 607 - 625.

Chandler, Alfred D.,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Clark, V. S. *History of Manufactur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Vol. 1. New York: McGraw-Hill, 1929.

Davis, Lance, and Robert Huttenback. *Mammon and the Pursuit of Empire: The Economics of British Imperi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The Thomas Alva Edison Papers, http://edison.rutgers.edu/.

Galloway, Lowell E., and Richard K. Vedder, "The Increasing Urbanization Thesis: Did 'New Immigrants' to the United States Have a Particular Fondness for Urban Lif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8 (1971): 305 - 320.

Hawke, G. R. "The United States Tariff and Industrial Protec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8 (1975).

Irwin, Douglas A. "Could the United States Iron Industry Have Survived Free Trade after the Civil War?"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7 (2000): 278 - 299.

——. "Did Late-Nineteenth Century U. S. Tariffs Promote Infant Industries? Evidence from the Tinplate Indust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2000): 335 - 360.

Lebergott, Stanley. "The Return to U. S. Imperialism, 1890—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0): 229 - 252.

Libecap, Gary D. "The First Consumer Quality Guarantees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Meat Inspection Acts of 1890 and 1891." Working Paper 88 - 12, Karl Eller Center, University of Arizona, 1988.

Lipsey, Robert. "Foreign Trade."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Livesay, Harold, and Glenn Porter. *Merchants and Manufactur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1.

Olney, Martha L. *Buy Now-Pay Later*.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 "When Your Word Is Not Enough: Race, Collateral, and Household Credi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2), (June 1998): 408 - 431.

O'Rourke, Kevin H.,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Globalization and History: The Evolution of a Nineteenth-Century Atlantic Economy*.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9.

Simon, Matthew. "The United States Balance of Payments, 1861—1900." In *Studies in Income and Wealth*, Vol. 24.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0.

Smolensky, Eugene. "Industrial Location and Urban Growth." In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An Economist'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ed. Lance E. Davis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Stone, Irving. *The Global Export of Capital from Great Britain, 1865—1914: A Statistical Survey*. New York: St. Martin's, 1999.

Taussig, Frank W. *The Tariff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utnam's, 1932.

Weiher, Kenneth. "The Cotton Industry and Southern Urbanization, 1880—193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120 - 140.

Weiss, Thomas. "Urbanizati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Service Workforce."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8 (1971): 241 - 259.

——. "Th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of the Urban and Rural Workforces: Estimates for the United States, 1870—191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1972): 919 - 937.

Wilkins, Mira. *The Histo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191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Williamson, Jeffrey G. *American Growth and the Balance of Payment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4.

——. "Globalization, Convergence, and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6 (1996): 277 - 306.

Wright, Gavi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Industrial Success, 1879—1940."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990): 651 - 668.

Zevin, Robert B. "An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Imperi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 (March 1972): 316 - 370.

第4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14—1946年

经济和历史回顾：1914—1946 年

1. 两次世界大战席卷了工业国家，劳动力、资本遭受巨大损失，并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苦难。美国以国内资本完好无损及相对于其经济竞争对手地位的加强摆脱了每次冲突。

2. 在俄国，一个共产主义政府上台。苏联忙于长期的竞争，首先是与德国，后来是与在 20 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主导世界范围内大国政治的美国。

3.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股市繁荣是基于一个持续繁荣的新时代业已到来的普遍预期。1929 年大崩溃使这些希望破灭，并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经济收缩。

4. 20 世纪 30 年代的大萧条是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灾难。银行系统崩溃，农产品的价格下降，工业生产急剧下降。在最低点，在 1933 年，有四分之一的工人失业。

5. 作为经济大萧条的结果，联邦政府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对私营部门的管制和社会福利支出增加了。1929 年，联邦支出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1947 年，它达到 15%。

6. 由于大萧条，国家的财政制度发生了根本变化。实施存款保险制度，禁止支付存款利息，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以调控股市。此外，世界货币体系发生了根本性改变。金本位制消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了美元起关键作用的新制度。

第 21 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 年

本章主题

1917 年 4 月美国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美国只积极参与了 19 个月，但很快就调集和动员了可观规模的资本和劳力。军队从 1916 年的 18 万人增加到 1918 年的近 300 万人。大量新机构试图管制价格，决定优先顺序，并分配资源。当战争结束时，大部分战时管制被放弃，大部分战时机构被废除。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中联邦政府的作用增大提供了先例。许多人从战争中得出经验——政府可以在应对危机中发挥强大的积极作用，当国家面临大萧条时这一经验得以被提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

到 1914 年，欧洲的军队已在持久的军备竞赛中建立，而它的各个国家已由军事同盟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对抗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危险的事态。例如，在法国，由于 1870—1871 年的普法战争法国被迫向德国割让领土和赔偿，许多人仍然寻求报复。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对动荡的斯拉夫少数民族的恐

惧在增加。在英国，德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的企图产生了高度紧张的局势。德国则害怕被敌对军事联盟包围。而这些恐惧和冲突可被大大扩展。

即使在战争前夕，仍有相当多的乐观主义者认为和平将延续。欧洲已经几十年没有发生较大的战争，而且在此期间，工业化和相对自由的国际贸易使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将摧毁这一进步成果的战争似乎很不合理。而且，许多人相信，劳工运动导致的国际团结程度的不断提高会破坏有帝国主义列强参与的对战争的支持。但这些乐观主义者错了。

1914 年 6 月 28 日，奥地利大公斐迪南被一个塞族人刺杀的事件引发了连锁反应，它很快将欧洲卷入一场前所未见的血腥战争。一边是协约国：英国、法国、俄国和几个小国。另一边是同盟国：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它们的同盟。许多人认为，战争会像普法战争那样很快结束。但在西线，德国进攻法国陷入堑壕战，造成了甚至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死亡人数也不能打破的僵局。根据保守估计，有 1 000 万人在该战中死亡，另有 2 000 多万人受伤。①

美国经济的第一个反应是金融恐慌。股票市场暂时关闭，随着储户试图把钱兑换成黄金，银行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但是，危机很快就过去了。根据 1907 年危机后通过的《奥尔德里奇-弗雷兰法》（Aldrich-Vreeland Act），银行已被授权发行紧急货币作为黄金的临时替代品，而这种货币的发行结束了这场危机。这种货币总额一度达到公众手中货币的近四分之一。②在美国的整个中立期间（从 1914 年直到 1917 年），很显然，这一时期对美国企业来说大大有利可图。由于英国海军封锁，德国从美国的进口下降到几乎为零；但英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开始从美国购买价格不断上涨的大量食品和弹药。美国向欧洲飙升的出口和它下降的进口之间拉开了巨大差距。欧洲通过减持美国债券、输出黄金、举借新债支付这些出口。当战争开始时，美国是债务国，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正常状态。在战争结束后，美国是持有世界大部分货币黄金储备的债权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世界金融中心是伦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金融中心是纽约。由于战斗如此遥远、如此血腥，美国的情绪是最初赞成避免卷入战争，但最终，许多势力和事件结合将美国推向积极参与到协约国一方，部分原因是英国和美国之间文化和语言的密切关系。但使公众舆论转而反对德国的关键因素是德国在战争中对潜艇的使用。1915 年，在英国船舶卢西塔尼亚（Lusitania）没有受到警告就直接沉没（1 198 人丧生，包括 124 名美国人）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德国发出了一系列措辞强硬的警告。有一段时期，德国限制了潜艇的使用。然而，1917 年初，为了在美国的干预能扭转局势之前孤注一掷，从而以饥饿迫使英国投降，德国重新发起无限制使用潜艇战的方针。

美国参战将是简短而具有决定性的。美国于 1917 年 4 月 17 日宣战。17 个月后，于 1918 年 11 月 11 日与德国签订了停战协定。美国军队在赢得许多重大胜

---

① Roger Chickering and Stig Forster, *Great War, Total War*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

②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172.

利上发挥了作用。但不是胜利本身，而是美国增援部队的巨大压力迫使被多年的战争和封锁消耗殆尽的德国人妥协。事实上，当战争结束时，同盟国仍占领协约国的大量领土，从法国到克里米亚。

美国参战

如在本章内容介绍中所指出的，美国军队从 1916 年的 179 000 人增加至 1918 年的近 300 万人。约 200 万人在美国海外远征军服役，其中约四分之三参加了战斗。于 1917 年 4 月公布一个军事草案，其中包括熟练工人延期服役制度。美国人参加了激烈的战斗，117 000 名美国人在兵役中死亡，一半以上死于疾病。美国生产了大量军火和武器，并发起了一个伟大的造船计划。

军事行动在财政上的表现是联邦政府支出的大幅增加，从 1916 年占 GNP 的 1.5%至 1918 年的 24.2%。美国参战开始时该国运营接近充分就业：1916 年的失业率为 5.1%。(这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有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和资本储备形成鲜明对比。) 因此，在不减少平民消费的情况下要大大增加武器和其他军用物资的供给是不可能的。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融资

政府从 4 个基本途径获得战争所需的资源：(1) 征募，包括征兵，征用食品和其他原料，以及占用士兵宿舍；(2) 征税；(3) 借贷，其中可扩大到包括出售现有资产，如土地和未来付款的索赔权；(4) 印钞票。我们可添加第五类，给战争的自愿捐款。这里的关键是找出各国政府可以获取的超出可自动获得的资源的途径。后三种途径——征税、借贷以及印钞票——通常被称为筹措战争的三种方式，因为它们是到目前为止现代政府获得支持战事所需资金的主要方式。

1916 年国会征收遗产税以协助重整军备计划筹措资金。要重新分配“强盗”财富的民粹主义改革者曾长期主张此税。联邦一级曾以战时需要为理由成功抵制该税。(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美西战争以来的第一次战争。) 但是，自 1916 年通过后，遗产税成为联邦税收制度的一个永久但很小的部分。

经过大量争论，1917 年 10 月 3 日国会通过了《战争税收法案》(War Revenue Act)。该法案增加了企业和个人所得税 (最高一级税率是 70%) 并设立了消费税、超额利润税 (对于企业) 和奢侈品税。表 21—1 显示了战争的总财务成本及它如何分布于各种资金来源。税收很重要，但借贷更为重要，占融资总额的 61%。

为什么国会宁愿借贷？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借款掩盖了一些战争费用。当税收被提高时，谁在对谁做什么完全昭然若揭。也可以认为战争是一种投资——用威尔逊总统的话说就是“为保卫世界民主而战”。既然后代将受益，为何目前一

代要承担全部的战争负担？此外，将税收提高到足以为所有战争融资将减少工作努力。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为，长期来看使用借贷来“平滑”税收比较好。

威尔逊的财政部长威廉·吉布斯·麦卡杜研究了南北战争的融资并得出结论，财政部长萨蒙·蔡斯曾犯了错，因为他未将购买战争债券与爱国主义更紧密地联系起来。麦卡杜发起了一项营销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券的积极计划，以使“爱国主义资本化”[①]。他举行巨额债券集会，让名人如道格拉斯·范朋克和玛丽·璧克馥力劝众人购买战争债券。查理·卓别林制作了一部电影，展示了购买战争债券如何帮助战争融资。这一切如何起作用非常值得商榷。尽管有这些大吹大擂和巨大且往往恶毒的反德宣传，美国政府仍发现它不能出售支付的利率远低于市场利率的债券。[②] 经济推理命题 3（经济激励很重要）既适用于和平时期也适用于战争时期。

表 21—1　　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融资，1917—1919 年

	总计（十亿美元）	比例（%）
战争支出	31.0	100.0
税收	7.6	24.5
向公众借贷	19.0	61.4
印钞票	4.4	14.1

注：总战时支出被计为 1917—1919 年联邦政府支出的总和减去 1916 年平均支出的 3 倍。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Series Y336 (expenditures), Y335 (taxes), X594 (U. S. government obligations held by commercial banks), and X800 (U. S. government obligations held by the Federal Reserve).

政府还依靠创造新货币来筹措资金。在以前的战争中，该机制曾经很简单。在独立战争时，政府已印制大陆券（Continental dollars）；在南北战争时，发行了绿背纸币。现在的机制更为复杂。当美联储在公开市场上购买债券时，它就是通过创造以前不存在的存款。当存款被存放在银行体系时，这些存款成为银行的货币和信贷进一步扩张的基础。总而言之，如表 21—1 所示，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系统获得价值超过 40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大约为战争总融资的 14%。即使这个数字在某种程度上也低估了货币创造的影响，因为银行给债券购买者提供个人贷款，该贷款由政府债券担保。尽管这一交易在银行的账目上作为个人贷款出现，它实际上是间接购买政府债券。

通过创造货币为战争筹措部分资金的最终结果是货币存量和价格水平的大幅度增加。如表 21—2 所示，1914—1920 年间货币存量约增加了一倍，价格水

① David M. Kennedy,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105.

② Margaret G. Myers,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280 - 283, and William J. Schultz and M. R. Caine, *Financi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Prentice-Hall, 1937), 533 - 539.

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在销售战争债券。

平也是如此。但是请注意，价格并没有像货币数量论的天真版本将预测的那样，与每单位的货币实际产出同比例上涨。见经济透视 19.1。1915—1918 年间，价格上涨速度超过每单位货币产出（K 下降），1918—1919 年更慢，而 1919—1920 年更快。可以对这种模式做出一个相当简单的解释。在受威胁和实际战争的年代，通货膨胀的担心促使人们花钱。战争的结束创造了回归价格稳定降低通货膨胀的预期。最后，一个意想不到的战后繁荣重新点燃经济活动和通胀预期。

表 21—2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货币和价格

年份	货币存量（十亿美元）	每单位实际 NNP[a] 的货币（1914 年＝100）	隐式 NNP[a] 价格平减指数（1914 年＝100）
1914	16.39	100.0	100.0
1915	17.59	104.1	103.1
1916	20.85	105.2	116.5

续前表

年份	货币存量（十亿美元）	每单位实际NNP[a]的货币（1914年=100）	隐式NNP[a]价格平减指数（1914年=100）
1917	24.37	126.3	143.9
1918	26.73	126.1	165.5
1919	31.01	140.5	168.0
1920	34.80	166.0	191.7

a. NNP：国民生产净值。

资料来源：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23-124.

当因为政府取得真正的资源从而抬高价格而导致你口袋里现金的实际价值下降时，通货膨胀发生了，通货膨胀是货币税。由货币创造引起的通货膨胀具有较理想的隐性税的政治属性。民众会把通货膨胀归咎于投机者而不是货币政策。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没有通过创造货币来融资的正当理由。如果政府能对房屋、烟草和酒征税，为什么不能对货币征税？但是，一般认为，货币创造很可能被过度使用，因为决策者将不用对此承担与税收一样的责任。

支付战争的人力成本

战争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士兵、水手、飞行员和他们的家人负担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从经济上来考虑这些费用。征兵可被看做是一种税。该税额是政府将不得不支付给士兵以让其自愿服役和它的实际支付之间的差额。当一个士兵受到非致命伤（204 000人）或者阵亡（117 000人）时，有进一步的损失：损失的未来收入的贴现值。[①]

人们普遍认识到，这些损失产生了美国对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人的义务。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战后支付给退伍军人的福利，这些义务履行得很好。然而，人们对补偿的适当性进行争论。对死亡和丧失肢体的“公平”赔偿金额难以商定，而战争带来沉重的心理成本，例如炮弹休克的想法刚刚得到认可。也有更微妙的心理影响，对美国生活和文化的幻灭感，不管怎样，有时影响了退伍军人谋生的能力。表达了对战争和传统美国价值观的幻灭的作家，比如欧内斯特·海明威、约翰·多斯·帕索斯和F·斯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称为“迷惘的一代”。

给退伍军人或他们家属的补偿，并不改变经济整体上蒙受的资源和产出损

① *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Series Y879, Y880, Y882.

失。这些款项只是重新分配损失的负担。[①] 所有这些计算和不可避免的关于补偿是否足够的争论，不应掩盖如下事实：最终，不可能用钱来衡量所有人力成本，该成本对美国来说很高，对欧洲交战国来说更是高得惊人。

用命令指挥系统替代市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像美国内战），尝试了从最高层指挥经济。这方面的努力产生于意识形态时势。战前，赞成和反对通过市场组织经济的人之间的斗争很尖锐，并且民主党和共和党均有强大的反市场派系。还有德国的例子，集中的方针被广泛认为是有影响力和有组织的。也许对自由放任传统最大胆的背离就是全国铁路的国有化。到战争结束时，华盛顿充斥着为应付各种经济问题而成立的机构：一个旨在限制私营部门发行证券的资本问题委员会，有进出口权的战时贸易局，旨在生产船舶和控制其使用的战时航运局和紧急舰队公司，以及约150个其他机构。而且，早已存在的机构往往被赋予新的权力。控制和指挥系统实际是怎么运转的呢？

食品管理局和燃料管理局

在1917年8月，国会通过了《杠杆食品和燃料管理法》（Lever Food and Fuel Control Act），设立战时食品管理局和燃料管理局。赫伯特·胡佛被任命为食品管理局局长。胡佛享有作为一个杰出管理员的声誉——他当时担任比利时救济委员会主任——他的声誉随着他担任食品管理局局长的表现而上升。他的工作是要保持足够的粮食供应国内市场和美国的盟友，同时防止价格过度上涨。胡佛的权力是有限的，他的管理哲学——强调自愿合作——阻止他寻求更大的权力。正如正式配给制，一般避免了对违反进行处罚的价格直接控制。但是，食品管理局局长被授权给食品经销商发许可证。如果经销商没有遵从食品管理局的价格政策，就可能被吊销许可证。经济透视21.1讨论了在竞争市场上配给制的作用。

经济透视 2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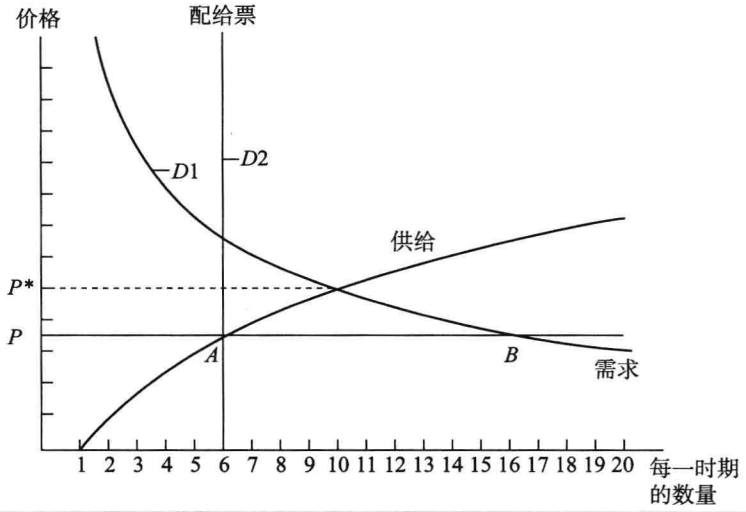
配给制的作用

下图说明了配给制的作用。政府已把价格固定在P。但在这个价格上，需求

① 这些问题在John Maurice Clark，*The Cost of the War to the American People*（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31）中进行了探讨。

量超过供给数量 AB。这将减少产量（相对于让价格上涨到自由市场均衡价格 P^*）。有些消费者会因无法买到商品感到沮丧。时间可能会被浪费在排队等候上。消费者之间的激烈竞争可能导致行贿和各种形式的隐性价格上涨，比如降低质量。

相反，可以给消费者颁发配给票。每一次购买，消费者必须与货币价格一起交出配给票。在这种情况下配给票将有效需求曲线从 $D1$ 减少至 $D2$。在这个例子中，由于政府的猜测完全正确（发出了既不太多也不太少的配给票），没有多余的需求，由价格控制造成的问题减少。正式配给制被用于糖（经过长时间的等待，排队变得无法忍受），但在许多情况下，政府允许“社会需要的”（socially desirable）各种形式的隐性价格上涨，如本书中描述的旨在促销“胜利面包”的捆绑销售。其结果是走向真正的自由市场均衡价格 P^*。



在正式配给的地方，胡佛呼吁自愿节约。“无肉星期一”和“无麦星期三”被宣传为减少国内需求、让更多商品出口的方式。胡佛显然认为，呼吁道德原则可以影响行为（经济推理命题 4：制度很重要）。零售商被鼓励（或允许，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与不太理想的替代品一起出售小麦面粉，如黑麦面粉或马铃薯粉。由此产生的混合物可烤成一条“胜利面包”。当然，这实际上是一个隐藏的价格上升。小麦面粉的真实价格是直接支付的金额加上买方为不太理想的面粉支付的金额与他将自愿为它支付的金额之间的差额。依靠这种折中办法，食品价格得以控制，产量也得以配给。

战时工业委员会

在 1918 年 3 月，为回应对战争努力的众多批评，威尔逊重组了最宏伟的战争机构——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并且任命伯纳德·巴鲁克为其领导人。巴鲁克是一名成功的华尔街投机者，但作为一个南部的犹太民主党

© CULVER PICTURES

食品管理局利用对爱国主义的呼吁来减缓对供给短缺的商品的压力。

人，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华尔街的一个局外人，是在民主党政府中管理战时工业委员会的理想人选。巴鲁克立即上马谈判主要工业产品的价格。其他工业品价格由一个单独的价格委员会制定，该委员会使用一种被称为批量界限定价法（bulk-line pricing）的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公司报告其生产成本，然后委员会设置将带来“大部分”（比如80%）的最大可能产出的一个价格。该制度的目的是要平衡对原料的需要与对整体价格稳定的需要，同时限制低成本生产商的利润。巴鲁克也成立了一个优先次序制度，以指导企业完成数量越来越大的战争合同。每个合同都被赋予一个政府优先等级：AA级，A级，B级，C级，D级。如果发生冲突，生产者必须在A级订单之前完成AA级订单，以此类推。这听起来不错。当政府计划者可以按照国民价值确定分包合同的优先次序时为什么要依靠市场呢？但是，当为了节省行政资源，企业被赋予自己设置分包合同的优先次序的权

力时，行业很快被高度优先的合同塞满了。自然倾向是给一切事物最高优先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优先权通货膨胀”破坏了该制度。）

巴鲁克在战时工业委员会的限制是短暂的——约 8 个月——但他从他的经验得出有力的结论。在随后的几年，他一再强调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例子指出了和平时期的企业和行业以及战争时期的集权政府（废除市场）之间走向合作的方式。

© BETTMANN/CORBIS

伯纳德·曼内斯·巴鲁克在一个相对轻松的时刻。他是成功的华尔街的投资者和投机商，也是民主党强有力的支持者。1918 年，他被威尔逊任命为战时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劳动力

政府合同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劳动力供给却因移民中断和男子征兵入

伍而减少。如表21—3所示，到1918年，实际收入大大高于1914年的水平。不过，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却远非顺利。特别是在1917年，货币收入比1916年增长了14.5%，但消费价格上涨了16.1%——实际工资下降。这种情况不禁让人想起南北战争。从长远看来，我们预期实际工资由劳动生产率决定，但在短期内，一些工资可能被证明是黏性的。那么，1917年是罢工年，这并不奇怪——创纪录的4 450次。罢工在密西西比河以西尤为严重，那里混合存在着低工资、苛刻的工作条件、不妥协的雇主，以及产生激烈的劳资纠纷的激进工会。

威尔逊政府的反应是务实的。在少数情况下，它通过征兵和其他方式威胁罢工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更包容。战争合同一般包括要求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条款，虽然他们没有提供劳工组织最关心的目标：只招收工会成员的工厂。当铁路工人罢工威胁扰乱战争努力的核心行业时，政府将铁路国有化。在政府的控制下，铁路提供了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较高的工资，同时只是小幅提高运费。结果是出现了由政府来弥补的经营赤字。铁路终于在1920年恢复私有制。根据表21—3，货币收入在1918年跃升了22.6%，超过了生活费用（虽然难以肯定，因为价格管制扭曲了价格指数的含义）；实际收入可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表21—3　　年收入，1914—1920年

年份	失业减少后所有雇员的货币收入（美元）	失业减少后所有雇员的实际收入（1914年美元）
1914	555	555
1915	547	541
1916	647	595
1917	748	586
1918	972	648
1919	1 117	648
1920	1 236	619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Series D723，D725.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初期劳工组织是非常乐观的。工会会员数在上升，大众对劳工运动保守派（在塞缪尔·龚帕斯的领导下，他在战争期间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评价也很高。但是，许多工人领袖进入劳资关系新时代的希望很快就结束了。1919年由总统召集的工业会议——有来自劳工、管理层和在巴鲁克的领导下的大众代表出席——以失败告终。更重要的是，组织钢铁工业——当时美国工业的领头羊的一次尝试，在一次漫长而痛苦的罢工后失败。

妇女是战争期间开发的潜在劳动力来源之一。一些妇女服务于位于欧洲的军

队，通常是护士或电话接线员。妇女在工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约有 100 万名妇女从事战争工作。但是，战争并不意味着妇女经济作用的突破。很少有妇女在重工业工作。首次聘用相对较少。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许多已婚妇女先前单身的时候已经被雇用过；她们暂时返回以帮助她们的家庭应付战争。在战争结束后，妇女在劳动人口中的比例恢复到战前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这是来自工会和其他部门要求妇女为退伍老兵腾出空间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是旧经济压力的结果。已婚妇女和单身妇女在 1920 年的劳动人口参与率都略微低于她们在 1910 年的水平。在政治方面，威尔逊政府大力支持妇女选举权，把她们的贡献看做“对战争胜利关系重大”[①]。因此，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宪法第十九修正案》终于在 1920 年通过。

也许没有哪群工人比非洲裔美国人更热切地抓住了战争所提供的机遇。随着工厂满负荷运转和来自欧洲源源不断的移民被剥夺，北部工业终于期望非洲裔美国人供给劳动力。开始于 1914 年，北部工业的代理人在南方到处招聘工人，通常向他们提供北上的交通费。于是开始有了大规模的非洲裔美国人从南方农村的外流：纽约、底特律、圣路易斯、克利夫兰、芝加哥和其他工业城市都能看到络绎不绝的新来者。在南部的一些地方，新的劳动力短缺实际上导致种族关系的改善；但在其他地方，南部以旧的方式回应，伴随着骚扰、拘留和殴打。一些南方人也试图阻止来自北方的代理人招募黑人工人，但无人能阻止潮流：北部工业提供更高的工资，而且北部城市提供更大程度的自由。

然而，白人工人对来自南部的移民反应时而消极时而强烈。美国黑人和白人工人之间的竞争不久爆发了种族暴力骚乱：1917 年 7 月在东圣路易斯，9 名白人和较多但人数不详的非洲裔美国人被杀；1919 年 7 月在芝加哥，13 名白人和 23 名非洲裔美国人被杀。但结果并不总是那么消极。在辛辛那提，我们知道，由于沃伦·惠特利（1990）的工作，战争期间的非洲裔美国人的就业导致雇佣惯例发生了永久性变化——战争给非洲裔美国人提供了“迈出第一步”的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遗产

停战后的复员遵循最简单的路径。士兵均尽可能快地退役了。战争合同被取消。行政部门被关闭。尽管迅速复员，事情再也回不到从前。

国际遗产：《凡尔赛条约》

最重要的一些变化是在国际领域。战争结束后不久，威尔逊起航前往欧洲，

① 引自 Kennedy，*Over Here*，284。

参加将通过谈判来结束战争的《凡尔赛条约》的巴黎和平会议。最后，条约由“四巨头”敲定：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然而，美国从未批准该条约。它被压在参议院，其中共和党人坚持要做一些威尔逊不会同意的改变。作为英国代表团的一分子出席该会议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写下了对《凡尔赛条约》的杰出分析。①

凯恩斯清楚地表明，盟军要求的赔偿远远超出了任何基于产生停战状态的理解可以合理计算的数额。他还争辩说，德国没有能力支付赔款，为了支付赔款，德国将必须运行一个庞大的出口大于进口的顺差。此外，凯恩斯对德国扩大出口和减少进口的前景的仔细研究使他深信，关于条约暗示的秩序变化是不可能的。换言之，该条约是惩罚性的，对德国和奥地利施加了严厉的惩罚。凯恩斯的论点在经济学家之间引起了一个漫长的后来被称为“转移”问题的辩论，一个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辩论。如果可以纠集足够的政治意愿，也许德国确实有能力进行规定的转移支付。但今天很少有人会就凯恩斯对惩罚性较低和约的呼吁进行辩论。德国认为该和约是不公正的，这促成了当时似乎不可思议的事——第二次世界大战。

国内遗产

战争还留下了许多国内遗产，正如罗伯特·希格斯在他的著作《危机与利维坦》（*Crisis and Leviathan*）中所表明的那样。② 有些是财政遗产，如为了支付国债利息、退伍军人福利以及其他长期成本而导致联邦支出增加。更重要的是思想遗产。虽然大多数美国人在战后更愿意回到旧模式，但一些人，比如伯纳德·巴鲁克，认为如果政府在协调经济活动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经济会运行得更好。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参战的时间太短，不能得出关于政府干预的短期效果的有力结论，更不用说长期效果。但是，围绕战时政府方案的成功的光芒，使得支持政府在经济中能发挥适当作用的辩论显得强有力。积极介入的政府可以改善经济运行的想法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沉睡，但随着大萧条日益明显，这一想法变得很重要。例如，新政的国家工业复兴总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就是仿效巴鲁克的战时工业委员会。新政的商品信贷公司（Commodity Credit Corporation）就是仿效美国谷物公司，而根据20世纪30年代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s）实施的管制，则是仿效食品管理局执行的管制。这些只是几个例子；完整的清单更长。此外，许多被选来执行新政

①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19). 这是有史以来经济学家撰写的最有说服力的小册子之一。它仍然值得你花时间一读。后来，Etienne Mantoux 在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中提供了一个有力的回答。

②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7.

方案的个人，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政府机构工作过。例如，于 1933 年领导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的休·S·约翰逊将军，曾在巴鲁克麾下为战时工业委员会服务。

改革者无疑会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经济中赢得许多变化，即使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发生过。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认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控制和规范市场的联邦项目一直是成功的看法加快了改革步伐并增加了改革深度。

战后经济衰退

停战的即时影响是经济放缓。价格连续数月大致保持水平。然后，在 1919 年，经济繁荣开始了，而价格开始迅速上涨。美联储认识到，保持贴现率低于市场利率的政策会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银行发现从美联储借款然后扩大自己的贷款是有利可图的。然而，美联储不愿提高利率。其中一个原因是，高利率可能会降低市场上大量的政府战争贷款的价值。

最后，可能是因为政府的黄金储备已被耗尽，美联储采取行动了。在 1919 年年底和 1920 年初，美联储提高了贴现率。1920 年 1 月从 4.75%提高到 6%是在该制度的短暂历史上幅度最大的单次增加。6 月 1 日，贴现率再次提高至 7%。这些增加给市场发出了一个强烈的信号：信贷很快将紧缩。此外，在经济的其他部门也出现了明显的突变。例如，随着欧洲生产恢复，农产品价格在整个世界的大部分都下跌。因此，经济进入严重的衰退。从 1920 年到 1921 年，名义国民生产净值下降了 18%，而实际国民生产净值下降了 4%。但是，经济衰退也非常短暂：它类似于所称的“V 形”衰退，直线下降再直线回升。也许，原因之一是，即使银行倒闭的数目大幅上升，也不会产生金融恐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1929—1930 年的急剧萎缩，初看起来是 1920—1921 年的重复，产生了推动经济陷入更深衰退的金融恐慌。）经济从 1920—1921 年的经济衰退中复苏后，进入了一个长期的经济扩张。这次扩张是如此强劲，以致许多人开始相信一个持续繁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兴旺的 20 世纪 20 年代”是下一章的主题。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yres, Leonard P. *The War with Germany: A Statistical Summary*.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http://www. lib. byu. edu/~rdh/wwi/memoir/docs/statistics/statstc. htm.

Brandes, Stuart. *Warhogs: A History of War Profits in America*.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7.

Chambers, John Whiteclay Ⅱ. *To Raise an Army: The Draft Comes to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87.

Clark, John Maurice. "The Basis of War-Time Collectivis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 (1917): 772 - 790.

——. *The Costs of the Wa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1.

Clarkson, Grosvenor B. *Industrial America in the World War*.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3.

Coit, Margaret L. *Mr. Baruc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7.

Cuff, Robert D. *The War Industries Board: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during World War 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 "We Band of Brothers—Woodrow Wilson's War Managers."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2 (1974): 135 - 148.

Cuff, Robert D., and Melvin I. Urofsky. "The Steel Industry and Price Fixing during World War I."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4 (Autumn 1970): 291 - 306.

Edelstein, Michael. "War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Ⅲ,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29 - 405.

Ferguson, Niall. *The Pity of War*. London: Penguin Press, 1998.

Friedman, Milton. "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2 (May 1952). Reprinted in *The Optimum Quantity of Money and Other Essays*. Chicago: Aldine, 1969.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Fussell, Paul. *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Gilbert, Martin. *The First World War: A Complete History*. New York: H. Holt, 1994.

Glaser, Elisabeth. "Better Late than Never. The American War Effort, 1917—1918." In *Great War, Total War: Combat and Mobilization on the Western Front 1914—1918*. eds. Roger Chickering and Sig Forste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89 - 407.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ohnson, James P. "The Wilsonians as War Managers: Coal and the 1917—1918 Winter Crisis." *Prologue* 9 (1977): 193 - 208.

Kennedy, David M. *Over He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American Society*. Oxford, Engl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19.

Koistinen, Paul A. C. "The 'Industrial-Military Complex' in Historical Perspec-

tive: World War Ⅰ."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1 (1967): 378 - 403.

Leuchtenburg, William E. "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ed. John Braeman et al.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

Litman, Simon. *Prices and Price Control in Great Britain and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World Wa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0.

Mantoux, Etienne. *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Rockoff, Hugh.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mer, Christina. "World War Ⅰ and the Postwar Depression: A Reinterpretation Based on Alternative Estimates of GNP."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 (July 1988): 91 - 115.

Scheiber, Jane Lang, and Htarry N. Scheiber.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Wartime Mobilization of Black Americans, 1917—1918." *Labor History* 10 (1969): 433 - 458.

Taussig, Frank W. "Price Fixing as Seen by a Price Fixe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33 (1919): 205 - 241.

Urofsky, Melvin. *Big Steel and the Wilson Administration: A Study in Business Government Relation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9.

Whateley, Warren C. "Getting a Foot in the Door: Learning, State Dependence, and the Racial Integration of Firm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March 1990): 43 - 66.

World War Ⅰ Document Archive. http://www.lib.byu.edu/~rdh/wwi/.

第 22 章　兴旺的 20 世纪 20 年代

本章主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公众希望，就像总统沃伦·G·哈丁所说的“回归正常”。战时管制取消了，税负削减了，20 世纪 20 年代的共和党政府普遍回归到市场力量来产生经济增长。经过 1920 年和 1921 年严重但短暂的衰退后，经济进入了长期扩张。一种新的美国中产阶级的依靠耐用消费品，特别是汽车的生活方式出现了。股票市场上涨，而且认为经济已进入持续增长和繁荣的新时代，而这确定了最终消除贫困的信念。但 1929 年 10 月的股市崩盘及 20 世纪 30 年代初陷入空前大萧条深渊，使得最坚决的乐观主义者变成了悲观主义者。

经济史学家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灾难是否不可避免。20 世纪 20 年代繁荣的结果和它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依赖，或者它们是否是 20 世纪 30 年代的冲击和政策失误造成的结果？换言之，是有一个致命的癌症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经济中生长从而使得灾难愈来愈近，即使当时的经济医师继续断言患者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吗？经济史学家提出了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保留下来的许多问题——收入分配的变化，农业中目前存在的问题，股市的繁荣与萧条，等等。然而，关于这个时期的大量研究表明，如果在 30 年代初已经遵循正确的政策，这次大萧条是可以预防或至少能得到减轻的。市场经济的威望随着股市到达高峰。在大萧条期间，国家从 20 世纪 20 年代的自由市场模式转向战争年代进行的中央计划模式以恢复繁荣发展和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社会变迁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名为哈里·唐纳森的有前途的年轻作曲家决定与刚组成的欧文·伯林音乐公司共命运。他的1919年最流行的歌曲既是一个问题，也是预言性答案："在他们看到巴黎之后，你如何将他们保留在农场?"确实，如何做到？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美国人已从无聊的乡村生活中被费力夺取出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标志着农业社会的结束。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到过巴黎，而且一些人到过的地方不会远于芬斯顿军营（Camp Funston）。但乡村男孩、小镇记账员和工厂工人等逐渐形成了对旅游和冒险的爱好。

受提供的就业岗位、城市生活的乐趣和交通发展的诱惑，在1920年和1930年之间有近1 500万人加入到美国城市居民数量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的某段时间，美国人生活在2 500人或以上的城市中心的数量突破了5 000万大关。正如1920年人口普查报告所表明的，第一次有超过50%的人口，超过5 400万人，是城镇居民。领导向城市迁移的是南部非洲裔美国人，他们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向北大量迁移。对非洲裔美国人特别有吸引力的是纽约、费城、华盛顿、芝加哥、圣路易斯和洛杉矶。到1930年，哈莱姆区是近30万非洲裔美国人的集中点。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一词指的是文学和艺术的异常繁荣，但其支柱是工业部门的工作。这种移民浪潮和本章稍后讨论的自由移民的结束联系在一起。由于无法依靠来自欧洲源源不断的非熟练和低技能的移民，雇主转向来自南部的移民。

对个人权利的一个"可怕"侵犯——《宪法第十八修正案》以少数票获得通过，禁止制造、销售或运输"烈酒"，剥夺了农业工人、工厂工人和其他人的基本享受，其理由是喝酒有罪及无论如何穷人没有资格享有这样的奢侈品。①

恐惧和仇恨的膨胀正在加剧，这在三K党的活动中达到顶点，而到1924年，该组织的反非洲裔美国人、反犹太人、反罗马天主教的迫害已经成为全国性的丑闻。

未来仍然抱有繁荣和更多闲暇时间的光明前景。妇女已经获得投票权，但她们的解放不限于此。特别是年轻妇女开始对曾是1914年以前男女关系的典型的双重道德标准进行破除；20世纪20年代的"不拘传统的时髦少女"在1919年已经出现，女孩可以抽男人抽的香烟，喝男人喝的威士忌，玩男人玩的游戏。

人们可能已经期待这些变化将引致在工作场所的相应变化，尤其是在年龄较

① 作者们承认在这个问题上的偏见。

大的已婚妇女中。[①] 增加的教育，降低的人口出生率，规模较小的家庭，文秘部门的出现，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示范效应，这些条件共同实现了劳动力中更多的女性参与。事实上，根据单纯的经济因素，人们可能预期双职工家庭的数目快速增长，而那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才真正到来。但这种发展被“婚姻障碍”阻止了；“婚姻障碍”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雇主所遵循的禁止雇用已婚妇女和强行辞退结婚的女员工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障碍只反映了主张已婚妇女回归家庭照顾孩子的更广泛的社会规范。随着大型企业（这些企业依靠人事部门做出雇佣和解雇决定以及偏好利用官僚规则来做出个性化的雇佣和解雇决定）的增长，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变得更加广泛。

新商品及中产阶级的兴起

另外，在20世纪20年代，现代美国生活水平对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来说变得可能。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销售，及耐用消费品、电力、新设备、郊区房屋和城市摩天大楼的生产突飞猛进使这十年显得重要。

革命的程度可由表22—1的数字表明，它们是由斯坦利·勒伯格特收集整理的。在这十年之初，只有略多于1/3的美国家庭住在用电力照明的住宅和公寓里；到这十年快结束时，只有略少于1/3的美国家庭缺乏电力照明。在这十年之初，汽车仍可视为有钱人家的奢侈品；到这十年快结束时，它已经成为中产阶级的必需品。

表22—1　　美国家庭拥有各种设备的比例（%）

	1920	1930
内抽水马桶	20	51
集中供暖设备	1	42
用电照明的家庭	35	68
冰箱	—[a]	8
洗衣机	8	24
吸尘器	9	30
收音机	—[a]	40
汽车	26	60

a. 小于1%。

资料来源：Stanley Lebergott,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248 - 299, pass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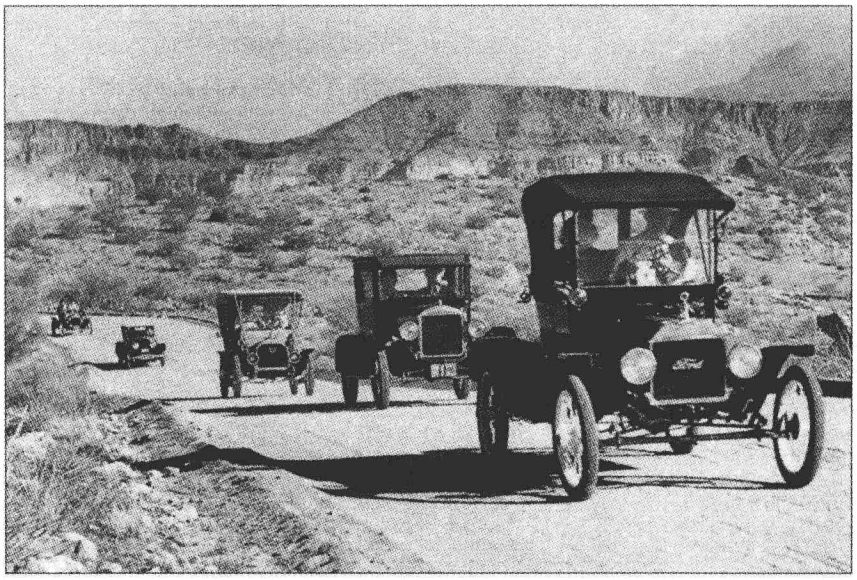
①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chapter 6.

汽　车

在许多方面，汽车是20世纪20年代经济的象征。汽车年产量从1921年的150万辆上升到1929年的480万辆。到1930年，60%的美国家庭拥有汽车（表22—1）。

汽车的广泛使用加快了20世纪20年代的大建设热潮。汽车改变了住宅的位置，预示着郊区的全盛时期。汽车将娱乐与旅游相结合，使农村出现了汽车旅馆、热狗摊、道路标志和加油站。美国景观的这种变化很大程度上是无政府计划和管制的。正如亚历山大·菲尔德（1992年）所表明的，它同时也留下了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使得大萧条复苏更加困难的法律纠纷残余。

汽车也扩大了对政府铺路的要求，因为汽车俱乐部，特别是农夫迫切要求走出泥泞的援助。随着1916年《联邦援助公路法》的通过，全国公路系统的建设开始。根据该法，政府承诺将花费7 500万美元建设农村驿道，将这笔钱交给农业部在5年期内支出。不算桥梁和其他大型建筑物，国家出资不超过总建筑成本的50%，而且其前提条件是州公路主管部门组织足够人员和足够设备开展工作和进行后续维修。1921年《联邦公路法》修改了原法，要求农业部长必须优先考虑已指定用以获得联邦援助的公路系统的那些州。指定系统将构成州的主干线，不超过州公路总里程的7%。顺便说一句，在1921年《联邦公路法》中，国会拨给仅一年（1922年）建设的拨款和它之前5年拨款的总额一样多。



© H. ARMSTRONG ROBER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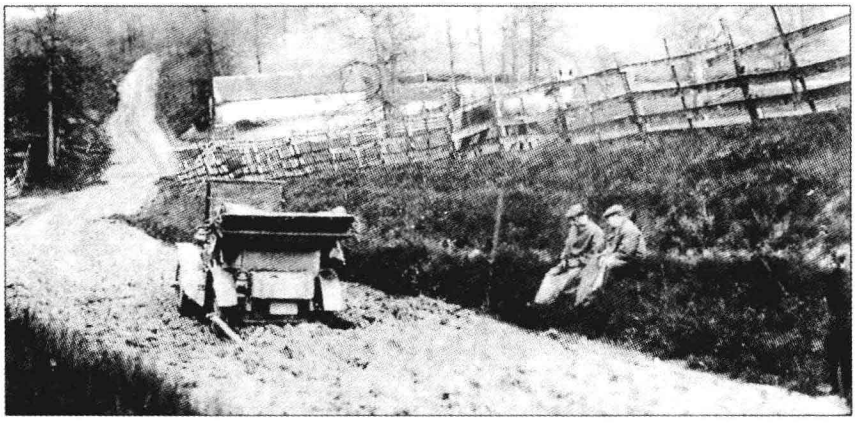
亨利·福特于1908年开始了T型汽车的批量生产；到1916年，他每天生产2 000辆。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T型车的平均占有率输给了更时尚且更昂贵的竞争对手。T型车的生产于1926年停止。

先购买，后付款

另一个主要增长部门是电器，如电炉灶、吸尘器、收音机和冰箱等。例如，十年来，冰箱的年产量扩大了近 50 倍，在 1930 年达到近 100 万台。虽然在 1930 年只有 8%（表 22—1）的美国家庭依赖机械制冷，“卖冰者”的日子不多了。也许最引人注目的是收音机的迅速采用。1920 年，当美国匹兹堡的 KDKA 电台成为首个商业广播，收音机仍然是发烧友的玩具；到这个十年快结束时，40%的美国家庭拥有收音机（表 22—1），这已改变了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

耐用消费品市场的增长是由供给方和需求方的同时发展引起的。大规模生产和技术进步降低了给定的许多耐用消费品服务质量的成本。例如，亨利·福特在战前就使用装配流水线，从而开创了低成本汽车的大规模生产。在 20 世纪 20 年代，为了应对来自通用汽车公司的激烈竞争，他引进了改良的包含自动点火装置、挡风玻璃雨刷及改良刹车的车型。

由于玛莎·奥尔尼的工作，我们现在知道，重要的发展也发生在需求方面。一个是消费信贷的发展——“先购买，后付款”分期付款购物法。[①] 不用储蓄现金或生息资产去购买耐用消费品，消费者可先支付首期付款，立即拥有该耐用品，并用分期付款计划支付。提供贷款的金融公司是受保护的，因为它们对该耐用品有要求权，并且如果买方未能支付所需款项，可将其收回。本来，汽车制造商成立金融公司是为了帮助经销商在淡季购买库存车从而调节汽车的年需求量，但是，这种做法迅速扩展到消费者购买汽车的融资。



AAA WESTERN AND CENTRAL NEW YORK

当美国人开着他们的新车却最终陷入泥淖时，他们发起了全国性的公路建设计划。

① 这个广告口号在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流行。奥尔尼选择它作为其在此期间对消费者行为研究的权威报告的标题。参见 Martha Olney，*Buy Now，Pay Later：Advertising，Credit，and Consumer Durables in the 1920s*（Chapel Hill：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91）。

广告数量的迅速增长也促进了耐用消费品购买，它极力赞扬新的基于节省时间和人力的耐用消费品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好处，并指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如何能用分期付款计划立即实现。广告依靠报纸和杂志，特别是针对妇女的广告，比如《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但有些广告还依赖于广播新媒体。全国广播公司（NBC）成立于192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成立于1927年。不出所料地，导致广播电台的发展。通过电话投票系统来确定节目收听率，而收听率低的节目会被取消。某些特定商品与特别节目捆绑，因为厂商寻求一切手段满足美国公众的愿望、时尚及爱好。

© HISTORICAL PICTURES STOCK MONTAGE

通常用信贷购买的耐用消费品的批量生产，成了20世纪20年代繁荣的特征。

政府制定的商业政策没有造成美国人消费模式的这些根本性变化，但他们确实适应了它们。在20世纪20年代，总统沃伦·G·哈丁和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两届政府都公开致力于企业应在没有政府干预或干扰的情况下自由成长的原则。由于没有来自政府的障碍，企业变得比之前几十年更加综合。值得一提的是，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因为效率原因鼓励合并；竞争性企业获准成立行业协会，不仅为了使工具标准化及交流技术信息，而且还制定价格。哈丁和柯立芝均指派无论

是在字面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无意执行反托拉斯法的人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委员。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业、制造业、分销、电子、钢铁、汽车和采矿都日益受到大企业的控制。大量消费、大量生产和巨人公司因此成为20世纪20年代的标签。

禁酒令

禁止饮酒的呼吁从19世纪就开始出现。特别是禁酒党（Prohibition Party）虽然规模不大，却进行了长期而积极的运动。但直到1917年，禁止饮酒的立法才最终在国家范围通过。这是战争时期的一项措施。放弃酒精被视为暂时牺牲，这将释放蒸馏和酿酒行业的资源，并使工人保持最高效率。执法在1919年《沃尔斯特法案》（Volstead Act of 1919）中得到加强，并且在1920年当《宪法第十八修正案》得到批准时，规定禁酒是永久性的，或者尽可能永久。

起初，禁酒受到广泛的中产阶级的支持。包括这个时代一流的经济学家之一欧文·费雪，他相信这一禁令增加了工人阶级的储蓄，并提高了工业生产力。然而，众所周知，当犯罪率猛增时，尽管执行开支金额从1921年的630万美元增加到1930年的1 340万美元，人们的看法却改变了。贩卖私酒成为一大产业，而歹徒诸如阿尔·卡彭（Al Capone）和“金刚腿”（Legs Diamond）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壮观的情况可由令人战栗的统计数字支持：凶杀案率上升，而禁酒案件淹没联邦法院。到旨在结束禁酒的《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在1933年获得批准，大多数美国人已对“高尚实验”的结果感到失望。见新观点22.1。

新观点 22.1

禁酒令

当一个社会宣布大麻、可卡因、海洛因、合成代谢类固醇等为违禁药物时，会发生什么呢？“高尚实验”可以告诉我们这种行动的潜在成本和好处。

由于禁酒令，酒的消耗量下降，虽然也许没有达到它的倡导者所希望的程度。禁酒令使供给减少，因为生产商面临法律起诉的危险。由于对法律的尊重，禁酒令可能使需求减少，尽管有一些不确定性，因为需求可能会由于“禁果”效应而增加。当然，对酒的产量的统计是不完全的，因为存在大量的非法生产。经济学家如克拉克·沃伯顿以及最近的杰弗里·迈伦和杰弗里·兹韦贝尔使用相关变量，如死于肝硬化的人数来推断消费。根据他们的研究工作，饮酒量先是急剧下降，但随后上升到禁酒前的60%或70%的水平。由于供应和需求都在下降，目前尚不清楚禁酒令对价格的影响。价格的证据非常粗略，但与价格可能上升但上升幅度不是很大的观点相一致。

犯罪增加。在“黑市”的参与者不能使用法律制度来解决买家和卖家之间或相互竞争的卖家之间的纠纷。因此，卖方转向犯罪，有时是暴力犯罪，以保护他

们的财产。此外，因为他们的生意是非法的，针对潜在竞争对手的暴力的边际成本低于它本来应有的成本。这一时期的凶杀案率上升到一个不能由其他因素来解释的数额。

死于饮酒过量和意外中毒的人数增加。生产者往往生产高浓度酒精饮料，以便更好地对当局隐瞒他们的产品。这增加了意外过量的风险。而且，质量往往差异很大，因为生产商无法确定和保护品牌，因此没有保持其产品质量的激励。在一个案件中，将酒精伪装成药物的掺假导致成千上万人中毒。

资料来源：Clark Warburton, *The Economic Results of Prohib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and Jeffrey Zwiebel and Jeffrey Miron, "The Economic Case against Drug Prohib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Autumn 1995): 175 - 192.

20 世纪 20 年代的劳动力

美国流行上高中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来时现代美国人生活标准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美国的高中，包括 45 分钟的课时、多种多样的课程、学术追踪，当然，还有乐队和运动队。如表 22—2 所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入学率和毕业率的提高是惊人的。1910 年，17 岁美国人中有不到 10%的人高中毕业。到 1938 年，几乎有一半是高中毕业生。高中毕业已经成为进入人生新阶段的标准仪式。此外，美国教育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到了 20 世纪中叶，人均中学教育年数的巨大差距在美国和其他工业国之间拉开。

表 22—2　　高中毕业率

	高中毕业生占 17 岁青少年的比例（%）	
	48 个州	32 个非南部的州
1910	8.6	11.1
1920	16.2	19.9
1928	27.0	32.1
1938	48.2	55.9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Claudia Goldin, "How America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1910 to 1960," NBER Working Paper No. w4762, 1994, Table 1.

为什么“高中运动”在美国获得极大的成功？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和拉里·凯兹（Larry Katz）最近的研究明确了背后动因。首先，读高中的回报率极高（毕业后赚取的额外收入相对于放弃的收入）。此外，社区愿意建立高中并配备教职员工，让孩子和生活在那里的人的子孙有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机会。最有社会凝聚力的社区群体，最有可能为资助学校的高税收投票，并非位于有着与他们相异的移民群体的大城市。相反，中西部的农村社区——例如，在艾奥瓦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在建立高中方面处于领先地位。高中运动对经济推理命题 3 和 4 提供了进一步说明：激励很重要（高回报率鼓励年轻人留在学校）；制度很重要（地方财政和公共教育管制鼓励高中在中西部早日采用）。

工资上涨

耐用消费品革命引起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并因此带来工作时间和工资的改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制造业接受了 48 小时工作周，到 1920 年，一些协议准许星期六有半天休假。但是，直到这 10 年接近尾声，48 小时工作周才成为大多数职业的标准。然而，休闲的进展对许多美国工人来说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收获之一。

另一个收获是周期性失业的相对缺乏。除 1921 年和 1922 年的艰苦岁月，20 世纪 20 年代普遍没有大规模失业。1923—1929 年间的失业率平均只有 3.3%。[①] 总之，失业的威胁通常较低，和增加的休闲一起，促进了繁荣发展的意识。

1919—1929 年间非农就业人员的年实际收入上升了约 23%，在 1914 年大约上升了 33%。总体而言，至少对于那些生活在城市的工人来说，劳动力的进步是客观的。但是，并非所有部门情况都不错。在稍后的章节，我们来看在 20 年代经历了一个艰难时期的农业。当工人将他们的收益与处在更高经济阶梯上的那些人相比时，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满足于他们取得的收益。

工会衰落

尽管（或者说因为）产业工人的需求激增，20 世纪 20 年代不是工会的前进岁月。如表 22—3 所示，工会会员人数从 1920 年平民劳动人口的大于 12%下降到这十年末的不到 8%。鉴于制造业的快速增长和城市地区人口的集中，这一下降尤其令人惊讶。诚然，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雇主继续有效利用它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展的反工会工具。他们在雇用和解雇中歧视加入过或组织过工会的雇员。他们使用令人憎恶的黄犬契约，其中新员工承诺不会加入工会，以防止工

① 这些失业率来自 Stanley Lebergott，*Manpower in Economic Growth*：*The American Record since 1800*（New York：McGraw-Hill，1964），受到 R. M. Coen 质疑并调高至 5.1%，参见 "Labor Force Unemployment in the 1920s and 1930s：A Re-examination Based on Postwar Experienc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5（1973）：46－55。这种调整如果被接受，会改变 1923—1929 年期间的失业率水平，但不改变劳动力进步的趋势。

会会员及作为一种对说服员工违反合同的工会进行民事诉讼的依据。但雇主最有效的武器是禁令，通过它法院可以至少暂时禁止如纠察运动、间接抵制及工会供养罢工者等做法。在20世纪20年代，除了适用于铁路的法律，政府一般不干预劳动关系。虽然这种政策放缓了有组织劳工的进展，但不能认定这是工会会员绝对下降的主要原因。

表22—3　　1919—1929年工会会员数

年份	工会会员总数（千人）	总会员数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	总会员数占非农就业人口的比例（%）
1919	4 046	10.2	14.8
1920	5 034	12.2	16.3
1921	4 722	11.2	15.0
1922	3 950	9.3	12.4
1923	3 629	8.4	11.1
1924	3 549	8.0	10.6
1925	3 566	7.9	10.3
1926	3 592	7.9	10.3
1927	3 600	7.8	10.0
1928	3 567	7.6	9.7
1929	3 625	7.6	9.7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Series D4，D7，D8，D940.

看来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关的工会会员高潮尚未确立是最有可能的。战时会员的增加，部分是由于工会为减少对工会组织的反对而签订的保证不罢工的协定。将失业水平提高至11%的1921年和1922年的经济急剧衰退，逐渐削弱了劳动力的议价能力。由表22—3可以确定，会员的急剧下降发生在1923年，此后，只有轻微的人员自然缩减。此外，以1916年反对美国钢铁公司的重要罢工为始点，大量罢工失败了——除了激怒雇主。旨在吸引工人远离自身组织的公司福利方案也产生了它们的影响，但1924年和1929年的停滞不前主要应归因于另外两个原因。第一，实际工资增加使得大部分劳动力普遍感到满意。更重要的是，强大的工会组织劳工联合会，其成员特别得益于建设热潮，对组织日益增长的大规模生产行业没有兴趣。此外，普遍疲倦和缺乏想象力的劳工领导者也是一个原因。

移民限制

但是，劳工确实终于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其最珍视的目标之一——限制移民。在20世纪20年代实施的移民限制，是长期趋势的一部分。1885年，为未来的劳动服务预付移民的航行费用的做法被规定为非法。1907年，移民财力审查生效，并于1917年实行读写测验。这种在其他接受大批移民的国家如阿根廷和澳大利亚等普遍的趋势，反映了劳动力的日益自信，它认为自由移民在减缓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增长。在美国，正如克劳迪亚·戈尔丁所表明的，部门利益也发挥了作用。例如，美国南部认为它的政治权力正在被其他地区基于移民的人口迅速增长所削弱。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移民的大门依然敞开；在1921年，有效限制移民的立法终于获得通过。

1921年《紧急移民法》(Emergency Immigration Act of 1921) 将每年从任何国家接纳的人数限制到1910年居住在美国的该国籍人数的3%。1924年，一部新法律将移民限制到1890年美国人口的2%。这个变化进一步限制了来自欧洲南部和东部的移民。此外，来自东亚的移民被完全排除，加强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早期与日本的“君子协议”。该法还设定了基于1920年配额的略超过15万名移民的最高限额，于1929年生效。对移民流的这些限制的影响从表22—4中可以看出。战前年份（在欧洲战争开始于1914年）和20世纪20年代之间的对比很明显。对移民的限制显然有效削减了合法移民的人数。

表22—4　　1910—1929年移民数量

年份	新来者	年份	新来者
1910	1 041 570	1920	430 001
1911	878 587	1921	805 228
1912	838 172	1922	309 556
1913	1 197 892	1923	522 919
1914	1 218 480	1924	706 896
1915	326 700	1925	294 314
1916	298 826	1926	304 488
1917	295 403	1927	335 175
1918	110 618	1928	307 255
1919	141 132	1929	279 678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Series C89.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移民做出严格限制？在某种程度上，限制是对来自南欧和东欧的“新移民”日益敌视的结果，他们已经构成了在战前年份中大量涌入的移民的主体。种族主义包括三K党的活动在增加，一定程度上是因战时宣传和爱国主义刺激。有时候，声称新移民没有本土出生的美国人聪明的作家给种族主义披上了伪科学的外表。

而且，这场战争创造了一个劳动力大量涌入将削弱非熟练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的恐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中欧经济增长迅速；后来它躺在废墟里，多年来背负着沉重的赔款。再往东，俄国经济也被多年的战争和革命耗尽。而且，这场战争建立了船运的庞大新供给，这样很容易把移民带往美国。一旦战争结束，美国会不会被从欧洲大陆来的移民淹没？这些担忧似乎被大战结束后不久恢复的高水平移民所证实。

关于土地

1896年和1914年之间的时期，有时被称为“农业的黄金时代”，是美国农民经济状况迅速改善的一个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农产品的国际需求激增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加。

农业经济困难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农产品价格开始急剧下降。到1921年年底，尽管略有回升，18个月前卖2.58美元/蒲式耳的小麦价格为0.93美元，而玉米从1.86美元下跌到0.41美元。许多商品没有受到相当严重的冲击，但价格在所有行业都严重地下降了。从1920年6月的指数234（1909－1914年＝100），一年后农民收到的价格下降到指数112。随后逐步恢复，1925年8月农业指数达到159。经过1926年和1927年期间的小幅下降之后，价格保持稳定，直至1929年年底。

1920年和1921年的通货紧缩在工业部门和整体经济中都很严重，但对农业部门冲击最大。农民支付的价格一直跌到1921年底，然后保持稳定，一直到这十年结束。贸易条件（农民收到的价格与他们支付的价格之比）在价格突破时期对农业不利，然后价格得以恢复，这样，到1925年，它们并不远低于1920年的水平。这个指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有所下跌，但在1929年仍然离繁华的战前岁月的水平不远。那么，总体上，似乎看不出农业应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遭受更多损失。此外，查尔斯·F·霍尔特（Charles F. Holt）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20年代普通农民的收入上升。但是，补救农业立法的大量鼓动工作是在这些年里发生的。为什么？

答案似乎是，许多农民，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在被证明错误的时

间招致了固定的债务负担。在1910年和1920年期间土地价值大幅上升；在繁荣高峰时期，艾奥瓦州和伊利诺伊州最好的土地售价高达500美元/英亩——在当时是极其高的数字。在这10年，许多高级农场价值翻番。为了购买这种高价财产，农民负债累累。长期债务从1910年的32亿美元上升至1920年的84亿美元，在1923年高至近110亿美元。20世纪20年代初的通货紧缩，使农场债务变成沉重的负担。虽然大多数美国农民在这些年可能没有固定偿还债务的负担，一个人数众多且非常具有号召力的少数派走向破产。农业贷款止赎数量在20年代初大幅增长，然后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居高不下。据H·托马斯·约翰逊，止赎率从1918年止赎抵押农场的2.8‰增加到1920年的3.8‰，1921年的6.4‰，1922年的11.2‰，以及在这10年的剩余年份里的14‰～17‰。①

农业补贴的最初步骤

1920年年底的农民暴力抗议活动，导致国会在1921年创建农业调查联合委员会（Joint Commission of Agricultural Inquiry）。该委员会报告了明显的事实——农场的麻烦是普遍商业萧条和出口下降的结果——并建议帮助合作营销协会、改进信贷服务及扩展农业部的研究活动的措施。

一个更激进的做法是早在1922年由农业部长亨利·C·华莱士召开的全国农业会议上所提倡的。② 虽然美国总统哈丁认为“农民必须做好准备自救”，在本次会议上仍听到了许多激进的建议。在其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农业平等观念，并提出“平等农业”的口号。有人认为，农业有权分享它在国民收入中的公平份额，如果农民接受的价格与他们支付的价格之比与1910—1914年盛行的比例保持相等，就有可能实现。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旨在确保农产品“对等价格”或“公平交换价值”的各种设想。最能被专业农场支持者和政客所接受的是《麦克纳里-霍根法》（McNary-Haugen bills），其寻求确定每个农产品的公平交换价值。公平价值是保留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购买力的价格并要在两方面坚持：第一，关税是为了保护国内市场不受进口损害；第二，由联邦政府特许的私营公司要购买数量充足的每种商品，以迫使其价格上涨到计算的公允价值。该公司可以反过来出售所获得的商品。而且，有人建议，剩余应以世界价格销往国外，世界价格可能会低于受支持的美国价格。行政开支及经营亏损将由生产农民分担。对于出售的每包棉花或每蒲式耳小麦，将向种植者收取被称为“均衡费”的税。这些税收将用于支付经营价格支持计划的所有费用。农民的收益范围是较高的价格超过税收的额外收入。参照经济推理命题1、2和4：选择、成本和制度很重要。

---

① H. Thomas Johnson, “Postwar Optimism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192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Winter 1973—1974): 176.

② 他的儿子亨利·A·华莱士，杂交玉米的开发者之一，曾在罗斯福时期担任农业部长和副总统，并且在杜鲁门时期担任商务部长。

《麦克纳里-霍根法》两次在国会上通过，并两次被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否决。尽管经历了这样的挫折，20世纪20年代的鼓动确实为农业争取了一些特权。首先，1922年《卡珀-沃尔斯特德法》（Capper-Volstead law of 1922）免除了农民合作组织违反反托拉斯法被起诉的威胁。次年，《联邦中介信用法》（Federal Intermediate Credit Act）提供了12家中介信贷银行，这将为商业银行和其他贷款机构再贴现有关农业票据。[①] 为了实现更广泛的价格和收入补贴目标，有两大努力。将关税作为提高农产品（在传统上是出口，而不是进口的产品）价格的策略的天真信念导致对农业的“保护”，终于在1930年6月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中达到高关税。更重要的是1929年《农业市场经营法案》（Agricultural Marketing Act of 1929）得以通过是为了履行共和党前一年的竞选承诺。作为第一个使联邦政府承诺稳定农产品价格政策的法律，该法案尽可能地通过非政府机构生效。该法案建立了联邦农业局以鼓励合作营销协会成立并建立将由合作社拥有的“稳定企业”，该企业将使用一个5亿美元的基金提供价格支持。

农业的危难时期过去也曾发生过。为什么20世纪20年代提出了在有限的规模内做出帮助农民的直接努力？如伊丽莎白·霍夫曼和加里·D·利贝卡普所表明的，一些事情已经改变了。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价格控制实验已经使农民和他们的拥护者确信更多的直接控制将是有效的。此外，联邦政府已经变得远比早先坚强——部分原因是所得税的通过赋予了它一个新的收入来源——这使得对农民的直接援助似乎更为现实。最后，国内市场一体化已明确只有联邦干预可以帮助农民。

最终，在1920年采用的农场计划只向农民提供了有限的帮助。农业生产的供给是高度有弹性的。如果没有手段来控制产量或者进行大规模购买，联邦立法不能显著改变农民收入，特别是那些贫困农民的收入。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政策讨论为20世纪30年代要遵循的政府对农业的大规模干预创造条件。

富者越富而穷者益穷？

在20世纪20年代的富人形象通常被描绘成自我满足和自我放纵，喝着香槟酒，无视周围不断增长的苦难。而且，一些历史学家已经看到20世纪20年代日益集中的收入和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间的直接联系。这种观点认为，太多的收入集中到富人手中，这些人消费的速度不足以维持总需求。对收入分配的早期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富人变得相对更富。在他1953年发表的开拓性著作中，西蒙·库兹涅茨表明，人口前1%的人收到的可支配收入的份额从1920年的

① 非紧急短期农业信贷需求因该法案的通过得到了妥善的照顾；1916年《联邦农业贷款法》成立了12家联邦土地银行来通过合作借贷集团向农民提供长期贷款。

11.8%增长到1929年的18.9%。[①] 查尔斯·霍尔特依据库兹涅茨的数据，认为在20世纪20年代实际收入的所有增加都流向了高收入群体。[②]

然而，最近的研究与该观点相反。吉恩·斯迈利指出，人口中最富有部分的收入份额呈上升趋势是有失公允的，因为它是以报税表为根据的。[③] 富人的税率在20世纪20年代大幅降低了，从而鼓励人们将自己的财富转变成产生应纳税收入的资产并报告一些以前未报告的收入。

杰弗里·威廉森和彼得·林德特，在有关美国不平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长期层面表示关注。[④] 不平等增加的长期趋势已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断，所以在20世纪20年代，不平等的增加是可以预料的。无论不平等的增加怎样，它可能代表了战前普遍环境的恢复。1929年的收入分配远非平等，但几乎没有已然发生的激烈的意外事件可以作为解释即将到来的大萧条的证据。

此外，当讨论20世纪20年代的收入分配时，记住斯坦利·勒伯格特基于如表22—1的那些数字提出的观点是很好的：尽管某些群体受损了，很大一部分美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却得到了改善，这些可以从诸如使用电力照明的家庭百分比，拥有洗衣机的家庭百分比，甚至使用内抽水马桶的家庭所占的比率之类的统计数字看到。经济推理命题5（证据很重要）在这里是恰当的。

宏观经济政策

财政政策

20世纪20年代末的财政政策最好被视为一个长期且旷日持久的战后调整。虽然战争的某些代价，比如退伍军人福利和国债增加的利息，一直持续到战后时期，然而，复员为削减战时征收的高税收创造了相当大的余地。

在20世纪20年代围绕税收的辩论与20世纪70年代的辩论（在供给学派的旗帜下）包含了同样的理由，并一直持续到今天。白宫主张通过去除战争期间采纳的过高税级来减税。财政部长安德鲁·梅尔顿认为，降低税率将鼓励储蓄和增长，并且对税收的影响将相对较小。富人将把他们的财产从免税市政债券转变成

---

① *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Series G341. 这些序列来自西蒙·库兹涅茨的 *Shares of Upper Income Groups in Income and Saving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3)。国民收入核算之父库兹涅茨，后来获得诺贝尔奖。

② Charles Holt, "Who Benefitted from the Prosperity of the Twentie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277 - 289.

③ Gene Smiley, "Did Incomes for Most of the Population Fall from 1923 through 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3): 209 - 216. 库兹涅茨本人曾对过于重视日期做出过警告。

④ Jeffrey Williamson and Peter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i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chapter 12.

应税资产，从而大大降低对总税收的影响。国会的自由派不完全反对减税。不过，他们赞成通过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免税额来减税。这场斗争的结果——1924年、1926年和1928年税收法案——扫除了战时消费税制度，降低了个人和公司税的税率，并降低了遗产税。整体而言，为20世纪20年代期间的历届政府采取的财政政策感到骄傲是可以理解的。税率削减了，但税收增长了，并且预算保持盈余。也许长期更重要，联邦预算制度于1921年推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使它能够应付联邦政府在以后的几十年要进行的大规模扩张。

表22—5显示，与20世纪20年代的整体经济相比，联邦支出相对较少。事实上，在1927年，联邦政府支出只有国民生产总值的3.5%，大多为传统分类：国防，邮政服务，退伍军人的服务，以及国家债务利息。虽然越来越多的资金被用于健康和福利，这些仍然是小类。预算的革命将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

表22—5　　1922年和1927年各级政府的支出和开支分配（%）

	1922年	1927年
GNP的份额		
政府总支出	12.6	1.6
联邦政府	4.9	3.5
州与地方政府	7.7	8.1
各级的开支分配		
联邦政府	39.2	30.4
州政府	11.7	12.9
地方政府	49.1	56.7

资料来源：Albert W. Niemi, *U. S. Economic History* (Chicago: Rand McNally, 1975), 117; as derived from *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0), 484 - 516.

货币政策

20世纪20年代期间对美联储来说威信不断增长。表22—6显示，经过1920年和1921年的急剧但短暂的衰退后，经济发展顺利。实际收入逐年稳步上升，货币存量也一样。根据国民生产净值（NNP）平减指数来判断，价格保持稳定。

表 22—6　　货币、价格和实际收入，1920—1929 年

年份	货币存量（十亿美元）	内含价格平减指数（1929 年＝100）	实际国民收入（1929 年十亿美元）
1920	34.80	121.7	62.208
1921	32.85	103.7	59.567
1922	33.72	98.6	63.859
1923	36.60	100.9	73.460
1924	38.58	99.6	75.559
1925	42.05	101.6	77.343
1926	43.68	102.1	82.807
1927	44.73	99.4	83.623
1928	46.42	100.1	84.918
1929	46.60	100.0	90.308

资料来源：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25.

是什么影响了这些年来美联储的政策？令人惊讶的是，并未影响政策的一个事实是，大量银行的倒闭。每年总共有好几百起银行倒闭事件，于 1926 年达到了高峰值 975 起。美联储的结论是，这些银行（主要是在农村地区）受管理不善、在战争期间给农民的不切实际的贷款以及由于汽车产业的崛起而增加的竞争困扰。（汽车增加了借款人和存款人以优惠条件购物的能力。）美联储遵循了简单的逻辑，令银行倒闭，总体上加强了银行体系。虽然很难想象在今天的政治环境下美联储采取这样一个无情的立场，其分析可能包含许多原因。遗憾的是，这个政策延续到 20 世纪 30 年代，在非常不同的经济状况下大量银行倒闭破坏了对银行体系的信心。

尤金·怀特的一系列重要论文阐明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弱点及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银行系统崩溃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这个问题源于禁止银行分行的立法。小规模银行无法分散其贷款组合并且在临时流动性不足的时期没有资源可动用。各州尝试不同的存款保险计划以保护它们的系统，但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大多数州开始废除已经造成严重后果的反对银行分行制的禁令。但此时损害已经造成，而要建立一个能够经受住 20 世纪 30 年代通货紧缩的系统为时已晚。①

而且，美联储深切关注华尔街日益增长的投机，我们稍后将更详细地讨论。美联储认为投机转移了生产力更高的投资资金，并且不可避免的裁员可能导致经济普遍动荡。但尚不清楚如何减缓资金流入股市而同时不用限制信贷总供给，因

① Eugene N. White, "State-Sponsored Insurance of Bank Depos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and "Before the Glass-Steagall Act: An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Banking Activities of National Bank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3 (1986).

此不会冒经济衰退的风险。起初，美联储尝试了“道德劝说”，说服纽约城市银行减少发放通知贷款（call loans）。这项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效，但其他借贷机构很快地进入了其留下的空白。

最后，沮丧于不能以任何其他方式给市场降温，1929 年 8 月 9 日美联储将贴现率从 4.5%提高到 5.5%。贴现率仍远低于通知贷款利率和其他银行贷款利率。因此，提高贴现率本身并不能消除借款的动机，但这标志着美联储限制信贷供给的意图。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都在采取类似的行动：英格兰银行将其贴现率从 5.5%提高到 6.5%。也许由于这些紧缩信贷的广泛前兆，美国股票价格在 9 月初达到了高峰。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看到的，对于美联储的政策在随后发生的事件中的确切作用存在相当大的争议。然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美联储被赋予了设定保证金要求的权力，因为人们认识到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已经被扭曲。

国际发展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欧洲的问题似乎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很遥远，并且与他们的生活无关。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态度是幼稚且事与愿违的。如果美国人更多地考虑到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未来可能会有所不同。然而，美国不能完全忽视主宰了国际舞台的两个问题：德国的战争赔款（和盟军欠美国的战争债务）以及国际金本位制的恢复。

正式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对法国和其他协约国支付大额赔款，以补偿由德国军队在战争期间所造成的损害。不久就很容易地发现，德国缺乏经济实力和政治凝聚力来做出如期支付。部分问题是，德国需要实行大量顺差以支付赔款，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和其他经济政策限制了德国的出口。但是，德国确实从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人大量借钱的偏好获得好处。1924 年，根据《道威斯计划》（Dawes plan），德国的债务被缩减，有人提出一大笔基本上来自美国的贷款，以帮助德国在 1923 年灾难性恶性通货膨胀以后恢复本国货币。根据 1929 年的《杨格计划》，进一步缩减了赔款总额，大多数历史学家如今都同意，试图从德国获得赔偿是一个错误，而一个明智的政策应旨在尽快恢复德国经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遵循的方针。①

在 20 世纪 20 年代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金本位制的恢复是实现持久的繁荣所必需的。如果每一个国家规定其货币可兑换成黄金，汇率将是固定的，而且货币当局将被迫慎重对待它们创造的货币数量（为避免黄金流出），而通货膨胀将可以避免。英国银行家特别急于回到战前平价的金本位制（也就是说，用美元计算英镑的战前价格），以帮助恢复伦敦作为世界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曾在

① 在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1920）一书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警告过试图从德国获得赔款的危险。

1924 年终于回到金本位制，但似乎英镑在战前被高估了。（该汇率是每英镑兑换 4.86 美元，但英镑的供给和需求平衡的均衡价格可能更低，大约为 4.4 美元。）高汇率使得英国货物难以出口，导致了英国一个漫长的艰难时期。[①] 如果美国允许由此产生的大量黄金流入增加其价格水平，对英国出口的压力也会得到减轻，但美联储却选择“消除”黄金流入。回想起来，如果美国的决策者考虑到其行为引起的国际影响的重要性，则可以避免后续的困难。无论如何，美国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主要受国内因素的影响，而且（除了在农业部门）事情好像进行得很顺利。

大牛市

一个事件主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的社会记忆：股市大繁荣。20 世纪 20 年代初股票价格稳步上涨，但在 1928 年和 1929 年的第 3 季度，股价飙升。表 22—7 显示了 1922 年和 1929 年之间股票价格发生的变化：7 年后，价格上涨逾两倍。1928—1929 年间，平均股价（第 1 列）上升 26.5%。看来发财很容易——只要把钱投入股市即可坐享其成。这个时代的典型是金融家约翰·雅各布·拉什科布在《妇女家庭杂志》发表的一篇标题很乐观的文章：《每个人都应该变得富有》。[②] 是什么造就了大牛市？一个原因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收入和公司支付股息的增加，反映为汽车和其他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大幅增加。通用汽车公司，由于其对福特的挑战带来的巨大盈利，是市场的最爱。

但是，股票价格上涨的速度甚至超过收入。考虑表 22—7 的第 2 列，这表明股票价格与股息的比例。1922 年，投资者必须为目前的每美元股息支付 17.24 美元；到 1929 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 28.74 美元。当然，人们不会以股息永远保持不变为前提进行投资。牛市中最受欢迎的是美国广播公司（RCA），它从未支付过股息。人们购买 RCA 股票的（有效）假设是它将在未来支付大额股息。

表 22—7　　1922—1929 年股票市场

年份	标准普尔普通股票价格指数（所有股票）	股票价格—股息比
1922	100	17.24
1923	102	16.84
1924	108	17.04
1925	133	19.27

① 再一次，凯恩斯警告政府实施了一个错误的政策。参见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London: Woolf, 1925)。

② 引自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of 1929*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57。

续前表

年份	标准普尔普通股票价格指数（所有股票）	股票价格—股息比
1926	150	18.80
1927	182	20.96
1928	237	25.13
1929	309	28.74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Series X479 and X495.

乔治·塞金在一个关于牛市的有趣评论中认为，如果在股市暴跌前几年的收入增长可预计未来，那么只有相对少数股票可被认为在市场的高峰期被高估了。但尤金·怀特指出，塞金的结果取决于多年利好时期的预计收入。[①] 怀特认为，这回避了问题的实质：为什么市场选择以最有利的年份为基础的预测，而不是一个长期运行的经验？见经济透视 22.1。一些历史学家推测，部分的解释是，人们说服自己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科学和技术将大大超过过去可能产生的收入增长。

经济透视 22.1

未来股息的增长预测

经济理论的结论是如果投资者是理性的，股票（或股票组合）的价值将等于预期未来股息的折现值。计算公式为：

$$P=\frac{D_1}{(1+i)}+\frac{D_2}{(1+i)^2}+\frac{D_3}{(1+i)^3}+\cdots \tag{1}$$

其中 P 是一只股票或一组股票的价格；D_1，D_2，D_3，等等，是预计的明年的、从现在起第 2 年、第 3 年，以此类推年份的股息；i 是投资者折现未来值的利息率。

如果我们做出额外假设，预期股息的增长速度 g 不变，公式简化为：

$$P=\frac{D_1}{i-g} \tag{2}$$

如表 22—7 所示，1922 年，价格—股息比为 17.24。假设投资者使用战前（1900—1914 年）每年 2.72%的股息增长率来预测未来股息的增长。这个假设将

① Eugene White，“When the Ticker Ran Late：The Stock Market Boom and Crash of 1929，” in *Panics and Crashe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ed. Eugene N. White（Homewood，Ⅲ.：Dow Jones-Irwin，1989）.

意味着由方程（2）贴现率约为每年8.52%。让我们假设投资者在1929年使用同样的贴现率，但是，他们现在使用战后（1919—1929年）的股息增长率每年5.84%，来预测未来的股息增长。然后，由公式（2），预期的价格—股息比将是37.34，大大高于实际市场的价格—股息比28.74。基于这些假设，1929年股票仍被低估。但是，如果我们假设一个更合理的股息增长率4.28%——战前和战后的平均增长率，那么价格—股息比应该是23.58左右；1929年股票被高估。

如果收入没有驱动市场，是信贷条件驱动的吗？当时，大量股票是凭保证金额度购买。买方将以现金形式预付股票价值的约50%，并从经纪人那里借入其余的50%。以这种方式举债经营意味着，当股票价格上涨了，比如说10%，投机者挣到初始投资的20%。但是，水涨船高，反之亦然。如果股票下跌10%，投机者损失20%。人们有时假定额定保证金变得非常低——5%或10%——但大多数经纪人要求45%或50%上下。[①] 经纪人借给投资者的钱是从哪里得到的？经纪公司以通知贷款的形式从银行借钱——一经要求就必须偿还的贷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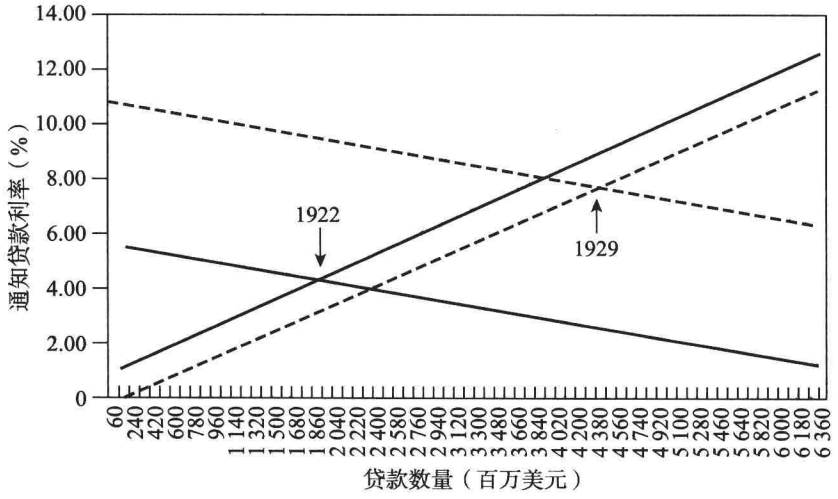
有时做出的一个假设就是，繁荣出现是由于银行更愿意发放这些贷款。然而，这也似乎不尽然。见经济透视22.2。

经济透视 22.2

☞

通知贷款和牛市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纽约银行方面越来越倾向于提供通知贷款导致了牛市。然而，尤金·怀特对市场的研究表明，这不是决定性因素。[②] 他的分析如下图所示。



① 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of 1929* (Boston: Houghton-Mifflin, 1961), 37.

② 参见 Galbraith, *The Great Crash*, 37。

通知贷款账户在20世纪20年代急剧上升，但它也从1922年的4.36%上升到1929年的7.74%。[①] 显然，如图所示，市场均衡向右上角移动，这表明，贷款需求的增加超过供给。如果供给的增加大于需求，均衡通知贷款利率将会下降。换句话说，信贷由于通知贷款利率的上升被拖进股市。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当时股市看起来的确有“泡沫”——通常认为1928年3月是泡沫开始的时间——在这个意义上，股票价格偏离基于“基本面”如预期收益和其他投资的利率等的预期。为市场提供信贷的机构，或许很多投资者，特别期待市场价格下跌。钱不断地大量涌入股市，甚至很多认为股市被高估的投资者，都认为自己能在股市开始下跌之前盈利并退出。

繁荣的真正解释，如果曾经有一个，将要由社会心理学家提供。这是一个乐观的时代。生意兴隆。人们似乎没有理由认为它不能继续蓬勃发展，为普通美国人提供越来越高的生活标准。股票市场反映了这种乐观。

他们应该更了解吗

在异常愉快的1929年夏季，美国人祝贺自己找到了一个无止境繁荣的办法。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流动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工业生产在10年中上升了50%。大部分企业都满意自己的利润，工人满足于使他们能够享受汽车和家用电器奢侈品的工资及收入的增长。农民抱怨价格，但无可厚非，因为这是传统；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机械发明已经使得农场的生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舒适和更富有成效。此外，真正想成为富人的途径只有购买普通股。

政治气候有利于商业投资者，他们当时作为物质福利的提供者深受公众尊敬。赫伯特·胡佛，一个成功的商人和一位杰出的公职人员，已当选为总统，人们普遍预期他是一个温和的和明智的领导者。同样令人欣慰的是西欧经济的稳定。战争破坏已经恢复，金本位制已经重新确立，而且赔偿问题几近解决。

当时美国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欧文·费雪。作为一个杰出人物，费雪在经济学领域从指数到货币理论做出了重要的理论与实证贡献。他的卡片索引系统让他发了一笔财，他的关于健康饮食的书成为畅销书。当记者想知道流行歌曲名“Yes，We Have No Bananas”是否是规范英语时，他们会问欧文·费雪。[②] 费雪并没有羞于做出有关股市的预测。仅仅在股市崩溃的几个星期前，他认为，“股票价格已近乎永久高原”，并补充道，“股票价格可能会有衰退，但不是什么崩溃性质。”即使在股市崩溃后，费雪说，“至少，对于不久的将来，前景是光明的。”[③]

现在可以轻易地嘲笑这种乐观。但费雪等人应该早弄清楚吗？有没有本来应

① White，“When the Ticker Ran Late.”

②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问题是“Have you no bananas”。

③ 引自 Galbraith，*The Great Crash*，91，99，151。

该重视的即将发生灾难的迹象？也许，恐慌和危机在美国历史上的悠久传统（费雪对此很了解）应该暂停。当然，经济中如银行系统和农业部门也有弱点，但尽管存在这些弱点，美国经济已实现多年快速增长。最终，我们是否认为费雪和其他乐观主义者是不明智的，抑或仅仅是难以置信的不幸，取决于我们认为引起大萧条的原因是什么，这是下一章的主题。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merican Stock Exchange, "History and Timeline." http://www.amex.com.

Field, Alexander J.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June 1984).

——. "Uncontrolled Land Development and the Duration of the Depr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December 1992): 785 - 805.

Fisher, Irving. *Prohibition Still at Its Worst*. New York: Alcohol Information Committee, 1928.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Great Crash of 1929*, reissued with a new introduc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1.

Goldin, Claudia.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in the U.S., 1890 to 1921" In *The Regulated Economy: A Historical Approach to Political Economy*, eds. Claudia Goldin and Gary Libeca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America's Graduation from High School: The Evolution and Spread of Secondary School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8 (1998): 345 - 374.

——. "Egalitarianism and the Returns to Education during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n Edu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part 2, no. 6 (December 1999), S65 - 94.

——. "The Human 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Virtues of the Pas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2001): 782 - 818.

Goldin, Claudia, and Lawrence F. Katz. "Education and Incom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Evidence from the Prai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2000): 782 - 818.

Hawley, Ellis W. *The Great War and the Search for a Modern Order: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and Their Institutions, 1917—1933*. New York: St. Martin's, 1979.

Holt, Charles. "Who Benefitted from the Prosperity of the Twenties?" *Explora-*

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77): 277 - 289.

Hughes, Jonathan. *The Vital Few*.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20.

Keller, Robert. "Factor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20s: A Reexamination of Fact and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3 (1973): 252 - 273.

Lampman, Robert. *The Share of Top Wealth-Holders in National Wealth, 1922—1956*.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Leuchtenburg, William E. *The Perils of Prosperity, 1914—1932*,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Libecap, Gary D. "The Political Allocation of Mineral Rights: A Reevaluation of Teapot Dom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14 (1984): 381 - 393.

Lorant, John H. "Technological Change in American Manufacturing During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243 - 246.

Mercer, Lloyd, and Douglas Morgan. "Alternative Interpretations of Market Saturation: Evaluation for the Automobile Market in the Late 192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9 (Spring 1972): 269 - 290.

——. "The American Automobile Industry: Investment Demand, Capacity, and Capacity Utilization 1921—1940."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0 (November-December 1972): 214 - 231.

——. "Housing Surplus in the 1920s: Another Evalu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Spring 1973): 295 - 304.

Metzer, Jacob. "How New Was the New Era?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192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March 1985): 119 - 126.

Miron, Jeffrey A. "Violence and the U. S. Prohibitions of Drug and Alcohol." *American Law & Economics Review* 1 (1999): 78 - 114.

Miron, Jeffrey A., and Jeffrey Zwiebel. "Economics of Drugs: Alcohol Consumption during Prohib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Papers and Proceedings (1991): 242 - 247.

——. "The Economic Case against Drug Prohibi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Autumn 1995): 175 - 192.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http://www.nyse.com.

Olney, Martha. "Credit as a Production-Smoothing Device: The Case of Automobiles, 1913—1938."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9 (June 1989): 377 - 391.

——. "Consumer Durables in the Interwar Years: New Estimates, New Patterns."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2, eds. Roger Ransom, Peter Lindert, and Richard Sutch. Greenwich, Conn.: JAI, 1989, 119 - 150.

——. "Demand for Consumer Durable Goods in 20th Century America."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7 (July 1990): 322 - 349.

——. *Buy Now Pay Later: Advertising, Credit, and Consumer Durables in the 1920s.*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Sirkin, Gerald. "The Stock Market of 1929 Revisited: A Note."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9 (Summer 1975): 223 - 231.

Smiley, Gene. "Did Incomes for Most of the Population Fall from 1923 through 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3): 209 - 216.

Smiley, Gene, and Richard Keehn. "Margin Purchases, Brokers' Loans, and the Bull Market of the Twenties." *Business History Conference* 17 (1988): 129 - 142.

Soule, George. *Prosperity Decade: From War to Depression, 1917—1929.*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7.

Swanson, Joseph, and Samuel Williamson, "Estimates of National Product and Income 1919—1841."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Fall 1972): 53 - 73.

Timmer, Ashley S.,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Racism, Xenophobia or Market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mmigration Policy Prior to the Thirties." NBER Working Paper No. 5867.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December 1996.

Vatter, Harold G. "Has There Been a Twentieth-Century Consumer Durables Revolu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27 (1967): 1-16.

Warburton, Clark. *The Economic Results of Prohibi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2.

White, Eugene N. "Before the Glass-Steagall Act: An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Banking Activities of National Bank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3 (1986): 33 - 53.

——.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19 - 138.

——. "State-Sponsored Insurance of Bank Deposi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7—1929."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Sept. 1981): 537 - 557.

——. "When the Ticker Ran Late: The Stock Market Boom and Crash of 1929." In *The Stock Market Crash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ed. Eugene Nelson White. Homewood, Ill.: Dow Jones-Irwin, 1989.

White, Eugene N., and Peter Rappoport. "Was There a Bubble in the 1929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3 (September1993): 549 - 574.

——. "Was the Crash of 1929 Expect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March 1994): 271 - 281.

Williamson, Jeffrey, and Peter Lindert. *American Inequality: A Macro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

第 23 章　大萧条

本章主题

随着 20 世纪 20 年代即将结束，美国人对他们的福祉和更美好的前景充满信心。在 1928 年夏天的选举中，总统候选人赫伯特·胡佛用这些话语鼓吹美国的乐观主义：

我们今天在美国已经比以往任何国家都更接近战胜贫困的最后胜利。救济院正从我们中间消失。我们还没有达到目标，但是，只要有机会与过去 8 年的政策一起前进，我们将很快在上帝的帮助下见到贫困从这个国家被消除的那一天。

几乎没有无人理睬的警告，胡佛的话是时代信心的典型；几乎每个人都错过了一个正在显现的经济正在下跌的迹象。事实上，即使在大萧条全面爆发后许多人仍没有认识到衰退的幅度。

大萧条是 20 世纪最重要的经济事件。1929 年和 1933 年之间，美国经济崩溃。几乎无法描述传达大萧条产生的纯粹的恐怖和痛苦，但数字可以显示其规模。实际 GDP 下降了 30%。失业率从 1929 年的 3.2%上升到 1933 年的 24.9%。饥饿和恐惧使国家瘫痪。

对经济史学家来说，核心问题是这些：是什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崩溃？为什么经济保持低迷这么长时间？如何才能避免重蹈覆辙？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学者们还远未就所有问题达成完全一致。但是，在促成危机的严重性特别是金融系统崩溃的关键因素上已达成共识。在本章，我们集中于危机的规模和根源。在下

一章，我们的重点是罗斯福政府对大萧条的反应及长期后果，特别是现代的中央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混合经济”的出现。

大萧条的规模

即使在事后，回想起一个如此大规模的经济灾难的发生，也绝对认为其十分异常。从1929年至1933年的4年期间，美国经济完全瓦解。当前价格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6%，从1 044亿美元跌至560亿美元。如图23—1所示，以1929年不变的价格，下降27%。工业生产下降了一半多，而总投资如图23—2所示，基本上崩溃了。到1933年，总投资低于资本折旧水平。该国的资本存量实际上是下降的。在这个过程中，批发价格下降了1/3，消费价格下降了1/4。在1933年3月大萧条的低谷，耐用品产量已经下降了80%，非耐用品下降了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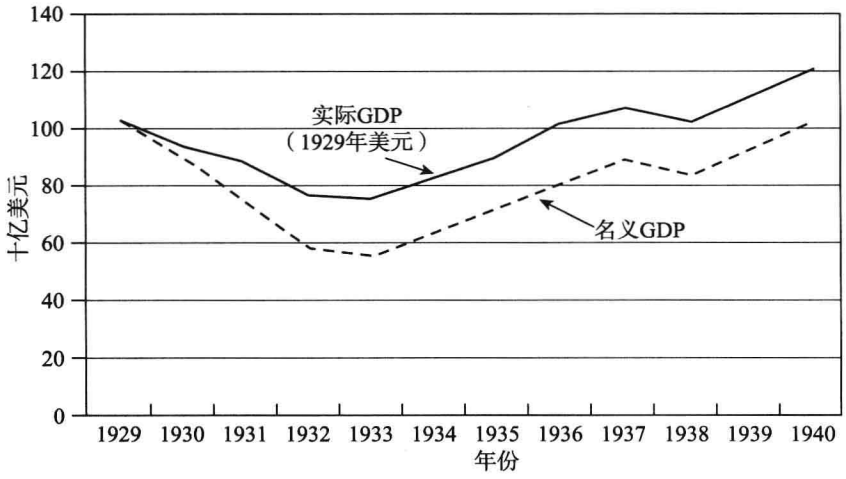


图23—1　1929—1940年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www.bea.gov/.

最可怕的统计数字是失业人数。图23—3生动地说明了失业率如何飙升。失业人数从150万上升到1 150万。平民劳动力的1/4失业或要通过紧急情况获得由联邦政府于1933年创造的“因人设事的闲差”。美国至少一半的经济支柱人口要么失业，要么处于收入严重减少的情况。

大萧条的强度是令人痛苦的，其表面上的永无休止带来了沮丧和绝望。1920年和1921年的萧条是尖锐且困难的，耐用品产量下降了43%，但它表现为萧条应有的状态，来去都很快。在大萧条时期，耐用品生产却直到1940年8月即大萧条后11年多才恢复1929年的顶峰。如图23—3所示，在大萧条开始十年后失业率仍居高不下。

对由大萧条的持续时间及深度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这决定

性的10年的事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心理方面的革命性影响只有南北战争造成的影响可与之相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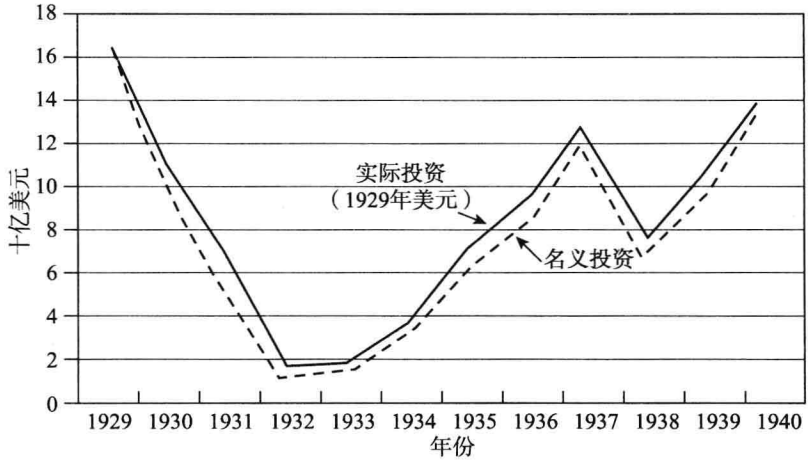


图 23—2　国内私人投资总额，1929—1940 年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http://www.bea.go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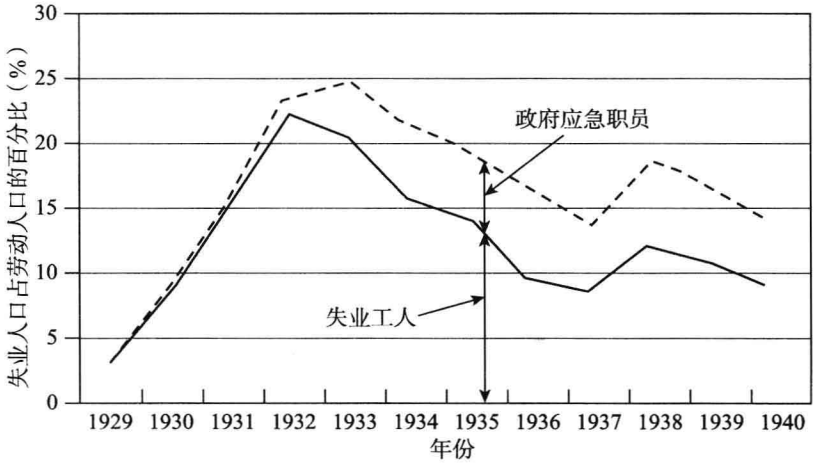


图 23—3　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比例，1929—1940 年

资料来源：Michael Darby，"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 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aid：Or an Explanation of Unemployment，1934—194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1976）：7，8.

大萧条的根源

一个令人满意的对大萧条的解释要求我们必须区分带来经济活动放缓的力量

和将经济下滑转变为彻底灾难的力量。

1929 年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的华尔街。随着纽约证券交易所（右边）里的灾难程度变得明显，投资者和好奇的人在铺板街上（地铁建设正在进行）成群地漫无目的地乱转。

事后认识使我们能够发现为经济衰退埋下伏笔的两个经济原因。最重要的是从 1925 年开始的住宅和非住宅建筑的下降。始于 1918 年的建筑业繁荣无疑有助于经济走出 1920 年和 1921 年的低迷；相同建筑业周期的下降阶段，刚好与其他经济弱点巧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重大影响。1925 年至 1927 年开始的建筑业温和下滑成为 1928 年的显著衰退。

第二个经济原因来自农业部门，该部门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仍然是重要的，足以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正如在第 22 章提到的，农民在整个 10 年里与不断下跌的世界市场价格和沉重的债务作斗争。在中部农业地区，1926 年后很少出现繁荣心理现象。

1929 年春季耐用消费品产量的温和滑坡以及在这年夏天非耐用品生产的下降很可能已被预料到，但没有预报任何灾难性的事情。一系列将衰退转变成大萧条的毁灭性打击当时冲垮了经济。

股市崩溃

第一次打击是 1929 年 10 月最后一周股市崩盘。股价下跌，甚至是大幅度的

下跌，并不必然导致商业衰退。1987 年的股市崩盘就是佐证。然而，1929 年崩盘，由于衰退的灾难性严重程度和它创造的对未来经济去向的不确定性，大大加快了当时进行中的轻微下滑。

《纽约时报》指数的 25 家工业类股，早在 1924 年时位于 110 点，1929 年 1 月已攀升至 338 点，而到 9 月升至 452 点。几乎不可能买到价值没有快速上升的普通股，投资者迅速积累财富。由这些收益产生的乐观弥漫于商界，并导致了永久繁荣已经到来的结论。然而，许多投资者已经对价格上升到令人眩晕的高度感到不安。胡佛总统和美联储官员担心过度的投机活动和崩溃的危险。8 月，美联储将贴现率（它借给成员银行的利息率）提高至 6%，企图阻止信贷流动进入股市。英格兰银行和其他央行因为相同的原因采取了类似行动。至少在很短的时间内，这些行动并没有发挥作用：股票价格继续上涨。

v York Times.

THE WEATHER
Rain today and probably tomorrow; somewhat colder tomorrow.

YORK, TUESDAY, OCTOBER 29, 1929. TWO CENTS

Memory Honored Day Fete on Ships

EUROPE IS DISTURBED BY AMERICAN ACTION ON OCCUPATION DEBT

London Urges an Explanation of Move for Direct Payments by Germany.

BANK'S PRESTIGE INVOLVED

Britain and Continent Feel That We Do Not Have Faith in Young Plan Institution.

SCHEME IS LAID TO HOOVER

President Is Said to Wish to Avoid Clash in Congress Over Linking of Reparations and War Debts.

By EDWIN L. JAMES.

LONDON, Oct. 28.—There appears to exist in London a certain absence of understanding as to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conversations between Washington and Berlin which now are about to ripen into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in the German capital

T. E. BURTON, 4, DIES AT 77

man Had Served in r 41 Years—First to the House.

VOCATE OF PEACE

STOCK PRICES SLUMP $14,000,000,000 IN NATION-WIDE STAMPEDE TO UNLOAD; BANKERS TO SUPPORT MARKET TODAY

Sixteen Leading Issues Down $2,893,520,108; Tel. & Tel. and Steel Among Heaviest Losers

A shrinkage of $2,893,520,108 in the open market value of the shares of sixteen representative companies resulted from yesterday's sweeping decline on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was the heaviest loser, $448,906,182 having been lopped off of its total value. United States Steel common, traditional bellwether of the stock market, made its greatest nose-dive in recent years by falling from a high of 202½ to a low of 185. In a feeble last-minute rally it snapped back to 186, at which it closed, showing a net loss of 17½ points. This represented for the 8,131,955 shares of common stock outstanding a total loss in value of $142,293,446.

In the following table are shown the day's net depreciation in the outstanding shares of the sixteen companies referred to:

Issues.	Shares Listed.	Losses in Points.	Depreciation.
American Radiator	10,096,289	10⅝	$104,748,987
American Tel. & Tel.	13,202,093	34	448,905,162
Commonwealth & Southern	30,764,466	3¼	96,138,962
Columbia Gas & Electric	8,477,307	25	146,300,754
Consolidated Gas	11,451,189	20	228,023,780
DuPont E. I.	10,322,491	18⅝	190,030,628
Eastman Kodak	2,528,701	41⅞	83,368,813
General Electric	7,211,424	47⅝	342,343,480
General Motors	43,500,000	6½	283,625,000
International Nickel	13,777,408	7⅞	108,497,088
New York Central	4,837,086	25⅝	124,211,671
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	24,443,643	8	195,549,144
Union Carbide & Carbon	8,730,173	20	

PREMIER ISSUES HARD HIT

Unexpected Torrent of Liquidation Again Rocks Markets.

DAY'S SALES 9,212,800

Nearly 3,000,000 Shares Are Traded In Final Hour—The Tickers Lag 167 Minutes.

NEW RALLY SOON BROKEN

Selling by Europeans and "Mob Psychology" Big Factors in Second Big Break.

© BROWN BROTHERS

报纸通过枯燥的统计数据报道了华尔街崩溃的痛苦细节。

9 月 5 日，投资顾问罗杰·巴布森警告说，崩溃即将到来，市场度过了“巴布森崩盘”。整个 9 月份价格都在下跌，但没有出现恐慌迹象。然后，10 月 23 日和 10 月 24 日（“黑色星期四”）发生了急剧崩盘，当时交易创下了 13 亿股的纪录（300 万股为正常水平）。银行和投资公司大规模有组织的购买防止了彻底崩溃，但在 10 月 28 日（“黑色星期一”）和 10 月 29 日（“黑色星期二”），恐慌卷土重来。滑坡一直持续到 11 月中旬。到那时，股票价格已下跌至它们 8 月价格的一半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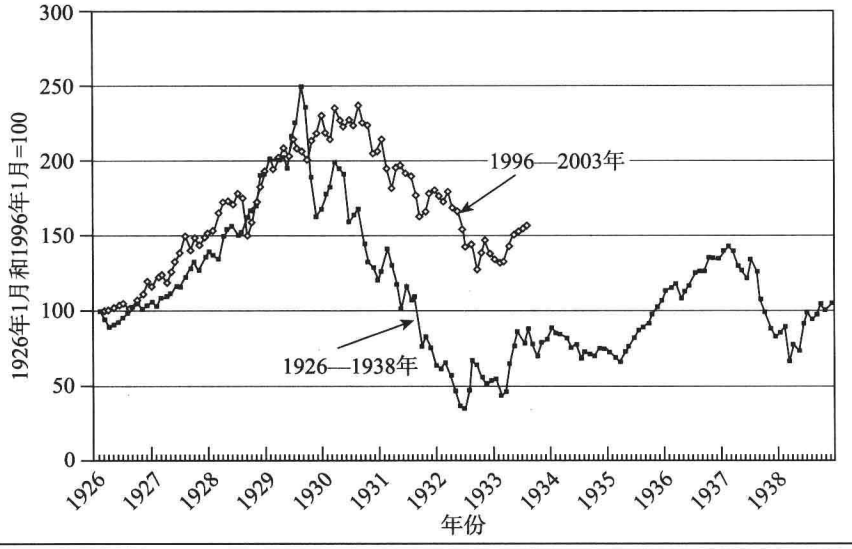
但是，至少到 1930 年，股票价格仍高于 1926 年达到的水平。如果涉及的所有损失曾是股市投资者在 1927 年和 1928 年获得的非凡的资本收益，这将很难将

大萧条归咎于股市暴跌——毕竟，“来得容易，去得容易”。由崩盘所产生的独特的心理创伤比财富损失的直接影响更重要。许多美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已经相信经济已进入一个持续和快速进步的“新时代”，这将把他们带往越来越高的生活标准。股市的大幅上升被作为这个观点受到知识渊博的投资者普遍赞同的证据。当市场崩溃时，对未来的这种乐观情绪与它一起崩溃；几乎在一夜之间，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悲观情绪笼罩着市民。特别地，耐用消费品购买急剧下降，因为其取决于消费者对未来的信心，并越发依赖于分期付款。[①] 见新观点23.1关于股市崩溃可以提供的教训。

新观点 23.1

☞

下图显示了从1926年1月至1938年12月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价格，并与从1996年1月至2003年8月的股票价格进行了比较。由此可见，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股票价格的上涨与20世纪20年代后5年的股价上涨类似。这一类似促使许多投资者（包括许多经济史学家）在2000年高峰附近售出股票。金融历史知识是否可让人成为更好的投资者？当然，对金融史的研究增加了我们对目前各种交互作用力量的了解，但金融市场不会照抄过去的模式。请注意，到目前为止，最近股票价格的下跌并没有像20世纪30年代初的下跌那么严重，也许是因为在21世纪初没有出现过像20世纪30年代初破坏了信心的银行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那样的严重事件。



① 这个观点是在Christina Romer，“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CV (1990)：597－624中发展的。

斯穆特-霍利关税率

在1930年6月，国会通过、总统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 Tariff Act），其提高了各种各样商品尤其是农产品的关税。有人强烈抗议该法案，1 000名经济学家包括该行业所有权威人士签署了一份请愿书，敦促胡佛总统否决它，其理由是高关税将减少进口，从而使得其他国家更难以赚得购买美国的出口商品所需要的钱。有人还认为，高关税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报复。每个国家都将提高关税，而贸易将下降。事实上，不久其他国家也会提高关税，例如，英国在1932年就提高了关税。但是，很难说其他国家是否出于报复美国提高关税而提高自己的关税或者是其他原因，如仅仅是因为正常的资金来源正在枯竭而提高在大萧条时期的收入。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虽然不明智，然而并非是大萧条的主要根源。在1930年，出口仅占GNP的6%，进口仅占4.9%。此外，关税的提高只适用于我们进口商品总数的一部分；许多商品被豁免。[①] 增加的关税确实对进口竞争部门有一些积极的就业效益。因此，《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至多是使得本就糟糕的情况更糟。也许关税最大的影响是心理上的：对该法案的争议，加深了对未来的悲观情绪，并打击了投资意愿。

对于许多比美国更依赖贸易的其他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紧随《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增税回合更重要。当时及此后的大多数专家，将30年代提高关税的倾向视为一个弄巧成拙的“以邻为壑”的政策。从一定程度上讲，美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冠军（尽管并非一直是冠军）。《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成为美国最后一次出台的高“保护性”关税政策。

银行危机

股市崩溃的破坏性影响在大萧条的初期阶段出现。如果不是银行体系的结构性弱点，士气可能有所改善，股市和经济可能已经有所恢复。

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初多次因银行倒闭浪潮受到冲击。如表23—1所示，随着南方和中西部的银行倒闭，1930年10月开始受到第一次冲击。尽管损失沉重，这些倒闭并没有引起美联储或国家媒体的注意，也许是因为它们与20世纪20年代曾发生的倒闭类似。[②] 然后在12月11日，在纽约的美国银行倒闭。这次倒闭很重要：以存款来衡量，这是美国历史上空前的最大的倒闭。虽然这是一个

---

① 许多进口税是按名义价值计算的（每磅进口产品收多少美分）。通货紧缩提高了这些税收负担，这增加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呼吁的关税提高。

② See Eugene N. White,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19 - 138; and Elmus Wicker, *The Banking Pan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chapter 2.

普通的银行（由纽约州特许的），它的名字可能导致一些人认为与政府有特别密切联系的银行倒闭了。

表 23—1　　金融崩溃年代表：1929—1933 年

时期	事件	评论
1929 年 10 月	股市崩溃	对未来的乐观主义变成了悲观主义 耐用消费品的购买下降
1930 年 10 月	美国第一次银行危机开始	南部和中部的银行倒闭增加
1930 年 12 月 11 日	纽约市美国银行倒闭	通货存款比开始升高
1931 年 3 月	美国第二次银行危机开始	银行倒闭创下新高，存款下降
1931 年 5 月	奥地利最大的私人银行维也纳信贷银行破产	这次危机已成为国际性危机
1931 年 7 月	德国银行关闭	资本流入美国，但美国银行的短期债务被冻结
1931 年 9 月	英国放弃金本位制	没有什么事情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黄金流出美国
1932 年 4 月	大规模公开市场购买开始	规模太小，为时已晚
1933 年 3 月	1933 年银行恐慌	国家银行假日开始。罗斯福总统 3 月 6 日宣布全国的银行放假

资料来源：Derived from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301 - 324, and other histories of the period.

多数经济史学家一致赞同此时的美联储应充当最后贷款人。它应该慷慨地借款给倒闭的美国银行和其他银行以打破正在破坏银行体系的恐惧循环。然而，因我们稍后将详细讨论的种种原因，它没有这样做。对于美联储，似乎正在倒闭的银行只是管理不善的银行，就应该被淘汰以使系统更有效。有时一个银行陷入困境的谣言将使人们在银行破产之前进行挤兑——一个典型的恐慌迹象。更一般地，银行倒闭的恐惧使人们将存款转换成现金，从而使银行丧失了准备金。此外，银行拒绝新贷款或续借旧贷款以建立自己的储备。其结果是银行的存款额和贷款额缩水。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到，结束这种恶性循环很重要，但美联储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

连着数月，事情似乎平静些了，但第二次更强烈的危机始于 1931 年 3 月。这一次，国外的事件加强了危机。1931 年 5 月，维也纳信贷银行——奥地利的一家大银行破产了。因为黄金是大多数工业国家货币供给的基础，类似这样的破产使全世界人民确信是时候将票据债券兑换成黄金实物。1931 年 9 月，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以及金融公正的象征的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英镑将不再一经要求即可兑换成黄金。这反过来又增加了对美元的压力，它仍可兑换成黄金。

最后的银行恐慌开始于 1933 年。在 1930 年和 1932 年之间，有超过 30 亿美元（在 1930 年 1 月大约占存款总额的 7%）存款的 5 000 多家银行已经停业。1933 年，另有存款超过 35 亿美元的 4 000 多家银行将关闭。经过多年的通货紧缩这些银行财力变弱，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新政府将如何处理危机的不确定性，以及普遍的不信任和恐惧气氛——这一切都促成最后的危机。到罗斯福于 1933 年 3 月 4 日上任的时候，金融系统已停止运转。

罗斯福总统的首要行动之一就是 1933 年 3 月 6 日宣布全国银行放假。紧随国家银行假日的这一行动，将国内所有银行关闭了一周。这一行动能改变情况吗？市民被告知，在此期间银行将被调查，而只有健全的银行获准重新开放。人们已对这种处理方式提出疑问。也许很多健全的银行将被关闭，而不健全的却允许继续开放。但似乎这一方案有效，即使这只是一个安慰剂；恐慌消退了。

除了银行假日，联邦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助于恢复人们对金融体系信心的其他行动。通过要求大家把货币黄金上交给美联储交换其他货币这个简单的权宜之计，黄金囤积得以结束。也许最重要的是，为确保银行存款，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ederal Deposit Insurance Corporation，FDIC）成立。保险于 1934 年 1 月 1 日生效，并在 6 个月内将几乎全国所有商业银行都包括在内。存款保险急剧改变了存户面对的动机。破产的谣言不会再使得人们进行挤兑，因为他们现在知道他们最终会在任何情况下获赔他们的存款。这些政策一起大大改变了银行破产率。银行破产的数目由 1933 年的 4 000 家下降至 1934 年的 61 家，并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剩下的几年保持两位数水平。通过对比可知，从 1921 年至 1929 年银行破产数量最低的一年是 1922 年 366 家。虽然大萧条在这十年的后面几年里延续，银行危机已克服。

金融危机的作用

银行和金融危机显然是一个重大的灾难。它们在大萧条中的作用是什么？它们是大萧条的根源还是仅仅是大萧条的结果？

货币主义的解释

如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J·施瓦茨这样的货币主义者认为，经济大萧

条的主要根源是货币存量的下降，这是由从银行系统提出货币和银行持有更多准备金的决定所产生的。银行可以保持或提高自身准备金的唯一方法是通过减少它们的贷款，这一决定导致了银行信贷和存款的多重收缩。根据货币数量理论，当货币存量缩小时，人们试图通过减少支出来恢复货币余额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其结果是国民生产净值下降。因此，货币主义者认为，如表 23—2 所示，货币存量从 1929 年的 470 亿美元下降到 1933 年的 320 亿美元，是国民生产净值从 900 亿美元下降至 430 亿美元的主要根源。他们指责美联储未作为最后贷款人以防止货币存量的下降。

表 23—2　　1919—1933 年货币与收入

年份	(1) 货币供给 （十亿美元）	(2) 国民生产净值 （十亿美元）	(3) 货币与国民生产 净值的比率	(4) 商业票据利率 （%）	(5) 实际利息率 （%）
1929	46.6	90.3	0.52	5.78	5.88
1930	45.7	76.9	0.60	3.55	8.15
1931	42.7	61.7	0.69	2.63	15.46
1932	36.1	44.8	0.81	2.72	14.99
1933	32.2	42.7	0.76	1.67	3.03

资料来源：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24.

货币主义者并不认为货币存量下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请注意，货币与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表 23—2 第 3 列）上升了，显示人们是在囤积而不是在花费。特别地，在大萧条的第一年，货币与国民生产净值的比率急剧上升，可能是因为股市的崩溃，而货币供应量仅小幅下降。不过，货币主义者坚持认为，货币供给量的任何下降都具有重要意义。（见下文更多的对比例与货币数量论的讨论。）

货币存量的崩溃无疑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大多数经济史学家现在跟随货币主义者，至少有一些作用归因于货币崩溃。但是，比起其他根源比如股票市场崩溃，对于应该分配多少权重给金融危机这个问题出现了一些争议。彼得·特明持最强烈的怀疑态度，他对表 23—2 数据的解释刚好与货币主义者的提议相反。[①] 根据特明，由于一定程度上是由股市崩溃带来消费支出崩溃，国民生产净值下降。因此，利润下降，工人被解雇。许多企业和个人无力再偿还银行贷款。这引发了银行倒闭浪潮以及表 23—2 第 1 列所示的货币存量下降。可以肯定这是一个悲剧，但在特明看来，它是大萧条与农业、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以及其他经济部门的问题类似的一种症状。

① Peter Temin,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根据特明，一个关键的证据是利息率的表现。他说，如果货币存量下降是触点，我们将会看到利率上升。人们会出售金融资产以获得货币，这些资产的价格将会下降，而它们获得的回报（相对于它们的价格）会上升。如果小麦短缺，我们预期小麦价格会上涨，而如果货币短缺，我们预期利率将上升。但是，我们的观察正好相反：短期利率，如表 23—2 第 4 列所示，从 1929 年的 5.78%下降到 1933 年的 1.67%。因此，特明的结论是，1929—1933 年的紧缩期间没有货币短缺。

但是，特明的分析并没有结束辩论。货币主义者反驳，利率不是货币资金的价格，而是信用的价格。（见经济透视 23.1。）因为货币供给量下降导致经济活动的普遍减少，对信贷的需求下降。对于货币主义者，货币价格是价格水平的倒数，即货币购买力。这个变量从 1929 年升至 1933 年，表明货币供给紧缩的速度超过需求。货币主义者也指出，对商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实际利率：市场利率加上预期的通货紧缩率。表 23—2 第 5 列表明实际利率的一种简单衡量，商业票据利率扣除自上一年以来的物价变动百分比。实际利率在大萧条的最初几年显然非常高。

金融危机的非货币影响

此外，最近的研究已确定了其他渠道，金融危机通过它们加强了经济活动的衰退。开创性的研究由本·伯南克所作，他以广泛的证据为基础，主张银行倒闭使企业，特别是规模较小的企业很难获得它们所需要的用以继续运转的贷款。①

伯南克的解释强调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当借款人与贷款人协商时，他们获得的关键信息不同。贷款人不能看到借款人的内心以了解借款人的还款决心。在正常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建立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长期的合作关系或通过抵押品来克服的。但是，当一个银行破产，银行及其借款人的长期合作关系被切断。借款人可以接近另一个贷款人，但另一贷款人如何才能知道该借款人在过去一直在努力忠实地去偿还贷款或借款人被其他社会成员视为一个风险很小的人？伯南克的分析还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大萧条持续了这么长时间：需要时间来建立新的关系。

经济透视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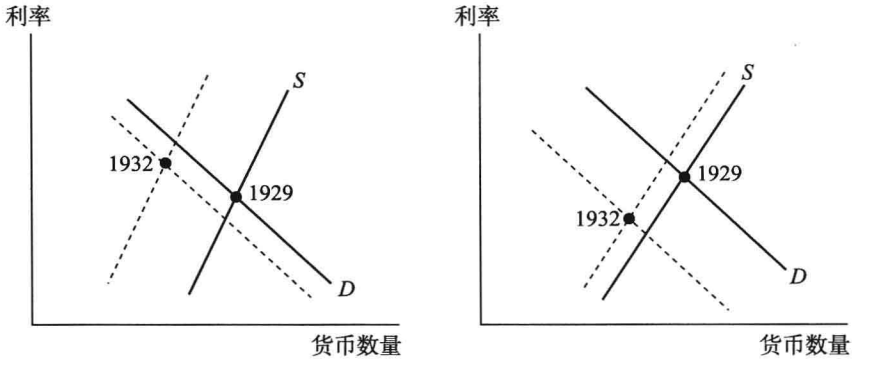
特明对货币主义者大萧条解释的批判

下面两幅图说明了彼得·特明对货币主义者大萧条解释的著名批判。它们描

① Ben Bernanke,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1983): 257 - 276.

绘了货币的供给和需求，将利率作为持有货币的价格。特明对货币主义者解释的描绘见图 A，对凯恩斯主义者解释的描绘见图 B。如果货币主义者是正确的（根据特明），占优势的移动应该是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图 A）。如果凯恩斯主义者是正确的，占优势的移动应该是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图 B）。因为利息率在大萧条期间下降——如表 23—2 第 4 列所示——特明的结论是凯恩斯主义者是正确的。

货币主义者反驳说，特明忽略了货币数量的下降对货币需求的中期和长期影响。下降的实际收入（由过去的货币供给量减少所致）减少了货币需求。所以图 B 中需求曲线的部分移动可归因于货币存量的减少。此外，较低的市场利率与较高的实际利率是一致的。



此外，伯南克指出，目前的通货紧缩增加了企业和消费者的债务负担，因此减少了他们有资格获得信贷的能力。股票价值、城市和农村的土地价值都在下降，也有类似作用。企业和个人没有可提供作为抵押品的资产。虽然危机的非货币影响的作用在最近几年得到了相当的重视，它已被考虑了很长时间。1933 年，欧文·费雪将大萧条归咎于不断上升的债务的实际价值及其对消费的影响。

总之，对大萧条中金融危机确切作用的争论在持续，但是大多数经济史学家如今赞同金融危机是重要的，美联储因事件沿着灾难性路径展开而应该受到相当多的指责。[①] 参考经济推理命题 5：证据很重要。

为什么美联储没有拯救银行体系

通过充当最后贷款人以达到预防未来危机的目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紧随 1907 年恐慌的发生而建立。但是，由于一些原因，它没有这样做。

其中一个原因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根本没有意识到危机的重要性

① 甚至彼得·特明也在他的后期作品中将紧缩银根制度的部分原因归咎于美联储。参见 Peter Temin，*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Cambridge，Mass.：MIT Press，1989）。

及应对它所需采取的行动。在当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查尔斯·S·哈姆林 1931 年 8 月期间的日记中，他告诉我们，公开市场委员会（Open Market Committee）投票以 11 比 1 反对公开市场购买 3 亿美元的政府债券——债券卖方将支票存放在美联储，这将给银行系统注入准备金——而代以 1.2 亿美元。但各地区银行的管理者，仍然根本不能把握危机的严重性，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迈耶甚至担心通货膨胀。

当 1933 年 3 月银行假期结束时，数千人排队提取现金。

从某种意义上说，未能理解崩溃的重要性，是美联储看待货币政策的错误指标趋势的结果。美联储的许多官员认为，较低的名义利率（见表 23—2 第 4 列）是金融市场资金充裕的某些迹象，而试图注入更多资金没什么好处。如果考虑了实际利率（见表 23—2 第 5 列）他们将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美联储也未理会货币存量的下降。数据已提供给他们，但美联储官员把货币存量仅仅作为对资金需求下降的一个迹象。

在其 1932 年年度报告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认为它购买债券的权力受到规定的限制，即联邦钞票必须 40%用黄金和 60%用黄金或合格票据（银行出售给美联储的贷款）做后盾。美联储拥有的唯一的“游离金”（free gold），用技术术语来说，是其持有的黄金数量超过它在法律上要求持有的金额。它认为，这一数额太小，不足以允许大量买入债券。这种购买行为将导致银行削减它们来自美联储的借款（如果准备金已经足够为什么还要付息借入准备金呢），剥夺了美联储基于纸币的贷款。其结果将是，美联储当时约 4.16 亿美元的游离金消失，从而违反了美国承诺金本位制的规则。

弗里德曼和施瓦茨推进了一些论点，以证明游离金问题仅仅是理性化工

作，而不是美联储不愿扩大货币存量的真正原因。一方面，当规定美联储要持有什么储备来发行钞票的规则在1932年2月被《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放松时，美联储没有通过相应增加其公开市场购买的债券来回应。但是，对金本位制维持的关注，正如巴里·艾肯格林所表明的，不是对游离金数额的技术关注，而可能已经是对美联储行动的心理限制。事实上，在他看来，世界各地的中央银行都犯了把维持金本位制置于扩大货币存量与大萧条斗争之上的错误。

被弗里德曼和施瓦茨证明的美联储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在20世纪20年代，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在其极具魅力的总裁本杰明·斯特朗的领导下支配着该系统。在斯特朗于1928年去世后，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试图通过抵制来自纽约的压力来行使权力。这种权力斗争在20世纪30年代造成了恶果：当纽约银行奋力争取更具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在华盛顿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因国内政治原因给予抵制。

放在每一个这些因素上的准确权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们，虽然在1913年建立美国联邦储备系统是为了保护在危机时期国家的银行体系，却未能在20年后遏止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银行危机。

20世纪30年代的财政政策

认为胡佛政府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与大萧条作斗争的普遍看法是错误的。在1932年1月，他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通过发行由联邦政府担保的证券来融资，再把钱借给银行、保险公司、铁路和遇到财政困难的其他企业。在和平时期这样一个机构的成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金融公司的复兴）标志着与传统的决裂。由联邦农业局实施的带产量控制的农产品价格支持具有同等的革命性。胡佛政府的重大缺陷是其一直拒绝建立一个急需的以工代赈联邦计划，即使这意味着赤字，并且它未能催促美联储扩大货币和信贷。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补充说当局应为任何目的故意提高开支，并削减税收以产生“乘数效应”。实际上所有的经济史学家都同意当局过分依赖企业和政府领导人的公开见证以保持信心，但没有足够的措施来提高收入和纠正通货紧缩。

富兰克林·D·罗斯福及其班子对赤字感到不安。在1932年竞选期间，罗斯福承诺削减25%的开支并平衡预算。但一旦上台，罗斯福政府愿意运行大量赤字（按历史标准衡量）为其许多新方案融资。这些赤字有多大？为什么他们不让国家如凯恩斯经济理论预测的那样走出萧条？[①] 有关数字在表23—3中给出。在大萧条期间联邦预算稳定地处于赤字状态。相对于传统的联邦政府的规

①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直到1936年才出版。但是，许多经济学家赞同用赤字来为增加的政府支出融通资金。有人认为增加的支出会刺激增长并刺激经济的自然扩张力。

模，支出和赤字的级别看起来确实很大。请注意，1938 年的联邦支出高达 1927 年的 2.5 倍。税收也增加了（尽管大萧条）75%，从 40 亿美元增至 70 亿美元。

表 23—3　　政府支出和税收，1927—1940 年（十亿美元）

年份	联邦		州和地方		私人投资
	支出	税收	支出	税收	
1927	2.9	4.0	7.8	7.8	14.5[a]
1932	4.8	2.0	8.4	7.9	3.4
1934	6.5	3.1	7.8	8.4	4.1
1936	7.6	4.2	8.5	9.4	7.2
1938	7.2	7.0	10.0	11.1	7.4
1940	9.6	6.9	11.2	11.7	11.0

a. 这是 1929 年的数据。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Series F53，Y335，Y336，Y339，Y340，Y652，Y671.

1938 年由此产生的 2 亿美元（=72 亿美元－70 亿美元）赤字足以抵消州和地方各级的 11 亿美元（=100 亿美元－111 亿美元）盈余。

凯恩斯理论认为，政府支出的作用是抵消自主私人支出如投资或消费的下降。很显然，私人投资支出在 1929 年和 1938 年之间减少的 71 亿美元（表 23—3）远远高于联邦支出或联邦赤字的增加。难怪，当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加里·E·布朗做出结论，“财政政策……似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已经是一个不成功的恢复手段了——不是因为不起作用，而是因为没有尝试过。”①

部分复苏，然后新的衰退

爬出深渊

国民生产净值从 1933 年很低的 427 亿美元上升到 1937 年的 751 亿美元，仍远低于 1929 年的水平，但足以减轻许多困难及显示经济复苏的潜力。同期，物

① Cary E. Brown，“Fiscal Policy in the Thirties：A Reapprais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December 1956）：879. Work by Larry Peppers strengthened Brown's original conclusions；see “Full Employment Surplus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Changes：The 193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Winter 1973）：197－210.

价折算指数从 73.3 上升到 81.0（1929 年＝100）。正统的凯恩斯主义者认为这种繁荣是受政府救济失业和在第 24 章描述的其他新政方案支出扩张的刺激。复苏也受货币存量从 1933 年的 322 亿美元扩张到 1937 年的 457 亿美元的刺激。

农场家庭止赎和失业在大萧条期间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无家可归者。像图中在纽约中心公园的贫民区，被称为“胡佛城镇”。

货币扩张不是有预谋的美联储增加货币存量政策的结果。相反，随着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增强，人们开始重新把钱存入银行体系。这导致了货币存量的增加，因为银行会根据再存入的每 1 美元创造几美元的贷款和存款。曾破坏过从 1930 年到 1933 年货币制度的部分准备金制度，如今具有相反作用。然而，更重要的是基础货币的增加，这主要是因为美国财政部对黄金的购买。

黄金价格与货币存量

在银行假期和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罗斯福政府禁止黄金交易。1933 年 4 月 5 日，它采取了不平凡的一步：命令所有黄金持有人将其黄金（稀有币和其他专门馆藏品被免除）交付给美联储。这些行动使美国脱离金本位制。几个月来，黄金价格，因而仍与黄金挂钩的外币价格，随供求状况波动。但是，联邦政府坚定不移地努力通过购买黄金来提高黄金价格。当时的想法是提高在世界市场上商品的美元定价，特别是农业商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政策是成功的；在此期间发生的一些通货膨胀，因为经济低迷而令人惊奇，可归因于汇率操纵。

© HISTORICAL PICTURES STOCK MONTAGE

平衡预算和削减支出的竞选承诺遇上大萧条的经济现实。一些媒体抨击罗斯福用赤字开支来支付其新方案。

1934 年 1 月 31 日，美国再次承诺实行通过固定每盎司黄金价格为 35 美元的形式的金本位制（萧条之前的价格是每盎司 20 美元），在该价格上美国财政部将购买或出售黄金。然而，金本位的新形式只是对古典金本位的苍白反思，因为普通公民不能持有金币。由于这些政策，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黄金产量在 20 世纪 30 年代激增。世界产量从 1933 年的 2 500 万盎司增加到 1940 年的 4 000 万盎司。毕竟，工资等生产成本已经下降，但黄金可以出售给美国财政部的价格已经上涨。其结果是财政部的黄金储备迅速增加。当政府制定价格时，它改变了激励并影响生产。这能用经济推理命题 3 解释：激励很重要。此外，在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引起了资金的大量外流，寻求安全的避风港，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黄金储备。

当财政部购买黄金时，它发行了可作为现金或美联储存款的黄金凭证。实际

上，如果财政部购买黄金，它被允许通过印刷新货币进行支付。其结果是基础货币的快速增长，它与银行体系再次存入的货币一起导致了货币供应量的迅速增加。

大萧条中的衰退

到1937年初，制造业总产出超过了1929年的速率，而复苏虽然不完整，似乎一直很好。然而，就在那时，扩张又突然停止。工业生产在1937年5月达到了1929年的高水平然后转向下行。商品价格紧随其后，令人厌烦的通货紧缩过程又开始了。零售销售额下降，失业增加，薪酬下降。更让公众忧愁的是，股市在8月份开始了长期的低迷，1938年3月的股价不到1937年高峰期的一半。1937年的重大挫折在图23—1至图23—3中用图形给予揭示。

发生了什么事？当时和现在一样，许多人把萧条的新冲击归因于1935年和1936年引进和通过的改革措施。社会保障和授予劳动者的新自由遭到了一些苛刻的批评。大部分批评是针对由罗斯福政府创造的反商业的政治气候，有人宣称这使得不可能大力拓展业务。在他的1936年国情咨文中，罗斯福总统批评了“经济秩序的保皇党”，他说，这些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事务并获得了与国民收入不成比例的收入。富有的人特别反感1935年和1936年针对防止避税并使税收结构更加累进的税收立法。此外，遗产及赠与税与个人附加税和大公司营业收入所得税一样都增加了。1936年的未分配利润税——一种强加给企业以使它们分配利润的附加税而不是持有这些利润，可使个人股东避免个人课税——也招致不满。政府的批评家感到疑惑，当利润可能被将来的立法剥夺时，企业为什么要进行长期投资？

无论这种观点的优点是什么，很明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在导致经济衰退中发挥了作用。政府官员相信在1937年初，充分就业和通货膨胀即将来临。救济和公共工程支出被削减，而新税如社会保障税等（在下一章讨论）被征收。其结果是，1937年的预算赤字大幅下降。发现经济衰退，信奉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不会感到惊讶。

货币政策也努力创造了一个经济衰退。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如前所述，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银行危机后稳步上升。美联储把这些准备金解释为货币在银行累积，因为它在当时的低利率下无法投资获利。美联储当时决定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以锁定超额准备金，防止它们在预计不太遥远的通货膨胀期间被投入使用。但是，事实证明这一政策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事实上，这些准备金并非多余，而是银行为应对危机重演而蓄意建立的一个缓冲。它们对美联储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决定的反应是通过获得更多的准备金来恢复其安全系数。为做到这一点，银行减少了它们的贷款和存款。货币供给量在1937年再次下降，虽然只是轻微下降。

1937—1938年的紧缩没有1929—1933年的紧缩那么严重或持久。其中一个原因是，银行体系并未崩溃。通过存款保险建立的保障，与幸免于20世纪30年

代初崩溃的银行的谨慎行为一起，防止了重复。与1930年的1 350家和1931年的2 293家银行相比，在1937年停业的银行数目只有82家，而在1938年只有80家。然而，在萧条期内经济衰退的结果是，1939年，经济离充分就业仍很遥远。

它会再次发生吗

遗憾的是，没有人可以肯定地说这样的萧条不会再次发生。有许多理由认为在现代条件下发生像大萧条那么大规模的崩溃的可能性极小。

原因之一是，我们不会重复同样的错误。由于有更好的数据在手，且随着大萧条的经验在许多书籍和文章中展示，美联储不太可能允许银行系统崩溃。此外，因为我们不再基于金本位制，美联储在危机中创造美元的能力实际上是无限的。

财政政策的情况也是这样，虽然在这里，我们不能这么自信。对平衡预算的信仰似乎难以动摇，即使在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不过，类似20世纪30年代初的条件今天可能会被相当大规模的减税和增加支出满足，这似乎很有可能。许多各种各样的支出——所谓的自动稳定器——例如失业救济金，即使没有特定的国会行动，也将提高。

私营经济也更不容易受到经济崩溃的影响。工业部门，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商，似乎最容易受到需求突然变化的影响，它会导致大规模裁员。然而，与服务部门相比，该部门目前比它在20世纪30年代相对小得多。此外，双收入家庭的迅速增加对许多家庭来说已经降低了经济衰退完全剥夺其收入的概率。

最后，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会减轻痛苦和只要存在就能减少负面恐惧的机会的政府方案网络。其中包括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退休金福利保证公司等。但无论我们有多了解这些事实，当一个部门或另一个部门的环境恶化时，大萧条的噩梦就会一次又一次地重现并困扰着我们，这仍然是事实。

关于资本主义，大萧条告诉了我们什么

罗斯福总统“智囊团”（提出了许多新方案以应对大萧条的一个顾问小组）的一个成员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说：

> 纸包不住火了。没有看不见的手。从来都没有。如果大萧条没有教会我们这一点，我们的教育就是无能的……我们现在必须提供一只真正的和有形的指导之手去实行那个虚构的、不存在的、看不见的机构本应该执行却从未执行的一项任务。①

① 引自 Rebecca Gruver, *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72), 936。

特格韦尔直率的言论处理了一个由大萧条提出的根本问题：大萧条不是证明了在缺乏政府指导的情况下，自由市场经济有可能脱离轨道且造成经济灾难吗？为什么我们要把资本配置交托给不断经历盛衰周期的股市呢？当它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而城市的人却在挨饿时，为什么我们要把农产品分配交给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对于20世纪30年代考虑周全的许多观察家，对这些问题的明确回答是由特格韦尔给出的一个答案：不要把事情交给自由市场；常识告诉我们，政府的监管会使情况好转。

但是，大多数主流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还没有被完全说服。同意大萧条揭露了经济体制的根本弱点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得出的结论仍然是它没有证明全面干预市场是正当的。他认为，萧条是总需求的问题，并认为这是独立于个别市场的问题。正如他所说：

> 说得具体一点，我认为没有理由认为现行的制度严重误用了使用中的生产要素。当然也有先见之明的错误；但这些是不能通过集中的决定避免的。当从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1 000万人中雇用900万人时，没有证据表明这900万人的劳动是具有误导性的。对现行制度的不满并非这900万人应该受聘于不同的工作，而是那些工作应该也可向其余的100万人提供。现行制度是在确定实际就业的数量上而不是在方向上已经崩溃。①

较为保守的经济学家已经给了特格韦尔最消极的答案。在他们看来，大萧条是场货币金融危机。政府管制已经产生了变弱的危机四伏的银行系统。为防止银行危机而建立的机构美联储，当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崩溃时未能挽救它。通过允许银行系统利用竞争和迫使美联储维持货币存量以加强本身来消除这些弱点，大萧条的重演可以预防。在他们看来，在20世纪30年代推出的所有政府方案，只发挥了削弱信心、阻碍私人投资及延迟复苏的职能。在20世纪30年代，特格韦尔的立场占了上风。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所看到的，大萧条导致联邦政府试图影响个别市场的程度大幅增加。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ernanke, Benjamin. “Nonmonetary Effect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3 (1983): 257 - 276.

——. *Essays on the Great Depression*.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Bordo, Michael D., Ehsan Choudhri, and Anna J. Schwartz. “Could Stable Money Have Averted the Great Contraction?” *Economic Inquiry* 33 (1995): 484 - 505.

①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4 [reprint of 1936 edition]), 379.

Bordo, Michael D., Christopher Erceg, and Charles L. Evans. "Money, Sticky Wage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2000): 1447 - 1463.

Brown, E. Cary. "Fiscal Policy in The Thirties: A Reapprais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 (December 1956): 857 - 859.

Brunner, Karl.,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Calomiris, Charles W. "Financial Factor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Spring 1993): 61 - 85.

Calomiris, Charles W., and Joseph R. Mason. "Contagion and Bank Failure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June 1932 Chicago Banking Panic."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7 (1997): 863 - 883.

Dighe, Ranjit S. "Wage Rigidity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Truth? Consequences?"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 17, eds. Gregory Clark and William A. Sundstrom. Greenwich, Conn.: JAI, 1997, 85 - 134.

Eichengreen, Barry. "Central Bank Cooperation under the Interwar Gold Standard."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1 (1984): 64 - 87.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moot-Hawley Tariff." I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Volume 12, eds. Roger Ransom, Peter H. Lindert, and Richard Sutch, Greenwich, Conn.: JAI, 1989, 1 - 43.

——.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Epstein, Gerald, and Thomas Ferguson. "Monetary Policy, Loan Liquidation, and Industrial Conflict: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Great Contrac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957 - 984.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http://lcweb2.loc.gov/ammem/fsowhome.html. Famous collection of photographs taken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Ferderer, J. Peter, and David A. Zalewski. "To Raise the Golden Anchor? Financial Crises and Uncertain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9 (1999): 624 - 658.

Field, Alexander. "Asset Exchanges and the Transactions Demand for Money, 1919—1929."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43 - 59.

——.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489 - 498.

Fisher, Irving. *Booms and Depressions*. New York: Adelphi, 1932.

——. "The Debt 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Econometrica* 1 (1933): 337 - 357.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and Museum. http://www.fdrlibrary-marist.edu.

Friedman, Milton. "Why the American Economy Is Depression-Proof." In *Dollars and Deficits*.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 Hall, 1968.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299 - 545.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Great Cras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Gandolfi, Arthur, and James Lothian. "Review of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9 (1977): 679 - 691.

Higgs, Robert. "Regime Uncertainty: Why the Great Depression Lasted So Long and Why Prosperity Resumed after the War" *Independent Review* 1 (Spring 1997): 561 - 590.

Keynes, John Maynard.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64 (reprint of 1936 edition).

Kindleberger, Charles P. *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8.

Mayer, Thomas. "Money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A Critique of Professor Temin's The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5 (1978): 127 - 145.

——. "Consumption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1978): 139 - 145.

Meltzer, Allan H. "Monetary and Other Explanations of the Star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 (1976): 455 - 471.

Olney, Martha L. "Avoiding Default: The Role of Credit in the Consumption Collapse of 1930."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 (1999): 319 - 335.

Peppers, Larry C. "Full Employment Surplus Analysis and Structural Changes: The 193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0 (Winter 1973): 197 - 210.

Romer, Christina. "The Great Crash and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5 (1990): 597 - 624.

——.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December 1992): 757 - 784.

——. "The Nation in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7 (Spring 1993): 19 - 39.

Rosenbloom, Joshua L., and William A. Sundstrom. "The Sources of Regional Variation in the Severit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Evidence from U. S. Manufacturing, 1919—1937."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9 (1999): 714 - 747.

Temin, Peter.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Norton, 1976.

——.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Ⅲ,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1 - 328.

Temin, Peter, and Barrie A. Wigmore. "The End of One Big Deflation."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27 (October 1990): 483 - 502.

Trescott, Paul. "Federal Reserve Policy in the Great Contraction: A Counterfactual Assessm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 (1982): 211 - 220.

——. "The Behavior of the Currency-Deposit Ratio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16 (1984): 362 - 365.

Wheelock, David C. *The Strategy and Consistency of Federal Reserve Monetary Policy, 1924—1933*.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White, Eugene N.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19 - 138.

White, Eugene N., and Peter Rappoport. "Was the Crash of 1929 Expecte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March 1994): 271 - 281.

Wicker, Elmus. "A Reconsideration of the Causes of the Banking Panic of 193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0 (1982): 435 - 445.

——. "Interest Rate and Expenditure Effects of the Banking Panic of 1930."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9 (1982): 435 - 445.

——. *The Banking Panics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第 24 章　新　政

本章主题

1932 年总统大选是在恐惧和不满的气氛中进行的。被提名连任的赫伯特·胡佛，为美国的困难指责欧洲的重大事件，并承诺将很快恢复繁荣。胡佛认为，损害美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只能导致更严重的灾难。热情但有力的民主党候选人富兰克林·D·罗斯福，大体上不明确如果他当选将采取的措施，尽管他承诺过要平衡预算。人们不会误解他利用政府权力试图解决国家问题的意愿。在民主党大会接受提名的演讲中，罗斯福承诺如果他当选，将实行“新政”(New Deal)。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几年里这些话将如何全面落实。

在罗斯福当选和就职之间，经济状况恶化。自亚伯拉罕·林肯以来就没有总统一上台就面临更大的危机了。全国 1/4 的工人失业。在他发表于 1933 年 3 月 4 日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振作了民族的精神。他宣称：“允许我申明我的坚定信念：我们应该感到害怕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害怕本身——一种莫名其妙、丧失理智、毫无根据的恐惧，它把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乌有。”

新政分两个阶段展开。第一次新政（1933—1934 年），特别是第一个“百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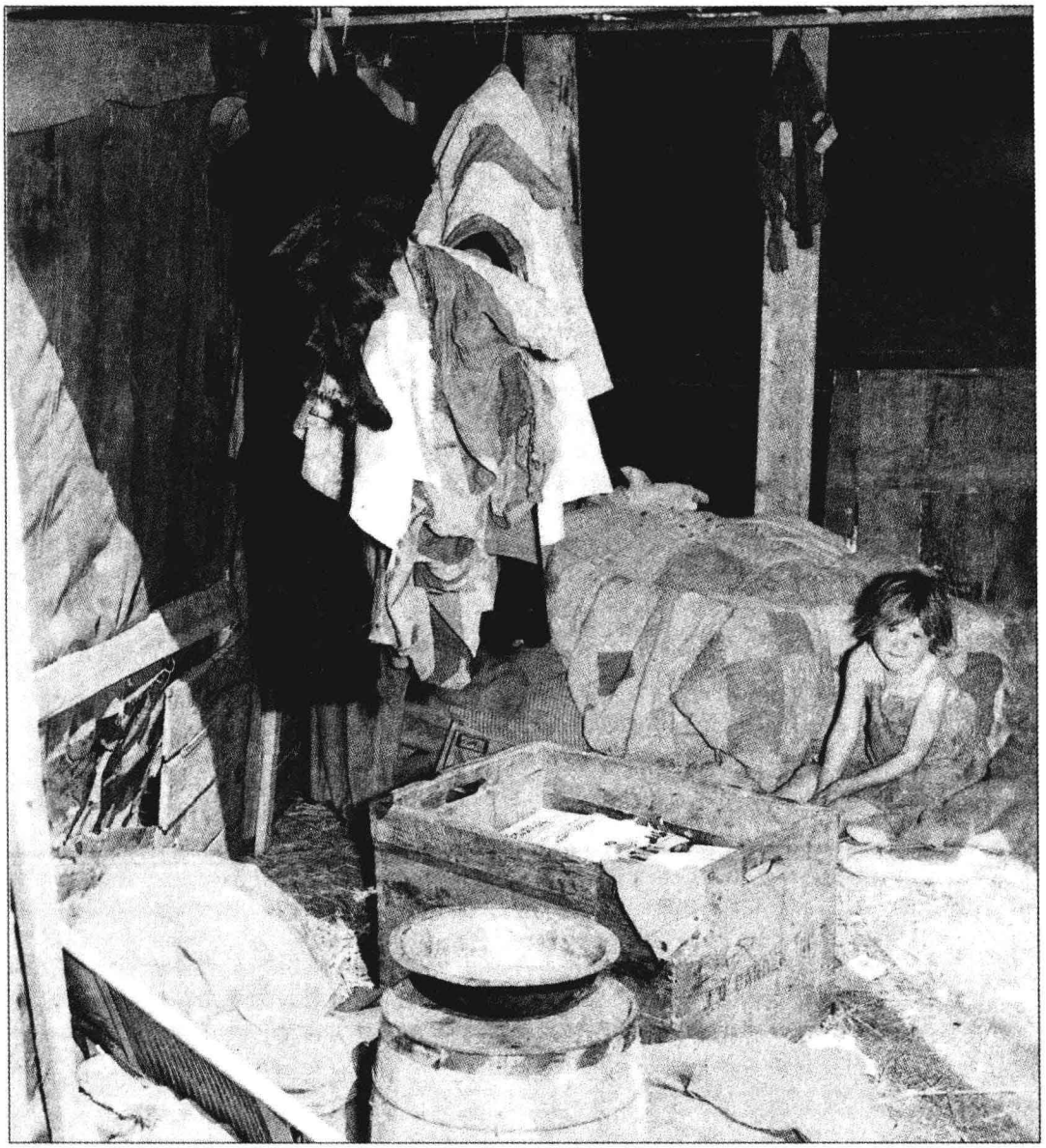
新政”，包括范围广泛的旨在既要提供即时救济也要促进复苏的立法的通过。这是试验时间，提供希望的任何想法都可能被试用。民间资源保护组织（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1933 年 3 月）、《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1933 年 5 月）和《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1933 年 6 月）是我们将讨论的在新政的这一阶段创建的里程碑。第二次新政（1935—1941 年）因更有意识地转向左派而著称。虽然它继续救济和复苏措施，政府当局急切推动它认为会永久提高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改革。1935 年《社会保障法》（Social Security Act of 1935）和《公平劳动标准法》（1938）都是第二次新政的主要成就。虽然新政只占很短的时间跨度，我们必须详细考虑它，因为它是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许多制度和想法的起源。

第一次新政：救济与复苏

帮助有需要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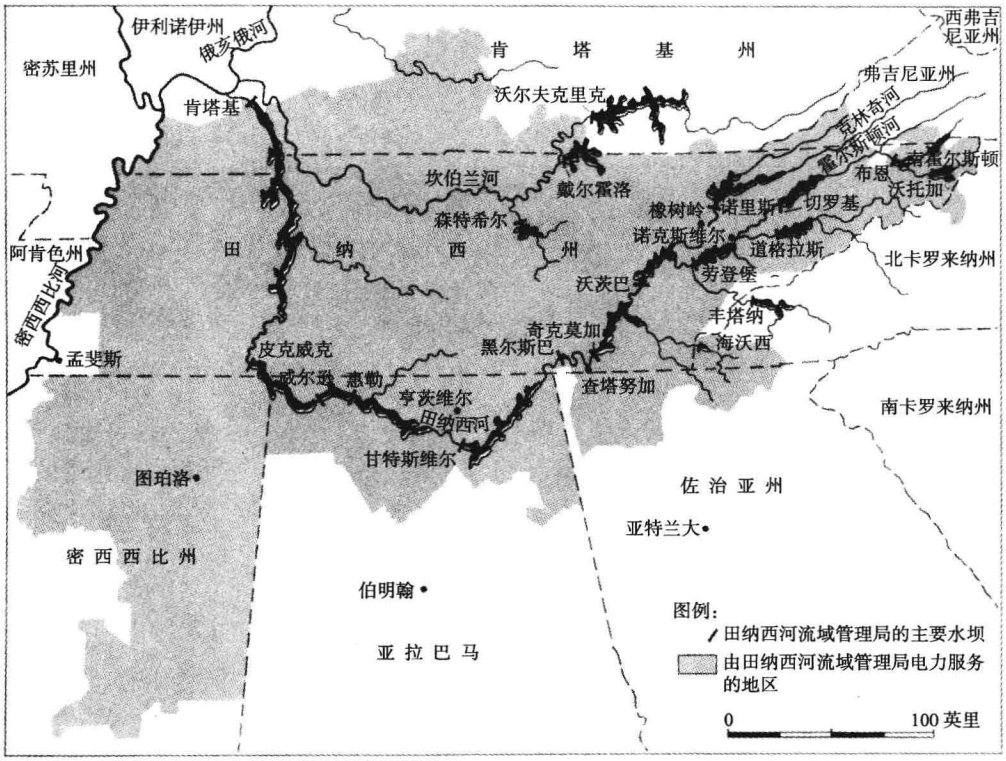
新政府最紧迫的问题是为贫困家庭提供救济。由哈里·霍普金斯主管的联邦紧急救济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gency，FERA），给破产的国家和地方救助机构注入 5 亿美元资金。1935 年，联邦政府设立了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后来称工程项目管理署（Works Projects Administration，WPA），也在霍普金斯的管理下。该机构在道路建设、防洪工程，以及类似的项目中雇用了数百万人。其最著名和最有争议的工程雇用了作家、摄影师、艺术家和其他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评论家们抱怨，这些工程往往具有较强的左翼政治信息，这也不无道理。但是，其中一些工程，例如记录昔日奴隶最后一代的回忆，也有持久的价值。在霍普金斯的指挥下，工程项目管理署的工作重点是创造就业机会；这些项目对经济基础设施的贡献倒是次要的。另一个类似的众所周知的机构是民间资源保护组织。

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承担大型建设项目。在大萧条期间它花了 60 多亿美元在水坝、经济适用房、机场、军舰和其他项目上。其局长哈罗德·伊克斯因他的诚实和他为非洲裔美国人争取就业的努力赢得了令人羡慕的名声，但他有时因花费过多的时间来计划项目而受到批评。最雄心勃勃和有争议的是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这是一个多方面项目，旨在促进数十年来一直遭受贫困的广大地区的经济发展。管理局在一个包含 7 个州的区域（见地图 24—1）修建水坝，向农民提供廉价电力（这一政策造成相当大的来自私营电力公司的反对），从事防洪，设立内河航线，并促进农民教育及相关项目。



NATIONAL ARCHIVES, MARION POST WOLCOTT, FSA

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摄影师拍摄了极度贫困的美国人的经典照片，为新政提供支持。



地图 24—1　公共电力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新政在公开资助电力上的重大实验——的范围包括 7 个州的部分地区。它的支持者们把它称为“区域规划”的光辉典范；它的反对者们公开指责它是“逐渐的社会主义”的可恶例子。

新观点 24.1

政府应是最后的雇主吗？

当失业率上升时，联邦政府应该干预并雇用失业者吗？毕竟，如果银行能有最后贷款人让它们摆脱困境，为什么工人就不能有最后的雇主？这项建议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在道义上有义务减轻失业造成的巨大痛苦。这项建议的批评者警告说，这样的政策将非常费钱，会破坏失业者的工作伦理，并很可能成为政治恩惠——腐败的温床。本文论述了一个人们可以经研究看到这样的制度可能有效的历史上的例子。新政建立了一批创造就业机会的方案。其中最有名的和最有争议的是民间资源保护组织。模仿军队，该组织在其 1935 年高峰期雇用了 50 万人从事建造国家公园设施、清洁和扩大水库、植树造林（如下面的照片所示）和类似的活动。正如经济推理命题 5 提醒我们的，对经济史的研究可以阐明今天最重要的政策问题。

© HISTORICAL PICTURES/STOCK MONTAGE

紧急救济措施的总体影响如表 24—1 所示。在 1933 年，在实施新政的第一年，联邦、州和地方应急工作计划雇用的工人超过 200 万人（劳动力的 4.3%）。最高纪录是在 1936 年，有 370 万人（劳动力的 7%）受聘于这些计划。换句话说，如果不存在救济计划，而且工人未能在私营部门找到工作，1936 年没有工作的劳动人口的百分比将不是 9.9%（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高的失业率），而是 16.9%。事实上，那些你很可能会在历史教科书或报纸看到的引用的官方数字列出的失业人口为 16.9%，因为它认为在没有这些工作的情况下这些工人将失业。

表 24—1　　大萧条期间参与应急工作计划的工人

年份	失业人数（千人）	失业人数（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参与应急工作计划的工人（千人）	参与应急工作计划的工人（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1929	1 550	3.2	0	0.00
1930	4 320	8.7	20	0.04
1931	7 721	15.3	299	0.60
1932	11 468	22.5	592	1.20
1933	10 635	20.6	2 195	4.30
1934	8 366	16.0	2 974	5.70
1935	7 523	14.2	3 087	5.80

续前表

年份	失业人数（千人）	失业人数（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参与应急工作计划的工人（千人）	参与应急工作计划的工人（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1936	5 286	9.9	3 744	7.00
1937	4 937	9.1	2 763	5.10
1938	6 799	12.5	3 591	6.60
1939	6 225	11.3	3 255	5.90
1940	5 290	9.5	2 830	5.10
1941	3 351	6.0	2 209	3.90
1942	1 746	3.1	914	1.60
1943	985	1.8	85	0.20

资料来源：Michael Darby，“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 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aid: Or, an Explanation of Unemployment, 1934—194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976): 7, 8.

金融体系的复兴和改革

金融体系在1929—1933年的紧缩之后成了废墟。罗斯福政府和两党的支持者，在第一次新政期间着手振兴和改革该体系。深刻的变化发生在四个主要方面：银行体系、联邦储备体系、证券市场与国际金融体系。让我们逐一加以考察。

（1）重建商业银行体系：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

也许最重要的变化是存款保险。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针对商业银行）和联邦储蓄与贷款保险公司（针对储蓄银行）成立于1934年。罗斯福对存款保险有些怀疑，担心它将鼓励宽松的银行业务，但他向国会的强大压力屈服了。起初，存款保险似乎是一个纯粹的成功，因为一旦存款保险已经到位，银行倒闭就会下降到低水平。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储蓄和贷款危机期间，不少经济学家指出，存款保险已经伴随发生了长期运行成本：存款人不再有通过从风险高的银行取出资金并把它们存在更安全的银行来控制银行体系的激励了。对银行体系重要的改变包括将商业银行（办理存款和发放短期贷款）和投资银行（出售证券）分离。禁止支付存款利息。巴里·威格莫尔的最近研究表明这在消除银行的即时经济问题时可能是重要的。

（2）证券市场的监管。

股票市场的崩溃让许多投资者破产，并强烈怀疑他们被华尔街愚弄了。由费迪南德·佩科拉带领的国会调查似乎提供了普遍的欺诈行为的证据。其结果是，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于1934年成立。这个机

构被授予广泛的权力来监督证券交易所，其交易规范以及新证券的发行。约瑟夫·P·肯尼迪——未来的美国总统的父亲，是它的首任主席。

（3）取消金本位制。

最引人注目的行动是1933年4月5日颁布的一项行政命令，这要求所有持有人把他们的黄金（除了稀有硬币）交给美联储作为对联邦储备券的交换。金本位制被抛弃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人们认为将资产转换成黄金的企图正在破坏银行体系。其次，通过打破与基于黄金的其他货币的固定联系，美国能让美元贬值（使得用外国货币来计算更便宜），因此使美国的出口，特别是农产品，更具吸引力。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人试图重建固定汇率和黄金的关系，美国人决不会再听到金币叮当声了。

（4）货币权力在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集中。

美联储系统显然未能阻止银行倒闭和破产潮。罗斯福政府的反应是将货币权力集中在华盛顿。（这至少可以说是有点讽刺，因为在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委员会做了最大的努力来抵制来自一些地方银行对更有力行动的要求。）1935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立美联储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它所有的成员均由总统任命。理事会获得对该系统的最有力的经济手段的控制权——在公开市场上购买或出售证券的能力。犹他州的一位银行家马里纳·S·埃克尔斯，是新授权理事会的第一任主席，他坚信利用联邦赤字开支和货币政策可以刺激经济。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地方银行只是在制定货币政策方面扮演一个咨询的角色。

虽然由新政提出的一些金融改革后来被放弃了，许多其他的改革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延续到今天。很少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在最紧急的情况下产生的制度将如何可能继续影响几十年来的经济行动。参见经济推理命题5：制度很重要。

《全国工业复兴法》

政府干预的最显著的一个进展是随着《全国工业复兴法》（NIRA）的公布开始的。其主要目的是提高价格和工资，通过减少工时来增加就业，以及通过竞争者试图维持产量来防止降价。国家复兴署（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在休·约翰逊将军的领导下，监督各个行业“公平竞争法规”的编制。这些实际上都是卖家之间设定最低价格、限制产量并设立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的协议。在等待批准基础法规的时候，总统于1933年7月颁布了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法规。卖家签署了这部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法规，同意提高工资、缩短工作日及放弃减价。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显示一个“蓝鹰”标志，避免因不履行他们的职责而被抵制。

到1935年，557项基础法规已获批。虽然在理论上，法规是劳工、消费者和雇主代表的成果，实际上，劳工界代表参与了法规制定的不到10%，而消费者代表则微不足道。雇主代表通过其国家贸易协会和制造商协会来表达，其结果是价格被设定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如此结果的可能性已被《全国工业复兴法》通

© BROWN BROTHERS

在图中显而易见，在1936年民主党会议上罗斯福的笑容，使他的主题歌“快乐的日子再次来临”对一个处于惊恐中的民族是可信的。他的人格魅力以及对形势的乐观预期抚慰了大萧条对人们的影响。

过暂停反托拉斯法得以确认。

《全国工业复兴法》是否有效？看来好像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法规是在重新分配收入，而不是扩大收入。制造业产量在国家复兴署设立后激增，因为商人预期价格上涨从而增加了他们的库存。但是，工业生产指数再次失效，而到1935年盛夏，该指数不高于国家复兴署成立后曾达到的第一个高潮。失业虽然减少了，但仍非常高，大多数制造企业在远低于其产能的水平上经营。

早在1935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美国经济经历的提升主要来自通过赤字开支和货币创造的收入注入。当时，毫不遗憾的是，新政人物看到《全国工业复兴法》获得通过；但后来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一法案违宪，其理由是国会非法将立法权授予总统。

农业与新政

农场危机

随着大萧条的来临，农场的人们开始遭受只有很少人会相信的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三年来中央市场的玉米平均价格从每蒲式耳0.77美元下降至0.19美元，小麦的平均价格从每蒲式耳1.08美元下降至0.33美元。表24—2显示了关键的平均水平，1929—1932年之间，农民收到的价格下降了56%。农民支付的价格也真的下降了。即使考虑到这一点，农民的“贸易条件”——农民收到的价格除以支付的价格——还是下跌了37%。农场经营者的纯收入从1929年的总共62亿美元降至1932年的20亿美元。再一次，价格变化调整起了作用，但以

1929 年不变美元计价，实际收入净额从 62 亿美元下降到 30 亿美元。

表 24—2　　大萧条选定年份的农产品价格和收入

年份	农民收到的价格	对应于农民支付的价格的农民收到的价格	农场经营者的总净收入（百万美元）	农场经营者的净收入，以 1929 年的固定价格计算（百万美元）
1929	100	100	6 152	6 152
1932	44	63	2 032	2 956
1937	82	101	6 005	7 206
1938	66	85	4 361	5 509
1939	64	83	4 414	5 726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Series K344, K347, K352, and K137.

背负固定债务的农民遭受了特别沉重的打击：1932 年，所有农场债务的 52%未偿付。止赎权的威胁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并破坏了各地农民的生活。

1930 年农场止赎率从之前 1929 年高达 15‰的农场止赎记录跃升至 18‰，1931 年为 27.8‰，终于在 1932 年达到 38.1‰的峰值。[①] 抵押止赎使得世代相传的农场的主人沦为佃农，或在大萧条的深渊中被迫进入救济名单。在农场组织咄咄逼人的压力下许多关注农民的暴力威胁的州强制停止止赎。

止赎常常被归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农业的过度扩张。据说农民负债购地，在战后经济未能保持战争年代的高价格时以不偿付欠款告终。然而，李·J·奥尔斯顿的研究表明，这个问题虽然在 20 世纪 20 年代很重要，但到 1929 年已经得以解决。20 世纪 30 年代初的高止赎主要是农产品价格下降的结果。[②]

即使当时大多数农场的抵押贷款仍是相对短期的“气球”式抵押贷款也没有起到改善作用：全部本金要在大约 5 年后归还。只要价格稳定这种贷款就有效，银行也愿意“自动滚动”贷款，即用新的贷款替换到期的贷款。如果银行陷入困境并要求还款，而价格又很低，那么一个农民可能无法避免破产。用每年付清一点本金的长期“摊销”抵押贷款替代短期气球式贷款，成为罗斯福政府的重点，并通过各种措施实现。

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之前，所有有助于提高农产品价格的策略都针对平价或“公平交易”的价值，正如参议员乔治·诺里斯所声称的那样。政治家最可以接受的是传统的高关税策略，正如 1930 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所征收的税款。但更为重要的是 1929 年《农业市场经营法案》的通过，这是 1928 年共和党的竞选

① H. Thomas Johnson, “Postwar Optimism and the Rural Financial Crisis of the 1920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11 (Winter 1973—1974): 176.

② Lee J. Alston, “Farm Foreclos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885 - 903.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农业贫困使得成千上万的人从中西部流向加利福尼亚，他们将个人所有物都堆在家庭旧车上。正如威尔·罗杰斯所说，一个开着汽车驶向破房子的国家，不得不在当时令人痛苦的高速公路上停下来为某些婴儿换尿布。

承诺的结果。这部萧条前的法律承诺政府实行农产品价格稳定的政策并成立了联邦农业委员会（Federal Farm Board）以鼓励合作营销协会。该委员会还被授权建立由合作社拥有的“稳定企业”和使用5亿美元的价格支持行动初始资金。

随着严重的萧条在1930年开始，联邦农业委员会努力勇敢地支持农产品价格，但在1929年6月至1932年6月期间，委员会的企业购买了剩余农产品，结果却由于价格持续下跌不断增加亏损。委员会自己接手经营并承受损失，花费了约6.76亿美元。但与此同时，面临着灾难性价格下跌的农民却在增加产量。在当时看来，产量得不到控制，价格就不能获得支持。

农业自由市场的终结：1933—1941年

到富兰克林·D·罗斯福就职的时候，有关农业政策理论经历了根本的改

变。很明显，通过购买和贷款的支持将需要庞大的开支，这是新政仍不愿承担的。因此，1933 年 5 月通过的《农业调整法案》为农业调整署（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AAA）的成立做准备；农业调整署的责任是通过限制农产品的供给来提高农产品价格。农业调整署最重要的武器是“农产品播种面积分配制”。农业调整署将确定在下一个种植季节要种植的一些主要作物的总面积。然后总面积将按州划分，它反过来又基于每个农场的近期种植的历史分配给个别农场。例如，每个小麦农场的种植面积基数是 1928—1932 年的平均小麦种植面积。为了确保个体农民的合作，先是给予直接的补贴，后来被称为“调整款”。该款项通过联邦财政部的支票支付，但在新政时代早期，期望纳税人埋单似乎仍有点不现实——至少直接让他们埋单是如此。因此，救济款获得了由任何产品的第一加工者（比如磨粉厂主，必须为磨成面粉的每蒲式耳小麦交税）支付的税款的资助，虽然假设这一税项会转移给消费者。

当最高法院在胡萨克密尔斯案（Hoosac Mills Case）中宣布《农业调整法案》违宪时，农业调整署的原始计划在 1936 年经历了挫折，因为它试图管制农业生产——这是保留给各州的权力。但是这一裁决并没有结束农产品播种面积分配制。农业调整署很快找到了绕过该裁决的一个解决办法——将分配制建立在水土保持需要的基础上。

1936 年的严重干旱与随之而来导致俄克拉何马州人民向加利福尼亚迁移的沙尘暴，给他们提供了理由。沙尘暴使注意力集中在对水土保持的需要上，其结果是《水土保持和国内配额法》（Soil Conservation and Domestic Allotment Act）的通过。[①] 根据这一法令，农业部部长可以向减少种植土壤消耗作物的面积并采取措施保护或重建休耕土地的农民提供补贴。

1937 年的农业生产量非常高，强有力的提价措施缓解了种植面积减少的压力。1938 年国会通过了一部新的农业调整法，其更加重视通过增加需求来支持价格。1933 年以来，商品信贷公司通过向农民提供关于农作物安全的贷款完成了“缓冲”玉米、小麦和棉花价格的功能。这些贷款大多无追索权。如果商品信贷公司给某商品提供贷款而该商品价格下跌，农民可以让商品信贷公司拥有该贮藏产品的所有权并取消债务。如果该商品价格上涨，农民可以出售商品，偿还贷款，并保持盈利。因此，商品信贷公司的支持价格成为市场最低价格。见经济透视 24.1。

经济透视 24.1

商品信贷公司价格支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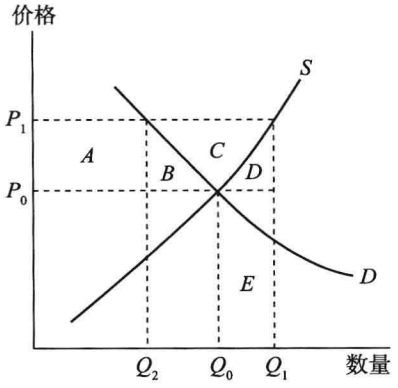
下图说明了商品信贷公司的价格支持的影响。在缺乏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价

① 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在《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中逼真地描述了俄克拉何马州人民从中西部沙尘暴地区向加利福尼亚的迁移，是一部 1940 年由新星亨利·方达和简·达维尔主演的极好的电影。

格将是P_0，产量是Q_0。干预将价格提高到P_1，产量将是Q_1。较高的价格将消费量减至Q_2，从而由政府导致（Q_1-Q_2）的库存累积。农场收入（扣除生产成本）提高了$A+B+C$。政府总支出是$(Q_1-Q_2)\times P_1$。面积A是由消费者以较高价格的形式直接支付的。$B+C+D$是通过税收由消费者间接支付的。消费者直接支出的变化是$Q_2\times P_1-Q_0\times P_0$。（消费者是比以前花费更多还是更少取决于需求弹性。）

若干损失与此计划相关。首先，用于生产Q_1-Q_2的资源被浪费了。剩余产品的存储成本（图中未显示）也发生了。其次，消费者被剥夺了他们认为价值高于生产成本的农产品。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损失用面积B来衡量。然后，为尽量减少这些损失所付出的努力导致了在本专栏中所描述的计划：生产限额，剩余农产品消除计划和出口补贴。

经济学家常常建议给农民直接收入补贴和农业产品的自由市场相结合，作为帮助农民而不会产生这些损失的一种方法。但是由于若干原因，农民们通常喜欢价格支持。有三点值得注意：(1) 直接收入补贴可能被视为贬低；(2) 直接收入补贴可能会主要流向贫穷的农民，因此遭到富人和有影响力的农民的反对；(3) 直接收入补贴倾向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通过价格支持发放的补贴可能会随着技术进步使供给曲线右移而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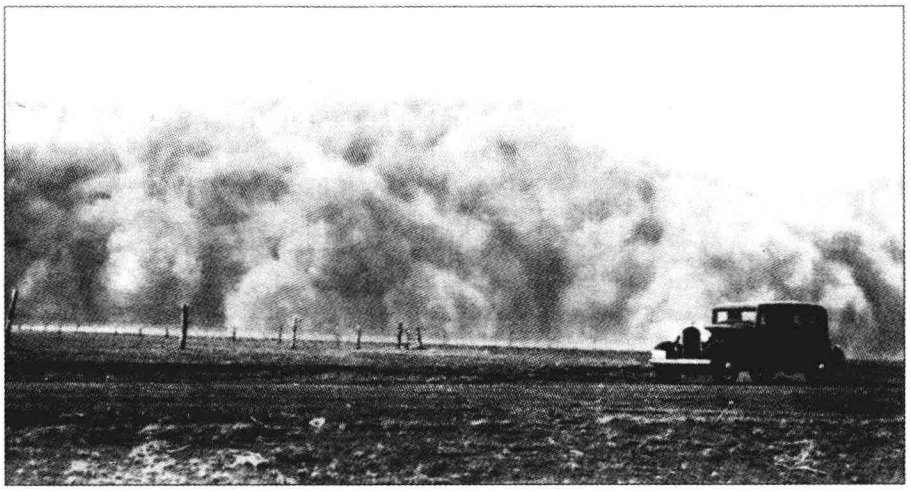


1938年《农业调整法案》通过硬性规定各主管在“平价”价格给予玉米、小麦和棉花贷款提高了商品信贷公司的作用。这些价格是指与1910—1914年的普遍价格具有相同购买力的农产品价格；1910—1914年期间，相对于其他价格，农产品价格特别高。平民党由政府决定“公平”价格的梦想已成为现实。

在20世纪30年代两种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其他方法是：(1) 销售协议；(2) 消除过剩计划。对牛奶和某些水果蔬菜很重要的营销协议法案，是某产品的生产者协会和加工者之间的合同（这需要得到农业部批准）。这些协议可能设定最低价格、要销售的总数量，以及加工者之间的营销分配。换句话说，在该行业的公司可以合法成立减少产量提高价格的卡特尔。

最容易接受的、持久的过剩处理计划是营养计划（nutrition program），如食品券计划、低成本牛奶分配计划和学校午餐计划。从1939年至1942年实施的食

品券计划获得了热烈的支持。给低收入家庭的食品券被用于从常规零售店购买食物，因此，把剩余商品给了那些大概最需要它们的人。此外，它们还帮助抵消了由限制作物导致的高价格对穷人的影响。1961 年拥护者终于重新获得这一计划。



© BETTMANN/CORBIS

在 20 世纪 30 年代让农民更加不幸的是几年空前的炎热和干旱。随后对之前已被侵蚀的土壤的吹刮导致图中发生在得克萨斯的柄状狭长地带的沙尘暴。政府的土地政策通过将农民限制在小块土地上也起了负面作用。

对农民的影响

到 1937 年，由于经济复苏以及新政的农业项目，农民的贸易条件回到他们在 1929 年的水平，农民的净实际收入总额高于 1929 年的水平（表 24—2）。然后农场受到“大萧条中的衰退”打击。1939 年，农民的贸易条件和总的实际净收入再次远低于 1929 年的水平。

在 20 世纪 30 年代政府为提高农民收入所采取的最具体措施是生产控制。当然，当国家的重大问题是大量失业和饥饿时，要限制农业产量并提高食品及棉花的价格是一个错误。有更好的方式可以帮助农民。这在今天很容易看到，但在当时可不那么容易。罗斯福的许多早期顾问确信恢复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将恢复充分就业。事实上，就像其他类型的新政立法旨在帮助特定群体一样，新政农业政策的主要成果是重新分配收入，而不是结束大萧条。

显然，罗斯福新政对于农民来说已经远离了总统哈丁的政策建议——“农民必须做好准备自救”。美国人民对政府应该支持特定职业群体或阶层的经济财富的原则的认同是极重要的。农民不是这种哲学的唯一受益者，但我们不能找到一个立法方式的更好例子：起初是为了减轻紧急困难而通过的立法，却已接受为经济体系的一个永久部分。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经济推理命题之一在起作用，经济推理命题 4：制度很重要。

劳动力与新政

新政改变了美国工人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新政前，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是，在大多数时间劳动力市场将为穷人提供足够的发展机会。如果未能这样做，这是因为个人的失败：懒惰，嗜酒，等等。大萧条改变了这种态度。占主导地位的假设是，由市场提供的机会是不够的。它最终要由联邦政府来确保那些能够工作的人可以找到工资和工作条件体面的工作。

为什么如此高的失业率持续这么久

失业在整个大萧条年代持续。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是“黏性”工资的结果。如表 24—3 所示，实际工资（工资除以价格）确实仍然很高。当然，这对于那些失去了工作或者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的人来说并不值得庆幸。

表 24—3　　大萧条期间的工资

年份	名义工资（制造业的小时工资，美元）	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	实际工资
1929	0.56	100	100
1930	0.55	97	101
1931	0.51	89	103
1932	0.44	79	99
1933	0.44	78	101
1939	0.63	85	132

注：实际工资是名义工资除以国民生产总值平减指数。1929 年的指数被设定为 100，以便容易观察趋势。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169－170，D 802；197，E1.

为什么实际工资仍然如此之高？政府的政策是部分原因。正如安东尼·帕特里克·奥布赖恩所显示的，在大萧条的前两年，胡佛政府成功地给大企业施加压力来迫使它们保持工资——政府和商界领袖认为将有助于维持需求的一项政策。在新政初期，《全国工业复兴法》继续执行保持工资的政策。经济力量也起到保持高实际工资的作用。失业工人不可能突然彻底削减他们的“保底工资”（他们愿意拿的最低工资）。相反，他们很可能会在市场求职过程中慢慢地调整自己的

保底工资。（回忆经济推理命题 1。）调整过程因此花了相当长的时间。在新政的后来时期，《瓦格纳法案》（Wagner Act）及《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 Acts）及工会的相关成长（稍后讨论）均有助于维持工资。

鼓励劳动力市场竞争的政策将有助于恢复充分就业吗？即使在今天，经济学家还远未对这个有争议的问题达成共识。新古典主义传统的经济学家，特别是迈克尔·波尔多、克里斯托弗·J·塞格、查尔斯·L·埃文斯、哈罗德·L·科尔和李·E·奥海宁认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高实际工资的新政政策抑制了劳动力市场的调整并延长了高失业。新凯恩斯主义者往往跟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在 1936 年出版的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认为，工资削减将只会产生期望、投资、国民收入和就业的螺旋式下降。在凯恩斯看来，只有大规模的政府支出能够消除大萧条。

无论政府计划对实际工资的影响如何，政府救济机构的成立和赋予工会的新权力在劳工和新政之间产生了强大的联系。最重要的产生联系的元素是罢工和无雇主干涉的组织权利。工会会员人数已从 1920 年的超过 500 万急剧下降到 1923 年的 350 万。直到 1930 年它仍稳定在这一水平，此时它再次开始下跌，一直到 1933 年到达底部。在新政府执政满一年之前，更有力的工会领导人认为政府将鼓励组织工会而且国家对待工会的态度已经改变，因为人们对企业已不再抱有幻想。

特别成功的是在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内发展起来的产业工会强大能干的领导：矿工联合会的约翰·L·刘易斯，成衣业工人工会（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的西德尼·希尔曼，以及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的戴维·杜宾斯基。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工会运动在老工艺工会和较新的产业工会之间的内部冲突已相当激烈。推进组织大规模生产行业（钢铁、汽车、橡胶、电器设备）工会是不可避免的，但老工会通过坚持它们的工艺管辖区仍不可侵犯来阻止这种努力，并突袭新产业工会的会员。1935 年，8 个产业工会在美国劳工联合会内部形成了产业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for Industrial Organization，CIO）。1936 年，这些工会被联合会暂停了；3 年后，CIO 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这两大联合会之间的关系令人不快。CIO 的领导人毫不掩饰他们对劳工联合会缺乏战斗力的蔑视，而 AFL 领导人密切地观察 CIO 与保守工会主义的暴力决裂。然而，自满和惰性不再困扰劳工运动。[①] 工会会员在 20 世纪 30 年代迅速增加（表 24—4）。政府亲劳工的态度，清楚地显示在新政的劳工立法上，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1930—1939 年期间，工会会员人数从占劳动力的 6.5%增至 15.8%。

① 1955 年，由于敌对舆论和劳动立法的刺激，AFL 和 CIO 团结起来，合并组建为 AFL－CIO。大约 50%的成员属于 AFL 的附属机构，30%属于 CIO 的工会，其余的属于无党派工会。

表 24—4　　1930—1955 年工会会员人数

年份	人数（千人）	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年份	人数（千人）	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1930	3 401	6.8	1943	13 213	20.5
1931	3 310	6.5	1944	14 146	21.4
1932	3 050	6.0	1945	14 322	21.9
1933	2 689	5.2	1946	14 395	23.6
1934	3 088	5.9	1947	14 787	23.9
1935	3 584	6.7	1948	14 300	23.1
1936	3 989	7.4	1949	14 300	22.7
1937	7 001	12.9	1950	14 300	22.3
1938	8 034	14.6	1951	15 900	24.5
1939	8 763	15.8	1952	15 900	24.2
1940	8 717	15.5	1953	16 948	25.5
1941	10 201	17.7	1954	17 022	25.4
1942	10 380	17.2	1955	16 802	24.7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5），178，Series D948－949.

劳工关系的新框架

除了只适用于铁路行业的立法，国会在 1932 年之前已很少干预劳工关系。1932 年《诺里斯-拉瓜迪亚法》（Norris-LaGuardia Act of 1932）是走向清除自由组织工会障碍的第一步。主要在程序的性质上，该法大大限制了法院发出劳工禁令的能力。黄狗合同——工人同意不加入工会的雇佣合同——通过在联邦法院规定不可强制执行已被取消。此外，非公司员工抵制和纠察是允许的。《诺里斯-拉瓜迪亚法》授予工人组织工会的机会，但没有仲裁确保他们获得集体谈判的好处。

劳工集体谈判权的第一个积极主张是在《全国工业复兴法》的第 7a 条，但没有提供执行该原则声明的手段。两年后，当《全国工业复兴法》被宣布违宪时，国会用一部更为精心复杂的法律——《全国劳工关系法》（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取代了第 7a 条；它通常被称为《瓦格纳法案》，以它的发起人纽约的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的名字命名。

《瓦格纳法案》将集体谈判原则确立为劳资关系的基石，并指出，真心实意地认识和处理真正的劳工组织是管理层的责任。该法进一步保障了工人组织和加入工会组织，进行集体谈判，选举他们自己的代表，并进行一致行动的权利。此外，《瓦格纳法案》宣告一系列“不公平”的管理习惯为非法。

此后，雇主不能：

（1）在雇员行使自主组织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过程中干预、限制或强迫雇员。

（2）支配或干预任何劳工组织的成立或管理，或为干预行为提供财政或其他支持。

（3）通过关于雇佣或聘用任期或工作条件的歧视来鼓励或阻止工会会员，除了与一个享有多数地位的真正的工会签订的封闭式工厂协议（a closed-shop agreement，要求某一类职工为特定工会会员的集体协议）可能涉及的歧视。

（4）因起诉或根据该法作证而解雇或以其他方式歧视雇员。

（5）拒绝进行集体谈判。

《瓦格纳法案》不单纯是一个原则声明。它成立了一个具有执法权力的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NLRB）。当最高法院在 1937 年宣布《瓦格纳法案》合乎宪法时，就不再有劳工组织快速发展的法律障碍了。然而，在合宪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许多雇主公然违反该法，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多的劳资关系的动荡。已暂停的 CIO 和 AFL 之间仇恨的增长导致管辖权冲突，所以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进行调停。随着工业争斗似乎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有公众要求修订该法，而雇主苦苦地抱怨该法律的片面性。但是，从劳工的角度来看，《瓦格纳法案》是他们的《大宪章》（Magna Carta）。

《公平劳动标准法案》

取代并扩展了《全国工业复兴法》的条款的 1938 年《公平劳动标准法案》（Fair Labor Standards Act of 1938），是联邦监管工作场所的起点。除其他事项外，该法律规定了每小时 0.25 美元的最低工资（计划最终上升到 0.40 美元），规定每周最多工作 44 小时（计划降至 40 小时），雇主要为超时工作支付加班费，并禁止雇用未满 16 岁的儿童。[①] 劳工部的工资和工时处是为了执行该法而成立的。农业是豁免的，其他豁免将最初被法律涵盖的非农业工人的比例减少至约 44%，其目的是保护工人和增加就业。例如，人们期望，需要额外支付加班费将鼓励企业以较低费率雇用更多的工人。

对《全国工业复兴法》的长期效应的任何评估都会引起争议。例如，即使在今天，经济学家们还没有对就业和最低工资的收入效应达成一致意见。许多经济学家因它增加低技术工人的失业而批评最低工资。如果工人给公司增加的收入比他们的工资少，公司为什么要雇用他们呢？但其他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损失很

① 当时制造业工人的每小时平均工资约为 0.62 美元。

小，而这些否则将接受低于最低工资的工人的利益更重要。明确的是，《公平劳动标准法案》给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留下了持久的印记并建立了联邦政府将有助于制订工作规定和条件的前提假设。

最高法院与新政

新政的许多反对者希望最高法院宣布罗斯福的许多立法违宪。除其他事项外，反对者认为禁止未经正当程序征用私人财产的《宪法第五修正案》、《宪法第十五修正案》将导致限制经济管制的扩张。毕竟，只要政府施加控制，如使用最低工资或最高限价，一些人的财产价值就会减少。如果每一个这样的征用都必须在法庭审理和适当补偿（实质性正当程序），那么很少会有实际的管制范围。

最高法院本身对新政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因此，一些早期的新政立法获得了法院的批准。其他新政立法，包括其最雄心勃勃的计划，都被否决了。在1935年谢克特家禽公司等诉美国案（A. L. A Schechter Poultry Corp. et al. v. United States）中，最高法院一致裁决《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理由是该法律给行政机关授予了过分武断的权力，而且它试图管制州际贸易。[①] 在美国诉巴特勒案（United States v. Butler，1936）中，《农业调整法案》被裁定违宪，理由是它是由不当税收资助的。

受1936年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鼓舞，罗斯福试图通过建议将允许他任命更多法官的立法来改变法院的趋势。但是，对罗斯福企图“挤走”法院的反对十分普遍，他遭受了他的少数政治失败之一。不过，最后罗斯福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法院的温和派，也许读了选举结果报告，转变成为左派。在随后的几年，许多保守派大法官退休了，这允许罗斯福任命更多的自由派。在美国诉达比案（United States v. Darby，1941）中，法院裁定支持《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在维卡德诉菲尔本案（Wickard v. Fillburn，1942）中，法院裁定支持新的《农业调整法案》。

因此，在阻碍联邦（和州）的经济控制的法律中，如联邦政府只可管制州际商业的想法及联邦和州政府不能任意干预私人合约的想法被推翻了。增加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的法律障碍已被清除。

第二次新政：福利国家

美国福利国家建设是在20世纪30年代与全国失业保险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一起开始的。

---

① 这个著名的案例被称为“病鸡案”，因为除了违反该准则的其他行为，据说该公司还出售了病鸡。

社会保障

在1932年之前，因工伤事故外任何其他原因的收入损失给工人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工人必须依靠自己的积蓄或亲友、有组织的慈善机构以及州和地方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期间的救济负担使慈善组织、州和地方政府以及联邦政府不知所措。出于经济和道德原因，这种联邦救济的经历使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应对收入严重损失的永久性计划的必要性。

政府、企业和学术界的一些领导人一直以来主张，一个包括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的社会保险综合方案是必要的。这种方案在欧洲、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早已十分平常，而且学术期刊包含了很多有关这些方案的报告。但迟至1930年，在美国很少有赞成社会立法的民意。美国人认为，个人应自力更生并反对政府的强制支持。各种利益群体表示了他们的反对。私营保险公司，毫不奇怪，设法阻止或至少修改社会风险的政府保险。在社会保险的需求并非那么明显的农业，有人反对为这种保险增加税收。最令人惊讶的事实是，在大萧条之前，隶属工会的工人本身并不支持社会保险（工人赔偿除外）：迟至1931年，一次全国劳联大会仍拒绝签署失业保险立法。

四年的经济浩劫清除了主要立法的所有严重障碍。1935年《社会保障法》规定了以工人支付收入的1%到最高3 600美元的款项为基础的联邦养老和遗属保险计划。它进一步向有需要的老年人、未成年子女和盲人提供援助。随后的修订补充了其他群体。

该法案是作为“保险”计划构造的，其中工人和雇主各缴一半保险费。法案起草的措辞并未决定其经济效应。缴付的保险费是其工资成本的一部分。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导致了工人较低的工资。从长远看，雇主将大部分保费转嫁给员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将社会保障作为保险计划而不是作为受工人纳税资助的福利计划提出，政府当局希望克服福利的负面形象，并建立对该计划的长期支持。罗斯福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我们将这些工资缴款放在那，以便纳税人有合法、道德的政治权利来领取退休金……已经收取了社会保障税，没有该死的政客能废除我的社会保障计划。”

但是，保险的想法没有持续多久。老年人要求尽快开始支付福利的压力导致1939年的一个修正案，将该制度转换成一个缴费未保存而是迅速转移到那些领取社会保障支票的人那里的制度，即“现收现付”制。虽然当时颇具争议，美国人民很快接受了社会保障。关于谁应该被覆盖在内，应该是什么样的福利水平，以及该如何资助该制度的争论仍在继续，但该制度的存在本身并没有受到质疑。

失业保险

失业保险计划在其目的上没有社会保障广泛，但它是被解散工人强大的短期帮助。失业保险是通过州系统提供的，主要是为了规避法律上的困难。1935 年《社会保障法》批准了州政府对除少数商业职业外的所有职业的雇主支付的第一个 3 000 美元工资征收 3%的税。类似于社会保障的变化，最近的趋势已经使失业保险的法律更加自由——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失业保险金是一个高度可靠的自动稳定器的事实。它的自动稳定作用是通过当失业增加时，及时增加失业保险金来实现的。

新政的批评者

当时和现在一样，新政受到猛烈批评。它的保守批评者抱怨说，罗斯福正在建立一种新方案的“字母汤”，而机构正在将美国变成一个官僚国家。他们还抱怨说，由民间资源保护组织和其他机构创造的就业机会仅仅是削弱美国工人特性的“耙叶工作”。

批评者还抱怨说，资金并不单纯向贫民提供救济，而是为了尽量扩大对新政的政治支持。这种批评已获得了来自经济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因为它是以实证调查为准的。伦纳德·阿林顿是第一个系统研究这一问题的人。他发现新政的人均支出在西部较高，尽管该计划声称南部是最需要的地区。后来，其他人，包括唐·雷丁、加文·赖特、加里·安德森和罗伯特·托利森证实新政似乎是为取得最大的政治支持而分配资金。约翰·瓦利斯指出，其中一些似乎是政治分配的事情可通过新政方案中要求来自州的配合补助款的规定来解释。这一规定倾向于奖励生活在富裕州的人们。不过，看来即使在考虑配合补助款时，一些证据仍支持政治分配理论。当然，即使是最有需要的人并不总是主要的受益者，尽管如此，他们可能已经受益。例如，普赖斯·V·菲什巴克、迈克尔·R·海恩斯和肖恩·坎特最近的研究表明，在南部，新政方案降低了白人与黑人的婴儿死亡率，即使一些但并非所有方案似乎在管理方式上有利于白人。

也许最强烈的是那些声称罗斯福政府的政策虽然意在帮助穷人，实际上有助于延长大萧条的批评。我们已经看到，今天的一些经济学家附和当时提出的批评，将高失业率延长归咎于旨在保持高工资和加强工会组织的新政劳工政策。许多批评者，包括当时的一个主要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更普遍地认为罗斯福的反商业言论和他不断增设的新法规和税收已经阻碍私人投资，而这抑制了复苏。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种对私人投资的打断，美国经济可能已经迅速复苏，就像它 1921 年曾在保守的沃伦·哈丁时期和他的减税制度及自由放任政策下迅速复苏那样。换句话说，不要说消除大萧条，罗斯福政策的最终效果甚至让它延

长！这种批评仍存在争议，因为确定政治制度对私人投资的影响非常困难。[①] 虽然罗斯福的保守批评家们是最有影响力的，新政也遭到了来自激进的左派和民粹主义者的批评，他们声称罗斯福帮助穷人的努力还远远不够。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位医师 E·弗朗西斯·汤森博士因他给 60 岁以上的人每月 150 美元（相当于今天的 5 000 美元）的养老金计划吸引了大量支持者。资深电台牧师查尔斯·E·库格林主张民粹主义的货币改革。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激进派是休伊·朗——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政治首领和参议员。他的“分享财富”计划将给每一个美国家庭赠送 5 000 美元的房子，2 000 美元的年收入（约为今天的 67 000 美元），以及其他福利，资金来自对巨额财富所征的财产税。

但是，来自右派和左派的批评者只是少数派。毫无疑问的是，大部分公众认可政府积极实验但举步维艰地应对危机的行为，正如罗斯福在 1936 年和 1940 年以压倒性胜利连任所显示的那样。

新政的遗产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新政是有时相互矛盾的方案的大杂烩：一些旨在减轻痛苦，其余的是为了防止再次发生大萧条。回想起来，新政如果遵循了凯恩斯的建议可能会做得更好，并集中地减轻痛苦和最大限度地发挥整体的货币和财政刺激措施，而不是试图改革市场。无论如何，新政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第一，它建立了广泛的继续规范我们的经济生活的制度和方案：证券交易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最低工资和其他工作场所的规定，社会保障，失业补偿等。第二，它在年轻的新政人物之间创造了理想主义精神，这将在实施肯尼迪-约翰逊时代通过的更多法规的过程中奏效。第三，它创造了一个假定，即人们可以指望华盛顿想出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的办法。的确，在 1929 年之前人们常常求助于华盛顿：减少国外竞争，补贴铁路建设，救济火灾受害者，等等。所有潜在的改革必须克服一个假定：现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包括自由市场，从根本上来说是健全的。大萧条和新政扭转了举证责任，把它留给现状的捍卫者来表明市场力量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即公众的注意力已被危机所吸引。

矛盾的是，新政的第四个也许是最重要的遗产，是它没有做的事情：它没有试图推翻资本主义。随着国家动荡不安和经济成为废墟，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广泛的商业和工业国有化可能在 1933 年已经建立。新政基本的本能是改革和保护资本主义体系。美国人喜欢把自己看作优秀的扑克牌玩家。1932 年，他们不想停

---

① See Joseph Schumpeter,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1939), vol. 2, 1044 - 1045; Thomas Mayer and Monojit Chatterji, “Political Shocks and Investment: Some Evidence from the 1930s,” *Journal of Economics History* 45 (December 1948): 936 - 941; Anthony Patrick O'Brien, “Were Businessmen Afraid of FDR? A Comment on Mayer and Chatterj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December 1990): 936 - 941; “Reply to O'Brie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December 1990): 942 - 944; and Robert Higgs, 1997.

止玩牌，他们只是想改变规则并获得新政。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llen, Frederick Lewis. *Since Yesterday: The Nineteen Thirties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1940.

Alston, Lee J. "Farm Foreclos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885 - 903.

——. "Farm Foreclosure Moratorium Legislation: A Lesson from the Pas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1984): 445 - 457.

Alston, Lee J., and Randal R. Rucker. "Farm Failures and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A Case Study of the 1930'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7 (September 1987): 724 - 730.

Anderson, Gary M., and Robert D. Tollison. "Congressional Influence, and Patterns of New Deal Spending."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34 (April 1991): 161 - 175.

Bernstein, Michael. "A Reassessment of Investment Failure in the Interwar American Econom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479 - 488.

——. *The Great Depression: Delayed Recovery and Economic Change 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Bordo, Michael D.,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N. White, eds.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Bordo, Michael D., Christopher J. Erceg, and Charles L. Evans, "Sticky Wages,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0 (December 2000): 1447 - 1463.

Brunner, Karl, ed.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Chandler, Lester V. *America's Greatest Depression, 1929—1941*.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Cole, Harold, L., and Lee E. Ohanian. "Re-examining the Contributions of Money and Banking Shocks to the U. S. Great Depression." In *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 2000*, eds. Ben S. Bernanke and Kenneth Rogoff.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 183 - 227.

Costa, Dora L. *The Evolution of Retirement: A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1880—199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Darby, Michael.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 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aid: Or, an Explanation of Unemployment, 1934—194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February 1976): 1 - 16.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and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photographs. http://rs6. loc. gov/fsowhome. html.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 Institute Web site devoted to Dew Deal public works and art projects. http://newdeal. feri. org.

Franklin D. Roosevelt Library. http://www. fdrlibrary. marist. edu/.

Fishback, Price V., and Shawn Everett Kantor. *A Prelude to the Welfare State: The Origins of Workers' Compens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ishback, Price V., Michael R. Haines, and Shawn Kantor. "The Impact of the New Deal on Black and White Infant Mortality in the South."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8 (January 2001): 93 - 122.

Hawley, Ellis W. *The New Deal and the Problem of Monopoly: A Study in Economic Ambivalenc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8.

——. "Regime Uncertainty: Why the Great Depression Lasted So Long and Why Prosperity Resumed after the War." *Independent Review* 1 (Spring 1997): 561 - 590.

Kindleberger, Charles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Leuchtenberg, William E.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1963.

——. "The New Deal and the Analogue of War." In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eds. John Braeman, Robert H. Bremner, and Everett Walters. 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

Libecap, Gary D.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Regulating State: Federal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Agriculture, 1884—1970." In *The Defining Momen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Michael D. Bordo, Claudia Goldin and Eugene N. Whi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181 - 224.

Margo, Robert. "The Microeconomics of Depression Unemploymen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1 (June 1991): 333 - 342.

Mayer, Thomas, and Monojit Chatterji. "Political Shocks and Investment: Some Evidence from the 193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5 (December 1985): 913 - 924.

——. "Reply to O'Brie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December 1990): 942 - 944.

O'Brien, Anthony Patrick. "A Behavioral Explanation for Normal Wage Rigidit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4 (1989): 719 - 735.

——. "Were Businessmen Afraid of FDR? A Comment on Mayer and Chatterj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0 (December 1990): 936 - 941.

Public Broadcasting System Web site describing the Dust Bowl. http://www.pbs.org/wgbh/amex/dustbowl.

Schumpeter, Joseph. *Business Cycles: A Theoretical, Historical,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Capitalist Process*, New York: McGraw-Hill, 1939.

Smiley, Gene. "Recent Unemployment Rate Estimates for the 1920s and 193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3 (1983): 487 - 493.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Web site, history section. http://www.ssa.gov/history.

Temin, Peter.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01 - 328.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Web site, history section. http://www.tva.gov/abouttva/history.htm.

Wallis, John Joseph. "The Birth of the Old Federalism: Financing the New Deal, 1932—194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139 - 159.

——. "Employment, Politics, and Economic Recovery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4 (1987): 516 - 520.

Wallis, John Joseph and Daniel K. Benjamin. "Public Relief and Private Employment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1981): 97 - 102.

Walton, Gary M., ed. *Regulatory Change in an Atmosphere of Crisis: Current Implications of the Roosevelt Year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Weinstein, Michael M. "Some Macroeconomic Impacts of the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 1933—1935."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Revisited*, ed. Karl Brunner.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1981.

Wright, Gav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New Deal Spending: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56 (1974): 30 - 38.

第 25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本章主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仅 21 年，世界再次陷入战争：战争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 405 000 人丧生，其中 292 000 人阵亡。另外，有671 000人受伤，虽然不是致命伤。死亡人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4 倍，为南北战争的 2/3。至于其他交战方，死亡人数要高得多。总而言之，约 4 000 万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人力资本”损失令人吃惊。

美国的主要经济目标是要给它自己的军队和它的盟国提供足够的武器以战胜轴心国（德国、日本及其盟国），正如罗斯福总统所说的那样，要成为“民主兵工厂”。这个目标完成得很出色。在短短几年中，美国工厂制造出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得多的武器，并且超过了所有轴心国的总和，即使轴心国比美国早几年就已经开始转成战时编制。

从短期来看，战时努力缓和了对罗斯福新政的许多紧急措施的需要。以工代赈不再有必要，因为全国的工厂处于高负荷忙碌状态；不再需要应急资金来帮助面临破产的企业摆脱困境，因为利润在猛增。从长远来看，战时努力加强了已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发生的经济转型。高联邦赤字和低失业率的结合使许多经济学家和公众相信凯恩斯解决失业问题的妙方的有效性。政府的动员管理使经济学家和广大公众相信联邦政府有能力成功地管理大型项目。

战争动员

当德国军队进攻波兰时，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开始。[①] 保证波兰独立的英国和法国，随后对德国宣战。在美国，由于制造商预期1916年激动人心的日子的重复——当时中立的美国通过补给交战中的欧洲而获得巨大利润，工业生产发生了一个短暂的激增。但是，在“虚假战争”期间当英国、法国和德国，虽然正式处于战争状态，似乎将避免发生武器的重大冲突时，工业生产下跌。当德国对低地国家发起闪电战，席卷法国各地的所谓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并攻破法国时，虚假战争于1940年5月结束。美国制造商预计到未来的短缺，开始建立库存，英国和它其余的盟友开始向美国订购大量战争物资，而且美国发起了一个大幅扩大的军事订货方案。

最初，英国被要求以“现付自运”为基础支付武器。它通过转移黄金和要求用英国公民拥有的美国银行的存款和证券来支付。（这项政策消耗了英国不少的海外投资。）当这些资金来源开始耗尽时，罗斯福总统于1941年3月成功地建立了贷款租借法案。“租借”之名旨在将注意力从这个简单的事实转移，美国政府现在将支付送往英国和其他盟国的武器。

起初，价格保持相对稳定，由于数百万美国工人仍失业，并未充分就业，工业生产能力远未得到充分利用。用经济学家的术语说，美国还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曲线。然而，到1940年秋天，供给已变得不那么无弹性，批发价格开始上涨。1941年，美国经济正进入高速发展，尽管有零星的失业现象。例如，钢锭和铸件的生产在1940年已经达到5 980万长吨（long-ton），超过了以前的高峰——1929年达到的5 640万长吨。1941年，产量达到7 400万长吨。一种具有广泛工业用途的化学物——硫酸，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生产：比起1929年的530万短吨（short-ton），1941年生产了680万短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工业生产指数与1929年的100相比，在1941年达到了139。尽管美国工业正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许多美国人仍然怀疑援助英国及其盟国的明智性。然而，在1941年12月7日，所有的疑虑消失了。引述罗斯福总统著名的战争消息：

> 昨天，1941年12月7日——一个耻辱日子——美利坚合众国遭受了日本帝国的海军和空军部队突然故意的袭击……昨天的事实不言自明。美国人民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清楚地了解到这对我们的生命和国家安全的影响。

美国现在完全致力于反对轴心国的战争（在日本袭击和美国回应后，德国已迅速对美国宣战），但许多军事和经济问题仍有待回答。

在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美国通过了一项大胆的经济动员计划。美国将利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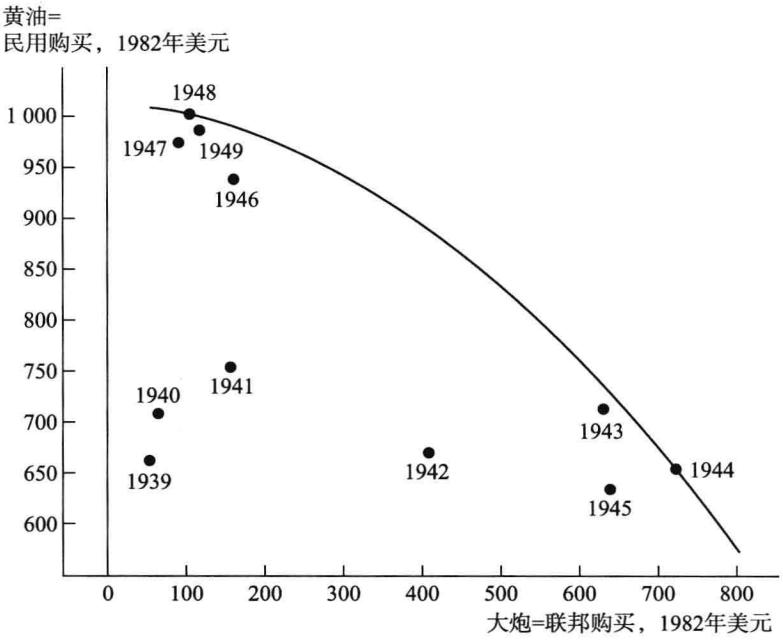
① 有关战争期间美国经济最好的一般调查是 Harold G. Vatter, *The U. S. Econom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其庞大的工业力量来大量生产武器，并以纯粹的火力压倒轴心国。特别地，罗斯福总统呼吁制造闻所未闻的总共 50 000 架飞机，尽管当时没有人问这样大量的飞机如何能够生产出来。经济动员涉及许多取舍。最重要的问题是平民消费减少到什么程度——正如人们常说的，“大炮与黄油”之间的选择。[①] 参见经济透视 25.1。

经济透视 25.1

1939—1949 年“大炮和黄油”之间的选择

生产可能性曲线显示了横轴上衡量的大炮（军费开支）和纵轴上衡量的黄油（平民消费）之间的取舍。下图显示了在战争年代每年生产的黄油和大炮之间的实际组合，连接 1944 年和 1948 年取得的组合点绘制了一条假设的曲线。一些组合位于生产可能性曲线里面（1939 年，1940 年，1941 年，尤其是 1942 年）；这些点表明，经济仍在低于其最大可能的产量水平下运转。因此，在一般情况下，美国的战争开支主要是通过水平移向生产可能性曲线，而不是沿着它移动。所谓“大炮和黄油”通常被认为是德国最高陆军元帅赫尔曼·戈林创造的，他在 20 世纪 30 年代要求“用大炮代替黄油”。



① 战争期间黄油的平民消费量确实下降了，但是这似乎只是低消费长期趋势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冰激凌的消费量在战争期间比之前要高，这也是长期趋势的一部分。

表 25—1 非常笼统地显示了美国如何分配其资源的战时努力：1929 年，联邦政府支出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2.6%。即使在 1940 年，经过新政时期联邦政府职能几年的扩张之后，联邦政府支出也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约 8.2%。这场战争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最大的进展发生在 1944 年，这一年联邦政府支出了约 7 225 亿美元（以 1982 年的物价计算），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52.3%。

表 25—1　　实际国民生产总值（1982 年十亿美元）

年份	GNP	商品和服务的联邦总购买	前一列占 GNP 的百分比（%）	商品和服务的民用总购买[a]	前一列占 GNP 的百分比（%）
1929	709.6	18.3	2.58	691.3	97.42
1939	716.6	53.8	7.51	662.8	92.49
1940	772.9	63.6	8.23	709.3	91.77
1941	909.4	153.0	16.82	756.4	83.18
1942	1 080.3	407.1	37.68	673.2	62.32
1943	1 276.2	638.1	50.00	638.1	50.00
1944	1 380.6	722.5	52.33	658.1	47.67
1945	1 354.8	634.0	46.80	720.8	53.20
1946	1 096.9	159.3	14.52	937.6	85.48
1950	1 203.7	116.7	9.70	1 087.0	90.30

a. 包括州和地方政府支出。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7*（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246－247.

分析这些数字的另一种方式也是有趣的。从 1940 年到 1944 年，真正的联邦支出总额增加了 6 589 亿美元（=7 225 亿美元－636 亿美元），而总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 6 077 亿美元（=13 806 亿美元－7 729 亿美元）。因此，军事支出增加的 92.2%（=6 077 亿美元 ÷ 6 589 亿美元×100%）可用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来解释。只有 7.8%的增长要由民用部门的生产下降来抵消。战时努力的大部分资源是通过雇用以前的闲置资源并更集中地利用已就业的资源获得的。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参战也能够保持民用消费良好，虽然不是整体。不过，在扩张能力较小的其他国家，牺牲当前的消费或投资以便为军事行动提供资源的必要性相应更大一些。

取　舍

虽然关于民用消费和投资减少多少的决定是最重要的，战时动员也涉及了其他更微妙的取舍（强调取舍很重要的经济推理命题 2，在和平时期适用，在战争时期也适用）。其中之一是在工业安全领域。往往造成严重伤害或死亡的事故在战争期间急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预料之中的，有这么多的人在危险的岗位上工作这么长的时间！而且，看来事故发生的速度增加了，至少在制造业是如此。官方数字显示了在制造业工作的每百万小时的伤残数量从 1940 年的 15.3 增加到 1943 年的 20.0，空前的最大值。

做出更大的努力来维持安全应该吗？可能吧，但这个问题一直是安全和产量之间的一个取舍。得到充分休息的工人更为安全，但更多的休息时间可能意味着较低的产量。航运码头更多的工作空间降低了事故风险，但更多的工作空间意味着更高的压缩成本和建设其他设施可用的资源更少。另一种微妙的取舍介于生产武器的质量和数量之间。变化的技术和战场经验不断地对现有武器提出修改建议。做出这些修改往往意味着拆除和重建装配线，从而失去宝贵的生产时间。这种权衡往往是军队领导人（他们主张尽可能生产最先进的武器）和主管军工生产的平民（他们对生产中的潜在损失更为在意）之间争论的焦点。当希特勒的军队在突出部之役（Battle of the Bulge）中攻击盟军部队时，德国的坦克——著名的装甲车，和同盟国手中的任何坦克几乎一样好或者更好，但它们的数量大大超过了同盟国。

整体而言，美国大规模生产战争武器的决定证明是一个辉煌的成功。美国自身生产出了比轴心国总和更多的武器。不仅是小型武器和弹药等军需品大量生产，并且携带武器到战区的飞机甚至船只也大量生产。亨利·凯瑟在波特兰、俄勒冈的船厂，使用了一些最先进的技术，其中著名的自由轮（Liberty ship）创纪录地在 8 天内完成制造。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亨利·A·格梅里和简·S·霍根多恩已经表明的那样，大规模生产技术甚至被用来生产驱逐舰。[①]

势不可挡的火力

表 25—2 显示了每年由五个大国生产的弹药（1933—1939 年为累计数）。到 1939 年，德国和日本已累积相当大的弹药库存。它们希望在它们的对手有时间来武装之前，以更大的长远经济能力在闪电战的攻击中用这些弹药战胜其他国家。虽然它们赢得了无数的最初的战斗，最终其扩张路径被阻止了，而这次战争

① Henry A. Gemery and Jan S. Hogendorn, "The Microeconomic Bases of Short-Run Learning Curves: Destroyer Production in World War II," in *The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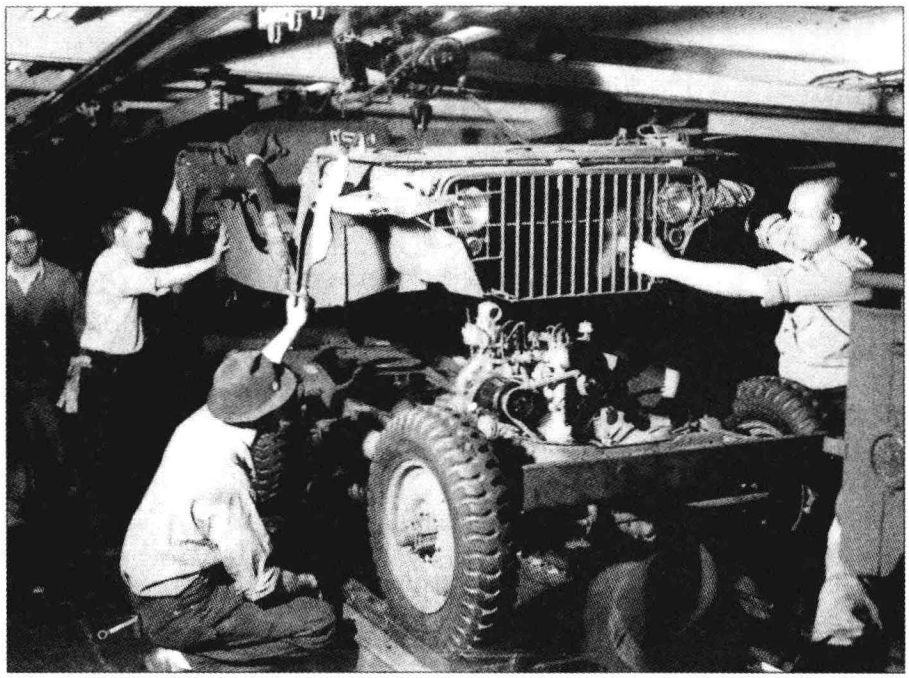
成为一场消耗战。美国以建造武器和生产武器的手段发起了一个庞大的计划，从而它的产量飙升。结果可从表 25—2 看出。到 1942 年，美国的军火生产超过了德国和日本的总和。尽管德国和日本在繁重的空袭下提高生产能力，尽管在防线后面有战斗优势，最后的结果不再有疑问。美国及其盟国联合生产弹药的巨大数量意味着德国和日本迟早将被打败。

表 25—2　　由主要交战国生产的军火

（以 1994 年美国军火的价格计算，百万美元）

	1933—1939 年	1940 年	1941 年	1942 年	1943 年	1944 年
美国	1.5	1.5	4.5	20	38	42
英国	2.5	3.5	6.5	9	11	11
苏联	8	5	8.5	11.5	14	16
德国	12	6	6	8.5	13.5	17
日本	2	1	2	3	4.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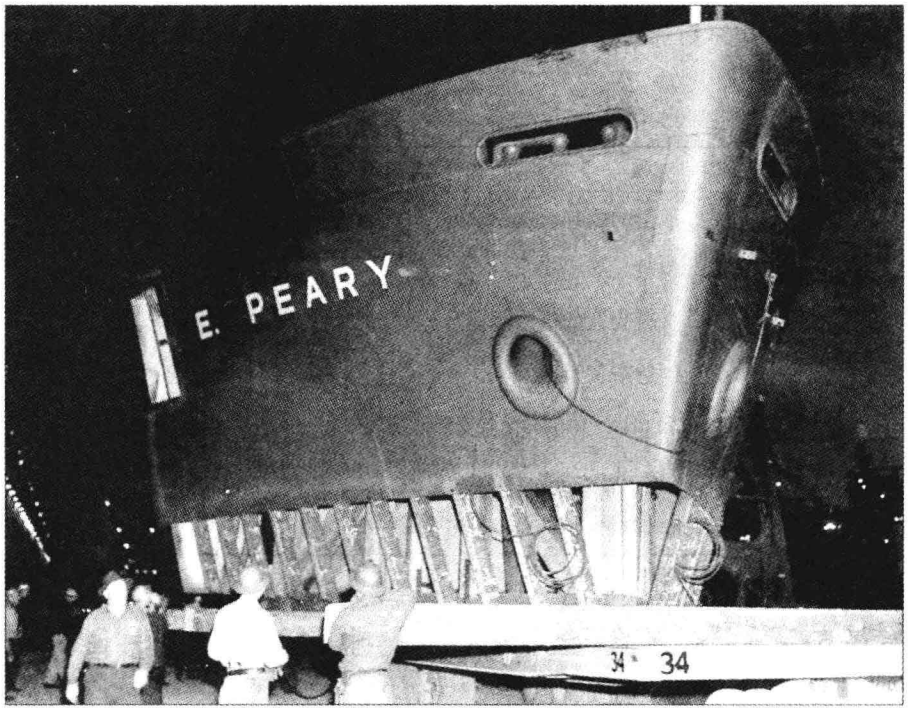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Mark Harrison，"Resource Mobilization for World War II：The U. S. A.，U. K.，U. S. S. R.，and Germany，1938—194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41（1988）：172.



© H. ARMSTRONG ROBERTS

民用汽车的生产于 1942 年 2 月结束。然后汽车工业转向大规模生产坦克、机枪、飞机引擎和其他战争武器，包括这里展示的在福特的生产线上生产的吉普车。

几个机构，最重要的是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WPB），试图管理军火生产的庞大扩张。一个工具是优先权，本质上是一个根据合同指导厂家安排生产的评级。资源的重新分配是如此快速，新合同的总额是如此巨大——一度未履行的合同的总价值据说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以致当战时生产委员会终于解决如动员开始后不久就发展的“优先权膨胀”（太多的合同具有最高优先权）等问题时，弹药生产达到高峰。最后，利润动机是资源的主要分配者。[①]



© BETTMANN/CORBIS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生产的自由轮，使得美国商船队的总吨位数是原来的5倍。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正如在前面的章节中所提到的，要获取打一场大战所需的资源有四种基本途径可供一国使用：（1）征用资源；（2）对收入或有钱人征税；（3）借款；（4）印钞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依靠所有四种方式。当然，征兵是征用最

① 关于战时合同的利润率以及军事承包商的过高利润在战后持续，参见 Robert Higgs，“Private Profit，Public Risk：Institutional Antecedents of the Modern Military Procurement System in the Rearmament Program 1940—1941，” in *The Sinews of War：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eds. Geofrey Mills and Hugh Rockoff（Ames：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93）。

重要的例子。政府还依靠税收。这场战争从根本上改变了所得税。单身及已婚人士的豁免被调低。在1943年，用于收集所得税的薪资扣除制度（payroll deduction system）被引进，而扣税后的实得工资（take-home pay）成为英语语言中的一个词汇。总之，这些创新意味着所得税首次成为大众税。公司税率也增加了，超额利润税也被采用。由于这些加税和税基迅速增加的结果，美国能够用税收为战争提供约40%的经费（表25—3）。这比美国内战或第一次世界大战所用的税收所占的份额还要大。尽管如此，美国仍然需要大笔借款来为战争筹措资金。参考新观点25.1。

表25—3　　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筹措资金

	1941—1946年（十亿美元）	占支出的百分比（%）
战争的联邦总支出[a]	320.2	100.0
税收	129.8	40.5
来自公众的借款	115.8	37.0
创造新货币	74.6	22.5

a. 1941—1946年的总支出减去1940年支出的6倍。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0），711；and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Monetary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1970），33－37.

新观点25.1

应该如何为战争融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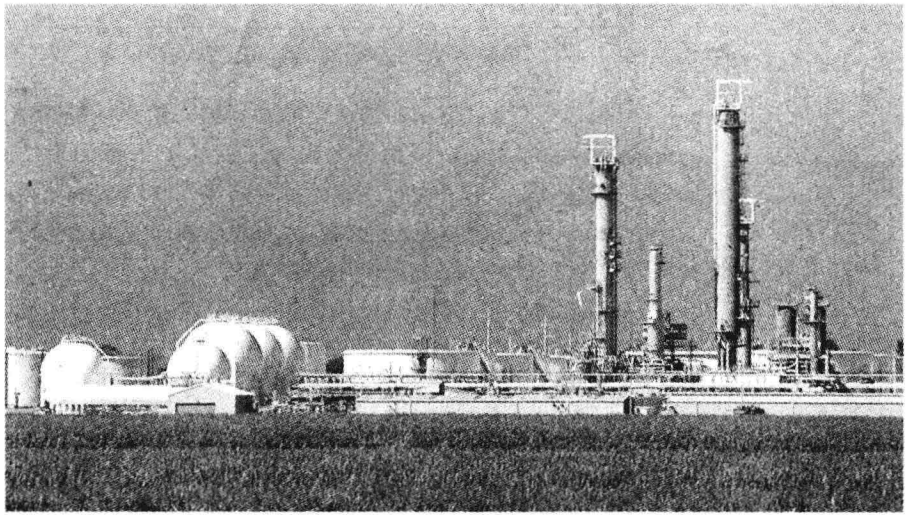
在美国走向战场时，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否主要依靠税收或债务来筹措资金（没有人认为靠印钞票是个好主意）的争论仍然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反映了一种思想学派的罗斯福政府，建议通过提高税收为战争筹措大部分资金。据当局表示，这样做可避免增加年青一代（包括那些参与战斗的人）的负担，否则在未来几年要支付大量债务的利息和本金。但是，要使国会增加税收是不容易的。共和党国会议员抱怨说高税率打击工作积极性，他们仅支持通过已增加的税项来为战争筹措部分资金。今天，许多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也认为“平滑税”——在战争期间只将略微提高税收并主要依靠债务——是为战争筹资的最有效方式。赤字财政支持者还可以指出一个事实，即联邦债务在1945年达到了2 590亿美元，为国内生产总值的121%，没有造成明显的危机，作为经济可以承受非常高的债务水平的证据。

在思考这次争论的过程中，亚当·斯密这位税务财政支持者所说的话可能是

贴切的（*The Wealth of Nations*，The Glasgow Edition，925）：

> 战争［如果经费来自税收，而不是债务］在一般情况下会更迅速结束，且更少大肆进行。在战争持续期间，感受到它的沉重负担的人们，将很快对战争感到厌倦，而政府为了迁就他们，继续参与战争的时间不会长于有必要这么做的时间。

可以想象，所有战时赤字可能通过向公众销售证券来筹措资金，但（尽管大肆宣传战争债券的推动力）销售这些债券所需的利率将可能是历史上非常高的水平。因此，美联储采取了非凡的“钉住”政府证券利息率的措施。它是通过承诺每当它们的价格低于预定的支持水平时会购买政府债券来实现的。[①] 从表面上看，出售债券给美联储似乎是免费搭车，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政府担负的未来利息成本。美中不足之处（这取决于一个人对事情的看法）是美联储必须创造新的货币来购买这些证券，而这增加了经济面临的通货膨胀压力。



© JACKSON HILL/SOUTHERN LIGHTS PHOTOGRAPHY INC.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美国只生产少量特种用途的合成橡胶。到 1944 年，像这样的位于巴吞鲁日的工厂保证全国供应充足。

1939 年，失业率保持在居高不下的 11.3%的水平。凯恩斯主义者声称，失业率能用足够的政府支出特别是赤字财政支出（deficit-financed spending）增加来消除。诚然，1939 年的赤字占 GNP 的 3.07%。根据凯恩斯主义者，需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赤字。到 1944 年，赤字已大大增加至 GNP 的 22.5%，并且失业几乎消失（1.2%），一个破纪录的最低失业率。大多数经济学家，特别是年青一代的经济学家，如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和詹姆斯·托宾，发现凯恩斯主义治疗失业的有效性的这种证明使人信服。要知道其原因，请

① 政府债券支付的利率取决于债券的固定年支付和它的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低市场价值意味着高利率。

考虑表 25—4 显示的关键数字。

表 25—4　　赤字开支和失业的下降

年份	失业人口占劳动人口的百分比（%）	GNP（十亿美元）	联邦预算赤字（十亿美元）	赤字占 GNP 的百分比（%）	货币存量（十亿美元）
1929	3.2	103.9	0.7	0.67	46.6
1933	20.6	56.0	−2.6	−4.64	32.2
1939	11.3	91.3	−2.8	−3.07	49.2
1944	1.2	211.4	−47.6	−22.52	106.8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87*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7), 244, 280, and 331; and Michael R. Darby, "Three and a Half Million U.S. Employees Have Been Mislaid: Or, an Explanation of Unemployment, 1934—1941,"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4 (1976): 8. The last column is derived from 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 Schwartz, *Monetar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King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124 - 125.

当时以及后来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仍然对凯恩斯的疗法持怀疑态度。一方面，这些数据也符合货币供给量大幅增加能治愈萧条的货币主义主张。考虑表 25—4 的最后一列。1939 年的货币存量仅略高于 1929 年，但到 1944 年，它已增加了一倍多。一些经济学家也指出，大批青年男子征兵入伍使许多失业可能性高的人从劳动力大军中剔除。正如在许多情况下，历史的教训是模棱两可的，因为在历史的自然实验中，其他因素很少如我们所愿保持不变。尽管现在经济学家对凯恩斯学说要旨的这种证明有所保留，毫无疑问的是，它在战争期间对经济决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即使在当时，一些凯恩斯主义者也担心，由战时赤字开支政策产生的通胀压力已通过一系列工资和物价管制（这在和平时期是不能接受的）得到了遏制。

工资和物价管制

在战争初期，罗斯福政府决定它将用直接管制来对抗价格上涨。它会通过呼吁人们的爱国主义来设法说服企业不提高产品价格；如果劝说无效，它将简单地规定涨价非法。

在 1940 年 5 月，罗斯福总统成立了国防顾问委员会（National Defense Advisory Committee, NDAC）并选择一位抽烟的脾气暴躁的新政人物利昂·亨德森来负责其价格稳定部（Price Stabilization Division）。亨德森寻求来自在经济关键领域厂商的不提价的自愿协议，一个成效甚微的政策。物价继续上涨。1941 年 4 月，罗斯福通过设立价格管理和民用补给办公室（Office of Price Administration

and Civilian Supply，OPA）以增加亨德森的人手。最后，OPA 成为普通美国人最熟悉的民用机构，因为它制定价格并确定每天消耗的货物和服务的数量。经济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在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指导下的 OPA 价格司的设立。在战后时期，加尔布雷思成为自由主义观点的主要倡导者，该观点认为，美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可以通过扩大联邦政府的作用来解决。毫无疑问，他在 OPA 的经验，以其巨大的（在他看来有利的）对经济的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想法。

最初，OPA 希望通过仅在选定行业应用管制来控制物价总水平，但不受控制的价格继续上升，并且速度越来越快。在 1942 年 4 月，OPA 出台了《最高价格通用规管法》（General Maximum Price Regulation），这一法案被亲切地称为《通用最高法规》（General Max），它给大多数价格制定了上限。不过，即使这项措施也并没有完全奏效；一个问题是，每个卖方负责根据政府设立的规则来制定自己的价格。这对于一个公司来说，通过指向一个异常高的基期价格或由一个竞争者制定的异常高的价格来证明其收费价格是公道的，这完全是太容易了！有效的价格管制要求 OPA 设定具体的美元－美分的价格，这样其雇员或志愿价格观察员委员会就可以对价格进行检查。

1943 年 4 月，罗斯福总统颁布了著名的“持平”命令要求 OPA 拒绝所有的涨价请求，除非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在经济上令人怀疑，因为它没有提供相对价格的调整，但在舆论的法庭上容易做出辩护，在战争的剩下时间里出奇地有效。从 1943 年 4 月直到 1946 年 2 月当这项政策开始失效时，官方统计的消费者价格指数每年仅上升 1.6%。

隐藏的价格上涨和黑市

但是，仅官方指数并没有揭示全部情况。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是如果设定的价格上限低于自由市场的均衡价格，对供给的争夺战将会出现，这将产生规避价格上限的企图。在战争期间有无数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规避采取品质劣变（quality deterioration）的形式：脂肪被加入汉堡，粗织物取代精细织物，减少租金控管公寓的维修。品质劣变能用规定了产品的确切内容的法规来限制，如牛奶脂肪含量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往往越来越长，并成为它们本身的问题。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一个于 1943 年辞职的 OPA 官员卢·马克森抱怨他在 OPA 视为反商业气氛的事情。马克森的许多指控被夸大了，但他用来渲染其指控的一份详细说明水果蛋糕含量的 6 页的条例涉及真正的问题。

“强制升级”（forced uptrading）是价格管制造成的另一个问题。战前，制造商通常给买家提供在低价低质商品和高价高质商品之间的选择。在通常情况下，高价的产品线有较高的利润空间，但以较小量出售。随着各行各业的战时需求超过了供给，制造商淘汰了价格较低的产品线。这对那些无论如何希望上升到高价产品的消费者来说很好，但对于那些被迫购买高价东西的人来说，他们愿意支付的高价产品和因为低价产品线被淘汰他们被迫支付的高价产品之间的差异是隐藏的价格上涨。

不是最频繁但最令人吃惊的规避形式是黑市。在这里，愿以高于官方价格购买的买家和愿意销售更多的卖家将远离 OPA 窥视下进行交易。黑市采取了多种形式，取决于产品和 OPA 正在进行的执法工作。在纽约，有不少“地下肉店”，很像地下酒吧，那些地方在禁令期间繁荣发展，人们可以在那里购买额外的肉类，但价格远高于 OPA 设定的价格。在战争结束汽车生产恢复后，规避汽车价格管制的现象非常普遍。其中一些就发生在经销商的展厅里，其中现金付款往往在暗地里进行，而官方文件显示该车已以 OPA 的价格上限出售。一个真正的黑市也形成了。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利斯维尔，最近从经销商处购买的数量庞大的汽车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要以黑市价格转售。

配给制

当价格被控制在低于自由市场均衡价格时，配给是一种减少规避的方法。比起处于没有任何用品留下来可疯狂争夺的危险中的消费者来说，至少保证有最小量商品可供消费的消费者进入黑市的可能性较小。此外，必须将它已售出的产量相对应的配给票显示给当局的公司将发现更难以将物资转移到黑市。在某些情况下，进行定量配给是为了实现特定的政策目标。例如，实行汽油配给以减少汽车和卡车轮胎的使用，这两者因为橡胶短缺供不应求。[①] 配给的最简单形式是票证，票证持有人有权购买一定数量的某种物品，但购买物品时必须交出票证。第一个实行配给的商品——轮胎，就是以这种方式处理的。但是，根据对肉类和油脂的红点制度（red-point system），消费者被定期提供一定数量的点数。每种商品都被分配了一个点价格，而消费者可以从不同的配给物品中选择，只要他或她有足够的配给点数。

平衡商品的供给和配给票或点数的数量是不容易的事。为了使红点制度运作更顺畅，OPA 发行了可作为找零或储存到日后使用的红点代币。到 1944 年底，调查表明，消费者已经积蓄了大量代币，而 OPA 担心这会使得商店的货架被清空并动摇人们对配给方案的信心。为了重新获得控制，OPA 取消了所有未支付的代币，此举使 OPA 失去了大量的公众支持。1945 年，随着战争接近尾声，大多数配给方案也已停止，这是一个广受欢迎的决定。

当授权价格管制的立法于 1946 年 6 月到期时，国会通过了一部新法律。它是如此的漏洞百出，以至于美国总统杜鲁门将它否决，希望一个强大的通货膨胀剂量将迫使国会通过一项严厉的措施。最后，通过了允许对选定的价格重新控制的立法。当肉类价格被重新控制时，大牧场主不把他们的动物送入市场——毕竟，很显然价格管制即将被淘汰，而价格只会越来越高——其结果是肉类短缺。一方面要面对愤怒的消费者，另一方面是他对美国的牛群实行国有化的建议，杜

① 在少数情况下，配给计划的目标是有争议的。一个广为宣传的脂肪救援方案导致消费者认为脂肪是制造对战争很重要的化学物品所必需的。真正的动机是肥皂制造商害怕脂肪短缺会导致肥皂配给，从而导致在战争期间习惯了节约使用肥皂的消费者在战后将继续减少购买。

鲁门决定永久终止价格管制。

战时繁荣？

如果我们看看人均实际 GDP 的图，如图 25—1 所示，战争年代作为一个独特的成就引人注目。显然，战争期间实际人均收入比它之前或以后更高。这些统计数字与个人记忆和挑出战争年代作为一个独特的繁荣时期的战争的历史记载相符。[①] 然而，罗伯特·希格斯最近质疑对战争的这一看法，并声称战争不是一个独特的繁荣时期，但实际上，它是一个持续的萧条时期，而真正的繁荣直到战争结束后才重现有几个原因。换句话说，希格斯断言图 25—1 如此雄辩诉说的故事是假的。经济推理命题 5（证据很重要）在这里很合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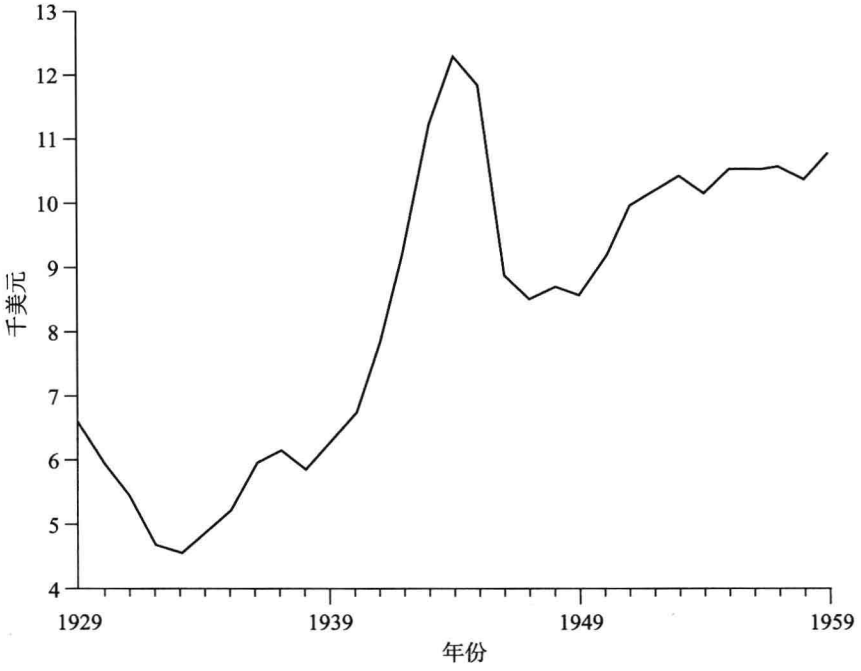


图 25—1　实际人均收入，以 1987 年美元计算

官方估计的实际人均 GDP 于 1944 年达到显著的峰值。但我们真的能用战争期间的经济产出与战前或战后的产出相比吗？

资料来源：U. 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National Income and Product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Volume 2，1959—1988.

首先，希格斯指出，如前所述，价格管制和配给所产生的不少问题，对战争

① Studs Terkel，*The Good War：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New York：Pantheon Books，1984）。这本书淋漓尽致地汇总了来自范围很广的美国人群体的战争回忆。

期间有问题的产量尤其是民用消费量进行测量。如果因为他们遗漏了隐藏的价格上涨或因为配给商品的价格低估了获得它们的难度导致价格指数被低估，那么产出将被夸大。希格斯还指出，战争产出没有直接促进消费，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未来。在他看来，战争产量应完全从 GDP 中略去。

人们可以质疑希格斯的论点。战争期间隐藏价格上涨幅度的任何测量必将有一个大的误差幅度。旨在躲避税务员或物价员的观察的价格上涨只能以迂回的方式进行猜测或估计。希格斯的战争产量应该从 GDP 中略去的主张也是值得商榷的。毕竟，我们包括诸如医疗保健等类别，提出了许多同样的在 GDP 方面的问题。一场癌症手术，像对一个确定的敌人打仗一样，是昂贵且痛苦的。事实上，我们经常使用同一种语言："他与癌症抗争以夺取生命。"癌症手术和战斗是良好投资，因为它们保护我们将来享受生活的能力。

不过，希格斯的争论确实有助于我们了解"战时繁荣"的本质。对于很多人来说，和大萧条的赤贫相比，这场战争确实意味着目前实际消费的增加。对于其他人，不可能的事情不是战争期间的消费，而是只需提出要求便能得到的就业岗位，通过它人们可以赚钱，这将使未来的几年有价值，即使由于短缺和配给导致在战争期间无处花费。

战争期间的劳动关系

战争使劳动关系搁置。罗斯福政府一直支持劳工组织、集体谈判和罢工的努力；如今劳工被期待配合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劳工承诺不罢工，与管理层的不关厂承诺（no-lockout pledge）类似。在大多数情况下，劳工信守其承诺。主要的例外是在其超凡领袖约翰·L·刘易斯领导下的矿工联合会。因为公众对煤田罢工表示愤慨，1943 年国会通过了《史密斯-科纳利战争劳动争议法案》（Smith-Connally War Labor Disputes Act），其中规定了由政府接管因罢工受阻的重要军工厂。然而，尽管如此，通过劳工的爱国主义和政府的特别权力，劳工和管理层之间的冲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般得以遏制。

真正的危机发生在战争结束时。随着工人的加班费消失和实际收入被价格上涨所侵蚀，劳工领袖受到争取增加工资的压力——没有斗争是不可能有加薪的。同时，在图 25—2 中生动显示的 1945 年和 1946 年的广泛停工使大部分选民疏远。

在此期间雇主抱怨，他们被卷入竞争工会的管辖争议而且劳工本身对不公平待遇感到失望。一种信仰在成长，即工会力量正在被用来侵犯个别工人的权利。事实上，雇主往往用罢工来迫使 OPA 准予价格上涨。当然，劳工意识到这一途径是对雇主开放的，而这也进入他们的罢工考虑。在许多情况下，OPA 声称可以在不准许价格上涨的情况下支付较高的工资，但阻力最小的路径往往是准许一个正经历罢工的行业一轮工资和价格的上涨。

在 1946 年共和党赢得国会控制权后，他们不失时机地制定一个长期的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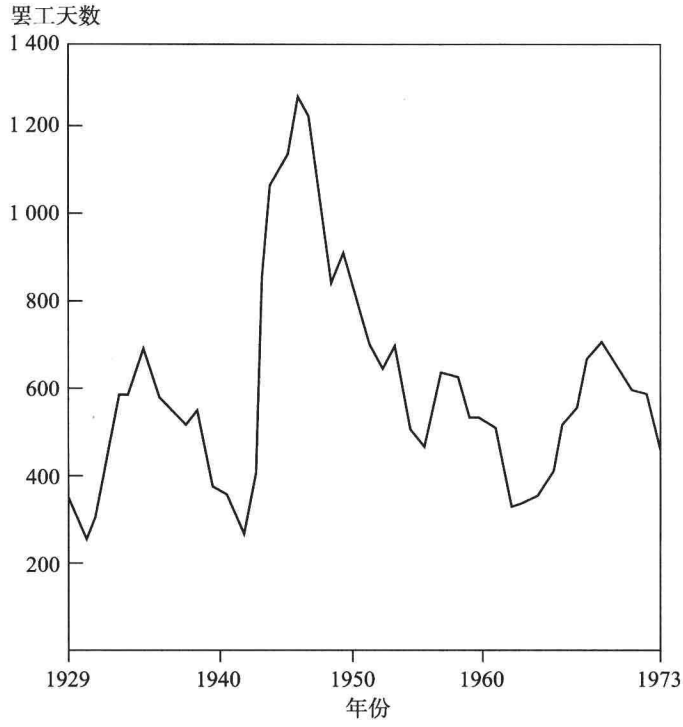


图 25—2　每千名非农雇员罢工天数的五年移动平均，1929—1973 年

资料来源：P. K. Edwards, *Strik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81—1974*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18.

性议案，这大大修改了《瓦格纳法案》。于 1947 年通过的对杜鲁门总统的否决不予理会的新法律，被正式称为《劳资关系法案》（Labor Management Relations Act），但其更为人所熟悉的名称是《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该法案反映了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公共政策保护的信念，不仅要保护他们参加劳工组织的权利，而且要保护他们不参加劳工组织的权利。雇主只雇用工会成员的封闭式工厂协议（closed-shop agreement）被依法取缔。准许非工会成员被聘用但要求他们在一定时间内加入工会的工会工厂协议（union shop agreement）是被允许的。然而，工会安全条款的执行仅限于会费拖欠的案件。更重要的是，法律允许各州取缔一切形式的工会安全，包括工会工厂协议。

与《瓦格纳法案》不同，《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假定工会和工会人士的利益并不相同，同时认为，许多工会成员是劳工老板的“俘虏”，其立场冒犯了很大一部分隶属工会的工人。

《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最重要的特征是那些声称因公众利益而规范工会的特征。寻求认证或请求调查不公正劳资行为的工会必须服从其内部事务通过提交报表的详细审查。罢工的权利被合同终止通知后的冷静期（cooling-off period）条款修改，而且美国总统被授予通过强制令推迟罢工 80 天的权力。更重要的是取缔某些不公平的工会行为。自 1947 年以来，工会的以下做法是违法的：

(1) 就其有权参加或不参加劳动组织限制或强迫员工，或为了集体谈判或调整不满的目的在选举雇主代表时加以限制或强迫。

(2) 造成或企图造成雇主歧视雇员。

(3) 根据工会工厂协议，收取过高的会费。

(4) 当涉及的工会是认证的谈判代理时，拒绝与雇主集体谈判。

(5) “任闲职”——也就是说，导致该雇主对未执行的服务做出支付。

(6) 参与或鼓励员工参与罢工，旨在强迫一个雇主停止与另一个雇主进行交易（间接抵制）。

经过 12 年的几乎完全自由之后，劳工发现《塔夫脱-哈特利法案》是具有很强的限制性的。人们发出了关于美国工联主义未来衰落的警报。劳工的领导被该法案攻击性的语言和惩罚性的精神激怒。但是，其中已出版的许多规定看起来比他们在实践中证明的更糟。例如，禁令条款激起了人们对当法院应私人的请求准予禁令的日子的回忆；然而，由美国总统控制，在紧急情况下可采取行动，因而禁令已不再是毁灭性武器。此外，虽然工会问题今天仍然存在，它们的出现主要源于《塔夫脱-哈特利法案》以外的根源。

少数族裔的战时经历

第二次世界大战无论如何已经对所有美国人产生了重大影响。它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几个特殊群体。例如，妇女进入劳动力来填补由士兵留下的职位空缺。参见视角 25.1。对日本裔美国人的拘留给他们造成了巨大的苦难。战时繁荣加快了贫困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从南部农业迁出的长期运动。这两个群体都回应了类似的经济生活事实。总共有将近 100 万名黑人从南部农场搬到位于南方、东北、中西部地区和太平洋海岸的工业中心。[①]

非洲裔美国人口的流动有显著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 1940 年，非洲裔美国人口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约各占一半；在 1950 年，他们主要分布在城市。这次农村人口外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60 年代继续。到 1970 年，有 3/4 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城市地区。非洲裔美国人口城市化对民权运动及结束法律歧视有着重要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场运动开始于战争期间。

军队在战争期间仍然实行种族隔离，但在 1940 年，军官候选学校（除了空军）废除了种族隔离。此外，由非洲裔美国人战士创造的优秀记录和不断增长的由非洲裔美国人团体争取司法公正的需求一起，促成了杜鲁门总统在 1948 年发出废除军队种族隔离的行政命令的决定。在大后方也取得了进展。1941 年 2 月，A·菲利普·兰道夫——卧车列车员兄弟会（Brotherhood of Sleeping Car Porters，BSCP）的领导，组织了一次向华盛顿示威以抗议在国防工业的歧视的游行。罗斯福政府说服兰道夫团体取消游行以交换一项行政命令，禁止在国防建设

① Harold G. Vatter, *The U. S. Econom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127.

中的歧视并成立了公平就业实践联邦委员会。该委员会尽管缺乏执法权力，但同雇主一起结束歧视。威廉·柯林斯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努力对非洲裔美国人在与战争有关的行业的就业水平产生了积极影响，而在这些行业中的继续雇佣与对黑人重要的工资溢价有关。而且，公平就业委员会必须在有暴力隐患的环境下工作。白人—非洲裔美国人暴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频繁，但1943年初夏，在底特律附近的暴力突发导致25名非洲裔美国人和9名白人死亡。

一个最严重的种族偏见的例子发生在1942年。有大约11万名日本裔美国人（其中75 000名是公民）被迫离开他们在西海岸的家园并被安置于拘留营一直到1945年。许多人被迫以“大甩卖”的价格卖掉农场和其他企业，因此被剥夺了几十年来建立起来的财产。与此同时，日本裔夏威夷人和日本裔美国人在军队里表现突出，在意大利战场上英勇战斗，在太平洋战区担任翻译官的任务。1988年，美国国会正式道歉并支付给被拘留的每一个幸存者2万美元作为赔偿。

战争期间的农业

随着需求的扩大，农业生产借助于特别好的天气以每年5%的惊人速度增长。这个数字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1.7%的年均增长率相比。战争期间的价格管制使得对农业商品没有对非农业商品那么有效；因此，在战争期间农产品价格要比农民必须购买的商品上升得更快。

在1942年，人们强调刺激特殊种类的产出特别是肉类和油料以及避免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价格暴跌的必要性。1942年10月的立法为战争期间和战后两年安排了最后的政策。1942年法令规定最低支持率为基本商品平价的90%；这些支持价格要继续生效整整两年，从战争正式结束后的1月1日开始。农产品的价格上限被设为最高是平价的1.1倍。

但是，棉花支持价格被设为平价的92.5%。生产长绒棉（与战争有关的许多用途都需要它）的工人可免除兵役。[①] 农业部长可酌情决定，如果他认为较高的价格将限制为牲畜提供的饲料数量，他可将小麦和玉米支持价格设为平价的85%。注意到棉花和牛肉利益与国会议员挂钩，其中一些议员已靠资历升至有权势的职位，这并非完全不相关。

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的前两年，一般不要求价格支持。由于大多数产品的巨大需求，农产品价格倾向于推动它们的上限价格。对于一些肉类和奶制品，为了“维持现状”打击通胀，甚至有必要降回到零售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为防止农民获得的最低价格下降，肉类加工业务批发商和乳品店获得补贴，其金额等于出

① Rachel Maines, “Twenty-Nine Thirty-Seconds or Fight: Goal Conflict and Reinforcement in U.S. Cotton Policy, 1933—1946,” in *The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售的每单位产品的价格回落。

视角 25.1

铆工罗茜

战争期间的一个最显著的发展是妇女在劳动力中的作用变化。约有 20 万名妇女进入军事部门。她们主要任职于陆军妇女队（Women's Army Corps，WAC）和志愿紧急服役妇女队（Women Accepted for Volunteer Emergency Services，WAVES），并有少量在海军陆战队（Marine Corps）、海岸警卫队（Coast Guard）和妇女辅助渡运队（Women's Auxiliary Ferrying Service）。妇女也大量进入了平民劳动力。许多妇女开始从事战前由妇女担任的工作，但许多其他人正如“铆工罗茜”所象征的那样，开始从事传统上由男性做的工作。妇女成为工具制造者、起重机操作员、伐木工和装卸工人。大约 14%在珍珠港事件前已经不在有偿劳动力之列的女性开始工作。[a]

“钻探工黛比”有助于战争期间生产线保持运转。

高工资以及报效祖国的愿望鼓励妇女参加工作。政府的宣传促使妇女从事工业劳动以帮助供应战胜轴心国所需的武器。这种宣传也鼓励妇女认为这些就业机会是临时的，战争结束后要还给归来的士兵们。

妇女的劳动力参与在整个 20 世纪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期上升趋势，但战争的十年作为一个特别快速发展的时期而显著突出。1940 年，只有 13.8%的已婚妇

女参加有酬劳动。1950 年，该数字为 21.6%，劳动参与率的年增长率为 5.65%——比任何其他 10 年都要大的增幅。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战争带来的态度改变的结果。暂时（他们或其他人可能以为）参加工作的妇女对有偿劳动以及一些有用的技巧乐此不疲，这鼓励她们在战争结束后继续留在劳动力中。而且，有些雇主由于看到妇女在传统上属于男性的工作岗位上表现良好，可能改变了他们对职业妇女生产力的看法。

我们不应妄下结论认为在战争期间或在以后的几十年发生的所有变化是妇女在战争生产工厂中工作的结果。克劳迪亚·戈尔丁最近的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变化甚至比战争所带来的态度变化更重要。[b]

对战争 10 年间的女工进行抽样调查，戈尔丁发现超过半数的在 1940—1944 年（高峰年）间进入有偿劳动力中的罗茜们到 1950 年已经退出。许多人由于优待退伍军人的资历规则和社会压力失去了工作。其他人选择离开是因为经济情况允许她们这样做。

虽然许多女工在战争结束后离开了工作岗位，其他妇女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决定成为劳动力。总体而言，戈尔丁发现，大约一半在 1940—1950 年成为劳动力的妇女是战争期间进入并在战后继续工作的女工，是在战争期间没有工作的妇女但在战争结束到 1950 年之间成为劳动力的。

哪些因素使得妇女在战争刚结束那几年成为劳动力？其中之一是对女工的需求不断增长。充分就业意味着对所有类型劳动的更多需求，而雇用许多妇女的文职部门增长得尤其迅速。

表 25—5 显示了在 1940 年至 1950 年之间妇女担任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文职和销售工作占就业增加的 47%，其重要性很显然。

教育的增加也有助于妇女胜任更多的工作。由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低生育率，年轻未婚妇女的供应在萎缩，而由于在战后时期家庭组成的增多，年轻已婚妇女的供应也在下降。

这些变化使市场向年龄较大的已婚妇女开放。到 1950 年，这些根本力量已经推动了妇女的劳动人口参与率高于战时高峰值，尤其是年龄较大的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

表 25—5　　1940 年和 1950 年妇女担任的岗位数（千）

职业	1940 年	1950 年	增加百分比（%）	占总增加百分比的比例（%）
专业人员、技术人员	1 608	2 007	399	8.25
经理、职员、老板	414	700	286	5.91
文职人员	2 700	4 502	1 802	37.26
销售人员	925	1 418	493	10.19
手工劳动者	2 720	3 685	965	19.95
女工匠、女工头	135	253	118	2.44

续前表

职业	1940 年	1950 年	增加百分比（%）	占总增加百分比的比例（%）
熟练工人	2 452	3 287	835	17.27
体力劳动者	133	145	12	0.25
佣人	3 699	3 532	−167	−3.45
农场工人	508	601	93	1.92

a. 出人意料的是，大约 34%的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一直工作的女性在战争期间却离开了岗位。丈夫或其他家庭成员工资的增加以及家庭雇工的数量减少可解释这一现象。

b. Claudia D. Goldin, "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in the Rise of Women's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991): 741 - 756.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132.

战争使商品信贷公司摆脱了 1939—1941 年期间建立的严重的存货负担。由商品信贷公司提供的贷款很小，虽然在 1944 年购买鸡蛋的需求如此巨大以致引起尴尬。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及军事政府的外需和意外高的国内需求导致了战后十分有利的价格，并减轻了商品信贷公司的贷款和购货承诺。事实上，与许多专家的预测相反，对粮食、饲料和棉花的需求在战后特别高。1946 年夏季价格管制被取消允许所有价格迅速上升，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比其他领域更快。对农作物的大多数生产限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取消，而到 1948 年春天，只有烟草和马铃薯仍受管制。

复员和转业

萧条会复燃吗

人们普遍预期一旦战争结束，大萧条就会死灰复燃。毕竟，似乎在战争期间巨大的政府开支水平是唯一让美国摆脱萧条的事情；削减开支，经济会重新回复到萧条。许多甚至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这种分析。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因此迫切要求政府做出战后保持高就业水平的承诺。其结果是 1946 年《就业法》的通过。

联邦政府的责任是为了“促进最大限度的就业、生产和购买力”。形容词“最大限度的”是故意含糊其辞，但整个声明被普遍理解为如果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威胁，政府将迅速采取行动以振兴经济。具有足够多的专业工作人员的经济

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被添加到了总统行政办公室（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总统在该委员会的协助和指导下，每年至少向国会提交一份对目前经济状况的报告，并提出对立法行为的建议。该法规还规定，众议院和参议院要组成一个常设的联合经济委员会（Joint Economic Committee），它将研究总统和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举行听证会，并转而向国会报告。虽然未提供“投资基金”，但成立了一个监督机构以让国会和总统系统地了解经济变化。作为一项折中的法案，该法规承认了政府在维持充分就业方面的作用但没有说明政府将如何防止萧条。

预期的萧条并没有出现。在战争期间，人们已累积大量的金融资产，尤其是货币和政府债券。他们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他们在战争期间无法购买耐用消费品，部分是因为他们在为他们认为摆在面前的萧条时期储蓄。一旦战争结束，这些储蓄造成了需求的激增，这促成了价格在战后的崛起以及来自军队和国防工业的工人重新融入和平时期的劳动力。

《美国军人权利法案》

政府政策在解决军人过渡成为劳动力方面也发挥了作用。所谓的《美国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 of Rights）为退伍军人提供了许多福利。这项立法使许多退伍军人推迟再次成为劳动力的时间，并向他们提供提高技能的机会。

针对退伍军人的规划以认真的方式开始，罗斯福总统任命了战后人力统筹委员会（Postwar Manpower Committee），它在1943年6月发表了一份报告，建议为退伍军人提供慷慨的福利计划。受退伍军人组织（Veterans of Foreign Wars）和美国退伍军人协会（American Legion）推动，国会除了美国人对军人牺牲自己保卫人民的简单的感激之情之外，由于多种原因也倾向于慷慨对待退伍军人。当时有一种普遍看法，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员工作做得很糟糕，退伍军人未得到善待。也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及加拿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例子。最后，有人担心战后大萧条会重来，而如果没有足够的一揽子退伍军人福利，退伍军人将直接从“战线”到“生活线”（bread lines）。由此产生的法律——1944年《军人再调整法》（Servicemen's Readjustment Act of 1944）自此就因其常用的名字《美国军人权利法案》变得广为人知。《美国军人权利法案》提供了广泛的福利，包括退伍金、医疗保健、就业援助、低利率购房、农场或商业贷款、失业救济金、再就业权利、就业优先权和教育福利。

《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教育条款被认为是最具革命性的立法。除了其他教育福利，《美国军人权利法案》还为退伍军人提供上大学的学费、杂费和生活费。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结果，高等教育的入学人数在战后激增。《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影响力在1947年达到高峰，当时有约170万名退伍军人被录取，占全体学生的71%。（越战时期在1977年高峰期有约200万人。）不能把战后时期美国年轻人上大学比例的提高都归功于《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第二

次世界大战老兵退伍很久以后招生持续增长，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继续上升。对高等教育的强调是发生在20世纪早些时候的高中运动的自然产物。但是，《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确实在发动高等教育的战后扩张上发挥了作用。它表明，来自各种背景的美国人都能在大学校园取得成功。它也变革了许多高等院校。例如，现为新泽西州立大学的罗格斯大学，须聘请教授并学习“大批量生产”教育以适应退伍军人。

根据《美国军人权利法案》，退伍军人选择他或她想上的学校，学校决定是否录取这名退伍军人。学校必须得到认可，但该法案明确禁止政府对录取过程或教育的其他方面实施任何直接管制。简言之，它是一种“凭证”制。教育凭证制的当代拥护者列举《美国军人权利法案》的成功作为证明教育凭证制可靠性的证据。这无疑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当然，这种情况是不寻常的，因为退伍军人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成熟人群。这个例子不能被忽视，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作为教育券的案例。

消费社会的诞生

战后的需求激增迎来了一个新的消费者导向型社会，对于一些人来说，它代表了美国梦的实现，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它代表不假思索的物质文化的产生。建筑商如Levitt and Sons利用在战争期间开发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为战争工人提供住房，使其适应大规模生产的郊区住宅，甚至创建整个新社区，如纽约的莱维敦。得到来自联邦住房管理局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预付款的援助，建筑商们给退伍军人和其他买主提供了非常优惠的条件。

民谣歌手马尔维娜·雷诺兹在一首受欢迎的民歌中表达了许多批评者对新的“大片”房屋的感受：

> 山坡上的小盒子，粗制滥造的小盒子，
> 山坡上的小盒子，完全一样的小盒子，
> 有一个绿色的，有一个粉红的，有一个蓝色的，有一个黄色的，
> 它们都是粗制滥造的，它们看起来都一样。①

新建筑技术的捍卫者认为，通过实现长期生产运作经济，建筑商能够降低房屋的单位成本从而使市民能买得起房。但是，谁也不能将这放入一首持久的民谣。随着出生率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猛增，这些年来见证了“婴儿潮”的开始。紧随士兵与他们的亲人团聚不久后的婴儿潮形象是浪漫的，而且无疑在许多个案中是有根据的，但婴儿潮是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它一直持续并于20世纪50年代末达到高峰。

总之，这场战争迎来了一个数百万名美国人首次能够分享中产阶级的生活方

① Malvina Reynolds, “Little Boxes,” in *The Ballad of America: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Song and Story*, ed. John Anthony Scott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 378 - 380.

式的时期。为退伍军人提供的政府方案，如《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也有些帮助，但关键因素是没有发生的事情——20世纪30年代不景气的经济状况的恢复。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arro, Robert J. "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 to Fiscal Policy." In *Modern Business Cycle Theory*, ed. Robert J. Barro.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8-235.

Blum, John Morton. *V was for Victory: Politics and American Culture during World War II*.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7.

Bowles, Chester. *Promises to Keep*.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Broom, Leonard, and Ruth Reimer. *Removal and Return: The Socio-economic Effects of the War on Japanese-American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49.

Buchanan, A. Russell. *Black Americans in World War II*. Santa Barbara, Calif.: Clio, 1977.

Cain, Louis, and George Neumann. "Planning for Peace: The Surplus Property Act of 194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March 1981): 129-135.

Caruana, Leonard, and Hugh Rockoff. "A Wolfram in Sheep's Clothing: Economic Warfare in Spain, 1940—1944."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3 (March 2003): 100-126.

Catton, Bruce. *War Lords of Washington*.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8.

Chandler, Lester Vernon. *Infl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48*. New York: Harper, 1951.

Clinard, Marshall B. *The Black Market: A Study of White Collar Crime*. New York: Rinehart, 1952.

Collins, William J. "African-American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1940s: A Portrait from the Palmer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September 2000): 756-781.

——. "Race, Roosevelt and Wartime Production: Fair Employment in World War II Labor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March 2001): 272-286.

Conrat, Maisie, and Richard Conrat. *Executive Order 9066: The Internment of 110,000 Japanese-Americans*. San Francisco: California Historical Society, 1972.

Eiler, Keith E. *Mobilizing America: Robert P. Patterson and the War Effort, 1940—1945*.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e Dwight D. Eisenhower Library and Museum. http://www.eisenhower.utexas.edu.

Friedman, Milton. "Price, Income and Monetary Changes in Three Wartime Peri-

od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y 1952): 612 - 625.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chapter 10.

Galbraith, John Kenneth. *A Theory of Price Contro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 *A Life in Our Times*. Boston: Houghton Mufflin, 1981.

Gemery, Henry A., and Jan S. Hogendorn. "The Microeconomic Bases of Short-Run Learning Curves: Destroyer Production in World War II." In *The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Glenn, Norval D. "Changes i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and Occupational Gains of Negroes during the 1940's." *Social Forces* 41 (1962): 188 - 195.

Goldin, Claudia D. "The Role of World War II in the Rise of Women's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1 (1991): 741 - 756.

Goldin, Claudia, and Robert A. Margo. "The Great Compression: The Wage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at Mid-century."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7 (February 1992): 1 - 34.

Gordon, David L., and Royden Dangerfield. *The Hidden Weapon: The Story of Economic Warfare*. New York: Harper, 1947.

Gordon, Robert J. "45 Billion of U. S. Private Investment Has Been Mislai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9 (June 1969): 221 - 238.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from World War II. http://www2. smu. edu/cul/ww2/title. htm.

Harrison, Mark, 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Issue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Mixed Econom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 "Wartime Prosperity. A Reassessment of the U. S. Economy in the 1940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1992): 41 - 60.

——. "Private Profit, Public Risk: Institutional Antecedents of the Modern Military Procurement System in the Rearmament Program 1940—1941." In *The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Hoopes, Roy. *Americans Remember: The Homefront: An Oral Narrative*. New York: Hawthorne, 1977.

Janeway, Eliot. *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 A Chronicle of Economic Mobilization in World War II*.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1.

Kuznets, Simon. "National Product War and Prewar." New York: National Bu-

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Occasional Paper 17, 1944.

Lane, Frederick C. *Ships for Victory: A History of Shipbuilding under the U. S. Maritime Commission in World War II*.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1.

Maines, Rachel. "Twenty-Nine Thirty-Seconds or Fight: Goal Conflict and Reinforcement in the U. S. Cotton policy, 1933—1946." In *The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lls, Geofrey, and Hugh Rockoff, eds. *The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Millward, Alan S. *War, Economy and Society, 1939—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exhibit "A People at War." http://www. nara. gov/exhall/people/people. html.

National Historic Chemical Landmarks Program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The United States Synthetic Rubber Program, 1939—1945. http://www. acs. org//landmarks/rubber.

Numerous documents related to the war maintained by The Avalon Project at the Yale Law School. http://www. yale. edu/lawweb/avalon/avalon. htm.

Nelson, Donald M. *Arsenal of Democracy: The Story of American War Produc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46.

Novick, D., M. Ashen, and W. C. Truppner, *Wartime Production Contr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9.

Overy, Richard J. *Why the Allies Won*. London: Jonathan Cape, 1995.

Polenberg, Richard, ed. *America at War: The Homefront, 1941—194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Rockoff, Hugh. "The Response of the Giant Corporations to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World War II."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1 (March 1981): 123 - 128.

——. *Drastic Measures: A History of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Rupp, Leila J. *Mobilizing Women for War: German and American Propaganda, 1939—194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Smith, T. Lynn. "The Redistribution of the Negro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0—1960."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51 (1966): 257 - 263.

Terkel, Studs. *The Good War: An Oral History of World War Two*. New York: Pantheon, 1984. U. S. Bureau of the Budget, War Records Section. *The United States at War: The Development and Administration of the War Program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6.

University of San Diego Department of History, time line of World War II, http://history. sandiego. edu/gen/WW2Timeline/start. html.

Vatter, Harold G. *The U. S. Economy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Wilcox, Walter W. *The Farmer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Ames: Iowa State College Press, 1947.

Young, Roland. *Congressional Politic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第5部分
战后时代：1946年至今

经济和历史回顾：1946 年至今

1. 人们普遍认为会出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萧条并没有出现。经济学家将这一结果归功于维持高就业的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但是，通货膨胀在美国历史上首次成为一个和平时期的慢性问题。

2. 联邦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继续扩大，特别是在战后的第一个 30 年期间。1949 年，联邦支出总额为国民生产总值的 15%；在 1993 年，达到 22%。

3. 美国的经济结构在战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制造业和农业相对于服务部门在下降。

4. 在 20 世纪 60 年代，民权革命震撼了全国。通过政府和直接行动做出的努力，去争取妇女、非洲裔美国人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更大的经济进步。

5. 经济增长速度在战后前 20 年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抱怨对象，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生产率增长放缓和令人不安的社会恶化的迹象出现，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多。

6.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对政府干预经济的反应开始了。航空公司、银行以及其他部门解除管制；边际税率得以削减。1996 年，政府尝试改革福利制度。

第 26 章　美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本章主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的 30 年美国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是各级政府在规模和影响力上的继续增长，特别是在联邦一级。政府不仅支出的美元增长了，而且通过法律法规和官僚主义的决定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力也在增加。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这很有利。过去不稳定的自由市场经济已经被结合了市场的灵活性和政府控制的稳定性的“现代混合经济”取代。这一增长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此时越来越多对大政府的不满以及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威胁，导致保守派提出的减少开支和放松管制的请求取得成功。本章从广义上讨论政府职能扩张、原因以及最终的幻灭各个方面。

战后时代的政府规模

正如经济学推理命题 5 所强调的，对重要历史问题比如联邦政府扩张的看法，必须以证据为基础。在这里，我们探讨联邦政府扩张的三个指标：(1) 联邦总开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 (GDP)；(2) 联邦采购的货物和服务相对于 GDP；(3) 联邦就业相对于总劳动人口。研究所有这三项对于政府在战后时代的增长程度提供了一个具有细微差别的回答。

联邦支出

联邦政府总开支与 GDP 的比值如图 26—1 所示。由此可见，联邦支出相对于经济规模一直增长到 1980 年，此时达到 GDP 的 1/5。这是政府规模最常用的指标，但它只描述了部分情况。然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比例趋于平稳，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逐渐下降。

政府支出不仅包括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如回形针、坦克、水坝和最高法院法官和军队士兵的工资），而且还包括转移支付（如福利支出和给州及地方政府的补助金）。图 26—1 中的虚线不包括转移支付，只反映相对于 GDP 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额。联邦政府规模的这一衡量指标在朝鲜战争后普遍呈下降趋势。唯一明显的中断出现在越南战争期间和由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推动的军事集结期间。由于大量的经济活动发生在州和地方各级，将这些级别的趋势与联邦一级的趋势进行比较是很重要的。如表 26—1 上部的面板数据所示，在近几十年，州和地方级别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额（大多为警察、消防、教育等）超过了联邦一级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额。当我们观察所有级别的政府总开支的趋势相对于下面的面板数据（从而加上转移到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额），我们看到，这个比例到 1980 年左右一直在上升，但随后趋于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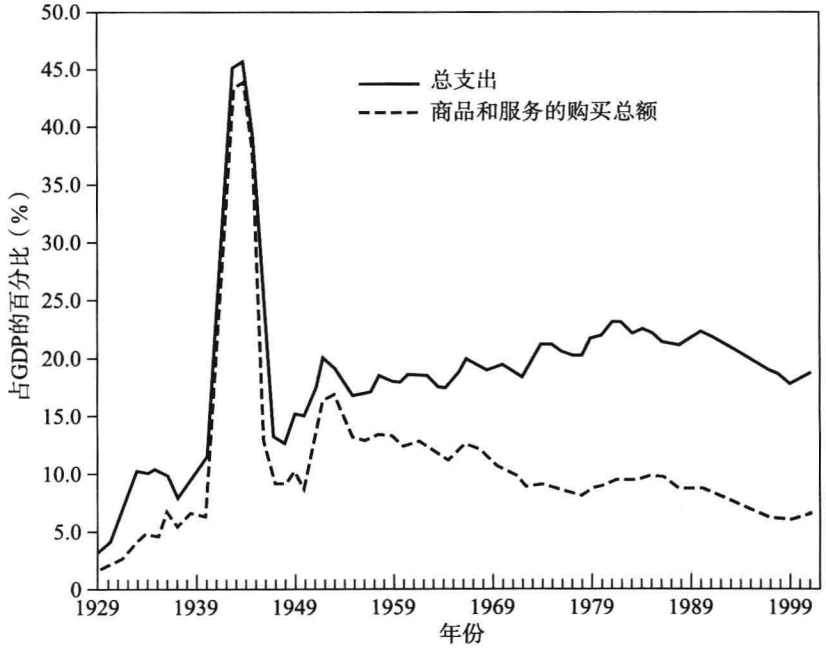


图 26—1　联邦政府规模的两个衡量指标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6) and various issues of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表 26—1　　各级政府的支出（%）

年份	联邦	州与地方	总计
	相对于 GDP 的商品和服务的购买额		
1940	6.3	8.6	14.9
1950	8.8	7.1	15.9
1960	12.5	9.1	21.6
1970	11.2	11.6	22.8
1980	8.8	11.6	20.4
1990	8.8	11.6	20.4
2001	6.2	12.2	18.4
	总支出相对于 GDP		
1940	9.9	11.1	20.2
1950	15.2	9.5	23.9
1960	18.4	11.6	28.7
1970	20.0	14.2	32.0
1980	20.6	11.0	29.1
1990	21.2	11.4	30.6
2001	19.2	12.8	29.3

注：联邦政府给州和地方政府的拨款从总计数中扣除，以避免重复计算。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C.：1975），series Y533，Y590，Y671，and 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various years. *See* http://www.access.gpo.gov/eop.

转移支付起初并没有耗尽 GDP。接受福利救济的人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但交税更多的人却买得更少了。事实上，因为我们大多数人接受的补贴和交税，实际上并不存在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例的上限；它可能会超过 100%。在任何一年，政府可以多次征税和转移相同的美元。但是，政府每次征税都会影响工作和投资的激励，而这些激励反过来又会影响 GDP。不过，收到政府补贴和支付税金相同的人却有激励去减少他们的税负。如果他们通过不那么勤奋工作或者将他们的资本投资在收益较小的用途去减税，经济的总产值将减少。（永远不要忘记经济推理命题 3：激励很重要，即使只有片刻！）

大多数经济学家同意这种对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的影响方向的分析，但在战后时期主要争议之一涉及这些影响的重要性。一些专家认为，反激励因素的影响并不重要，并指出，在美国以占 GDP 的比例来衡量的税收总额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似乎偏低，在这些国家工作的努力和储蓄似乎是令人满意的。例如，一个比较表明，在美国各级政府 1989 年税收总额占 GDP 的 30.1%。这与澳大利亚

(30.1%)、日本(30.6%)和瑞士(31.8%)大约相同,但低于加拿大(35.1%)、联邦德国(38.1%)和法国(43.8%)。[①] 但是,这种比较从来没有结论,因为许多其他条件并没有保持不变。也许从这些比较中获得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并不是只有美国趋向大政府。这适用于所有发达国家。

联邦就业

另一项常用的衡量联邦政府大小的指标是联邦就业占总就业的份额,如图26—2所示,它绘出了联邦雇员与平民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不包括军事和邮政服务)。该系列在20世纪30年代急剧增加,并在20世纪40年代再次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扩大)。总劳动人口中联邦劳动人口的份额上下波动,1980年以后下降。要记得,联邦政府扩张的动态元素是转移支付。这一扩张源泉并不意味着联邦官僚机构同样庞大的膨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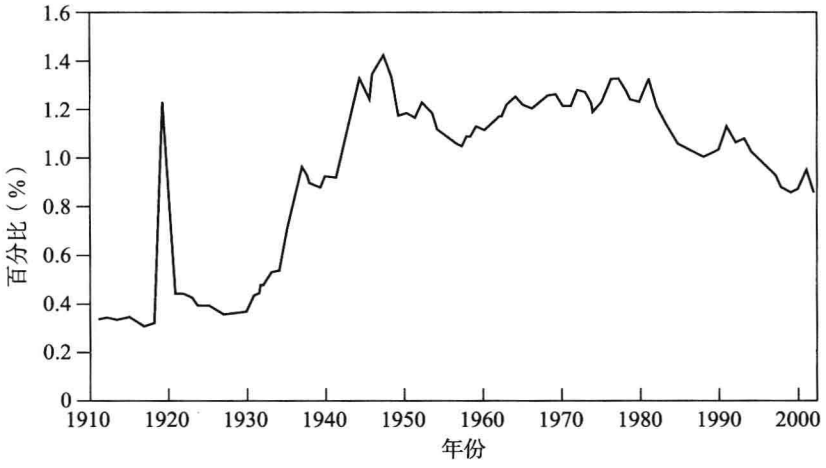


图26—2 联邦公务员雇佣人数占总劳动人口的比例,1910—2001年

注:从1950年至1980年,联邦劳动人口的增长比总劳动人口快些;但是,自1980年以来,联邦劳动人口增长减慢。

资料来源:*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issues.

在联邦预算案中的赢家和输家

在1949—1989年联邦预算过程中的最大赢家是那些收入保障(社会保障、联邦雇员退休和残疾保险、住房援助,等等),在1949年和1989年之间它每年

①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tied States: 1992* (Washington, D.C.: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1992), 836.

增长 11.6%，教育每年增长 13.0%，健康（医疗、保健服务、健康研究等）惊人地每年增长 16.3%。在同一时期，消费价格每年上涨约 4.2%，所以所有这些类别在实际上和名义上均增长迅速。事实上，在所有主要的预算类别中，只有退伍军人福利和国际事务在 1949 年很高（由于战争后遗症），却未能在战后时期比价格增长得更快。收入保障、健康和教育支出的扩大起因于新的计划，它旨在（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扩大不太富裕的人们的选择范围。

图 26—3 提供了战后时期预算优先事项是如何改变的鸟瞰。它显示了国防、收入保障以及保健作为联邦预算份额的开支。军费开支的增加主要是由于三次主要的军备增强。首先是与 20 世纪 50 年代初的朝鲜战争相关，第二次与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的第二次越南战争有关，第三次与里根政府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军事竞赛有关。收入保障上的支出随着福利资格的扩大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预算中获得了较大的份额。在保健上的支出，包括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在 1959 年不到 10 亿美元，随着各种福利资格的扩大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快速增加。[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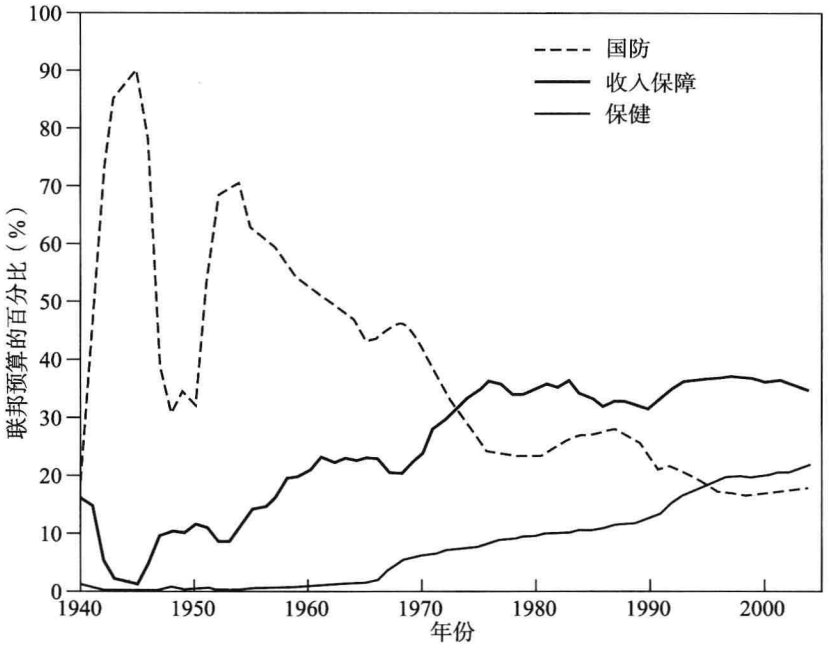


图 26—3　1940—2004 年联邦预算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www.access.gpo.gov.

回顾图 26—3，请记住总预算在增加，因此预算中国防支出的份额长期下降，并不等同于实际国防开支的下降。以不变购买力美元（1982 年美元）计算，国防开支从 1953 年的 1 660 亿美元降至 1960 年的 1 370 亿美元；然后，在 1970

① 虽然正如伊利诺伊的已故参议员埃弗里特·德克森所说的，“这里 10 亿美元，那里 10 亿美元，很快国库就会空虚。”

年恢复到2 040亿美元后，在1980年里根的军事竞赛前夕，它下降到1 520亿美元。到1991年，实际的国防开支高达2 510亿美元。这些庞大的开支（在1991年约为GDP的5.7%）是冷战的遗产，是美国为遏制共产主义的最终成功的尝试。

冷战对经济的影响是什么？对这个难题的答案取决于支出的哪些类别必须减至维持国防支出的高水平。政府其他类型的支出是否减少？私人消费？私人投资？迈克尔·埃德尔斯坦和罗伯特·希格斯所做的细心研究表明，国防开支的增加以牺牲私人消费为代价，而不是投资或非军事政府开支，这表明国防开支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很小。①

自由时代：1945—1976年，继续扩张

如何解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初30年美国联邦政府支出特别是转移支付的增长？关于政府恰当作用的公众态度的变化看似是关键因素。

回顾过去，我们可将战后时期划分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时代。没有精确的分界线可以给出。然而，很明显的是从战争结束，也就是说，1976年是一个自由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扩大政府的争论受到了来自广大市民的同情，在这个时代即使共和党总统也不得不迁就占主导的自由主义思想。然后，出于不同的原因——越南战争、经济增长放缓及通货膨胀情绪加速——情绪转向保守派。政治家，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必须回应公众对扩大政府开支的关注。

在自由时代，民主党人努力催促福利国家的扩张和其他新政改革，而保守派打后卫战，当他们能维持现状时拖延福利国家的到来，当他们不能维持现状时撤退到新岗位。战后的第一个总统，民主党人哈里·S·杜鲁门，赞成新政的大规模扩展。杜鲁门的方案，被他称为“良政”（Fair Deal），需要大范围的经济立法，包括《塔夫脱-哈特利法案》的废除、增加社会保障福利、较高的最低工资、住房的联邦补贴、联邦强制医疗保险和建设工厂以克服“短缺”的权力机构。②

他的方案的一些部分是现有方案的扩展和修改，被制定为法律——社会保障福利延长及最低工资提高，但新方案被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人的国会联盟阻止。特殊利益集团在游说国会反对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认为该项立法与其利益相违背。例如，美国医学协会大力游说反对杜鲁门的健康保险提案，他们将此指责为“公费医疗制度”的先驱。

一般来说，共和党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政府的管理哲学反对在经济领

---

① Robert Higgs, “The Cold War Economy: Opportunity Costs,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 (July 1994): 283-312; and Michael Edelstein, “What Price Cold War? Military Spending and Private Investment in the US, 1946—1979,”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1990): 421-437.

② 传统上每届政府用一个宏伟的短语总结其立法计划。富兰克林·罗斯福给了我们“新政”；哈里·S·杜鲁门的“良政”；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伟大的入侵”；约翰·F·肯尼迪的“新边疆”；以及林登·B·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域的新举措。该政府的座右铭“减少对企业的干预，增加政府的事务”总结了它的哲学，但现有计划周围已经形成了继续扩大的共识。例如，社会保障福利增加并扩大到更多的工人，最低工资从每小时 0.75 美元提高至 1.00 美元，更多的资金提供给住房，以及公路建设极大扩展提案的提出：双车道州际“高速公路”取代美国拥挤的单行道公路。

“小新政”

福利立法的突破发生在民主党人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肯尼迪的“新边疆”（New Frontier）与杜鲁门的“良政”相似，但在许多方面它并没有这么做。肯尼迪对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险胜几乎可以说是一个要求彻底改变的命令。

该方案要求为老人提供联邦医疗保险，资助教育，并为住房和“市区重建计划”提供更多的联邦资金。如同前任政府，现有的方案得以扩大。社会保障福利增加，最低工资从 1.00 美元提高至 1.25 美元（在四年期间），并使其适用于更多的工人，并按照他们承诺的，更多的钱被用于联邦住房项目。

该方案也有一些新的举措。对阿巴拉契亚和其他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的关注导致了《区域再开发法案》（Area Redevelopment Act）的通过，其中规定为企业提供低成本的贷款和培训职工的资金。其他法规为医疗教育、高校建设项目提供资助，以及给受联邦项目不利影响的地区提供救济。不过，肯尼迪为老人提供医疗保健和对公立学校提供联邦援助的提案失败。

此外，民权运动正在关注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困境。在大学校园，学生们被肯尼迪对大政府的信仰所吸引。一段时间，似乎约瑟夫·熊彼特的预言终于开始变成现实了——资本主义将被那些对已经创造了他们自身高标准的生活基础的体系失去信心的中产阶级的子女削弱。①

当林登·B·约翰逊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于 1963 年就职时，他宣布了“向贫穷开战”（War on Poverty）的意图。其结果是 1964 年《经济机会法》（Economic Opportunity Act of 1964）的通过，它在农村和城市地区创办训练营，为农民和小企业提供资助，并为社区的反贫困活动提供资金。1964 年，约翰逊总统以大多数选票再次当选；这次委任和约翰逊在华盛顿的长期经验，有利于他推动那些当时被视为“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计划的基础。

大范围的重要立法接踵而来。事实上，“新政”之后的立法独一无二，而且在某些方面，它甚至更激进。一个针对 65 岁或 65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方案（医疗保险制度）终于得以加入社会保障。用于阿巴拉契亚山区改善土地和公路及提供健康中心的 10 亿美元的款项得以投票通过。住房及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得以建立，它的领导是一个内阁级别的秘书。此外，一个新的住宅条例为穷人提供联邦租金补贴，是福利立法的新起点。最低

①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415 - 424.

工资——自由民主党派方案的常见部分，提高并扩大至覆盖农场劳动者、小型零售商店的工人及医院工作者。大众运输法案提供资金以改善铁路运输，而运输部（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第十二内阁级别的部门建立。这些和其他方面的改革充分地扩大了政府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

新法规

在19世纪，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法规旨在处理特定行业的具体问题，只有少数例外。州际商务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主要关注铁路线、卡车及水路运输工具收费价格的法规；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监管银行，等等。但是，在战后，各机构都成立了监管广泛行业的权力机构，涉及一系列广泛的问题。例如，在1970年，国会成立了职业安全和健康管理局（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Administration），制定在整个工作场所的工作条件标准。总统候选人罗纳德·里根后来引用这个机构颁布的易引发矛盾的企业管理规定，作为说明“政府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的例子。

战后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是旨在使消费者免于购买危险的或在其他方面不满意的商品和服务的主要法规的通过。消费者保护绝不是战后时期独一无二的事物。早在1838年，国会就批准建立了汽船检查局以检查汽船的安全性，但如表26—2所示，这种立法通过率在战后时期加速。

表26—2　　美国主要的消费者安全法，1900—1980年

年份	法律	主要条款
1906	《食品与药品法》	禁止食品与药物的掺假和伪造商标的行为。要求在产品标签上列出药的成分。
1906	《肉制品检查法》	规定联邦对于在州际之间运输肉类的屠宰、包装及肉罐头厂进行检查。
1938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	将含有一种对人体不安全的物质的任何食物或药品定义为掺假物品。要求引进新药物的申请要通过安全测试。
1938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惠勒-利修正案》	将《联邦贸易委员会法案》的禁令扩至“不公正或欺骗性的行为或做法”。
1953	《易燃织物法》	禁止生产、进口或销售“如此易燃以至于个人穿上是危险的”织物。
1958	《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食品添加剂修正案》	禁止使用已表明会使人类或动物致癌的食品添加剂。

续前表

年份	法律	主要条款
1960	《有害物质标志法》	要求对有害的家用物质做出标志。
1962	《凯法弗-哈里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修正案》	要求对新药的安全和功效进行额外测试。
1965	《烟草标志和广告法》	要求在香烟包装和在广告中使用健康警告。
1966	《正确包装与标签法》	要求列出产品含量和制造商信息。
1966	《儿童保护法》（1960年《有害物质标志法修正案》）	禁止销售有害的玩具或儿童使用的其他商品。
1966	《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	规定车辆及零部件和车辆召回的安全标准的制定。
1967	《易燃货物法（1953）修正案》	将联邦权力扩大至建立织物的安全标准，包括“家用”产品。
1970	《公共卫生吸烟法》	禁止播放香烟广告。
1970	《毒害预防包装法案》	规定有害物质的“儿童安全”包装。
1972	《消费者产品安全法》	成立了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有权设定消费者产品的安全标准和禁止呈现出过度危险的产品。
1977	《糖精研究和标志法》	要求对包含糖精的产品使用健康警告；推迟糖精禁用令。
1980	《综合性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超级基金）法》	为清理有毒废弃物堆放地提供基金。

该汽船检查局是在一系列爆炸使许多乘客和机组人员丧生后制定法律的。磺胺酏剂悲剧（Elixir Sulfonamide tragedy）之后有了1938年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出售的这种形式的药物被证明是有毒的，并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许多是儿童。但是，根据现行法律，该生产者仅仅被判为商品贴错标签罪。

《凯法弗-哈里斯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案修正案》（Kefauver-Harris amendments to the Food, Drug, and Cosmetic Act）紧随镇静剂灾难而制定。在欧洲，孕妇服用镇静剂导致了婴儿严重的先天性缺陷。类似的结果在美国很大程度上得以避免，主要是因为一个公职人员——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斯·凯尔西博士的果断行为，她抵制了准许该药物销售的巨大压力。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额外的法律保障，缺少这样一个坚定的监管者将导致悲剧的未来情况可能出现。

1953年《易燃织物法》（Flammable Fabrics Act of 1953）是另一个例子。这

部法案也紧随一些事故而来。应当注意，该行业没有抵制这项立法。通过能够证明其织物达到联邦安全标准，制造商希望增加需求，并为诉讼辩护提供基础。

然而，悲惨事件并不是全部情况。消费者保护法的通过也和自由派与保守派观点之间的公众舆论波动有关。要注意，在表 26—2 中有 8 部主要的消费者保护立法都是在 1965 年和 1972 年之间通过的，包括《正确包装与标签法》（Fair Packaging and Labeling Act）、《国家交通与机动车安全法》（National Traffic and Motor Vehicle Safety Act）和《消费者产品安全法》（Consumer Product Safety Act）。这一系列的立法活动与其说是与个人悲剧相关，不如说是对市场普遍缺乏信心。可是，后来，对政府改善市场力量的结果的能力的自由信仰被放在防守上。“里根革命”一贯反对联邦权力的扩展，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无较大的消费者法律获得通过，然而，按计划有一个医疗制度改革的大规模修正，尽管有政府的支持，修正未能获得反对它的市民支持。

权衡管制立法的成本和收益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经济学家甚至在个别法规方面都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更不用说整个趋势。管制的好处相对容易看到：消费者可能会受到保护，免于消费危险的食物、使用危险的药物或者驾驶危险的汽车。但管制也有成本：它可能会提高产品价格，由于需要给产品配置昂贵的补充或需要某公司搜集证据来证明其产品是安全的。管制也可能通过防止价格竞争来限制竞争，或通过提高引进新产品的成本来扼杀创新。例如，人们坚持认为制药业的管制已经限制了推向市场的新药物的数量。①

保守时代：1976—2000 年

20 世纪 60 年代是令人激动的时代。对于自由派，看来“新政”的承诺最终能够实现，一个快速增长的经济将提供解决贫困和机会不平等问题的资源。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20 世纪 60 年代是特别令人激动的时代：依据凯恩斯的充分就业政策能管理好经济。尽管新的福利和监管法规继续在这 10 年的剩余时间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初获得通过，有迹象表明，早在 1966 年，“小新政”正在失去影响。

1976 年吉米·卡特当选后，新的联邦措施将是寥寥可数。其根本原因是在越南长期而徒劳的战争所产生的对政府的幻灭感，提供与乐观的预测一致的福利的一些自由派方案的失败，以及经济表现恶化。生产率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加速，失业率保持在较高水平。有政府提供慈善，经济就能够轻松产生大量盈余的信念如今看来似乎很天真。

---

① 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个公正的文献综述，参见 Peter Asch, *Consumer Safety Regulation: Putting a Price on Life and Lim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hapter 7。

解除管制

前几年，民主党人吉米·卡特1976年的当选肯定标志着新一轮的新政立法，尽管卡特政府支持许多传统的民主党方案，但它强调经济和政府效率，且令人惊讶的是，它强调解除许多经济领域的管制。该政府认为，这些管制已不再被需要或立法的意图已被该立法希望控制的非常团体所破坏。

学术界早就认识到，监管机构往往被受管制行业“俘获”。公众将被某行业的滥用的披露唤醒，然后监管机构将被建立，工作人员最初是由响应公众利益或至少是对该行业持批判态度的人组成。但最终，公众的注意力会转向其他问题，只有受管制的行业自身会对谁被任命主持该监管机构以及该机构做出了什么样的决定保持兴趣。结果，很自然地，从长远来看，同情受管制行业的人们将获委任于管理机构，依据规定做出的裁定将是为了该行业而不是公众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这样的想法，卡特总统支持放开天然气价格，并放松对航空公司、卡车运输、铁路，以及金融服务业的管制，包括存款利率上限的取消。

阿尔弗雷德·E·卡恩，卡特任命的对航空公司解除管制的人，既是新时代的象征，也是新时代的主要参与者。[①] 卡恩从教育和情感上是一个自由民主党人，但他开始相信如果监管者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和边际成本定价给予更多的重视，那么总体利益将得到最好的维护。举个简单的例子，边际成本定价理论认为，飞机座位应以实际中多运送一个乘客的成本而不是以高平均成本定价。一度，当许多飞机座位空缺时，该行业的重要部门非常认同卡恩对边际成本定价的重视。

里根经济学

虽然卡特政府采取了若干改革，目的在于解除对市场的过度管制，但试图改变战后时期的基本思想主旨的人，是1980年首次当选的共和党人罗纳德·里根。里根在他的就职演说中简单地说道：“政府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他的经济政策，通常被称为“里根经济学”，有几个要素。一个是减税，特别是降低边际税率（适用于额外收入的税率）。里根政府称，这种削减对于建立工作和投资的激励机制是必要的。它的批评者抱怨说，这种削减是给富人的大放送。

里根政府想从根本上改变预算优先事项，增加国防开支和减少民用支出。它轻而易举地增加了国防开支。从1980年至1983年，国防开支从1 340亿美元上升至2 100亿美元，但在削减民用开支方面，尽管做了一些工作，但较难获得国

① 欲知卡恩在监管革命中的作用的有趣说明，参见 Thomas K. McCraw, *Prophet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chapter 7。

会通过。从1980年至1983年，除国防开支以外的所有开支从4 570亿美元增至5 980亿美元。价格较上年同期上涨（民用开支增加27%，但国民生产总值平减物价指数上涨19%），民用预算的某些领域备受重创（“教育、培训、就业、社会服务”类预算从320亿美元下降到270亿美元）。但是，整体而言，要做出削减极其困难，尤其是在里根与国会最初的“蜜月”结束后。里根的预算办公室主任戴维·斯托克曼（David Stockman）负责提出要做出的削减并向国会推销。他的书《政治的胜利》（*Triumph of Politics*）用许多案例描述了削减方案是如何难以实施。

1988年当选的乔治·布什，一个温和的共和党人，许诺即使不逆转也会放缓里根的政策，特别是在监管方面。布什确实在接受共和党提名的演讲中说到“仔细听好：没有新税”，从而对里根遗产最流行的部分提出要求。但是，两年后，在必须对越来越多的联邦赤字想点办法的强大压力下，布什接受了加税。由政治资本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对赤字的任何影响。

1992年，在承诺取消里根—布什对富人加税的做法，在穷人身上和城市地区多支出，在国防上少支出，并增加联邦政府在医疗保健方面的作用之后，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当选总统。但是，在他的医疗措施失败及1994年一个保守派国会当选后，他背离了扩大福利国家的企图。1996年，他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的第一个赢得连任的民主党人，但在竞选过程中，他支持限制福利的立法，而该立法在某些情况下取消福利，这与他维护和延长“新政”的最初目标相去甚远。2000年，一个保守的共和党人乔治·W·布什勉强且有争议地赢得选举。他的第一个立法胜利——大幅减税，表明保守浪潮尚未结束。

要把自由时代与保守时代看得更清楚，我们来回顾经济的两个部门，即农业和环境部门，它们特别清晰地表明了变化。

农　业

农业的相对衰落

农业工人数相对于总劳动人口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据估计，在1800年大约3/4的劳动力从事农业劳动。到1850年，这一比例已下降至55%。1920年，它是26%，到195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2%。

这一趋势在战后时期继续。1960年，在农业中就业的劳动力的比例为8%；1970年为4.4%；1980年为3.4%；1994年只有2.8%。类似的跌幅在整个工业世界都有记载。事实上，正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跌幅更大。例如，在意大利，作为总劳动力的一个比例来测量的农业就业，从1960年的30%以上下降到1990年的约9%；在日本的变化十分类似，从1960年的略低于30%下降到1990年的7%左右。在美国，简单地说，它已经不是农业部门自身不成气候的问题，而是

其他行业在扩张。农场工人的数量实际上从 1950 年的 9 926 000 人下降至 1994 年的2 767 000人。

农业劳动力下降是两种现象的结果。首先，对农业产品的需求通常没有实际收入增长得快。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实际收入一定比例的变化所产生的对农产品需求变化的百分比），通常小于 1。其次，农业技术进步迅速使得产生一定量的农产品所需的工人数目减少。技术进步发生在几个方面。农业机械发展迅速。拖拉机变得更大了，敏感的电子设备增加了，它能够监测犁地、播种、收获。新除草剂和杀虫剂的研制，动植物的科学饲养和基因改造进一步扩大产量。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化学品被用来给棉花除叶，使机械采收容易；开发的番茄新品种具有较硬的表皮，能承受机械收割和跨国——最终国际——运输。

© MICHAEL POLE/CORBIS

具有大量现代科技投资的大农场越来越多地主导着农业部门。比较这里显示的谷物收割机与在第 15 章提到的麦考密克的谷物收割机。

这些创新来自生产农业机械、化学品和种子的私人公司，联邦及州立的重点实验室和实验站。联邦和州政府在设法增加产量上是如此成功，以至于自由派将农业部门作为联邦政府如何产生重要的科技进步的例子。自由派想在制造业开始类似的联邦方案，但是，争论并没有结束；保守派人士指出，尽管联邦政府的一部分方案在努力提高农业产量，但我们在后面将看到，其他联邦农业方案在努力减少污染。

不仅农场工人数目减少了，而且农场数目也减少了。在表 26—3 中将它与前些年的数据进行比较。1950 年，美国共有 538.8 万个农场；到 2002 年，这一数字已下降到 215.80 万，少于 1870 年。农场的土地数量亦在下跌，但速度却慢得多，从 1950 年的 11.61 亿英亩降至 2002 年的 9.41 亿英亩。其结果是，农场的平均规模如表 26—3 最后一列所示，从 1950 年的 216 英亩到历史新高 2002 年的 436 英亩。是那些中小型农场主放弃了自己的农业经营。大量土地汇集起来成为

业主制农场或公司制大型农场。事实上，公司制农场的兴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引人注目并受到争议的特点，虽然许多公司制农场是出于税收目的由简单的家庭农场转换为公司形态。

表 26—3　　美国农业结构的变化

年份	农场（千个）	农场的土地总数	
		农场总规模（百万英亩）	农场平均规模（英亩）
1850	1 449	294	203
1870	2 660	408	153
1880	4 009	536	134
1900	5 740	841	147
1920	6 454	959	149
1940	6 109	1 065	175
1950	5 388	1 161	216
1960	3 962	1 177	297
1970	2 954	1 108	373
1980	2 440	1 039	426
1990	2 140	987	461
2000	2 172	943	434
2002	2 158	941	436

注：1993 年农场的定义做了变化以包括一些小型农场，所以后来的数据不能直接与先前的数据比较。

资料来源：1850—1970：*Historical Statistics*；1980—1990：*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2002：National Agricultural Statistics Service at http://www.nass.usda.gov.

引发这些变化的因素何在？小型与中型农场主放弃经营是由于受到农场推力与拉力的作用。通常，只有那些能够大规模耕作从而可以通过大量投资农场设备实现高生产力的农场经营者才能获得农业收益。艾伦·奥姆斯特德和保罗·罗得估计仅拖拉机就解释了 1910—1960 年956 000个农场的消失。[①] 例如，在种植棉花的南方，许多土地所有者终止小租约，巩固他们的土地，以便他们可以利用大型机械。人们也被其他地方收入较高的可能性从农业中牵引出来。例如，南方的佃农转移到密西西比河谷的工业中心、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虽然离开农业通常意味着能挣到更多的钱，这可不是轻率的决定，因为它意味着离开家人和朋友，

① Alan L. Olmstead and Paul W. Rhod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The Impact and Diffusion of the Tractor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910—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6 (September 2001): 663 - 980.

并放弃珍爱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尽管联邦政府做了大量努力来帮助农民而他们继续离开土地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大部分的援助份额落入到了地位已经较高的人手里。当政府支持农产品价格时，出售农产品数量最多的人受益最多；当需要限制农场种植面积时，休耕面积最多的人得到的补贴最多。例如 1989 年，家庭收入最高的 15% 的农户得到所有政府支出的 6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的农业问题是如何处理由农场价格支持产生的大农场的剩余产品。为了纠正此问题，1949 年，农业部长 C. F. 布兰南宣布了媒体和公众迅速贴上他的名字的赔偿金计划，尽管其中心思想在学术著作中已发展多年。布兰南计划允许农产品在市场上寻找自然价格水平，将市场价格与“现代化”平价之间的差额用来自财政部的支票支付给农场主（直到最高金额）。“布兰南计划”的潜在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剩余农产品将被淘汰，节省仓储成本；而公众，特别是穷人，将可购买到便宜的食品。参见经济透视 26.1。

经过几个月的激烈辩论，在此期间，国家农人协进会（National Grange）和美国农场局联合会（American Farm Bureau Federation）反对该计划，众议院拒绝给“布兰南计划”（Brannon Plan）一次试运行机会。当时政治辩论的典型是，“布兰南计划”的反对者通过大骂其为“社会主义”获胜。当然，如果“布兰南计划”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那么现行的制度也是社会主义制度。“布兰南计划”的真正异议是公开的补贴可能更难在舆论法庭得到辩护。

经济透视 26.1

“布兰南计划”的经济学意义

下图说明了“布兰南计划”的经济学意义。在自由市场，农产品价格和产量将分别是 P 和 Q，像往常一样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交点。但是，这个价格被认为是对农场主不公平的。

在传统的支持系统下，政府要将价格提高到现代化的平价价格 P^*。在这个价格上，消费者只愿意购买 Q^*；但农场主生产 Q^{**}。为了将市场价格保持在 P^*，政府必须购买过剩的供给，$Q^{**}-Q^*$。这将使政府（纳税人）付出 $P^* \times (Q^{**}-Q^*)$。过剩（$Q^{**}-Q^*$）将要存储，所以在未来几年将发生储存费用。农场主的收益（相对于自由市场均衡）将是面积 P^*BC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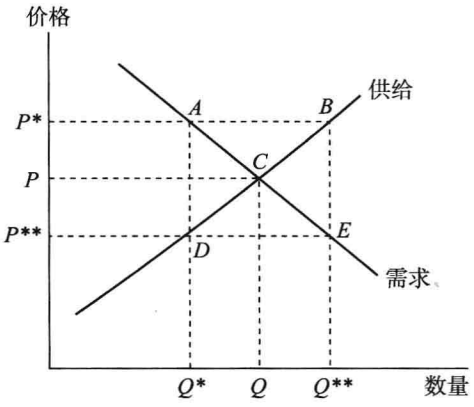
根据“布兰南计划”，政府只不过是允许剩余农产品在市场上出售，价格下降到 P^{**}，销售量为 Q^{**}。然后财政部将就平价 P^* 与新的市场价格 P^{**} 之间的差额向农民开出支票。在这种情况下，由政府支付的总费用由面积 $Q^{**} \times (P^*-P^{**})$ 给定。

很明显，消费者能从转变到“布兰南计划”获得好处。他们支付较低的价格来购买农产品。根本没有资源浪费在生产粮食然后将其储存在政府仓库上。然而，即使实施“布兰南计划”，也有由三角形 CBE 给定的效率损失：如果用在其

他经济领域，用于农业的资源可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对政府预算的影响，取决于面积 $Q^{**} \times (P^{*} - P^{**})$ ——“布兰南计划”下的费用，是否超过或低于面积 $P^{*} \times (Q^{**} - Q^{*})$ ——在传统的购置用于存储制度下的成本加上存储费用。一般来说，这将取决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弹性。供给和需求曲线越有弹性，相对于购置用于储存计划，“布兰南计划”的费用将更低。

经济上，农场主在这两个计划下经营状况相同。他们生产产量 Q^{**} 和获得总收入 $P^{*}Q^{**}$，但是，在“布兰南计划”下，农场主可以以“福利”支票的形式获得收入的一部分。一些农场主会觉得这有失身份。直接支付对公众来说也很明显，使得农场主更难以维护和提高他们的补贴。



在“布兰南计划”失败后，改革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较为温和的措施。例如，当剩余农产品仍处于争议的水平时，国会又转向了大萧条时期的解决方案。1956 年《土壤银行法》（Soil Bank Act of 1956）的出台正是为了减少基本商品的供给，通过给那些把不生产的土地转进“土壤银行”的农民提供支付，从而实现 10%～17%的耕地面积的减少。转移支付是基于商品基本价格乘以每英亩的正常产量乘以不耕种的英亩数的旧公式。虽然土壤银行的想法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刚产生时是与大平原各州的沙尘暴有关，该计划还是维持原状：几乎毫无掩饰地提高农产品价格的保护方案。

结果出人意料，但回顾起来却很容易理解。农场主把产能最小的土地放在土壤银行，更深入细致地耕种其余的土地。剩余农产品继续增长，经过 9 年的连续增长，在 1961 年达到空前的高水平。①

1961 年《紧急饲料粮议案》（Emergency Feed Grain Bill of 1961）通过向减少 20%土地耕种面积的农场主提供大量款项，鼓励大幅减少玉米和高粱的种植面积；更多的款项将提供给额外的 20%转为饲料作物的耕种面积。整体而言，这一计划有效，因为这一减少足以抵消农场主最小化其影响的努力。10 年来饲

① 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指出了土壤银行计划的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艾奥瓦州的农场曾经在它们的田地边缘种满了树木，但为了避开面积限制，边界繁茂的树木（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及木材的一个来源）被砍掉了。

料谷物结转首次下降。

这个小小的成功鼓舞了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用类似的但异常昂贵的计划去抨击小麦的剩余产量。尽管富裕的农场主和他们的组织农场局联合会起初反对，但很快意识到了他们方式的错误，并全心全意地参与制定1965年《粮食和农业法》(Food and Agriculture Act of 1965)。像个可怕的大赠送，这一法案使美国纳税人每年付出50亿～60亿美元，在使富裕的农场主更富裕的同时允许一小部分普及到贫困的农场主。

由于20世纪70年代对通货膨胀和政府开支的关注一路攀升，国会发现单方面应对农场的利益越来越困难。精通农业补贴的吉米·卡特总统（他是来自佐治亚州的一个富有的花生农场主），在1977年《粮食和农业法》(Food and Agriculture Act of 1977）中为降低支持价格做出了努力。这是在指定的范围内基于小麦、棉花、饲料和许多其他商品制定复杂的支持价格的纪念碑。但是，农民强烈反对并涌入华盛顿特区，以表明他们对低价格的反对。在1978年冬天，他们通过1978年《紧急法令》(Emergency Act of 1978）获得了较高的支持价格。

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1981年底通过的《农业法案》，支出超过226亿美元，其中有超过100亿美元分配给食品券计划（food stamp program)；对花生、糖、小麦、饲料谷物、稻米、大豆、棉花和羊毛的价格支持在持续，虽然这些支持比它们在卡特政府时期的水平有所减少。正如所料，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农场利益团体都宣称，政府主导的削减没给面临收入严重减少的农民留下任何有效保护。

在随后几年，给农场主的鼓励措施有所改善。在用于谷物的差额补贴制度下，它包含已在前面讨论过的“布兰南计划”的要素，农场主获得一个基于“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或支持价格之间的差价的补贴，无论后两个哪个较高。差额补贴适用的数量是基于历史产量和种植面积，所以农场主不能通过更深入细致地耕种他们的土地来增加他们的差额补贴。面积限制制度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变化。1985年，土地休耕保护计划成立，允许农场主与农业部门签订长期合同以退出生产用地。这一方案旨在将通过环境敏感土地退耕来保护环境的目标与限制产量的目标结合起来（点数制决定了实现这一目的的土地的重要性)。

在20世纪90年代初，农业似乎将逃过放松管制。但即使是农业，也不能永远顶住自由市场的潮流。1996年，国会通过了《联邦农业完善与改革法案》(Federal Agriculture Improvement and Reform Act)，惯称《农业自由法案》。该立法扫除了政府对农产品价格设定底价作为控制生产或面积的回报的政策。作为补偿，农场主保证能得到年度直接补贴直至2002年，以帮助向自由市场农业过渡。虽然许多农场主反对这项措施，但其他人支持它。在许多农场主看来，许多农产品的价格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过渡方案下有保证的补贴数额，可能会比传统方案下可得到的多。但是，在该法案通过之后，农产品价格就因种种原因开始回落，包括在世界其他地区生产的增加。在1998年，并再次在1999年，国会提供紧急款项以帮助农场主应付收入的突然下降。

2002年《农场安全与农村投资法案》（Farm Security and Rural Investment Act of 2002）继续提供与价格绑定的补贴，该补贴到2002年为止占向农场主提

供的转移支付的主要份额，尽管它确实保留了因为这些补贴不太可能扭曲生产决定，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农场主应该得到直接补贴的想法。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像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农业一样，美国农业将得到巨额补贴。

为什么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农民能获得如此巨额的补贴？我们大多数人对在严峻的经济现实面前仍试图维持所珍惜的生活方式的人感到同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解释我们上面提出的问题。然而，主要的解释是农业政治经济学。农民是一个组织健全、在众议院特别是在参议院（其中的代表不受该州人口的支配）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特殊利益团体。而且，农民得到的补贴尽管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对一般纳税人却只有轻微影响。消费者即使都知道美国农业政策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花时间奋起反对只是减少他们少量收入的价格上升政策和加税补贴并不值得。①

环境和自然保护运动的遗产

黄石公园，建立于1872年，是旨在保持其自然奇观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国家公园。② 当时，很少有人担心如果转移到私人手中，黄石公园的土地将被用于农业用途。相反，国会关注的是，如果一个民营企业家控制了使用黄石公园的权利，它的自然美景将因通道和广告而降级。

政策的一个重大改变发生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领导下，他相信如果将损耗率交给市场，自然资源将被过快耗尽，因此，联邦政府应在保护可耗尽的资源上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木材和矿产品。罗斯福宣传资源保护事业，而且借助于林务局（当时是农业部林业司）强有力的局长吉福德·平肖，将公共领域的约1.5亿英亩的西部土地转换成国家森林，这样林业局就有权控制这些土地。

自然保护运动在20世纪20年代衰落，但在罗斯福政府时期高涨。大体上，“新政”环境政策可分为三类：（1）政府对将公共土地退出生产并为子孙后代保护好的传统计划的追求；（2）政府推行新的政策，对农民保持私有土地不生产进行补偿，虽然如前所述，“土壤银行”的主要理由是要提高农产品价格；（3）政府坚持认为，在某些情况下，保护自然资源需要对整个地区的许多资源进行即时保护，并且重大项目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是必要的。

此外，在“新政”时期做出了保护农业用地的第一次系统的努力。这些努力在1933年开始于土壤侵蚀管理局在内政部的成立。（1935年，它作为土壤保持局成为农业部的一部分。）起初，合同是与单个农民签订，该局提供技术援助和一些材料，而农民提供劳动力和剩余的材料。早在1937年，罗斯福总统给各州长写信，要求他们的立法机构通过让土地所有者形成土壤保护区的法案。到

① 加里·利贝卡普已经向我们指出，在某些情况下，“消费者”对农业政策改革有很大的财政影响。例如，糖果制造商对降低糖价有着强烈兴趣。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并没有给涉足农业政策改革的消费者支付补偿。

② 1832年，一个联邦“保留地”建于阿肯色州的温泉城，以保护其矿泉。

1954 年，已组织了约 2 500 个水土保持地区，包括美国所有农场的 80%。

“新政”还试图通过它在大范围的方案中控制河谷的水分布来保护自然资源，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同样，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提供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的建筑业就业和廉价电力，但保护自然资源也是一个目标。这些方案的一些支持者认为，没什么更能产生长期成功的自然保护。这个证据不足为信。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在提升整个地区上无疑做了很了不起的工作，但建设如此庞大的项目也耗资巨大。

技术进步使得曾经被认为无用的旱地复垦成为可能。大多数沙漠变成农田只需要水。例如，由 65 000 马力的发动机驱动的泵已安装在华盛顿州的大古力坝（Grand Coulee Dam）用于从 280 英尺的哥伦比亚河峡谷提水到大古力鸿沟，从此处引水灌溉广大地区。垦务局（Bureau of Reclamation）估计，落基山脉以西的 5 000 万英亩土地可转变为沃土。

从技术角度看，像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实际上只是增加目前产量的费用。这些费用可于现在支出也可于今后的 100 年支出，而且不会使我们的自然资源恶化。因此，灌溉和排水项目通常不会防止今后的产量降低。在未来的任何时间均可灌溉亚利桑那州的沙地，由此增加的产量，正如现在已改善的一样大。换句话说，复垦与保护是不同的。对在灌溉的西部土地上种庄稼的全部成本的估计表明这种努力很少是值得的。农民能继续经营仅仅是因为他们使用的水得到了高补贴。

环保运动的兴起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公众开始相信环境已经被许多危险的工业副产品污染。许多人认为，使环境再次恢复比经济快速增长更重要。环保运动并没有完全打破先前对自然资源保护的重视，但这两个运动有重要的区别。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强调为了保持林地、耕地、水和矿产资源的长期收益率而对资源进行管理；环境保护论者更加强调为今后的审美享受保护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强调个别资源；环境保护论者强调环境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他们看来，国家公园只是整个环境的几小块地，保护是不够的；整个环境必须不受经济发展的破坏性副作用的损害。

对环境的日益关注并不局限于美国；其他工业国，特别是西欧的工业国，经历了同样的现象。刚刚开始工业化进程的国家对环境的态度对较发达国家来说往往是令人沮丧和傲慢的。一个未污染和保存完好的环境似乎是一种奢侈品：随着收入增加，消费者希望将更多的收入用于环境上。

虽然对环境的关注始终如一，但在美国，公众的视线依时事的发生不断转移。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瑞秋·卡森的书《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高度关注农药滥用的危险，因此，农业部在 1969 年完全禁止使用 DDT。同一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芭芭拉海岸发生的重大溢油事故，引起了人们对海上石油钻探危险的关注，类似地，也引起了对计划中的阿拉斯加管道的影响的恐惧。

© UNDERWOOD & UNDERWOOD/CORBIS

海洋生物学家瑞秋·卡森发表于1962年的书《寂静的春天》详细说明了某些杀虫剂的危险性，并有助于发起现代环保运动。

为回应这些问题和其他环境问题，1970年，国会通过了《洁净空气法案》及《水质改善法案》，并成立了环保局（EPA）。从那以后，环保局制定了一大批条例。在通常情况下，它设置基于一个“最佳可用技术”所允许的最高污染水平。在许多情况下，环保局必须对各项污染物设置数百个标准。例如，环保局为每个型号的汽车制定单独的标准。衡量环保局的成本与效益是极为困难和有争议的，但没人怀疑遵循环保局的标准的直接成本是非常高的。根据一项估计，1988年这些成本是1 000亿美元，约为国民生产总值的2%。①

对“温室效应”的关注，说明了环保运动对相关环境问题的重视。累积的某些气体（二氧化碳、甲烷以及氯氟化碳）在大气中产生温室效应。这些气体吸收从地球上反射的红外辐射（温室玻璃也是如此），从而提高全球气温。温

① 此外，旨在改善环境质量的其他一些方案相继出台。也许最有名的是成立于1980年的超级基金，它负责清理有害污染物堆放场。

室效应再次说明外部性问题。个体生产者，甚至整个国家，都没有动力去控制他们排放到大气中的气体，因为费用将由全世界分摊，可能在地球的另一面集中。

对全球变暖预期的影响是不确定且有争议的。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可能最大，在那些国家农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份额）可能受到不利影响，使人衰弱的寄生虫病可能变得更加普遍。此外，极地冰川的融化，可能引起海平面上升及造成海岸的广泛破坏。另一方面，一些将经历较长生长季节的区域，实际上可能提高其农业生产力。

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各种方案已经提出。通常，有两种方法。自由派经济学家赞同通过国际谈判达成明确的排放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些目标制定详尽的政府计划。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学家赞成征收排放税，一些经济学家赞成建立可交易的权利——解决外部性问题的通常办法。国家将被指定最大排放量，如果超过其指定的水平，它们要设法从排放量低于其目标的其他国家那里购买更多的排放权。也许在今后几年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环境保护将更多地依靠市场机制（税收和建立可交易的权利）还是更多地依靠政府的直接控制。

经济学原理能解释政府的扩张吗

我们已经看到，战后时期政府的增长是政治经济自由派与保守派的理念之间持续斗争的结果。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指出，在这些变化的趋势下，决定政府规模的是更根本的力量。

瓦格纳定律

于19世纪80年代，德国经济学家和经济史学家阿道夫·瓦格纳写道：现代产业的发展将产生越来越大的政治“对社会进步的压力”，从而形成不断扩大的公共部门。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发生，因为竞争的民族国家将发现安抚劳工和至少部分地满足社会对正义的要求符合它们的利益。瓦格纳的预测在许多情况下被证明是正确的，公共部门相对于私营部门将不可避免地扩大的想法被称为瓦格纳定律（Wagner's Law）。

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已接受瓦格纳定律，但他们强调不同的基本力量：人均实际收入的增加。政府帮助弱势群体、保护环境的计划，诸如此类可能是奢侈品：当收入增加时，我们不成比例地多购买。在对政府的需求增长放缓后，1969年之后对政府的需求增长放缓符合本命题。在一定程度上选举方式反映对长期收入的看法，生产率增长放缓的信念产生了政府支出大幅下降的需求。其他长期趋势也可能影响对政府的需求。例如，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可能已经增加了保护环境

或提供公共交通运输方案的需求。①

纯转移支付呢？可以预期一个穷人投票赞成对富人征重税。因此，我们可能期待，在一个成人说了算的民主制度中，一票之后，所得税率将是高度累进的，税后收入将趋向平等。事实上，大多数工业化民主国家最令人惊讶的不是它们的累进所得税，而是这些税不是更累进的。经济学家艾伦·H·梅尔策和斯科特·F·理查德已经创立了合理的转移支付理论。在他们的模型中，人们投票支持有利于他们的收入再分配方案，但考虑到高税收的不利影响——不鼓励工作和储蓄的高边际税率的趋势。穷人没有自动投票赞成“向富人征重税”，因为他们最终获得的将比之前少。②

经济学家萨姆·佩兹曼发展了相关的理论。根据国际比较，他认为，一个由市场产生的更平等的收入分配，说起来有点矛盾，促进了政府的扩张，因为它增强了赞同通过政府进一步实行再分配的政治力量。当穷人非常穷时，他们不能产生促进自身利益的政治压力。经济增长赋予穷人的政治力量不可忽视。③

政府职能的扩张：互相矛盾的解释

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强调主导思想在“公共目的”与“私人利益”之间的改变。从长远来看，根据施莱辛格，政府将趋于增长，因为自由派政府发起的纲领很少被之后的保守派淘汰。一个恰当的比喻是，政府像个螺旋，在自由主义主导的时期拓宽但从不缩小。④ 在施莱辛格看来，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间的交替是永久的。政治活跃的年轻人接受了他们成长岁月中的主导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在政府、私营部门、学术界和新闻界达到越来越高的影响水平。最后，他们取得政权并试图重申他们青少年时代的自由主义或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克林顿总统的当选是施莱辛格理论的一个明确例证：克林顿和他的许多关系紧密的顾问们，在自由党肯尼迪和约翰逊时代是大学生和反战支持者。进一步考虑施莱辛格的观点，或许有点过于望文生义，我们可以预言，大约在2016年，一个保守的政府将取得政权，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初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哲学！

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罗斯·D·弗里德曼强调了得到后来的自由派或保守派政府支持的改革新趋势。因为“暴政的现状”，方案试图抵制消除它们的企图。政府方案的受益者——由官僚（见经济透视26.2）、政客和私营部门组成的“铁三角”企图保护方案，甚至当已经表明这些方案损害公共利益时也如

---

① 欲了解这种观点的早期说法，参见 Solomon Fabricant, *The Trend in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0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2)。

② Allan H. Meltzer and Scott F. Richard,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October 1981): 914 - 927.

③ Sam Peltzman,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October 1980): 220 - 285.

④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chapter 2. 小阿瑟·施莱辛格的父亲，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创建了该理论。

此。如果从所有选民的角度衡量，消除一个给定的方案可能增益颇丰；但对于单独的每个选民来说，增益可能太小，不值得为它战斗。①

在他的《危机和利维坦》一书中，罗伯特·希格斯同意主导思想是决定政府扩张速度的关键因素，但强调经济或社会危机在使得自由干预思想可以接受方面的作用。② 1931 年温和的衰退有可能导致民主党取代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但大萧条使人们渴望接受大范围的新方案。约翰·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将在任何情况下奋力推进新方案，但 20 世纪 60 年代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使得公众愿意接受范围更广泛的新立法和方案，特别是旨在解决贫困和种族歧视问题的这些方案。

一个学术作家将他或她自己的理论当作是观察到的唯一趋势推进，这很常见。产品差异化对学术有益，正如它对汽车生产商、保险商和鸡肉商有益一样。不过，在我们看来，我们已研究的政府扩张理论相互补充。施莱辛格强调政治领导人对青少年时期思想的怀旧之情，希格斯强调危机的作用，弗里德曼强调理性选民的关注，都有助于我们理解导致战后时期政府的作用先是扩大后来减小的复杂过程。

经济透视 26.2

为什么官僚机构具有负面含义

为什么政府官僚机构往往显得如此大且低效率？换句有所不同的话来说，为什么“官僚机构”这个术语具有这种负面含义？经济学家威廉·尼斯坎南根据国会和官僚机构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仍有争议的回答。下图中的 S 曲线代表了一个政府部门提供单位“产出”的成本——灌溉土地亩数、给农民的建议、给予的补助金、检查的发电厂，或诸如此类。D 曲线表明了每增加一个单位产出的边际价值。在那个产出水平，有效率的产量将是 OG；生产每一单位是因为边际价值超过边际成本。在 OG 产量上，生产最后一单位的成本 BG 恰好等于它的价值。当然，这是如果该产品由私人公司生产，且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出售才会发生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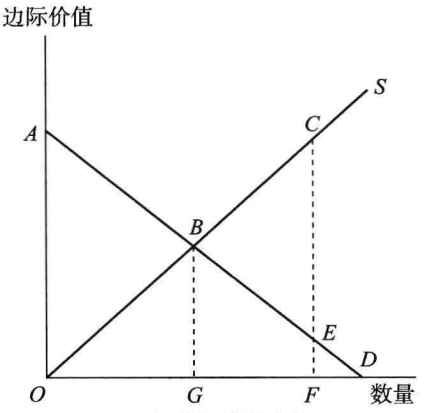
不过，尼斯坎南认为，国会的预算编制过程的工作方式不同。③ 官僚们对成本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不感兴趣。他们的目标是要掌管尽可能大的预算——华盛顿的威信由此而来。因为他们很有可能垄断且拥有产量有点难以衡量的生产成本的所有可用信息，他们将使得 S 曲线的形状很难判断。相反，他们会向监督官僚机构的国会委员会提供一个为执行该部门“使命”所需经费的请求。国会委员会也可能对大于 OG 的产出感到满意，因为委员会成员将收到竞选捐款，它来自受

①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41 - 51.

② Robert Higgs,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利维坦”(Leviathan) 是《圣经》中的海怪。这个词被用来代表一个极权主义、官僚主义的政府。

③ William A. Niskanen,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chapter 5.

益于该部门工作的利益集团。但是，如果该机构的总费用增长到超过总效益的地步，美国国会其他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新闻媒体以及当总税收提高时将招致并忍受众多指责的行政部门将提出质疑。其结果是，官僚机构将以总成本 *OCF* 生产产出 *OF*，从而这些成本将等于总效益 *OAEF*。官僚机构将会变得过大。



机构规模最大化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aron, Henry J. *Politics and the Professors: The Great Society in Perspectiv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8.

Anderson, Terry L. *Politician Environmentalism: Going behind the Green Curtain*. Standford, Calif.: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2000.

Asch, Peter. *Consumer Safety Legislation: Putting a Price on Life and Limb*.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Bennett, James T., and Manuel H. Johns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Federal Government Growth, 1959—1978*. College Station, Tex.: Center fo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Free Enterprise, 1980.

Borcherding, Thomas E. "The Sources of Growth of Public Expenditur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2—1970." In *Budgets and Bureaucrats: The Sources of Government Growth*, ed. Thomas E. Borcherding. 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7.

Buchanan, James M. *Public Finance in Democratic Process: Fiscal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 Choice*.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7.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The annual tables in the appendix are an excellent source of data on the postwar ear. http://www.access.gpo.gov/eop/.

Edelstein, Michael. "What Price Cold War? Military Spending and Private Invest-

ment in the US, 1946—1979."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14 (1990): 421 - 437.

Fabricant, Solomon. *The Trend of Government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990*.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52.

Friedman, Milton, and Rose D. Friedman. *Tyranny of the Status Quo*.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3.

Galbraith, John K.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9.

Glasner, David. *Politics, Prices, and Petroleu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ergy*. Cambridge, Mass.: Ballinger, 1985.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1968): 1243 - 1248.

Heller, Walter.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Higgs, Robert. *Crisis and Leviathan: Critical Episodes in the Growth of American Gover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The Cold War Economy: Opportunity Costs, Ideology, and the Politics of Crisi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31 (July 1994): 283 - 312.

Higgs, Robert, and Anthony Kilduff. "Public Opinion: A Powerful Predictor of U. S. Defense Spending." *Defence Economics* 4 (1993): 227 - 238

Hughes, Jonathan R. T. The *Governmental Habi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Kahn, Alfred E. "Surprises of Airline Deregul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apers and Proceedings* 78 (1988): 316 - 322.

Lilley, William, III, and James C. Miller, III. "The New 'Social Regulation.'" *The Public Interest* 47 (1977): 49 - 61.

Lowery, David, and William D. Berry.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Competing Explan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7 (1983): 665 - 694.

McCraw, Thomas K. *Prophets of Regula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Meltzer, Allan H., and Scott F. Richard. "Why Government Grows (and Grows) in a Democracy." *Public Interest* 52 (Summer 1978): 111 - 118.

——.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9 (October 1981): 914 - 927.

——. "Tests of a Rational Theory of the Size of Government." *Public Choice* 41 (1983): 403 - 418.

Niskanen, William A. *Bureaucracy and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Chicago: Aldine-Atherton, 1971.

Olmstead, Alan L., and Paul Rhode. "The Transformation of Northern Agriculture."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93 - 742.

——.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Impact and Diffusion of the Tractor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910—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September 2001): 663 - 980.

Peltzman, Sam.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 (October 1980): 220 - 285.

Schlesinger, Arthur M., Jr. *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6.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one of the best sources of current annual data. http:// www. census. gov/prod/www/statistical-abstract-us. html.

Stockman, David A.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Stone, Alan. *Economic Regulation and the Public Interest: The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thaca, N. 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7

Tanzi, Vito, and Ludger Schuknecht. *Public Spending in the 20th Century: A Glob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the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 http://www. epa. gov/history/.

U. 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griculture. http:// www. usda. gov/history2/front. htm.

Vietor, Richard H. K. "Government Regulation of Business."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69 - 1012.

Wildavsky, Aaron. *The Politics of the Budgetary Process*. Boston: Little, Brown, 1964.

第 27 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增长和商业周期

本章主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人们十分担心大萧条将卷土重来，但当预期的经济崩溃没有出现，恐惧让位于乐观。学院派经济学家尤为乐观，因为信仰——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已显示了一个现代化工业经济体如何能够通过合理使用财政政策来保持稳定。在肯尼迪和约翰逊当政时期，经济学家对商业周期可以克服的信心达到高峰，但随后，凯恩斯主义方案（当它付诸实施时）倾向通货膨胀的弱点，开始使它本身有感觉。

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严重的战后衰退时期，也未达到大萧条时期的失业率水平。相反，通货膨胀成为首要问题。在之前的扩张中，通货膨胀率趋于下降（见图 27—1）和失业率趋于上升（见图 27—2），因此，核心或基础通货膨胀率在 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稳定提高。类似地，失业率在每个扩张时期下跌的幅度没有它在每个衰退时期上升的多；一些人所谓的核心或自然失业率，这些年也有所增加。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像萧条对于上一代人一样，“滞胀”看起来很令人费解。

滞胀对凯恩斯经济学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因此，经济学家和决策者开始更加注意芝加哥大学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思想。弗里德曼强调了几点，它们对 20 世纪 70 年代到 20 世纪剩余时间里的政策有深远的影响：(1)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取舍是暂时的；(2) 通货膨胀是一个货币问题，最好

通过以一个缓慢而稳定的速度增加货币存量来解决；(3) 自由浮动汇率比固定汇率更有效。试图运用货币主义学派（由弗里德曼建立的思想流派后来的名字）的想法，虽然并不总是忠于原学说，但它成为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的基础。通货膨胀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得到了抑制，但是以严重的衰退为代价。尽管通货膨胀率从未降至零，但它在 20 世纪的剩余时间里得到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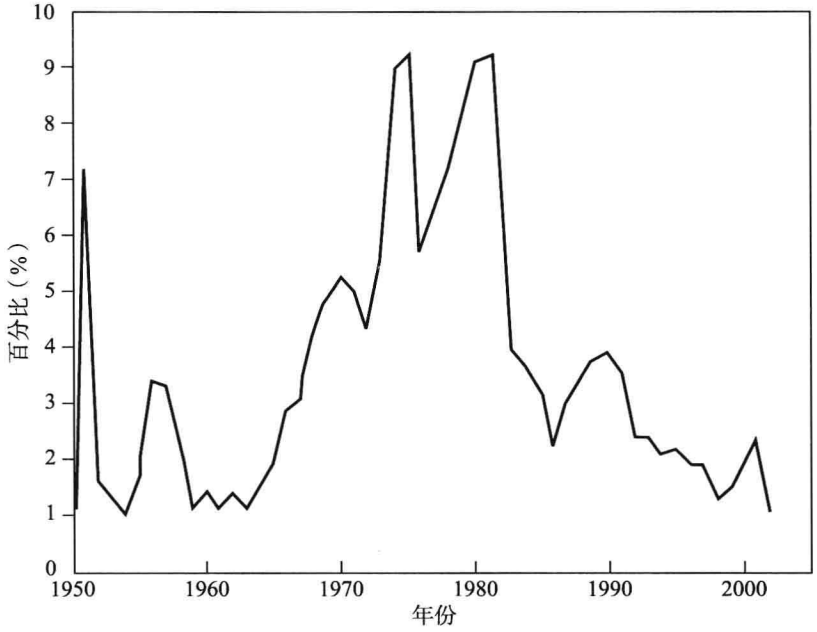


图 27—1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1950—2002 年

资料来源：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t http://www.bea.doc.gov.

凯恩斯主义时代

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于 1936 年发表，该著作往往被列为 20 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书。在超过 30 年的时间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提出的思想主导了美国和其他工业国的宏观经济决策。《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一本复杂的书，而如何解释它存在很大争议。

不过，大家明确了几个关键点：(1) 经济衰退后自然返回充分就业的倾向不存在；投资需求可能不足以吸收人们在实现充分就业收入水平上所希望达到的所有储蓄；(2) 当经济低于充分就业时，货币政策在恢复投资和充分就业上不太可能有效；(3) 经济衰退后要恢复充分就业，可能有必要控制私人投资及用政府公共工程支出来补充。最后一点——为凯恩斯的美国学生如阿尔文·汉森、阿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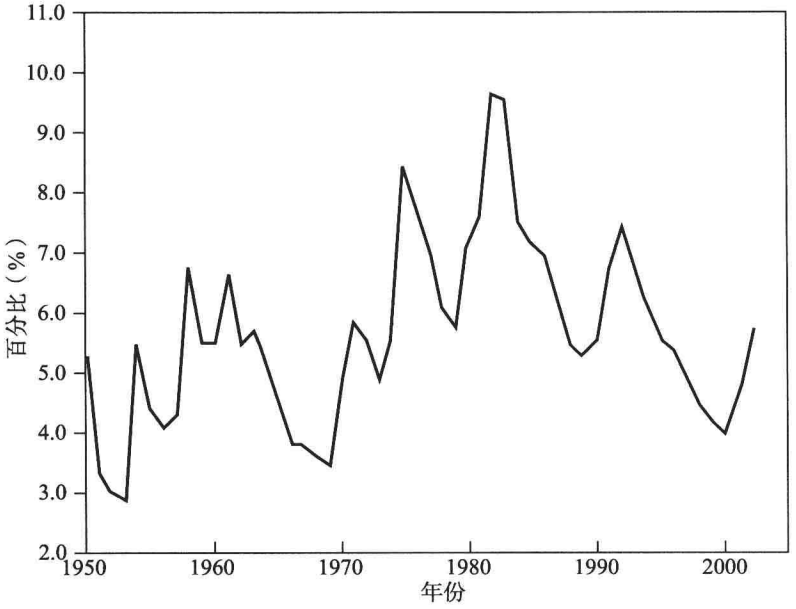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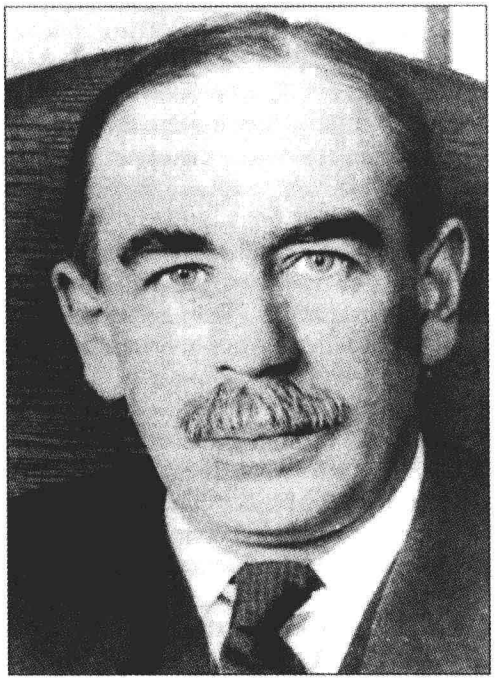


图 27—2　平民失业率，1950—2002 年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http://www.access.gpo.gov.



© H. ARMSTRONG ROBERTS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充分就业可通过政府支出和税收的适当改变以及通过对私人投资的管制来维持这一理论的设计师。他的理论在 20 世纪 40 年代、50 年代和 60 年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勒纳、保罗·萨缪尔森等人所强调——可被理解为经济可保持在一个平稳水平，在经济衰退时可通过增加政府支出或削减税收，或二者并用，在达到充分就业后，受通货膨胀威胁时则反向采取这些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赤字开支在消除失业上的成功肯定了（或者看起来如此）凯恩斯理论这一药物治疗严重萧条的价值。这种乐观情绪被最初的战后经济衰退的处理所加强，该衰退从1948年11月（见表27—1）延续到1949年10月。在工业生产下降了10%和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4%之后，杜鲁门政府迅速在“贫困地区”授予军事合同，尽管有几个月的失业率一度升至5%以上，但复兴来得如此迅速，以至于从未有公众要求采取行动的呼声。凯恩斯理论药物似乎对轻度衰退起作用，而且不会造成需要其他治疗的危险副作用。

表27—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商业周期

高峰	低谷	从上一次低谷到本次高峰的扩张长度（月）	从高峰到低谷的紧缩长度（月）
1945年2月	1945年10月	80[a]	8
1948年11月	1949年10月	37	11
1953年7月	1954年5月	45	10
1957年8月	1958年4月	39	8
1960年4月	1961年2月	24	10
1969年12月	1970年11月	106	11
1973年11月	1975年3月	36	16
1980年1月	1980年7月	58	6
1981年7月	1982年11月	12	16
1990年7月	1991年3月	92	8
2001年3月	2001年11月	120	8

a. 从1938年6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扩张。

注：国家经济研究局——最先开始对商业周期进行研究的私人研究团体，注明了商业周期中的高峰和低谷的日期。确切日期是一个判断问题。另一个衰退的常见定义——连续两个季度的收入下降，通常会产生类似的日期。

资料来源：参见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http://www.nber.org。

朝鲜战争和财政部—联邦储备协议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越过三八线，攻打韩国。杜鲁门总统立即做出回应，授权美军击退朝鲜军队的进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到5年，美国发

现自己再次交战。消费者的反应是购买并储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稀缺的物品：食糖、汽车轮胎、耐用消费品等。通货膨胀加速（见图 27—1）。政府迅速做出反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得出的教训是：权宜办法不管用。第一，旨在提高个人和公司税率的 1950 年《税收法案》（Revenue Act of 1950）于 1950 年 9 月制定。1951 年《税收法案》虽然没有杜鲁门政府想要的全面，却实现了个人和公司税的额外增加。

第二，政府实行价格和工资管制。赞成渐进式控制价格和主张立即对物价进行全面冻结的两派人之间迅速展开了一场辩论。这一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同，冻结价格的倡导者获胜，价格冻结于 1951 年 1 月下旬公布。物价管制局（Office of Price Stabilization）主任兼价格冻结的主要倡导者迈克尔·V·迪塞利这样解释他的立场。控制价格就像“剪断一只猫的尾巴”——最好是一下剪断；而一点一点地剪会导致“一只疯狂的猫和疼痛的尾巴”。

第三，政府实施了限制性货币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联储采用固定汇率（设置它们的上限），即使这迫使美联储购买比它想要的更多的联邦债务，从而扩大货币和信贷。在财政部的要求下，固定汇率在战后初期继续，尽管美联储的不满不断增长。朝鲜战争使矛盾公开化。在杜鲁门总统的要求下进行讨论后，美联储和财政部宣布，它们于 1951 年 3 月 4 日达成协议。

这项协议后来被称为财政部—美联储协议，因为由这两个机构发布的联合声明说它们已达成“完全一致”。这项协议的要点是，美联储将被允许限制购买政府债务，即使结果是更高的利率。这对美联储是一个胜利，虽然财政部赢得了其他方面。当时有人预测，金融市场将会因该协议陷入休克状态，但事实上，金融市场迅速适应了新的制度。该协议允许美联储在战争期间遵循非通货膨胀性的货币政策；在整个战争期间，每单位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实际上略有下降。

该反通胀计划很管用。从 1951 年 1 月价格冻结到 1953 年 2 月控制终止，消费品价格只有 2.1%的年增长率。当控制终止时，从控制终止直到战后的价格高峰，许多商品价格只出现 2.6%的增长率。

正如我们将要讨论的，价格控制在 20 世纪 70 年代再次被使用，部分原因是它们似乎在朝鲜战争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然而，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朝鲜战争计划的其他部分——货币和财政紧缩——被拒绝，其结果是，管制是失败的。

艾森豪威尔时期

1953 年，主要经济指标发生了不利的变化。在大约 9 个月的时间里，工业生产下降了 10%，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 4%，而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 10%。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曾普遍预测这次经济衰退。国防开支，从而政府总开支在 1953 年第二季度和 1954 年第二季度期间减少了 110 亿美元。总投资也下降了 100 亿美元，主要是库存。总之，有一个“外生性”支出大幅下降，这在凯恩斯

模型中是整体经济的大波动源。

这次衰退引起极大的关注。在几个制造领域的失业人数超过本地劳工总数的10%，许多家庭在任何明确的改善迹象出现之前就用尽了他们的失业保险金。

政府没有采取断然措施来应对经济衰退。在一定程度上由于从1954年1月1日起联邦所得税税率的降低，适度的财政赤字有刺激作用；美联储采取了“积极宽松”的货币政策。“自动稳定器”——失业保险金、随着收入的下降总税收的减少以及对农业的价格支持都有助于缓解总支出的下降。

价格开始在1955年中期稳步上升，一直持续到1957年初。通货膨胀成为当时美国国内的紧迫问题。美联储以限制性货币政策作为回应，该政策一直持续到1957年夏末的经济衰退点过去很久。随后是大范围的经济衰退，战后迄今为止最严重的一次衰退。到1958年春天，失业人数占平民劳动力的7.5%。反弹于1958年4月开始，但1959年的复苏令人失望，当指标在该年年底再次恶化时，决策者的挫折感是显而易见的。

许多自由派经济学家认为，如果能更有力地使用凯恩斯主义药物，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经济表现本来可以得到改善。由于考虑到这一点，下一个上台执政的经济顾问团队攻击失业。

肯尼迪-约翰逊时期与新经济

在1960年选举中，经济是重要问题。民主党人约翰·F·肯尼迪承诺启动经济，更强调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大概）较少强调价格的稳定。虽然1959年和1960年的经济衰退是温和短暂的，这是肯尼迪以微弱的100 000票击败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经济在1961年2月开始复苏，但其速度令肯尼迪团队感到失望。因此，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沃尔特·海勒的指导下，制定了1964年实验性减税计划。在1963年11月令人震惊的肯尼迪刺杀案后，政治精明的林登·B·约翰逊就任总统，并及时引导国会进行减税并使之成为法律。

这是历史性的减税。当时的联邦预算出现赤字；正统的经济理论要求增税以平衡预算，但肯尼迪总统的顾问信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新经济学”[①]。他们认为，只要经济低于充分就业状态，减税是合理的，因为它将更多的收入留在公众手中，创造对商品和服务的更多需求。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在目前情况下处于赤字状态的预算可能会变成充分就业时的平衡或盈余，因为随着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税收趋于上升，而某些类别的开支会下降。

在一段来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常被引用的文字里，凯恩斯写了以下内容：

① 如前所述，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大，但它们对于许多未受过经济学教育的美国人来说仍然是“新的”。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无论它们是在对的时候还是在错的时候，都比通常理解的更强大。事实上统治世界的，就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践家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的影响，却往往已沦为某一个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奴隶。

在空中听取灵感的当权的狂人，他们的狂乱想法不过是从若干年前学术界拙劣作家的作品中提炼出来的。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①]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后不到30年内，凯恩斯的思想正在对美国的财政政策产生深远的影响。肯尼迪减税被普遍视为巨大的成功。失业人数从1964年占劳动力的5%降至1965年的4.4%再到1966年的3.7%。然而，当肯尼迪的顾问们首先计划进行减税时，紧紧围绕减税的越南战争建设未被计算在内。环境变化促使沃尔特·海勒和其他的减税创造者力劝约翰逊总统增税，但他并未采纳这个建议。凯恩斯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政治弱点于是显现出来。减税容易，增税困难。通胀压力开始增大，并且如图27—1所示，1965年年底通胀率开始上升。当时有人认为，肯尼迪减税迎来了积极财政政策的新时代；果不其然，肯尼迪减税是基于凯恩斯主义思想的财政政策的重大改变的最后一个例子。

曾有一段时期，肯尼迪政府依靠“工资价格控制指标”来控制通货膨胀。在早期和有争议的测试中，当该行业提高的价格比控制指标允许的多从而威胁联邦采购给维持在控制指标和其他制裁内的公司的转移支付时，肯尼迪总统公开抨击钢铁行业。最后，钢铁行业让步了，但政府当然不能将每一个违反控制指标的价格上涨作为一项重大危机。当1965年通胀加速时，控制指标废而不用。

直到1969年的最后一个季度，经济扩张的速度才有了短暂停顿。事实上，从1961年2月至1969年11月的扩张，到那个时候，是战后时期最长的持续增长。在1969年和1970年经济繁荣之后的衰退是短暂的，主要指标显示1970年第四季度是个低谷。

尼克松时期：价格管制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结束

1971年，通货膨胀率约为4%，失业率约为6%。尽管通货膨胀比衰退前的高峰有所下降，也有可能下降得更多，但公众难以接受通货膨胀下降很少却付出了看似非常高昂的代价。此外，美国当时开始意识到其国际金融地位面临的严重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已经采取了后来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的汇率制度，建立该体系的会议于1944年在新罕布什尔举行并以它命名。在那次会议上决定将采取以美元为基础的所有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设立的各种规则允许各国在某些情况下贬值本国货币。还建立了国际

①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6; first Harbinger ed., 1964), 383. 这段文字常被人引用，我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大多数是被经济学家引用。

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为正在经历国际收支逆差的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世界银行的建立是为了提供长期投资资金。

该体系在某些方面像金本位制度，除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基础是美元而不是黄金外，尽管美元本身当时与黄金挂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随后几年中，核心的问题一直是“美元短缺”：受战争蹂躏的国家要获得迫切需要用以购买食品和固定设备的美元有困难。通过使每一单位的国内货币等于较少美元，货币贬值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货币贬值将通过鼓励出口增加美元供应量，通过限制进口减少美元需求量。但是，他们相信，普遍使用货币贬值会通过定价过高以致无人问津而强加自身的痛苦，并认为这将破坏建立固定汇率的目标。

逐渐地，随着欧洲和日本从战争中恢复，美元短缺变成了美元过剩。因为美国商品定价过高从而在世界市场上无人问津，美国的通胀恶化了美元过剩。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有国际收支逆差。因此，外国建立了对美国的短期美元债权。外国的中央银行持有大部分债权。其中有些债权被转换成黄金，这使人们担心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最终将破坏世界货币体系。事实上，如果美国不对央行持有美元施加外交压力，黄金转换量将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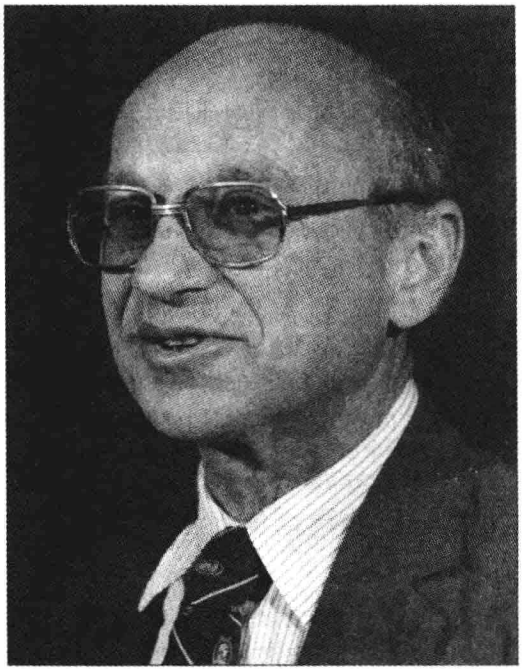
美国国际收支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变得十分尖锐。世界上的美元远远超过在诺克斯堡的黄金，挤兑美国黄金储备导致世界金融体系崩溃的可能性，似乎即将发生。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同时“关闭了黄金窗口”，并强制实行工资价格管制制度。关闭黄金窗口只是指拒绝美元兑换黄金。重建固定汇率的短暂尝试——《史密森协定》（Smithsonian Agreement）于1971年12月达成；它要求固定汇率，但是，一个又一个国家开始对美元自由浮动本国货币。这一系列事件由米尔顿·弗里德曼领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们的思想所加强，他主张外国货币的价格应该像小麦、汽车和电脑的价格一样在市场上确定。一时间，一些人希望世界能够回到固定汇率，但是这并没有发生。由此产生的汇率制度经常被称为“肮脏浮动”（dirty float）。私人供给和需求是汇率的主要决定因素，但中央银行经常干预，当市场力量的结果不能让它满意时采取购买或出售货币的措施。

1971年采取的价格管制试图使美国公民确信政府正对通货膨胀采取一些措施。管制也与正发生在美元上的事情紧密联系在一起。情况是，国际收支问题主要是由美国的通胀引起的，因为通货膨胀使进口更具吸引力而出口更缺乏吸引力。价格管制将为美国把内务管理妥当争取时间。

价格管制经历了一系列阶段。前3个月被称为第Ⅰ阶段，是价格冻结时期。由于禁止所有价格上涨不能在不产生短缺和回避要求配给的情况下长期有效，必须推行具有更大灵活性的制度。在第Ⅱ阶段，价格和工资分别由物价委员会和工资委员会规定。这些机构有权对个别市场具体对待。

在第Ⅱ阶段1972年的通货膨胀率只有3.3%，低于1967年以来的水平，并低于后来再次出现的通货膨胀直到1983年。价格管制获得了大部分的赞同，虽然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通胀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降低。在管制成为经济的永久部分前开始取消它们的时间看来很合适。在1973年1月开始的第Ⅲ阶段，规则放松了，



© BETTMANN/CORBIS

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市场的坚定捍卫者，他主张缓慢而稳定的货币存量扩张、弹性汇率制、完全志愿军队和自由贸易。该主张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及90年代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

其管理由企业负责。通货膨胀由1972年的3.3%加速至1973年的6.2%。更糟的是，反复无常的食品指数以惊人的14.5%的年增长率上升。

价格管制受到相当多的批评。保守派抱怨说，通货膨胀率上升的原因是第Ⅰ阶段、第Ⅱ阶段被抑制的通货膨胀再也无法控制。自由派抱怨说，尼克松政府蓄意破坏该计划，因为它太有效。

作为对批评和通货膨胀加速的回应，肉类价格于1973年3月被冻结，并于6月对所有价格实施冻结。出现了肉食短缺；许多超市的肉食柜台实际上是空荡荡的。短缺因控制的取消日期的公布而加剧；由于几乎肯定知道肉类将获得更高的价格，大牧场主们拖延他们的牲畜进入市场的时间。这一事件说明了经济推理命题3（激励很重要）。注意，这里的激励是未来巨大收益的可能性。

由于肉类短缺，其他行业出现价格扭曲、规避与上涨，价格管制计划惨遭失败。第Ⅳ阶段取代了1973年8月的冻结Ⅱ期。（它实际上是第Ⅴ阶段，但到那个时候，没人去算。）在这个阶段，价格按行业部门放开。

管制计划对物价的整体影响是什么？1974年，消费品价格以12.2%的年增长率飞速上升。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在价格控制下建立的通货膨胀压力的释放。其他人怀疑大量抑制性通货膨胀是在第Ⅲ阶段后留下来的，看看其他因素，例如在石油和食品供应方面的冲击，以及对以往货币存量增加的滞后反应——来解释通货膨胀的加速。大多数统计研究一致赞同价格管制抑制通货膨胀在一段时间有效，但在效果和持续时间上意见不同。

如果冻结Ⅰ期及第Ⅱ阶段产生的平静已被用来实施限制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可能已经因这些管制措施而以稳定的价格复苏，正如它在朝鲜战争后的复苏一样。然而，这是不可能的。货币存量从1970年12月至1971年12月以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速度13.5%上升，从1971年12月至1972年12月以13.0%增长。①

1974年的通货膨胀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经济中运行的货币存量增加的结果。财政政策会导致通货膨胀。在1971年和1972年赤字分别高达230亿美元和234亿美元。在之前的战后时期，只有一年出现过更高的赤字，但通常它已小得多。目前尚不清楚为什么货币和财政政策在这些年的扩张如此快速，但可能价格管制本身也有问题。通过创建通货膨胀已受到控制的假象（以及如果通胀加速则归咎于新创造的一批人），价格管制的存在鼓励美联储关注减少失业问题。无论如何，很清楚，以高昂代价买到的回到稳定价格水平的机会失去了。

卡特时期与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的威胁

在吉米·卡特总统上台后，他的政府有杜绝长期通货膨胀因素的极好机会。相反，它着手刺激经济。要求增加社会保障福利的政治压力、退伍军人的福利、农业补贴、公务员退休金、州补助金、福利计划及其他预付款开支受到卡特政府和国会的热烈欢迎。同时，货币政策是强烈扩张的。从1975年到1976年，货币存量以13.7%的年增长率增长，从1976年至1977年，它以10.6%的速度增长。到1978年秋，通胀上涨的速度是两年前的2倍。

随着民意调查显示，通胀是“头号敌人”，卡特不得不采取行动。卡特的反通货膨胀计划最终包括以下内容：（1）承诺降低政府开支增幅；（2）承诺降低联邦赤字；（3）呼吁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效率；（4）制定一套工资物价上涨的“自愿指导方针”。不到一年，该计划很显然是一种徒劳的行为。自愿控制证明特别令人不安。一些大公司和工会被忽略，但其他更小、较少政治势力的团体被迫遵守。实质上，自愿控制成为选择性应用的强制控制。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继续上升。

在卡特小组的主要成员发表了互相冲突的公开声明后，混乱局面开始盛行。当得知价格在一个月内上升了1.1%，总统的“反通胀盟军”阿尔弗雷德·卡恩说，“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但不是非常多；在极大程度上它取决于消费者。”与尼克松不同，他可以声称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973年至1976年期间的石油价格上涨及其他外部冲击是由于通胀，卡特团队找不到人分担责任，除了全国私营部门。②

---

① 货币有各种定义，这取决于其中包括哪些金融资产。经济学家对什么是“最好”的定义有分歧。这些数字是针对M2的，其中包括现金和在商业银行的存款。

② 虽然由石油输出国组织造成的财富大转移无可争议，它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目前还不太清楚。联邦德国和瑞士比美国更容易受到石油输出国组织和农作物歉收所产生的实际冲击，但它们通过不懈努力，设法减少其货币增长及降低通货膨胀，使得这些冲击在1972年和1976年之间消失。

这些年，新闻媒体有助于促进这一错误的强调。常规地，记者会说，本月通胀的大部分是由住房价格、食物价格或能源价格的上涨，或者任何该月价格上涨最多的商品引起的。这样的上涨是通货膨胀的结果，但是，它们并不导致通胀。

大通胀

在1979年和1980年，通货膨胀（图27—1）达到两位数的水平，引起对经济灾难的普遍恐惧。未预见到价格上涨的债权人受损，而债务人获益，但即使是获益或跟上通胀的很多人也害怕如果他们失策，通货膨胀会迅速降低他们的生活水平。

1976—1980年通胀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利率的上升。1965年后利率不规则地上升，在经济衰退时期下跌，但在随后的扩张时期过度弥补。在明显动荡的1980年，优惠利率（the prime rate，历史上，优惠利率是北美银行提供给信用等级最高、风险最低的贷款客户的贷款利率）在4月份上升了20%，在盛夏前下跌至11%，在圣诞节前达到历史最高纪录21%。高利率持续于整个1981年并进入1982年年初。

通货膨胀显然是造成利率上升的重要因素。经济学家们早就认为，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通货膨胀溢价（inflation premium）会被纳入利率。当未预期到价格上升时如果贷款人和借款人可以商定一个10%的利率，如果预期价格将上升5%，那么他们应设置15%的税率。当没有预期到通货膨胀时，通货膨胀会消灭5%的本金值，并且利息使得贷款人与借款人留在相同的实际位置。在历史上，通货膨胀和利率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像这个例子所说明的那样准确，但随着通货膨胀持续，信贷市场学会密切关注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率和利率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经济学家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个学习过程中的老师。

随着利率和房价的上涨，许多人发现自己无法购买仅仅几年前似乎已在其掌握之中的新房。在战后时代的头十年，每一代人会过上比上一代人有更多物质的舒适生活的想法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现在，这一观点存在疑问；很多家长担心自己的孩子前途渺茫。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发现很难获得住房，老年人正在为社会保障制度的困境忧虑：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支付增加会使该制度破产吗？

图27—3详细说明了这次通货膨胀。这些数字可能会诱使人们指责价格上涨最快的部门。但是很显然，价格的普遍上涨并非源于任何一个部门。所有部门，尽管有差异，都对潜在的通货膨胀做出反应。

正如在大萧条时期，政府的许多政策是在20世纪70年代为有需要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救济而开始实施或扩大的。例如，随着食品价格上涨，食品券分发得更宽松，但这些措施未能防止民众失去对政府保护未来的能力的信心。

民意调查显示公众信心下降，这不会使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感到惊讶。在他1991年的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中，他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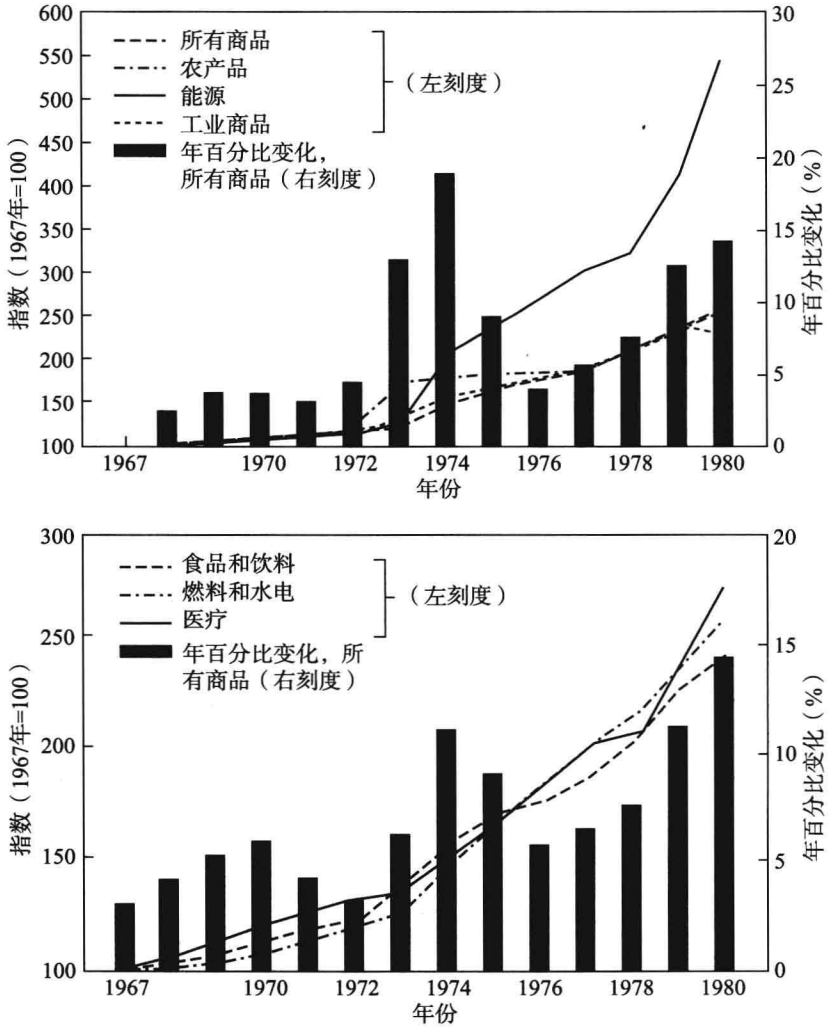


图 27—3　（上）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967—1980 年
（下）消费者价格指数，1967—1980 年

资料来源：Charts prepared by the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据说，列宁曾说过，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最好的方法就是使它的货币贬值。通过通货膨胀的持续过程，政府可以偷偷摸摸且神不知鬼不觉地没收本国公民财富的重要部分。通过这种方法，他们不但没收，而且还是任意没收；而该过程使许多人陷入贫困时，它居然使一些人变得富裕。这种财富任意再分配的景象不仅打击安全，而且打击对现行财富分配公平的信心。制度给这些人带来的暴利超出了他们的功德，甚至超出了他们的期望或欲望，他们成为“奸商”，他们是因通货膨胀而变得赤贫的资产阶级的仇恨对象，不亚于无产阶级对他们的仇恨。随着通货膨胀的继续和货币的实际价值每月波动很大，构成资本主义的最终基础的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所有长期关系，变得如此完全无序以至于几乎毫无意义；财富

的获取过程退化成投机和博彩。

列宁是极为正确的。要推翻社会的现有基础，没有比使货币贬值更微妙、更确实的手段了。这个过程占用了支持毁灭的经济规律的所有隐藏力量，但是，在一百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人了解这一方式。①

货币主义和它的传承者

“滞胀”，与高通胀并存的高失业，也破坏了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信心。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们相信存在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失业可以以持久的高通胀为代价持久地降低。参见经济透视27.1。现在，他们意识到，菲利普斯曲线只是代表暂时的取舍。一旦工人和雇主开始适应新的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将开始向后移动至其“自然”率。

许多经济学家对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新观点做出了贡献；也许最有影响力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他1967年对美国经济学会的演说——《货币政策的作用》解释说，增加货币增长在一段时间内减少失业，因为一开始价格上涨的速度将超过工资，实际工资将下降。但是，一旦工人明白，他们将要求工资的增加与价格上涨一致，而失业率也将回到它的“自然率”②。

政策含义是明确的。政府不应试图通过货币和财政政策将失业率降低到尽可能低，因为这将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率。一个稳定的货币和财政框架将是更好的选择。正如凯恩斯在刚引用的那一段话中所提到的，新思想很少立即执行；相反，它们逐渐影响决策者。

经济透视27.1

☞ **菲利普斯曲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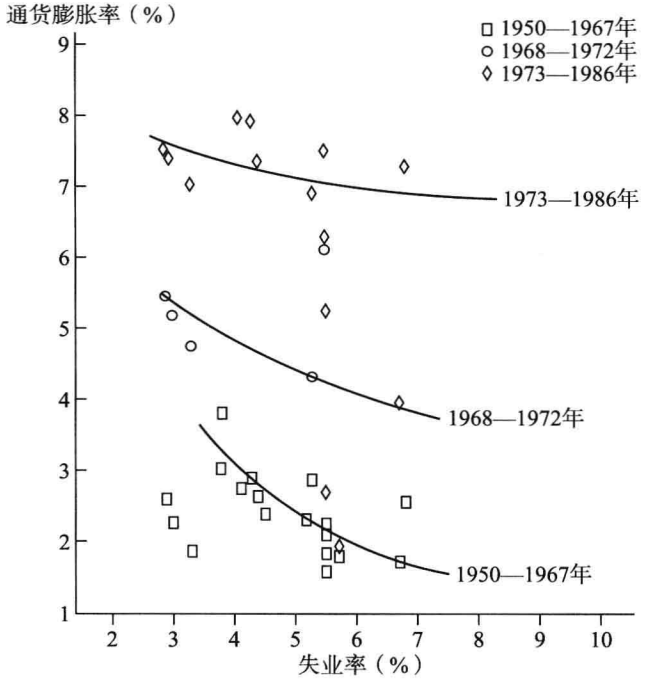
下图显示了菲利普斯曲线，它描述了在失业（横轴）和通货膨胀（纵轴）之间的关系。最初，人们认为取舍是稳定的。例如，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一个低失业水平。其结果应该是高工资上升率（当替代工人很少时工会自然会斗争），随着工资增加获得通过，高价格增加率得以实现。政策制定者，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面临着一个稳定的“选择菜单”，可以选择适合他们喜好的通胀和失业的组合。关注美元价值的共和党，会选择高失业率和低通货膨胀；关注低收入工作者的民主党，会选择低失业率和高通货膨胀。

---

① John Maynard Keynes,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19), 235 - 236.

② 自由派经济学家更喜欢术语“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因为它对其是否是一个“好”速率的问题未做出结论。

下图显示了这个清楚的看法所产生的结果：菲利普斯曲线稳步上移。经济学家用新的理论回应该曲线：也许是由于更多年轻工人进入劳动力大军，或者是由于年轻人不愿意工作。然而，随着移动不断继续，该曲线接受了严密的检查。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埃德蒙·菲尔普斯极力主张不是通货膨胀率而仅仅是实际通胀和预期通胀的差距增加利润及减少失业。连续地更高的菲利普斯曲线由连续地更高的预期通胀产生。此外，由于预期最终总是适应实际通胀，没有永久的取舍发生。后来，由罗伯特·卢卡斯领导的经济学家认为，由于人们合理地形成预期，取舍可能不存在，即使在短期内。一条曾经似乎是稳定的向下倾斜的曲线已成为一团围绕着一条垂直线的云。



货币主义实验?

认识到卡特总统的政策没有奏效及美国民众对抑制通货膨胀的前景越来越失望，美联储终于采取重大步骤。1979 年 10 月 6 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了政策的根本转变。从此以后，利率在他们的决策中将没那么重要。将更多地重视货币总量（货币存量的不同度量），新技术将被引入以控制货币存量的增长。

这种转变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货币主义者来说似乎是个胜利，他们根据他们对货币史的研读早就形成了四个要点：（1）通货膨胀主要是一个货币现象——“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因此，为了降低通货膨胀，美联储不得

不减少货币存量的增长。(2) 货币影响经济具有长期、可变的滞后。因此，最简单的政策是最好的：逐步将货币存量增长率降低到一个低速率，然后保持稳定。企图微调经济最终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3) 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取舍一直是暂时的。同样，结论是不要试图微调经济。(4) 利息率是一个误导性的货币政策指南，美联储在长期无法控制它。在大萧条时期，低利率已经发出了银根宽松的误导性信号。当时的高利率正在发出银根很紧的误导信号。

一种相关但不同的有关“理性预期”的思想认为反通货膨胀、失业及减少产量的代价很大程度上是错误期望的结果。如果工人继续基于高通胀预期要求工资高增长，且这些预期落空，则工人最终会失去市场。记住经济推理命题 2：选择涉及成本。这一思路的政策含义也很清楚：如果人们真的相信美联储会坚持其新政策，货币政策即使有了突然改变也将造成极少损失。

再次，政策制定者向学院派经济学家请教有关如何管理经济的思想。当然，政策制定者不能强迫以货币主义者所希望的方式进行实验。货币主义者抱怨说，不是平滑并缓慢降低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而是增长率的波动正在变得比以前更大。正如在肯尼迪-约翰逊时代，政策制定者可以口头上支持想法和采纳适合他们的部分方案，而忽略他们不想听到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采用一套新理论有个好处，就是如果政策不奏效或如果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很高，可以指责货币主义者。

© AP/WIDE WORLD PHOTOS

保罗·沃尔克，美联储主席，是主张紧缩银根以降低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领导下，美联储降低了货币存量的增长速度，通货膨胀急剧下降。通货膨胀率在 1980 年和 1981 年从 13.3%下降至 8.9%。在整个 1982 年上半年，通货膨胀率低于 6.0%。为抓住机会以消除通货膨胀，贯穿于 1981 年和 1982 年年初，沃尔克顽强地坚持他的政策。尽管失业率

从1979年的5.8%上升至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1982年的9.5%，他依然这样做。[①] 放松紧缩的货币政策的政治压力很强烈，但美联储坚定不移。在1982年，通胀率是3.9%。然而，反通货膨胀的成本很高，尽管一些经济学家预测：一旦美联储物价稳定的承诺得到认真对待，真正的调整将很小。当然，根据以往经验，这一次没有什么理由认为美联储靠得住。

从1982年开始，美国经济开始了截至当时为止和平时期最长的扩张（见表27—1）。失业率逐步下降，而延续到罗纳德·里根的剩余任期，通货膨胀均保持在可容忍的水平。两届任期之后，里根作为战后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于1989年离任。里根的大部分名望基于他上任和离任时经济状况的对比。

究竟该记录有多少是因为货币政策很难说。该时期的讽刺之一是，经济似乎不用经历返回高通货膨胀率就能够吸收大量新的资金。从1980年12月至1986年12月，货币存量以9.0%的年增长率增长。一些观察家认为这是正常的，只要经济正在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谷底复苏。其他观察家建议撤销对银行体系的管制，特别是银行存款的付息独立增加了货币需求。

总之，随着货币存量迅速增长，经常地超过美联储宣布的目标，并且几乎没有不可接受的通货膨胀率的证据，美联储逐渐放弃了它对货币增长的重视，并开始再次关注利率。

罗纳德·里根和供给学派经济学

在1980年选举中罗纳德·里根的压倒性胜利及国会特别是参议院权力的急剧转变，对共和党来说，同时提供了一个变革的任务和实现它的联盟。里根政府刚成立不久，就迅速采取行动落实里根的经济竞选承诺。这些集中在通过降低边际税率达到大规模减税（特别是非常高的收入）、消除联邦赤字、削减联邦政府在消费和管制以及军队建设方面的作用。

再一次，一个新的经济思想流派在改变经济政策过程中颇具影响力。供给学派经济学家如阿瑟·拉弗认为，高税率阻碍经济增长。降低税率将给人们更多激励去工作、投资和创新。降低税率通过扩大税基甚至会产生更多税收，从而帮助平衡预算。税率和税收之间的关系形成著名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超过一定范围，提高税率会增加收入，但在另一些点，额外的增税会导致工作努力的大量削减和逃税的增加，然后总税收将减少。拉弗和其他供给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已经进入此范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一致认为高税率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生产力，许多人怀疑降低税率的影响是否有供给学派认为的那么大。在争夺共和党提名的竞选中，里根的对手乔治·布什讲了许多，他把通过减税来平衡预算的想法指责为“巫术经济学”（voodoo economics）——在供给学派理论的批评者中广泛传播的一个术语。

选举结束后，国会迅速行动，在3年内减少23%的所得税和其他税收，但开

① 这一事实在媒体上频繁重复使许多人误以为失业率几乎和大萧条期间一样高。当然，情况并非如此。参见第23章。

支方面的削减却难以实现。[①] 正如负责削减支出的戴维·A·斯托克曼在他的回忆录《政治的胜利》（*The Triumph of Politics*）中告诉我们的，即使是最常识性的削减都被“铁三角”坚决抵制：在私营部门的政府支出的直接受益者、执行该计划的政府官僚，以及获得受益者特别感激的国会议员。

减税、经济衰退、未能削减建议支出以及军事预算的增加使联邦预算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地产生了赤字。表 27—2 显示了在里根总统时期赤字的加速增长和问题的长期性。如表 27—2 所示，在 1985 年财政赤字达到 GDP 的 5%，并在下一个十年，占 GDP 的比例虽然逐渐下降但仍然是一个很高的比例。

表 27—2　　联邦政府的赤字，1940—2001 年

年份	十亿美元	占联邦支出的百分比（%）	占 GDP 的百分比（%）
1940	−2.9	30.53	2.86
1950	−3.1	7.28	1.05
1960	0.3[a]	0.33	0.06
1970	−2.8	1.43	0.27
1980	−73.8	12.49	2.64
1985	−212.3	22.43	5.04
1990	−221.2	17.65	3.81
1995	−164	10.82	2.22
2000	236.4[a]	13.22	2.41
2001	127.3[a]	6.89	1.26

a. 盈余。

资料来源：*Th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3*（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4), Tables B-1 and B-80.

这种赤字会有什么后果？一些经济学家预测，庞大的联邦预算赤字将导致实际利率（市场利率减通货膨胀率）飞涨，因为赤字意味着大量增加的信贷需求将面临不变的供给。但无论如何，信贷供给证明比原先预期的更有弹性。外国贷款银行涌入美国市场，购买政府债券、私人证券、房地产和其他资产。实际利率没有飞速上涨，尽管进出口差额越来越大，但美元仍保持强劲（可以兑换大量外汇）。外资贷款银行有一天会对美国经济失去信心总是有可能的，但“清算日”

① 这通常被称为减少 25%，但它是在三年内逐步削减了 10%、10%和 5%。这些累积为 23%：1−(1−0.10)×(1−0.10)×(1−0.05)=0.23。

© REUTERS NEWMEDIA INC. CORBIS

1987 年，艾伦·格林斯潘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他对货币政策的巧妙处理因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扩张而备受称赞。

证明比许多人预期的来得更漫长。

经济学家警告说，用来资助赤字的税收在阻碍资本的形成。当总统乔治·布什于 1989 年 1 月上任时，那时人们十分关注联邦赤字。在竞选期间，布什曾承诺将继续执行里根的政策。他通过宣称“仔细听好了：没有新的税收”对民主党下战书。但是，当 1990 年和 1991 年的经济衰退使得预算赤字更高时，他放弃了这个承诺。当克林顿于 1993 年 1 月宣誓就职时，赤字仍然是个大问题。不过，快速的经济增长解决了这一问题。如表 27—2 所示，到 2000 年出现了庞大的盈余。被证明是短暂的新担心是如何用尽盈余，而不是如何偿付赤字。

美联储的格林斯潘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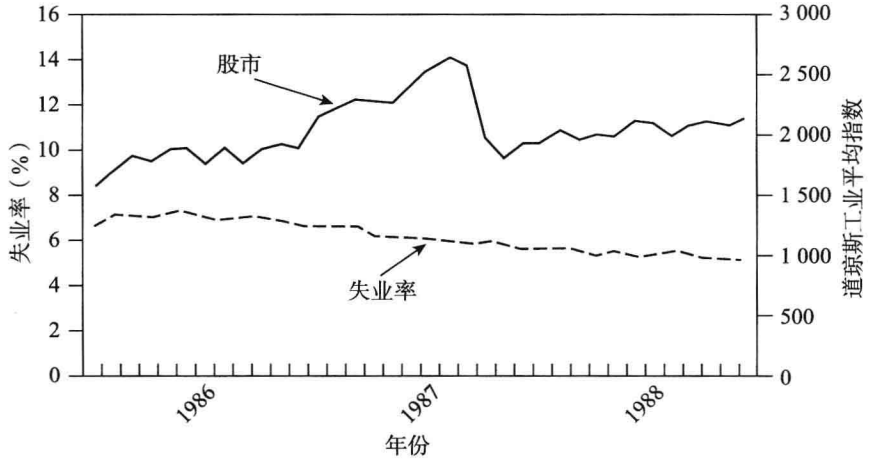
1987 年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任命经济学家格林斯潘掌管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格林斯潘在 20 世纪的剩余时间继续任职并进入 21 世纪，他是任期最长的主席，并获得令人羡慕的声誉；参见备受欢迎的格林斯潘传记《大师》。[①] 他很快就受到了考验。在接管美联储后仅仅几个月，股市突然暴跌。整个金融系统即将崩溃的恐惧在广泛蔓延（参见视角 27.1）。

① Bob Woodward,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视角 27.1

股市崩盘会引起萧条吗

由于还未完全清楚的原因，1987 年发生了一次严重的股市崩盘。一种广泛使用的指数（在下图中以右坐标轴测量的实线表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在 1987 年 9 月和 10 月之间下降了 26%。在这次崩盘刚结束的那段时期里，很多人预期 1929 年和 1930 年发生的事件会重演：快速陷入严重的萧条。但是，这并没有发生；例如，用失业率（如图中左坐标轴衡量的虚线所示）代表的实体经济保持稳定。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因通过向金融市场注入额外的流动资金立即做出反应而受到赞扬。从该案例也可学到一个关于基于有限根据妄下定论的危险性的教训。诸如“股市崩盘引起萧条”的结论不能可靠地建立在对一个历史事件匆忙解读的基础上，无论其多么引人注目。正如经济推理命题 5 提醒我们的，结论必须接受一系列事实的检验。



格林斯潘安排向市场注入大量临时资金，从而有助于平息恐惧和恢复秩序。这一时期也存在其他金融危机：1995 年墨西哥债务危机和 1997 年东亚债务危机。在这两种情况下，格林斯潘支持激进的措施以帮助遏制危机。在管理经济方面，他没有坚持米尔顿·弗里德曼所主张的货币供给量应该以年复一年相同的速度增长的看法，但他确实坚持旧货币主义者的传统，强调物价稳定是美联储可以而且应该做到的最终目标。

1991 年 3 月（表 27—1），经济达到了低谷，从此开始了史上最长的经济繁荣。繁荣并没有结束，直到 2001 年 3 月，整整十年后。这次扩张由一个庞大的投资繁荣（investment booms）所驱动，因为个人电脑的使用和侵入到经济中的互联网改变了美国人工作和娱乐的方式。用句俗话说就是，美国人在“连线”。

股市繁荣与投资繁荣相伴随，正如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景象一样。从1991年3月的3 018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几乎翻了四番——到2000年1月高峰值为11 750点。其中包含更多的受青睐的高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甚至上涨得更多。

在此期间，格林斯潘因保持持续扩张且未将经济推向螺旋式上涨的通胀而受到颇多赞扬。认识到若干因素——提高生产率增长和与比传统情况低的失业率水平相一致的价格稳定——格林斯潘着手调整货币政策。股市繁荣产生了持续的担心。因此，格林斯潘试图利用自己的巨大声望发表讲话以将市场降温到他认为更可持续的水平。他对股市屈从于“非理性繁荣”的描述被广泛引用。不过，有段时间，市场甚至忽略了联邦储备委员会著名的主席。一切好东西，至少是所有的经济扩张，都会结束。股市暴跌，实际投资大幅下降，而失业率上升。2001年3月，失业率为4.2%；到该年年底，为5.8%。据官方的测定，20世纪90年代大繁荣之后的经济衰退并不是特别长；从2001年3月至2001年11月只有8个月（表27—1）。然而，尽管布什总统推动通过了一次重大的减税及联邦预算从盈余转向赤字，正如本书所述，这次间歇期之后的扩张看起来毫无活力。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用政府和美联储的批评者偏爱的术语来说，它已经是“无就业复苏”。通过凯恩斯主义的手段（瞄准利率）实现货币主义结果（物价稳定）的新货币正统是否将被证明足以满足新的经济环境还有待观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比大萧条前更稳定吗

在战后时代的大多数时间，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已变得更加稳定，当然是与大萧条比，但与萧条前相比也是如此。他们认为，更大的稳定性是经济结构变化（制造业和农业的相对下降及服务业的兴起）和财政货币政策完善的结果。

克里斯蒂娜·罗默质疑这个观点。她指出，在战后时期可得的失业人数、GDP及类似变量的原始数据的解释力和可靠性大大超出了20世纪早些时候。她认为，关键的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异性减少，仅仅是有更好的估计结果：改善是一个“数据的虚构”。为了证明她的观点，罗默在时间上将战前估计延长。换句话说，她估计了战后失业、GDP等，好像她不得不凑合用仅有的“坏”的战前原始数据。她发现了可在表27—3看到的一个例子。官方对1948—1982年估计的数字显示在第二行，罗默的估计在它们下方的括号中显示。关键的变化是失业率的标准差。传统的数据显示有一个从2.38%至1.58%的大幅下降，表明了更大的稳定性。罗默表明，如果战前估计失业的方法已用于战后时期，降幅本将从2.38%降至2.24%，表明稳定性几乎没有改善。罗默的工作受到了质疑，但它使得经济学家对于现代决策的要求更加谨慎。[①]

① 对罗默工作的批评，参见 David Weir, “The Reliability of Historical Macroeconomic Dat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rory* 46 (June 1986): 353 - 365。

表 27—3	失业率的替代测算方法	
年份	平均值（%）	标准差（%）
1900—1930（官方）	4.84	2.38
1948—1982（官方）	5.41	1.58
1948—1982（罗默）	(5.52)	(2.24)

资料来源：Computed from Christina Romer, "Spurious Volatility in Historical Unemployment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986): 3, 12.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Blinder, Alan S. *Economic Policy and the Great Stagfl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Bordo, Michael D., and Barry Eichengreen. *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s: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Brownlee, W. Elliot. "The Public Sector."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Ⅲ,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013 - 1060.

Brunner, Kari and Allan H. Meltzer, eds. *The Economics of Price and Wage Controls*.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6.

Eckstein, Otto. *The Great Recession*.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8.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Materials on the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 minneapolisfed. org/sylloge/history. html.

Friedman, Benjamin M. "Postwar Changes in the American Financial Market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Martin Feldste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Friedman, Milton.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 (March 1968): 1 - 17.

Friedman, Milton, and Anna J. Schwartz. A *Momen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Gordon, Robert J. "Postwar Macroeconomics: The Evolution of Events and Idea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Martin Feldstein. Chicago: Uni-

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Understanding Inflation in the 1980s."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 16, no. 1 (1985): 263 - 299.

Heller, Walter W. *New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New York: Norton, 1966.

Lucas, Robert E., Jr. "Econometric Policy Evaluation: A Critique." In *The Phillips Curve and Labor Markets*, eds. K. Brunner and A. H. Meltzer.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on Public Policy, Vol. 1.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6.

——. "Understanding Business Cycles." In *Stabilization of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y*, eds. Karl Brunner and Allan Meltzer. Carnegie-Rochester Conference Series, Vol. 5.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77.

Okun, Arthur M. "Measuring the Impact of the 1964 Tax Reduction" In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Growth*, ed. Walter W. Heller.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helps, Edmund S. "Phillips Curves, Expectations of inflation and Optimal Unemployment Policy over Time" *Economica* 34 (1967): 254 - 281.

Phillips, A. W. "The Relation between Unemployment and the Rate of Change of Money Wage Rat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1861—1957." *Economica* 25 (November 1958): 283 - 299.

Roberts, Paul Craig. *The Supply-Sid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Romer, Christina. "Is the Stabilization of the Postwar Economy a Figment of the Dat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1986): 314 - 334.

——. "Spurious volatility in Historical Unemployment Dat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1986): 1 - 37.

Sachs, Jeffrey. "The Changing Cyclical Behavior of Wages and Prices, 1890—1976."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1980): 78 - 90.

Schultz, George P., and Kenneth W. Dam. *Economic Policy beyond the Headlines*. New York: Norton, 1977.

Stein, Herbert. *The Fiscal Revolution 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 *Presidential Economic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4.

Stockman, David R. *The Triumph of Politics: How the Reagan Revolution Fail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Sundquist, James L. *Politics and Policy: The Eisenhower,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8.

Tobin, James. *The New Economics One Decade Older*.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Weir, David R. "The Reliability of Historical Macroeconomic Data for Comparing Cyclical Stabilit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June 1986): 353 - 365.

White, Eugene N. "Banking and Finan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Ⅲ,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73 - 802.

Woodward, Bob. *Maestro: Greenspan's Fed and the American Boom*.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第 28 章　制造业、生产力和劳动力

本章主题

虽然许多其他国家都希望增强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在整个 20 世纪却下降了（相对于其他部门）。如表 28—1 所示，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削减了一半，从 1950 年占劳动力的 25.6%到 2001 年占劳动力的 12.8%。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相对下降和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绝对下降）是对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长的结果，消费者越来越有能力购买更便宜的来自国外的工业品，而且制造业的生产率却在不断提高。

但是相对衰落的画面，不该导致认为该部门停滞不前的想法。在战后时代，制造业发生了巨大变化。新产业出现并代替旧产业。新生产技术获得通过。兼并和收购浪潮淘汰了老企业，创造了新的巨头。能源危机迫使公司改变固有的做法。“裁员”改变了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反垄断政策逐渐为经济学家的观点所改良。

就业模式

美国劳动力市场在战后时代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变革。在需求方面，发展的关

键是服务业或政府部门的增长。到1992年，有2/3的工人在私人服务机构或政府服务部门工作。供给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20世纪60年代的道德觉悟大大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将许多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成员局限于美国经济生活边缘的歧视性壁垒减少了；移民法发生了改变，以消除世界上某些地方的人入境的限制配额。此外，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包括家有幼儿的妇女，急剧上升。

这些变化的一个后果是工会的衰落，在20世纪50年代，它的权力达到了最高点，其成员在之后的几十年里只看到自己的影响力在减弱。最后，在20世纪后期，这些变化使得实际工资增长放缓，特别是对于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它预示着可能给21世纪留下一个令人不安的遗产。

表28—1　　制造业作用的变化

年份	制造业中的雇佣人数（百万人）	制造业雇佣人数占劳动力的份额（%）	制造业产出占GNP的份额（%）
1950	15.1	25.6	28.0
1960	16.2	24.6	26.9
1970	18.9	24.0	23.9
1980	19.8	20.0	20.8
1990	18.7	15.7	17.8
1999	18.3	13.7	16.2
2001	17.3	12.8	1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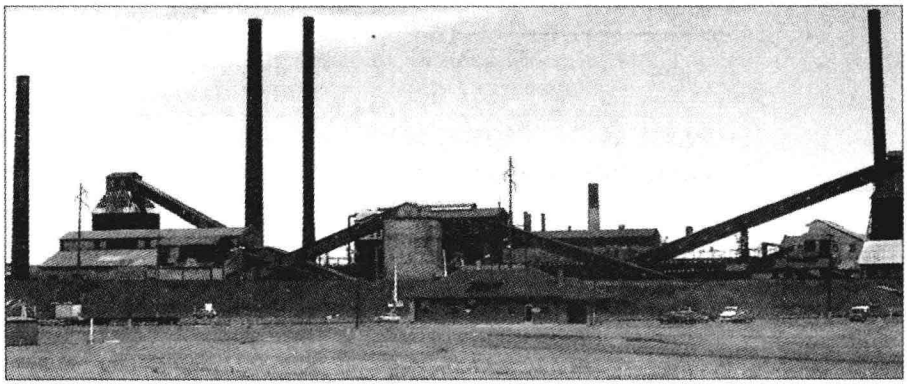
资料来源：劳动力：*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3*（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311；制造业中的雇佣人数：*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s 6.5B, 6.5C；制造业产出占GNP的份额：*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1*（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285；GNP：*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NIPA Table 1.9。

破坏性创新风暴

很久以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通过破坏老产品的市场推出新产品，用他的一句名言就是通过“破坏性创造风暴”，资本主义不断向前发展，不论是好是坏。①

① Joseph Schumpeter, “The Analysis of Economic Change,”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 17 (4), (May, 1935), 2-10. 有关熊彼特强调重大创新的批判性评估，参见Nathan Rosenberg,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chapter 4。

战后时代为熊彼特的结论提供了丰富的证据。在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抗生素行业具有最高的平均增长速度——以惊人的每年118%，电视机产量几乎一样大；家用冰箱及烘衣机紧随其后。而在另一边，拖拉机、机车、人造丝和醋酸的生产放缓。一些行业的产量却在下降。消费者偏好的变化能够解释其中的一些下降，如烟斗和嚼烟，羔羊和羊肉的例子。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倒退的行业已成为来自新产品的竞争的牺牲品。电视伤害了电影产业，改变了广播节目制作，出现了体育比赛的问题，影响了图书销售和餐馆用餐。网络电视，反过来，一直受到有线电视、DVD和互联网发展的影响。某一商品的生产方法，也可能被新方法淘汰。比导电性能相当的铜电缆更坚固、更轻的钢筋铝电缆，夺取了高压输电线路业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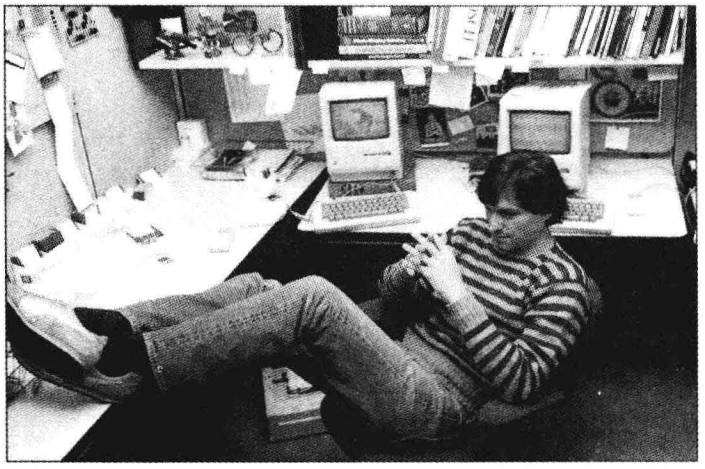
工厂关闭，特别是东北部和中西部“生锈地带”的“传统制造工业”的关闭，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导致了就业机会的重大损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自动洗衣机、电视机、家用冰箱、空调、除湿机及干衣机获得了成功。随着20世纪60年代的进展，中央空调和电加热系统为家庭支出份额的迅速增加而相互竞争。在20世纪70年代，随着家庭转向相机、音响、船、露营车及其他休闲设备，花在老产品的新设计方面的娱乐及职业支出暴涨。

今天，正如在过去，美国制造商不断努力开发新产品。熊彼特认为，寡头和垄断的主要理由是它们发展了使研究和创新的过程制度化的大型科研部门。在熊彼特看来，有市场支配力的公司通过推出新产品将保持或增加其支配力，而竞争性公司或独立实验室却可能难以筹集投资于研究和发展的资金。然而，随后的研究对垄断和寡头在研发方面发挥的中心作用提出了质疑。一方面，有市场支配力的公司似乎往往注重旨在保护其垄断力量的小革新。如拍立得照相机（Polaroid camera）和间歇式挡风玻璃雨刮器（intermittent windshield wiper）等新产品往往来自小企业或独立发明家。[①] 互联网和生物技术领域已经表明，风险资本家愿意支持新的企业。

① 对证据的回顾，请参见 Frederic M. Scherer, *Innovation and Growth: Schumpeterian Perspectiv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chapter 11。

最重要的是，计算机说明了不同类型的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作用。有一段时间，看起来好像由 IBM 主导的主机电脑业务将成为规范。其次是个人电脑革命打破了共识预测，使得 IBM 不断追赶。然后在一段时间内看起来好像苹果电脑及其操作系统将占主导地位，但不久它就被微软及其 Windows 操作系统取代。参见视角 28.1——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与约翰·D·洛克菲勒的财富比较。



© JEFFREY AARONSON/NETWORK ASPEN

史蒂夫·乔布斯与苹果公司个人电脑的早期版本。但是，作为一个先驱者，并不能确保其在产业中的地位。到 20 世纪末，该行业快速的技术变化使得苹果公司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微软。

视角 28.1

比尔·盖茨和洛克菲勒一样富有吗

美孚石油公司（Standard Oil）的创始人约翰·D·洛克菲勒，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的人。虽然估计不同，但人们常说，在 1913 年洛克菲勒的财富达到高峰，约为 10 亿美元。这个数字如何与当今最大的财富——在 2003 年估计约为 430 亿美元的比尔·盖茨的财富比较？显然，我们不能直接用 2003 年的美元与 1913 年的美元比较。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我们需要将 1913 年的美元通货膨胀。目前的消费价格指数约为 1913 年的 18 倍，按这个标准，洛克菲勒的财富，约值今天的 180 亿美元。盖茨更富有。不过，我们可以在其他方面做些比较。例如，我们可以使用 GDP 来比较他们的财富。洛克菲勒的财富相当于 GDP 的 2.73%，但盖茨的财富只相当于 GDP 的 0.41%。用一句稍微不同的话说，相对于洛克菲勒在 1913 年的经济规模，盖茨在今天拥有相同的财富将需要 2 850 亿美元。根据这个标准，洛克菲勒更富有。没有单一“正确”的方式可以比较这些财产。为了了解由这些财富资助的慈善组织可以购买多少商品和服务，消费者价格指数（CPI）比较可能是更好的标准，但要了解每个人有多大的权力和影响，GDP 比较可能会更好。适当的衡量实际上取决于其选择重点。

更多有关如何把东西转成今天的钱的信息可以在经济史协会的网站上找到：http://www.eh.net。

比尔·盖茨，计算机软件巨头微软公司的创始人，由“现代洛克菲勒”创办的该公司会持久吗？这很难说，但请注意，埃克森公司（Exxon）是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的后代。

一些经济史学家认为这些“创造性破坏风暴”使得生产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分配。其他人则认为是路径依赖的结果。参见经济透视 28.1。一些偶然事件决定所采取的路径和最终目的地。也许政府的干预可以确保经济将结束在正确的地方。

经济透视 28.1

☞

路径依赖

有时，经济史学家发现聚焦于一个从围绕着更复杂的历史过程的许多问题抽象出来的简单例子更有用。例如，很多经济史学家怀疑微软的胜利和 Windows 操作系统是路径依赖。如果比尔·盖茨在计算机革命早期运气不好，史蒂夫·乔布斯或者其他某个先驱运气很好，我们可能已经以一个不同的可能更好的标准操作系统而告终。讨论在微软背景下的路径依赖的问题是，我们必须将这个问题从

众多的其他问题中理清，包括商业惯例、知识产权等。因此，许多经济史学家讨论了一个在简单案件的背景下的路径依赖。一台电脑键盘左上方的六个键拼成QWERTY。据称，最初分配给这些字母的键是为了让打字员减慢速度，以及防止第一批机械打字机的键盘受干扰。现在，根据这一情况，消费者无法摆脱这个效率不高的设计，因为这个错误的道路（从我们的角度看）是19世纪当电脑仍是未知时就已经选择了。保罗·A·戴维在他的著名论文《克里欧和经济学的标准键盘》中首次提请经济史学家注意这个例子。斯坦利·J·莱博维兹（Stanley J. Leibowitz）和斯蒂芬·E·马戈利斯（Stephen E. Margolis）在一篇题为《键的寓言》的论文和其他作品中质疑戴维的观点。莱博维兹和马戈利斯认为，替代性键盘的好处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大，一些人表明如果政府为了社会利益而强制使用一个新键盘很可能是一个错误。你可在 http://eh.net/lists/archives/eh.res/阅读经济史学家之间的一场关于路径依赖和QWERTY的引人入胜的讨论。

生产力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冲击市场的新产品浪潮伴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事实上，增长是如此之快，有些观察家开始谈论第二次工业革命。然而，大约自1970年后，生产率增长放缓。正如图28—1所示。这幅图绘出了在非农商业部门每劳动小时的产出增长率。为了使图形更易于阅读，我们绘出了3年移动平均。[①] 经济放缓开始的确切日期（或过渡期的年数）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当你看图时你可做出你自己的判断——但战后时代初期和中期的反差巨大。生产率的增长放缓是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关注，因为在市场经济中，生产率是实际工资的根本决定因素之一，稍后我们会回到这个主题。

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放缓？许多因素都在起作用。（1）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生产转变是一个重要因素。服务业质量的提高非常难以衡量，以至于产量增长可能已被低估。（2）正如迈克尔·达比所认为的，劳动力结构的变化解释了大部分的放缓。许多年轻并因此没经验的工人在20世纪70年代第一次加入劳动力大军。[②]（3）在20世纪70年代，每单位劳动力投入的资本增长也放缓了。在一定程度上，这可能是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扰乱金融市场和阻碍储蓄的结果。（4）20世纪70年代高度变化的通货膨胀率可能也有扭曲价格信号，并且阻止了资源被重新分配给它们最有效的用途。当通货膨胀每个月急剧变化时，工人或资本所有者很难知道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下降了，因为他们处在一个衰退的行业或者因为他们的名义收入已暂时落后于价格。（5）一些过失也应归咎于遵守新的政府法规的高成本，它产生于在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更

① 1970年数字是1969年、1970年和1971年的平均值。移动平均常被用于平滑数据，以便观察者能专注于长期趋势。

② Michael R. Darby, "The U. S. Productivity Slowdown: A Case of Statistical Myop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June 1984): 301 - 322.

多立法，也许因为20世纪80年代制造业生产率的反弹应给放松管制一些赞扬。(6) 当石油价格大幅上涨时，一直依赖于廉价且丰富的石油的工农业生产者突然被迫适应更高的价格。大量投资要求用于把旧设备替换成高效能设备，即使在新设备每劳动小时生产相同产出的情况下。20世纪末，生产率增长开始上升，这在第29章的图29—1中很明显。适应能源价格的上涨、计算机革命和企业重组都促成了生产率的增长，和之前的下降一样出乎意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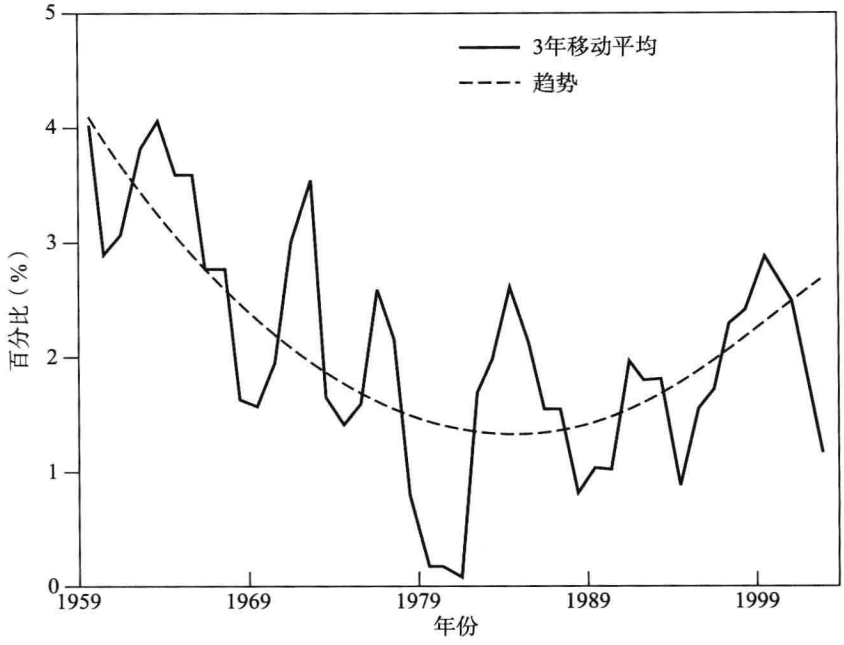


图28—1　1959—2001年非农商业部门每小时的产出增长率：3年移动平均

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降至贫血水平，但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增加得更快。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Series D-684；and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2003*（Washington, 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Table B-50，328.

能源危机

从1973年开始，当时控制了世界石油市场大部分份额的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始施展其权力。极具破坏性的是1973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之后的石油禁运。当美国采取价格管制以保护消费者不受价格上涨损害时，其结果是在加油站排长队：通过等待时间而不是通过价格进行配给。

这次经历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应对“能源危机”的根本辩论。它是否应该通过政府行为——配给、对穷人的补贴及对于新能源的联邦支出——或通过价格机

制？官僚的做法曾经尝试过。联邦能源署（Federal Energy Administration）成立于1974年，一个内阁级别的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接着于1977年成立。大范围内的联邦能源项目的支出增加。但到最后，许多痛苦调整是价格上涨的反应。美国人通过购买小型汽车（其中许多来自外国厂商）、使他们的房子绝缘以及投资于更节能的生产工艺来削减他们的能源消耗。在供给方面，较高的价格使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外的国家的石油生产迅速增加，从而削弱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垄断力量。价格体系像它的许多鼓吹者曾提示的一样有效，尽管可能没有他们中的一些人所预期的快速和轻松。

能源危机的规模及其结果可从表28—2中的数据读出。第1列显示了原油价格发生的变化。正如你能看到的，它急剧上升，并且到1980年是它在1970年的6.75倍那么高。然而，在第2列所示的石油的实际价格（石油价格除以平均价格）没有上升得那么快。换句稍微不同的话说，石油生产商能够在1970年到1990年之间将其产品价格提高6.3个因子，但它们只需2.11个因子就能改善其“贸易条件”。这是个大幅增长，但远小于20世纪70年代做出的可怕预言。事实上，自1980年以后，原油价格不能跟上通货膨胀的步伐。第3列所示的各种能源的价格也因能源危机而上涨，但以一个更小的比例上涨。石油价格冲击产生了使用成本较低的可替代石油的能源形式的激励，但随着需求转向这些资源，其价格也上涨了。

表28—2　　能源危机

年份	原油价格（当前美元/百万BTU）	原油价格（1996年美元/百万BTU）	各种能源的平均价格（1996年美元/百万BTU）	能源消费（千BTU/1996年美元GDP）
1970	0.55	1.89	5.67	19.10
1975	1.32	3.30	8.33	17.79
1980	3.72	6.52	12.08	16.10
1985	4.15	5.64	11.36	13.49
1990	3.45	3.99	9.59	12.60
1995	2.52	2.57	8.45	12.07
1999	2.68	2.56	NA	10.85

注：BTU为英制热能单位的英文缩写。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1), Table 954 (price of crude oil), 948 (energy prices), and 945 (energy consumption).

能源价格上涨的结果显示在表28—2的最后一列，它说明了每1美元实际GDP的能源使用量。这一指标从1970年到1975年只下降了5%。从短期来看，可做出的调整是有限的。也许车主能做的最多就是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旅行。然

而，从长远来看，更多的调整是可能的。到1990年，能源利用已下跌了近30%。从长远来看，消费者可以购买更小、更省油的汽车，搬到离工作或公共交通近的地方，等等。能源危机是经济推理命题2和3的经典例证；选择涉及取舍和激励。做出这些调整对经济造成了损失。本来可为增加产量的投资提供资金的储蓄却被用于保护能源或开发替代能源。

产业组织的变化

企业之间的兼并、一家公司被另一家收购以及剥离是公司设法提高其生产力并最终提高其盈利能力的主要途径。例如，生产同一产品的几家公司的组合，可让合并后的公司实现单独的每个企业不能实现的规模经济。即使公司生产不同的产品，合并它们利用精英管理可能利润更大。在20世纪，几次不同的合并浪潮已经并再次塑造了美国的产业结构。

回顾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兼并和收购一波接一波地来到，一般在非常激烈的经济活动时期达到顶点。例如，20世纪20年代带来了业务合并浪潮，在某些方面，它比得上1897—1904年的大合并运动。而且，这些浪潮通常产生了由担心大公司正在接管经济的恐惧驱使的公众的强烈反对。20世纪20年代的反对合并运动因信仰加强，即广泛存在的垄断导致了大萧条。

战后时期发生了三个兼并浪潮：（1）在1966—1969年期间尤其明显的混合兼并浪潮；（2）在1977—1989年期间尤其明显的恶意收购浪潮；（3）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且仍在进行的为实现规模经济的并购风潮。

混合兼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首次兼并浪潮中，主要形式是混合兼并，它合并生产无关商品或服务的公司。在1964—1972年间，该次浪潮的顶峰，所有兼并的约80%是混合兼并。这种合并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多样化该公司采取的行动来减少商业周期或在个别市场意外冲击的不利影响。混合兼并的特点是它的管理机构。一个小的精英总部工作班子处理一般事项，诸如财务规划、资本分配、法律和会计任务、业务研究之类。

林恩-坦科-沃特公司（Ling-Temco-Voight，LTV），第一批和最成功的企业集团之一，作为一个年销售额少于700万美元的名为林恩电子（Ling Electronics）的小公司于1958年开办。在接下来的10年，林恩收购或合并了坦科飞机公司（Temco Aircraft）、钱斯-沃特公司（Chance-Voight）、奥科耐特公司（Okonite）、威尔逊公司（Wilson & Company）、威尔逊体育用品公司（Wilson Sporting Goods Company）、大美国集团（Greatamerica Corporation）以及约24家其他公司。它在1968年的总收入近30亿美元。当LTV在1969年收购琼斯和劳克林

钢铁公司（Jones and Laughlin Steel Company）时，该合并意味着全国百家最大公司名单上的两个公司相结合，使 LTV 变成美国第十四大公司。

可比结果可通过其他兼并获得，比如海湾与西方工业公司（Gulf and Western Industries）、ITT 公司（International Telephone and Telegraph）、博益智·卡斯卡德公司（Boise Cascade）、利顿工业公司（Litton Industries）和自动喷洒器公司（Automatic Sprinkler Corporation）。这些以及其他一些混合兼并创造了第一次兼并浪潮的辉煌及快速的融资行动。这一浪潮于 1969 年达到顶峰。在 20 世纪 70 年代，许多兼并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多样化的公司被证明比预期更难以管理，而多样化无法使得合并企业远离传统企业所经历的困难。

恶意收购

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并购活动再次出现。在 1975—1985 年，宣布合并和收购的数量增加了 30%以上。合并后的企业价值（按 1975 年的价格）从 120 亿美元增长到 900 亿美元。诸如垃圾债券（junk bonds）和杠杆收购（leveraged buyouts）之类的新术语以及诸如 T·布恩·皮肯斯、卡尔·伊坎和迈克尔·米尔肯之类的新人物主导着财经版。

在典型情况下，诸如皮肯斯和伊坎这样的企业掠夺者（corporate raiders）把认为价值被低估的公司作为目标。然后，他们发行垃圾债券（高风险因而高收益的债券）。向被收购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提供这些债券和现金的一些组合。米尔肯——德雷克塞尔·伯纳姆·兰伯特投资银行公司（investment banking firm of 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领导——帮助组织希望在与买家收购时利用垃圾债券的企业家。米尔肯坚持认为，基于垃圾债券的历史纪录，在长期这些债券很少具有一般人所认为的高风险。他和他的购买者往往忘记的是，通过他自己的行动，米尔肯改变了市场，以至于他的许多垃圾债券无法正确地与以往发行的债券进行比较。

收购企业如何能给普通股支付比它目前的市场售价更高的价格？最终，每个杠杆收购（杠杆是债务资本比率）取决于由公司收购产生的收入可以增加足以支付新债务利息的金额并仍为股东留下足够回报的信念。增加收入的许多方法包括更换不称职的管理层，开发所持有的未被充分利用的天然资源，以及减少对养老基金的“过度”贡献。

杠杆收购和垃圾债券的捍卫者认为，这些技术提高经济效率。批评者认为，杠杆收购艺术家只是为了短期收益剥夺公司宝贵的资产和欺骗愚蠢的垃圾债券购买者。此外，批评者指控由此产生的许多公司的债务资本率极高，它们将在未来经济衰退期间无法按期偿还它们的利息。

垃圾债券市场的下跌如它的上升一样迅速。1986 年，德雷克塞尔成为正在进行的对由套汇人伊凡·波斯基操作的内幕交易的调查目标。[①] 1989 年德雷克塞

① 当基于来自该公司管理层且未向公众公布的信息购买或出售证券时，“内幕交易”发生了。

尔被迫解雇米尔肯，他之后因其在丑闻中的角色蹲大牢。几个月后，零售领域的垃圾债券大型发行人——坎普公司（Campeau Corporation），遇到流动性危机，使垃圾债券市场急转直下。立法禁止美国储蓄机构持有垃圾债券的规定也促成了该下滑，尽管只有少数储蓄银行曾经大举建仓垃圾债券。1990 年，自身持有大量垃圾债券库存的德雷克塞尔宣布破产。新的垃圾债券发行及其在公司收购中的使用结束了一段时间。

回想起来，垃圾债券市场壮观的盛衰是一种症状，而不是 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高利率和金融市场动荡的原因，它使得投资者寻找新的且更灵活的融资形式。

寻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战后第三次并购浪潮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这一次，公司通过合并或收购能够填补它们的“核心竞争力”的公司以力求实现规模经济。1966 年化学银行（Chemical Banking）和大通曼哈顿（Chase Manhattan）的联合产生了一个占有纽约消费市场更大份额的更精简的公司。在其他情况下，公司通过市场营销寻求规模经济。这似乎是吉列公司（Gillete）收购电池制造商金霸王公司（Duracell）的背后动机。

第三次并购浪潮的背后驱动力是什么？咆哮的股市是一个因素。公司发现通过发行股票筹集资金比较容易。宽松的反垄断环境是另一个因素。

自从大萧条以来，反托拉斯政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在 20 世纪 30 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一阶段，司法部和法院对似乎限制竞争的兼并和商业惯例持敌对态度。在这个阶段，法院普遍遵循本身违法原则（per se rules）。例如，法院通常认为，一个大的市场份额控制本身（本质上）是非法的。公司因为提供了高品质的产品或者已收取“公平”价格而获得了很大份额不是抗辩理由。

反托拉斯政策的第二阶段开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当时法院开始注重针对规则本身的批评家，这些人认为规则本身与健全的经济分析往往不一致，而且因为如此，经常弊大于利。许多杰出的批评家，如罗伯特·博克、哈罗德·德姆塞茨和理查德·波斯纳等，均与芝加哥大学著名的法学和经济学课程有关。法经济反垄断学派强调了几点。首先，大的市场份额通常是有效管理或创新的结果。解散这些企业可能会造成效率损失，该效率比从更大的竞争带来的好处以及（可能）降低的价格更重要。在美国铝业公司（Alcoa）裁决中，勒尼德·汉德法官已经把美国铝业公司建设新产能远远超过需求的做法视为趋向垄断的危险做法。而法经济学派从另一面看待此事，将美国铝业公司作为一个应该祝贺而不是惩罚的有远见的例子。其次，即使权力下放的行业在长期可以实现高效率，也可能会产生高过渡成本。而且，这种反垄断行动，可能会阻止其他公司开展产品创新和成本削减。再次，即使在一个行业中只有少数公司竞争仍然有效，因为勾结企图往往容易受挫，而且潜在进入者的数量可能很大。

因此，20 世纪末的合并浪潮类似于 19 世纪末的合并浪潮。在这两种情况

下，公司通过合并或收购相同或密切相关领域的公司来寻求规模经济。在这两种情况下，一个蓬勃发展的股票市场发挥了作用。而在这两种情况下，调控政策是原因之一：在19世纪末，兼并由根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一个松散的公司联盟将受到批评的恐惧所驱动，而在20世纪末，兼并被创建更具效率的公司将幸免于法院的起诉的信心驱动。

服务业的兴起

劳动力需求最重要的变化是“白领”（服务）业的增长，服务业是包括零售贸易、金融、教育、医疗、娱乐等的多样化分组。表28—3显示了这一增长。1955年，服务业提供了所有工作的约41%；到2002年，它提供了将近64%。下降的主要行业是农业、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它们的共同份额由1946年的44.5%下降到2002年的20.2%。农业在1970年之前的时期下跌最迅速。就像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在评论这一章时所说的，“东西”的生产相对“话语”的生产下降了。

表28—3　　1955—2002年职位的分布占总雇佣人数的比例（%）

年份	农业	制造业、矿业和建筑业	服务业	政府
1955	11.3	35.9	40.7	12.1
1960	9.2	34.3	42.6	14.0
1970	4.7	31.7	46.7	16.9
1980	3.6	27.4	51.7	17.3
1990	2.9	22.1	58.8	16.3
2000	2.4	19.0	63.2	15.3
2002	2.4	17.8	63.9	15.9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3*（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3），Table B46.

行业的盛衰可用需求结构的变化解释。随着实际收入上升，对某些产品如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增长缓慢，然而对某些服务的需求迅速增加。例如，医疗技术的迅速改善和联邦资金的增加带来了与健康有关的职位数量的迅速增长。通货膨胀和放松管制鼓励金融业企业提供一系列新产品。

与制造业和农业的生产率增长相比，服务业的生产率增长一直很缓慢。这导致实际工资的增长放缓。[①]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公众在其他行业投入越多，

① 应当指出，服务业的生产力是出了名的难以衡量。为了说明该困难，菲利普·科埃略（Phillip Coelho）提出以下问题：与牙医使用1950年应用的技术来补牙相比，我们将为2002年牙医的补牙服务支付多少呢？

经济将增长得越快。一些行业的扩展对其他行业具有有利影响。例如，教育的生产率增长可能会相对缓慢，但教育领域的扩展通过提供新技术和受过更好教育的工人对制造业有利。

服务业的增长也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在制造业中，需求下降往往迅速导致失业。然而，在白领部门，雇主往往愿意继续雇用职工，因为他们有专业知识或者与客户有长期合作关系。基于这个原因，服务业的兴起往往倾向于缓和在战后时期经济衰退对就业的影响。

劳动力中妇女的角色变化

战后劳动力供给最引人注目的趋势是妇女的比例有所增加，特别是（参加工作或积极寻求工作的）属于有偿劳动人口的已婚妇女。表 28—4 显示了每隔 10 年间隔的重要比率。已婚妇女的参与比例从 1960 年的 32%增长至 2001 年的 61%。孩子不到 6 岁的已婚妇女中（未显示在表 28—4 中），变化甚至更大，从 1960 年的 18.6%增至 1994 年的 61.7%。权威人士喜欢指出，如《反斗小宝贝》（*Leave It to Beaver*）等电视喜剧——最初播放于 1957—1963 年——描绘了一个家庭中若母亲没有外出工作，则不再代表典型的美国家庭的现实。

表 28—4　　1960—2001 年有偿劳动力中男性和女性的参与率（%）

年份	已婚妇女	已婚男子	单身女性	单身男性	总计
1960	31.9	89.2	58.6	69.8	59.4
1970	40.5	86.1	56.8	65.5	60.4
1980	49.8	80.9	64.4	72.6	63.8
1990	58.4	78.6	66.7	74.8	66.5
2000	61.3	77.3	69.0	73.5	67.2
2001	61.4	77.4	68.2	72.6	66.9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section 12, table 562, 6; table 568, 10.

在劳动力中，已婚男性的比例大幅下跌，在某些情况下因为他们的妻子获得的额外收入使得这样的选择是可行的。单身女性和单身男性的劳动参与比例增加了。最终的结果是，美国人的有偿劳动参与比例在战后时期稳步上升，在 21 世纪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有偿劳动力中妇女的参与比例提高是经济、政治和文化趋势的结果。换句稍有不同的话说，我们既需要经济推理命题 3——激励很重要，也需要经济推理命

题4——制度很重要，来解释劳动力中妇女角色的转变。[1]

（1）实际工资增长。男性实际工资增长，这往往阻碍已婚妇女的劳动力参与，但对女性可得的更高的实际工资的影响占主导。

（2）20世纪以来受教育年限大大增加。约10%的1900年出生的非白人妇女和约30%的1900年出生的白人妇女高中毕业；到1970年，这些数字已分别增至80%和90%。通过额外的教育使收入增加成为可能，这鼓励妇女参与有偿劳动。当然，这个因素见效存在很长的时滞。对一些妇女来说，她们未能看见教育对劳动力参与的全面影响，直到她们已经过了养儿育女的需求最大时的年龄。

新观点 28.1

自动化和裁员

在20世纪80年代各种新技术的实施造成了许多工人失业。例如，基于计算机的技术的迅速发展，使电话公司能够增加每日通话数量，从1984年的12亿个增至1990年的95亿个，同时将其劳动力从1984年的742 000人减至1990年的648 000人。这些技术的使用是许多其他行业“裁员”或减少劳动人口的一个因素。通用汽车公司（General Motors）从1979年到20世纪90年代初由800 000人减至450 000人；在通用电气公司（General Electric），它在同一时间段从402 000人减至298 000人。但是，正如一些企业很快就知道的，事实证明，由经验丰富的下岗职工提供的专门知识的损失比预期的代价更高。

当引入新技术时丢失的工作最终会被新工作取代吗？这是经济学中最古老的问题之一，而且当失业率上升时它会重新出现。在19世纪，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大卫·李嘉图认为，新机器的引进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能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卡尔·马克思阐述了因织布机而流离失所的手摇纺织机工人的困境。今天，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失去的工作最终将被取代，因为由技术创新产生的节省成本将以更低价格的形式转移到消费者身上，让消费者有更多的钱花在其他商品和服务上。因此，技术进步不必然产生大量失业。在20世纪最后十年这个大经济扩张期（最长的纪录），其中就业人口从1992年的1.18亿人增长到2000年的1.35亿人，失业率从劳动力的7.5%下降到4.0%，有利于证实面对快速的技术进步经济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想法。

然而，新工作将取代旧工作的信心不该使我们对来自技术进步的苦难无动于衷。其技能曾经带来溢价率（premium rates）的工人，通常是老工人，可能会发现自己在竞争低薪职位。知道总就业人数在增加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安慰。

（3）一个家庭的平均子女数从20世纪初的3～4个下降至20世纪80年代的1～2个，而且女性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总之，这些人口发展趋势意味着在

① G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eration Ga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138-149.

家庭的抚养负担减少之后，妇女有很多时间追求事业。

（4）增加的离婚率鼓励妇女投资于家庭以外的事业。这些趋势的相互作用是复杂的。例如，虽然离婚率上升鼓励妇女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有偿劳动力中妇女参与率的上升，鼓励一些早期无法承受离婚的妇女选择离婚。换句话说，原因和结果相互联系，相互转化。

（5）迅速增长的服务部门，特别是文职和教育部门，对女性特别有吸引力。直到1950年，由于对已婚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的歧视，这些行业的增长主要影响的是单身的白人妇女。随着歧视性的雇佣做法被打破，这些行业发展的影响传播得更广泛。

（6）耐用消费品日益增长的可用性和技术水平影响了对家居维修的劳动力需求。电动洗衣机和电冰箱、低维护面料、电话应答机和其他节省人力的设备减少了家居维修的劳动力投入。

（7）女权运动通过道德说教和政治行动帮助消除对女性工人的歧视。一些壁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打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企业存在“婚姻障碍”。这些公司根本不雇用已婚妇女，而且强迫在工作后结婚的妇女离职。婚姻障碍在大萧条期间作为配给稀缺工作的一种方式变得特别普遍。一个理由是，让可能已经有家庭经济支柱的一个已婚妇女去工作从而让唯一支持全家生计的某个男人得不到工作，这是不公平的，到1950年，婚姻障碍几乎已经消失（除了乘务员），而且一些人事经理高度青睐已婚妇女。

另一波行动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1961年肯尼迪总统任命的以值得尊敬的埃莉诺·罗斯福为名誉主席的妇女地位总统委员会（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the Status of Women）是出发点。一定程度上是该委员会建议的结果，国会通过了要求同工同酬的1963年《同酬法案》（Equal Pay Act of 1963）。《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第七章于次年通过，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国籍或性别在就业、升职或解雇工人中的歧视，并成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以协助执行法律。①

1965年，约翰逊总统创建了联邦履约项目办公室（Office of Federal Contract Compliance Program）来要求与联邦政府做生意的雇主提交反歧视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计划。反歧视行动不只是没有种族成见、性别中立的劳工政策；它要求付出积极的努力来寻找传统上被歧视的工人。全国妇女组织（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成立于1966年，一定程度上旨在迫使政府严格执行新的反歧视法规。

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经历了进一步的成功。1972年《教育修正法》（Educational Amendments Act of 1972）第九章将《民权法案》扩展至教育机构；第九章的后果之一是增加了妇女对高中和大学体育的参与。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女权运动似乎失去势头且无法赢得重要的立法胜利。但是，在20世纪

① 性别一词直到它获得通过的前一天才出现在议案中。曾经有人声称，它最初是带着使该法案对于大多数人不可接受的想法被插入，但这个问题仍不清楚。参见 Claudia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1，以及书中引用的参考资料。

60 年代和 70 年代创建的机构继续争取取消歧视性障碍。

性别差距

尽管有了联邦立法、增加的教育和经验，以及雇主对妇女能力的更好了解，男性和女性的收入之间相当大的差距仍然存在于各种职业。基于该领域的顶尖专家——克劳迪亚·戈尔丁的工作，表 28—5 显示了在 1890 年、1930 年、1970 年和虽然数据没有严格比较的 2001 年的 6 个主要职业分类的性别差距。令人惊奇的是，在 1930—1970 年，性别差距持续存在且它在各个职业类别除了“专业”类均存在增加的趋势。不过，看来自 1970 年以来，向同工同酬的进展已经发生在大多数行业，“专业”领域除外。一个相当大的差距依然存在。

表 28—5　　性别差距——女性与男性的收入比

职业	1890 年	1930 年	1970 年	2001 年[a]
专业	0.26	0.38	0.71	0.71
文职	0.49	0.71	0.69	0.81
销售	0.59	0.61	0.44	0.62
体力劳动	0.54	0.58	0.56	0.74
服务业	0.53	0.60	0.56	0.76
农场	0.53	0.60	0.59	0.84

a. 因为这一列基于不同的数据来源，只能与其他列进行粗略比较。

资料来源：1890—1970 年：Claudia D. Goldin,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64; 2001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section 12, table 613, 403。

在这漫长时期，产生妇女相对收入增加的主要因素是妇女教育的增加和通过说服和立法实现的歧视性社会规范的崩溃。然而，妇女劳动参与率的增加，未能使性别差距缩小更多。不断增加的参与率意味着妇女劳动力经验的平均年数仍然相对较低，因为有很多人刚刚进入劳动力大军。此外，由于歧视往往阻止她们进入某些领域或发展，进入劳动力的妇女拥挤到对她们开放的领域，从而阻止这些领域的工资和其他经济领域上升得一样快。随着女性劳动参与率的稳定和由经济创造的全系列工作均对妇女开放，性别差距应该会进一步下降。

婴儿潮

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决定与家庭构成和生育的决定密切相关。在大萧条时期出

生率骤降。例如，15～44岁黄金生育年龄的女性，生育率从1929年的每1 000名妇女生育89.3个孩子下降到1936年的75.8个。随着战争期间恢复繁荣，出生率再次上升。1942年，出生率达到91.5‰，超过1929年，虽然它在1944年和1945年下降。

1946年，“婴儿潮”出现了。毫无疑问，婴儿潮的早期存在部分地归功于因战争分离的夫妇的团聚，但它持续的时间远远超出这是一个重要因素的时期。如图28—2所示，婴儿潮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末，然后出生率则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受抚养儿童人口比（14岁以下儿童与20～54岁妇女的比率）稍晚些达到高峰。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在该时期后期和其他变量一起趋于平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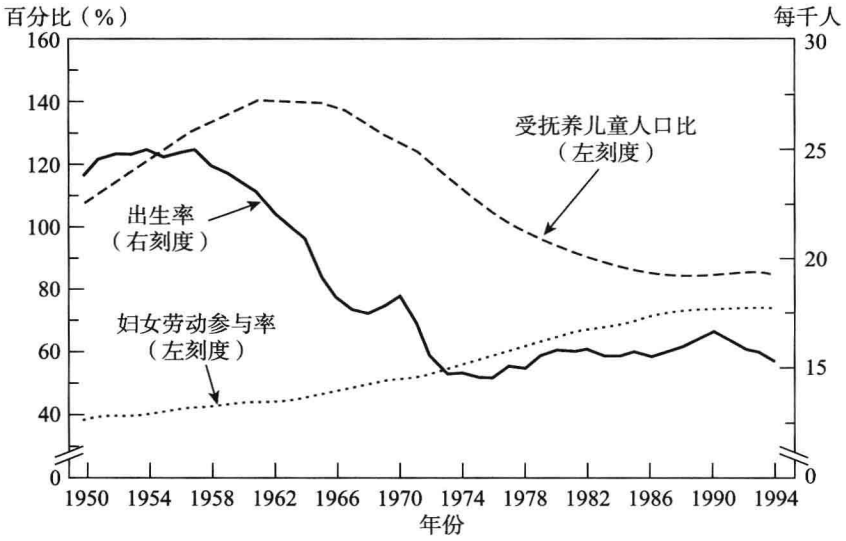


图28—2　出生率、妇女劳动参与率和受抚养儿童人口比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6*（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6), 57.

婴儿潮是一个复杂的现象，但对未来经济状况的预期无疑是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逆转：强劲的经济和对未来的乐观鼓励美国人开始组建或扩大家庭。在20世纪50年代末高峰期过后，人口出生率开始大幅下降，在20世纪70年代达到非常低的出生率。事实上，在缺乏移民的情况下自然生育率是如此之低，人口有可能已经下降。

出生率下降有几个原因。而且，盛行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和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的不确定性一样，阻碍家庭形成和生育。如图28—2所示，出生率下降也与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了有偿劳动力的决定有关。20世纪60年代开始使用高度有效的口服避孕药，也促成了出生率下降。①

① 对口服避孕药可用性的复杂影响的详细讨论，参见Claudia Goldin and Lawrence F. Katz, “The Power of the Pill: Oral Contraceptives and Women's Career and Marriage Decision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527*, February 2000, http://www.nber.org。

少数族裔

在战后时期，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工人进入经济主流的努力具有重要但有限的成功。表 28—6 显示了从 1950 年至 2000 年以 10 年为时间间隔，非洲裔美国人与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与白人的中等家庭收入的比率。这些数字没有调整影响种族之间收入的差异性：父母的年龄和工作经验，子女数目，家庭的地理位置等。然而，这个比率提供了一个寻找经济平等的粗略指标。奇怪的是，对于非洲裔美国人，增加的比例似乎已经主要局限于 1960 年至 1970 年。对于西班牙裔美国人，自 1980 年以来的变化也很小。

表 28—6　非洲裔与西班牙裔家庭和白人家庭的收入比，1950—2000 年

年份	非洲裔—白人	西班牙裔—白人
1950	0.54[a]	NA
1960	0.55[a]	NA
1970	0.61	NA
1980	0.58	0.73
1990	0.60	0.71
2000	0.69	0.76

a. 包括其他种族。

资料来源：1950—1965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87*（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8），436；1970—1990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1），466；2000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section 13，table 653，433。

非洲裔美国人

人们可能已经预料到导致非洲裔美国人发展迅速的两个因素：（1）他们受教育年数的增加；（2）非洲裔美国人劳动力的地理再分配。对于今天已经知道主要的非洲裔美国人学校的人满为患和资金不足的大学生来说，可能难以相信相比以前目前已经取得了很大进展。原因是，现在很难想象，譬如，在 1940 年事情是如何糟糕。那时，80%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劳动力只有小学学历，而 40%只接受了不到 5 年的教育。

如表 28—7 所示，在战后时期，非洲裔美国人男性获得学校教育的数量差距大大缩小。在 1940 年，与白人男性的 24.2%相比，只有 6.9%的超过 25 岁的非洲裔美国男性完成了高中学业。到 2000 年，与白人男性的 88.5%相比，79.1%的非洲裔美国男性高中毕业。非洲裔美国妇女的类似改善也有记录。在教育质量上的差距虽然更难以衡量，但可能也大幅缩小了。

表 28—7　1940—2000 年不同种族、性别且年龄为 25 岁或以上已完成 12 年或更多教育的人口比例（%）

年份	白人	非洲裔美国人	西班牙裔美国人
		男性	
1940	24.2	6.9	NA
1950	34.6	12.6	NA
1960	41.6	20.0	NA
1970	57.2	35.4	NA
1980	72.4	51.2	44.9
1990	81.6	65.8	50.3
2000	88.5	79.1	56.6
		女性	
1940	28.1	8.4	NA
1950	38.2	14.7	NA
1960	44.7	23.1	NA
1970	57.7	36.6	NA
1980	71.5	51.5	44.2
1990	81.3	66.5	51.3
2000	88.4	78.7	57.5

资料来源：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2002*，chapter 1，table 8，http://www.nces.gov.

非洲裔美国人至少在最初阶段，也从他们的人口地理再分布中受益。1940 年，白人和非洲裔美国人巨大的工资差距存在于北方和南方，而非洲裔美国人的差距大得多。非洲裔美国人从工资低的南方快速迁移是被这个差距所驱动，而且倾向于减小这一差距。1940 年，75%的非洲裔美国人生活在南方；到 1980 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 53%。

尽管存在这些趋势，涨幅因歧视而缓慢且停滞不前。反对歧视的斗争长期而艰巨。1947 年，当杰基·罗宾逊打破了大联盟棒球中的肤色障碍时，最有名的

里程碑之一发生了。这一点很重要，不仅是对战后时期将在职业体育谋生的非洲裔美国人，而且因为它对白人对非洲裔美国人能力的成见产生了影响。

民权运动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公平就业法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一些州通过的这些法律，成立了可对有歧视的企业发出暂停及终止命令的委员会。到出台1964年《民权法案》为止，98%的南方以外的黑人都被涵盖在这些法律内。最近威廉·柯林斯的研究表明，这些法律在改善非洲裔美国妇女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取得一定成功，但在改善非洲裔美国男性的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收效甚微。

1954年，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中裁定种族隔离学校不符合宪法。这一裁决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许多学校特别区（school districts）当时声称它们给非洲裔美国人提供隔离但平等的教育（最高法院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裁决），但事实并非真的如此。正如罗伯特·马戈记载，非洲裔美国人学校系统上经费不足，而且非洲裔美国人进入劳动力有严重障碍。[①]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没有在一夜之间带来改变。许多学校特别区故意拖延，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法院开始命令校车接送实现种族融合时，在许多领域才取得重大进展。

其他歧视明显的迹象，比如隔离式运输，也由于民权运动而摇摇欲坠。该运动的高潮是1963年8月在华盛顿的游行，该运动的青年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发表了令人难忘的题为“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讲。不到一年后，《民权法案》通过，除其他事情（如前面提到的）以外，它规定就业歧视是非法的。见新观点28.2。

和来自联邦政府的压力一样，民权运动本身带来了变化。正如加文·赖特在他的一本富有思想的书《老南方，新南方》中所解释的，南部的政界及商界领袖正试图吸引新企业到南方来；他们很快认识到，如果他们想继续成功地争取外部资金，民权风暴的迅速解决是必要的。1970年，艾利斯-查默斯公司（Allis-Charlmers Corporation）的总裁访问了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表示了对于在那里建厂的怀疑，因为杰克逊州立大学非洲裔学生和当地警察之间的暴力冲突不断。结果是，当时长达7年的融合教育问题上的僵局终于被打破，而艾利斯-查默斯公司宣布了建设计划。[②]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平等的进程缓慢。原因之一是，当反歧视斗争从目标是明确的法律的南方转移到目标是隐含的社会规范的北方，基于法定程序的进展证明更难以实现。此外，正如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在《真正的劣势阶层》（*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一书中所示，在许多较老的北方城市里制造业就业机会的丧失，沉重地打击了非洲裔美国人，他们是由于这些工作才被吸引到这些城市。

---

① See Robert Margo, “Race Differences in Public School Expenditures: Disenfranchisement and School Finance in Louisiana, 1890—1910,” *Social Science History* 6 (Winter 1982), and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in Segregated Schools: The Effects of Separate but Equ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September 1986).

② Gavin Wright,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sinc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266-267.

新观点 28.2

衡量《民权法案》的影响

正如约翰·H·多诺霍三世和詹姆斯·赫克曼所示，联邦政府制止歧视施加的压力是针对南方，在这里，社会规范通过州和地方立法支持，限制了非洲裔美国人的就业机会。这种压力是成功的。图 28—3 显示了在南卡罗来纳州纺织行业的就业，是一条引人注目的证据。注意直至 1965 年，非洲裔美国人的份额（他们只限于最卑贱的工作）很低但稳定。从某种意义上说，雇主可能会欢迎联邦的压力。例如，想要利用相对廉价的非裔美国人的南卡罗来纳州的雇主，可以以联邦制裁为威胁，作为打破既定的种族规范的借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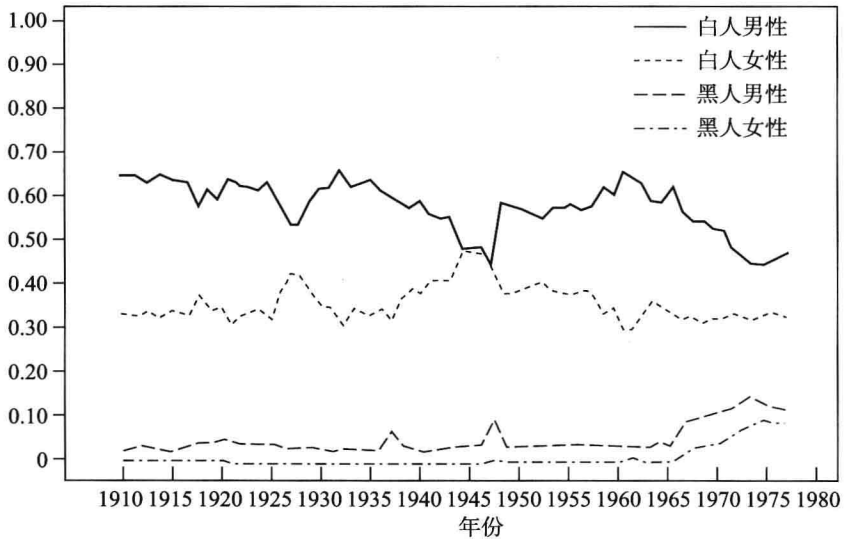


图 28—3

美洲印第安人

尽管 20 世纪 60 年代道德觉醒之后歧视性障碍受到侵蚀，但歧视性障碍因其在过去和现在的影响继续付出沉重的代价。美洲印第安人的战后经济史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在 2000 年的人口普查中，约有 410 万人，即人口总数的 1.5%确定自己（单独或与其他种族组合）是美国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约 310 万人确定自己

属于某个部落。家庭收入中位数是 32 116 美元，约 80 万名美国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收入下跌至贫困线以下。

目前的保留地和托管领土只是剩余的一小部分残余，当然，即使是只有一小部分，也仍属于 19 世纪的印第安人的土地。1887 年国会通过了《道斯法案》(Dawes Act)，该法案规定，每个注册的美洲印第安人将获得 160 英亩将被托管 25 年的土地。从理论上讲，当时的想法是，通过土地“私有化”，可以创造一个有效率的富裕农民的经济体系。但是，伦纳德·A·卡尔森和许多其他经济史学家认为，设计该方案是为了阻挠印第安人农业的发展和促使美洲印第安人的财产转让给白人。在 1887—1920 年，美国印第安人持有的土地从 13 800 万英亩下降至5 000万英亩。该分配方案在 1934 年由《印第安人重整法案》(Indian Reorganization Act) 代替，终于设法保留保留地和托管领土。

许多印第安人选择自己的拒绝市场、符合传统价值观的生活方式，但是也存在许多企业家精神的例子。通常，企业家首创精神被政府的以牺牲印第安人、造福美国白人的政策故意挫败。李·奥尔斯顿和巴勃罗·史必乐重新分析了一个 19 世纪著名的例子——切罗基地带 (Cherokee Outlet) 案例。早在 1867 年，切罗基族已出租一部分他们的土地给白人畜牧主。租赁安排由联邦政府支持，它使用骑兵让占地人远离土地。政府在 1888 年结束了该安排。一些畜牧主为这块地向切罗基族出价 3 000 万美元。相反，代表白人殖民者的政府，迫使切罗基族将土地以 870 万美元卖给政府。

最近，美国印第安人企业家精神最明显的标志是一直快速增长的游戏。2002 年，全国约有 200 个部落主办游戏。1998 年游戏收入为 85 亿美元，相当可观；2002 年，收入为 145 亿美元，每年增长 13.4%。然而，大部分收入是在少数几个大型设施产生的。2002 年，前 12%的印第安游戏设施带来了总收入的 65%。[①] 此外，人们已经提出了关于游戏收益的“涓滴”程度和舒缓整个美洲印第安人经历的经济萧条的严重问题。尽管游戏很突出，认为这是印第安人企业家唯一的成功形式是错误的。印第安人已经成功地从事制造业、农业、旅游业和其他行业，而且在全国各地广泛多样化地开展经营。密西西比河乔克托人 (Choctaws)，亚利桑那州的怀特山阿巴契人 (Apaches)，蒙大拿州的平头印第安保留区的萨利什 (Salish) 和库特奈 (Kootenai) 部落，以及新墨西哥州的科奇蒂普埃布洛人 (Cochiti Pueblo)，均已被认为是以保留地为基础的经济的企业家精神的成功例子。

新的移民

从 20 世纪 20 年代建立配额制度直至 1965 年，移民法几乎没有发生一点变

① See the National Indian Gaming Commission at http://www.nigc.gov.

化。这一概括的重要例外是一个计划，根据它，墨西哥农业工人（墨西哥短期合同工）可以暂时在美国工作。这项计划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尽管它为战争时期的努力做出贡献是值得怀疑的），结束于1965年，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自由立法浪潮的另一种结果。①

当时，一个新的移民制度开始实行。总统约翰·F·肯尼迪和他在国会的盟友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反映种族和民族偏见的国家配额。在肯尼迪去世后制定的新法律取消了配额，它基于人口的民族构成，支持给予家庭团结高度重视的优先事项的复杂系统。对移民总人数设置了一个限额，但该限额不包括美国公民的配偶、未成年子女或父母。1980年，一个单独的吸纳政治难民的方案已建立。由于这些变化，移民人数增加，许多来自“新”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0世纪60年代，37%的移民来自欧洲，39%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13%来自亚洲。到1990年，7%来自欧洲，67%来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22%来自亚洲。

表28—8显示了美国自1901年以来的总入境情况。表中，1965年法律改变之后的移民率加速明显；移民率从1951—1960年期间的1.5‰增至1991—2000年期间的3.4‰。然而，即使是后者的移民率，仍远低于1901—1910年间10.4‰的平均率。

表28—8　　1901—2000年移民

年份	总计（千人）	比率（每年每千美国人口）
1901—1910	8 795	10.4
1911—1920	5 736	5.7
1921—1930	4 107	3.5
1931—1940	528	0.4
1941—1950	1 035	0.7
1951—1960	2 515	1.5
1961—1970	3 322	1.7
1971—1980	4 493	2.1
1981—1990	7 338	3.1
1991—2000	9 095	3.4

资料来源：*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section 1, 10.

① Lee J. Alston and Joseph P. Ferrie, “The Bracero Program and Farm Labor Legis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T.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表 28—8 的数字没有考虑非法移民，特别是来自墨西哥和拉丁美洲的非法移民。有证据表明，虽然难以衡量，但这些移民数量很大。例如，在 1990 年，约有 120 万名非法侨民在企图从墨西哥越境进入美国时被逮捕。想办法处理非法移民的压力导致 1986 年《移民改革和控制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 of 1986）的通过，进而对非法移民实施强硬的新管制措施（例如，规定雇主雇用无证劳工为非法），同时给已经在这个国家扎根的非法入境者创造一个大赦方案。

许多美国人受益于移民：雇用移民的公司所有者（包括那些间接通过退休基金拥有公司的人），当非熟练劳动力被广泛使用时他们拥有的特殊技能变得更有价值的人，消费由移民帮忙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人，给移民提供服务的人，以及在移民定居的居民区拥有财产的人。

另一方面，在劳动人口中与移民直接竞争的本土出生的工人——例如在城市地区的非熟练工人——面对较低的实际工资和较少的就业机会。很难说这些影响有多大。一些劳动经济学家强调移民和本土工人之间的替代性，这就意味着要降低本土工人的工资。[①] 但也有人已经找到了互补的证据，这意味着要提高本地工人的工资。[②] 最近一个复杂的研究为两者的影响都找到了证据，取决于正在考虑的团体，但强调这两个影响已很小。[③]

美国接收的移民的原籍国也经历了各种影响。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数十年，有人对“人才流失”表示极大的忧虑，美国在发展中国家招来工程师、科学家、医师和类似人员。

在 20 世纪 90 年代，高移民率产生了和 20 世纪初的高移民率大致相同的政治结果：关于移民对工资和社会福利制度的影响的夸大，与对移民做出温和批评的人夸大的谴责相符。对移民的批评是否会导致严重的限制，似乎取决于经济能否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和不断上涨的实际收入。

工　会

工会会员在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急剧增加。工会劳动人口的比例从 1933 年的 14.7%上升到 1938 年 20.4%的非农劳动人口。从 1940 年的 22.5%至 1950 年的 31.6%，在 20 世纪 50 年代保持稳定。在它的高峰期 1953 年前后，约 1/3 的非农劳动人口加入工会。然而，自那以后出现了稳步下降，自 1970 年以

① Jean Baldwin Grossman,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Natives and Immigrants in Produ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4 (1982): 596 - 603, and Vernon M. Briggs, “The Imperative of Immigration Reform,” in *Essays on Legal and Illegal Immigration*, ed. S. Pozo (Washington, D. C.: W. E. Upjohn Institute, 1986), 43 - 71.

② George J. Borjas,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Black, Hispanic and White Labor,” *Economic Inquiry* 21 (1983): 93 - 106.

③ Francisco L. Rivera-Batiz and Selig L. Sechzer,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Immigrant and Native Labo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U. S. Im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licy Reform in the 1980s*, eds. Ira Gang, Francisco L. Rivera-Batiz, and Selig L. Sechzer (New York: Praeger, 1991).

来急剧下降。这可在表 28—9 中看到，其中显示了工会劳动人口比率。到 1994 年，劳动人口参加工会的比例已经回落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的水平。

表 28—9　　1950—2001 年工会会员人数

年份	工会会员总人数（千人）	占平民劳动力总数的百分比（%）
1950	14 294	23.0
1960	15 516	22.3
1970	20 990	25.4
1980	20 968	19.6
1990	16 740	13.5
2000	16 258	11.5
2001	16 289	11.5

资料来源：1950—1980 年：Leo Troy and Neil Sheflin, *U. S. Union Sourcebook* (West Orange, N. J.: Industrial Relations Dat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1985)；1990—2001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03), section 12, 367, 411.

许多因素可以解释工会组织力量的下降。在职工群体通常很小的日益增长的服务业，已经证明难以组织工会。此外，在货物生产部门，已经发生了一个从蓝领到白领就业的稳定转变，这已经放慢了工会增长的步伐，因为白领更不容易组织起来。制造业向传统上就敌视劳工运动的南部和西部的转移，也削弱了工会的权力。使得在工会力量的传统堡垒（如汽车）中的工人害怕裁员和关闭工厂的外国工业的竞争，进一步削弱了工会组织。往往害怕参加工会活动和可能反对工会试图控制劳动力供给的非熟练工人的高移民率，也削弱了工会的力量。

除了这些经济发展趋势，法律环境的变化已经对工会不利。由于《塔夫脱-哈特利法案》（Taft-Hartley Act）设立的立法机会，许多州通过了“工作权利”法。2003 年，19 个州，其中许多州在南方，实施了工作权利法。通过规定在本州范围内强制执行限期加入工会规定的协议是非法的，工作权利法阻碍了组织工会的努力，是工会和非工会工人之间摩擦的一个根源。

工会内的不和也伤害了劳工运动。在工会力量高峰期，美国劳工联盟（劳联）和产业工会联合会（产联）于 1955 年合并，乔治·米尼成为首任主席。把所有工人团结在一个大工会里的激进梦想似乎近在手边，但和谐未能保持。当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在他们充满活力的领导人沃尔特·鲁瑟的领导下，在政治纠纷中离开劳联—产联时，工人团结在 1968 年遭受了尤为严重的打击。同时，许多组织收益正在由独立工会获得，如已被赶出劳联—产联的卡车驾驶员工会。因此，指责主流工会领导导致了工会影响力的部分下降的批评者可能是正确的。

工会组织可以恢复其以前的一些影响吗？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与工会运动有关的经济趋势似乎有可能继续。另一方面，有人指出，在产业结构的某些方面与我

们自己相似的加拿大——尽管其他政策不同，例如移民政策——劳工运动的影响力仍然远远超过美国。最好记住，美国的工会制度传统上是爆发式成长，从未被专家预见过。

实际工资

什么是所有因素——整个战后时期在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出生率、移民、劳动人口参与的变化等的净结果？图 28—4 显示了自 1960 年至 1995 年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发生的变化。从战争结束到 20 世纪 70 年代，劳动生产率和实际工资均稳步增长，从而产生一个以广泛富裕为特点的未来梦想。然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如前所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和实际工资的增长转向较低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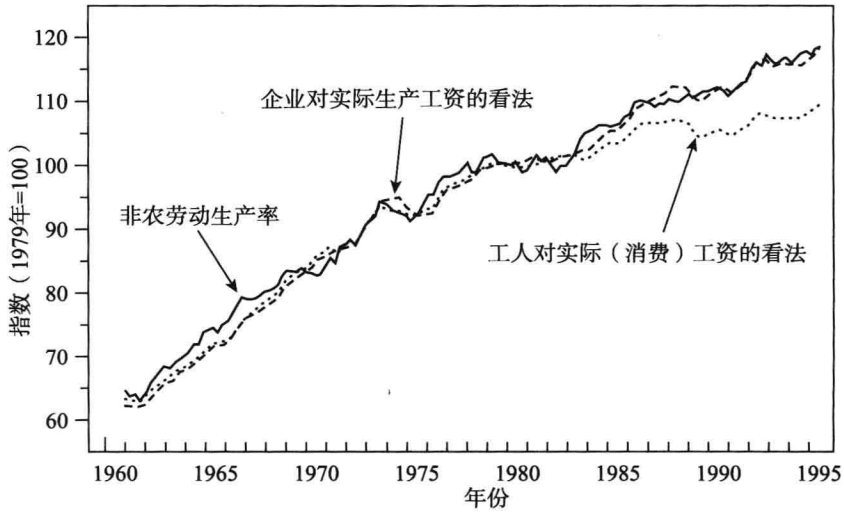


图 28—4　实际补偿和劳动生产率的衡量

注：实际生产工资已跟上生产率，而实际消费工资却未跟上。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1996*（Washington，D. 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6），61.

图 28—4 显示了 2 组实际工资系列。较高的线是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实际工资。它给出了工资和福利相对于企业收到的价格的比例。较低的线是从工人的角度来看实际工资。它给出了工资和福利相对于工人支付的价格的比例。两者可区分是因为和企业相比，消费者会把他们收入中较大的比例花在某些物品上。由此可见，实际工资，特别是从工人的角度来衡量的实际工资，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初进入长期的停滞。经济透视 28.2 探讨了实际工资和平均劳动产品之间随着时间推移的密切关系。

如何解释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数据具有误导性。例如，

用于衡量实际工资的价格指数已受到批评，因为它未正确考虑在电子、医药和其他领域的质量改善。虽然这种批评无疑有一定的道理，但看来从战争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和其后几年期间的实际工资增长也有一个真正的区别。此外，一些经济学家声称，战后早期几十年是例外。也许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生产力增长率从长期来看是更有代表性的期待。这一言论对于政策制定者有用，但对于工人来说是无用的安慰。

经济透视 28.2

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根据经济学理论，实际工资应该等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MPP*）。

$$\text{实际工资} = MPP \tag{1}$$

用商品和服务来衡量，多雇用一个工人的成本应该等于额外的产量。这个等式告诉我们生产力是工资的重要决定因素，但哪些因素将决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考虑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Y = AK^{a}L^{(1-a)} \tag{2}$$

其中Y是产出，A是技术效率水平，K是资本额，L是劳动的数量，a是资本的份额，而$(1-a)$是劳动的份额。有了这个生产函数，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由式（3）给出：

$$MPP = (1-a)\ A\ (K/L)^{a} \tag{3}$$

这个等式表明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是由经济中效率的一般水平A和资本劳动比(K/L)决定。由美国劳工部衡量的劳动生产率与新闻界报道的（所生产的产出量与所雇用的劳动量的比率）劳动的边际物质产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在此模型中，关系由式（4）给出：

$$MPP = (1-a)\ (Y/L) \tag{4}$$

换句话说，如果系数a是稳定的，劳动的平均产品(Y/L)和劳动的边际产品之间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关系。如果方程式（1）及（4）都不变，随着时间的推移，实际工资和平均劳动产品之间应该存在密切的关系。事实上，这正是图28—4所要表明的。

许多因素，其中一些已经在前面的章节中讨论过，解释了实际工资增长的放缓。（1）20世纪70年代以后，储蓄率相对较低，从而压制了资本劳动比的提高。（2）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如劳动人口参与率的上升，也压制了资本劳动比的提高。（3）向服务业的转变、能源危机，以及有人会说，遵守政府法规的成本使生产率下降。新观点28.1讨论了两个额外的因素：自动化和裁员。

不可避免的是，实际工资增长的停滞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经济史学家回想起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那些年，实际工资增长缓慢产生了激进的工会及来自广大民众对政府必须拆散大公司和限制移民的要求。21世纪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面对一个与战后时代的最初几十年所设想的未来非常不同的现实。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lston, Lee J., and Joseph P. Ferric. "The Bracero Program and Farm Labor Legislation in World War II." In *Sinews of War: Essays 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World War II*, eds. Geofrey T. Mills and Hugh Rockoff. 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

Alston, Lee, and Pablo Spiller. "A Congressional Theory of Indian Property Rights: The Cherokee Outlet." In *Property Rights and Indian Econom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Forum*, ed. Terry L. Anderson. Baltimore: Rowman & Littlefield, 1992.

Barrington, Linda, ed. *The Other Side of the Frontier: Economic Explorations into Native American History*. Boulder and Oxford: Westview Press, 1999.

Borjas, George J. "Economic Benefits from Immigr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9 (1995): 3 - 22.

Briggs, Vernon M., J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Labor For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Carlson, Leonard A. "Federal Policy and Indian Land: Economic Interests and the Sale of Indian Allotments, 1900—1934." *Agricultural History* 57 (1983): 33 - 45.

Chiswick, Barry R. "The Effect of Americanization on the Earnings of Foreign-Born Me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6 (October 1978): 897 - 921.

The Civil Rights Division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 history. http://www. usdoj. gov/crt/crtann. html.

Collins, William J. "African-American Economic Mobility in the 1940s: A Portrait from the Palmer Survey."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 (September 2000): 756 - 781.

——. "Race, Roosevelt, and Wartime Production: Fair Employment in World War II Labor Marke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 (March 2001): 272 - 286.

David, Paul A. "C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332 - 337.

Donohue, John H., III, and James Heckman. "Continuous versus Episodic Change: The Impact of Civil Rights Policy on the Economic Status of Black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9 (1991): 1603 - 1643.

Easterlin, Richard.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Population Growth"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05 - 548.

Fisher, Franklin. *Folded, Spindled, and Mutilated*. Boston: MIT Press, 1983.

Freeman, Richard B. "Unionism Comes to the Public Sector."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4 (March 1986): 41 - 86.

——. "The Labour Market in the New Information Economy."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18 (2002): 288 - 305.

Freeman, Richard B., and James L. Medoff. *What Do Unions Do?*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Galbraith, John Kenne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Goldin, Claudia. "The Changing Economic Role of Women: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3 (Spring 1983): 707 - 733.

——. "The Female Labor Force and American Economic Growth, 1890—1980." In *Long Term Factor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Gallrna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 *Understanding the Gender Gap: An Economic History of American Wome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Labor Market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549 - 624.

——. "The Human-Capital Century and American Leadership: Virtues of the Past"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 (2001): 263 - 292.

Jacoway, Elizabeth, and David R. Colburn. *Southern Businessmen and Desegregation*.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

Labor History Sources in the Manuscript Divis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www.loc.gov/rr/mss/laborlc.html.

Lamoreaux, Naomi R., Daniel M. G. Raff, and Peter Temin, eds. *Learning by Doing in Markets, Firms, and Count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Liebowitz, S. J., and Stephen E. Margolis. "The Fable of the Keys." *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 33 (April 1990): 1 - 25.

——. "Path Dependence, Lock-in, and History."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1 (1995): 205 - 226.

——. *Winners, Losers and Microsoft: Competition and Antitrust in High Technology*. Oakland, Calif.: Independent Institute, 1999.

Mansfield, Edwin. "Technology and Produ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Martin Feldste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80.

Margo, Robert. "Race Differences in Public School Expenditures: Disenfranchisement and School Finance in Louisiana, 1890—1910." *Social Science History* 6 (Winter 1982): 9 - 33.

——.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 Segregated Schools: The Effects of Separate But Equ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September 1986): 794 - 801.

——. *Race and Schooling in the South, 1880—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Musoke, Moses S., and Alan L. Olmstead. "The Rise of the Cotton Industry in California: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2 (1982): 385 - 412.

Piore, Michael J. *Birds of Pass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osner, Richard A. *Antitrust Law*.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Reid, Joseph D., Jr. "Future Unions" *Industrial Relations* 31 (1992): 122 - 136.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3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1950.

Simon, Julian C.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Immigr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9.

Smith James P., and Finis R. Welch. "Black Economic Progress after Myrdal."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6 (1989): 519 - 562.

Stigler, George J.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Antitrust Law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9 (1966): 225 - 258.

Temin, Peter with Louis Galambos. *The Fall of the Bell System: A Study in Prices an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iffany, Paul A. "The Roots of Decline: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in the American Steel Industry, 1945—1960."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4 (1984): 407 -419.

Tomlins, Christopher. "Labor Law."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I,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625 - 692.

Weir, David R. "A Century of U. S. Unemployment, 1890—1990: Devised Estimates and Evidence for Stabilization."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14 (1992): 301 - 346.

Wilson, William Julius.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2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Wright, Gavin. *Old South, New South: Revolutions in the Southern Economy Since the Civil Wa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

第 29 章　过去的成就，未来的挑战

本章主题

在第 1 章，我们描述了在 20 世纪期间美国经济的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化。举一个有趣的例子，你会记得自 20 世纪初以来，威斯康星大学的大学生橄榄球和篮球运动员的身高和体重的大幅变化吗？现在你意识到自殖民时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每一个部门以不断变化为特征，而且，你知道美国经济是如何从那时一直走到现在的。你知道了英国的殖民政策、奴隶制、铁路、关税、银行、大萧条、滞胀和许多其他主题。我们不会试图在这一章总结所有论点。相反，我们将关注找出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成就和一些未来的重要挑战。历史不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水晶球。充其量它给我们提供有益于迎战不可预知的未来的教训。正如本书所说，美国面临着伊拉克战争造成的巨大的不确定性。将有不可预测的事件以及基于过去的经验不能解决的问题。但美国对战争和类似形式的逆境做出反应的经济史提供了有助照亮未来的重要教训。

过去的成就

美国经济的成就是真实且可衡量的。在这里，我们不能叙述在前面 28 章中

所记录的成就，但我们将描述是这些成就的顶点的三个方面的发展：(1) 经济成就的常规指标——实际人均收入的上升；(2) 地区间人均收入的收敛，特别是南方进入经济主流的一体化；(3) 福祉的各种不同的生物医学指标的改善，其中福祉已经越来越多地被经济史学家用于证明经济发展。

实际收入增长迅速

我们判断我们的经济表现，首先是看它使美国人的实际收入水平上升的能力。图 29—1 显示了人均实际收入自 1870 年以来在大量增加。虽然有几个大的波动围绕着该趋势，特别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的减少，长期趋势是明显上升。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后代将会变得比过去几代人更富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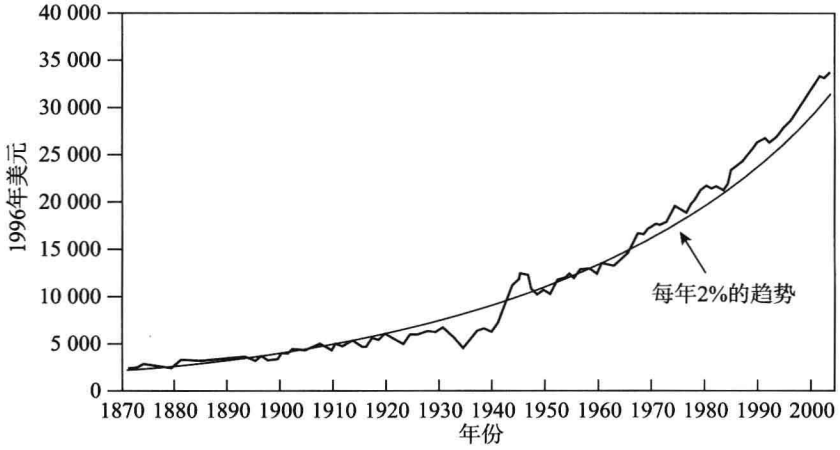


图 29—1　1870—2002 年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资料来源：1870—1928 年：Louis D. Johnson and Samuel H. Williamson，"Source Note for US GDP"；1789—2002 年：http：www. eh. net；1929—2002 年：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2001) at http://www. bea. gov，所有数据以 1996 年美元为基准。

表 29—1 显示了自 1960 年以来的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实际消费，以及每年的增长速度。该表表明了实际收入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已大幅上升。此外，实际人均消费量的数字显示出类似的趋势。一些经济学家会说，实际人均消费是衡量经济为一般美国人带来好处的最佳单一指标。增长率每年高于 2%，看来很小，但几十年后就增长了。2001 年的实际人均收入几乎是 1960 年的 2.5 倍。事实上，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充分考虑可能采取的质量改进——例如上代人之前不存在的各式各样的电子——当代人相对于过去处于更好的位置。

表 29—1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实际个人消费（人均，以 1996 年美元计算）

年份	国内生产总值（十亿美元）	平均年增长率（%）（过去 10 年）	个人消费支出（美元）	平均年增长率（%）（过去 10 年）
1960	13 148		8 358	
1970	17 446	2.83	11 300	3.02
1980	21 521	2.10	14 021	2.16
1990	26 834	2.21	17 899	2.44
2000	32 579	1.94	22 061	2.09
2001	32 352	1.70[a]	22 390	2.04[a]

a. 自 1990 年起的数据。

资料来源：*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2003*（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Table B-31.

此外，与其他工业化国家相比，美国大约已经完成预期可及的收入增长。表 29—2 比较了美国和其他主要工业国的人均收入水平。这种比较本来就困难，就像在不同的时间点上比较收入，但它们毕竟是铁事证据的改进。正如你可见的，大多数其他工业国家的人均实际产品仍然比美国低，而且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甚至相对于美国下跌。

表 29—2　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选定的国家占美国的百分比（%）

国家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美国	100	100	100
加拿大	84	83	80
法国	79	76	72
德国	69	78	73
意大利	71	73	69
日本	67	87	79
瑞典	78	75	70
英国	67	71	69

资料来源：1980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6*，section 30，Table 1335，836；1990 年、2000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section 30，Table 1319，833。

其他国家可能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使许多美国人担心。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自己的消费水平无须仅仅因为他国消费水平正在上升而下降。全球经济与橄榄球比赛不同；在经济比赛中，所有团队都能出人头地。

落后地区已赶上

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南部地区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讨论了一些抑制南部经济发展的制度。然而，从长远来看，如图29—2所示，在美国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已逐渐趋同，尽管仍然存在一些差异。收敛主要是由市场力量带来的，虽然政府将资源从一个地区重新分配到另一个地区的政策也发挥了作用。劳动力已从劳动力丰富的地区，如南方，迁移到劳动力匮乏的地区，如太平洋海岸，从而提高劳动力输出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并降低劳动力输入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类似地，资本已从资本充裕的地区，如东北，迁移至资金匮乏的地区，如南方，从而降低资本流出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并提高资本输入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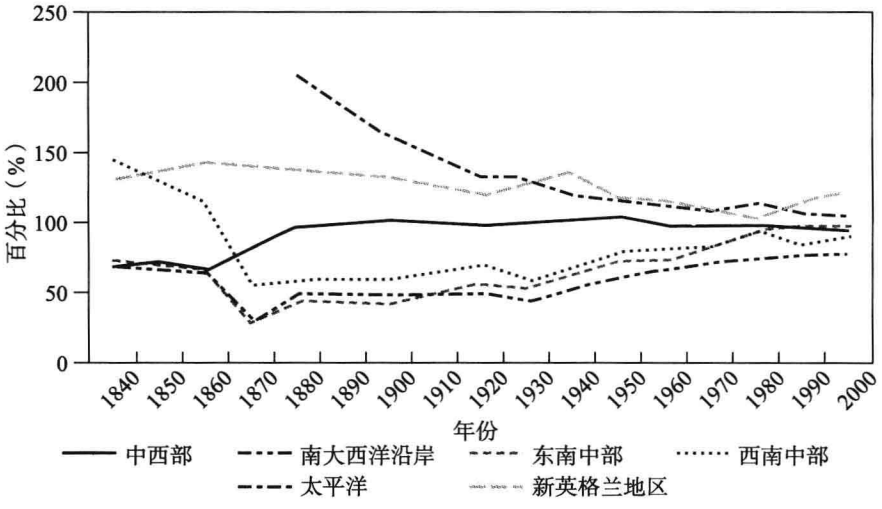


图29—2　美国人均收入的趋同

资料来源：Richard A. Easterlin，“Regional Income Trends 1840—1950，”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eds.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New York：Harper & Row，1971），40；*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 and previous editions.

福祉的生物医学指标明显改善

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实际收入指标，与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个人幸福是不

完全相关的。困难之一就是经济学家所说的“指数问题”。在通常情况下，实际收入的计算方法是用加权平均价格去除货币收入，其中权重是由基期消费的数额决定。这对于目前的消费数量与基期相同的商品有效。但是，对于由于被一些新的或更好的商品所替代而导致其消费数量下降的商品来说该怎么办？在这种情况下，基于旧权重的价格指数往往低估了实际收入的增加。计算价格指数的政府机构都很明白这个问题，并已开始使用“链指数”，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该问题，其中的权重每年更新。尽管如此，由于新产品的推出，比较今天与20年前的实际收入仍然困难。计算机革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小型数字助理、个人电脑、DVD、电子象棋软件、视频游戏、手机等已经增加了我们的幸福，但却未完全反映在实际收入指标中，是“指数问题”的受害者。

而且，实际收入仅仅是使个人幸福的许多因素之一。因此，经济史学家越来越求助于健康和福祉的生物指标，以补充他们对经济增长的成就和失败的理解。（见经济透视29.1所提供的基于身高的见解的讨论。）这些指标表明在战后时期，在美国生活的人有着更健康的身体，正如死于特定疾病的死亡率和更广泛的健康指标如婴儿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的统计数字所揭示的一样。

经济透视29.1

男性身高作为福祉的一个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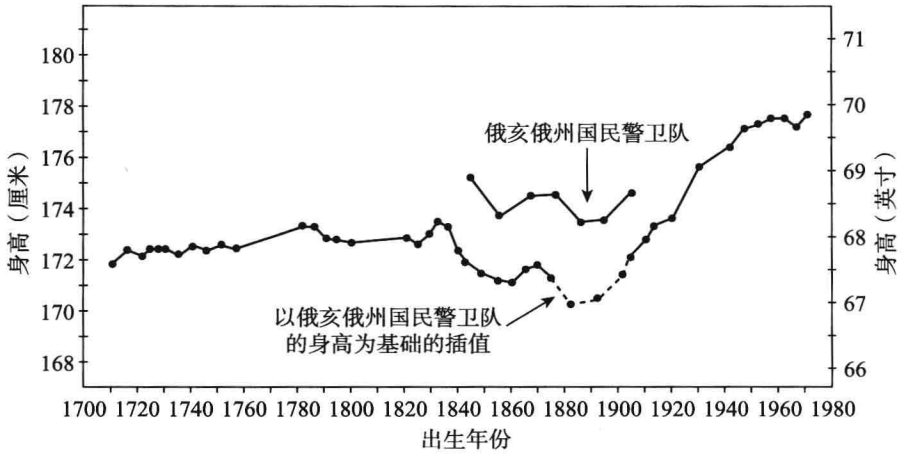
最敏感的人口动态统计之一是身高。身高是多种因素的结果，包括营养和疾病，而且与收入水平和分配密切相关。身高可作为补充收入的一个福祉指标，并可帮助我们理解用收入的常规方法衡量的福祉不可靠或无法使用的时期或地方。在一定程度上通过罗伯特·W·福格尔、约翰·科姆洛什、理查德·斯特克尔和其他知名学者的影响，对各年龄所对应的身高所做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史的一个“热门话题”。

这里的数字显示了从殖民时代到现在根据出生年份排列的美国白人男性的成人身高。这些数据来自不同的来源。例如，当男人应征入伍时，他们要测量身高。正如你能看到的，这一数字讲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这与表明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稳步上升的图29—1不同。很明显，美国男子的身高在殖民时代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低于现代标准。然后，身高从19世纪40年代下降，一直到20世纪初，此时成年男性的身高开始了至现代水平的长期增长。

导致身高下降的原因还不清楚。城市化似乎并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农村和城市地区的身高都在下降。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平等是现在正在研究的一种可能性：穷人可能没有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可能性是，人口流动增加——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其他国家和美国之间——传播儿童传染性疾病，阻碍很多人达到他们充分的成人身高。

我们可以从对年龄所对应的身高的研究中导出的一个重要的教训是，虽然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是经济如何多产的有用的简要衡量方法，我们需要其他方法

来获得一个全面的图景。经济史学家长期使用如工业生产指数和消费价格指数等方法。现在他们开始认识到从其他学科获取的更多方法，如按年龄所对应的身高，可以提供重要的见解。



不同出生年份的本土出生的成年白人男性的平均身高

资料来源：Richard H. Steckel，“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1995)：1920.

如表 29—3 所示，战后时期在减少多种疾病导致的死亡率方面已经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例如，流感和肺炎的死亡率从 1940 年的 10 万分之 70.3 下降至 2000 年的 10 万分之 20.3，部分原因是抗生素的使用。请注意，人口的年龄分布对死亡率会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如果每个年龄组人口的比例保持不变，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将从 1940 年的 10 万分之 485.7 下降到 1990 年的 10 万分之 189.8。实际死亡率只是由 10 万分之 485.7 下降至 10 万分之 368.3。医疗技术的迅速改善提高了生活水平，而对于一些疾病，采用更健康的生活方式已经产生了这些改善。此外，每 10 万人拥有的活跃的医师数从 1970 年的 153 个增加到 2000 年的 251 个，部分原因是在国外受过教育的活跃医师人数的增加。到该时期结束时，医生们在治疗病人方面比他们在以往医疗科学史上显然更有效率了。

表 29—3　1940—2000 年选定疾病的死亡人数（每 10 万人：未调整年龄的数字放在括号里）

	194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a]
肺结核	45.9	0.6	(0.9)	0.5	(0.7)	(0.3)
慢性肝病及肝硬化	8.6	12.2	(13.5)	8.6	(10.4)	(9.5)
流感和肺炎	70.3	12.9	(24.1)	14.0	(32.0)	(24.3)
糖尿病	26.2	10.1	(15.4)	11.7	(19.2)	(24.9)

续前表

	194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a]
心血管疾病	485.7	256.0	(436.4)	189.8	(368.3)	(339.3)
艾滋病	NA	NA	NA	NA	NA	5.2

a. 初步数据。

注：1980年和1990年的第一列已进行年龄调整，以显示如果年龄分布情况和1940年相同，死亡率将如何。括号里的数字并未进行年龄调整。无法获得2000年已进行年龄调整的数字。

资料来源：*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Series B149，B157，B158，B159，B160，B162；1980—1990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1995*，section 2，Tables 124，125，91—92；2000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section 2，Table 101，80。

婴儿死亡率是人口总体健康的一个敏感指标，表29—4显示了1940年和1999年之间的婴儿死亡率。婴儿死亡率的下降是巨大的。医学上的改进，如抗生素的发展和收入的提高——因为收入决定了获得营养和医疗保健的机会——说明了导致下降趋势的原因。但是，我们离给定医疗知识现状下的最低水平仍然很远。非洲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为1999年活产婴儿的11.9‰，比白人婴儿死亡率5.8‰的两倍还要高。此外，其他一些国家做得比美国更好，表明可以实现更大的进展。2001年，法国的婴儿死亡率是4.5‰，加拿大是5.0‰，英国是5.5‰。另一个发展潜力指标是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差异很大，从1999年缅因州的4.8‰到可怕的哥伦比亚特区的15.0‰。

表29—4　　1940—1999年婴儿死亡率（每1 000名出生婴儿）

年份	新生儿死亡率（出生至28天）			总的婴儿死亡率（出生至1岁）		
	合计	白人	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	合计	白人	非洲裔美国人及其他
1940	28.8	27.2	39.7	47.0	43.2	73.8
1950	20.5	19.4	27.5	29.2	26.8	44.5
1960	18.7	17.2	26.9	26.0	22.9	43.2
1970	15.1	13.8	21.4	20.0	17.8	30.9
1980	8.5	7.4	13.2	12.6	10.9	20.2
1990	5.8	4.8	9.9	9.2	7.6	15.5
1999	4.7	3.9	7.9	7.1	5.8	11.9

资料来源：1940—1970年：*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Series B 136－147。1980—1990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section 2，Table 122，88。1999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section 2，Table 98，78。

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人口健康和福祉的另一个敏感指标，它不可避免地使大学生感兴趣。这一测量方法还显示了生活水平的稳步提高。对于美国来说，1850年一个白人婴儿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40岁；对于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婴儿，其预期寿命只有23岁。到1900年，白人婴儿的预期寿命已上升至52岁，非洲裔美国人婴儿的预期寿命上升至42岁。[①] 到1940年，白人的预期寿命为65岁，非洲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为53岁。自1940年以来已取得大量额外进展（见表29—5）。在1940年和2000年之间，所有美国人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从63岁上升至77岁，增长了22%。见视角29.1关于有唐氏综合征的人的预期寿命。尽管非洲裔美国人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仍比白人短，但非洲裔美国人预期寿命的增长幅度更大，从53岁至72岁，增长了36%。这是公共健康得到改善、医疗保健获得增加、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一个见证。

表29—5　　1940—2000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岁）

年份	合计			非洲裔美国人[a]		
	合计	男性	女性	合计	男性	女性
1940	62.9	60.8	65.2	53.1	51.5	54.9
1950	68.2	65.6	71.1	60.8	59.1	62.9
1960	69.7	66.6	73.1	63.6	61.1	66.3
1970	70.8	67.1	74.7	65.3	61.3	69.4
1980	73.7	70.0	77.4	69.5	65.3	73.6
1990	75.4	71.8	78.8	72.4	68.4	76.3
2000	76.9	74.1	79.5	71.7	68.2	74.9

a. 1940—1960年的数据包括其他少数族裔。

资料来源：1940—1990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section 2, Table 116, 84 and previous editions。1996—2000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section 2, Table 91, 71。

美国健康和福祉的增加（当从其他发达国家或美国最成功的州的角度来看，是缺乏进展）可以追溯到各种因素，包括营养、生活方式和医疗保健的使用。直到1940年，只有7%左右的美国人口有某一种医院保险（例如，几乎每个人都必须支付某一种医院费用的预付费）。这一比例在战后时期由于新的政府计划而急剧上升——最重要的是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以及通常由雇主提供的私人保险

① Michael Haines, "The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790—1920," in *The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 II, eds. Stanley L. Engerman and Robert E. Gallma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58.

的扩展。2000年，86%的人口被私人或公共健康保险所覆盖。然而，一个令人担忧的仍然未被健康保险覆盖的人口部分是贫民。2000年，只有70%的生活在收入在贫困线以下家庭中的人有某种强制医疗保险。[①] 拥有某种形式的保险的很多人担心保险是否足够。例如，关注的重点是，医疗保险制度直到2004年才涵盖药品费用。

视角 29.1

弱智人群预期寿命的增加

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影响了广泛的群体，这些人传统上被排除在美国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主流之外。弱智人群就被排除在外。比如，最近的一项研究[②]揭示了患唐氏综合征（导致弱智的一种遗传缺陷）的人的寿命有了惊人的增加。对于患这种病的白人，其死亡年龄中位数由1968年的2岁增加至1997年的50岁。患有唐氏综合征的非洲裔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也有惊人的增加，但与福祉的其他衡量方法一样，两个人种之间的增长率差距仍然存在。在1968年，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大多数非洲裔美国人在出生后的第一个生日前死亡。不过，到1997年，死亡时的年龄中位数上升至25岁。对于白人，进展在整个期间保持稳定。对于非洲裔美国人，1982年左右才开始有进展，而大部分改善是1992年以后实现的。

虽然目前尚不知道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人预期寿命增加的原因，似乎有可能是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童在家抚养频率的增加，而不是转入各种公共机构的控制中。这导致改善的管理、营养、医疗保健和情感支持。

医疗保健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弥补先天性心脏缺陷（相当数量的少数患有唐氏综合征的人为该病所困）的手术方法的发展和使用（往往在幼年时）。

未来的挑战

美国经济在20世纪取得的成就，看起来就像是1901年的某些人所期待的科幻小说。但是，我们也将在未来几年面临挑战。在此，我们考虑最重要的三项：收入分配的明显恶化，人口老龄化，以及寻找有意义的人生。

① 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102.

② J. M. Friedman, "Racial Disparities in Median Age at Death of Persons with Down Syndrome—United States, 1968—1997",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 June 8, 2001, 463-465.

改善收入分配

很多美国人，特别是大学生，担心他们即使身处经济增长中却不能分享其成果，因为收入分配正变得不那么平等。富人正占用所有的收益。关于互联网创业者或体坛顶尖人物的惊人收入的故事看似肯定了富人正变得更富而穷人正变得更穷的印象。

由此可见，战后时期家庭收入分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将 2000 年的分配与 1947 年的分配相比。显然，收入分配自 1967 年以来已经变得不那么平等。最低收入的 1/5 的人的份额已经从 5.5%下降到 4.3%。十分突出地，最贫穷的 1/5 的人所占的份额已经下降了将近 25%。[①] 另一方面，前 5%的人所占的份额已从 1967 年的 15.2%上升到 2000 年的 20.8%，增加了 31%。

虽然表 29—6 所示的分配正在恶化的证据很明确，这种变化的原因，正如思想丰富的分析家们，比如罗伯特·W·福格尔所指出的，是复杂的。[②] 他和其他分析家根据他们对收入分配的基本决定因素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我们将在下面讨论。再次，我们必须提醒你经济推理命题 5 的重要性。判断必须基于对所有证据的仔细检查。收入分配是一个情绪问题，人们可能根据几个例子或几个数字就对此问题草率下结论。

表 29—6　　货币收入在家庭之间的分配（%）

年份	最低的$\frac{1}{5}$	次低的$\frac{1}{5}$	中间的$\frac{1}{5}$	次高的$\frac{1}{5}$	最高的$\frac{1}{5}$	最高的 5%
1947	5.0	11.9	17.0	23.1	43.0	17.5
1957	5.1	12.7	18.1	23.8	40.4	15.6
1967	5.5	12.4	17.9	23.9	40.4	15.2
1980	5.2	11.5	17.5	24.3	41.5	15.3
1990	4.6	10.8	16.6	23.8	44.3	17.4
2000	4.3	9.8	15.5	22.8	47.4	20.8

资料来源：1947—1967 年：U. S. Bureau of the Census,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eries P-60, no. 118, Table 13；1980—1990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section 14, Table 745, 471；2000 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section 13, Table 659, 437。

① [(4.3−5.5)/(0.5×5.5+0.5×4.2)]×100%=−24.5%。

② Robert W. Fogel,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217 - 222.

（1）工作时间分布的变化已经对收入分配产生重大影响。在1890年，穷人一般比有钱人工作更多的时间。现在，穷人比占了相当大比例的收入最高的1/5的专业人员工作时间少。双薪家庭——其中有两个家庭成员是高薪专业人士，曾经是罕见的，现在已司空见惯。表29—7显示了不同类型的家庭在过去30年里的情况。有两名有偿劳动力的家庭的实际收入已经显示了实际收入的最快增长。

表29—7　　不同类型的家庭的实际家庭收入中位数（1998年美元）

家庭	1970年	1980年	1990年	2000年[a]	1970—2000年年度增长率（%）
已婚夫妇家庭	41 504	45 832	49 754	57 141	1.07
妻子是有酬劳动力	48 450	53 235	58 337	67 075	1.08
妻子不是有酬劳动力	36 720	37 575	37 744	38 363	0.15
男户主，目前没有妻子	35 568	34 697	36 224	36 233	0.06
女户主，目前没有丈夫	20 101	20 614	21 116	24 904	0.71
所有家庭	38 942	41 637	44 090	49 133	0.77

a. 初步数据。

资料来源：1970—1990年：*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section 14，Table 748，472；2000年：*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section 13，Table 662，438。

（2）人们从一个收入阶层移动到另一个收入阶层的流动性必须考虑在内。处于最低收入类别的家庭可能是由于暂时的原因：一个倒霉的小企业老板或者一个刚下岗和暂时经历低收入的大公司主管。高度熟练和雄心勃勃的移民可能进入最低类别，但会逐步建立起他们的事业。

（3）公共政策应首先注重长期贫困的人及消费无法比贫困线收入多的人。这些个人和家庭占所有家庭的大概4%；他们被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称为“真正的弱势群体”。美国有帮助这些人实现体面的物质生活水平的能力。

（4）几乎所有观察家都同意，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对训练有素的人员的需求一直在急剧增长，相比之下，对只受过高中教育的人员的需求则比较低迷。这主要是由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对医药、计算机、金融及类似领域训练有素的人员的需求增加了。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由于政策失误。在20世纪70年代，供过于求的恐惧导致政府削减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支持。例如，医学学位的授予数量在1984年后下降。完善收入分配可能需要政府资助更多的教育。

照顾老年人

美国人在这个新世纪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需要照顾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如表 29—8 所示，起初，社会保障是一个保险制度，依据的原则是生息基金的建立应从个人收集的保费中来，而且该基金应足以应付未来的债务。税收于 1937 年开始收取，但一直到 1942 年才为了积累储备提供福利。但是，增加福利的政治诱惑变得太大，并在 1939 年通过了将社会保障转换成现收现付制的立法，使得受益人完全由那些目前将钱存入该制度的人支持。

表 29—8　　1960—2000 年老年人口

65 岁及以上的人	1960 年	1970 年	1980 年	1990 年	2000 年
合计（百万人）	16.7	20.1	25.6	31.1	35
占总人口的百分比（%）	9.2	9.8	11.3	12.5	12.4
占 18～64 岁人口的百分比（%）	17.0	17.0	19.0	20.0	21.0

资料来源：1960—1990 年：*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0*，section 1，Table 12，13；2000 年：*Th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2002*，section 1，Table 12，14。

在随后的几年，社会保障福利的迅速增加有几个原因：人口老龄化，更多的工人被覆盖，以及福利与价格水平指数化。不可避免的是，税率必须提高：从 1937 年的 2.0%提高到今天的 15.3%。最高纳税额从 1937 年的 60 美元（约为今天的 750 美元）上涨至今天的 11 659 美元。从法律的角度来看，一半的税收由雇主支付，另一半由雇员支付。但是，经济学家承认，税收的经济轨迹可能与法律轨迹非常不同，而且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实际上，工人通过直接的贡献或接受较低的工资支付了大部分税收。1950 年有 4 330 万名向该体系存钱的职工和 290 万名受益人，受益人与工人的比例为 1∶16.5。到 1975 年，有 1.002 亿名被覆盖的工人和 3 110 万名受益人，受益人与工人的比例为 1∶3.2。今天，有 1.529 亿名被覆盖的工人和 4 520 万名受益人，受益人与工人的比例为 1∶3.4。

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危险地接近破产。1982 年 4 月 1 日，该制度的受托人报告说，“社会保障从 1983 年 7 月开始将无法及时支付退休金和抚恤金，除非国会采取纠正措施。”佛罗里达州的众议员克劳德·佩珀——老年人的主要代言人兼众议院老龄工作委员会主席说，受托人的报告“证实了我的信念，即经济表现不佳正在掠夺社会保障信托基金”。连续第 17 年，合并后的老年和残疾信托基金付出的比它们接收的要多，不久，基金将被耗尽。基于以格林斯潘为首的总统委员会的立法拯救了该制度。然而，对于社会保障未来的担忧仍然存在。“私有化”社会保障的建议正在考虑之中。根据这些建议，当前社会保障收入或者加税收入的一部分可投资于私人证券。

追寻有意义的人生

福祉的许多社会指标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恶化”。如表29—9所示，1960—1980年未婚妇女生育率、离婚率、自杀率和谋杀率都上升了。诚然，这些趋势的确切含义很难确定，因为社会可接受的事物在变化。例如，未婚妇女生育率的提高，可能部分反映了社会规范的改变。我们可以通过衡量方法上的国际差异来看对未婚妇女生育的社会规范差异的影响。1992年，美国的该比例为30%，少于瑞典（50%）但多于荷兰（12%）或日本（1%）。社会规范也可能影响变量的报告以及真实水平。同样，国际比较是有益的。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行年龄调整后的自杀率各不相同，从美国的12.3‰到加拿大的12.9‰，到丹麦的20.9‰（在该国与自杀相关的社会耻辱感相对较弱），在西班牙则为7.1‰（在该国与自杀相关的社会耻辱感很强）。事实上，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该趋势的一部分代表福祉的增加——有些人离婚可能会比仅仅是迫于强大的社会压力而维持婚姻更幸福。但总的来说，这些趋势也标志着价值观的恶化，许多人对整个社会和自己的生活深感不安。

表29—9　　选定社会指标的变化：1950—1999年

年份	未婚妇女生育率（%）	离婚率（‰）	自杀率（‰）	谋杀率（‰）
1950	3.9	2.6	11.4	NA
1960	5.3	2.2	10.6	5.0
1970	10.7	3.5	11.6	8.0
1980	18.4	5.2	11.9	10.2
1990	28.0	4.7	12.4	9.4
1999	33.0	4.1	10.7	6.2

资料来源：1950—1970年：*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Series B1, B28, B166, B216, H954；1980—1990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section 2, table 86, 70, Table 130, 94；1999年：*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2*, section 2, Tables 66, 75, 100, 108, 59, 63, 79, and 86。

实际上，最近一本重要的书——《第四次大觉醒》（*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由美国经济史的一个重量级人物罗伯特·W·福格尔所著，声称试图确保所有公民都有实现有意义的人生的精神资源可能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①] 这里提到的精神，福格尔并不仅仅指宗教价值观，虽然它们都属于他所思考的一部

① 标题指的是福格尔的看法：美国正处于一个与重新塑造过去的经济和社会制度复兴类似宗教复兴。

分。他打算也包括能帮助人们应对生活及找到一条有意义的道路的其他价值观和文化传统。

我们将面临的且需要精神和物质资源来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真正的弱势群体需要物质资源以满足日常生活的需要。但这是否足够？是否也需要帮助他们在社会中找到一个有意义的角色？大多数人的退休可能会延迟。社会将如何为退休人员提供有意义的活动，以及会怎样处理经常困扰老年人的抑郁症？另一方面，在经济的一些部门，比如学术界，退休可能会延迟。这些部门的青少年将如何应对他们在阳光下获得位置之前所延误的时间？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和少数族裔参加工作，社会将如何打破阻止他们到达企业和政府的最高梯级的玻璃天花板？随着美国人日益认识到美国边界以外的世界，美国人将如何应对物质收入方面巨大的国际差距？这些问题都不容易回答；它们都要求思考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的新方法。

衰落的先知

未来的情况怎样？过去十年的生产力增长放缓伴随着社会弊病的各项指标如谋杀率的上升，给中心舞台带来了一系列权威人士。他们声称：如果他们不迅速振作起来，美国人将面临生活水平的长期下降。一些人强调储蓄不足和政府赤字；其他人则强调美国对石油的依赖；还有一些人谴责对环境的破坏。

在他广受好评的书——《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一个最具思想性的衰落先知保罗·肯尼迪强调一旦以往的大帝国达到卓越的地位，它们就会呈现衰落的趋势，因为它们已经用尽了自己在国外冒险的资源。自然，曾经目睹越南战争对国内的破坏性后果的美国人，明白他的观点的说服力。

多数学生都熟悉基于环境危险的衰落预言，如全球变暖。我们不想争辩，衰落先知所探讨的问题不是真实的，或者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重要的是要记住，衰落的预言并非只在我们的时代出现。尤其是对于英国，这是一个古老的故事。写于 1798 年，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在他著名的《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中预测，最终英国的人口增长将面临其产粮能力的下降（毕竟，农业土地数量是有限的）。工资将最终下降到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水平。[①] 只有当人口能够以某种方式受到抑制时灾难才可以避免。200 多年后，英格兰的人口和生活水平远远高于马尔萨斯所能想象的。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另一个坚信必然衰落的先知。在他写于 1865 年的名著——《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中，杰文斯预测，英国最终将被迫进入衰退，因为它的煤炭储备（当时其主要的工业动力源）将被耗尽。英国不仅将面临经济衰退，而且

① 马尔萨斯将他的论文修改了多次。在后来的版本中，他承认，对人口增长的道德约束会阻止实际工资下降至维持生活所需的最低水平。

也将面临“道德和智力倒退”[①]。这场灾难从未出现：更多煤炭储量被发现，技术变革允许其他动力源的使用，以及世界贸易的发展使人们有可能摆脱基于英国是唯一的工业国这个前提的理论范畴。

我们不能说当前一代的悲观论者是错误的。分析由美国经济实现的经济增长的长期记录，经济史学家可能持怀疑态度。很久以前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提出了如下观点：

> 我们不能绝对地证明，那些告诉我们社会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和我们的最美好时代已经过去的人是错误的。但来到我们面前的所有人都这么说，用着正好同样明显的理由。[②]

精选参考书目和建议阅读资料

Abramovitz, Moses. “Catching Up, Forging Ahead, and Falling Behind.”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6 (June 1986): 385 - 406.

Blinder, Alan S. “The Level and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Well-Being.”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Martin Feldste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chapter 6.

Browning, Edgar K., and William R. Johnson. “Taxes, Transfers, and Income Equality.” In *Regulatory Change in an Atmosphere of Crisis: Current Implications of the Roosevelt Years*, ed. Gary Walt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9.

Carter, Susan B. “The Changing Importance of Lifetime Jobs in the U. S. Economy, 189—1978.” *Industrial Relations* 27 (1988): 287 - 300.

Center for Population Econom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http://www.cpe.uchicago.edu.

Cherlin, Andrew J. *Marriage, Divorce, Remarriag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Clark, Colin. *The Conditions of Economic Progress*, 3d ed. New York: St. Martin's, 1981.

Cohen, Wilbur J. “Economic Well-Being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In *The American Economy in Transition*, ed. Martin Feldstei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Costa, Dora. *The Evolution of Retirement: An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① 引自 Stanley Engerman, “Chicken Little, Anna Karenina, and the Economics of Slavery: Two Reflections on Historical Analysis, with Examples Drawn Mostly from the Study of Slave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 (1993), 163。恩格曼指出，马尔萨斯和杰文斯都看到了来自不远的将来的紧缩。

② “Southey's Colloquies,” in *Macaulay's Essays* (1860 ed.; American ed., Boston: 1881; Riverside 5d.), Vol. 1, ii, 186. 我们感谢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推荐的这个引文。

1880—189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Costa, Dora L., and Richard H. Steckel. "Long-Term Trends in Health, Welfa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ealth and Welfare during Industrialization*, eds. Richard H. Steckel and Roderick Flou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De Long, J. Bradford. "The Shape of Twentieth Century Economic History."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569,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

——. "Cornucopia: The Pac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7 602, 2000. Available at http://www.nber.org.

Easterlin, Richard A. "Regional Income Trends, 1840—1950." In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ed. Robert W. Fogel and Stanley L. Engerman.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1.

——. "Does Economic Growth Improve the Human Lot? Some Empirical Evidence." In *Essays in Honor of Moses Abramovitz*, eds. Paul David and Melvin Red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 *Birth and Fortun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Fogel, Robert W. "Economic Growth, Population Theory, and Physiology: The Bearing of Long-term Processes on the Making of Economic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4 (1994): 369 - 395.

——. *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Gershenkron, Alexander.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raeger, 1962.

Heckman, John J. "The Central Role of the South in Accounting for the Economic Progress of Black America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0 (1990): 242 - 246.

Joyce, Theodore, Hope Corman, and Michael Grossman. "A 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 of Strategies to Reduce Infant Mortality." *Medical Care* 26 (April 1988): 348 - 360.

Kennedy, Paul.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 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7.

Komlos, John. "The Height and Weight of West Point Cadets: Dietary Change in Antebellum Americ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47 (1987): 897 - 927.

Krugman, Paul R. *The Age of Diminished Expectations: U. S. Economic Policy in the 1990s*, 3d ed.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Lebergott, Stanley. *The American Economy: Income, Wealth and Wan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Levy, Frank. *Dollars and Dreams: The Changing American Income Distribution*. New York: Norton, 1988.

Maddison, Angus. *Phase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Malthus, Thomas R. *An Essay on Population*. London: J. M. Dent, 1914, 2 vol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http://www.cdc.gov/nchs/.

Reich, Robert B. *I'll Be Short: Essentials for a Decent Working Society*. Boston: Beacon Press, 2002.

Ruggles, Patricia, and Michael O'Higgins. "The Distribution of Public Expenditure Among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27 (June 1981): 137 - 163.

Simon, Julian. *The State of Humanity*. Oxford: Blackwell, 1995.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71.

——.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y & Prospec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ess, 1978.

Steckel, Richard H. "Stature and the Standard of Living."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3 (1995). 1903—1940.

Sundquist, James L. *Politics and Policy, The Eisenhower, Kennedy, and Johnson Years*.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8.

Thurow, Lester. *The Zero-Sum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0.

——. *The Zero-Sum Solution*.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5.

Weaver, Carolyn L.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and Dimensions of Crisis in Social Security*. Washington, D. C.: Fiscal Policy Council, 1981.

Wilson, William Julius.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译后记

加里·M·沃尔顿和休·罗考夫合著的《美国经济史》是美国第一批美国经济史教材之一。作者加里·M·沃尔顿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学教授，同时还是经济学教学基金会会长。休·罗考夫是罗格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本书英文版自2001年出版以来，如今已再版十次。

本译作是集体合作劳动的结晶。本书由王珏老师组织翻译，翻译小组成员包括李昊（第1部分）、周嘉舟（第2部分的第7～11章）、何富彩（第2部分的第12、13章和第3部分）、钟红英（第4、第5部分等）。为力求准确、尽量忠实原文，小组成员翻阅了大量资料，互相校对各自的译稿，之后由钟红英、高梦沉反复校对，王珏老师对全稿作了总译校。本书从2010年6月份开始翻译，一直到2011年6月才交稿，我们度过了酷夏严冬，也深深感受到了作为译者的责任和艰辛。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对本译作非常关心，并给予不少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即便如此，由于时间仓促，加上能力有限，我们的译作难免存在疏漏、欠当之处，衷心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译　者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Economy, 10th edition
Gary M. Walton, Hugh Rockoff
Copyright © 2005 by South-Western, a part of Cengage Learning.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Cengage Learning.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原版由圣智学习出版公司出版。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is authorized by Cengage Learning to publish and distribute exclusively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Unauthorized export of this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本书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圣智学习出版公司授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此版本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销售。未经授权的本书出口将被视为违反版权法的行为。未经出版者预先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发行本书的任何部分。

Cengage Learning Asia Pte. Ltd.
5 Shenton Way, # 01-01 UIC Building, Singapore 068808

本书封面贴有 Cengage Learning 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6-1133

教学支持说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分社与人大经济论坛（www. pinggu. org）于 2007 年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后，一直以来都以种种方式服务、回馈广大读者。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教学一线的任课教师与广大学子，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分社与人大经济论坛做出决定，凡使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分社教材的读者，填写以下信息调查表后，发送电子邮件、邮寄或者传真给我们，经过认证后，我们将会向教师读者赠送人大经济论坛论坛币 200 个，向学生读者赠送人大经济论坛论坛币 50 个。

教师信息表	学生信息表
姓名：	姓名：
大学：	所读大学：
院系：	所读院系：
教授课程：	所读专业：
联系电话：	入学年：
E-mail：	QQ 等联系方式：
论坛 id：	E-mail：
使用教材：	论坛 id：
论坛识别码（请抄下面的识别码）：	使用教材：
	论坛识别码（请抄下面的识别码）：

我们的联系方式：

E-mail：gaoxiaofei11111@sina. 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中关村大街甲 59 号文化大厦 1506 室经济分社，100872

传真号：010 - 62514775

附：人大经济论坛（www. pinggu. org）简介

人大经济论坛依托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于 2003 年成立，致力于推动经济学科的进步，传播优秀教育资源。目前已经发展成为国内最大的经济、管理、金融、统计类在线教育和咨询网站，也是国内最活跃和最具影响力的经济类网站：

- 拥有国内经济类教育网站最多的关注人数，注册用户以百万计，日均数十万经济相关人士访问本站。
- 是国内最丰富的经管类教育资源共享数据库和发布平台。
- 提供学术交流与讨论的平台、经管类在线辞典、数据定制和数据处理分析服务、免费的经济金融数据库、完善的经管统计类培训和教学相关软件。

论坛识别码：pinggu _ com _ 1545967 _ 4210768

CENGAGE Learning™

Supplements Request Form（教辅材料申请表）

Lecturer's Details（教师信息）			
Name: （姓名）		**Title:** （职务）	
Department: （系科）		**School/University:** （学院 / 大学）	
Official **E-mail:** （学校邮箱）		**Lecturer's Address /** **Post Code:** （教师通讯地址 / 邮编）	
Tel: （电话）			
Mobile: （手机）			
Adoption Details（教材信息） 原版☐ 翻译版☐ 影印版 ☐			
Title:（英文书名） **Edition:**（版次） **Author:**（作者）			
Local Puber: （中国出版社）			
Enrolment: （学生人数）		**Semester:** （学期起止日期时间）	
Contact Person & Phone/E-mail/Subject: （系科 / 学院教学负责人电话 / 邮件 / 研究方向） （我公司要求在此处标明系科 / 学院教学负责人电话 / 传真及电话和传真号码并在此加盖公章。） 教材购买由 我☐ 我作为委员会的一部分☐ 其他人☐ [姓名：] 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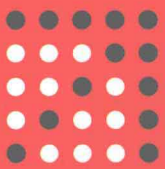
Please fax or post the complete form to（请将此表格传真至）:

CENGAGE LEARNING BEIJING
ATTN : Higher Education Division
TEL: (86) 10-82862096/ 95 / 97
FAX : (86) 10-82862089
ADD: 北京市海淀区科学院南路 **2** 号
融科资讯中心 **C** 座南楼 **12** 层 **1201** 室 **100080**

Note: Thomson Learning has changed its name to CENGAGE Learning

VERIFICATION FORM / CENGAGE LEARNING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6-1133号



CENGAGE Learning
www.cengageasia.com

ISBN 978-7-300-14529-7